

雪域境外流亡記

約翰·F·艾夫唐著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淪陷之前

1933年—1950年

1932年8月，十三世達賴喇嘛憑窗凝視夏宮（羅布林卡，意即寶貝園林）園內，開始寫下了他留給西藏人民的遺囑。他警告，「就是在這裡——西藏的心臟，宗教和政府可能會受到內外夾擊。如果我們不能保衛自己的國家，情如父子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銷聲匿跡，落到無人知曉的地步；僧侶會遭到摧殘，寺院會遭到毀壞；佛法統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員的土地和財產遭到沒收，這些官員將被迫服侍敵人，或像乞丐一樣飄流四方。眾生萬物都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提心吊膽地過日子，苦難的日日夜夜就會沒完沒了，令人難熬。」雖然達賴喇嘛並沒有明說，究竟是誰將給這個國家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但他的意思卻十分清楚：西藏在與世隔絕、平安無事地生存了二千一百年之後，現在災難已經臨頭。

達賴喇嘛的遺言在全國上下流傳了一年之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了。按照慣例，達賴喇嘛的屍體塗上了防腐香油，穿上金線緞袍，端端正正地坐在羅布林卡的寶座上，形似蓮花，面部朝南——這是長壽方向。他的冬宮布達拉宮和拉薩市中心大昭寺的金頂上都插上了黑旗。首都家家戶戶房頂的經幡比平時掛得矮一些，窗洞裡點上了酥油燈。拉薩全城老幼為失去了達賴喇嘛而悲痛萬分，他們滿懷悼念之情列隊瞻仰領袖遺容，並以傳統的姿勢獻上哈達，以表敬意。然而，甚至在政府的信使還沒有來得及將這一消息送往全國各地時，就已經出現了預示土登嘉措的繼任人（藏人認為繼任者是敬愛的領袖本人的再生轉世）將在何方的跡象。

一天上午，僧人侍者來查看達賴喇嘛的屍體，他們走進上了鎖的停屍房，打開了四周撒了鹽的盛屍體的盒子，發現屍體面部方向改變了。現在面部已不是朝南，而是朝著東北方向。他們又將頭扭回原位，可是事隔不久，又發現面部轉向東方。之後幾個月中，相繼出現了一些新的跡象。三位國家一級的曲均（1）面朝東方，降神作法，獻上哈達；在拉薩的大廣場上，有一個供眾集會講經用的台子，台子的東端長出了一片金魚草；在布達拉宮那座建造中的嵌珠寶的達賴喇嘛靈塔的大殿裡，一夜之間東北邊柱子的東側長出了一個龐大的星狀蘑菇。歷代以來，每逢高級活佛去世，就會發生一些有意義的事件，這一次拉薩人民看到了姿態各異的雲朵形狀，雲彩之下是環繞城市東北端的一座座荒涼的高山，一條條彩虹不時橫貫這些雲朵。

1935年春天，西藏新任攝政王熱振仁波齊（2）由十三世達賴喇嘛噶廈政府的一位高級噶倫陪同，來到聖湖拉姆拉措，觀看湖中顯出的幻景。拉姆拉措湖位於拉薩東南九十英里處，它在西藏有幻景的諸湖中最負盛名，在這樣的湖水中，可以預見到未來——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的未來。這個湖呈長方形，週長還不足一英里，處於一盆地之中，海拔一萬七千英尺，周圍是陡峻的高峰。山峰間的氣候瞬息萬變，時晴時雨，一會兒下冰雹，一會兒飄雪花。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靈童，採用的也是這一方法，數百人戲劇性看到了湖中達賴喇嘛的出生地，這一幻景持續了一個星期。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熱振仁波齊希望至少可以看到同樣清晰的景象。

熱振仁波齊一行在附近的恰廓傑寺祈禱數日之後，騎馬來到了俯瞰湖水的石波山腳。然後他們徒步登山，繼續向前，爬上了一山頂，從這裡他們分頭行動，各自去尋找自己能看到的幻景。熱振仁波齊獨自看到了一幅奇景。熱振凝視著北寒帶的清澈湖水時，三個藏文字母映入了他的眼簾：阿、尕、瑪。接著出現的是一座三層樓高的大寺院，金色綠玉色廟頂。有一

條白色大路從寺院通向東面的一棟房子，房前是一座小山，屋頂邊緣的綠松石色瓦片十分醒目，院子中間有一條棕白兩色相間的狗。後來，攝政王又夢見到了這棟貧寒的農夫住房，不過這次還看到了從屋頂伸出來的奇形怪狀的水槽管道，院子當中還站著一個小男孩。

在攝政王的報告提交給在拉薩的上密院之後不久，就向西藏東部派遣了三支尋訪隊，一支前往東南方去達波，一支去東部康省的首都所在地昌都，第三支前往東北部地區安多（3）。第三支尋訪隊於1936年秋天啟程，共四十人，由色拉寺的高級喇嘛格桑仁波齊帶隊。這支尋訪隊騎馬朝東北方向走了一千多英里之後，它選定了安多全區最重要的寺院塔爾寺作為它的尋訪中心。塔爾寺位於中國西部最重要的城市西寧南面十五英里處，由三世達賴喇嘛於三百五十年前始建，這座寺院是為了慶祝藏傳佛教最大的教派「格魯派」（善德之道信徒）的鼻祖宗喀巴的生辰而修建的。這座寺院四周是低矮的山頭，山下是一片肥沃的河谷。這座寺院映入尋訪隊眼簾時，它就像湖水中顯現出來的景色一樣，寺院中心殿堂全是金色綠玉色屋頂。

尋訪隊分成四個小組，開始在這一地區尋找不同凡響的兒童。他們查驗了一些預選兒童，但沒有一個令人滿意。在這裡待到第六個月時，格桑仁波齊不厭其煩，親自去察看一個幼兒的情況。這個男孩住在一個叫扎色（達澤）的農莊裡，位於塔爾寺東面，有兩天的行程。格桑仁波齊之所以注意到了這個小孩，是因為西藏的第二大活佛七世班禪喇嘛（4）曾告訴過他。在赴安多途中，尋訪隊遇到了當時在康區小住的班禪喇嘛，從他手裡得到了可能作為達賴喇嘛靈童的三個人的名單（這是班禪喇嘛自己尋訪的結果）。達澤這個男孩是最後一個有待檢驗的對象。

1937年初冬，格桑仁波齊在一位名叫洛桑才旺的政府官員和兩名侍從的陪同下前往達澤。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們打扮成商人，格桑仁波齊穿一件羊皮長襖當僕人，洛桑才旺裝扮成主人模樣。翌日下午，當他們走近達澤時，一座典型的藏式村莊出現在他們眼前：小山坡簇擁著約三十家農舍，四周是長勢茂盛的青稞地，一直延伸到壯麗的雪峰腳下，其中最為醒目的是河流南面的傑里山。傑里山的下半部長滿了楊樹和針葉松，這裡有兩座小寺院，上面那座小一點的叫噶瑪夏松寺，在歷史上特別有名氣。夏松寺聳立在一座高五百英尺的懸崖峭壁之上，它的殿堂全是在岩石上開鑿出來的，宗喀巴就是在這座寺院裡加入了僧侶的行列，接著他立下了當新教徒的誓言。尋訪隊隊員心裡都記得這些事情。他們騎著馬朝上走，來到了由三座平頂房子組成的建築群前，每座建築都有一個院子，位於山坡上的這些房子比村莊裡的其他建築來說都要高一些。這當中就有他們要尋找的那座房子。這家的房子有一扇笨重的大木門，東牆沒有窗戶，牆的正中有一件華蓋式的棉布裝飾品，裝飾品的上面插著一面十英尺高得白色經幡，上面寫著佛經裡的數千條祈禱詞，經幡在風中嘩嘩飄揚。

這一行人下馬後，拴在大門口的一條棕白兩色相間的猛犬開始叫了起來。這時女主人走了出來，洛桑才旺稱自己是商人，請求借用她的廚房來燒茶——對於西藏的出家人來說，這是司空見慣的。洛桑才旺被領到了北翼好一些的房間，而其他的人則被帶到了緊靠大門的廚房。格桑仁波齊在穿過院子時，注意到了屋頂邊緣蓋的是青綠色瓦片，中間安有彎彎扭扭的排水槽，排水槽是用有節子的落葉松木做的。格桑仁波齊來到廚房之後，被領到一個木座墩旁，前面有一個磚頭砌的灶。這時，一個男孩走了進來，他剛剛兩歲半，漂亮的臉蛋容光煥發，拖著笨重的藏靴，身著羊毛長袍。男孩爬到了格桑仁波齊的大腿上，玩弄著掛在格桑仁波齊頸上的一串念珠，這串念珠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遺物。根據這行人中真正的僕人安多格桑的回憶，這位名叫拉木登珠的幼兒突然激動起來。男孩子稱這串珠子是他的，要求馬上給他。格桑仁波齊回答說：「如果你能猜出我是誰，我就將念珠給你。」男孩很平淡地說：「你是色拉寺的喇嘛。」然後，男孩又說出了洛桑才旺的名字，事前並沒有人將名字告訴過這男孩。他接著又說其餘的客人也都是色拉寺的。最令人驚奇的是，拉木登珠與這些人交談時，說的是西藏中部地區的方言，而這這種方言在他的出生地幾乎無人知曉。

這些人的興趣大增，在這裡過了夜，打算第二天拂曉前神不知鬼不覺地離去。翌日清晨，拉木登珠比他們還起得早。他看到這些人在做行前的準備工作時，哭哭啼啼地請求將他也給帶走。他們只好向他擔保還要回來，這樣才止住了他的眼淚。

後來他們真的回到了這裡，目的就是要對這男孩進行一系列的檢驗，看他是否確係達賴喇嘛靈童。

當尋訪隊再次來到達澤時，僧人給這戶人家送了禮物，並請求與這位年紀最小的家庭成員單獨待在一起。夜幕降臨後，他們轉移到位於房子正中的主人臥室，在炕上擺了一張矮矮的桌子，桌子上放了若干物品，其中一些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遺物，而其他東西則是精心製作的仿製品。這些物品包括達賴喇嘛的眼鏡、銀質鉛筆、飯碗，還有四樣東西，這四樣東西是桑耶寺曲均特地命令這個尋訪隊隨身攜帶的。它們是一串黑色念珠、一串棕色念珠、兩根手杖和一面進行佛事活動時用的象牙小手鼓。檢驗的第一階段就以這些物品為中心展開。

拉木登珠進入這間臥室之後，就被領到了格桑仁波齊跟前，他們與三位官員一道坐在炕桌的兩邊。格桑仁波齊手裡拿著一串黑色念珠，這就是上次來訪時吸引住這男孩的那串念珠；在這串念珠旁，還有一件一模一樣的仿製品。他們叫這孩子拿一串念珠，男孩毫不猶豫地拿起了達賴喇嘛的那串念珠，並將它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幾個月後給他棕色念珠時，他也這樣做的。接著手杖送了上來。起初，拉木登珠輕輕地扯了扯那根仿製手杖，然後鬆開了手，抓住了達賴喇嘛的那根手杖，高高興興地將它拿在面前，就像拿著一根巨棒似的。這件事情特別重要，這是因為那根「仿製」手杖達賴喇嘛的確使用過一段很短的時間，但他後來將它送給了朋友。最後的物品是那面鼓，還有待選擇。那面仿製鼓上面飾有緞帶，華麗漂亮，而達賴喇嘛的那面鼓卻不那麼吸引人。然而，拉木登珠又一次抓著了達賴喇嘛的那面鼓，他用右手前前後後地快速撥弄這面鼓，於是鼓就像舉行密宗儀式那樣敲打起來了。

接下來進行人身檢驗。察看這男孩身上是否有八種生理特徵，它們是將歷代達賴喇嘛與常人區別開來的特徵。其中包括：大耳朵、寬眼睛、眉毛梢朝上翹、大腿上有虎皮斑，還有一隻手掌上有一個形似海螺的痕跡。這些檢驗者們輕輕脫下了孩子的衣服，看到有三處地方像他們用心尋找的地方那樣。正如其中一位名叫索南旺堆的喇嘛所描述的，他們完全沉浸在「崇敬、興奮」的氣氛之中。他回憶說：「我們的確非常激動，幸福的淚花奪眶而出。」「我們幾乎停止了呼吸，在墊子上都坐不穩，連話都講不出一句來。」不存在絲毫疑問了。眼前的男孩就是西藏神聖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當時他年僅二歲半。

儘管尋訪隊獲得了成功，但他們面前還存在著一個嚴重障礙。中國西北地區的穆斯林軍閥馬步芳得知了達澤男孩這一消息。尋訪隊害怕他會進行幹預，便在馬步芳將軍戒備森嚴的西寧司令部檢驗了幾十名男孩，目的就是要混淆視聽，不暴露他們選中的達賴靈童。這些孩子當中表現最出色的不過認出了四件物品中的兩件，這時馬步芳恍然大悟，他將拉木登珠全家和其他幾個小孩召到一塊，私下進行了檢驗。於是，通過拉木登珠早熟的行為舉止，馬步芳斷定他成為達賴靈童的可能性最大。結果，當尋訪隊要求獲準將這男孩帶回拉薩時，馬步芳拒不批准。他厚顏無恥地要勒索十萬銀元（約相當於九萬二千美元）的贖身費。尋訪隊官員別無他法，只好付了這筆錢。但是，馬步芳不但不放這男孩走，反而得寸進尺，又提出了下述要求：還要三十萬銀元；給他已故達賴喇嘛的全套袍服以及寶座上的裝飾品；給他十分珍貴的全套三百三十卷佛經金汁寫本。這些藏人儘管憤怒無比，但也無奈，只好再次屈從。他們在穆斯林商人中籌借這筆款子的時候，拉木登珠則和他的大哥達澤仁波齊同住塔爾寺，他的大哥已被確認為活佛了。

進一步得到的證據表明，尋訪隊的確找到了達賴喇嘛靈童，他們的擔心也因此與日俱增，唯恐會失去新發現的達賴喇嘛靈童。除了房子本身之外，屋頂那些奇形怪狀的排水槽、那條狗和阿、尕、瑪這幾個字母與這個地方相比較，完全吻合。阿代表的是安多（5），尕代表的是塔爾寺（6）尕和瑪這兩個字母代表的是附近山坡上寺院的第一個詞：噶瑪夏松寺（7）。現在，人們仍能回想到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蒙古和中國度過了五年半的流亡生活之後，回到了西藏；在歸途中，他於1909年在這個寺廟待過。他留下了一雙靴子，表示祝福。當地人們仍記得，十三世達賴喇嘛盯著拉木登珠出世的這座房子，看了很久好久，並說這是塊美麗的地方。最近四年，達澤的農作物歉收，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村民們都說他們當中會出現一個高級活佛。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任何不吉利事情必定為吉利事情所抵銷。尤其是拉木登珠一家經歷了嚴重的困難，他們的一些家畜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男嬰問世前的那幾個月，他的父親疾病纏身，而且病因不明。不過，他的母親卻想方設法將家中大小事情料理下來了。在分娩那天，她來到牛棚，這是西廂的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裡面有一個馬槽，單單點著盞芥子油燈。1935年7月6日破曉時，十四世達賴喇嘛問世了，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媽媽認為這一點很不尋常。同一天，他父親神秘地恢復了健康，就像他害病時一樣原因不明。他下了床，在家裡的佛龕前做了禱告，當人家說他得了個兒子時，他只是回答說：「很好，我想讓他去當喇嘛。」

拉木登珠的父母對於他們第五個孩子的特殊身份一無所知。但是，在他出生後的幾天，一對烏鴉（藏人認為，烏鴉是被保護神瑪哈卡拉所差遣的）來到了達澤這戶人家，在房頂上落了腳。每天早上，它們都是那個時候飛來，唱上一陣子，然後就飛走了。現在人們回想到，在一世、七世、八世和十二世達賴喇嘛誕生時，也出現過類似情況。早在1391年，一世達賴喇嘛根頓珠巴在問世的那一天，就得到了一隻烏鴉的保護。當時，他從事游牧的父母親遭到了土匪的襲擊，他們撿下孩子逃離了帳篷。那天晚上他們回來時，發現嬰兒待在一個角落裡，前面站著一隻黑色大烏鴉為他站崗放哨。

尋訪隊來到達澤之前，拉木登珠最愛玩的遊戲是叉腿坐在窗框上，熬有介事地說他是在騎馬去拉薩。拉木登珠來到塔爾寺之後，去拉薩的願望更為強烈，當時這孩子還只有三歲，但他卻常常獨自一人在玩著整理行裝、上路奔向聖城拉薩的遊戲。

等了八個月之後，即藏歷 6 月（1939 年 8 月中旬）初一那天，尋訪隊、達賴喇嘛靈童及其一家終於離開了塔爾寺。他們與一隊穆斯林商人（第二筆贖金是這些人支付的，他們要去麥加朝聖）同行，他們早晨離開塔爾寺，踏上第一天的行程。當時陽光明媚，但又下著小雨。他們這一段艱難的旅程要跨越荒涼的藏北草原，需三個月時間。拉木登珠與六歲的哥哥洛桑三旦同坐一乘轎子（這種轎子靠桿子支撐，架在兩匹騾子之間）。儘管拉木登珠現在還沒有得到正式的承認，但人們卻像尊敬達賴喇嘛那樣尊敬他。路過城鎮和游牧部落時，拉木登珠坐在高高的寶座上，給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摸頂祝福。雖然在舉行這些儀式時，從表面看他悠閑自在，但這類驟然而至的事情起初卻也帶來了諸多不便，正如緊靠這孩子的那些成年人中的一位所說的那樣，拉木登珠「煩躁不安」，「偶爾還輕聲哭泣」。然而，當這隊人馬走進西藏中部地區時，他的情緒就好一些了。在那曲北面的地方，當藏軍的一支騎兵前來迎接這隊伍時，拉木登珠觀看了專為他表演的馬術，他十分高興。在渡沱沱河時，他們乘坐的是牛皮船，這也使他感到高興。在河對岸很遠的地方，拉薩上密院派了一隊人馬來迎接他。幾天之後，他們又遇到了另一隊歡迎人馬，他們帶來了達賴喇嘛旅行用的黃色帳篷，還帶來了政府的決定：正式宣布這個安多男孩為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第三隊官員帶來了關於這一決定的公告，公告是由攝政王、噶廈和上密院聯合簽署的。一天拂曉前，這隊官員就從首都拿著火炬出發，騎馬奔波了十天來迎接他們的新領袖。朝陽的萬道金光，照亮了一大片歡迎帳篷，這時達賴喇嘛靈童被帶了進來，他身上穿著醬黃色喇嘛袍，人們給他獻了「芒德丹松」——一尊佛像、一個聖骨盒（塔）和一本經書，這是信徒向高級喇嘛表示敬意的傳統方式。然後，他坐上黃轎。這時攝政王和大管家也來了，他們穿過了擠滿歡樂人群的村莊。現在這隊人馬已達數百人，他們靠近拉薩時，達賴喇嘛有一陣子興奮無比，因為在一些政府高級官員謁見他時，一位他熟悉的喇嘛走上前來，手裡拿著一根三英尺管子，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層緞子。封在裡面的是一幅班登拉姆唐嘎畫，這是西藏最聖神的物品之一，班登拉姆是歷代達賴喇嘛的主要保護神。人們認為，這根管子是一件容器，保護神可以通過它與外界進行交流，所以自從十五世紀以來，這根管子就一直讓人拿著，緊隨歷代達賴喇嘛。當拉木登珠看到它時，欣喜若狂，致使他身邊的許多人眼淚奪眶而出。

1939 年 10 月 6 日上午，十四世達賴喇嘛靈童來到了能極目遠眺拉薩的地方。在離城區兩英里的多古塘平川，紮了一大片帳篷，形成了四個具有同軸心的四方形帳篷群。正中間是一個大帳篷，叫做「大孔雀帳篷」，帳篷上面是白色和藍色相間的華蓋。這個帳篷是用鮮艷的黃緞做的，襯料是絲綢，上面有一王冠，若干世紀以來，這個帳篷僅用來迎請新的達賴喇嘛靈童去首都。內圈的四方形最小，四周是八英尺高的帷帳，兩邊是用豹皮和虎皮做的蒙古包，外面是西藏僧俗官員的數百頂帳篷，他們專為這些儀式而聚集一堂。

在多古塘待了整整兩天，拉木登珠高高坐在靠近大孔雀帳篷後壁的一個寶座上，右手拿著一條細細的黃絲帶，挨個地分別給集聚在那裡的七萬僧俗民眾祝福。點心、乾果和犛牛肉裝在大盆裡，分發給人們。隊列排得長長的，沒有盡頭。那些沒有去排隊的人，則跳舞、唱歌、祈禱，許多人高興得哭了起來。數年之後，達賴喇嘛回憶說，當人民的慶祝活動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時，有些人卻希望弄清楚，拉木登珠是否確係達賴靈童。一位哲蚌寺的格西（佛學博士）甚至直截了當地詢問了他一會兒。達賴喇嘛笑著回憶說：「你看，雖然一些很有體面的老年人想弄清楚這一點，但顯然我表現不錯，使他們信服了。」

10 月 8 日，晴空萬裡，朝陽冉冉升起，一列衣著華麗的衛隊護送著靈童進入拉薩市區。十六名貴族，身著綠色緞袍，頭戴圓形紅纓帽，抬著裡面坐著達賴喇嘛靈童的黃轎。在達賴喇嘛靈童前面行走的有國家級曲均、樂師、僧人和諸噶倫；走在後面的是攝政王、首席噶倫、達賴喇嘛的家人和一長列衣著隨官品而各異的堪布和俗官。喇嘛在布宮頂上（布達拉宮聳立在拉薩河谷中間的紅山上）吹奏十英尺長的法號，歡迎這列隊伍的到來。數萬人排列在這列隊伍經過的道路兩旁，整個線路用黃粉、白粉畫了線，高高的桿子上插著一大片「勝利幡」，每隔三十碼就有一個香爐在這片密如森林的「勝利幡」中燃燒。拉薩人手裡搖著小鈴，而藏軍的進行曲樂隊則在吹奏著「神佑女王」的曲子，這是從他們的英國教官那裡學來的。這列隊伍進入拉薩城之後，繞著具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大昭寺轉了一圈，在大昭寺前的大廣場上停了下來，印度、中國、尼泊爾和不丹的使節在整理等候準備表示他們的敬意和祝賀。廣場上還有國家級曲均突然降神作法。他身著厚絲袍，一面擦得明亮的鏡子蓋住了整個胸部，一個上面裝飾著旗子、重達一百磅左右的大頭盔戴在頭上。曲均衛上前來，跳宗教舞時，噓噓發出聲響，面頰膨脹，雙眼凸出，有節奏地朝空中踢腳，忽蹲忽起。他手裡拿著一條獻給達賴喇嘛靈童的哈達。他猛然來了個九十度大鞠躬，儘管頭盔很重，但他居然啪的一聲鞠了個躬，而且顯得毫無慚色。他用額頭輕輕碰了碰達賴靈童的額頭，將哈達獻渾身癱了靈童。拉木登珠鎮定地接受了這條哈達，然後又將哈達戴在曲均的脖子上，表示祝福。接著，這支隊伍快步繼續前進，來到了大昭寺，這是西藏最神聖的寺院，達賴靈童在這裡進行了祈禱。達賴靈童被領著從大昭寺經過布達拉宮腳下，穿過了拉薩城的西大門，然後走了二英里，來到了羅布林卡。達賴靈童被安排在這一長列隊伍的最後

面。靈童被帶進了他前任的居室，他指著一個小盒子不動聲色地大聲說：「我的牙齒在那裡。」侍從打開這個盒子之後，驚奇地發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全副牙齒都在裡面。然而，並非只有他們才感到驚訝。對於這些，達賴喇嘛自己也非常激動。數年之後，他這樣描述了他進入拉薩時情景：「當人們看著我從他們面前經過時，我可以聽到他們高聲叫喊：『我們幸福的日子來到了。』我感到似乎是在做夢……彷彿我在一個大公園裡，四處都是美麗的花朵，微風輕拂而過，孔雀在我面前翩翩起舞，空氣中散發著令人心醉的野花芬芳，回蕩著自由幸福的歌聲。」

不到七個星期，攝政王就為拉木登珠在大昭寺舉行了剪髮儀式，靈童發誓皈依佛教，並給他起了法名，叫吉尊堅貝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聖佛、光輝、雄辯、憐憫、佛教博學的衛士、智慧的海洋。不久後，也就是1940年2月22日，這時名叫丹增嘉措的靈童還不足五歲，就在布達拉宮的東大殿裡舉行了盛大的坐床儀式，在他還沒有成年之前，就被立為西藏至高無上的僧侶領袖。

從地理和民族角度看，年幼的丹增嘉措所統治的這片國土都是另外一個世界。西藏高原地處亞洲大陸腹心地帶，面積與歐洲相仿，周圍是地球上最高的一些山脈——南面是喜馬拉雅山脈，西面、北面和東面是喀喇崑崙山脈、崑崙山脈、岷山和大雪山。只有在東北面，也就是在煙波浩淼的青海湖畔，才有一條暢行無阻的通道，能夠進入西藏高原。它蜿蜒於崇山峻嶺之間，人們一旦來到這裡，世界的其他地方就落在腳下了。西藏的平均海拔為一萬五千英尺——比海面高三英里，是地球大氣層厚度的一半多，是大氣層下面的濕氣層的四分之三。這個國家擁有令人神往的美麗風光。西藏的中部是無邊無際的羌塘，即北部平原——這裡是貧瘠的荒地，土壤含鹽和礫砂，冰川河流縱橫交錯，清澈的湖邊閃爍著白色的鈉。在南面，沿著雅魯藏布江（即布拉馬普特拉河^⑧）流域是西藏三個行省中的第一個行省——衛藏（9），也就是西藏中部地區。衛藏就如同西藏西部地區一樣，氣候乾燥，風沙很大。它位於喜馬拉雅山脈的背風處，只有在短暫的夏天雨季期間草木才返青。鈷藍色的天空，掛著彩虹，熾熱的陽光灑滿了寬闊的河谷。二萬英尺高的壯麗山峰將這些河谷分隔開來，人們也可偶爾幸運地看到河堤上一小片柳樹、楊樹或核桃樹林。東部，高原河谷海拔低一些，也沒有那麼開闊，這就是西藏的第二個省份康省。這裡不均稱的山坡上，生長著茂密的森林。高山峽谷裡奔騰著亞洲的幾條大江大河：薩爾溫江、湄公河、長江。康區擁有大片森林資源，這裡落葉松、雲杉和柏樹，森林中棲息著熊、狼、猴、豹、熊貓、布穀鳥和鷹。康區地勢最為險峻，是西藏最難進入的地區。北面是西藏的第三個行省安多。安多一直延伸至崑崙山脈和祁連山脈，地形地貌頗為壯觀。安多的高山平原與森林河流一道構成了一幅風景優美的畫面，與美國西北部的風光相似——極目遠望，遼闊的草原無邊無際，毗連著峰頂覆蓋白雪的高山，山坡上一群群羚羊、犛牛、野驢正在吃草。

西藏的七百萬人民是與蒙古族有種族關係的游牧部落的後裔。根據藏族自己的傳說，他們的國家曾位於一淺海之下，事實的確也是如此。淺海消失之後，一隻猴和一個女妖來到了這片開闊地，定居下來。這隻猴子是大慈大悲菩薩堅熱斯（10）的化身，它平靜安寧，喜於沉思。它隻身居住一洞穴裡，一心一意修禪。另一方面，那個女妖則易於發怒，剛愎自用——這個殺生成性的傢伙性慾也是滿足不了的。她在原野裡拼命發情呼叫，想找來一個雄性夥伴。猴子聽到這些呼叫之後，心中充滿了憐憫之情，來到了女妖身邊，與她生活了很長時間，生了六個孩子：這些就是藏族的始祖。

這些後代生下來就沒有尾巴，也無明顯的猿猴特徵，他們互相同婚，人口也就成倍地增加了。像父親的那些後代溫柔聰明，而那些繼承了母親秉性的子孫則殘酷、放縱、毫無節制。開始，這些人居住在衛藏貢波里山的山洞裏，這些山洞是女妖的，後來他們逐漸擴散開來，在這塊國土的其他地區也有他們的後代。公元前127年（原文如此——編者），洞穴南面的雅礱河谷推選出第一代藏王，名叫聶赤贊布。他的這個朝代共有四十一位藏王，這就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一千年。

早期的頭人政權奪利，部落之間不時發生衝突，他們只是鬆散地結合在一起。然而，到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贊乾布時期（609—649）（原文如此——編者），他將這些頭人和部落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紀之後，這個帝國達到了極盛時期，成了亞洲最大的帝國，地域遼闊，東起失陷的中國都城長安，西至帕米爾高原和撒馬爾罕（11）。

第三十七代藏王赤松德贊（741—798）（原文如此——編者）在擴大疆土方面，在西藏歷史上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矛盾的是，招致這個帝國崩潰的居然也是他。赤松德贊以前的王室只是將外來宗教——佛教當兒戲，而這位藏王卻牢固地樹立了佛教不訴諸暴力的信條，使佛教壓倒了西藏的原始宗教笨教。這樣，他就撒下了政治、文化大動亂的種子。到九世紀中葉時，這場大動亂摧毀了王朝本身。其後的四百多年，西藏陷入了分裂，諸王子和僧侶各自立國，爭鬥不已。最終於十三世紀建立了中央政權之後，西藏卻付出了代價：西藏納入了元朝的版圖。然而，儘管雙方形成了這樣的關係卻仍然達成了獨特的諒解：保證這種臣屬關係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只是名義上的而已。

1207年，西藏的主要統治者得到了成吉思汗的部隊正在進軍的消息，他們籌集了一筆錢財，給蒙古人進了貢，這才免遭侵略。但是，三十二年之後，由於西藏沒有繳納歲貢，致使成吉思汗的孫子闊台汗入侵西藏。他採取報復行動，焚燒了拉薩北面的熱振寺，屠殺了五百名僧侶民眾。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位蒙古王子卻要拜薩迦班智達為師，薩迦班智達是西藏四大教派中排列第二的薩迦派的領袖。薩迦班智達同意了，因為他獲得了統治西藏中部的僧侶大權作為回報，這些權力後來由薩迦班智達的侄兒八思巴從闊台的接班人忽必烈汗手中接管了過來。因此，所謂的法師與保護人的關係就正式建立了起來，一方面蒙古人聽信於這位卓越的西藏喇嘛的宗教權威，而同時又認為這個國家是屬於蒙古人的勢力範圍。由於這種關係，在忽必烈汗獲取國家的王位之後，西藏與中國也就鬆散地結成一體了。一百年後，隨著薩迦權力和蒙古人地位的衰退，這種關係破裂了。接下來的三個世紀是西藏享受獨立的時期。爾後，新教派格魯派於1642年在其領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利用蒙古人的支持，戰勝了其他教派的競爭，建立了格魯派的統治地位。不久之後，滿洲人在中國建立了第二個外族人的王朝，他們取代了蒙古人世俗保護者的地位。歷代達賴喇嘛只是像徵性地與滿洲人結盟，而由他們自己統治西藏。直到二十世紀，拉薩方面仍認為它對北京只承擔禮節上的義務；這倒是轉移野心勃勃的大鄰國的視線的有效辦法。與此同時，西藏獨特的文明完全成熟了。

隨著西藏人自己早期帝國的崩潰，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一心一意酷愛戰爭的狂熱轉變為對和平的熾熱追求，使全體國民的性格回到了早為人遺忘的祖先的年代。這一轉變基礎上得歸因於佛教觀念。佛教認為，任何形式的世俗生活都充滿著痛苦，只有認識到生存歸根到底都是虛無的，才能獲得解脫——修成正果。傳播到西藏的是大乘佛教，這一教派特別強調稱道是為了普度眾生。因此，培養一顆憐憫的心，放棄世俗世界而獲得智慧，這些觀念改變了藏人的靈魂。狩獵、打魚、甚至傷害一隻小昆蟲也成了對佛教的褻瀆。轉經筒將經文撒遍江河；經幡在空中漫天飄揚，將祈禱送向四面八方；嘛尼堆（12）有房子那麼高，石頭上面刻有祈求佛陀保佑的經文，頂部尖尖的佛教聖人靈塔遍布全國，形成了一張碩大無朋的聖網，這些靈塔被絡繹不絕的香客連成了一個整體。在這個國家裏，以前每條河谷都有一座堡壘（13）矗立在山頂上，俯瞰河谷。在這些地方，如同城鎮般的寺院像雨後春筍一樣相繼出現，它們是學習中心和文化中心，後來寺院僧眾發展到佔整個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

西藏的文化在寺院裏得到了繁榮。寫作、文學、醫學、美術、建築以及寺院裏高級階段的學習全部源於偉大的佛教經典（達磨）全集，在亞洲國家當中，西藏繼承了全部的佛教經典。一方面，一些僧人輪流管理西藏的政務，另一方面，大部分僧侶則通過參加宗教儀式、學習以及天天坐禪孜孜不倦地追求成道，中心人早在孩提時代就步入了佛門。在格魯派寺院裏，學者們在參加佛學博士（格西學位）的最後考試前，要誦經辯經二十年。他們的努力只有那些終身隱居山洞和深山裏的苦行僧才能比得上，這些苦行僧只有手下幾個信徒來照料他們，無論是從精神還是從生理方面來看，他們都是最苦的僧人。西藏的著名宗教人士有四千，他們是活佛，能夠自行選定再生的時間和地點。當他們還是幼兒時，他們的信徒就確立他們為活佛靈童，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寺院，再次擔負起普度眾生的偉大佛教任務。在活佛當中，主要有一些高級菩薩（即佛）的轉世，達賴喇嘛就是堅熱斯的化身，在西藏他是最神聖的人物，堅熱斯是保護西藏的聖人。

由於西藏的崇山峻嶺和佛教順應時勢的教義，因此供養僧侶追求這種無利可圖的宗教的世俗社會仍然是封建性的，但封建的教義本質上卻滲透著民主思想。藏人生性熱情，講求實效，甘心接受命運的安排，從社會而言是保守性，而個人則善於忍耐。他們生來喜愛等級觀念，多少世紀以來，各個階級之間界線分明，命運變化。

西藏的原始居民是游牧民，他們死守著這片空曠的高原，驅趕著大批牛羊，冬季和夏季在不同的牧場上放牧。他們居住在低矮昏暗的毛氈帳篷裏，講的是自己的方言，戴著笨重的護身盒，佩戴長刀，長袍的邊緣有一束羊毛——不過即使是在嚴冬，他們也常常鬆開長袍，讓胸脯袒露在外面。他們伏擊商隊以豐富自己的生活，當積雪太深無法活動時，他們就連續幾天背誦西藏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這些游牧部落的鄰居過的是定居生活，游牧部落遠離定居的村莊和城鎮，因此游牧民從高地下來，只是為了用肉和奶酪換取糧食、槍枝和日常生活用品。這些受到保護的谷地和河流盆地裏居住著西藏的大多數人口：他們是農民，長於種植業，主要作物是青稞，但農田貧瘠，極易流失，且氣候乾燥，降霜早，冰雹的破壞性也很大。但是，儘管有種種不利條件存在，而西藏人民卻仍然比較富裕。這裡沒有饑荒，肉類儲藏得當可以保鮮一年，糧食可以保存一百年。由於這裡海拔高，細菌無法繁殖，因此疾病很少。一個家庭人口通常很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以及一妻一夫的現象並存。無論是在外面還是在家裡，婦女與男人享有平等地位，這樣的平等地位在亞洲無疑是首屈一指的。西藏社會壓迫性的主要特點是它的稅收制度：由於農民必須向當地居統治地位的大寺院、貴族或政府莊園繳納實物地租或勞務地租，所以農民就被地產所束縛，妨礙了他們在社會上的流動。

經濟上改善全靠經商。秋收之後，一家就有一二個男人外出經商。他們走的是古代商隊的路線，加入了大商人的騾子、犛牛和駱駝行列，南奔印度，東往中國，北去蒙古。茶磚、工具、煙葉、銀錠、馬匹、俄羅斯綢、日本火柴和美國香水全部進口；出口商品有麝香、羊毛、鹽巴、金粉、皮毛、草藥和犛牛尾巴，犛牛尾巴在國外用來做蒼蠅揮和聖誕老人的小鬍子。商人用自己大包大摺的貨物組成柵欄，在裡面宿營過夜，火槍和猛犬是時刻準備著的。商人一般中午歇腳，因為西藏下午就會起大風沙，離破曉還很早，他們就上路了。他們商業貿易最大的受益者是人數甚少的貴族階級，這些人總共不過三百戶人家，貴族與喇嘛一道構成了西藏社會的寶塔尖。

西藏最早的貴族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雅魯的那些贊普。他們就像後來封為貴族的人們一樣，政府也封給了他們世襲的莊園，作為回報，他們就得到各級官僚機構中去任職。他們身著絲綢長袍（長袖比手要長一英尺以示悠閑），戴耳環，出門騎馬時，侍從在前面開道，這樣別人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貴族地位。他們用的餐具是銀碟玉碗，他們喜歡漂亮的花園，喜歡射箭（箭是黃楊木做的，射出去時颼颼作響）。他們還喜歡進行為時四天的野餐，野餐時衣著華麗的青稞酒（啤酒）姑娘為客人唱歌，給大家勸酒。不過，這些貴族並不是生來就很富裕。貴族都要僱一些僧人，請他們天天在家庭佛堂裡念經，除了堅定地信仰佛教之外，他們最關心的事情莫過於國家的治理。儘管很多貴族在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和第四大城江孜附近有莊園，但他們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卻在首都，因為他們所擔負的政府工作迫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

拉薩是西藏全境的重心。拉薩城中心——也就是西藏的中心——是大昭寺，這座寺院裏供養著全國最神聖的一尊佛祖像。據說，這尊佛像係佛祖本人所造。這尊佛像就像一塊磁鐵，吸引著全國上下的善男信女，使他們五體投地地拜伏在它面前，人們為了完成這項朝佛活動常常要耗時數年。他們到達大昭寺之後，就轉動這裏轉經道（這條轉經道叫南廓，是拉薩三條環形轉經道中的第一條）上的轉經筒，然後他們走進這座神聖的寺廟，瞻仰佛祖的尊顏。佛像前點著大酥油燈，肅穆的燈光照在鍍金佛像身上，閃閃發光。大昭寺體現了西藏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無法分離的特點。在一樓的五十多個殿堂裏有無法估量的宗教財富，而上面的兩層樓則設有政府的六個部門：外交局、財政局、海關、農業局、拉薩市長辦公室、攝政王辦公室，還有其他數十名官員的辦公室。這些部門的文件包括具有數百年歷史的論文和稅收材料，全部歸檔成摺，存放在這裡。各個部門的大部分預算支出靠的是糧食、物資和燃料，這些東西就貯藏在隔壁的倉庫裏。在這些部門的辦公室之間，還有比它們更多的佛堂神殿，因此，當這些共分為七品的各級官員在處理國家的各項政務時，就總是要從香霧繚繞的佛像和虔誠的朝佛香客身邊經過。

大昭寺外是拉薩的第二條環形轉經道，叫八廓，也是市場。從這裡放眼西望，輪廓似船的布達拉宮遙遙可見。這裡的人群擁擠不堪，賣餅的、書商、卡墊和馬鞍商人相互競爭，都想爭取人們在它們那裡買東西。這裡純粹是西藏社會全貌的一個縮影。西藏中部地區（即衛藏地區）的婦女戴大木框頭飾，上面嵌有珊瑚、珍珠、綠松石，戴琥珀大項鍊，繫著多色圍裙，長袍拖到了踝骨。身材高大威武的康巴男子漢身著厚厚的羊皮衣服，頭戴狐皮帽，腰帶上佩著長長的短劍，昂首闊步，穿過八廓街。從安多地區來的游牧果洛人（14）他們害怕土匪，男人也戴象牙手鐲，腳上穿的是紅黑兩色相間的笨重皮鞋，他們的頭髮剃得光光的，只在頭頂上留下一撮短短的頭髮，婦女的辮子拖到腰部，編織成一百零八根，上面繫著大銀盤和銀幣以示富有。喇嘛在那些商人面前停下來買鼻煙（他們除了每天喝上六十碗酥油茶之外，吸鼻煙是他們唯一的享受），孩子們則在玩耍，用一隻腳向空中踢著用緞帶紮的東西，同時遊落四方的藏戲團和吟唱詩人在為人們表演，內容是西藏那些大聖人的生平。新年之後，大昭寺和八廓街成了為時三星期的莫南姆欽木（傳昭大法會）的中心。成千上萬名喇嘛來到拉薩，使拉薩人口急劇膨脹；城市裏到處是公開講經、辯經、遊行、賽馬以及其他體育活動，這些活動一直擴展延伸到了第三條（最外層的）轉經道林廓，即聖道。

林廓長達四英里，不僅拉薩城在它的範圍之內，而且拉薩河谷的兩座主要的小山也在林廓的懷抱之中，一座小山上面是布達拉宮，另一座小山上面是藥王山醫學院，這是政府的主要醫學院。這條轉經道上人很多，都是叩長頭的善男信女。這條轉經道要穿過許多林卡（樹林），夏季和初秋季節，拉薩人一大群一大群地來到林卡野餐、看戲。由於這些地方佛教徒佔絕大多數，所以也是乞丐光顧的主要場所。乞丐居住在林卡附近，他們居住在用犛牛角和山羊角做成的奇形怪狀的房子裏，與穆斯林阿訇們一道，將屍體運到拉薩城東面的一塊黑色大岩石上，在這裏將屍體砍碎餵鷲鷹，這也就是最終的利他主義行為。林廓外有羅布林卡和世界上最大的寺廟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它們是「國家的三大支柱」，喇嘛總數在二萬二千以上。再遠一些地方，這條河谷裏還有西藏的幾十座古老寺廟。在西藏宗教史上，這些寺廟使得拉薩這塊「聖地」（人們就是這樣稱呼拉薩的）變成了無可爭議的僧侶權力中心。

自從達賴喇嘛的政府噶丹頗章建立以來，西藏的政府一直由喇嘛和貴族平分秋色。在每一個重要職位上，同時有一名僧官和一名俗官，分享和權力。西藏的獨特政體十分成功，很少發生內亂。只有在達賴喇嘛沒有成年而攝政王又軟弱無能時，才會出現內亂。隨著具有抑製作用的中央權力的消失，派系活動不可避免地抬了頭，自從雅魯王朝倒台以來，西藏就一直沒有擺脫過派系活動。派系活動也就必然導致了與外強建立不明確的妥協關係，最近的就是與中國建立了這樣的關係，這些也就成了西藏這一國家的獨一無二的政治趨勢。只要西藏仍像隱士一樣，躲在深山峻嶺之中，與外界完全隔絕，那麼上面的那些弱點絕不會危及西藏的穩定。但是，接近十九世紀尾聲時，與外界隔絕了二千多年的中亞大地，驟然暴露在外界的入侵之下。

1904年，英國由於擔心俄國通過西藏向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地區擴張，派了一支遠征軍前往拉薩。但是，在從西藏政府那裡得到進行貿易方面的保證之後，這支遠征軍部隊就撤退了，而沒有提醒中國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要求，有如英國駐印度總督柯森勳爵所說的那樣，只是「憲法上的空洞條文」，沒有任何實質意義。滿洲人為了重新明確他們在西藏的統治地位，派出了一支軍隊。在英國發起進攻之後，十三世達賴喇嘛過了差不多六年的流亡生活，他返回拉薩還只有幾個星期，就被迫於1910年冬天再次出逃。好笑的是，這次他卻是逃往印度，求得英國人的武裝保護。有史以來第一次，北京直接對西藏進行統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11年的革命之後。這時北京的部隊被趕走了，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正式宣告西藏獨立。以袁世凱為首的新生的中華民國，無視這一宣告，宣布了一項政策，它以孫中山的五個民族的中國的理論為基礎，對於中國在多少世紀以來與其有過這樣或那樣關係的大部分主要地區，提出了主權要求。這樣，不僅是西藏，而且還有滿洲里、蒙古和新疆，都被認為是中國本土的行省，這一觀點先後被國民黨和共產黨所採納。不過，中國卻無法佔領這些領土。到1918年時，小小的藏軍將中國人攆出了康區，趕到了兩個國家原來的邊界康定。然而，十三世達賴喇嘛認識到，最後還必須尋找一項政治解決辦法。

在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上，達賴喇嘛讓英國來充當調停人，企圖談判達成一項妥協的解決辦法，這一妥協要以英國人提出的「中國是完全自治的西藏的宗主國」這一觀點為基礎。但中國人拒不同意——中國人堅持要完全統治西藏，這時達賴喇嘛也就開始採取了使西藏的落後軍隊現代化的行動。隨著中國的第一個共和國的倒臺，還有軍閥之間的爭權奪位，接著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長期較量，西藏問題也就退居次要位置。西藏又一次感到完全獲得了獨立，沒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壓力。這個國家經歷了二十年的和平時期，正如達賴喇嘛在他的遺言中所說的那樣，在他統治的後期，西藏如同變成了一個「幸福、安寧的新國家」。然而，在面呈喜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肖像旁，有一幅生動細膩的畫，預示著凶兆，未來的西藏將深受壓迫，「歲月艱難，時相難熬」。1933年冬天，儘管離這一命運似乎還十分遙遠，但它的先行事件卻即將突然襲來。

達賴喇嘛死後三天，野心勃勃的隆沙孜本（負責財政事務）發起了一場政變。他希望能夠利用向攝政王過渡的這一微妙時期，企圖用他控制下的上密院來取代噶廈這一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隆沙孜本通過顫動有一千官兵的仲扎瑪嘎團（15）的代本反叛，成功地戰勝了自己的主要對手（一位名叫昆培拉的僧官，過去他一直得到了這個代本的支持），指控昆培拉在達賴喇嘛患病的最後階段沒有盡心照料，由上密院將他發配到西藏南部。直到發現隆沙預謀殺害一位拒不讓步的噶倫時，上密院和噶廈才認識到，照此下去，他們被解除職權的時候也不遠了。（後來，隆沙的追隨者們手中的文件，也暴露了其推翻政府的周密陰謀。）隆沙被指控犯有嚴重反叛行為，他受到了西藏最嚴重的懲罰——弄瞎雙眼。然而，這場危機剛剛避免，又出現了第二場危機，雖然這次沒有第一那樣富於戲劇性，但卻更危險。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死後的混亂時期，中國國民黨的一位將軍和兩名助手獲準來到拉薩。1912年，也就是將滿洲皇帝的佔領軍趕出去後，藏人表明了自己的獨立地位，因為他們拒絕中國再派人駐紮西藏，歷史上滿洲王朝派有兩名大臣駐在拉薩——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北京一直援引這一做法，作為它對西藏實行統治的依據。但現在，雖然政府自身都無法把握，但卻仍準許這個披著弔唁外衣的代表團來拉薩。代表團在參加了官方悼念活動之後，卻沒有走，而留了下來，開設了一個聯絡處，在西藏為國民黨建立了一個關鍵性的立足點。這樣，緊接著達賴喇嘛圓寂之後，他在遺言中預示的兩種危險——西藏將「內外」受到威脅——開始變為現實。在如此不吉利的背景之下，上密院選舉熱振仁波齊為攝政王，他是喇嘛，二十三歲，雖然他在宗教方面頗有成就，深受尊重，但在政治方面卻不敏銳。西藏再次擺脫世俗事務，在她與世隔絕的狀態行將結束時，樂意於追求平平靜靜、坐禪修行的生活。達賴喇嘛將在這一段安靜的空位期間度過他的童年。

在布達拉宮的東牆下，為達賴喇嘛一家新蓋了座「亞西公館」，而丹增嘉措卻住在布達拉宮頂層的四間房裏。布達拉宮長度超過四分之一英里，內有一千多個房間，有集會廳、狹窄的走廊和黑淒淒的古老殿堂，與其說這是一處王宮住所，還不如說是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館。冬天這裏冷得令人發僵；夏天布達拉宮峭陡牆下的污水發出的惡臭彌漫了整個大廈。布達拉宮的中間是紅宮（宗教宮殿），這裡有前面九位達賴喇嘛（16）的靈塔，靈塔包有金皮鑲嵌了珠寶。靈塔前點著酥油燈，

僧人在這裡祈禱。紅宮兩旁是白宮，白宮裡面有達賴喇嘛自己的寺院，有培養僧官的「山峰」學校、政府的各部門以及上密院的會議廳。在東翼的中部，有一個大廣場，達賴喇嘛的臥室比這裡高出五層樓可以居高臨下俯視廣場。從達賴喇嘛居住的這些房間去布達拉宮頂十分方便，從這裡可以欣賞令人驚歎的拉薩景色、拉薩河以及河谷周圍的那些高一萬五千英尺的山峰。宮內房間天花板和門道裝飾華麗，有金雕和紅漆的金絲飾品，如同一個個小巧玲瓏的珠寶盒，地上鋪著色彩絢麗的藏式地毯，牆壁和佛龕上覆蓋著綢緞和唐嘎畫，起居室的牆壁有精工細膩的壁畫。這些壁畫描述的是偉大的五世達賴喇嘛的生平，修建布達拉宮的就是他（17）。達賴喇嘛的臥室，不過是一間大一點的小房間，裡面陳設著一張現代式條桌和床鋪，床上飾有龍的圖案。布達拉宮圖書館收藏的經書和歷史文獻多達成千上萬卷，許多都是用金粉、銀粉、綠松石粉和珊瑚粉寫下來的；布達拉宮裏有不少倉庫和存放貴重物品的庫房，這裡有西藏各個歷史時期精心保存下來的工藝美術品掛毯、塑像以及古代的盔甲，這些都是無價之寶。

年幼的達賴喇嘛，就是在這座莊嚴的大廈裏長大的，同他作伴的幾乎全都是僧人。人們稱他為尊貴的保護神、實現希望之神或就稱「陛下」，沒有幾個人能夠直接與他說話。只有「當主持冗長的僧侶儀式時，他才公開場合露面。但是，雖然他的地位給他帶來了限制，但他在充當這一角色時似乎倒很自在。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齊回憶說：「從一開始，我弟弟做的事就件件完美，這一點我們大家都看到了。他從未發過牢騷，從未表示過反抗。大家對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達賴喇嘛自己也回憶道：「我年輕的時候，任何事情對我來說都很容易，就像我都習慣了似的。我對這所有的場面都很喜歡。」

丹增嘉措六歲開始接受教育。達賴喇嘛每天一大早就要開始上第一節課，他的經師開始了持續十八年的課程。他要在撒了白粉的木板上學習讀書寫字，還要花很多的時間背誦，對於西藏的小喇嘛來說，背誦是主要的學習方法。達賴喇嘛要面對經師，不吞不吐地一段段經文，而且這些段落越來越長，這一技巧在後來用於辯經時，就可以派上用場，對數千頁深奧難懂經書、哲學詞彙和祈禱詞依靠記憶加以引用。

然而，要擔負這一角色有時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丹增嘉措七歲時，他被要求在二萬名喇嘛面前吟唱一段經文的起始句，由於緊張，他幾乎昏了過去。後來，他經常做夢逃離布達拉宮，過著不像這樣荒謬可笑的生活。達賴喇嘛回憶時說：「我十歲到十一歲時，就和我的大經師靜心修習讀書。我們總是坐在達賴喇嘛頂層的一間黑洞洞的小房間裏，一扇窗戶正對北面。我們下邊有一條路，男孩、女孩趕著家裡的牛羊，前往牧場。每天晚上，這些孩子就趕著牛羊回家，他們嘴裏總是唱著藏戲。當時我常常羨慕他們，要是我與他們在一起又有多好啊！我經常這樣想，假如我同他們在一起，那真是富於幻想的經歷。」

每逢冬末，達賴喇嘛離開布達拉宮前往羅布林卡，他遷居這天，全體政府官員脫下笨重的冬裝，穿上了薄一些的衣服，使整個首都的面貌為之改觀，迎接新季節的到來。然後，他們與攝政王、噶倫以及藏軍司令一道前進，藏軍司令在達賴喇嘛的黃轎前持刀致意，穿過沉默的人群。人們秩序井然，因為達賴喇嘛的那些警衛在拿著長鞭子維持秩序。這些警衛身高都在六英尺半以上，他們有時還要拍拍人們的肩膀，以便進一步維持好秩序。人們很高興地看到，年幼領袖的夜鶯和鸚鵡在鳥籠裏叫喚不停，他那些打扮得五彩繽紛的馬匹配上了黃鞍、馬勒，並裝飾了一些小巧的金器，這些馬跟在馬夫身後，騰躍向前；僧人吹著尖銳的高調短號，軍樂隊則在奏著「遙遠的梯佩拉里」（18）。年幼的達賴喇嘛，從吊著絲穗的黃轎窗戶朝外觀看，最使他感到欣慰的莫過於大自然的景色。他回憶說：「當時的季節美極了。草地在反青，杏樹在開花，鳥兒在歌唱。那時，我非常喜歡從布達拉宮遷居羅布林卡的這一天。」

羅布林卡由八世達賴喇嘛（19）始建於十八世紀，在布達拉宮西面兩英里處，曾是沐浴（20）和野餐的好地方，內有殿堂和兩層樓高的宮殿。雖然政府也將辦公地點遷移到了夏宮，但這座園林裏卻仍是一片寧靜的氣氛。馴服的麝、野雞和孔雀在亭閣之間悠閒漫步；池塘裏餵養著供觀賞的魚兒，每當這些魚兒聽到達賴喇嘛的腳步向池塘走來時，它們就會游到水面上來等著餵食。園林裏大部分地方都是密林，每天早上，人們就要將數百個陶瓷花盆端出來，裡面種的是花卉和稀有植物，將這些華鉢整齊地擺放在宮殿前的草坪上。如果人們進行更為大膽的經營，就會得到應有的報償，因為羅布林卡的土地肥沃，這是令人驚訝的。小蘿蔔品種經常可以收到重達二十英鎊的果實，白菜則有三英尺大。這裏還種了桃樹、梨樹、櫻桃樹、蘋果樹和核桃樹。

達賴喇嘛在羅布林卡度過了他童年最幸福的時刻。十三世達賴喇嘛蒐集了一些《全國地理》和《生活》（21）雜誌，有時間他就翻看這些舊雜誌，這樣就培養了他對現代發明的愛好，加之別人送給了他一些禮品，如望遠鏡等，這就更加深了他

這一愛好。達賴喇嘛長大一些之後，他開始將手錶拆卸開來，還卸了幾部昂貴的，但一般情況下已不能運轉的電影放映機，憑著記憶他又將這些東西重新裝好。然後，他的注意力就轉向了兩輛巴比奧斯汀牌小轎車和一輛桔紅色的多奇牌轎車，它們是西藏僅有的車輛，曾經是已故達賴喇嘛的財產。自從十三世達賴喇嘛死後，這幾輛車就一直閒置在一旁。有一位年輕藏人在印度學過開車，丹增嘉措與他一道修好了兩台車，在這一過程中達賴喇嘛學會了內燃機的工作原理。這個司機走了之後，白天他就偷偷摸摸地在羅布林卡內牆裡的草坪上開車，偶爾撞著了大門或樹木。有一次，他匆匆忙忙，結果一盞前燈撞壞了，他企圖用一塊特別劃開的玻璃來掩蓋住撞壞的部位，由於他多次使用了糖漿，這塊玻璃也給弄得模糊不清了。達賴喇嘛還花費了很多時間，琢磨交流電和直流電的奧秘，他用的是一台有些毛病的發電機，他這樣做總是使大管家和經師們感到擔憂，因為他們害怕達賴喇嘛被電打死。由於這位年輕領袖翻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外交書刊，所以他對地圖、歷史和國際事務產生了興趣。當他進入青春期時，他就叫兩位會講英語的官員翻譯他訂閱的一套書，這套書講得是剛剛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此同時，他開始學習字母，擴大詞匯量。對於達賴喇嘛來說，這些興趣是前所未有的，他完全是進行自發的追求，直到後來出現了一位他十分需要的志同道合人士，他就是海因利希·哈雷，他是一位奧地利登山愛好者，當時住在拉薩。

哈雷在回憶他與當時十四歲的達賴喇嘛的第一次會見時寫到：「對我來說，他似乎就像過了多年的孤獨生活似的，一直在用這些時間思考著各種問題，終於他遇見了一個可以交談的人，他只想立刻知道全部問題的答案。」達賴喇嘛通過第三者，要求哈雷在羅布林卡蓋一個電影廳。當電影廳落成時，他出乎意料地邀請哈雷私下來見他。哈雷回憶：「我朝電影廳走去，但我還沒有進門，門就從裡面打開了，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這位活佛。」達賴喇嘛一邊將客人推著進入放映室，一邊說：「進去嘛，讓我們看看日本投降的場面。」哈雷開始緊張地將膠片裝入放映機，但達賴喇嘛卻「用手肘將哈雷輕輕推到了一旁」，他只用了一會兒就將膠片裝好了。電影放完之後，丹增嘉措把他那些神魂顛倒的堪布給打發走了。他將哈雷領到了已經陽光明媚的電影廳裏，拽著哈雷的衣袖將他拉到栗色地毯上坐下。達賴喇嘛坦率地說，他早就計劃要安排一次會見，因為他想不出還有其他熟悉外部世界的辦法。接著，達賴喇嘛接二連三地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你喜歡聖城嗎？你會開坦克嗎？會駕駛飛機嗎？噴氣式飛機為什麼能飛上天呢？為什麼你手上的毛就像猴子一樣？」哈雷感到達賴喇嘛的個性富有吸引力，他眼睜睜地看著這位年輕人。達賴喇嘛盤腿坐在他面前，雙手一動不動地放在大腿上，臉上煥發著激動的容光，整個身體兩邊搖晃。他的膚色比大部分藏人的膚色要白得多。他個子高，身材好，「一雙漂亮的貴族手」，雙眼充滿「表情、魅力、生氣」。達賴喇嘛不好意思地拿出寫英文單詞的筆記本，說：「海因利希，你教我學英語吧。我們現在就開始。」

他們的教學課程持續了好幾個月。科目有數學、地理和自然科學，內容從原子結構到拉薩與紐約為什麼有十一小時時差等等。此外，很多時間還花在電影廳裏看電影，達賴喇嘛最喜歡的電影有：一部有關甘地生平的紀錄片、卡索爾（22）新聞片和《亨利五世》，翻譯亨利五世這部影片，哈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因為他得將這部影片從莎士比亞時期的英語翻譯成藏語。哈雷說：「他的理解力、頑強和勤奮總是使我驚嘆不已。當我叫他翻譯十個句子作為課後作業時，他通常要交二十個句子的翻譯作業。」達賴喇嘛不尋常的性格，也使這位奧地利人感到驚奇。哈雷說：天生的謙虛是「永恆奇跡的源泉」，「一個富商的孩子比他受寵得多」。果斷是達賴喇嘛有別於他人的另一氣質，它具有「鮮明的個人意志，並能將這一意志強加於他人」。哈雷認為，達賴喇嘛內心有一種孤獨感——這一點得到了達賴喇嘛母親的證實。然而，當他們的友情加深後，達賴喇嘛不斷地提出了他心靈深處的話題：宗教。他私下告訴哈雷，他正在修習能將意識與身體分離的辦法，當完成這一過程時，達賴喇嘛打算將他送到西面七英里的岡朵卡（23），然後從布達拉宮直接指揮他在岡朵卡的一舉一動。哈雷對他的學生說：「你能這樣做時，我也會成為佛教徒。」不幸的是，這一實驗以及他們之間處於萌芽狀態的友誼驟然結束了。

1950年8月15日晚，丹增嘉措在喝茶，吃酸奶以及母親每個星期送來一次的家製麵包，這時突然而來的地震搖撼了整個羅布林卡，接著天空中傳來了接連不斷的四十響爆炸聲。達賴喇嘛以及他的侍從跑道外面的花園裏，遙望東面的色拉寺，爆炸聲就是來自那個方向。當時，他們以為這是色拉寺附近發射來的砲彈，但過了不久，來自拉薩城裏的人們說，爆炸聲來自東面更遠一些的地方。一天以後，印度電台報導，西藏南部發生了大地震；這次地震很嚴重，加爾各答的電影觀眾恐慌地逃離影劇院，餘震聲音震撼了全藏，一直傳到了西部邊境。

「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震起來就像整個世界的末日已經來臨似的。」這句話是羅伯特·福特寫的，他是英國人，無線電報務員，在康區首城昌都為西藏政府工作。事實上，這是歷史上的第五大地震；瞬間之間，高山河谷易位，數百座村莊被

吞沒，布拉馬普被拉河完全改道，地震之後的好幾個小時，西藏南部的上空仍閃爍著可怕的紅光，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硫磺味。

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全部西藏人認為，這次地震不僅僅是一種地質現象而已。在這次毀滅性的打擊中，他們看到了自己國家命運的先兆。

早在 1945 年（當時離中國的內戰結束還有四年，內戰一結束，勝者就勢必會對西藏實行壓迫），國家級曲均就曾面朝東方作法，發狂地搖晃著自己的腦袋，表示警報。1947 年，國家級曲均就預言過，鐵虎年——1950 年——西藏將面臨「大困境」。兩年之後的 1949 年，他的警告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因為這一年出現了一顆明亮的馬尾形彗星。這顆彗星在天空中懸掛了幾個星期，晝夜可見，尤其是年老的西藏人認為，這無疑是戰爭的預兆，中國 1910 年入侵前，也出現過這樣一顆彗星。第二年夏天，不祥之兆由自然現象變成了離奇的表現。夏季的一天，晴空萬裡無雲。大昭寺樓頂上的金頂，形狀各異，居高臨下，可以將拉薩市商業區盡收眼底。金頂人們無法上去。其中一個金頂直往外噴水。一天上午，在布達拉宮山腳下，發現一根高高的石柱柱頭也被碰掉了，這根石柱是公元 763 年為慶祝西藏征服中國而立的。

正如十三世達賴喇嘛所預言的那樣，外來的威脅和內部的衰落再次吻合。1941 年，熱振仁波齊將攝政王位讓給了達賴喇嘛的高級經師達扎仁波齊。他們私下達成了協議，他退位是為了隱居一段時期進行修習，修習結束，他將重返王位。六年之後的 1947 年春天，達扎仁波齊的隨從根本不願意交出權力。在這些人當權期間，賄賂成風，不管事的官僚主義盛行。為了使西藏的政府重新回到幹才手中來，熱振仁波齊的追隨者們謀劃了了一次政變。前任攝政王的私人秘書朗欽喇嘛，從蔣介石總司令那裡求得了支持，他將一個手榴彈包在一個署名送給達扎仁波齊的包裹裡。但這顆手榴彈爆炸過早，陰謀敗露之後，朗欽在拉薩一位朋友家的衛生間裏開槍自殺。接著熱振仁波齊被捕，關在布達拉宮，這一行動致使色拉寺傑扎倉的僧人反叛，熱振仁波齊是屬於這個扎倉的喇嘛。這些僧人與政府軍戰鬥了十二天，兩百人戰死，其餘的投降。一個星期之後，熱振仁波齊神秘地死於監獄，唯一不正常的現象是，他的臀部有一小塊地方變成了紫色。

內戰隨短，但卻是使西藏深受其害。此外，國民黨在這裡設立辦事處十五年之後，他們的破壞活動範圍在擴大，包括了西藏社會各方面的人士。直到 1949 年 7 月，西藏政府才認識到了滲透的嚴重性，它擔心新近獲勝的共產黨會利用這一形勢，因此關閉了「聯絡處」，將聯絡處的工作人員趕走了，一同趕走的還有二十五名掛了號的特務以及藏人同謀。雖然將中國人從拉薩攆走了，但卻無法消除他們民族統一主義的要求。

1950 年元旦，也就是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三個月，北京電台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布，1950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就是要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接著，西寧和四川省會成都也發表了許多廣播言論，都聲稱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廣播都說，西藏落入了「外國帝國主義分子的勢力範圍」。因此，「為了保證西部邊境的安全」，西藏需要「解放」。

雖然這些語言新奇，但含義卻很清楚。本來拉薩有四十年的時間可以用來加強防衛，但現在這四十年都喪失了，它終於開始採取行動保衛自己。西藏政府首先注意的是軍隊。自從十三世達賴喇嘛死後，改善軍隊這個問題被完全忽視。這支軍隊不過只是一支邊防巡邏隊，它擁有八千五百名官兵，五十門大砲，只有幾百門迫擊炮和機關槍。應徵入伍的士兵常常與妻子兒女一起行動；那些軍官大部分是服役期很短的貴族官員，他們事先也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然而，在西藏與中國既成事實的邊界——沿長江上游一線守備薄弱的城鎮，很快部署了一些新部隊，並增添了彈藥。官兵們都很有把握，他們能夠頂住久經戰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因為他們有崇山峻嶺佐助，這些山脈是他們祖國最重要的自然財富。

外交方面的情況卻不令人樂觀。西藏政府認識到，要依靠自身永久性地抵抗中國的進犯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給印度、尼泊爾、英國和美國發了電報，要求這些國家接待前來求援的代表團。因為西藏政府與所有這些國家（印度除外）沒有正式關係——西藏一直認為，與沒有關係的外界建立關係沒有必要，所以總的來說，它得到的是彬彬有禮的回絕。最令人失望的是印度，因為西藏是印度至關重要的緩衝地帶。

根據 1914 年的「西姆拉協議」條款的規定，除非中國承認十分明確的西藏自治地位，繼承了這一協議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就須拒不承認中國是西藏的宗主國。但是，儘管這一宗主國地位「十分含糊不清」，他卻反復提到這種地位是大家公認的事實，這樣也就向北京發了信息，印度新政府不會像英屬印度政府那樣幫助西藏。中國聽說西藏提出了上述要求之後，立即警告新德里，「接待非法代表團」就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有敵意」。幾個月後，中國政府表示要駐北京的印度大使

放心，中國無意用武力對付西藏。因此，尼泊爾主張拉薩在西姆拉協議的基礎上單獨與中國談判。這樣西藏政府被迫直接與共產黨打交道。它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要得到「西藏的領土完整不容侵犯」的承諾，並「通知中國政府，西藏人民和政府……將繼續擁有獨立地位」。途中，代表團與在新德里的中國官員進行了接觸，這些官員建議代表團等候新任駐印度大使的到來。代表團照此辦了；但中國人在實行自己的計劃過程中，卻沒有這樣做。

到初春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從中國的平原地帶來到了康區的高山峽谷，當時康區名義上仍是國民黨統治區。1949年末，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安多也採取了相類似的行動，佔領了安多的大片地方。4月16日，中國著名的「紅色元帥」林彪，率領第四野戰軍渡過狹窄的瓊洲海峽，這條海峽將中國大陸和海南島分割開了，只用了幾天時間，就擊敗了國民黨的部隊，這樣也就實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的第二項目標。北京廣播電台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廣播，只提到台灣和西藏還有待「解放」。三個星期之後中國人在電台上建議，如果藏人同意和平解放，就可實行「地區自治」和「宗教自由」。但這一建議在電台上還只發表幾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渡江發起了一次試探性的進攻，攻佔了防守薄弱的鄧柯鎮。兩個星期之後，七百名藏軍在卓有才能的木加代本的指揮下收復了鄧柯，士氣高昂的康巴兵將約六百名中國士兵殺得一個不剩。這是初始階段的第一次，也是傷亡最重的一次戰鬥（這場戰鬥發生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不過一星期的時候）。雖然藏人打勝了，但這一勝利卻也不能挽救他們的失敗，因為西藏的這支軍隊人數遠遠不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根本不同的軍隊。

甚至在進攻鄧柯的消息還沒有傳到東線司令部所在地昌都鎮時，這座城市就已陷入一片混亂。一名西藏中部的士兵，強姦了一個康巴姑娘，導致數百名非正規部隊的康巴人在軍營前示威。由於康巴人個子高大，獨立傾向較強，雖然他們也信奉佛教，但他們每逢不平，就立即要採取報復行動——這一氣質也是致使康區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部落之間競相殘殺的原因。這些康巴人手裏揮舞著步槍和長長的匕首，要求部隊出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實際上，兩名上校指揮官已經命令部下上好刺刀，準備格鬥，這時來了一位深受康巴人愛戴的政府高級官員，這才解除危機。康巴雖然暫時散開了，但卻更經常地在昌都縱馬奔跑（這是他們的習慣，每天如此），正如福特所描述的那樣：「一邊還朝空中放槍，揮刀舞劍，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姑娘們全躲在家裡不出門，一些拉薩的官員也躲得遠遠的。」

地區之間的抗衡，又一次威脅到了昌都鎮的和平，而西藏防務的基礎就全在於昌都的和平。這是很危險的。這一點十分清楚，因為軍隊的司令部沒有設在其他地方，而就選擇在昌都鎮。昌都距康區東部的西康（西康於1939年被中國作為一個行省納入版圖）邊界一百英里左右，位於岬角處，扎曲和昂曲兩條河在鎮腳匯合，這也就是湄公河的源流。1917年10月，中國軍隊被從這裡趕走；從那以後，康區交給拉薩稅收，就用來供養在這裡設防的一支常備部隊——這也就是康區從西藏中央政府所得到的主要幫助。因此，從政治上看，因為昌都的防務與康區對中央政府的忠誠息息相關，所以這種防務必不可少。但從戰略上看，在這個地方設防抵抗卻毫無意義。由於可以從北面對昌都實行包圍，所以將它與拉薩切斷十分容易。康區省長拉魯夏培決心死守昌都，以對付上述進退兩難的困境。他又假定，這個人開始並不會大舉進攻，他就會撤退——康巴人的忠誠依然如故，走五十英里經類烏齊撤到易於防守的高山口，這裡距昌都尾部五十英里，有一條河，它是薩爾溫江上游的支流。

從理論上說，這一個計劃能夠將不妙局勢所帶來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但是，由於這一計劃完全是防守型的，所以也就沒有利用西藏最有效的武器：遊擊戰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方面的可能性卻已經表現在拉嘎·班達倉身上，他是康巴人強有力的領袖人物，拉薩方面對他十分擔心，因為他企圖率領康區鬧獨立。6月份拉嘎來到了昌都，主動提出他的部隊可以在長江的東面投入戰鬥，採取打了就走的戰術，與此同時，他的弟弟多布吉已經在中國人軍事行動的基地康定，主動提出讓上述部隊擔任向導，作為回報他需要得到獲取獨立自由的保證。因為拉薩不願作出這樣的安排來削弱自身的權力，所以拉薩沒有徵用班達倉兄弟，這樣，也就將這些可怕的戰士推入了共產黨的懷抱，因而也就喪失了西藏軍事上的唯一真正的希望。正如一位藏人事後總結當時形勢時所說的那樣：「如若從中國進攻的第一天起，我們西藏人就戰鬥在一起的話，外面就不會失敗。我們的崇山峻嶺固若金湯。西藏沒有公路，中國人沒有給養運輸線。中國士兵行軍時，會害雪盲病，他們一個跟著一個走，用不了多少天他們就不會有任何軍隊就大搖大擺地走進來了。」

10月7日這天，和平終於喪失。第一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的八萬四千名官兵在劉伯承將軍的統一指揮下，黎明時乘著小小的牛皮船，在南起德欽北至鄧柯的六個地方發起了進攻。自從四個月前襲擊鄧柯以來，一直沒有大的交戰，而這次突然襲擊一下吃掉了西藏的四個代本，它們是「箭頭」，即藏軍前線部隊。

卡旦代本是西藏防線的中心環節，直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消滅了邊界康多渡口守衛部隊，並襲擊了卡旦代本在南森的司令部之後，他才意識到這場猛攻。藏人潰敗之後，朝南森鎮西面唯一可能賴以抵抗的一處高山口撤退。夜幕降臨了，藏人停止前進，在山口下的一塊平地上匆匆挖了一條壕溝，決定就在這裡宿營。夜晚，中國人沒有停止行動躺下休息，而是發起了進攻。戰鬥很快就告結束，卡旦代本自己也被俘虜，實際上他連靴子都沒有來得及穿上。

儘管最南部的城鎮德欽的守備部隊守住了，但他們卻丟掉了北面的一個主要山口，這是三個主要山口中的一個，這樣也就使得中國人民解放軍切斷了它與外界的聯繫。南森鎮西南面的大城鎮芒康，也以同樣快的速度落入敵手。這支守備部隊的司令德格王子（他來自北邊半自治的王國，被拉薩派駐這裏）大膽躍馬向前，向進軍中的中國人投降，目的就是要保存他那支數量上遠遠少於敵軍的部隊。這樣，只用了幾天時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就從南面和東面開拓了一條前往昌都的暢行無阻的通道。然而在北面的二百五十英里處，鄧柯卻堅守住了。因為擔任指揮官的木加代本將軍的部隊紀律嚴明，所以他能夠將中國人趕回到長江彼岸，給敵人造成重大傷亡。在北面遠一些的地方渡過了一些部隊，他們從側翼包抄了木加代本，最後他才被迫撤退，但他仍然是戰一步才退一步，決心保衛類烏齊，因為它是昌都後方的主要防衛城鎮。戰鬥的第一個星期，類烏齊的確十分寧靜，但人們知道，類烏齊北面的玉樹已被佔領，只要成功地發起一次進攻，康區的失落就不可避免。

四天之後，昌都才得到入侵的消息。當這一消息傳到昌都之後，全城人民一片混亂，整個夏天，拉魯夏培一直終於職守，武裝和徵用康巴兵。不過，8月底時他為期三年的省長任期屆滿。令人不可相信的是，儘管拉薩的噶廈政府知道中國人在冬天前一定會發起進攻，但它卻仍按照慣例行事，派了噶廈的一名噶倫去替換拉魯夏培。就在入侵即將來臨前的幾個星期，阿沛·阿旺晉美到達昌都，對他不熟悉的局勢擔負起指揮任務。他自己也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錯誤的做法，9月份他別的事情沒幹，整天就是參加歡迎他的晚會和宴會，這是習慣做法。選人擔負這樣一項艱難的任務，阿沛是錯誤的人選。雖然他以前在康區出任過一期官員，但很多人卻認為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首長，而不是能力卓越的領導人。福特是這樣描述他的：「高大而有風度，長下巴，臉色威嚴，但卻不乏樂觀神色。」抵達昌都時，他寬厚地叫各方人士放心，「只要我在昌都，昌都就不會投降。」

似乎沒有幾個人相信他的話。當入侵的消息在全城傳開時，人們排成一長列隊伍從昌都寺走向昂曲河岸。這裡，鈸聲、號角聲、海螺聲和康巴戰士陳舊的前裝槍的槍聲匯成一片，僧人則象徵中國人罪惡的一些模擬像，仍進了一堆寶塔形的柴堆。後來幾天，昌都最出色的算命先生門前街上的長隊越排越長。房頂上新插了一些經幡，數千人走出家門，環繞昌都的林廓轉經，不住地轉動經筒和叩著長頭。居民們驚恐不安，其中有一人發誓要叩長頭前往五百英里之外的拉薩朝佛，而且要立即出發。達賴喇嘛作過評論：「總的來說，我們我們西藏人篤信佛教，而且有許多人實踐得很好。但是，認為我們只需要祈禱，勿須作任何人為努力就可以挽救我們國家，這一信念是知識有限所造成的，從這點來看，宗教感情實際上成了障礙。」

更嚴重的障礙，卻在於中央政府的失職。阿沛得到入侵的消息之後，馬上給噶廈發了密碼電報。當時，拉薩的全體高級官員都在參加為期五天的宴請活動。噶廈每年都要為全體官員舉辦這樣的宴請。擲骰子、打麻將、喝青稞酒，大家都穿上最好的綢緞服裝，這些暫時成了人們頭腦中最重要的一一而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因此，對這封電報沒有立即作出答復，儘管最後還是回了電，但入侵的消息卻保密了九天時間，在此期間，噶廈在考慮要採取什麼對策。

在昌都，越來越緊迫。阿沛得到消息，東面的中國人只有一天的行程了，而後方的類烏齊正在受圍，他慌了手腳。阿沛電告拉薩，請示獲準投降，他的要求遭到拒絕。他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取下了懸掛在左耳下的黃金、綠松石長耳環，脫下黃綢長袍，換上低級官員穿的樸素的哩噠服裝，深夜趕忙逃走。10月17日破曉不久，人們發現省長已經逃走，昌都全城老幼驚慌失措。阿沛沒有從附近村莊弄來一些馱畜，因此他的部隊就無法秩序井然地後撤。見此，阿沛全然拋棄了手下的部隊，甚至也沒有將現存的牲畜在他的警衛部隊中分配一下。守備部隊有兩名上校，他只給其中一人下達了唯獨的一道命令：銷毀彈藥庫——都是些炮彈和子彈，這些東西對康巴人是無價值之寶，而康巴人還不得不留下來保衛自己的家園。結果，巨大的爆炸聲撕裂長空，拉薩官員、他們的部隊以及家屬步行逃離昌都。康巴部落人發狂似的搶劫行凶，只想找到一個人能夠發洩他們被出賣後而產生的暴怒，但這卻是一番徒勞。

阿沛的投降還不僅限於此。阿沛沿著西面的線路拼命奔逃，希望能夠趕在北面進軍的中國人前面，他遇見了一支裝備有大砲的增援部隊，這支部隊數星期前就從首都拉薩派遣出來了。使這支部隊官兵震驚的是，阿沛居然命令他們將武器仍下深淵，隨他一起逃跑。不久之後，偵察兵報告，有一支替中國賣力的康巴人隊伍已經切斷了這條退路。阿沛不是殺出一條逃

路來，而是躲在附近的一家寺院裏，確信在這塊神聖的地方，康巴人不會加害他——本來，他手中掌管著昌都的全部守備部隊，殺出一條生路來並不困難。18日下午，阿沛抵達這裡，接著木加代本率領著他手下全部五百名左右的久經戰鬥考驗、裝備精良的騎兵（毫無疑問，他們是東線部隊的最優秀戰士）騎馬也來到了這裡。阿沛聽說一支一百人的中國先頭部隊緊逼在後面時，他命令加木的部隊放下武器投降。這時，戰士們的妻子在準備宿營地，將東西從犛牛和騾子背上卸下來，支起帳篷，生火準備做飯，照看嬰兒小孩。與此同時，那些戰士們以不相信的目光，看著一支人民解放軍的小部隊在架上野戰炮，接著他們在康巴嚮導和翻譯的陪同下，走過來接受一支是他們力量二十倍的部隊的投降。中國與西藏的戰爭也因此而結束，這場戰爭不過剛剛進行了十一天。

一個星期之後的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宣布，中國軍隊已經進入西藏，將西藏人民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是北京廣播電台宣告的。翌日，印度對入侵提出了抗議，它得到的是措詞嚴厲的答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答復中堅持認為：「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任何外來干涉都是不能容忍的。」十二天之後，西藏噶廈政府給聯合國發了一封言辭懇切的呼籲電，請求幹預，以「阻止中國人的入侵」。而且，拉薩對中國人的意圖實際上一無所知，直到後來阿沛派來兩名官員來到拉薩，他們說阿沛——連同他手下的四名將軍一道——已被囚禁在昌都。阿沛希望能夠授權給他談判和平條件，因為中國軍隊的指揮官已向他保證，中國人的進軍只限於康區。拉薩政府終於面臨著失敗這一現實，它作出了迄今為止在這場危機中最重要的決定。

嘎東曲均被召到羅布林卡，正式進行了一次降神作法。保護神附身於他之後，他從坐著的位子上站了起來，大聲嘶叫，渾身急劇抖動，侍從們立即將降神作法用的頭盔戴在他的頭上，緊緊地在他下巴下面繫好帶子，曲均走到達賴喇嘛的寶座跟前，獻了一條長長的白色哈達，然後就回到座位上坐下了。當向這位神靈請教的時候來臨時，眾噶倫必恭必敬地尋找指導，一位秘書拿著一幅卷軸，唸著寫在上面的正式請求。曲均又一次走到達賴喇嘛跟前，清清楚楚地說：「立地為王。」接著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結束了。

丹增嘉措憂心忡忡。他對政治所知不多，對國際事務瞭解更少。那年夏季末，上密院從布達拉宮遷移到了羅布林卡，為的是與這位年輕領袖聯絡方便一些。在這一期間，達賴喇嘛在製定政策方面，進行了第一次為時甚短的嘗試，這一次給他的顧問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當時他才十五歲，離達賴喇嘛親政的年齡還差三年。但是，他沒有別的辦法。儘管中國人作出了保證，但解放軍隨時都會進軍拉薩。人民群眾早已在懇求達賴喇嘛親政領導。首都城裡「讓達賴喇嘛親政」的標語比比皆是。開始，丹增嘉措不同意，但最終還是同意了。1950年11月17日，在布達拉宮舉行了盛大儀式，達賴喇嘛獲得了西藏至高無上的俗權。無論達賴喇嘛自己作何反應，歷史逼迫他不得不這樣做。後來他寫到，「我不能拒不承擔責任。我必須承擔責任，拋棄我的少年時代，立刻準備領導我的祖國。」

譯注

- (1) 又稱神諭，代表保護神預卜人間之事。關於這方面內容，詳見本書第八章。
- (2) 仁波齊是用於佛師或活佛的敬語，意即「寶師」。
- (3) 安多大致為今日青海省。
- (4) 原文如此，應為九世班禪。
- (5) 阿和安多的英文分別為 Ah 和 Amdo。
- (6) 尕和塔爾寺的英文分別為 Ka 和 Kumbum。
- (7) 尕、瑪和嘎瑪夏松寺的英文分別為 Ka、Ma 和 Karma Shart song Hermitage。
- (8) 雅魯藏布江流入印度後，即稱布拉馬普特拉河。
- (9) 西藏舊時的行政區別，其他兩個地區指安多和康區。衛藏即前藏和後藏，指當今拉薩和日喀則附近大片地區。

- (10) 即觀世音，藏傳佛教稱之為堅熱斯。
- (11) 蘇聯城市。
- (12) 藏傳佛教信徒在石塊或石片上刻六字真言，置山口道旁，過路的信徒不斷往上添加石塊，日久成堆，故名。
- (13) 原文 Dzona，有兩義：宗（音譯），西藏舊時行政區劃，相當於縣；城堡。
- (14) 指青海省果洛地區藏族。
- (15) 由名門望族子弟組成的部隊。
- (16) 寶為八座，無六世達賴靈塔。
- (17) 應為擴建。
- (18) 一首英國歌曲。
- (19) 原文如此，應為七世達賴。
- (20) 這裡曾有一處溫泉。
- (21) 原文為 National Geographic 和 Life，均為美國雜誌。
- (22) 原文為 Castle newsreels。
- (23) 在當今的阿里獅泉河附近地區。

第二章 佔領

1950——1959

1950年11月上旬，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齊，出人意外地來到拉薩。自從一年前共產黨佔領安多地區以來，他一直受到囚禁，被迫目睹塔爾寺周圍的村莊改變它們長達數百年歷史的生活方式。由於中國正在進行入侵康區的準備工作，因此，西寧新任共產黨省長則動手策劃推翻達賴喇嘛的計劃，並企圖得到達澤仁波齊的支持。中國人要達澤仁波齊說服西藏的領袖，不要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如果不能說服，達澤仁波齊就得殺害達賴喇嘛。作為回報，中國人答應讓他擔任西藏的政府主席。

達賴喇嘛的哥哥佯裝同意從命，因而他獲得了自由，離開塔爾寺前往首都。他來到首都之後，立即將中國人的意圖告訴了達賴喇嘛，並向噶廈提交了一份詳細報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計劃，北京不僅要吞併西藏，而且還計劃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漸解體，用馬克斯主義的國家，來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不久之後，又得到了更為令人沮喪的消息，聯合國拒絕考慮西藏問題。此外，正如英國大使所堅持的那樣，聯合國也認為，西藏在國際上的法律地位並不明確，而聯合國的這一行動是因為採納了印度代表的建議。顯而易見，這位印度代表所關心的問題是最大限度地減少與中國的磨擦。上密院擔心達賴喇嘛會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抓獲，因此要求他逃往邊境城鎮亞東，如有必要，他就可以從那裡逃往印度。

1950年12月19日凌晨二時，丹增嘉措溜出了布達拉宮。達賴喇嘛跨上了一匹灰色座騎，陪同他的有四十名貴族和二百名配有機關炮和榴彈炮的精銳警衛部隊。他騎馬朝南，沿著拉薩河谷奔向印度邊境。在這支隊伍的正中間飄揚著達賴喇嘛旗，旁邊是西藏旗：西藏旗的圖案，是一輪紅日從白雪覆蓋的山峰後升了起來，放射出十二道光芒，兩頭獅子抱著佛、法、僧三寶。

上密院要求嚴守秘密，不要透露達賴喇嘛的出走，因為上密院確信，如果群眾知道了這件事，而他們又沒有看到他留在拉薩，當權人物就要擔很大風險，群眾就會作出努力，阻攔出逃。從首都騎馬行走還不到一天的路程，就遇到了這樣的障礙。當這支隊伍靠近用來修道的降寺時，數千名僧人蜂擁來到路上，擋住了去路。這些僧人來自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他們雲集於此是為了進行冬季辯經活動。接著就是相持不下的僵局，直到達賴喇嘛親自出面調解，說服這些僧人放他過去時，才結束了這一僵局。通過這一難關之後，隊伍繼續向江孜進發，繼而前往帕里，帕里是西藏最高的城鎮。從帕里開始，道路驟然下降，來到了森林密布的春丕谷，多少世紀以來，這裡一直是印度與西藏之間的主要貿易通道。在河谷遠遠的盡頭，也就是在邊境的山口之下，便是繁榮的亞東鎮。整個地區都設立了部隊檢查站，達賴喇嘛下榻在風景如畫的冬卡寺，而他的官員和隨從則住在冬卡寺下方的鎮子裡，其中包括達澤仁波齊和奔逃的海因利希·哈雷，他們住在當地農民和商人家裡，勉強應付一下。與此同時，噶廈授權阿沛·阿旺晉美，另外還有四名從拉薩和亞東派去的官員，叫他們與中國直接談判，以求獲得西藏希望贏得的一些自由。

1951年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西藏代表團抵達北京。中國總理周恩來為他們舉行了禮節性的招待會，爾後交給他們一份十條協議，詳細規定了投降的條件，即正如協議所說的西藏的「和平解放」。因為這項協議聲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代表團拒絕簽字。接著出現了僵局，直到提出了第二項協議，這項協議有十七條，這次不許有任何討論餘地。代表團成員與其政府的關係被切斷，緊接著受到了對他們施以人身懲罰的威脅和對西藏實行大規模軍事報復行為的威脅。5月23日，他們屈服了——但達賴喇嘛和噶廈並沒有授權給代表團，在中國主要領導人的住地中南海舉行了一次正式儀式，後來向全國和全世界公佈了舉行這一儀式的消息。在這次儀式上，他們用復制的西藏政府印章批准了這一協議，印章是為此目的早在北京就已偽造好了的。

根據十七條協議，西藏失去了作為單一民族的國家地位，阿沛·阿旺晉美在北京電台上公佈了這一解決辦法——直到這時設在亞東的西藏政府才第一次聽說了這一協議。第一條是：「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第二條確切地勾劃了實現這一目標的辦法，現存的「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其餘的條款，有些規定維持西藏的地方政府——其中包括達賴喇嘛的地位，有些條款就是要使西藏地方政府變得毫無作用，如取消從事外交活動的權利和將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款。這一所謂協議使達賴喇嘛大為吃驚，他命令達澤仁波齊過境去印度，通過私下渠道，最後一次呼籲要求得到援助——這次是向哈里·杜魯門和美國求援。

令人驚奇的是，美國同意了。通過在加爾各答的中間人，達成了一條秘密協議。按照這一協定，達賴喇嘛承諾在印度尋求庇護；公開譴責十七條協議。美國一方則保證支持達賴喇嘛及其在國外的政府，重新將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並為西藏的反華鬥爭提供財政援助，要是反華鬥爭有所進展的話，其他也包括軍事援助。達賴喇嘛抵達印度的日期定在7月12日，尼赫魯總理已經同意提供方便。

這一計劃沒有結果。就在計劃啟程日期行將到來之際，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堪布來到了亞東。他們多次會見了達賴喇嘛，請求他返回拉薩。這一次還請教了國家級曲均，他兩次明示西藏領袖返回拉薩。由於丹增嘉措確信仍然存在與中國達成妥協的某種可能性，他取消了外逃計劃。7月16日，丹增嘉措在冬卡寺樓上的房間憂心忡忡地望著窗外，這時他第一次看到了共產黨的領導人物張經武將軍，他由兩名身著高領灰色制服的助手陪同。張經武是新成立的西藏軍政委員會主任，當時穿著華麗綢服的西藏政府噶倫正在迎接他，他們邊喝茶，邊進行了簡短的會見。這位將軍遞交了毛澤東的一封信，信中談到了歡迎西藏成為人民共和國的成員，然後他繼續前往拉薩。一星期之後，達賴喇嘛也跟著去了，這時是1951年8月，他離開家鄉已有八個月了。丹增嘉措還剛剛十六歲，就擔負了與西藏新的統治者共同生存的微妙任務。

9月9日，十八軍的三千名官兵進軍來到拉薩，鼓角齊鳴，人們排成方隊，方隊前是舉得高高的毛和朱的畫像，還有中國的五星紅旗，四顆小星簇擁著中間一顆金黃色大星，這四顆星其中一顆就是代表西藏（1）。不到三個月，又來了兩支部隊，這樣佔領軍的人數就達到了二萬人——是拉薩全城人口的一半，他們依靠路途中徵用的三萬頭駱駝和馬匹來馱運給養等用品。藏人開始只是迷惑不解地默默觀看，現在他們排列在街道旁，吐口水，拍手掌，這是他們沿襲已久的驅邪辦法。當人們從「丹塔亞瑪」——佛教之敵·紅色中國人——身邊經過時，孩子們就扔石頭，僧人則將他們穿在外面的長袍兩端繫起來抽打。中國人接收了貴族深宅大院，在拉薩河畔人們喜歡野餐的地方建立了營房，並在那些貴族房子的屋頂上掛起了醒目的紅色標語牌，上面寫著黑色大字，宣傳「祖國」各民族的「團結」。一群一群的士兵，小心謹慎地穿過拉薩城熱鬧的街道，他們身著顏色單調的卡嘰制服，唯一具有區別特徵的東西就是他們帽子上的紅星。破曉了，練兵場上傳來了生

硬的口令，打斷了從家家戶戶傳來的和諧悅耳的祈禱。片刻之間，全城都籠罩在一片令人作嘔的煙霧之中，這些臭氣發自燃燒著的死畜骨頭。

這回中國人的佔領，不同於四十年前的入侵，這一次弄得大多數的藏人莫名其妙。保障宗教自由，還有給貴族的慷慨贈禮，承諾與興建醫院、學校、公路，官方禁止普通中國老百姓使用「蠻子」一詞，所有這一切使眾人感到茫然。然而這種豁達大度一年前就已在康區出現。入侵之後，被俘藏族士兵，被中國士兵稱為「兄弟」，並給了他們一包包食品和錢幣，然後將他們釋放；中國人的照相機，攝下了這些藏人表示感激的鏡頭，以證明人民在獲得「解放」時的喜悅心情。一位康巴戰士在概括大家的反應時說：「這些中國人真怪。我用刀子砍掉了他們八個腦袋，他們居然放我走。更奇怪的是那些宣傳小冊子的內容。中國聲稱它希望幫助西藏實行現代化，這一點倒還有些道理；但他們說『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勢力』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入侵之前，西藏只有六個西方人士，而現在他們都已離開了西藏。『歡迎回到祖國大家庭』純粹是無稽之談。」在美國重新安家的達澤仁波齊評論時說：「起初他們講的話，就像放在刀口上的蜜糖。但我們知道，如果人們去舔這些蜜糖，那麼舌頭就會被割掉。

佔領不到九個月，發生了第一場危機。人民解放軍是名副其實，他們就依賴西藏，從人民群眾那裡獲取自己需要的一切。中國人一到拉薩，就要求西藏政府「借給」他們二千噸青稞；當他們命令再給二千噸青稞時首都微弱的經濟即刻崩潰了。糧價螺旋似地上升，漲了十倍，肉價、蔬菜價格和日用品價格的上漲幅度，也僅略低於這個速度。拉薩面臨著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饑荒威脅，人們因此而奮起反抗，罵中國人的歌曲和標語充斥街頭。群眾舉行集會，成立了西藏第一個大的抵抗組織，叫米芒措都（人民大會），它同時向西藏政府和中國人的軍區遞交了一份有六項內容的請願書，要求人民解放軍撤軍。

中國人立即作出了反應，他們堅持要將藏軍刻不容緩地併入人民解放軍。魯康哇是達賴喇嘛的俗人首席噶倫，這人直言不諱，當他拒不聽命於中國人的意圖時，便被迫辭職。同時米芒措都的五名領袖也遭到囚禁。為了防止進一步的對峙達賴喇嘛接受了僧俗首席噶倫的辭職，此後他就決心由他來直接與中國將軍打交道。

眼下，丹增嘉措認為自己是他的人民和中國軍隊之間唯一的緩衝人物。由於丹增嘉措認識到，如果雙方關係進一步僵化，這只會嚴重危害西藏存在的自由，所以他決定嚴格實行非武力的抵抗方針。雖然從政治上說這是權宜之計，但最終來說，這一立場卻深深地紮根於達賴喇嘛的宗教信仰，也為全體僧眾所共同接受。正如哲蚌寺的喇嘛貢拉熱多仁波齊所解釋的那樣：「我們不能仇恨中國人，因為他們來傷害我們，完全是出於他們自己的無知。真正信奉宗教的人認為，敵人就是自己最大的朋友，因為只有敵人才能幫助宗教信仰者培養耐心和憐憫。」後來，達賴喇嘛在談及他的決定時，寫到：「從根本上說，大家都在受苦受難，因此互相虐待毫無益處。」

然而，西藏的順從程度卻使中國人大失所望。北京本來企圖組織傀儡政府，通過傀儡政府，它既可以控制西藏，又可以消除國際上對其入侵的譴責。1953年年底，北京確信它在這方面的努力已告失敗。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直接插手西藏的政務，以此取代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應邀前往中國，毛澤東打算在中國將新的安排強加於達賴喇嘛，儘管西藏人民強烈反對，丹增嘉措仍接受了這一邀請。表明上看，邀請達賴喇嘛，只是去參加首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要通過新的人民共和國憲法。

1954年7月11日上午，拉薩全城老幼聚集在拉薩河北岸的一頂大帳篷周圍，向達賴喇嘛告別。儀式結束後，數千人哭泣落淚，眼看著這位年僅19歲的領袖，沿著一條白色地毯向下走去。來到了河邊，他爬上了一條用繩子拴住的牛皮船，河在兩岸香霧繚繞，猶如雲朵飄向河的對岸。在那些沒有香霧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數千名中國軍人和藏兵，他們排列在河堤，一線攔住人們，因為很多人威脅說他們要跟在達賴喇嘛身後跳河。丹增嘉措揮手告別，漫出河道的夏季洪流，似乎吞沒了達賴喇嘛越來越小的身影；當拉薩人回到城裡時，感到失去了一切希望。

然而，跟隨達賴喇嘛的，還有西藏的大貴族和宗教方面的顯要人物及其傭人，共有五百人。這支隊伍朝東騎馬走了十二天，晚上宿營，他們穿過了西藏南部漂亮的波密森林，這裡的樹木是落葉松和松樹。然後，他們踏上了中國人正在修建的一條公路，中國人當時正在修建兩條公路，要將拉薩與祖國連接起來。到這裡之後，行程越來越困難。新建公路修在猶如豎井一般的江河峽谷之上，許多地方，公路被水沖走，迫使這一行人踏著泥濘，接連步行了幾個小時。山坡上的石頭嘩啦啦地滾落下來，掉在他們當中，死了很多騾子，三人遇難，但中國人仍拒絕改走以前的商路。這時又傳來了西藏的第四大城江孜被水沖沒的惡耗，使得這些西藏人的情緒更為低落。

24日，這隊人馬坐上俄國產的吉普車（車尾部像山坡一樣傾斜）和卡車，用了兩天時間就到了昌都。在這裡，達賴喇嘛第二次目睹中國人的佔領所帶來的更為殘暴的情景。自從入侵之後，昌都一直受軍事管制，就像中國本土的城市一樣，也安了喇叭，這些喇叭整天鼓動人們去工作，總是長篇大論的廣播宣傳言論。這裡有用冷杉紮的一座歡迎牌樓，一支手風琴樂隊和一隊手持鮮花、笑容滿面的婦女幹部歡迎達賴喇嘛。按照習慣，他給城市居民摸頂祝福，在場的還有一支人民解放軍的儀仗隊。雖然這很不和諧，但現在又總是需要，因為在康區的其餘城鎮，千千萬萬的僧侶大眾蜂擁而至，前來看望達賴喇嘛。臨近八月底時，他們過了康定，翻越了二郎山，進入了中國領土。達賴喇嘛在回憶他越過西藏國界之後最初時刻的感受時，作了這樣的描述：「在西藏一側，往上走的坡度較緩；但沿著這條線路向下走時，卻又長又陡。抵達中國平原時，我想到：啊，這裡的確大不相同；稻田、水牛——這些給我留下了十分鮮明的印象。」從四川的省會成都，達賴喇嘛在乘飛機來到西安。在西安，十六歲的班禪喇嘛及其二百隨從與達賴喇嘛會合，兩人乘專列繼續前進。雖然飛機和火車這些東西長期以來達賴喇嘛都十分嚮往，而這又是第一次乘坐這些交通工具，但他的雅興卻甚少。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抵達中國首都，他們頭上是高大的建築。他們身著金黃色緞袍，戴上骨頭盔——這是西藏與蒙古人有關聯以來，相傳下來的做法——走下火車，他們手握花束，沿著站台向前走，在周恩來總理和軍隊總司令朱德副主席的率領下，數百名工人和學生在熱烈鼓掌歡迎。當天晚上，在北京中心的紫光閣舉行了盛大宴會，正式歡迎藏人「回到祖國懷抱」。兩天之後，達賴喇嘛會見了毛澤東。

達賴喇嘛對毛的印象並非不好。他發現毛談吐直率，心地善良，忠心耿耿。達賴喇嘛注意到了一些詳細情況，其中包括這位革命領袖、黨的主席從未穿過擦得發亮的皮鞋，衣服袖口破舊，煙卷抽個不停，氣喘吁籲。毛似乎身體不好，但當他說話時，卻表現出不同尋常的分析能力。達賴喇嘛說過：「毛主席看上去並不很聰明，有幾分像鄉村來的農夫。但他的舉止，卻表現了真正的領袖人物的氣概。他自信心很強，誠摯地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而且我確信，他也表現出了對我的真正關心。」

事實上，毛被這位年輕的領袖人物吸引住了。毛花了數小時時間，向他提出建議該怎樣實行統治，甚至他還承認佛教不失為很好的宗教——佛祖對普通老百姓十分關心。但政治信仰卻重於個人喜好，情況總是這樣。有一次他們在親密交談，談得正投機時，毛靠了過來，附在達賴耳旁說：「我很了解你，但宗教肯定是鴉片。」又有一次藏人在舉行慶祝新年活動時，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拋擲糕點敬獻佛祖時，他也抓了兩撮，將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後面帶頑皮的笑容，將另一撮扔在地上。

在第一次私下會見時，毛主席告訴達賴喇嘛，一個新的委員會將負責治理西藏。這個委員會的名稱是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它將由五個組——四個藏人小組，一個漢人小組——構成，它的任務就是要為西藏併入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區劃做準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消息都是福音。正如毛自己所透露的，在見到達賴喇嘛之前，他的意圖是從北京直接統治西藏。毛指出，達賴喇嘛所持的和解性態度軟化了他的立場，丹增嘉措的主要目標是：在他心中產生足夠的信任感，以改變中國人無條件實行統治的立場。達賴喇嘛說：「我們必須看到，我們的國家是落後的，它要進步。中國人聲稱，他們來到西藏的目的，就是要開發西藏。你看，這樣就無須爭執了，我們的原則是一致的。」

後來達賴喇嘛在中國還待了七個月，在此期間，他對北京的真實意圖有所了解，因而他的樂觀態度也大打折扣。達賴喇嘛及其噶廈在政治會議上，在參觀學校和工廠時，詳細地作了筆記，他們終於認識到了入侵西藏的全部動機。

中國的首要目標是戰略性的。自從一千五百年以前，西藏入侵中國以後，歷屆中國政府都以小心謹慎的眼光，盯著自己的西部邊界。共產黨擔心失去他們剛剛到手的國家統治權，因此他們認為1904年英國進軍拉薩以及由此產生的英藏雙邊關係是新威脅的基礎。儘管新德里明確表示不會去履行1914年西姆拉條約的條款（該條約明確規定新德里是中藏關係的中間人），北京仍確信西藏存在著「帝國主義的威脅」，當時中國吞併西藏是防禦性的，它企圖永遠關閉中國的「後門」；但是，進攻性考慮也同樣重要。人民共和國佔有西藏高原之後，也就佔有了東方的至高點。無論它與亞洲的兩個大國——印度和蘇聯——中的哪一個發生衝突，西藏由於地處正中，且海拔又高，它都是賴以發起進攻的基地，這一點十分寶貴。從經濟上看，前進亦同樣吸引人。漢文西藏即「西方寶藏」之意（原文如此——編者），西藏擁有中國缺乏的一切：人煙稀少的大片土地，這裡的礦產資源、森林資源和動物資源幾乎沒有開發。從政治上說，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剛剛獲勝，他認為「解放所有受壓迫的人民」是它對義務，並以為這是它的歷史使命，它不但有理由吞併西藏，而且有理由吞併所謂的其他五十三個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的土地面積，為中國領土的百分之六十，而人口卻只佔共和國人口的百分之六。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它長期奉行的少數民族政策，從政治上和文化上，按照漢族的模式，同化這些毫無聯繫的民族——儘管他們大談「區域自治」。達賴喇嘛及其人數眾多的隨從，對這一政策感到十分可怕。

在中國，藏人第一次看到了現代化世界，這是精心安排的場面，為的是獲得藏人的同意，高級喇嘛和噶倫住在北京周圍的別墅裡，給他們配備了足夠的工作人員；這些人有臥車、司機以及私人廚師，比他們職位低的官員卻沒有這些，他們共享不同等級的伙食和車輛。每個星期要發錢——官品越高，錢就越多。冬天臨近時，給大家添置了新的冬裝。雖然高級官員需要參加政治會議，但大多數藏人則在遊玩參觀、買東西、看戲、看芭蕾舞、看雜技和參加舞會。但是，藏人透過中國人效率高、勤勞的表面，看到人們生活所處的環境，其氣氛卻無動人之處，壓制個性，要人們違背自己的本能服從國家。還有一條更深的鴻溝，將這兩個民族的哲學分割開來。共產黨相信，社會主義只要適用得當，就可以成為能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作為佛教徒的藏人卻認為，任何形式的世俗生活決不會使人滿意。對他們來說，解脫，意味著通過成佛而從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的苦難圈子中解放出來。僅有物質上的享受，這從來就不是西藏文化的理想目標。

1955年6月29日，達賴喇嘛回到拉薩，他發現西藏的首都已大大被他所參觀的新世界所改變。兩條公路已於去年12月通車，一條公路通向北面的西寧，另一條直達東面的成都，這些公路首次給西藏帶來了二十世紀的標誌。現在軍車在拉薩的古老街道上穿行而過。不久之後，由於交通變得十分擁擠，所以只得在主要的交叉路口修建一個混凝土台子，並配上一名穿白色制服的警察。1950年之前，藏人就已經向城市供電，而中國人現在卻擴大供電規模，並安裝了電話，還與他們日益增長的基地日喀則、江孜和亞東建立了電報聯係。拉薩河上架起了一座塔門支撐的橋梁，一年之前，還要坐船渡河。正在修建一家銀行、醫院、中學，辦一家報紙，成立青年組織和婦女組織。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興辦這一切並不是為了普通民眾，這些創新主要是為了贏得上層階級（即稱為「愛國上層人士」）的合作，中國共產黨期望在工作展開的開始階段，能依靠他們給予支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有待小心謹慎地展開，西藏政府的作用還得逐步削弱，這兩件事都是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任務。籌委會於1956年4月22日在新建的拉薩文化宮的一片吹打聲中成立，拉薩文化宮是西藏第一座禮堂，位於布達拉宮的對面。

達賴喇嘛希望籌委會能成為妥協服務的工具，但它卻直接破壞了西藏的政體。共產黨採取了慣用的政治手腕，使籌委會看上去是由當地人士在主事——五十一名成員中只有五名中國人，實際上共產黨分化瓦解藏人，使他們相互對立，這樣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就只能成為西藏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國共產黨工作委員會的代言人。籌委會由達賴喇嘛當主任，班禪喇嘛和張國華將軍當副主任，阿沛·阿旺晉美當秘書長，西藏政府僅在其中佔有十五個名額。第二組十一名藏人，都是中國人挑選的僧俗顯赫人士。而第三組和第四組藏人的組合，則更見險惡之用意，這兩個小組共有二十名成員，他們是入侵之後在昌都成立的昌都解放委員會的成員和班禪喇嘛委員會成員。作為政治組織，它們將西藏劃分成了三個地區，直接向拉薩的中央政權提出了挑戰。這樣，由於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要分成了十三個部門來分管西藏事務，所以不但西藏自身的國家政府被取而代之，而且在每個問題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可以與它唱對台戲。達賴喇嘛寫到：「有時候，看到別人怎樣操作這些場面，幾乎令人發笑。但在這些會議上，我常常感到十分尷尬。我看得出來，中國讓我當主任，只是為了給他們的陰謀塗上一層西藏權威的色彩罷了。」

相反，北京還希望通過抬高班禪喇嘛的地位來削弱達賴喇嘛的地位。自十七世紀以來，他們兩人中的長者，就一直是幼者的經師。但是，1923年九世班禪喇嘛（2）逃離了他的世代駐錫寺——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來到北京，因為他確信，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迫害他，譴責他在1910年的入侵時與中國同流合污。九世班禪喇嘛從此之後沒有返回家園，於1937年死於西藏東部的玉樹。國民黨認為可以利用這一不和，因此國民黨對確定新的班禪喇嘛施加了影響，在未經拉薩上密院同意的情況下，就於1949年在西寧確立了新的班禪喇嘛。不久，年僅十一歲的男孩落入共產黨之手，從此以後，他就被利用，充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的主要角色。班禪喇嘛的地位拉薩方面給予承認，不過這是作為十七條協議的組成部分而被迫承認的。由於班禪喇嘛所得到的地位幾乎與達賴喇嘛相等，因此他通過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而成了北京進行破壞活動的刀口，在其他地方則出現了更大的危機。

中國只是悄悄地在西藏中部地區實行這些變革，而在康區和安多，中國則強行實施這些改革。入侵之後不到一年，西藏社會的改革已經開始。起初，改革只是緩步進行。到1955年初時，改革形成了不可逆轉的潮流。人民解放軍的分隊，在黨的工作者和小股新招收的乞丐——好笑的是這些人竟被稱為「白村欣波」，即「勤勞的人們」——陪同下，掃蕩鄉村，繳獲人們的武裝，剝奪人們的私有財產，實行初級階段的合作社，最終將導致人民公社化。所謂的民主改革就是軟化政策，實行了五年，最後幾乎在每個村莊都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人民解放軍的對付辦法，是將大戶人家挑出來，捆綁後帶到村莊中央，用槍口逼迫全村老幼集合開「鬥爭會」。實行這一方面的民主改革，是白存欣波的任務，在此期間，白村欣波毆打和批判他們的「壓迫者」，如果這些壓迫者不老實坦白「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會遭到處決。實行人身威脅，強力推行

社會主義化，誘騙數千名幼童，不讓像藏人一樣在自己家裡長大，而是弄到新辦的那些少數民族學校裡面，作為國家的被保護人撫養。與此同時，中國開始派移民進行滲透。它希望這些移民最終能達到數百萬人，而使「世界屋脊」殖民化。

康巴人的反應一點也不含糊。他們跟隨部落首領，成千上萬人集合起來，騎上駿馬，手拿刀槍，襲擊分佈在東部地區的人民解放軍兵營——德格、甘孜、理塘以及康區其他許多縣的中國守備部隊。這些守備部隊在數量上完全處於劣勢，他們被迫撤退，損失慘重。然而，在中國人沒有採取進一步輕率行動之前，大多數的康巴部落首領也一直保持平靜。

戰爭爆發之後六個月，即 1956 年夏初，昌都的人民解放軍司令官王其梅將軍，將三百五十名顯要人物召到昌都鎮，要他們同意實行民主改革，佔壓倒多數的投票是「不要改革」；接下來的四次會議結果相同。後來在昌都東面四十英里的江達堡，從康區德格召來了二百一十名領導人開會。當這些人全部進去後，五千名中國軍隊包圍了城堡，這些藏人被囚禁了兩個月。被關後的十五天，他們終於表示同意。三天之後，江達堡的防衛放鬆，當天晚上這二百一十人全部逃入深山，西藏正式的遊擊抵抗力量就是這樣誕生的，中國人自己將許多康巴組織逼迫走向對立面，成了非法組織。

在拉薩，起義消息使得達賴喇嘛完全陷於困境，再也不能採取和好的態度。丹增嘉措為妥協而進行的六年之久的努力歸於失敗，人民現在也不聽他指揮，因此他在考慮退出政界，辭去行政職務。然而，1956 年 6 月，錫金王帶來了慶祝佛陀誕辰二千五百週年的邀請信，慶祝活動將在印度舉行。達賴喇嘛拿到邀請信之後，認為這是新的希望。不僅僅因為印度是西藏佛教文化發源聖地，而且也因為它在現代產生了聖雄甘地，由於他主張非暴力的觀念而深受全體藏族人民的敬重。與甘地的同事在一起，丹增嘉措希望能夠得到他們對西藏困境提出的好建議，至少英屬印度曾經是西藏最大的盟友，也許今天還可以依靠它來充當這一角色。

出於「安全方面的原因」，中國拒不准許達賴喇嘛前去參加慶祝活動。10 月 1 日，尼赫魯總理親自電告北京，再次發出邀請，這一次作了修改，增加了班禪喇嘛。顯然，再次拒絕會徹底戳穿中藏合作的假象；造成似乎是強行扣押達賴喇嘛的印象。然而，還是整整過了一個月，到了 11 月 1 日，經過印度駐拉薩總領事的催詢，中國才向達賴喇嘛承認，是發了第二次邀請，並允許他現在接受這次邀請。丹增嘉措立即準備要走，認為這次去印度是「走向寬容、自由世界的生命線」。

達賴喇嘛 11 月下旬離開拉薩，驅車朝南奔向亞東；數年來，中國衛隊第一次離開了這些藏人。他們騎馬爬坡前進，穿過了茂密的冷杉林和杜鵑花林，來到了海拔一萬五千五百英尺的納吐拉山口。他們走到一個圓圓的大石堆前，周圍是久經風吹雪打的經幡，他們在一片低矮的雲朵下停下來扔石頭，沉浸在傳統的興奮之中，高喊「拉爽羅」（「佛祖必勝」）。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小王國錫金邊界，這些藏人受到了一支儀仗隊和一些顯赫人士的歡迎。這些人拿著哈達和花環，在薄霧中擠作一團。接著夜幕降臨，下了一場大雪，他們騎馬沿著山坡下山，馬鈴在夜色裡叮鈴作響，他們在一些帳篷與平房前停了下來。旁邊有一座結了冰的湖。翌日，錫金法王在首都甘托克城外會見了他的尊貴客人，從那裡達賴喇嘛繼續前進，來到了印度境內的巴格多格拉機場。達賴喇嘛乘專機飛到了新德里，在巴蘭機場的柏油路面上，受到了尼赫魯總理和首都外交使團許多官員的歡迎。丹增嘉措相信，如果他留在自由世界推進藏族人民的事業，他能夠更好地為他們服務，因此他在與尼赫魯第一次單獨會見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總理的答復是十分堅定：他必須返回西藏，再一次在遭到重大破壞的十七條協議裡做文章，尋求妥協。尼赫魯指出，1950 年以前，沒有一個國家正式承認過西藏的獨立，現在讓印度擺出姿態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印度與中國的關係，嚴格地受制於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的精神。這五項原則，是在這兩個新共和國 1954 年的一項貿易協定的序言中明確提出來的。五項原則雖然遭到了印度反對派領袖的嚴厲指責，被說成了綏靖行為，但它對尼赫魯來說，卻是他崇高的心愛理想之一的體現。這一理想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兩個最大國家的和平與團結，也就是亞洲的和平與團結。因此，它不但體現了尼赫魯對中國反對殖民主義立場的欽佩之感，而且對於印度軍隊的弱點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防衛措施，印度軍隊已決心要與巴基斯坦作對。雖然尼赫魯拒絕給達賴喇嘛提供實質性的支持，但他的確同意將西藏人的立場轉告要去歐洲突然中途路過新德里進行訪問的周恩來。尼赫魯在後來與達賴喇嘛的一次會見中，他叫這位西藏領袖放心，周恩來親自跟他說過：「任何人如果想像中國會在西藏強迫實行共產主義，那是荒唐可笑的。」後來尼赫魯在向印度國會做報告也這樣說了。

達賴喇嘛在與中國總理的談話中，有力地詳細談到了人民解放軍在康區的鎮壓行動。達賴喇嘛得到了保證——他的兩個哥哥在後來的一次會見中，也得到了同樣的保證，如果存在任何不公平行為，就要給予糾正，西藏人的意見也一定讓毛本人知道。很奇怪，周恩來似乎並不知道西藏東部的民族改革，不過他對起義卻一清二楚，而起義就是民主改革所造成的結果。又過幾個星期後，週又回到了新德里，對達賴喇嘛的計劃十分關注。在氣氛緊張的第二次會談中，他明確表示，中華人民

共和國將不惜動用最大的力量，鎮壓對其為時七年統治的首次重大挑戰。接著他直截了當地問丹增嘉措，他打算不回國的消息是否真實。達賴喇嘛對此作過評述，真有幾分卑鄙，周恩來力圖操縱我，但我也擺布了他。他們都假裝誠懇，實際上我們講的都不算數。當他問我是否打算留在印度時，我表示根本沒有那回事——一切情況絕對正常。他進行了威脅和警告，儘管如此，我們的人仍然猶豫不決，但我終於還是決定回去。這樣，我與印度總理的談話所達成的意見，最終還是成了現實。

1957年2月的第一個星期，當時達賴喇嘛仍在新德里，毛澤東就公開宣布，西藏進行改革的條件還不具備：改革至少要推遲六年進行。接著，西藏的幹部叫人們放心，如果人民自己不要求改革，那麼在今後的「十五年，甚至五十年內」都不會強行實施改革，並且還宣布，一些漢族幹部要撤回，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部門也得減半。中國人由於害怕失去達賴喇嘛，失去象征西藏順從的這一門面，而作出了這些最初讓步。在這些讓步的支撐下，丹增嘉措於4月1日返回拉薩，再次為避免喪失西藏的自由而努力。

在達賴喇嘛外出期間，形勢大為惡化。康巴人首次打了勝仗之後，組織了「四水六崗」——這是康區和安多的傳統名稱，現在新近結盟的西藏頭人用它來作為他們聯合遊擊隊組織的名稱；理塘的一名大商人負責野戰。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住在大吉嶺，他於1951年同中央情報局組織了一個收集情報組織，他現在加緊了情報收集活動。人數不多的遊擊隊，通過印度和泰國，被偷偷運到關島。這些人在印度和泰國接受了現代化武器和突擊戰術的訓練，他們在夜間被空投到西藏，按照更為有效的方法組織了抵抗力量。他們定期得到了空投的輕武器。不過當時戰鬥已經升級，人民解放軍投入了整整十四個師——十五萬多人——進行了反攻。

1957年中期，開始了殘酷的報復性進攻，致使康區很多地方成了荒原。遊擊戰士身穿降落傘綢做的襯衣，戴著很重的護身盔甲防彈，吃乾肉和糌粑（炒熟的大麥面），從山里面的據點騎馬出來——用燧發槍、刀，有時還用手榴彈，伏擊人民解放軍的警戒部隊以及來往於重點設防的大城鎮之間的運輸隊。中國方面也作出了反應，它企圖切斷群眾支援「四水六崗」的基地。人民解放軍的Il'yushin—28轟炸機一批一批多次從甘孜和成都的機場飛到康區，而在地面運動的則有大型的機械化縱隊，狂轟濫炸，將幾十座村莊夷為廢墟。住在這些村莊裡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有些人說，中國人從1956年到1958年損失了四萬名戰士，不過他們自己在康區所採取的戰爭行動，也犯下了西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種種暴行。這些情況得到了國際律師法官委員會兩份報告（分別於1959年和1960年發表）的證實，這個委員會設在日內瓦，是一個人權監督組織，它由來自五十個國家的律師和法官組成。人民解放軍不僅將整個的村莊夷為平地，而且公開處決數百人，幹這些事就是為了嚇唬活人。他們的辦法有酷刑、肢解、活人解剖、砍頭、活埋、澆開水，將人拴在奔跑的馬匹後面活活拖死，從飛機上將人推下來；兒女被迫開槍打自己的父母，子弟被迫開槍打自己的經師。在每個地方，寺院都成了主要目標；僧人被迫與尼姑交配，被迫褻瀆佛像，然後送往安多和甘肅的勞改營，這些勞改營的數量在不斷增加。由於這些原因，遊擊隊發現他們的隊伍大為膨脹，因為數千名家屬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帶來了三倍於人甚至更多的牲畜。隊伍變得龐大之後，他們就成了中國人十分容易捕捉的空襲對象。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對藏人據守的地區佈置了大包圍圈，企圖將他們圍困起來，一個口袋一個口袋地吃掉。藏人一看戰事不妙，數百股散匪蜂擁西寧，試圖在達賴喇嘛的轄區之內尋找喘息之地。

西藏領袖回到拉薩後不久，聖城如同被帳篷淹沒了一般，因為來了一萬多難民。丹增嘉措意識到，毛許諾推遲改革純屬詭詐。他親眼目睹出現的不可避免的結果：1958年6月16日，起義隊伍終於潰退而進入西藏中部地區，國防自願軍宣告成立。國防自願軍是「四水六崗」和原來米芒措都（西藏中部的抵抗組織）的自然結合，它第一次升起了自己的軍旗，五千名騎兵前面是處於香霧繚繞中的達賴喇嘛像。他們排列在一片開闊地上，放聲歡呼。這支新軍隊成立了秘書處、財政處，制定了二十七條軍紀；它得到了中心地區山南所有西藏政府官員的支持，這樣也就直接損害了噶廈。在中國人的壓力之下，政府派了一個由五人組成的代表團到了遊擊隊那裡，為的是要提出下列保證：如果遊擊隊放下武器，決不採取報復行動。但適得其反，這個小組也加入了抵抗部隊。那時戰鬥已經蔓延到了離拉薩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僅僅在衛藏地區，康巴騎兵估計就達八萬人。1958年秋季，駐紮在澤當的人民解放軍三千名守備部隊受到侵擾。一方面，中國人匆匆忙忙增援駐西藏中部的部隊，一方面命令藏軍鎮壓起義。達賴喇嘛的噶廈政府立即予以拒絕，顯而易見，雖然藏軍已鬆散地併入了人民解放軍，但它正在等待時機參加遊擊隊。遭到拒絕之後，人民解放軍派出特別支隊，穿上康巴人的衣服作為偽裝，搶劫當地的村莊，他們希望這樣做能夠激發西藏中部人們長期以來害怕康巴土匪的心理，致使他們反對自由戰士。同時，達賴喇嘛幾乎盡最大努力進行了調解。他說：「羅布林卡內專門有一間房子用來會見中國將軍。由於事態發展到了這種地步，我甚至不願意走進這間房子。我感到膩味。這是悲慘的經歷。人們知道，他們的態度充滿矛盾；他們一天說『這是白的』，而第二天則會說『這是黑的』。這是瘋子行為，實際上是愚蠢的。如果人們不得不撒謊，那麼至少應該做到謊言不至於很

快就會戳穿。但是，中國人連這一點也全然不顧。當人們表示不同意見時，中國人立即會訴諸武力，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

1959年3月1日，當時達賴喇嘛在大昭寺小住，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這是一座軍營，周圍有磚砌的圍牆，叫做西林普(3)，位於布達拉宮和拉薩河之間)的兩名低級軍官來訪。他們帶來了當時負責指揮的譚冠三將軍的邀請信，請達賴喇嘛去看文藝演出。丹增嘉措感到有些奇怪，因為邀請信不是通過噶廈這一正常渠道交來的，但他還是答復說他很樂意去；但當時他正在參加最後的辯經考試，考試沒有結束之前，他不能確定日期，這兩個中國人就走了。達賴喇嘛又將注意力集中於眼下的任務。

按照所有的標準來衡量，最高等級的佛學博士學位拉然巴格西的考試，在西藏古老的學術體系中最高為嚴格，這些考試前一年就已開始。這一年達賴喇嘛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在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參加了初試。在整天的考試中，他與十五名寺院學者——每三名學者負責所學的五個科目當中的一個——進行了辯經，觀眾有數千人。達賴喇嘛辯的很好，真是難以想像，因為在十三歲到二十四歲這一段緊張的準備期間，一方面他要誦經和進行七個階段的學習，另一方面他還要擔負繁重的政務。最後復試的那天，達賴喇嘛要面對二萬名僧人，回答八十名擔任考官的學者的輪番提問。那二萬名僧人擠滿了大昭寺裡面大殿的每間佛堂。考試中間只休息兩次，從大清早開始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結束。達賴喇嘛回憶時說，數小時的辯經「就像一瞬間」。他的辯經使集合在那裡的堪布和學者相信，他的的確確是堅熱斯的轉世。

3月7日，譚冠三將軍再次要求達賴喇嘛確定去觀看文藝演出的日期，儘管他很不情願，但還是同意3月10日去。演出在軍區大院內舉行，選擇這個地方對達賴喇嘛來說是前所未有的。3月9日上午，一位姓胡的準將匆匆忙忙將P·T·扎卡拉將軍召到了軍區，達拉是指揮達賴喇嘛五百名警衛部隊的指揮官。準將通知達拉，翌日西藏領袖不能像往常一樣，帶上那支二十五名戰士組成的衛隊，他經過的沿線，不能在兩旁部署部隊（但平時都部署部隊），而且跟他進中國人軍區的兩三名警衛不許攜帶武器。當達拉要求對這些反常情況作出解釋時，準將不可思議地發問：「如果誰要是扣動槍機，你負責嗎？」準將還進一步要求此事要向群眾保密。這一點是做不到的，他們會見之後不到幾個小時，拉薩就弄得滿城風雨，說中國人計劃綁架達賴喇嘛。北京電台剛剛宣布，達賴喇嘛要參加將要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過實際上他還沒有同意去。這條消息只是進一步加重了人民群眾的懷疑。據人們所知，首都拉薩西北面七十英里的當雄機場停著三架飛機，也就使得上述說法增加了幾分可信性。此外，以前也出現過類似的騙局；在東部，至少有四名高級喇嘛曾應邀觀看文藝演出，他們都不讓帶隨從，結果全都關了起來，除一人之外全都給處決了。除了達賴喇嘛的私人侍從官員之外，其他人都沒有接到出席文藝演出的邀請，眾噶倫也不例外。不過，人民解放軍部隊了解到人民群眾的看法之後，於9日晚上向西藏的顯要人物發出了邀請。這是不能再晚的邀請，這一做法似乎一眼就能看穿，它只能證實人民群眾最嚴重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3月10日破曉之後不久，人群一窩蜂擁出拉薩城，到九點鐘時，羅布林卡正門兩側的兩個石獅前面聚集了幾乎三萬名群眾，他們的情緒有一觸即發之勢。他們高叫達賴喇嘛必須受到保護，並封鎖了羅布林卡。兩名長期在任的噶倫被耽誤了一段時間之後，放了進去，但第三位噶倫是新任命的，陪同他坐車的還有一名中國軍官，這位噶倫遭到了攻擊。眾所週知，帕巴拉·肯穹與中國人同流合污，這時他騎著自行車來了，他用左輪槍開了兩槍警告人群向後退，結果他被石頭砸死，屍體被拖到馬後，穿過拉薩的鬧市。

那天上午，選出了拉薩有名望的七十名公民擔任人民群眾的代表。中午，他們已經實現了人們的最初目標：一位噶倫通過大門口的高音喇叭宣布，達賴喇嘛決定不去觀看演出，而且——正如這些群眾領袖所要求的那樣——將來也一概拒絕前往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的邀請。人民群眾的情緒非但沒有平息，還受到了鼓舞，他們集合一大批自願者來保衛羅布林卡。之後數千人返回拉薩舉行群眾示威，要求中國人離開西藏。與此同時，三名噶倫乘車來到軍區，希望能夠給譚冠三將軍消消氣。譚冠三得到這一消息之後，勃然大怒，在房間裡踱來踱去。房間裡還有十名軍官和阿沛·阿旺晉美——他早已呆在軍區裡面。譚冠三指責西藏政府與「反革命叛亂分子」同流合污，並揚言如果他們的「陰謀」進一步搞下去，他將要採取嚴厲的報復行動。他怒氣沖沖地走出房間，領著別人前往軍區禮堂，宣布文藝演出開始。儘管這天出現了意料不到的事情，文藝演出還是要按計劃進行。

下午五時，達賴喇嘛十三歲的弟弟阿里仁波齊看完演出後，離開了人民解放軍司令部，他路過布達拉宮，朝東走向他家亞西公館。他回憶道：「當時黃昏將盡，圓圓的太陽發出淡淡的金光，影子長長的，但路上空無一人。在一個通往拉薩的岔道口，有一座中國人的碉堡，端著衝鋒槍的中國士兵在上面走來走去。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景，中國部隊通常不帶槍。」

接著，我來到我母親房子跟前，發現大門上了鎖；平時這道門晚上只是掩上而已，但現在甚至通往內院的門也關上了。我走了過去，抬頭看了看這座房子，我母親憂心忡忡地凝視著窗外。她看到我時，就拍起手掌來，因為她十分高興。」

3月11日拂曉來臨，羅布林卡已經作好了戰鬥準備。前一天晚上，政府官員和警衛部隊的官兵也已站到了那些群眾領袖的一邊，共同宣判了十七條協議的死刑。接著，警衛團公開起義，他們扔掉了一直被迫穿在身上的中國軍服，換上了自己的藏裝。警衛部隊官員進入陣地，與自願保衛部隊一道圍住了羅布林卡。同時警衛部隊還向東北方向派出了一支部隊，以阻止來自西寧公路的中國援軍。作為預防措施，達賴喇嘛一家從亞西公館搬到了羅布林卡的一座小院子裡。他們一家人來到這裡以後，阿里仁波齊就到處轉，進行檢查。外牆是白色的，內牆是黃色的，裡面就是達賴喇嘛的私人內院，無論是外牆還是內牆，每道牆旁邊都有持武器的人日夜站崗，而他們的馬匹則排成長隊，拴在羅布林卡外面。阿里仁波齊說：「我記得他們圍坐在火旁，靠著馬鞍在吸鼻煙。天氣有些寒冷，後來的幾天，天空陰暗，因此隔好一段距離就可聞到鼻煙味。每隔一段時間，那些守衛圍牆的人們就會來到他們支起來的帳篷裡，喝茶休息。他們腳穿大靴子，頭戴有毛皮邊的帽子，身穿長袍。他們用紅穗、綠穗和藍穗擦去步槍灰塵。大家總是在熱烈地進行交談。」

羅布林卡外面的拉薩城仍然是一片騷亂。群眾進行了一系列的集會，地點是在布達拉宮下面雪村里的政府大印刷廠裡面。在這裡，政府、各行會的代表以及寺院作出了正式決議，號召實行獨立。同時，全城人民都在設防保衛拉薩。所有的大房子，甚至大昭寺都設置了柵欄，有很多人防守。中國人也作好準備，似乎是要決一雌雄，這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都搬進了自己房子，房外設置了沙包，屋頂安了鐵絲網，在眾多的紅旗之間，露出了迫擊炮掩體和機關槍掩體，他們手拿照像機拍下了首都街上來往穿梭的隊列。但中國人主要的準備活動卻更為隱蔽。一方面西藏人民希望像1912年驅逐滿洲人的軍隊那樣採取粗暴方式大敗共產黨，另一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在佈置火炮，包圍了整個拉薩河谷。這樣人民解放軍無須正面與起義者發生衝突，就可以很快將其鎮壓。

達賴喇嘛寫道：「我感到似乎是站在兩座火山之間，哪一座都隨時可能爆發。」他又說，他最重要的道義上的義務……「就是要防止我那些手無寸鐵的人民，和中國軍隊發生一場完全是災難性的衝突。」這種災難的可能性，丹增嘉措一直很清楚。一年之前，達賴喇嘛夢見羅布林卡成了「刑場」，不過他並不樂意談起這件事。其他夢涉及他逃往印度，這是即將發生的事；好幾個月前，乃窮曲均提到過這件事。危機本身現在已經證實了這些預兆。佔領拉薩的人民解放軍有四萬人左右，一旦解除了捆綁他們九年之久的政治限制之後，他們無疑會實行毀滅性的報復。

為了努力避免這場衝突，達賴喇嘛力足仍然聚集在羅布林卡前的大片人群散開。此外，他盡力爭取贏得時間。在後來的六天中，譚冠三將軍寫來了三封信，他給予了積極答復。在這些信中，譚冠三將軍主動向達賴喇嘛提供保護傘。他說「反動集團」包圍了夏宮。譚冠三將軍一再要求達賴喇嘛到人民解放軍軍區來。在第一封覆信中，丹增嘉措說，那些羅布林卡外面的人藉口保護我，實際上在危及我的安全。在第二封覆信中，丹增嘉措訴說他已經下令「立即解散非法的人民大會」。在最後的一封覆信中，他說他力圖將「進步人民與反革命」區別開來。寫到這裡，他還說要在進步人民的保護下，秘密前往中國人的軍區司令部。這樣贏得了五天時間，但緊張局勢仍不見明顯好轉。3月16日清早，在向城里城外的那些主要據點發射了十七發炮彈之後，譚將軍的最後的一封信交到這裡。同一封信裡還有阿沛寫來的一封信，阿沛直言不諱地轉告了中國人的意圖。他在信中懇求達賴喇嘛在黃色圍牆裏找到一個安全保險的地方——以免遭到「罪惡反動派」的危害，並通知譚將軍他所處的位置。這樣就會像充滿凶兆的來信所保證的那樣，「這座建築不會受到破壞」。無論丹增嘉措是否從命，顯然人民解放軍是打算要炮轟羅布林卡。

3月15日，一個排的中國士兵，突然出現在羅布林卡南面長長的圍牆不到五十碼的地方。數百名藏軍跑到陣地上，端槍瞄準。阿里仁波齊回憶說：「他們離我們很近，甚至連他們的臉龐我們都可以看到，大家都摒住氣，等待著打第一槍，但他們只顧朝前走。這只是一次偵察行動，想弄清楚我們的兵力。」阿里仁波齊沒有服從他母親的命令，仍在組織防守。不久之後，達賴喇嘛的私人醫師丹增曲扎來到羅布林卡，從拉薩帶來了消息。他告訴達賴喇嘛的母親，3月12日上午，拉薩城的婦女——無論年輕姑娘還是老太太——在布達拉宮腳下集會。會後，她們來到八廓街（即市場），毫無懼色地叫中國人朝她們開槍，並高喊：「西藏從此獨立了。」她們當中的領袖人物，還採取更為清醒的步驟，她們要求印度總領事館協助抑制中國人。丹增曲扎在講完這一消息時，對阿里仁波齊點了點頭，評論道：「我早就知道今年會有麻煩事。新年那天上午，記得嗎？你那天在房子裡放了一個鞭炮，發出了戰場上的吶喊聲。孩子們玩打仗遊戲就肯定表明，大人很快就會打仗。」

兩天之後，即3月17日下午四點鐘，第一槍打響了。達賴喇嘛和噶倫們在金色頗章（十四世達賴喇嘛前任的宮殿之一）裡面開會，這時兩顆迫擊炮彈打破了園內寂靜。一顆落在北牆外的沼澤地裏，另一顆落在離金色頗章不遠的一個池塘裏。令人不解的是，接著炮擊就結束了。叫自願警衛部隊不要攻擊附近人民解放軍運輸中心的陣地，其餘的噶倫請示了達賴喇嘛之後，作出了當天晚上逃離拉薩的重要決定。

阿里仁波齊說：「17日傍晚六點半左右，我母親將我們叫到了她的房間。她的嗓音顫抖，對我說：『你最好換上俗人服裝。我們可能很快就得走。』我直截了當地問：『是去印度嗎？』她說：『不是，就到河對岸的尼姑菴裏去，但你不要告訴其他人。』我答應不會去告訴別人，但我知道我們是去印度。山南沒有中國人，只要過了山南，就到了印度境內的東北邊境特區。當然我看得出來，我母親嚇壞了，因為形勢太緊張。」

不過，阿里仁波齊倒感到十分興奮。他脫掉了醬色喇嘛袍將一支特製手槍插在一件樸素的普通長袍裏，沿著屋子前面的台階跑下來，到了屋子一樓的一間小房子裏。阿里仁波齊接著說：「因為我迫不及待地想將消息告訴別人，所以我來看看我的那位胖伯伯在幹什麼。他一個人在那裡，正在用一堆白色棉布窗簾發狂地縫袋子。我看見他後，明白了事前並沒有任何計劃安排。這都是緊急情況。我問鼻子湊過去，他高聲叫著：『走開！我忙著呢！』因此我跑回樓上，來到了我母親女僕的面前，說：『餵，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我們要去印度！』她厲聲說：『別吭聲！』接著，我拿定主意要去見我母親。當時正是夜間，我來到母親的房間裏，這裡燈火通明，就像舞台上一樣，什麼東西都顯得大一些。我的母親和姐姐穿著長褲，僕人們在給她們穿衣服，打扮成男人模樣。現在我心中明白了，我們這全都是當真的！真是太好了。我開始笑出聲來，她們也開始笑出聲來。然後，我姐姐給我一條用馬海毛織的粉紅色的漂亮圍巾和一頂羊毛圓頂無邊小帽，可以往下拽遮住人的臉。」

八點三十分，警衛部隊的一名上尉甲本·洛桑扎西帶著一個背著沖鋒槍的士兵到了這裡，通知達賴喇嘛的母親走的時刻到了。這位上尉在屋裡時，阿里仁波齊則站在前面的門廊向兩個僕人告別。他描述了當時情景：「涼風陣陣，星斗滿天，安靜極了。突然，從河邊方向傳來了布朗式輕機槍聲。戰士們從房子裏衝了出來，我們都站在門廊上看，但卻什麼也看不見。後來我們聽說，我們有一支守衛拉瑪崗渡口的部隊，有一百人，他們遇到了中國的巡邏隊。十分幸運，我們射擊將他們嚇走了，這樣，保持了通向河邊的路暢通無阻。」

九點，達賴喇嘛家里人——他的母親、弟弟和伯伯——和貴婦小姐及其女僕離開羅布林卡，這是要走的第三批人當中的第一批。他們摸黑走下了房子的台階，靜悄悄地在樹林中穿行，朝羅布林卡的南牆走去。可笑的是，不僅必須避開中國人，而且也必須避開西藏的戰士。幾天來，這些西藏戰士對進出羅布林卡的人都進行了檢查，擔心有人玩弄陰謀而使達賴喇嘛落入中國人之手。在很大程度上說，他們如此警惕是因為他們極不信任噶廈，因為噶廈多年來一直採取妥協態度，所以很多藏人特別是東部地區的藏人確信，噶廈什麼背叛勾當都幹得出來。因此，洛桑扎西偽裝成自願警衛部隊戰士，命令將門打開，他說他們是受派遣要到河邊去「巡邏」。阿里仁波齊笑著說：「我想由於我個子不高，所以我並不像，但他們還是讓我們全通過了。」這支隊伍在一片到處是灌木的開闊平地上繼續前進，遇到來一個男人牽著一匹馬在等候達賴喇嘛的母親，她行路很難，因為她有一條腿的膝關節軟弱無力。她騎上馬之後，有人牽著走，其他人繼續步行向前，隊伍散開，就像一支真正的巡邏隊一樣，其中一名戰士扛著伯伯的兩個袋子，裡面裝的是糌粑、酥油和肉，這是他唯一能夠攜帶的食品。在拉薩河石堤上，二十名戰士在兩條牛皮船旁默默地站崗。他們上船之後，劃到了對岸，那裡有三十名帶著馬匹的康巴遊擊隊在夜色中等待。牛皮船劃了回來，要接第二組人馬，也就是達賴喇嘛這個小組。這段時間阿里仁波齊順著水流的方向散步，走了短短的一截路，目光盯著拉薩河對岸一座人民解放軍兵營的電燈。這座軍營位於羅布林卡的西面二百碼的地方。軍營遠處，河谷北端，凹進去的山腰裏便是哲蚌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他回憶道：「我看到哲蚌寺時，禁不住朝它叩了三個長頭，表示告別，但願我能再看到你。我在祈禱，接著我回到了停放馬匹的地方，等候達賴喇嘛。」

在達賴喇嘛的宮殿裡，丹增嘉措已作好準備，他的這一組十點離開。丹增嘉措在羅布林卡度過了最後幾個小時，他寫了一封信，正式叫群眾領袖放心。接著他指示民兵不要堅持戰鬥，發生衝突時，要向拉薩河南岸撤退。他獨自換上了俗人穿的醬色長袍，戴上了皮帽子，他最後一次慢吞吞地走進自己的習經室。達賴喇嘛在修習時用的座墊上坐下後，讀者擺在座位前的經書，目光落在一行字上：佛陀教弟子為人要勇敢。他站起身，拿起一張聖書（這是他形影不離的保護女神班登拉姆，裝在一個特製的盒子裡），他將盒子吊在背後，離開了他的家。他將眼鏡給摘了，在黃牆一道門旁邊，從警衛那裡借了一

支步槍，這樣也就完成了偽裝。這時與他同行的，有警衛部隊的那位將軍、宗教司儀、大管家，他們走出了羅布林卡。四十分鐘前，他的一家也是從這道門出去的。沒有一個人認出他。

阿里仁波齊說：「忽然，我聽到很多人和馬匹在黑暗中走過來。接著我聽到大管家帕拉先生壓低嗓門在念著：『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意即『吉祥如意』，這句話我們只是諸如新年之類的喜慶場合才用。」這時第三組也來了，他們藏在卡車上面，然後蓋了一塊油布，從羅布林卡里偷偷跑出來的。這組人由噶倫、達賴喇嘛的兩位經師和嘎東曲均組成。三組人員騎著馬，沿著高於河堤的山坡邊的小路前進，他們沒有被發現。經過了人民解放軍設在羅布林卡周圍的軍營，有七百名康巴人給他們斷後。朝著藏布江奔去，然後再奔向遠處的山南群山，這些山嶺被遊擊隊所控制。

阿里仁波齊說：「我們分成小組，整夜騎馬趕路。黎明前，天氣特別冷，我都以為我的雙腿會凍掉；但太陽升起來時，空氣清新，天空晴朗，因為我們大家都感到精神又好了一些。」上午過了一半時間，阿里仁波齊的小組到了切拉（沙）山口的山腳。他繼續說：「從山下一直到切拉山口頂上，我胖伯伯的馬鞍子總是朝下滑，他只好死死地抱住馬頸；我笑個不停，直到我們在山口的那一邊下馬之後，才止住了笑聲。這邊都是沙地，大家跑了下去。」兩個小時之後，達賴喇嘛一行走完了抵達藏布江河邊最後的十里路程。他們騎馬前進時，突然刮起了猛烈的早春沙暴，使得緊跟他們逃跑的人甚麼也看不見了。他們安全抵達河邊，坐上了牛皮船來到了河對岸，許多人流著眼淚，雙手合十祈禱，掌心夾著正在燃燒的香。騎馬走半小時之後，他們來到了第一次歇腳的地方拉米寺。這是一座小寺院。太陽落山時，丹增嘉措一家人騎馬走了二十個小時之後，到達了這裡。

阿里仁波齊說：「我們剛到，我就被叫去見達賴喇嘛。我走進了寺院二樓的一間小房。正對著門有一扇窗戶，可以看見透進來的一點點光線，神聖的達賴喇嘛腳穿長筒皮靴，身著俗人服裝，站在窗前。以前我從未看到他像這樣穿戴過。但實際上看去，他卻顯得相當自然。他只是問了問：『你今天感覺怎樣？』我回答說：『沒什麼。一切都好，只是沙暴有點猛，媽媽因為騎在馬上，大腿有點問題。』接著，他默默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最後說：「恰傑」——這是我的小名——『現在我們是難民了。』

達賴喇嘛說：「我從拉薩逃出來的那天起，就感到渾身輕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危險依然存在。但儘管如此，我們的行動自由，可以自主，我們終於可以公開指責中國人了。我仍然記得當時我心裡在想，『我有權說中國人的壞話。』這種自由感十分明顯，這是我出逃之後的最強烈反應。」

阿里仁波齊在談到他們這些人的情緒時說：「真有意思，我們騎馬走了一天之後，就感到輕鬆高興，幹什麼事都不慌不忙。這真是西藏人的性格就像我們只是來到城外野餐似的。」但這條路卻不乏艱難。一行人騎馬繞著羊卓雍措湖朝南行進，這座湖支流很多，湖水顏色像綠寶石一樣。西岸風光獨特，沒有樹木，在寬闊的谷地裏，只有一些自古以來就有的商道。這些小道就像皮面上的皺紋一般，偶爾還可以看到村莊和寺院。為了防止被飛機發現，他們分組行動，一個組接一個組，步伐艱難地爬上高達一萬五千英尺的山口。這些山，仍然覆蓋著冬天厚厚的雪被。每天都有小股遊擊隊擋他們的道，也不知道這些遊擊隊是從那裡冒出來的。阿里仁波齊現在同達賴喇嘛這個組騎馬行動，他說：「看到這些遊擊隊就使人放心。他們個個身材高大——道地的康巴人，佩戴著手槍、步槍、刀劍和護身符。這幫人看上去五花八門，十分強悍。每天晚上我們停下來時，就有大幫人馬來到我們面前。他們先放下手中的武器，然後走到達賴喇嘛跟前，向他叩長頭並接受他的摸頂祝福。神聖的達賴喇嘛則與他們聊上幾句，問他們是那里人，屬於那支遊擊隊。接著他們就高高興興地離去，重新消失在夜色中，回到他們的陣地上去了。」

晚上停留時，達賴喇嘛及八名顧問開會討論計劃。起初，他們決定在國防自願軍防線後的隆子宗，建立一個臨時性的根據地。隆子宗是一個大城堡，位於一座小山頭上，距印度邊界北部六十英里。丹增嘉措計劃從那裡同中國人舉行談判，心想只要他留在西藏，只要他還有用處，也許能夠阻止人民解放軍採取的報復行動。但這一希望依據不足。3月24日，達賴喇嘛就接到報告，在他逃跑之後不過兩天時間，也就是3月20日凌晨二時，羅布林卡遭到炮擊。四天之後的3月28日，達賴喇嘛從一架小半導體收音機上收聽到周恩來宣布中國已經解散了西藏政府。由於對話又不可能，丹增嘉措決定重新組建他的政府。不久之後，即在隆子宗舉行了簡單的成立儀式。但隆子宗並不安全。人民解放軍已大舉渡過了藏布江，正在追趕他們。他們截獲了中國人在電台上發布的命令，中國人命令沿不丹邊界的部隊向東移動，封鎖從西藏南部逃入印度的所有通道。達賴喇嘛認識到邊界很快就要被封鎖，因此決定在印度尋求避難。前面已派出了通訊員，要求得到入境許可，大隊人馬都跟在後面，他們還要翻越兩座最高、最難走的山口。

在通向小鎮卓薩的拉果山口遇到了大風暴，這些藏人的手和臉全凍僵了，他們牽著自己的馬在狂風大雪中艱難行走，暴風雪過後已是精疲力盡，第二天才到達卡波拉山口（即白色山口）。這里白雪皚皚，銀光耀眼，迫使這三百五十人將辮子放下來擋住陽光，而達賴喇嘛則將哈達遮在臉上，就像外科醫生的口罩一樣。阿里仁波齊說：「我當時與與外交局長魯沙先生騎馬同行。當我們剛翻到山口的那一邊時，就聽到來了一架飛機，魯沙全然不知所措；接著一架沒有任何標記的運輸機從我們頭頂飛過，僅僅相距兩百碼。」人和馬匹已在耀眼的雪地上疏散開來。達賴喇嘛下了馬，獨自一人站在一塊雪被風刮走的空地上，立即順著隊列傳達了不要射擊的命令，雖然用布朗式輕機槍和半自動步槍很容易就可以將這架運輸機打下來，阿里仁波齊繼續說：「他們不是瞎子，他們一定看見了我們。從此以後我們可以肯定中國人很快就會追上我們。」

我們這支隊伍分成了若干小組，向前行進了二天。從沒有樹木的荒原，通過了高山地帶，從高處向低處來到了叢林密布的丘陵地帶。這裡是西藏門巴部落人居住的地方，他們的方言拉薩人幾乎聽不懂。他們來到了西藏境內的最後一個村莊，這個村莊叫芒芒村，那些通訊員帶回了消息，說邊界印度一則正在楚坦莫進行準備工作，迎接他們到來。在這裡還得到了拉薩城戰鬥的進一步詳細情況，這些情況是沿著他們同一條線路逃跑的目擊者提供的。達賴喇嘛說：「當鎮壓終於降臨時，我們的大多數人民仍處於夢鄉。在黑夜的一片嘈雜聲中，煙霧重重，我們的人民弄不清子彈和大砲是從哪裡打來的。破曉之後，卻見不到一個中國士兵的人影。因此，我認為中國人在戰鬥的第一階段使用心理戰術，打敗我們。」

3月20日上午，羅布林卡的宮殿和廟堂煙火未盡，一片廢墟，死傷者數百人躺在這裡。人民解放軍再次炮擊之後，大舉進攻。下午四點鐘，藏人潰不成軍，朝拉薩河退卻，他們寧可給傷員補上一槍，也不願讓他們當俘虜。藏人陷入了從西面的羅布林卡軍營和東面的人民解放軍休池林卡陣地組成的火力網。有些人的確還是跑到了拉薩河邊，但卻面對的是奔騰湍急的春流，結果很多人被沖走淹死了。倖存者採用手挽手的辦法，連成一條長鏈，他們渡過了河，來到了對岸，但衣服卻從後背起全弄破了，不過暫時還平安無事。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控制羅布林卡後，進行了大規模搜索，尋找達賴喇嘛——他的出逃，別人仍不知道，他們對大量的屍體挨個地進行了檢查。

拉薩城裡戰鬥持續了三天，3月20日上午，大砲轟擊了布達拉宮、色拉寺和藥王山（藏醫學院所在地），同時巷戰在全城爆發，拉薩人的武器只是一些輕武器、汽油彈、刀斧。他們用石塊、家具以及電線桿堆成了一些雜亂無章的障礙，在一時衝動之下，他們就從這些障礙後面衝了出去，攻打中國人的建築，人民解放軍就是不出來，結果藏人被成千成千地屠殺。藏人為了要與敵人正面交鋒，他們在石頭建築之間挖地道，這些建築都有若干世紀的歷史，日落時這些建築當中的很多座著火燃燒，整夜不熄，火光照亮了全城。

21日清晨，重新開戰，圍殲的色彩更濃。城裡的屋頂上經旗飄揚，濃濃的香霧騰空而起，猶如雲朵一般。這時，一隊康巴人從靜悄悄的街道上爬了過去，攻打幸福電影院。他們以勢不可擋的攻勢，打敗了一百名人民解放軍守備部隊，取得了藏人唯獨的一次勝利。接著展開了幾十場激戰。拉薩第二家最神聖的廟堂、上密院之家小昭寺很快也被擊塌，中國人的砲彈燃著了這裏千年之久的牆壁。西面半英里處是藥王山，藏人在這裡的砲兵陣地被攻克，守軍全部喪生，藏醫院的整個建築（砲兵陣地就設在裏面）被砲彈完全摧毀。藥王山的岩石山坡下面的羅布林卡聚集著數千老百姓，在出現緊急情況的這一天時間裡，他們整天待在這裡。此時他們爭先恐後擁進拉薩，直奔大昭寺，因為他們相信大昭寺是西藏最神聖的寺廟，躲在那裡很安全，會免遭中國人的攻擊。當夜幕降臨時，大昭寺的院子裏和為數眾多的殿堂裏塞滿了一萬多人——亂七八糟，擠成一團，有男的、女的、兒童和扛迫擊炮的遊擊隊戰士，還有數百名僧人，他們在大佛像的腳下狂熱祈禱。

22日是星期天，天剛破曉，人民解放軍就開始炮擊大昭寺。迫擊炮彈落在大昭寺華麗的屋頂上，東南方牆下的大院裏聚集著數千老百姓，他們暴露在附近房子上，射來的密集的機關槍火力之下。一輛坦克速度緩慢，開進了廣場，中國士兵衝出防禦工事，在坦克車的掩護下發起進攻。儘管整個扎布奇團被困在拉薩東面的軍營裡，但仍有一支藏軍騎兵躍馬設法從城外趕來增援，使戰鬥持續了二個小時。過了不久，坦克周圍的屍體成堆，共有數百具，有西藏人也有中國人。同時他們後面的大昭寺則在吐著火舌燃燒。到中午時，戰鬥已結束。人民解放軍在裝甲車的增援下，撞開了大昭寺的大門，攻入廟內。兩個小時之後，整個城市中國人的高音喇叭裏傳來了阿沛·阿旺晉美的講話聲，阿沛聲稱西藏政府已經達成了解決辦法，命令剩餘的抵抗力量投降。街道上老百姓遍地都是，他們手裡拿著白色的哈達，舉過了頭頂。而國防自願軍的官員則紛紛溜走，投奔山南的抵抗部隊。在被煙火薰黑、彈痕累累的布達拉宮上面，五星紅旗在暖風中飄揚。這是春天的一個下午，中午剛過不久。下面的道路上到處是屍體，俘虜排成長隊，走向羅布林卡。拉薩城裏還有成千上萬人被抓。在這以前中國對西藏的統治還沒有受到抵制，但這為時不久的階段終於已告結束。

達賴喇嘛在芒芒村病倒了。在高山口是暴風雪，而現在他們來到了海拔低一些的地方，風雪變成了暴雨。達賴喇嘛用的帳篷裏透水，讓暴雨淋得透濕。他就在這樣的帳篷裏設法睡一睡，但他卻無法入睡。3月30日上午，丹增嘉措害了痢疾。他搬到附近的一家房子裏，白天發燒，晚上又徹夜不眠。在芒芒村的第二個早晨來臨後，他們得到消息，說中國軍隊已逼近措那，這個村莊距達賴喇嘛的營地不遠，容易受到襲擊。儘管達賴喇嘛有病在身，但他還是決定立即越境，他對隨從共八十人，有官員、喇嘛以及他的家庭成員。丹增嘉措騎在一頭“扁加牛”牛背上，離開了芒芒，他當時的情況正如他自己後來所描述的那樣，「身患疾病，疲憊不堪，心情難受，我自己也無法形容。」

3月31日下午四時，他們來到了一大塊空坪上。在空坪的另一端，有一個用竹子新搭的歡迎牌樓，六個廓爾喀士兵穿著笨重的英製靴子，裡面可以裝彈藥，頭戴叢林中用的鬆軟帽子，立正恭敬在牌樓旁。當這些廓爾喀士兵持槍致意時，指揮官走上前來，獻了一條歡迎哈達。達賴喇嘛從犛牛背上跨下來，接了哈達，然後緩步跨過邊境，來到了印度，步入了流亡生活。

譯注

- (1) 原文如此。
- (2) 原文為七世班禪喇嘛，應為九世班禪喇嘛，以下均改為九世班禪喇嘛。
- (3) 即西藏軍區大院。

第二部分

第三章 雪域境外的流亡生活

1959—1960

達賴喇嘛騎馬在阿薩姆邦叢林密布的丘陵地帶走了十八天，一直從高處往低處走。廓爾喀人給他們帶路，各個小組都在茂密的雨季森林中宿營。他們看到了熱帶的鳥類、昆蟲、猴子以及開花的大樹，這些與身後幾英里的貧瘠的西藏高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們到了達旺，這是東北邊境特區卡門專區的前沿司令部，他們暫時住在小屋裡，在這裡開始與外界發生接觸。他們抵達這裡的當天，印度空軍的一架運輸機，飛旋在達旺鎮下方的一塊大草坪的上空，開始飛得很低，空投了一些裝了半袋東西的麻袋，裡面是麵粉、鞋子和淺頂軟呢帽；然後飛機盤旋而上，用降落傘空投了一些重點的物品。連續三天飛機都來了，而下面的藏人雙目無神，眼睜睜看著，因為他們注射了瘧疾、霍亂和傷寒疫苗而什麼也幹不了。達賴喇嘛抓緊趕路奔向孟迪拉，這是個大鎮，已經修好了公路並架設了電線。達賴喇嘛接到了尼赫魯總理發來的電報，歡迎他們來到印度，並表示要為他定居印度提供一切「方便」。達賴喇嘛受到了這一正式歡迎之後，深受鼓舞，他再次作了停留，從病後的最後影響中恢復過來，準備去會見各國新聞界的記者。這些記者已雲集附近的提斯普爾，它是布拉馬特拉河畔的一個茶葉種植中心。

不過，兩個星期以前，尼赫魯已向印度議會宣布達賴喇嘛已安全抵達印度，議會全場起立鼓掌表示歡呼。然而，在此之前的一星期，北京已發布了詳細的公報，表達了它對西藏騷亂的看法。公報將起義說成是由「上層反動集團」發起的一次小叛亂，旨在重建他們對「世界上最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地區」的統治。新中國新華社3月28日的文章說：「這些反動派的氣焰甚囂塵上，他們甚至準備接管整個世界。在西藏的愛國僧俗大眾的幫助下，人民解放軍徹底鎮壓了這場叛亂。主要是因為西藏人民是愛國的，他們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熱愛人民解放軍，反對帝國主義和叛徒。」公報聲稱：「達

賴喇嘛被叛亂分子公然劫持並扣壓」，公報還暗示，這些叛亂分子不但在聽命於台灣與美國，而且還在接受印度的號令。噶倫堡被認為「叛亂指揮中心」，它是喜馬拉雅山脈地區的商鎮，五十年代是西藏僑民居住的地方，印度議會不久前曾討論過西藏問題，這件事被指控為對「一個友好國家內政粗暴無禮的干涉」。

尼赫魯對北京的指責反應溫和。尼赫魯在議會承認，噶倫堡的確是「各國人士在棋盤上進行錯綜複雜角逐」焦點，但他矢口否認印度在西藏起義中發揮了作用。他還提到，他是信守「潘奇謝爾協定」(1)的；為了使中國進一步放心，「潘奇謝爾協定」規定雙方都不能干涉對方的內政。不過，這位總理的處境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樣，是「困難、微妙、令人尷尬」的。印度全國人民群眾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種聲援姿態。尼赫魯做到了這一點，因為他同意達賴喇嘛避難。但是，正如他自己十分清楚的那樣，這樣做不僅會使印度受到公開譴責，說它違背了「潘奇謝爾協定」，而且還面臨著比這危害大得多的譴責，人們會說印度加入了反共的冷戰陣營，因而也就會使它喪失不結盟的地位，而不結盟卻是印度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基石。為了防止遭到這樣的指責，尼赫魯強調他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純屬人道主義的做法，是以「堅實的紐帶」作為基礎的，這一紐帶是印度與西藏之間數百年來宗教與文化交往發展的結果。達賴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為開展西藏獨立運動的基地，也能利用印度作為基地從事任何政治活動；特別是要將達賴喇嘛與新聞界和公眾隔離開來，目的是要緩和北京日益憤慨的態度，但做到這一點並不簡單。

自從3月下旬出現了有關拉薩戰事的消息報導以來，偏僻西藏的叛亂消息一躍而成了世界頭號新聞。一百多名記者從巴黎、倫敦、紐約、非洲、東亞乘飛機來到印度，企圖得到已被認為是「一年頭號新聞」的這件事情的消息。他們選定噶倫堡作為開始活動的最佳地點，一齊雲集戴維·麥克唐納辦的喜馬拉雅飯店。戴維·麥克唐納曾任英國駐西藏商務代表，與十三世達賴喇嘛有私交。戴維·麥克唐納聽到達賴喇嘛出逃的消息之後，十分擔憂，但還是上床休息去了。而那些新聞記者則在用雙筒望遠鏡搜索著周圍的山峰，主動去找噶倫堡城中地位的藏族公民攀談，每天驅車一百英里，來往於噶倫堡和甘托克之間，以尋找重要的新聞素材。這些記者由於受到了來自編輯的日益增長的壓力，要他們提供有關神秘「法王」下落的頭版新聞，因此他們也就開始杜撰一些報導，用噶倫堡陳舊過時的電碼發回去。對點滴內幕消息的競爭也十分激烈，而正式可靠的消息又少得可憐，因此記者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用於偷偷摸摸地相互尾隨，以求掌握消息來源。然而，當他們得到達賴喇嘛越境來到東北邊境特區的消息之後，這些記者只需看一眼地圖就能得出結論，達賴喇嘛最終會在提斯普爾露面。接著，這些記者一窩蜂走得一個不剩，他們首先奔向阿薩姆邦的首府西隆，然後來到提斯普爾。他們睡在當時種植園主俱樂部的長沙發上和彈子球檯上，他們使得這座城鎮小型的簡易機場上擠滿了單引擎飛機，這些飛機全是租用的，目的就是要搶先得到「法王」抵達之後的獨特鏡頭，然後飛往加爾各答的達姆——達姆機場，向世界的各種刊物提供照片。

4月18日凌晨，印度官員撤銷了對福特希爾這座小型築路營的旅行禁令。福特希爾距提斯普爾三十英里，拂曉過後不久，達賴喇嘛就將抵達這裡。能夠找到交通工具的那些人第一次看到這位流亡領袖，跟在他身後的有他母親、姐姐、阿里仁波齊以及七十名西藏政府的官員，達賴喇嘛從吉普車上走了下來，地上鋪了一塊帆布，權作地毯。地毯的兩旁排列著面面相視的印度士兵。然後他在一位監工的小屋裡用早餐，外邊有一輛閃閃發光的普利茅斯牌汽車在等候他，前燈上的竹條上掛著西藏旗和印度旗。一個半小時之後，當達賴喇嘛滿面笑容、一言不發地走進提斯普爾的圓形別墅時，門前的那些麥克風和電視攝影機都忙著工作起來。丹增嘉措將各國領導人和表示良好祝願的人士發來對數百封來信和電報仔細看了看。與此同時，一名印度官員和一名西藏官員出現在記者面前，他們宣讀了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寫得一份聲明。聲明簡要介紹了導致達賴喇嘛出逃的主要事件，首次向外界披露1951年的十七條協議是由於「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而簽署的。聲明還說，自從人民解放軍抵達拉薩的那天起，「西藏政府就沒有絲毫自主權」。接著，聲明否定了中國人散佈的達賴喇嘛是被誘拐的說法，聲明達賴喇嘛來到印度是「出於自願，沒有受到任何強迫」。聲明總結時說：「達賴喇嘛的祖國和人民已經度過了一段困難重重的時期。此時此刻，達賴喇嘛想要說的就是他要對西藏所遭受的災難深表難過，並強烈地希望這場災難很快就會結束，而且不會發生任何流血事件。」

兩天以後，中國作出了嚴厲的答復，新中國新華社宣布：「達賴喇嘛的所謂聲明……粗糙拙劣，缺乏邏輯，滿篇謊言，漏洞百出。事實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由北京的中央政府制定的……甚至連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以及權力也不是由西藏人自己確定的。在現代歷史上所謂的西藏獨立歷來，就是英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他們企圖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可恥地繼承了這一衣鉢……」新華社的這一消息，列舉了達賴喇嘛的聲明不是以第一人稱所寫的事實，列舉了這一聲明的副本是由一位印度官員分發給記者的事實。

新華社的這篇消息認為，這些事實是達賴喇嘛遭到劫持的證據。這與北京以前的指責相比，已進一步升級。新德里認為，這是毫無根據地顛倒事實，表現的是好鬥的態度。新華社的這篇消息還說：「所謂的達賴喇嘛的這份聲明，反復講的是所謂的西藏獨立，現在發表這份聲明，人們不禁要問：這不是想要達賴喇嘛採取敵視祖國的立場，從而阻塞他回歸祖國之路嗎？這裡所講的獨立，事實上意味著要將西藏變成外國的殖民地或保護國。」

4月18日下午一時，也就是達賴喇嘛抵達提斯普爾之後幾個小時，他坐上了一節包廂，要坐三天火車，前往他的新住地穆索里。這裏曾經是英軍的一處丘陵駐地，位於新德里北面的山區。這些藏人在像客廳似的車廂裡，前面牽引的是印度鐵路公司的蒸汽機車，車頭形似槍管，又黑又長，前面還有一輛開道車。他們是在朝西行駛，穿過了南亞次塵土飛揚的北部邊緣，經過了阿薩姆邦、孟加拉邦、比哈爾邦，最後是北方邦；在北方邦轉向正北方向行駛，來到了鐵路線的終點站德拉登站，這裏相距穆索里有十八英里。這列火車所經過的路線兩旁，排列著身穿素裝的印度學生和工人，他們將專列所經過的車站擠得水洩不通，高呼「歡迎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萬歲！」在城鎮之間的鐵路沿線，農夫站在田地邊緣，雙手合十，表示敬意，等候數小時，為的就是要看一眼神聖的達賴喇嘛。在西里古里、貝拿勒斯和勒克瑙這些大站，丹增嘉措就要離開包廂，在群眾集會上發表講話。直到4月21日清晨，達賴喇嘛才驅車來到穆索里的山坡，這裡氣候涼爽，青松密布，頂峰覆蓋著積雪的楠達德維山遙遙可見。他這次的行程歷時一個月，長達一千五百英里，伯拉別墅成了這次旅行的終點站，它是屬於有權有勢的伯拉家族的避暑勝地。

伯拉別墅位於穆索里的郊區，修建在覆蓋著松樹和橡樹的山岬裏，俯瞰幸福河谷，它是按照英國農村別墅的式樣修建的：兩層樓，屋頂窗很陡，下面是突出的陽台，台地式的花園，裡面有蝴蝶花、百合花和藍白相間的紫羅蘭。別墅裡面配有椅子和沙發，靠背都很深，牆上掛著甘地和尼赫魯的畫像，中間還夾雜著印度教的男神、女神畫像。客廳裡有一部大收音機。不久之後，達賴喇嘛和及其噶廈政府就開始在收音機前收聽廣播。二層樓上，達賴喇嘛臥室隔壁的一個房間改成了修習室。伯拉別墅周圍有十四英尺高的帶刺鐵絲網圍著，丹增嘉措和他的一家就單獨住在這裡面，而西藏政府的大部分官員則住在幸福河谷俱樂部；它也是這個邦武裝警察的司令部，戒備森嚴，佈置了一片路障和便衣特務，有效的阻止了藏人與新聞界和其他來訪者的任何接觸。

4月24日，也就是達賴喇嘛抵達伯拉別墅三天之後，尼赫魯總理驅車穿過穆索里街道，他身穿著傳統的緊身白褲，齊膝的黑色上衣，鈕扣上有玫瑰形的寶石，頭戴國大黨帽，數千名丘陵地帶的老百姓和在這裡度假的人們在放聲歡呼。尼赫魯此行表面上要向旅行社大會發表講話。他在向大會發表講話時說，他來這裡是為了履行「前約」，並沒有意識到他將在這裡見到一位「大名鼎鼎的旅遊者」。在回答一位記者的提問時，尼赫魯指出，印度對西藏的興趣是「由於歷史、感情和宗教上的原因，根本與政治無關。」尼赫魯說：「無論外面的全部政策是否與農業的合作化、社會發展或工業發展有關，它都以合作為基礎。」這番話顯然是講給北京聽的。尼赫魯向班禪喇嘛和其他中國官員發出了邀請，叫他們來親眼看看達賴喇嘛，他沒有受到「劫持」。接著，尼赫魯乘車經過了勃拉別墅大門前的警察帳篷，然後與這位西藏領袖在草坪上待了一會兒，照了幾張像。接著，他們倆退入屋內，會談了幾乎四個小時，只有一名譯員在場協助他們。達賴喇嘛敘述說：「我將全部情況向尼赫魯作了解釋，他建議我靜下心來，認真考慮，不要急躁。他就像一位真誠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這使我感到高興並懷有希望。但與此同時，他提醒我要正視現實，因此，我感到有些灰心，實際上覺得沒有指望了。」尼赫魯講得很清楚，儘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印度決不會給西藏獨立的事業以任何實質性的支持，這就是「現實」。達賴喇嘛繼續說：「我隨意向尼赫魯提到我們已經在藏南成立了臨時政府，他有些惱火，立即答道：『我們不會承認你的政府。』大家知道，我認為我們從西藏來到這裡，抱著某種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們還可以進行對抗。但是，在與印度政府討論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們認識到，事實上事情並沒有這麼容易。印度人儘管對我們表示同情，但他們還是必須不折不扣地奉行他們的不結盟政策。當然，尼赫魯本人知識廣博，經驗豐富，但我認為，這場西藏危機也一定使他大傷腦筋。」

尼赫魯的確越來越感到情況複雜，處境艱難。3月上旬至4月上旬，印度國會開始討論西藏問題，到5月份這場討論就變成了一場熱烈的辯論，常常不乏譏諷之詞。印度共產黨表達的是中國對這場危機的觀點，指責印度政府對西藏另有打算，而幾乎所有的其他反對黨則認為尼赫魯採取的是綏靖立場。前一年，社會黨的領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譴責了「潘奇謝爾協定」，說它是在「罪惡中問世的，要我們批准去毀滅一個古老的國家。」現在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嚴厲批評總理沒有對北京採取強硬立場，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這也就為它直接進攻印度的北部地區鋪平了道路。中國已經說過印度北部的部分地區是中國的領土，克利帕拉尼說：「我不明白，在中國抱有這種想法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能夠同它保持友好關係。當然，我們維護這一友好關係的努力，只會導致這樣的結果：中國人不相信我們心懷善意，而只會認

為我們是膽小鬼。」 KM 芒西說：「西藏的悲劇使我們背上了一筆沉重的良心債。對於像我們這樣年輕的獨立國家來說，又擁有這樣的精神遺產，我們這樣對待西藏的局勢，這在歷史上已經構成了罪過。」

尼赫魯對北京的指責表示無比震驚，同時又拒絕改變自己的立場，堅持認為，將印度和中國的關係維持下去是最重要的。要做到這一點，對達賴喇嘛的行動就必須要有約束。在當時的氣氛中，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挑釁事件也可點燃中印戰火____而印度卻毫無準備要進行這樣一場戰爭。丹增嘉措認識到，他的地位以及西藏在將來建成一個獨立國家的希望全部懸而未決，因此，他暫時採納了尼赫魯「靜下心來，認真考慮」的建議，開始著手適應新生活。

達賴喇嘛的處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點不久即十分明顯。根據群眾要求，每星期他要舉行一次「達山」（即祝福），他坐在一張綢緞覆蓋的椅子上，椅子擺在伯拉別墅草坪一端支起的一個搖搖晃晃的木台上。夏季來臨之後，西藏這位流亡「法王」成了穆索里旅遊業最大的吸引力。6月3日，達賴喇嘛接見了五千名表示良好祝願的人們，玫瑰花瓣像雨點一樣落在他身上。有兩次只好在陽台上重新露面，因為那些遲到的人在高喊「達山！達山！」達賴喇嘛的那些噶倫，對於很多印度人企圖同神聖的達賴喇嘛握手十分惱火，他們決定，達賴喇嘛再也不露面。不過丹增嘉措不僅熱心與別人握手，而且對於幾乎全部破除他周圍那些有數百年歷史的繁文縟節還十分熱心。他評論說：「過去繁文縟節太多，你不能說話，甚至呼吸都不自由。我討厭拘泥於禮節。現在，新的處境使我較易於改變這一狀況。大家看，從這方面來說，成為難民實際上也是有益的。它縮短了我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而且它還加深了我對宗教的理解，特別是加深了對非永恆性的認識。雖然世界總是在不斷變化，但人們並沒有注意到它的變化。接著，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國倏忽全失。這說明，要死死捏住這些東西不放手是毫無用處的。」

一方面達賴喇嘛在適應這些變化，另一方面印度官員則在盡力維持過去的繁文縟節，這真是前後矛盾。達賴喇嘛到達印度三年之後，人們仍然稀裏糊塗弄不明白，一位記者的經歷可以說明。別人告訴他不要觸摸達賴喇嘛，也不要到達賴喇嘛前轉背就走，因此當接見結束時，他左右搖晃朝門邊退去。達賴喇嘛旁觀了一會兒，感到十分好笑。接著，他快步走到記者身邊，抓著他的雙肩，將他轉過去，然後友好地推了他一下。

不到兩個月，達賴喇嘛自願保持的沉默宣告結束。自從4月上旬以來，數一千計的難民開始源源不斷地翻越喜馬拉雅山脈的山口，進入不丹、錫金、尼泊爾和印度。她們帶來了消息，說中國方面在進行全面努力根除西藏的社會和文化。正如康區所進行的「民主改革」一樣，「民主改革」不日就要強行實施：財產與勞力的集體化、劃定階級成份、天天進行的政治「再教育」，解散僧侶階層，還有計劃要將漢人大批派來定居，開始西藏中國化的過程。此外，人們不但聽說很多人遭到囚禁和處決，而且每個地區新成立的軍管會直接犯下了許多暴行，經常對人們施以酷刑、強姦和肢解。眼下，西藏的這場全面災難，使達賴喇嘛顧不得尼赫魯的告誡了，迫使他發起了一場求得國際支援的運動。

6月20日，丹增嘉措舉行了他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在伯拉別墅的草坪上，支起了一頂四周沒有帆布的帳篷，幾十名記者在這裡傾聽達賴喇嘛宣讀一份冗長的聲明。聲明列舉了在西藏發生的種種破壞行徑，說中國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毀滅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甚至要同化藏族」。

達賴喇嘛要求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調查有關暴行，他明確廢除了十七條協議，並說：「我和我的政府在哪裡，西藏人民就會承認我們是西藏的政府。」他還說：「當我獲得1950年以前在西藏享有的那些權利時，我將返回西藏。」

然而，達賴喇嘛最迫切、最關心的是難民問題。到6月底時，幾乎二萬藏人逃離了他們的家園，這是數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難民，最後達到了十萬人。一方面，那些緊靠邊界的人們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海拔最高、荒無人煙的山口。另一方面，從康區和安多來的其他人，則一路上艱苦作戰，歷時三四個月，才能殺出一條生路。這些人當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倖存者共一百二十五人，他們於6月份抵達阿薩姆邦，而他們出發時共有四千人。大部分難民不是挨餓就是負了傷，或者患上低山病。當他們降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時，從文化方面而言，他們大受震驚。達賴喇嘛說：「1959年夏季期間，我的迫切任務就是設法拯救難民。他們一到，熱季就已經開始了。他們穿著笨重的靴子和長袍，這些東西毫無用處，全得燒掉，必須密切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接著，我們根據所掌握的一星半點知識，認為自己負有義務要告訴這些『新來』的難民，要返回西藏並不容易。我們說：『我們在印度待的時間一定會比預計的要長。我們不但肉體要在這裡定居，而且，思想也得在這裡紮根。』」

為解決這些難民問題，建立了兩個大型過渡性營地：一個叫米薩瑪裡，距提斯普爾十英里；另一個叫布克薩杜瓦爾，過去曾經是英國人的戰俘營，位於西孟加拉邦，離不丹邊境很近。這些難民營不但反映了印度政府在作出努力，而且也是反對黨努力的結果。這些反對黨在阿查雅·克利帕拉尼的領導下，聯合成立了一個中央救濟委員會，它在獲得糧食、藥品以及國際援助方面發揮了作用。印度的情報部門讓那些僧人、遊擊隊員及其家屬消毒滅菌之後，讓他們留下了指紋，並對他們進行了詢問。然後這些人就在營房裡等待，他們將分別派往印度北部涼爽一些的地方修路。這個計劃是達賴喇嘛和新德里聯合製定的，目的就是剎住日益增長的死亡率。1月至7月，第一批修路隊伍就離開了布克薩杜瓦爾，接著又是數百人，這些人都分佈在橫跨喜馬拉雅山脈的一千二百英里的弧形圈內。他們倖存下來的可能性十分有限，然而，他們卻是西藏最終獲得自治的唯一希望。

單巴次仁、他的父母和兩個妹妹用了三天時間，翻越了西藏和不丹的高山，這些山高達二萬五千英尺。三天後，他們的目標展現在自己的眼前，腳下是喜馬拉雅山脈南坡，森林茂密。數天來，他們艱難地走過了地圖上沒有標記的荒原，眼前曾一直是銀光閃閃的雪峰、山脊和峽谷；結束這樣的景色，多少天來這還是第一次。六個月前，起義被鎮壓下去，單巴的父親確白頓多和竹巴村全部體格健壯的男人，都被人民解放軍囚禁。開始他被釋放，但只過了幾個星期又重新被捕，然後又被釋放，正好目睹他妻子在群眾「鬥爭會」上挨打挨批。接著，他接到通知，雖然單巴只有十歲，但還是要與其他數千藏族小孩一道去中國上學。單巴的父母十分擔心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獨生兒子，因此決定逃跑。

1959年10月中旬，確白頓多領著一家，逃出了竹巴村。他妻子以及他們五歲和八歲的女兒午夜之後出發，悄悄地匆忙離開了竹巴村。一會兒過後，確白頓多和單巴跟了出來。家裡的門沒有闔上，以免引起懷疑。他們的那條狗不願回去，也跟著他們走。他們隨身帶了幾袋糧食和衣服，朝東走去，離開大路，進入了分隔山南(2)不丹的大山，然後拐道朝南。他們整夜爬山，爬到了一萬八千英尺的高度，兩個女孩背在父母的背上，單巴則握著父母的手走在中間。大人每前進一步，齊腰的下面半截就陷入了新近落下來的積雪裡，因此這樣爬山是極其艱難的。破曉時，他們在一塊大石頭後歇腳睡覺，就是一條毯子鋪在雪地上，人蜷縮一團睡在毯子上。直到這時，他們才發現自己的狗不見了，它很可能陷入了吹積而成的雪堆裏，無法自拔。

日落時，單巴一家凝視著高低起伏的山峰和湛藍色的天空，遠方天空下是西藏荒涼的棕紅色山嶺，在夕陽下閃閃發光。他們簡單地吃了一些融雪、乾肉和炒青稞麵之後，又繼續爬山。月光灑落在冰雪上，十分耀眼，他們每走幾步，就必須遮擋一下眼睛。到拂曉時，大家都已筋疲力盡。由於空氣稀薄，海拔很高，單巴的小妹妹已開始嘔吐。他們沒有吃一點東西，在山峰之間的低窪處倒下就入睡了，上頭有突出的山頭擋風。第二天夜晚，他們又繼續前進。早上三點，他們朦朦朧朧地看到前面有一道細如針一樣的山脊，確白頓多牽著他的孩子和妻子，一個一個、小心翼翼地跨過了一條肉眼不易看到的裂縫，這條裂縫在夜色中向兩邊延伸。不過，安全越過這道山脊之後，坡道逐漸下降。他們還是在雪地裏露宿，翌日下午才醒過來，因為他們現在不像以前那麼擔心被抓住了。他們翻越另一座馬鞍形的山坡後，不丹的山麓小丘展現在他們眼前，這時夕陽還垂掛在西邊的天空。他們翻越過的那些高山像一道牆，在他們身後高高聳立。這一家人如若不是他們最小的孩子的病情的話，他們一定會感到大為欣慰的。兩天來，她一直不吃不喝，昨天在途中，她只是一動不動地趴在母親的背上，別人想弄醒她時，她卻毫無反應。將近四點時，單巴的母親焦急地聽了聽女兒艱難的呼吸聲，然後大聲叫喊，孩子的「情況不妙」。他們在距離樹線還有一小時行程的地方，停下休息。單巴的母親坐下來，將女兒從背上舉起來，使勁晃她。就在此刻，小女孩停止了呼吸，其他人都在一旁看著她死去。單巴回憶說：「這使我們感到震驚。剛才她還活著，但過不久，也就是爬山最艱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她卻死了。」

太陽落到了群山後面，單巴和他一家守著屍體嚎啕痛哭。最後，確白頓多從他們帶來的一個袋子裏，拿出了幼女的其他衣服，穿在她小小軀體上，然後用雙手掘了一座淺淺的墳墓。接著，他將孩子掩埋了，在她的臉上堆起了白雪。他們一家在哭泣聲中，起步下山。四個小時之後，他們在岩石和齊腰深的灌木叢中，鋪下了毯子，燒了熱茶，這是三天以來的第一次，然後就睡著了。

單巴和他的一家躺在一個新世界的邊緣，這個新世界的各個方面對他們來說都很陌生。確白頓多以前曾在不丹經商，他至少還見過森林，其他則未見過。就像來自西藏的許多難民一樣，他們只是模模糊糊地認為地球上只有中國和印度，再遠一點的地方就是大海洋。全家人都不知道達賴喇嘛已經逃出一——中國將達賴喇嘛的出走嚴加保密，因此儘管他們自己的逃跑很成功，但卻失去了下一步的目標。所以，翌日他們就踏上了他們見到的第一條路，在森林中露宿一夜之後，順著這條路來到了一個村莊。

對西藏人來說，這些不丹老百姓看去就像自己的同胞一樣，他們身著齊膝長的方格長袍，留著沒紮辮子的頭髮。這些人已出走若干年代，只是生活習俗還或多或少地像他們的祖先，給人以奇怪的感覺。然而對不丹人來說，這些難民一點也不陌生。自從早春以來，數千人走了這條路，他們被弄得暈頭轉向，疾病染身，不少人忍飢挨餓。起義爆發後不久，不丹政府立即關閉了那些主要山口，因為它擔心如果允許難民入境，中國將會採取報復行動。但是，隨著許多宗教和政治人物的到來，而這些人當中有些還是不丹王室的親戚，不丹人終於修改了這一政策。後來，西藏人可以通過不丹王國，但條件是他們得前往印度。雖然最後留在不丹的難民四千人，但其他難民則被迫行乞通過不丹。他們將身邊為數不多甚少的幾件珠寶、佛像以及唐嘎換來食物糊口，因此，當他們一個月之後處境時，大多數人都變得一無所有。就是這樣，單巴、他的父母和妹妹穿過了不丹，晚上在森林裡露宿，白天在村里行乞。

不到一個星期，他們就不得不去討飯。他們來到了一座村莊的外圍，一家人分成兩組，母親領著女兒，父親則帶著兒子，挨家挨戶地去要殘羹剩飯，這裡的村民給他們什麼，他們就要什麼，主要是米飯和蔬菜。然後他們回到了鎮外的宿營地，吃了東西之後就繼續上路。確白頓多發現人們對孩子更為慷慨，便叫兒子單獨去要飯。但是，這個辦法儘管很奏效，卻使單巴本來就總是害怕迷路的心理負擔更重，大家也都有這種擔心。這裡的茂密森林不像西藏一眼望不到邊的景色，密林常常是遮天蔽日，造成了強烈幽閉的恐怖感。這種感覺又因為總是擔心一家人分開而更為強烈。這些人害怕樹林中躲藏著什麼東西，因而加重了他們的不安。這裡老虎、野豬和有毒昆蟲一應俱全。單巴的父親警告孩子們要注意蛇，將蛇描述成像西藏商人使用的黑白相間的繩子，但蛇是活的。然而水蛭卻防不勝防，因為它們到處都是。水蛭每天都爬到人身上來，緊緊地黏在人體上，慢慢吸血，可以膨脹到二英尺長，鹽和水是唯一的解毒藥。單巴及其一家留下火柴用來點火，卻去乞討食鹽來對付水蛭。他們裹在身上的還是那些熱得像火燒一樣的藏裝。在此期間，單巴的母親間或還要為死去的女兒哭泣。每天晚上睡覺前，他們要說幾句話；其他人從未提起過那件悲痛的事情，害怕進一步觸發母親的痛苦心腸。

全家人在步行通過不丹的途中，遇上了其他的難民，他們就像無數條小溪順勢而下，經過首都廷布，繼而奔向印度。終於，他們走了五天之後，來到了一塊大草坪上，這裡擠滿了準備越境進入印度的藏人，印度邊界距離這裡還有兩天路程。在這些人當中，單巴的父親發現了他認得的一家人，他與他們一起燒火做飯，兩家互相敘述了各自的經歷。他們一起進入了印度，幾天之後就到了布克薩杜瓦爾。

布克薩杜瓦爾的十三座混凝土營房周圍有三座小山，這塊地方很小，密不通風，周圍有高高的帶刺鐵絲網圍著，環境沈悶。單巴來到這個營地時，營地大門的內外已有數千藏民在這裡露營，大多數人都因為氣候炎熱和海拔較低而什麼事情也幹不了。為了解決過於擁擠的問題，印度政府已開始將難民大批弄走，要麼是讓他們去修路，要麼是轉移到米薩瑪裡的過渡性營地，這個營地要寬敞一些。兩個星期之後，單巴和他一家也轉移到了這個營地。單巴回憶說：「我們一大幫人離開了布克薩杜瓦爾，走了大約二英里，來到了鐵路線，大家都在談論火車。誰也沒有見過火車；我們剛聽說火車這個藏語新名詞『日里』（煤廓）它來自英文 Rail 這個名詞。聽到人們在談論可以跑動的大房子，我很激動；但當我們第一次到達鐵路線時，卻因為十分匆忙，也沒有機會好好看看。」印度警察將他們趕到了一條狹窄的走道，兩邊都是一排睡鋪，有三層，單巴設法弄到了一個靠窗的位置。這個有利的角度倒使他大吃一驚，他記得：「當時十分有趣。火車開動後，實際上我認為是外面那些山嶺在奔跑，而不是我們在移動。我凝視著窗外，心想：『這些山嶺怎麼跑得這麼快呢？』我就是不明白。」不過，夜幕降臨時，這時火車往南馳，喜馬拉雅山脈也已消失，他才開始明白過來。在火車上又過了一晚之後，他們抵達蘭加帕里鎮，這些難民要從這裡坐卡車前往新營地。

從外表上看，米薩瑪裡比布克薩杜瓦爾要大，壓抑感沒有那麼強烈。營地建造林中河邊的一片平坦沙灘上，由一百五十個竹棚組成。竹棚排列成行，十分整齊。一個竹棚裡住一百人，竹棚周圍種了很多蔬菜。黃瓜藤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在很多竹棚頂上鋪蓋了一層，可以稍稍遮擋一下熱帶地區的陽光。直到單巴一家來對米薩瑪里之前，這裡約一萬五千名難民絕大多數都是男人：他們是原康巴戰士和僧人，在起義期間逃離拉薩。他們已經體驗了最艱難的營地生活。米薩瑪裡是為藏人修建的，不過兩個星期，水源受到污染，衛生條件不好。配給的咖哩土豆、大米和小扁豆儘管數量充足，但對於只習慣於吃青稞、酥油和肉食的人們來說卻有害無益。結果發生了流行病，出現了致命的阿米巴痢疾。河堤上有一個火葬場，儘管相距有近五百米，但火葬場的煙霧每天都要飄到營地這邊來。首先死去的是老人和兒童，因為他們抵抗不了這樣的感染，通常只需一兩天就會完蛋。哭泣是營地最引入註意的聲音，偶爾，哭泣聲也夾雜著誦經聲，這是一位孤伶伶的僧人在誦經，他也和其他人一樣穿著政府發給的衣服。

單巴在米薩瑪裡度過了幾乎三個月。每天，他們全家無精打采地坐在床上，聽說又有一個人死去的消息。他們唯一能夠聊以自慰的是，他們抱有這樣的希望：希望達賴喇嘛不久將會率領他們返回西藏。他們總是談到這一點，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似乎確信，他們在印度的逗留只是暫時的。但是，1960年冬天，營地的一位西藏官員宣布，他們不久將被送到北部築路。確白頓多推斷，如果去修路，那麼，從米薩瑪裡回西藏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全家人喪失了信心。迄今為止，單巴和他的妹妹還沒有受到痢疾感染，但現在卻不行了。雖然營地的醫務所給了小妹妹一些白藥片，但她的身體仍垮得很快。以前，她常常在屋外玩耍——經常快步跑進屋，因為她見到一個黑皮膚的印度人而受到驚嚇；現在她也不能到戶外去玩耍了。她整天臥床不起，身體虛弱，不動不吃。就在全家即將離開這裡去築路時，單巴的又一個妹妹離開了人世。

兩天之後，單巴和父母上了火車，也不知火車駛向何方。在火車上，單巴的母親一直不讓他離開自己身邊。她心神錯亂，不思茶飯，不時哭泣，反反覆覆地說：「我們從中國人手裡跑了出來，結果只是將屍體掩埋在異國他鄉。」單巴的父親無精打采，坐在妻子身旁，因為失去了女兒而說不出一句話來。火車行駛三天之後，車上的一百六十名難民在一座小城鎮下了車，前面就是喜馬拉雅山脈的西段山麓。一名西藏政府官員在車站迎接他們，但印度官員卻未露面。這些人在月台上又住了三天。在這三天期間，他們迎來送走了流亡生活中的第一個藏歷新年，沒有舉行任何慶祝活動。當別人終於發現了他們之後，他們坐上了卡車來到了一些軍用帳篷前，這些帳篷已用過多年，破舊不堪，打了一些補丁。這些帳篷支在石坡上排列參差不齊，離一座叫做巴瓦納的印度村莊很近。沿著一條小道，穿過一段松樹林，走上幾百碼，就到了築路的起點處。

一個星期之後，築路工作開始了。每天早上七點四十分吹哨，難民們穿過松樹林來到路旁，首先由印度工頭點名，然後將他們分成十人一組。男人分發了斧頭和橇棍，砍樹，搬樹；婦女發了鐵鏟挖路基，兒童則發了筐子運土石。中間休息一小時吃午飯，然後要幹到下午五點。每天不過一個盧比，（即美金十分），勉強能買些大米，一個星期能買一次肉和蔬菜，數量可憐。難民們散工之後在村莊裏買東西，這是他們首次與印度的非官方接觸。

正如其他築路營一樣，他們發現與當地人接觸儘管很有必要，但卻常有危險。無論當地居民患什麼樣的傳染病——尤其是肺結核，總是可以傳染給西藏人。由於他們缺乏適當的抗體，大多數人常常因此喪命。流亡者來到印度之後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他們就清楚地看到，這一過渡性階段不僅比逃跑威脅更大，而且給人們帶來了傷害，幾乎沒有一家能夠倖免，甚至人們懷疑難民們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凝聚的集團而存在。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找不出明顯的疾病作為死因，藏人乾脆將不幸的死亡，歸咎於流亡使人心碎和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單巴的母親似乎也染上了這樣的疾病，她幹了兩個星期的修路活之後，無力繼續幹下去，不得不躺在草鋪上，蓋的是全家在帳篷中用做床鋪的那床毯子。因為要糊口，單巴和他的父親還得去幹活，無法照料她。晚上，他們將她抬到了巴瓦納特的小診所，但這裡那位主治醫務人員卻找不出任何確切的癥狀進行醫治。失去了兩個女兒，她現在仍極度難過，孤獨地逗留在人世。後來的一個星期天，負責這個築路團的西藏官員安排她去看看達賴喇嘛的新住地、相距很近的達蘭薩拉。幾個月之前，達賴喇嘛就從穆索里轉移到了這裡。

坐了兩個小時的汽車之後，這些築路工人在一個叫麥克累德干基的小村莊下了車。村莊位於山坡上，上面就是大城鎮達蘭薩拉。確白頓多從這裡背著妻子，爬上了通往達賴喇嘛住宅的石子小道。小道的坡度很大，在住宅的入口處，他們通過了安全檢查，然後被帶到了一個草坪上，前面是一個陽台，在一座大房子的南邊。達賴喇嘛露面之後，他們全部五體投地，拜倒在他面前。

這位年輕領袖談到了正在實施的計劃和進行的改進工作，爾後他們排成縱隊從達賴喇嘛身邊走過，接受他的摸頂祝福，然後接見即告結束。兩天之後，他們回到了巴瓦納村，單巴的母親躺在床上抬起頭，看著丈夫和兒子，說：「我已經見到了神聖的達賴喇嘛，感到無比欣慰。如果我要死，那是我的命運。我感到滿足了。」翌日，單巴的父親就打發單巴獨自上工。那天晚上，單巴的母親拿著他的手，說：「你一定要好好照顧你爸爸。我知道，總有一天你會回到西藏去的。」第二天，當單巴幹活回來時，母親已經去世了。

兩個星期之後，確白頓多開始嘔吐。就像他的孩子一樣，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他被送到了帕蘭普爾的一家醫院，到那裡坐車需要一個小時。單巴這時正好就要過他的十一周歲生日，但他卻一個人孤獨地待在帳篷裏，媽媽就是在這裡去世的。每逢早上，西藏政府的那位官員就要他去上班，但告訴那些印度工頭不要讓他幹很多活。晚上，這位官員領著他去巴瓦

納，買糖果給他吃。每天夜晚，單巴孤苦伶仃地躺倒失聲痛哭，害怕他的父親也會死去，使他成為孤兒。但確白頓多一個星期之後居然回到了這裡，真是奇跡，他雖然軟弱無力，但仍活著。

然而他們又面臨著再次分離。單巴這個築路團中有四十名兒童，決定要將他們都送到新建在達蘭薩拉的幼兒園去，這個幼兒園是1960年春季建成的，其任務是照顧失去親人而正在修路的數百名兒童。單巴聽到這一消息之後，拒不離開他的父親儘管確白頓多明確告訴兒子，他這次去沒有危險，並堅持說在築路營泥土和石頭沒有前途，但單巴仍執意不肯。不過，擔負這項任務的那些成年人卻沒有動搖。單巴被痛苦地弄上了擁擠的客車，流著眼淚乘車來到了達蘭薩拉，最終與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分離了。一年之後，他才收到了父親的來信。在此期間，在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持下，新的生活開始在他和他同一代的年輕人面前展現成形。

1959年夏季和秋季，難民繼續從高原來到印度。與此同時，達賴喇嘛為了贏得國際上對西藏的支持，正在加強努力。國際律師與法官委員會根據達賴喇嘛呼籲，進行公正調查的要求，對關於中國人暴行的許多報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進行了調查，到了7月末就已經編寫了一份初步文件，一年之後發表了整篇報告。在這份報告中，該委員會斷定，儘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確，但無論是從事實上還是從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個主權國家，不受中國統治。在談到違反人權問題時，該委員確信紅色中國有罪，犯下了「別的任何人和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嚴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種族，一個宗教集團！這也就是種族滅絕。」

達賴喇嘛從國際律師與法官委員會的初步調查結果中獲得了勇氣。9月8日他乘火車離開了穆索里，翌日早晨六點，達賴喇嘛抵達德里車站，受到了數千名印度支持者的歡迎，然後驅車來到印度國賓館海德拉巴德賓館。接著在總理住宅梯恩穆梯府與尼赫魯進行了會晤。達賴喇嘛說：「儘管印度方面強烈反對，但我自己還是決定要向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

首先，我見總理是為了解釋我們的立場。尼赫魯聽後說：「既然你已經決定發出呼籲，那麼就幹吧。」當時，我們的確感到自由是多麼美好，儘管以前我們想與聯合國接觸的打算都被潑了冷水，但我們的權利現在卻被人承認了。根據我過去同中國人（3）打交道的經歷，幾乎不可想像，它是我一生中不同尋常的出乎意料的經歷。」

丹增嘉措在徵得尼赫魯的認可之後，同一天給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發了電報，並準備隨後派一個代表團去；接著就忙於拜會外交官員，這是前所未有之舉，目的就是努力爭取對此項呼籲的支持。達賴喇嘛在回憶他對新德里外交使團的拜會時說：「將我自己與今天的達賴喇嘛相比，我當時就有幾分糊塗。與人單獨交談，這總是有益的，但有時卻不知如何開頭。這樣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我有勇氣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對外交禮節卻不太注意。不過，1959年我對自己還缺乏信心。因此，有時是很為難的，我常常焦急不安。」

然而，達賴喇嘛的努力，證明是令人滿意的。結果，愛爾蘭和馬來亞聯合向聯合國大會的程序委員會提出討論西藏問題，這次與1950年拒不受理的態度不同，而是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辯論。在很多方面，這場辯論反映了印度議會的那場辯論。正如提案國所指出的那樣，西藏的苦難主要涉及的是人權；進一步的問題，卻遭到忽視，因為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雖然沒有統治西藏，但也對西藏提出了主權要求。馬來亞代表達托·依恩邁爾·卡米爾在開場發言中，引用了國際律師與法官委員會最初報告的結論。結論認為：「根據可以得到的證據，要撤回對系統地大力無情壓迫人類的基本尊嚴的提案，這似乎是難於辦到的。」蘇聯代表瓦西里·庫什涅特索夫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這份報告毫不可信，指責提案國企圖「利用聯合國以達到加劇冷戰局勢的目的」，他認為根本就不存在西藏問題，這個問題純屬杜撰，目的就是要惡化國際形勢和大會的氣氛。整個共產黨集團的成員同印度共產黨一樣，它們都跟著蘇聯跑，對西藏問題表達的就是北京的觀點，認為這個問題「完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事務」，甚至討論這個問題也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無理的干涉」。這樣，西藏問題正如尼赫魯已預料到的那樣，成了全球衝突這個大棋盤上的犧牲品。但是，到會議結束時，大多數國家投票同意將西藏問題列入第十四次大會的議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站在西方民主國家一邊，以四十五票贊成，九票反對（二十六票棄權），通過了一項有利於西藏的決議。這項決議雖然沒有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但卻呼籲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要尊重西藏人們獨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從西藏出來的多批難民源源不斷帶來了一些報告，內容就是暴行和大規模的破壞行為。因此，1961年和1965年又通過了兩項決議，在這些決議中，聯合國的措詞強硬多了。正如第二個決議中所說的那樣，聯合國不僅表示「嚴重的關注」和「極大的不安」，因為，「西藏人民獨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受到壓制」而遭到了「深重的災難」，而且再次「鄭重」地呼籲，「停止那些剝奪西藏人民基本人權和自由（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自治權）的行徑。」

1959年12月，當時聯合國就要發出首次呼籲，丹增嘉措的流亡生活也將滿一年。他踏上了朝聖的征程，在佛祖成道的地方菩提伽耶，丹增嘉措下榻在這裡的藏傳佛教寺院。從這裡，可以看到建於二世紀的大寺廟摩訶菩提寺，附近是棵菩提樹，佛祖就是在這裡證悟實相。達賴喇嘛在這裡接見了約六十名難民代表，這些代表發誓要為西藏的自由繼續努力戰鬥。然後，他為一百六十二名加入僧人行列的人們舉行了儀式，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著，達賴喇嘛繼續前往鹿野苑的鹿園，這是佛祖首次講經的地方。達賴喇嘛的隨從比平時少，只有十六人，他們乘車穿過了兩千名哭泣的西藏人群，這些人們聚集在樹下的茶攤周圍，販賣他們一直設法保存下來的一些舊衣服和幾件值錢的東西。達賴喇嘛在這裡待了兩個星期，他按西藏的傳統方式，坐在蓋著綢緞的寶座上向人群講經。每逢講經結束後，丹增嘉措要向人們宣傳他心中的長遠規劃，說流亡藏人的重建事業和西藏獨立鬥爭要結合起來，歷時一個小時。他是以忠告的口吻在發表這番講話的。從此以後，他向自己的人民發表講話時也採取同樣的態度。達賴喇嘛說：「此刻，西藏的太陽和月亮被遮住了，但總有一天，祖國將回到我們手中。你們不要心灰意冷，擺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任務就是要維護我們的宗教和文化。」

譯注：

(1) Panch Sheel 的音譯。1954年4月，中印在北京簽訂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協定。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

(2) 西藏自治區的一個地區。

(3) 原文如此，應為印度人。

第四章 重新建設

1960年—1974年

達賴喇嘛對流亡社會的遐想，在他新的指揮中心達蘭薩拉紮了根。這是英國人棄置的一個丘陵營地，地處旁遮普邦的北部邊緣。在新德里西面，相距一天的路程，達蘭薩拉位於多拉山脈的低處山梁頂。達蘭薩拉由英國人始建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用作賈廊達爾師的夏季營地。最初英國人在最高處的山脊上建立了一個兵站，接著在正對下邊平原的一道狹窄的山梁上蓋起了麥克累德甘基這座小鎮，修建了一條柱廊，興辦了商店，前面是一座時髦的林園，還有一個供小鳥戲水、飲水的盒形裝飾物和一些石條凳。荒野中有一座聖公會的教堂，叫聖約教堂，它那富有鄉土氣息的鐘樓聳立在山坡上。這裡一百多間小屋，散佈在山坡上；小屋有用來娛樂的角樓，俗麗的門窗，拱頂，有很多廂房，都安上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稱，如伊凡鋤頭、鷹巢、栗木別墅、軍事演習、撤退等。

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期間，除了大城市之外，麥克累德甘基社團在營地北部是最有朝氣的社團之一；隨著鐵路修到了距離丘陵地帶只有七英里的帕坦科特，德里和拉合爾的官員蜂擁而至。春天，森林裏遍地鋪滿了報春花、槲寄生、紅杜鵑和紫紅杜鵑；六月雨季開始之後，到處都是毛茛、紫羅蘭和金銀花。這裡的野生動物資源十分豐富：豹、黑豹、豪豬、狐狸、鬣狗、紅臉猴和白鬚大金絲猴，這些動物在海拔低一些的山嶺中。在冬季幾個月中，黑熊和棕熊就與這些動物一樣下山覓食，在麥克累德甘基的上空，鷹。白嘴禿鷲在發狂地盤旋；斑鳩、鴿子、渡鴉、雪雉馴服地飛進城裏。達蘭薩拉原本要建成土王的夏都，它的前途似乎不成問題，但在1905年卻發生了一次地震，英國人重新選擇了西姆拉。那些留下來的地方官員也將他們的辦公室所轉移到低一千四百英尺的山上，這個地方就叫下達蘭薩拉，要隱蔽一些。1947年8月15日這天--印度的獨立日，這些官員也走了。

僅僅留下了一位名叫 NN 諾羅基的人，由他負責麥克累德甘基鬼怪式的生活。諾羅基家族是大油商，人們叫他們「歐洲商店」的老闆，自從達蘭薩拉始建以來，他們一家就住在這裡。他們原是信拜火教的波斯人，一千多年前為了逃避在波斯的宗教迫害，作為難民逃到了印度。他們的家族一直沒有受到危害，他們在麥克累甘基立業之後，多少代英國官員都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這個村莊的保護神。NN 諾羅吉是諾羅吉父輩家業的第五代主人，現在他手頭掌握了幾十間別人棄置的房屋。他企圖使這個村莊恢復活力，但他的努力並不成功。在十二年時間內，他多次主動提出要將這些房子無償提供學校，無償提供給州政府作旅遊別墅，但卻無人接受。終於他從朋友那裡得知，中央政府在為達賴喇嘛尋找可供長期使用的住處，他立即與新德里進行了聯繫，諾羅吉說這是林中一座被人遺忘了的幽靜城鎮，日趨衰落。他的介紹很有誘惑力，政府進行檢查之後，德里居然認為這個地方非常理想，這一點使他感到十分好笑。藏人開始也只好同意，達賴喇嘛說：「尼赫魯親自為我們選定了達蘭薩拉，因為他認為這裡『安寧、平靜』。不過，從我們自己的觀點出發，它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足的方面。德里是神經中樞，離德里越遠，通訊條件越不好，這樣，達蘭薩拉的不足之處也就顯而易見。但我們也看到了它的潛在力，這裏很開闊，發達的餘地更大。因此，雖然我們起初抱怨不願轉移，但後來我們的官員去看了這個地方並且覺得不錯之後，我們決定轉移。」

1960 年 4 月 29 日，達賴喇嘛在穆索里待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後離開了此地。他頭天晚上乘火車前往帕坦科特，翌日下午在車站就受到了邦當局和市政當局的迎接，來迎接他的還有幾千名西藏難民，他們正前往達爾豪榭去修路。這些藏人看到他們的領袖今日的景況遠遠不如以前，很多人失聲痛哭。丹增嘉措停步安慰這些難民，告誡他們不要喪失勇氣，並擔保「總有一天，我們會重返西藏」。接著，一隊警方吉普車的護送下，他開始乘車爬坡，需用二小時。他經過了遍地都是石頭的狹窄河谷，前往達蘭薩拉，前面就是多拉達山脈銀光閃閃的群峰。

達賴喇嘛在回憶他第一眼看到達蘭薩拉的情景時：「這是一座小鎮，當地人民對我表示了熱烈歡迎-這是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丹增嘉措的車隊緩緩駛往以前的英國郵政局、警察局和縣政府，進入主要街道。主街道將卡特瓦里集市一分為二，兩邊擺著水果、蔬菜攤子。露天理髮店、還有裁縫、鞋匠、買糖果的商販，擁擠不堪。三千人從上面仍在使用的兵站走下來，排列在道路兩旁，鮮花象雨點一樣落在新鄰居身上，以示歡迎。這些人當中有戴彩色繡花帽的丘陵地區老百姓，有戴紅色、藍色頭巾的錫克人，有身著黑色禮服的政府官員和商人；他們的妻子身著透明的沙麗服（1），甚至還有廓爾喀人。達賴喇嘛回憶說，當時有朵鮮花上有一條小毛蟲，毛蟲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當陽光將附近拱頂一樣的芒峰染成紫羅蘭色時，車隊沿著之字形路線，又上行了五英里，經過兵站來到了麥克累甘吉。下午五點他們在麥克累甘吉駛經一座用竹子新塔的歡迎牌樓，牌樓上紮了冷杉樹枝和一些彩色飄帶，金色的「歡迎」大字橫跨牌樓頂部。牌樓後面有二百五十名西藏難民，他們於一個星期前抵達這裡，這時他們開始叩長頭。同時，穿卡噠制服的印度警察使勁叫他們朝後靠。NN 諾羅吉走上前來，自我介紹之後，就將達賴喇嘛領到了一輛在等候著的吉普車旁，他們還要沿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山路乘車上行，前往達賴喇嘛的新住宅斯瓦格阿什拉姆府。達賴喇嘛說：「當我來到斯瓦格阿什拉姆府時，天色已經很晚，因此我看不到什麼。第二天凌晨，我還是像往常一樣五點就醒了，我聽到的第一樣東西就是放聲唱歌的鳥兒，這樣的鳥聲只有在這裡才聽得到。喀啦呵阿呵，喀啦呵阿呵，聲音就像這樣。後來別人告訴我，這只鳥鬧得我的一位高級官員徹夜未眠。接著，我沒有念經，而只是眺望群山，觀賞景色。這是 1960 年 5 月的第一天，天氣很好，但卻很熱。」

根據諾羅吉的建議，對四幢小房子進行了翻修，以便供這些藏人居住。海克羅夫特府原為縣長的住宅，重新起名為斯瓦格阿什拉姆府，即「天府」，被選定用作達賴喇嘛的住宅。這所住宅距麥克累德甘基大約四分之一英里，它位於山坡西部邊緣的一塊平地上，這裡地勢險峻，整個建築似乎就修在一塊懸掛在空中的岩石上，而房子本身幾乎沒有幾扇窗戶，是一座有三十二間房的平房。房間有一些活動天窗，冬天就靠幾個小壁爐取暖。因為地方不夠，房子的前端伸向兩邊，這上面有兩個大凸窗，向外突出；凸窗下面是門廊，頽瞰一條狹窄的走道，再往下二十英尺的地方有一道石牆。牆下有一個草坪，草坪以前用作網球場，但不久之後將成為接見坪。後面有三間外屋，其中包括廚房，這三間屋沿山而上，一間比一間高，一間比一間小。三幢別墅已經作了準備，供八十名政府官員居住，而達賴喇嘛的高、初級經師和新德里的聯絡官的住處則相距更遠。斯瓦格阿什拉姆府配有警衛室，拉了鐵絲網，後來還修建了一座高高的混泥土大門；這張大門建在松樹密布的翠綠山坡上，顯得極不和諧，不過這倒是居住在這座僻靜別墅裏人的地位的唯一見證。

自從來到達蘭薩拉的第一天起，達賴喇嘛就意識到他在林中十分孤獨。那二百五十名難民幾個星期之後離開了這裡，因為他們要去築路，留在麥克累德甘基的就只剩下了諾羅吉。諾羅吉常來，他給這些藏人提供了種種東西，從毯子、衛生用品、熱水瓶到食油和雨傘。斯瓦格阿什拉姆府十分擁擠，達賴喇嘛修道士式的臥室、住室和辦公室全在房子的前部；後面住著他的母親、兩個姐妹、姐夫 PT 達拉、管理服裝的堪布、負責儀式的堪布、管理繕食的堪布、大管家以及譯倉和翻譯。西

藏衛兵和印度衛兵在巡邏站崗，只留下了門前一塊供自由活動的地方。達賴喇嘛來到這裡不久，就馬上開始了步行爬山活動，有時爬到了高一萬六千英尺的山口，到了芒鋒的鼻子下面，然後下山來到叫做特里安德的徒步旅遊旅館過夜。陪他爬山的只有幾個人，達賴喇嘛回憶說：「我們常常爬高山陡坡，如果那些印度衛兵跟著我們爬，那對他們可真是很不容易。這些可憐的傢伙，他們腳踏笨重的靴子，鞋跟上還釘著光滑的釘子，而且他們還扛著大步槍。因此，我們叫他們把槍放下，就在山下等我們回來。我們的關係相處很好，我們經常在林中找上一塊好草坪，用來喝茶吃野餐，我的確非常喜歡這樣做。這是在達蘭薩拉的新經歷之一，自有其特殊的韻味。」

達賴喇嘛在斯瓦格阿什拉姆府的生活與西藏的生活全然不同。它的苦處包括每逢雨季期間，他的床頭天花板周圍直漏水，每天可以接二、三桶；它的樂處是，第一個冬天他們就堆雪人，打雪仗，在大客廳裏打乒乓球；這裡也是丹增嘉措與他母親進餐的地方。下午五點工作結束後，常常在門廊前的草坪上打一場羽毛球。他們還餵養了一些新奇的寵物，其中有一隻小鹿，還有幾只獨立意識很強的拉薩「阿普索」狗，這些動物增強了家裡的隨和氣氛。

儘管達賴喇嘛在斯瓦格阿什拉姆府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宗教活動，但他的大部分仍集中用於如何解除難民的困境。通過在國外重新振興西藏文化事業，為西藏進行一場有建設意義的鬥爭。丹增嘉措相信，北京企圖統治他的祖國的努力勢必歸於失敗。此外，付出這樣的努力不僅能防止難民社團的崩潰，而且給西藏的現代化提供了機會，當然這只是開始階段的現代化。一旦西藏重新獲得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說，難民社團也就為未來的西藏樹立了榜樣。

第一步，政府必須重新改組。噶廈將莫蒂梅爾別墅用作秘書處，噶倫和工作人員分佈在六個部門：內政、外交、宗教文化、教育、財政和安全。在新德里成立了一個局，這個局在藏人與印度政府和給難民提供援助的各個國際救濟組織之間起聯絡作用。這個局下設四個辦事處，分別設在紐約、日內瓦、東京和加德滿都，每個辦事處充當流亡政府的非正式外交結構。在西藏，文職官員的品第分為七級，現在新成了十級。同時，達賴喇嘛在印度律師的幫助下，正在著手起草一部民主憲法，將來要根據這部憲法，產生西藏歷史上第一個經選舉組建的政府。然而，復興卻是眼前的迫切任務，達賴喇嘛說：「在我們剛開始工作時，在我們那些當權人物當中存在著兩個派別。一個派別認為：我們西藏人該集中在印度北部地區；而另一派別——其中包括我自己——則認為，我們究竟居住在何處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們能找到一塊地方安居樂業，這樣我們就能保存西藏的特點、西藏的文化和種族。」最後，還是達賴喇嘛的觀點正確，因為印度北部僅管離西藏邊境很近，十分理想，但卻缺乏沒有被人佔用的大片土地。尼赫魯總統得知藏人的願望之後，就徵求了印度南部人口較少的各邦邦長的意見，請他們提供無人佔用的農村地盤。卡納塔克邦作出了積極的反映，提供了一片無人居住的叢林，它位於起伏的丘陵地帶，在邁索爾西面五十二英里處。正如達蘭薩拉和新德里聯合組成的調查組不久以後所發現的那樣，這塊土地是一片荒原，只有一條通往邁索爾的公路，公路沿線有幾個原始村莊。無論如何，這裡的潛力同達蘭薩拉的潛力相比不相上下；藏人在這塊土地上能夠獲得的任何成功，都會成為他們自己的功績。

1960年12月的第二個星期，也就是西藏難民抵達印度後差不多兩年時，第一批西藏難民六百六十六人離開了他們在北部的若干營地，前往南方興建永久性家園。羅桑江村是農民，十分健壯，鷹鉤鼻，他成了這個難民營第一任村長。他回憶說：「誰也不知道我們去哪裡。一位西藏官員告訴我們，我們這些人被選去開墾新的土地。接著，幾個星期之後他又來了，叫我們坐上一輛專列火車朝南開了三天，才到終點站。這是個大城市，大客車已在車站等候我們。汽車載著我們直奔鄉村，一直朝前走啊走啊，終於我們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這裡有一片帳篷，紮在叢林中間的一塊空地上。」

這一片新叢林不同於大多數難民穿過的不丹和阿薩姆邦的亞熱帶雨季森林。這片新叢林地處印度次大陸心臟，從心理上和地理上而言都十分偏僻。這些難民乘車路過了幾個村莊，村莊的房屋是用泥土和枝條砌成的。村莊裡到處都吊著一串串顏色鮮艷的紅辣椒、香蕉和芒果。村民們是小個子，黑皮膚，半土著居民，看上去完全不同。先前，這些藏人總是在想著轉移，現在大客車走了之後，只留下了幾個印度警察幫助他們組織安家。這些定居在此地的難民認識到，他們周圍的原始森林是大象、老虎、野豬以及其他危險動物的棲息地。他們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一頂大帳篷周圍的防禦土牆裏插上了一些長長的竹簽。他們在帳篷裏製作了一個代用佛龕，上面擺著達賴喇嘛送給他們的一尊寶貴的佛祖像。夜幕降臨時，他們挖了一些土坑，裏面放上石頭，做了第一頓飯。江村繼續說：「我們強迫自己吃飯，但我們都感到既害怕又難過，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許多人毫無辦法，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們可以聽到叢林中野獸的咆哮聲。這裡不像西藏，我們什麼也看不見，無論你朝那個方向瞧，除了樹木之外，什麼也見不著。」

翌日，天剛剛破曉，一些喇嘛就坐在帳篷裏的聖佛前，開始為成功念經。他們就這樣念經，持續了一個星期。接著砍伐、燒毀森林的戰鬥宣布開始。一家五口人可以分到一把斧頭、一把鋸子和一把大砍刀。印度政府每天付給兩個盧比(即美金二十分)作為工資。每隔六個月就要從北方新來一批難民，每批五百人。這個難民營叫比拉庫佩難民營，它在鬥爭中贏得了自己的生存。江村搖搖頭說：「炎熱最難忍受，整整兩年時間，煙火淹沒了周圍的一切--甚至在雨季也是如此。那時，我們得在傾盆大雨中幹活，晚上回到家時，看到的是帳篷給吹到在地的情景。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告別了人世。他們在棄世前，要回憶西藏，看看他們目前所在的地方，然後就瞑目了。」新開了一些地之後，出現了新的危險。有些人伐木，他們離帳篷最遠，常常遇見發怒的大象而被它們踩死。每塊空地周圍必須修建若干防衛室，形成一個圈；這些房子裏日夜都有哨兵值班，他們帶著鋅皮罐頭筒、鑼和大爆竹，既可以報警，又可以用來嚇走來犯的野獸。與大象戰鬥頗帶神話色彩；難民們帶著彈弓和其他自製武器，小心翼翼地走在新開的道路上；而有些人則單個地遇上了大象，他們只好爬到樹上躲一兩天，然後才能回到帳篷，這樣的事情並非少見。這些困在林中的移民處於艱難之際時，達賴喇嘛來此視察。他回憶說：「在我第一次訪問比拉庫佩期間，那裡的人為我特製了一頂帳篷，竹牆帆布頂。但是，它仍然遮擋不了砍伐燒毀森林所帶來的大量灰塵。由於這些原因，所以藏人情緒非常低落。他們的死亡率很高。因為烈日炎炎和燒樹的緣故，所以全部藏民都變得又黑又瘦。」普遍感到毫無希望。面對這種情況，達賴喇嘛做了他力所能及的鼓勵工作--保證最後能夠得到繁榮。他說：「每逢我參觀大難民營時，我總是向藏人保證我們會獲勝。我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年復一年之後，形勢終於發生了變化。這時情況好轉，我跟人們開玩笑，說他們的臉龐曾經又黑又瘦，現在已經變得膚色健康，笑容滿面了。我告訴他們，過去我只是許許空口願而已，因為當時我也不能給這些可憐的人們提供任何東西。但這些藏人對我講的話，總是深信不疑，照著去做，結果我們勝利了。這就如同澆灌即將枯萎的陳花一樣，如果人們懷著幾分希望去澆灌這朵陳花，它就會立即變得鮮艷，充滿生氣。」

1962年初，第一批難民帶著他們視為珍寶的酥油燈、祭碗和繫上哈達的達賴喇嘛照片，搬進一百多幢磚瓦房。比拉庫佩難民營最初只有一個營隊，這第一個營隊最後發展到二十個營隊，佔地五千五百公頃，人口為一萬人。這第一個營隊幾乎對後來的二十年發展起來的每一座難民營來說都是榜樣。在它成立之後不過一年，這裡的居民和第二農民營的居民一道親眼看著他們的名字毫無規則地從一個箱子中抽了出來，然後每人分到了一公頃的土地。從此以後，將比拉庫佩改變成為欣欣向榮的農業區的戰鬥揭開了序幕。

雖然這裡土地肥沃，但成功並非易事。1961年他們在二十八公頃的土地上種了一季小扁豆、棉花、煙葉和芫荽，結果收成不佳。接著他們在幾乎十倍於此的土地上撒下了棉花種子和煙草種子，結果又全部歉收，真是令人沮喪。在印度南部從事農業與西藏獨特的高原農業截然不同，看上去難民似乎要歸於失敗。這時瑞士技術合作公司這一救濟組織的一位農業顧問來到這裡進行指導，他進行了一些土壤試驗後確定：應該種玉米，施化肥，用拖拉機耕地。新方法和新作物獲得了成功。種植玉米非常好，到該難民營建營後六年的1966年，這個難民營糧食已經能夠自給。此後三年，又種了七萬七千棵果樹，建了一個牛奶場和家禽場，並種了第二季作物，是一種穀類作物，使收成多樣化。比拉庫佩從它的農產品中獲得了很大的收益。

當時，印度、尼泊爾和不丹境內共有三十八個難民營，共有差不多六萬人，他們開始建營時地址都是在當地人認為太偏僻或不宜居住的地方。蓋好房子之後，許多難民都認為農業難以經營，只好依靠織地毯等西藏傳統手工藝品掙錢。但是，到八十年代時，仍在築路的藏民只有三千人，而約四十四個難民營的居民人數幾乎達十萬人，貿易、政治以及宗教的紐帶將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都視達蘭薩拉為自己的首都。其餘難民移居到了世界各地的二十四個國家。

與藏人關係密切的許多國際救濟機構逐漸認為，藏人事業上的努力是經濟上的奇跡，這些難民的復興事業也就受到這一奇跡進一步的推進。流亡者們努力興辦的一些工廠，其中包括一家尼龍廠、一家石灰廠、一個石灰採石場和一家纖維玻璃廠，全部失敗了；而他們卻發現，通過農業合作社進行的集體供銷，在混亂不堪的印度經濟中卻大有潛力，這一次又是比拉庫佩帶頭。1964年這個難民營的六個營隊成立名叫「維護實現西藏傳統的願望」合作社。十六年之後，比拉庫佩的十四個「新」營隊創建了第二個合作社，名叫「重獲幸福生活」合作社。這些合作社依靠從瑞士技術合作公司和邁索爾復興和農業開發署獲得的基金，改變了這個難民營的面貌。難民營的各個村莊興辦了餐館和商店。為了促進生產，購買了種子、化肥、卡車、麵粉廠設備和碾米機；興辦了一個大車間，可以生產家具、大車、刀、斧和農具，以便在這些方面能夠做到自給。年輕人被派往挪威、丹麥和伊朗學習拖拉機修理。他們回來之後，擴大了拖拉機隊。這些拖拉機型號各色各樣，有伊斯各特牌拖拉機，蘇聯產的澤托牌拖拉機以及福特牌拖拉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辦起了一個修理車間，這個車間很快就擔負起周圍五十英里範圍內的修理業務。

一方面，這些合作社將難民營的產品銷到遠達孟買和加爾各達這兩個城市；另一方面，難民個人也在繼續從事貿易。賣毛線衫這種貿易幾乎供養了四分之一的難民。西藏人在噶倫堡興辦手編毛線衫業很成功，數千難民看到了足夠一點，並加以利用。他們開始銷售綠色、紫色、黃色、紅色毛線衫，這些都是機制產品。這些產品是從以前沒有得到資助的旁遮普邦那些工廠購進的。每年冬天，難民們就在印度境內商場集市的人行道上，辦起了商店，商店是用錫皮箱子改造而成的，難民們在這方面獲得了成功。在六十年代後五年，西藏毛線衫風靡印度次大陸。西藏毛線衫的突然風行，使得每個工人的平均工資高達五千盧比，合六百二十六美元，比修路工的工資高出七倍多。這樣流動式的銷售毛線衫，不僅使藏人的飲食得到了改善，而且滿足了藏人原來對貿易和遊歷的喜好。這樣藏人廣泛接觸了自己的居住國，並利用這一機會推進自己的事業；銷售出去的每一件毛線衫、絨線帽和哈達都附帶了一張小卡片，上面解釋了難民是怎樣被迫「離開世界屋脊來到次大陸的炎熱平原的」。

另一財政來源，就是達賴喇嘛自己的基金。1950年，當這位西藏領袖從拉薩逃往亞東時，他帶了一千多頭馱畜，每一頭載有一百二十磅重的財寶。這些馱畜被送往錫金，以備丹增嘉措還將被迫逃出西藏，其中四十頭運的是金子，六百頭運的是銀，其餘的馱畜運的是具有數百年歷史的硬幣。雖然達賴喇嘛回到了布達拉宮，但他的這一小部分家財卻沒有運回去。這筆財富只由一名不知實情的萊帕查（2）哨兵看守，在錫金王棄置的馬廄裏埋藏了九年，馬廄位於甘托克宮殿下方的山坡上。1960年的一天早上拂曉前，一長列車離開錫金首都前往加爾各答，錫金的半數人都驚醒了，大多數人認為國王在逃離祖國。當這筆財富安安穩穩地存放在加爾各答一家銀行的地下倉庫時，真相才大白。這件事引起了印度新聞界對法王這筆巨大財富的種種猜測。實際上，當這筆財產換成貨幣和後來進行投資時，實際只有九十八萬七千五百美元。這筆錢成了神聖的達賴喇嘛的慈善信託基金，它幾乎為流亡藏人興辦任何事業提供了種子基金。

由於經濟上有了保證，難民的文化復興事業也有了肯定的依靠。達賴喇嘛從一開始到達斯瓦格阿什拉姆府起，就著手這方面的復興工作。他解釋說：「我們將自己的文化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我們確定只需要作為歷史而載入書本的；第二類則包括現在可以帶來實際利益的任何東西，我們確信它們必須作為活的東西保存下來。因此，我拋棄了我們許多舊的傳統式-無論怎樣，我決定讓它們滾蛋。但是，我們的表演藝術、文學、科學和宗教，還有那些我們用作生計的技藝-繪畫、金屬工藝、建築、木製品和地毯，這些東西我們都作出了艱苦的努力要維護保存下來。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採用了一些現代方法，儘管這些方法對我們來說完全是新的東西，因而也是困難重重的。」

宗教作為西藏文明的源頭，居於優先地位。西藏與受到佛教熏陶的其他亞洲國家不一樣，唯獨它擁有佛經全集，全套顯宗經典，全套密宗經典，以及顯密的各種儀式，特別重要的是師徒世系，這是通過口傳保存下來的，它是追溯世界大宗教中歷史最悠久的佛教起源的一串串連貫的線索。西藏的僧侶有六十多萬(3)活佛有四千，但逃跑出來的僅分為七千人和幾百人，留下來的僧人被迫還俗。新來的難民還帶了消息，說這個國家的六千五百二十四座寺院裡面的東西正在被中國人拆毀。這是一些中國人組成的小分隊的專門任務，他們將這些珍貴的手工藝品運會國內，要麼熔化成錠，要麼通過香港在國際古董市場上出賣。每當築路營中死去一位學者，就意味著喪失了幾個世紀的知識學問，迫使達賴喇嘛採取緊急措施，讓他們先於那些普通藏胞擺脫這種致命的築路勞動。

到1959年8月止，布克薩杜瓦爾的最後一批難民也被送到築路營去了，它開始接受難民中的一批又一批僧人，集中這些人是為了搶救佛法。翌年，重新命名的布克薩喇嘛修道所的營房裏，已居住著將近一千五百名喇嘛。他們早上五點起床，然後集中在中間的院落裏念經，接著按紮倉分開活動，誦經、辯經和接受高級學者以及活佛的個別指導。這些喇嘛四處到築路營中搜尋，凡是能找到的經書他們全蒐集起來，從中開始用石墨寫下了二百多卷主要著作-但這僅僅只是西藏一千二百年以來的哲學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在印度，格魯派的信徒佔絕對多數，其他三個教派的信徒大都在錫金、不丹和尼泊爾的寺院裏找到了庇護所。格西學位的考試僅僅停了一年，又恢復了。看上去他們的宗教形勢似乎迅速得到好轉。接著喇嘛開始死亡。在這裡，一座營房裏有六十六個人居住。竹屋之間相隔的距離只有六英寸，肺結核頓時蔓延開來。每天早上念經完畢之後，二、三百人在高達二十英尺的鐵絲網內排隊，站在炎熱的陽光下等候幾個小時，輪著接受這個營地的唯一醫務工作者的檢查。康曲仁布齊是色拉寺的喇嘛，從這個營地始建以來，他就一直住在這裏。他回憶說：「我們熱切挽救自己的宗教。但幾年之後，死去的喇嘛數目急劇增加，活著的人情不自禁地懷疑，我們是否可以活著離開這塊地方。看到我們的朋友變得又黑又瘦，牙齒發黑，我們總是感到情緒低落，壓抑難受。我們之所以能夠忍受這些苦難，是因為明白，繼承西藏的宗教傳統全靠我們這些人了。」

1968年，比拉庫佩和蒙戈德這些大難民營終於準備開始接受倖存者。這些喇嘛移居南部之後，他們從事農業，逐漸修建了一百五十多家新寺院，裡面充滿了剛入佛門的小喇嘛，他們還塑造了西藏流亡生活中最生動的佛像。這些寺院對一系列文化機構起了補充作用，文化機構基本上設在達蘭薩拉。

第一個機構是西藏舞蹈戲劇協會，它是達賴喇嘛抵達斯瓦格阿什拉姆府三個月之後創建的。這個協會共有成員七十四人，其中只有二十人以前在西藏是演員。他們設法在自己的全部節目中，保留了四個經改編縮短了的拉姆戲(這些戲經常長達一個星期，在西藏的大城鎮中演出)、兩個歷史劇和不少的喇嘛舞蹈。他們還重新組建了一個進行曲樂隊，這支樂隊經常為一年一度在達蘭薩拉舉行的3月10日集會演奏，這是慶祝拉薩起義的集會。

一年之後的1961年10月，益西丹增創建了藏醫中心。拉薩培養的醫生逃出來的僅有三人，他是其中一個。獨一無二的藏醫是兩千一百多年以來在西藏發展而成的，挽救它的是一家小醫院。這裡有製藥房、占星學部和學校。到七十年代中期，從這裡畢業的學生，足以能夠給那些大難民營配備藏醫醫生了。成立的第三個大的機構西藏文獻檔案圖書館，它於1971年11月份開館，設在一座華麗的藏式建築內，位於政府新秘書處的大院內，這裡叫崗慶吉雄。西藏文獻檔案館在達蘭薩拉和麥克累德甘基之間，它很快就成了吸引數百名亞洲和歐洲學者的磁石，這些學者以前對西藏文化接觸甚少。直至1984年，這個圖書館通過多次教學計劃和蒐集計劃，匯集的書籍達五千多卷，估計為西藏文獻的百分之四十一。其餘的文獻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銷毀。新德里的西藏館建於1965年，它對圖書館的工作起了很多補充作用。全印廣播電台的藏語部得到了擴大，還出版發行了一些難民刊物。但是，在文化計劃中，最廣泛、最重要的是學校體制，它是達賴喇嘛創造的，旨在維護西藏的特性，同時又要使得「流亡的一代」能夠接觸現代世界。全體難民和僧俗大眾無一例外地認為，教育是他們未來事業最根本的希望所在。

單巴坐上客車離開巴瓦納的築路營，前往達蘭薩拉幼兒園。汽車下午很早就到達麥克累德甘基，這些孩子交到了達賴喇嘛的姐姐、幼兒園主任次仁卓瑪夫人和喇嘛土登尼吉手中。孩子們被領著穿過森林，沿著一條蜿蜒的土路來到了康寧別墅。這是一座糧倉式的建築，白粉石牆，鋅板屋頂；到現在幾乎二百名孤兒和半孤兒在這裡已經居住了五個月。

康寧別墅的正式名稱是西藏難民幼兒園。達賴喇嘛抵達達蘭薩大之後還不到三個星期，就創辦了這個幼兒園。促使成立這個幼兒園的直接原因是，有報告說一個難民集團在從密薩瑪裡轉移到拉達克的工地途中，恰遇大雪受阻，他們當中的兒童一個個夭折。五十一名兒童從這些難民營帶到了這裡，安置在西藏政府工作人員的房子裏。直到1960年5月17日，根據達賴喇嘛姐姐的指示，開辦了這個幼兒園，這種情況才告結束。孩子們與築路工作分手之後，沒有幾個人死亡，不過大都數都患有疾病。這些疾病範圍很廣，從肺結核到痢疾、感冒、疥瘡以及嚴重的營養不良。

單巴的痢疾早已治愈，但他卻一直鬱鬱寡歡，不願交談。他身上的蝨子給清除了一遍，剃了個頭，給他發了西服，兩條短褲，兩件襯衣，這還是生平第一次。他與其他孩子坐成一長列等待吃晚飯，晚飯是大米和煮熟的小扁豆，盛在打製成的碗中。然後，他和另外三十個小伙伴將自己的毯子鋪在康寧別墅裏一個房間的地板上，準備睡覺。病號和健康兒童混雜一團，因為病號太多無法隔離。翌日上午，首先是祈禱、做操，接著上了一堂課，學習藏文和英文字母，下午無人管，讓孩子們自己玩耍。自始至終，單巴拒不參入玩耍的行列。但一個月後，由於他的房間裏每天晚上都要塞入一百二十名兒童，擠得誰也無法動彈，他終於將注意力集中於眼下的情況了。一天，在院子裏踢足球時，球踢到了他跟前，單巴將球踢回去之後，就加入了其他男孩子的行列。從這時起，他那不願動彈的憂鬱情緒開始逐漸消除。

單巴與達賴喇嘛有過三次接觸，這是激發他對生活產生興趣的主要原因。一天上午，大孩子被人領著，穿過森林，來到斯瓦格阿什拉姆府觀看念經。這是單巴第一次觀看宗教儀式，他坐在天府門廊的台階上，凝視坐在寶座上的達賴喇嘛。他周圍有一些喇嘛，他們在做密宗儀式的優美手勢，同時還一邊背誦經文。單巴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與平常不同，這種感覺遠遠超過了幼兒園給他的那些物質上的利益，使他感到安穩而有了依靠。

他第二接觸達賴喇嘛時，氣氛更為隨和。當時，丹增嘉措從斯瓦阿什拉姆府步行來到康寧別墅，他要和孩子們一起吃傳統藏式晚餐「土巴」(即麵湯)。達賴喇嘛到達之前，全幼兒園的人都非常激動，因為沒有幾個成年老師在西藏這樣接近過他們的領袖。孩子們就像部隊的一個團集合在閱兵廣場上一樣，迎接達賴喇嘛。他隨即要看看孩子們在學習什麼。單巴被挑出來，在大家面前他在石板上寫下了ABC幾個字母。達賴喇嘛細心觀看了片刻，然後在單巴的肩膀上親熱地拍了一下，說：「很好。」單巴回憶時笑出了聲，「當然，我從那會兒起就喜歡上了他。」

第三次見到達賴喇嘛，是單巴離開幼兒園的時候。一百六十名年齡最大的孩子被挑了出來。他們要去穆蘇裡學校念書，這是一年前創建的的第一所流亡學校。單巴與這些孩子一道步行來到斯瓦格阿什拉姆府。達賴喇嘛坐在門廊上，孩子們簇擁在他的周圍。他叫孩子們要努力學習，這樣他們以後就能夠幫助那些沒有獲得像他們這種機會的人們。達賴喇嘛的話音剛落，單巴就領著大夥背誦「十四世達賴喇嘛萬歲壽詞」共十一節。單巴回憶說：「我的朋友們說，我緊張得渾身發抖，整段整段地給忘了。但我想，我還是正確地指揮了這次合誦，至少這幾句沒錯，『雪域的保護神丹增嘉措，佛祖保佑您，祝願您長生不老，萬壽無疆，您的願望輕而易舉就可實現。』」

達賴喇嘛說：「在西藏時，我就懷有興辦一所現代化學校的強烈願望。從五十年代初期起，我迫切地感到很有必要。雖然我對怎樣興辦這樣的學校一無所知，但我反復思考的就是這一點，我們必須興辦一所現代化的學校。但我甚至還不知道要開多少門課。」1959年達賴喇嘛外出朝佛，他剛到穆索里，就開始在城裡尋找一座合適的房子，以便實施他的計劃。終於他找到一處舊住宅，叫基爾達爾公館。它是一位營地軍官的房產，在印度分裂暴亂時期，房間裏死了一些穆斯林教徒。這位軍官確信他們的幽靈還常飄游到這棟房子裡來，因此很樂於將它低價出售。這座房子位於離伯拉別墅不遠的一處岩石平地上，有八個房間，房間的狀況一天不如一天。這幾個房間於1960年3月3日對五十名年輕藏人開放——有喇嘛、有康巴遊擊隊戰士以及政府官員，他們的年齡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不等。雖然達賴喇嘛並不精於現代教育，但兩位最近逃出來的流亡者卻在這方面見長，他們是瑪麗茶仁和吉米茶仁。他們是在印度接受教育的第一批藏人，穆索里學校完全交給他們領導。

茶仁夫婦是開創性的人物。吉米茶仁是王子，是錫金王的侄兒，瑪麗是旺秋·甲布茶仁的女兒，茶仁是十三世達賴喇嘛手下的噶倫，西藏八世紀名醫宇妥·雲登貢布的後裔。雖然茶仁夫婦在他們這一代人當中是倡導現代化的先鋒，但他們卻能免遭排外思想嚴重的當權人物的指責，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出身背景作為擋箭牌。在流亡時代，茶仁夫婦對於正在成熟的政府來說是無價之寶。

單巴到達新學校後，在茶仁夫婦的指引下，他首次得出了對自己處境有實際意義的解釋。他回憶說：「我們孩子都管他們叫媽媽和爸爸，他們的一舉一動也像父母。不久，孩子們人數達到了三、四百人，但茶仁夫婦仍對每個孩子都很關心。他們反復解釋我們的遭遇，課堂上講，會議上講，私下也講。尤其是，他們說我們是西藏人，我們被中國人趕了出來，我們必須想辦法回去，讓祖國重新回到我們的手中，這就是我們這些孩子的責任；我們必須為全體西藏人民謀利益，不要只為我們自己服務。由於反復聽到他們講這一點，我再也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劇之中了。我開始明白，我還有更大的責任，茶仁夫婦讓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他們使孩子們懂得了這一點。」

在茶仁夫婦的帶動下，又開辦了兩所寄宿制學校，一所辦在西姆拉，另一所辦在大吉嶺。然後達賴喇嘛與印度政府進行了接觸，提出了一個長遠規劃。1961年5月，在新德里的一次私人午宴上，達賴喇嘛與尼赫魯總理進行了協商，他得到了尼赫魯的支持，計劃在印度教育部設立一個獨立機構，叫西藏學校協會。協會的目標是興辦寄宿走讀學校網，教員由印度人和西藏人擔任。教育是尼赫魯既能夠放手援助藏人，又不致於招來政治後果的一個領域，他對藏人的援助非常慷慨。截止1964年，協會在各難民營已擁有七所寄宿學校（基本上每所學校的學生有五百人）、四所走讀學校，還有設在築路營地上的三所過渡性學校和由該協會間接資助的一些學校。但仍然存在著障礙，在興辦大型寄宿學校時，由於缺乏平地等必要條件，產生了巨大的困難。由於藏人住在山區，沒有幾座建築周圍有平地，學校不得不接受只要能夠到手的房子，然後再去進行改造，這一工作大多數是由孩子們擔負的。這些建築有：大吉嶺北孟加拉騎兵部隊的舊軍營；阿不山被遺棄的比卡內爾大君的宮殿；已停止營業的潘奇馬裡皇家飯店；噶倫堡的一個羊毛倉庫，自西藏貿易的全盛時期以來這個倉庫就從未用過。到1966年幾乎有七千名年輕人離開了築路營，但是，其中一半已超過年齡。有很多人被迫輟學，因為繼續下去他們到二十歲還讀不完中學。教師問題也有些麻煩，因為西藏學校協會仍不是印度學校體制的機構健全的組成部分，所以教員擔心工作期限沒有保障，不願意到偏遠的難民營去工作。由於只有具備大學水平的教員才能用英語（這一語言媒介是達賴喇嘛親自確定的）教學，因此很難找到教師開展教學工作。最後還是顧了一些人，但他們卻無法同西藏教員進行交談；直到後來新德里印發了一份有五百個單詞的印度語和藏語詞匯對照表，這種情況才告結束。

不過，孩子們還是開始學習了，他們是西藏歷史上見到世界地圖和聽說世界上還存在其他國家的第一代藏人。正像單巴所說的那樣：「我們開始學地理時，真是難以相信。老師讓我們看了地球儀，並給我們看了一些畫片，上面有各國人民，但在沒有徹底解釋清楚之前，我很難理解世界真有這麼大，我總是弄不明白。在西藏，對我們來說，印度就是地球的末端。」這些青少年的好奇心特別受到了西方援助工作人員的激發，因為他們給這些孩子們描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們這些

青少年第一次見到的白種人，孩子們給他們安上了一個綽號，叫「黃腦殼」，因為他們的頭髮是淡黃色。與此同時，西藏教員則正在達蘭薩拉的師範學校進行傳統的學習，教材委員會和出版印刷機構很快發行了一年級到中學畢業的教學大綱，課程有藏語、歷史、文學以及宗教。七十年代初期，西藏學校協會改名為中央西藏學校管理會，迄今為止，這個局下屬的三十二所學校的在校學生已有九千人；十年之後，五十二所學校的在校學生人數為一萬五千人，其中大部分學生已決定繼續升大學。按照西藏的學術傳統進行的高級階段的學習，由高等西藏研究所和佛學院負責；前者於1968年元月創辦於貝拿勒斯，後者於五年之後建校於達蘭薩拉。為了繼續照顧好孤兒，成立了好些西藏孤兒院。第一座是瑪麗茶仁於1962年開辦的穆蘇裡孤兒院；截止六十年代末，穆蘇裡孤兒院在院孤兒六百名，住在二十五棟藏式房子裡，保育員長期住孤兒院，它是僅次於達蘭薩拉幼兒園的孤兒院。達蘭薩拉幼兒園已更名為西藏兒童村，達賴喇嘛的妹妹白瑪甲布擔任主任之後，西藏兒童村遷移到了位於兵站上方的埃格頓府，並開始在山坡上迅速擴建。到七十年代末時，這個兒童村如一座城鎮一般，它收容的孤兒超過了一千人，年齡從六個月到十八歲不等。聯合國的下屬機構和其他組織認為它是難民兒童恢復成長的典範，在流亡生活中它無可爭辯地是辦得最成功的事業。

單巴來到穆蘇裡兩年之後，已滿十四歲，這是他進了聖加布里埃爾學校，它是台拉登城外的一所中等學校。與他同去的還有難民中的那些大孩子，因為這些人年齡太大，無法再進西藏人剛興辦的那些學校。在這以後的十年，單巴不得不在完全是異國他鄉情調的印度學校中生活。他描述說：「我們來到聖加布里埃爾學校之後，儘管這裡還有六名藏人，但總感到自己是外來人，而且這種意識越來越強烈。我們與其他人接觸越多，越感到孤獨。聽說過西藏的人們屈指可數，其餘的人總是問：『你們的父親在哪裡？他是乾什麼的？你的兄弟姐妹都是誰？』他們每問一次，我們就禁不住要回憶過去--我們是難民，我們沒有祖國。但這些人對我們究竟是什麼人，仍然一無所知。總的來說，這倒使我進一步認識到自己是西藏人。奪回西藏，使西藏重新回到我們手中，我們的這一願望變得越來越迫切。」

單巴轉到噶倫堡格蘭姆博士辦的教會學校之後，他感到大家普遍蔑視藏人，認為藏人「落後，不開化」。他非常氣憤，但氣憤卻變成了競爭的動力。單巴在格蘭姆博士的教會學校待了五年半，他學業優異，幾乎是每一個運動隊的隊長，先後當上了學校的學監、學生會副主席，最後當上了學生會主席。單巴的名子刻在學校的紀念牌上，這上面記載著優秀學生名單。由於單巴的成績出色，畢業時學校為了表彰他，專門召開了一次大會--這是格蘭姆博士的學校第一次舉行這樣的會議。單巴在評價自己受到妹妹和母親死亡的打擊之後，性格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時說：「我不得不依靠自己。我從內心深處認識到，除非自己創造，我就會一無所有。我認為是這種意識在推動為前進；我喪失了西藏，喪失了母親，家破人亡--喪失了這一切。為了自己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利益--無論是個人的損失還是國家的損失都十分慘重，我別無他路，只有從新將這一切建設起來。」

馬德拉斯基督教學院是印度最負盛的學院之一。單巴來到這個學校時，他發現自己是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一位藏人，成了不斷受到種族歧視侵擾的對象。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在考慮退學，因為諷刺譏笑多得無法忍受。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來到了校長辦公室，要求準許他向全院師生發表講話。單巴說：「為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感到非常失望和煩惱。不僅學生對西藏一無所知，而且教師也幾乎是如此。我說：『我不能再沒完沒了地向人們解釋我是哪國人，因此我想對全校師生發表講話。』幾天之後，單巴獨自一人走上了空無他人的舞台，面對座得滿滿一禮堂的在校生，這些觀眾覺得好笑。開始單巴很緊張，念著簡要勾劃了西藏歷史的講話稿。當他念到拉薩起義以及後來的難民出逃時，他突然發現自己推開了講話稿在直接講述自己的生活經歷。除了在兩年前，他跟一個關係密切的老師簡單介紹過這些經歷外，他在公眾場合談自己的痛苦經歷，還是第一次。講話結束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單巴仍像在格蘭姆博士的學校一樣學業優秀，現在學習是為了要成為醫生，因為在當時，藏人當中只有三、四個西方學習培養出來的醫生，儘管他向援助組織申請了三年，但他卻沒有找到一個讓他進醫學院的資助人。因此，雖然長期以來單巴次仁的學業優異，但展現在他面前的仍然是了無前途的世界。這似乎是一次大失敗。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去與他父親一起生活當農民，當時他父親居住在比拉庫佩。

單巴乘坐火車去內地，從運動東部的海濱來到了邁索爾。接著他爬上了一輛破破爛爛的鄉間大客車，朝南行駛五十英里，前往考維里河谷。汽車兩旁的原野變得越來越荒無人煙，連公路兩旁的地方也完全被叢林覆蓋。在考維里小鎮，他下了車，步行前往難民營。他渡過了考維里河，看到比拉庫佩的男男女女在大石頭上晾曬洗過的衣服。大石頭上用鮮艷的基色寫下了西藏全國所共享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在難民營工場附近他下了大路後，來到了完全是西藏氣氛的環境。這裡一片鬱鬱蔥蔥，田野起伏，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線。一排排草垛縱橫交錯，草垛上插著經幡。比拉庫佩有六座寺院，其中包括重建的色拉寺和扎什倫布寺，它們被一些村莊、學習、難民營辦公室和一家醫院分隔開來。各個營地都被一圈鮮艷的紫紅

色、黃色開花灌木林所包圍。在連接各個營地的長道上行走著一隊喇嘛、農夫，還有背著孩子的婦女，他們手裡拿著念珠。只有那炎熱的氣候和難民營周圍叢林覆蓋的小山才能證明，比拉庫佩並不是在西藏境內。

單巴自從到馬德拉斯學習以後，常來比拉庫佩看看。從他離開巴瓦納的築路營到這段時間共有八年，但他只見過父親三次。自從離開西藏以來，現在父子又團聚了，彼此的變化一目了然。像大多數老一輩難民一樣，確白頓多死死抱住西藏舊的觀念不放。從外貌看，身體萎縮變小，膚色更黑；從情緒上說，由於緊張的勞動，他變得更易於衝動——這種情緒在西藏社會通常被壓抑住。另一方面，單巴則是環境和知識的混合產物，他的知識是他的父親所不能理解的。他們的差別反映了難民經歷的新開端：流亡中的第一代藏人已告成熟，伴隨而來的是西藏特性的變化。單巴說：「我剛開始與父親生活在一塊時，他立即強迫我，要我按照他的安排成婚。在西藏，這是正常現象。但我對父親說，這事與他毫不相干，不是他結婚，而是我結婚。」儘管確白多頓無法迫使他屈服，但其他家庭照樣繼續為後代安排婚事。在信守保守觀念方面，難民營遠遠超過了達蘭薩拉和其他的城鎮中心，有時甚至還不惜訴諸暴力。正如單巴所說的那樣：「當長頭髮、喇叭褲流傳到印度時，全體藏族青年自然加以接受；對此老一輩不能理解，他們認為這些東西很不體面。在比拉庫佩，當我們伴隨著披頭合唱團的音樂跳舞時，我們的父母真會走出家門，朝我們扔石頭。我們不予理睬，不過，當事情平息下來之後，我們會解釋說：『人們必須有所變化。現在我們是與外界共同生活。事情就是這個樣。』經過多次的耐心交談之後，他們逐漸接受了這一點。」

而更帶根本性的變化是涉及到宗教方面的變化。在流亡生活要求之下，無所不在的佛教影響自然受到削弱。儘管年輕一代根據現在學校協會的教育大綱學過達磨（佛法-編注），但他們都幾乎沒有機會將它付諸實踐。他們對佛教的社會作用也逐漸表示懷疑，而這種社會作用在以前是不容置疑的，正如比拉庫佩的一位喇嘛所說的那樣：「當我在街上遇到年輕人衝他們笑一笑時，許多人根本不答理。他們知道，我是他們的西藏同胞，但我這身長袍就像是囚服。他們認為，喇嘛是我們丟失西藏的原因。」單巴表達了與他們相同的人們的普遍觀點，他確信像西藏過去那樣極端信奉宗教，宗教也就損害了國家。他說：「宗教有餘，政治不足。從根本上看，年輕人重視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而在我父親看來，是宗教是第一，政治是第二。但我認為，我們這一代是多少世紀以來第一次持相反看法的年輕人。」

不過，至於談到年輕人和老年人對西藏事業的決心，他們卻從來沒有異意。單巴說：「當我第一次去比拉庫佩看望父母時，以及我們後來每一次見面時，他就會說：『我生在西藏，長在西藏，我也要死在西藏。我的屍骨要安葬在那裡——而不是印度。』我從這番話中獲益非淺。我的母親見到神聖的達賴喇嘛之後說：『我感到太好了。現在我可以安心瞑目了。』接著她死了。但我父親卻不是這樣，他從未停止過戰鬥。那些活著的人們——那些倖存者，他們個個都是這樣。」

單巴在比拉庫佩待了一年。他想尋找比農活更有激發性的工作幹幹，因此，他自願要求到難民營辦公室兼職工作，同時他加入了西藏青年大會的地方分會。青年大會於1970年由為數不多的一些西藏青年創建，它很快就發展成了難民社會中最大的政黨。在達蘭薩拉，青年大會召開了它的首次會議，歷時一個星期。在這次會議上，單巴第一次談到了長期以來他對西藏政治鬥爭的看法。現在，他獲得了為青年大會工作的機會。因此，他熱情很高，接管了當地成年人教育方面的工作。每晚他講課時，談身體保健，這在難民當中仍然是一個大問題。他弄到了一部電影放映機，放映有關甘地為爭取民族解放而進行非暴力（即不合作運動）的紀錄片。接著，他從母校函索了一些圖書，一次寄一個包裹，辦起了難民營唯一的圖書室。只過了幾個月時間，由於當不成醫生而產生的失望的情緒便煙消雲散。這時，他還當選為西藏青年大會比拉庫佩分會的總幹事，在青年大會的四十個分會當中比拉庫佩分會最大。這四十個分會共有會員一萬人。

單巴當選為總幹事後不久，達賴喇嘛來到比拉庫佩主持一項全營男女參加的宗教活動。達賴喇嘛接見了青年大會成員，單巴又一次見到了西藏領袖；自從達蘭薩拉幼兒園的童年時代之後，這還是他第一次目睹領袖。單巴說：「神聖的達賴喇嘛是楷模，他對我的影響最大。作為人民領袖，他情緒高昂，富有遠見。我們都知道他生活簡樸，努力工作，關心西藏人民；但當我親眼看到這一事實時，受到了很大鼓舞，激勵著我為祖國多做工作。」

幾個月之後，流亡政府的全體成員來到比拉庫佩，在難民面前舉行一年一度的報告會。單巴作為青年大會的觀察員參加了會議。會議按照達賴喇嘛1963年頒布的民主憲法進行，單巴為這一點所吸引。有一天中午休息時，昆德林先生與他們進行了交談。昆德林先生一聽到單巴是大學畢業生，結果卻在當農民，他立刻堅持要單巴離開比拉庫佩，到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去工作。接著，他指示新聞宣傳局的秘書為單巴安排工作。幾個星期之後，這個局來了封信，讓單巴擔任秘書助理。單巴說：「我接到這封信後，就與父親商量。我剛念完書，感到有責任照顧父親。我對父親講明了這一點。我還告訴他，

如果我走的話，比拉庫佩難民營辦公室就會不高興。接著我說：『這次您決定吧。到現在為止，我生活中幾乎每一個決定都是自己作的，沒與您商量。現在這件事由您來決定。』他立刻作了回答：『從我們來看，達蘭薩拉是中央政府，而這裡只是一個辦公室，它負責照顧的是居住在舊營地裡的三千人。因此，很清楚，如果你去達蘭薩拉，你對西藏人民的用處就更大。至於談到我自己，只要我知道你是在為神聖的達賴喇嘛誠心工作，那麼即使我孤單一人去世，在那些最後的日子裡甚至沒有人給我餵開水，我也絲毫不後悔。』他老人家講了這番話之後，什麼都清楚了。我說：『好吧！』我就去了達蘭薩拉。』

幾個星期之後，單巴向父親告別，一去又是六年。雖然單巴在印度已有十四年了，但除了自己的衣服之外，沒有幾件其他財產。單巴乘汽車從考維裡來到邁索爾，然後坐上了北去的火車，來到了旁遮普邦的帕坦科特。從這裡又坐汽車，來到了下達蘭薩拉的卡特瓦集市的邊緣。

在這裡，他又換乘當地的汽車，爬了半小時坡行駛五公里來到了麥克累甘基。途中，他的目光透過柵欄式的車窗，目不轉睛地盯著窗外，公路沿著松樹覆蓋的山坡通過兵站，通往兵站上方的西藏兒童村。汽車通過山澗的另一座村莊福西塞村之後，那道錠子式的山脊映入了單巴的眼簾，麥克累甘基就座落在這道山脊上。再過幾分鐘之後，汽車將林中孤獨的聖約翰教堂甩在後面；接著就可以看到諾羅吉前門廊的鍍鋅頂蓋，然後是一群道道地地的西藏和山區老百姓。下面的河谷裡還有幾個當地的旅遊者，無所事事地看著鎮子頭上的混亂情景。客車停下後，單巴跳下車，從車頂上拿下了自己的袋子，步入了生氣勃勃、擁擠不堪的「小拉薩」。上達蘭薩拉是逐漸被人稱為小拉薩的，它反映了人們的願望。

自從達賴喇嘛剛剛到達這裡之後，麥克累甘基受到了發展的沖擊，它現在已經搖晃不定地經過了這一階段。目前它的常住人口為四千人，過往人口數百人，其中有香客、商人、政府官員和外國人。鎮子中間有一座殖民公園，藏人未加任何考慮就抹去了這個公園，取而代之的是三排房子，都是商店、餐館和飯店。一座高高的佛塔夾在這些房子中間，塔頂為金質，正如塔碑所寫明的那樣，它是為所有那些在中國人統治下西藏受苦受難的人們修建的。日日夜夜在這裡轉經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他們轉動著兩排轉經筒，口中背誦著祈禱詞。他們的家在鎮外，都是些用錫皮和石頭蓋的臨時小屋，雜亂無章。沿山而上，就像古代巴比倫的寶塔式建築一樣，窗口上裝飾著金盞花，頭頂上方的樹木之間掛著數百幅退了色的經幡。

「小拉薩」的居民大多數是買毛線衫的商人，寒冬臘月，他們離開自己沒有暖氣的小屋，在印度的城市之間乘坐火車找生意做。他們在達蘭薩拉時，充分利用了靠近神聖的達賴喇嘛的這一有利條件，每天都要沿著環繞達賴喇嘛的新住宅德慶措林建起來的林廓(即轉經道)轉經，這條轉經道與拉薩的林廓相似。單巴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來，他從鎮子的另一頭走出來，然後踏上了一條狹窄的小道，這條小道通向一座小山的頂部，它也就是麥克累甘基周圍最遠的那道山樑的頂部。

德慶措林，即大乘教義之島，建於 1968 年。它圍掉了一大片森林和山坡，達賴喇嘛可以在森林里和山坡上散步，在他自己的花園裡養花，照看野鳥和坐禪。達賴喇嘛的那棟樸素的小別墅屋頂是綠色，起伏不平；它的位置最高，它的下方依次是廚房、辦公樓、警衛室和秘書處，一直通到正門。

這裡有一個供因明派的年輕喇嘛辯經用的院子，下面鋪的是石板，院子的南端是達賴喇嘛私人寺院朗傑扎倉的殿堂。新建大昭寺橫跨這個院子，寺院的主殿有三層，檸檬色，上面是金頂，這是達賴喇嘛按照現代化風格親自設計的。單巴轉了轉排列在外牆的轉經筒，來到了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寺內，在大佛像和西藏的保護神像面前祈禱。接著，他沿著村中的一條石子捷徑，繼續下山，來到了流亡政府秘書處的新建住地崗慶吉雄，意即「雪域幸福河谷之府」。崗慶吉雄位於前往下達蘭薩拉的途中，它也如同德慶措林一樣純屬非修建不可；因為那些英國人的舊房子狹窄不堪，總是漏雨，必須修建新房取而代之。在那些正門前的白色柱子上有政府的標誌，它清楚地表明這是何處。政府標誌的圖案是兩頭青綠色棕毛的雪獅，它們抬著一個八輻法輪，背景是雪峰、太陽和月亮。為了同新德里保持友好關係，沒有掛西藏旗。裡面有一塊長方形平地，周圍是覆蓋著青枝綠葉的小山坡，景色宜人。這裡聳立著西藏文獻檔案圖書館大樓和政府大樓；政府大樓的底層是政府開會的大廳，圖書館大樓的兩旁是圓形宿舍，供圖書館的一百名常住學者作宿舍。政府大樓旁邊也有一排建築，高低錯落，政府的各個部門就設在這些房子裡。新聞局在最上面的一座建築的兩個房間裡辦公，這座建築凹了進去，是典型的藏式風格，前面有一根很粗的房頂柱身。單巴向新上司報到之後，被領到了自己的住處，這是一棟農舍式的房子，不遠的正對面就是秘書處的食堂。他明白自己已經來到了西藏政治鬥爭的心臟，因此，第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時，就迫切希望明天能以自己政府積極一員的身份開始工作。

譯注

- (1) 印度婦女用整段的布或綢包裹身體或披肩裹身的服裝。
- (2) 蒙古人種。
- (3) 作者此處指的肯定是藏族居住區。

第五章 為西藏而鬥爭

1959 年—1984 年

單巴 1974 年看到的流亡政府是一個稀奇古怪的混合體，它是革新、官僚機構和西藏噶丹頗章(五世達賴喇嘛於 1642 年建立的宗教政權)僧侶集團殘餘組合。無人承認達蘭薩拉，只有它自己的人民是例外--他們拒不加入印度國籍，因此達蘭薩拉的權力受到了限制，財源貧乏。政府的貧困甚至使單巴大吃一驚；政府機構使用的電話線亂七八糟，聲音不清；打字機是舊的。辦公室裡懸掛著達賴喇嘛的肖像。當時秘書處一百四十一名工作人員的生活區位於崗慶吉雄周圍的山坡上，擁擠不堪。政府機構僅能勉強行使其職能。單巴住的房子既無暖氣又無自來水，他與另外一個年輕人共用一個房間，這個房間年久失修；每天從老化的牆壁上掉下來的印度破報紙、泥土碎片和罐頭錫皮，像雨點一般落在他那狹小的帆布床上。這張床也十分破舊，他一躺下去，柳條就往下陷，可以挨到混泥土地板。就餐在秘書處的簡陋飯堂，膳食費從單巴自己的工資中扣除。他的月工資約為五十美元，這筆錢只能用來購買那些少不得的必需品。

在達蘭薩拉的部門中，新聞局的政治色彩最濃，為了推進西藏的事業，新聞局與國外的四個辦事處和新德里的大局保持密切的聯係。它有一個偵聽室，每天收聽拉薩廣播電台的報導，這個局還要詢問最近逃出來的難民，瞭解中國統治的最新情況--這就是分配給單巴的工作。同時，單巴還負責回答世界各地人士向崗慶吉雄流亡政府提出的問題。他還要剪報、收集政治、科學和文化方面的發展情況，以便翻譯之後供《知識》雜誌刊用；《知識》是時事刊物，這份刊物是為了讓難民瞭解國際時事。同時，單巴在剛到這裡的最初幾個星期裡，熟悉了流亡政府的組織機構。

政府的最上層是達賴喇嘛及其噶廈。下面設有六個大局和兩個分局(八十年代初期，在這兩個分局中又增設了衛生和審計總署這兩個機構)，這些局由噶倫分管。至此為止，這些都與西藏舊政府相同，其餘的就不相同了。就在單巴的辦公室的後面山坡上，有由十七人組成的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的住宅和辦公室，這個由當選代表組成的機構是流亡藏人的議會，它與西藏舊的國民議會「贊多」不同；這些代表是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的，任期三年--每個省的代表為三男一女，四個教派各選一名(其中包括西藏的原始宗教「笨教」的一名代表)，最後還有一名由達賴喇嘛根據有關人士在藝術、科學和文學方面的卓越成就而任命。最重要的工作由這些代表與噶廈共同負責；他們共同組成西藏全國工作委員會，它是政府的最高決策機構；他們還負責召開年度大會，每逢這樣的大會，各個局的首長都要當眾就本部門在過去的一年中的工作情況回答問題。雖然這些人民代表直接改善西藏困境的能力受到了難民生活的限制，但達賴喇嘛相信，進行民主方面的試驗是祖國鬥爭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解釋說：「光是批評中國是不夠的，我們自己必須拿出可供選擇的正確方法。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形成了代表性的政府體制；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討論和製訂了一部憲法草案。」

在製訂憲法時，達賴喇嘛對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實行代表性政府體制的民主程序，兼收並蓄。採納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為了保證財富能夠平均分配。而且他還十分信賴自己的個人信仰，他說：「從幼年時代起，我就感到人民群眾多麼重要。因此，我認為任何有益於窮人、被壓迫者、最下層群眾的思想都是神聖的。從理論上說，馬克思主義也服務於大多數人--工人階級，這一點觸動了我；但在將這點付諸實踐方面，當今的共產黨國家都犯了些毛病，在這些國家裡存在一種過分僵化的氣氛，它事實上損害了人類生活的價值。另一方面，自由雖然必需，但人們行駛這一自由的經濟機會也必須平等。所以，似乎兩種制度的某些部分都是需要的。」

1963年3月10日是拉薩起義四周年紀念日，這一天頒布了憲法，人們仍謹慎地稱之為「草案」，因為他還有待西藏六百萬藏人的絕大多數的認可。在流亡的難民社會中，除了幾戶貴族和康巴頭人(他們認為自己的權力會遭到削弱)之外，大多數難民熱烈歡呼，認為這部憲法是通向現代世界的重要步驟，雖然這一步仍令人費解。這部憲法共有七十七條，其中有些條款的製定就是為了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通過強有力的立法機構和最高法院來平衡執行機構的權力。這部憲法宣稱戰爭「是進攻性政策的工具」；它還公佈了西藏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力，其中包括普選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存權、自由權、財產所有權，以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在實施社會主義理想方面，規定土地國有製，並禁止「在對人民有害的情況下」，聚集財富和生產資料。這部憲法經群眾投票通過後，流亡政府根據這部憲法，著手組建完整的代議制政府，不過這套機構已經有了三年歷史。

由於達賴喇嘛急於開始西藏民主方面的實驗，早在1960年夏天--這時達賴喇嘛來到達蘭薩拉還只有幾個月，也就是在憲法大綱公佈一年之前(憲法大綱是1961年秋天頒布的)，他就促成了難民的第一次選舉。選舉活動完全不拘禮節。大多數藏人以前從未想到過要參入國家治理，更沒有聽說過選舉；多少世紀以來，政治歷來專屬於達賴喇嘛和貴族。結果，沒有候選人。人們在各個築路營集合，他們僅僅在紙條上寫了他們最敬重人士的名字。對人們的唯一要求就是投票選舉本地區的一名代表，僧人則投票選舉本教派的代表。選票最多的十三個人自然全部都是顯赫喇嘛、貴族以及來自康區和安多地區的部落頭人。1960年9月，這些人來到了達蘭薩拉，與達賴喇嘛一起開始工作，他們的工作就像選舉一樣非常奇特。

由於這些第一屆人民代表不熟悉管理程序，因此他們決定不行使對政策實行監督的職能，而是去政府的各個部門擔任副手，通過工作取得經驗。第二屆代表於1963年選舉產生，他們也與第一屆人民代表一樣工作；那些沒有再當選的人，很容易就能在政府部門找到工作，因為政府職員不足。直到1966年行政部門才終於分開，原因是這些人民代表已經受了訓練，如果他們還參入行政執行機構，這就勢必會損害他們調節行政執行機構的作用。

儘管有了改善，但選舉工作仍由政府負責。1963年的第二次選舉成立了選舉委員會，使用了投票箱，選舉了婦女代表(這是為了履行憲法中的婦女平等條款)。1966年進行了第三次選舉。這次選舉有了真正的候選人，他們由達蘭薩拉的選舉委員會提名，而不是由政黨提名，因為在流亡中進行競選被認為是一種孕育著不穩定因素的活動。直到1978年，第五屆人民代表委員會才實行兩次選舉，候選人在初選中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但是雖然經歷了十五年，選舉程序得到了改善，但很多人-特別是老一輩人-仍然認為人民投票選舉這種觀念難以理解。正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主席洛迪加里所說的那樣：「很多人走進選舉帳篷，他們就朝著神聖的達賴喇嘛像祈禱：『這裡的候選人，我一個也不認識，幫幫我吧，讓我選中那個能夠幫助達賴喇嘛及其百姓的人。』接著他們閉上雙眼，用一個指頭朝下點去，然後問負責選舉的官員：『請你看看這個名字是誰』。當他們得到答復之後，就說：『哦，這就是某某，我就投他的票。』」

人們並不是對代議制政府有抵觸，而是不贊成實行代議制政府的根本先決條件，即個人要宣布自己為候選人，這也就妨礙了人們接受民主程序。洛迪加里繼續說了下去：「如果我去叫某人投我的票，那就會被人認為是無比可恥的行為。這一點是好笑，人們在許多東方文化的社會裡都能看到這一點。我們從小就受到教育，總是要這樣說：『本人既無能力又無文化。』如果有人不是這樣，那麼也就清楚的表明他有個人動機，不會為大家的利益服務。」結果有些代表發現自己意外的當選成為代表，有些人甚至對於達蘭薩拉的委員會已經任命他們為候選人一無所知，直到他們應召宣誓就職才恍然大悟。與此相反，一些有心人儘管當選，但如果達賴喇嘛或全國工作委員會認為他們不合格，就可以作出結論，認為這些人不宜任職。

為創造名副其實的民主制度的鬥爭，核心問題在於達賴喇嘛究竟行使多大權力。達賴喇嘛曾利用憲法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這樣做居然違背了自己人民的意願。憲法最後一稿草案三十六條第五款規定，「根據國家的最高利益」，國民議會經與最高法院協商後，就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彈劾達賴喇嘛。反對呼聲很高，一百五十多名代表聚集達蘭薩拉，如不刪除這一條款，他們就拒不批准憲法。達賴喇嘛說：「當然，這是我自己的主意。如果我們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須要有能夠改變達賴喇嘛權力的條款。但是，也由於這是新東西，難以理解，我不得不讓他們相信，這一點不僅對全體西藏人民的今天，而且對他們的將來都是絕對必要的。這個問題是六十年代初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單巴次仁說：「我在政府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明白了光是進行選舉還不能產生民主制度。許多代表儘管在任，但他們仍持無所謂的態度；他們一想到有一個行使最高權力的行政長官，就感到非常自在，對於充分行使職能的立法機構也不在乎。我確信，基於這個原因，民主還有待於立足紮根，只有年輕一代才真正理解民主精神。」單巴發現，西藏青年大會具有真

正的現代政治氣氛。青年大會的領導人雖然沒有辦公機構，但全住在達蘭薩拉。單巴與這些領導人熟悉之後，他認識到他們而不是政府代表了達賴喇嘛建立政治上開放性社會的崇高願望的先鋒。

青年大會開始時在藏人的政治生活中起了主導作用。這個組織將為西藏獨立而鬥爭作為自己的宗旨。它的創始人是四個青年，全都出身於上層階級，大部分就學於英國人執教的第一流印度學校。加央羅布是青年大會的召集人，他在回憶成立這個組織的情景時說：「1970年，達蘭薩拉的形勢仍相當糟糕。這裡沒有西方人士，只有一些和平隊（1）的人，他們大約在聖誕節到這裡來唱頌歌。在藏人當中有很多理想主義青年，他們的生活豪放不羈，當然不是有意如此，而是生活實在艱難。每天晚上，總有五、六個人衝到你房裡來睡覺；大家都沒有錢，因此誰也不計較。不論得了幾個錢，幾天時間就會花得精光。我們有一幫人常常聚會，喝青稞酒，如果有錢就喝朗姆酒。接著我們就開始談論西藏，我想我們都有點動感情，我們會說：『我們怎麼辦呢？我們的夢想是什麼？』然後有人就會高聲宣布：『將來有一天，我會駕駛自己的坦克翻越山口，去看布達拉宮。』就談這些東西。過了一會，我們就在煤油爐上燒茶，但是，我們的玻璃杯和茶匙從來就不夠用，因此我們只好用牙刷來攪茶。」

我們常常談至深夜，最後形成了一致意見。不僅流亡的西藏青年沒有相互保持聯繫，而且很多人認為，儘管流亡政府在改革方面付出了努力，但它仍然繼承了其前身拉薩政府的不良傳統。羅布繼續說：「過於平庸，安全保險成了時髦貨，總是舊的那一套。那些有信念有才能的人們留在西藏，戰鬥到最後一個人，而許許多多的平庸之輩和官員卻跑了出來。在印度，整個的流亡官方機構總是不聲不響的。鉗制他們的並不全是印度政府，而是他們自己。無人有進取心。」

為了團結流亡青年，為西藏自由進行更為有力的鬥爭，他們決定召開一次小型會議。達賴喇嘛得知這一消息後，主動提出負擔會議費用，對條件是會議規模要擴大，全體難民中的年輕人都要派代表參加。羅布說：「神聖的達賴喇嘛並沒將任何條件強加在我們頭上，他採取的是同情、不干涉的態度，『讓它去發展，讓我們看看這些孩子有何作為。』大家的心情異常激動。」

一個月之後，即1970年10月7日，三百名西藏青年坐在康寧別墅門外，前面擺著一張插了三角旗的桌子，身後掛著一幅綠色的西藏大地圖。奏國歌之後，達賴喇嘛站立起來，他兩邊是他的兩位經師和噶廈成員，他致開幕詞。會上進行了為時一星期的辯論，無論是在外流亡或在西藏，這樣的事情從未有過。羅布說：「誰也沒有料想到會議開得那麼坦率，人們直截了當地向噶廈提出了有關過去的問題。中國人怎麼那樣容易就進了我們的國家？軍隊為什麼沒有浴血苦戰？昌都失陷時，情形究竟是怎麼回事？接著對當時政府的偏袒做法和濫用資金行為也提出了深刻的質問。其中一位噶倫的確渾身發抖，桌布長度不夠，人們可以看到他身上藏袍打折的地方在顫抖。由於所有的這一切，他們與政府的關係一開始就有幾分緊張。」

會議開了一半就正式成立了西藏青年大會，這樣在難民社會中也就有了忠誠的反對派，他們發揮了有效的作用。不過當時的情景令人感到奇怪。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年輕、文化程度高、會講英語的難民，因此政府職員的百分之四十幾乎是青年大會成員。到1984年時，這個比例已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就這樣，政府及其主要的批評者結合在一塊，令人難堪。當政府中的青年大會成員批評官僚錯誤和貪污行為時，噶廈看到了政府當中有不忠誠分子，因此它企圖破壞西藏青年大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此作為還擊。加央羅布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曾反復向噶廈表明，我們認為噶廈是西藏的合法政府。我們的忠誠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認為，就是因為我們忠誠的態度，青年大會就不應該採取百依百順的奴才立場，同意噶廈作出的所有決定。當我們向噶廈挑戰時，我們認為我們是出於理想主義的動機，但噶廈總認為我們是對他們權力的威脅。」

青年大會成立兩年後的1972年7月，在達蘭薩拉又成立了第二個群眾組織，名叫「為恢復西藏合法的獨立地位而鬥爭」，不過這個組織的領導權交給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委員會主要是利用這個組織來徵收難民自願上繳的稅收，這種稅佔難民月薪的百分之二，幾乎是流亡政府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同時，噶廈與青年大會之間的矛盾繼續發展，1977年春季產生了急劇的對峙而形成高潮。這是民主制度對西藏人的第一次真正考驗。

這一矛盾由一系列的事態發展而形成，開始於1977年3月10日，這是拉薩起義十八週年紀念日。這一年舉行了慶祝集會，西藏青年大會在新德里的中國使館前組織了慶祝示威。在這以前，中國大使館前有過多次由藏人舉行的示威遊行，有些還使用了暴力。這一次，原計劃衝進大使館內，破壞使館。但印度的國內保安機構情報局得知了這一計劃。10日早晨，當數百名示威者在瑪納卡梯拉（西藏難民營，位於舊德里朱木拿河河畔）聚集後，警察在這一地區周圍佈置了警戒線。為

數不多的藏人設法通過了警戒線，但後來在大使館附近經過一場苦戰之後還是被逮捕了。他們沒有受到指控就給釋放了，但釋放之前又有一千難民提出了抗議。示威者為了使集會獲得新的結果，他們決定進行絕食鬥爭，呼籲實施聯合國對西藏問題所作出的三個決議。新成立的西藏人民自由運動組織成立了一個協調委員會，在洛蒂公園附近的聯合國新聞辦事處門前支起了一個大帳篷，裡面有供絕食者睡的床，還有一些醫務人員以觀察絕食者們的身體狀況。從八十三名自願者當中挑選組成了三個隊，每死一個人就由另外一人替補上去。已經作出決定，除非聯合國同意再次討論西藏問題，否則絕食鬥爭就不予取消。羅布回憶說：「我們對這些自願者狠狠嚇唬了一番。我們單個地將他們叫進房間，說：『這可是沒救的。我們將活下去，而你們卻會死掉，這真是件難事。你會躺在那里活活死去，而我們卻會全然不理，我們只會在一旁談笑。因此你最好現在就退出來。』這一下馬上減了很多人。最後，我們組成了第一組，其中有三個遊擊戰士、一位婦女和另外三個男子漢。然後，我們指定其中一人負責，這人過去是遊擊戰士，十分頑強，對死亡毫不在乎。這是我們採取的預防措施，以保證在假惺惺的同情面前他們的意志不至於動搖。」

絕食於 1977 年 3 月 20 日上午十時開始。幾天以內，報界和電視對藏人的報導超過了十八年前達賴喇嘛抵達印度以來的任何時候的報導。這次的時機也十分得當，印度經歷了英迪拉·甘地宣布的歷時二十個月的緊急狀態之後，正在進行選舉。不到一個星期，在風靡全國的自由思想浪潮的急劇推動下，那些人民黨的領導人物，幾十年一直居於反對黨地位，他們對於捍衛西藏的事業叫得最兇。現在他們成了執政黨，也就終於能夠承認流亡政府了。與此同時，整個難民社會普遍支持那些絕食抗議的人們，藏人從中受到了鼓舞，他們在政治方面的努力達到空前的一致。

當時擔任青年大會主席的洛迪加里認識到了這時的有利機會，決定要見人民黨的領袖人物，於他們直接交談，其中許多領導人他都認識。這些領袖人物受到了雙重壓力：一方面他們過去曾許下過諾言；另一方面是這次絕食示威——這場絕食鬥爭為人們所普遍瞭解，這在人民黨就職前夕無疑是有害的。在這種情況下，洛迪加里希望能夠得到支持西藏獨立的正式保證。加里沒有事先通知達蘭薩拉的噶廈，因為這些人無疑會要扼殺這一計劃；他在加央羅布和一位綽號叫黃喇嘛（因為他的皮膚略帶黃色）的大個子陪同下，前往人民黨總部。羅布回憶說：「我當時問洛迪：『我們又怎樣進得去呢？』他們當時在確定總理人選，整個大樓裡擠滿了群眾和記者。此外，我們自己也是一副狼狽相：我當時從達蘭薩拉匆匆趕來，只帶了一隻牙刷，我穿的是短褲、一件藍色細紋布襯衣和一雙叭嗒叭嗒作響的拖鞋；洛迪穿的是白色印度睡衣，帶著衣箱；此外我們還有這位肥胖喇嘛同行。但我們三人就叫了一輛出租車，徑直奔去。」

當這些年輕人到達目的地之後，他們撥開新聞記者，設法引起了秘書 JP 納拉揚的注意；他是人民黨最受尊重的老一輩政治家，是競選的後台老闆。但是這位秘書當即拒不同意他們的要求。羅布說：「洛迪的意見是，『就告訴 JP，我們是西藏人，他從未拒絕過西藏人的要求。』我對他說：『洛迪，這次你那些廢話對我們毫無幫助。』但只過了一會兒，那位秘書就出來對我們說：『先生們，這裡來吧。』接著所有那些記者大聲叫喊起來：『這些下賤傢伙怎麼也能進去？』我們徑直穿過了人群。」

洛迪加里給納拉揚獻了一條哈達，向他祝賀人民黨的勝利，並呼籲支持絕食示威。納拉揚立即表示同意；此外，納拉揚答應保證贏得即將上任的總理莫·德賽的支持。這三個人對自己的成功都有點感到驚奇，幾分鐘之後他們就走了。打這以後的幾天，絕食帳篷收到了一些來信，一些即將受命擔任新內閣成員的政治家也來到了這裡，這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無一例外地保證要支持西藏事業；難民們的鬥爭得到居住國的支持，這還是第一次。作為這種嶄新姿態的交換，人民黨獲得絕食示威者的保證，絕食示威於第十天宣告結束；當時阿查雅·克利帕拉尼將桔子汁送到了七名藏人的面前。加里和羅布都很高興，在那些絕食者受到熱烈歡迎之後，加里和羅布回到了達蘭薩拉，他們帶回了人民黨寫給噶廈的信。

結果引起了一場混亂。由於這些青年先於噶廈與印度新政府進行了接觸，噶廈對整個事件完全持否定態度。噶廈指責絕食示威者毫無頭腦，破壞了全體難民的努力，這些政府成員一旦上台，真是無法弄清楚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最終立場。噶廈為了消除遭到的損害，要求西藏人民自由運動的領導人辭職，他們當中的主要人物也是青年大會的領袖。數天之後，達蘭薩拉擠滿了斥責噶廈的憤怒人群；人們在公共場合質問噶倫和人民代表（據猜測，這些人民代表與噶廈狼狽為姦），因為沒有幾個難民能夠理解他們反對這次勝利的理由。為了平息這場危機，西藏人民自由運動協調委員會終於宣告解散，而青年大會的四位創始人也從中央執行委員會辭職引退，以示抗議。人民黨就職上台之後不久，就背信棄義，否認以前作出的所有承諾，就像它的那些前任政府一樣，主張阻止藏人採取行動，以免他們妨礙與中國和平共處，與中國和平共處仍然是人民黨的願望。

這場對抗，生動地表現了流亡生活中政治自由的局限性。然而只過了幾年，全部青年領袖不僅重返政界，而且擔負了他們以前曾經攻擊的那些職務 - 噶倫、新聞局長、戲劇協會主席，洛迪加里則出任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的主席，這些證明了民主的力量。同時，青年大會接受了新的領導集團，單巴次仁位居其首。單巴來到達蘭薩拉之後不久，他發現自己成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三十一名候選人當中的一員。由於他在比拉庫佩分會擔任總幹事時聲望很高，因此於 1974 年當選出任青年大會司庫。四年之後，單巴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顧問，這是青年大會的最高職位之一，也是流亡社會中最有權力的職位之一。在單巴的領導下，青年大會採取了鬥爭性的新行動方針；青年大會的領袖作出了極其秘密的決定，即在為西藏而戰的鬥爭中，實行恐怖主義的時刻已經來臨。雖然這一想法已經討論了多年，但採納這一做法只有現在看起來才勢在必行，這不僅僅是由於為贏得印度新政府的公開支持的努力已告失敗，而且還因為 1959 年以來進行的秘密武裝鬥爭的效果不佳。

根登達傑所屬的築路營有五百人，1961 年初，築路營領導將他叫到一旁私下談了幾句話，這位工頭說：「已經選了你，讓你去接受訓練。你要去進行 X 光檢查，並需要一張自己的照片。」在幾天之後，根登在提斯普爾辦好了這兩件事，接受了 X 光檢查並拿到了自己的像片，回到了築路營。根登被介紹給了另外一個青年，這人同他一樣，也是康巴人，高大強健。工頭說：「去告訴你們的朋友，說你們要去大吉嶺工作。從現在起，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你們都要發誓保守秘密。」這兩個人發誓對於發生的事情，既不提問也不洩漏。然後他們得到了幾個捆錢，給了他們大吉嶺的一處地址和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他們到達目的地之後，只要出示這個號碼就能入內。他們在不清楚自己將要接受什麼類型訓練的情況下啟了程，同時他們一直擔心會被情報局的特務逮住，這些特務已下令禁止藏人外出旅行，他們正在難民中搜尋中國特務分子。不過，根登第二天在車上時注意到了另外兩個人，他們也像自己和他的伙伴一樣，特別健強，無疑是藏東人。當他們在大吉嶺前面一個站下車出站之後，根登匆忙跟了上去，忽生一念，想要得到這兩個人的幫助。根登問他們是否知道附近有個好餐館，他得到的是低聲細語的肯定答復，並被領到了一個小咖啡館。在這裡簡單吃了一頓之後，來了一輛卡車；顯然他們肩負的使命相同無異，這些人也沒有就這一點問一個字，就讓他們的伙伴躺在卡車車廂裡面。卡車終於停下後，根登看了看他在大吉嶺尋找的這個地址。他在門外出示了號碼，然後被領了進去，從此以後他只有短時間的散散步或偶爾上一次館子才能獲准出來。在這段時間裡，雖然管這棟房子的人從未提過他們所幹的工作，但根登清楚地認識到，他已經加入「措西甘珠」，它是至今仍在進行活動的西藏遊擊隊抵抗組織。

根登達傑在大吉嶺待了三個星期後，別人告訴他，要他將自己為數不多的幾樣東西收藏起來。根登得到一筆錢之後，允許外出，他來到了附近的市場，購買一雙旅遊鞋。他會到這棟房子之後，與其他四個人 - 他們都是康巴人和安多人 - 等了整整一天；他唯一剩下的財產就是一個掛在脖子上的布包，裡面裝的是經乃窮曲均聖化了的紅色保護繩和青稞麥。五點鐘，來了一位「措西甘珠」的高級官員，名叫拉姆次仁，他手上還拿著一份文件。他叫這些人要麼走，要麼在文件上簽字，如果簽了字，就說明已經加入了國防自願軍，就必須至死服從上司的任何命令。五個人都簽了名。六點整，在夜幕的掩護下，一輛帆布篷的吉普車來到了位於山腰的這條街道的盡頭，就在這棟房子這裡，他們幾個人上了車。在第二站，又有六個人擠進了吉普車，使根登不得不將背露在車外。他們離開了大吉嶺，朝南使去，似乎在徑直奔向東巴（2）邊境。三個小時之後，那位負責人說：「你們不必去考慮腳下是什麼東西 - 不是泥、水。就是糞上。我們過一會到了以後，行動全聽我的，要像戰場上一樣。」吉普車開到路邊之後，停了下來。這些人接到命令，一聲不吭地疾跑衝過一片開闊地。他們奔跑時，看到了汽車的一對前燈，接著隊長急令臥倒。車過去之後，他們又奔跑起來。在夜色中可以朦朧地看到一條寬闊河流的堤岸，接著他們在河邊來來往往度過了幾個小時，顯然他們迷了路，這時隊長叫其中一個能講印度語的人到附近一個村莊去，小心打聽一下這裡是不是巴基斯坦。半個小時之後，這個人折了回來，一群拿著棍子和步槍的憤怒村民包圍了他們。這些倒霉的藏人在數量上完全處於劣勢，因此很快就被趕到了附近的警察局。他們很清楚，等待著他們的是這裡的牢房。但他們剛一進去，驚奇地看到警察將村民們給打發走了，然後親切地接待了他們。接著他解釋說，他們不僅已進入了巴基斯坦國境，而且他們在河堤上尋找的那位間諜已經通知了這一地區的當局，請當局尋找他們這些人。一會兒後，在一輛巴基斯坦的軍車上接了頭。這些藏人上了車，乘車來到了一棟小房子前，然後單獨在這裡度過了那天夜晚的剩餘時間。

翌日，天剛開始破曉，根登就被叫醒，要他跑步去鄰近的一座建築。從這裡他親眼看著他這個小組的基地成員跑了過來，一次一個，最後是那個特務，他顯然很小心，決心不再讓當地人看到他們。這些藏人領到了食物，還得到了一床毯子用來墊坐，他們在房子裡待了一天，等候夜幕降臨。晚上他們又坐上了一輛軍用卡車，汽車將他們送到了一片樹林裡，他們分成三人一組，得到命令，再次抬腿猛跑。穿過一片空地之後就是鐵路，鐵路線上一節孤獨的車廂。根登一邊跑，一邊看了看遠處鐵路線旁的車站。他來到車廂前，停下仔細瞧了瞧車廂，但很快就被巴基斯坦士兵拉了進去；他們有一個班，挎著沖鋒槍。他被人領到了一個上了鎖的小房間，金色百葉窗緊緊關上了。不一會兒他就聽到了火車，掛上這節車廂之後。

就拉著跑開了。他判斷火車是朝南行駛。一天之後，可以聽到大型終點站的各種喧嘩聲。這節車廂脫鉤之後，離開了其他車廂，來到了相隔一段距離的地方。根登所在小間的門突然被打開，一名巴基斯坦打著手電，叫根登跟他走。下火車之後，這些藏人被匆忙弄進了一輛正在等候的卡車，這輛卡車在一輛吉普車的引導下，出了車站，快速駛過一座大城市-就是達卡，這是根登數年之後才了解到的。在城郊一座單獨的建築前汽車停下，這座房子在一個簡易機場一邊的端點；幾分鐘之內，機場上降下了一架無標記、銀灰色雙螺旋槳飛機，飛機滑行來到了面前。雖然有些康巴人從地面看到過在康區執行轟炸任務的中國飛機，但誰也沒有靠近看過「空中飛船」。接著，飛機尾翼上的小門打開，從上面吊下了梯子，裡面走出了一個口含煙鬥、面部輪廓分明的高個子白種人，這是他們驚訝不已。

機艙內右側有一排座位。左邊，達賴喇嘛的一張小照片牢牢地黏在機身上。三個白人在示範怎樣繫好安全帶，根登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示範。當飛機的螺旋槳轉動起來時，他們拉上了窗簾。接著，飛機起飛了，他們從前艙返回來，又拉開了窗簾，並遞來了一些裡面盛著棕色冷飲的紙杯。根登問他們當中的藏文翻譯，「這是什麼，是朗姆酒嗎？」翻譯又與其中的一位白人交談，他們用的是陌生語言。隨即他對同胞說：「這是一種外國飲料，名叫可口可樂。」這些乘客喝了可口可樂之後，又有人給他們端來了一盤食物。其中的幾位藏人緊緊抓抓著烤牛肉三明治、醃菜、鹽瓶和胡椒瓶，他們拆開了碟子邊上的小塊肥皂條，同時迷惑不解，以為這也是他們不知道的新食品，也給吃了。晚飯之後，他們才感到輕鬆，這是他們兩天前開始這次行程以來第一次感到輕鬆。這些藏人離開了那些怪裡怪氣的椅子，對周圍的環境毫不在乎，盤腿就坐在地板上，完全是典型的康巴人方式。他們突然掏出了兩個象牙骰子，立即開始了靠運氣取勝的遊戲，這是西藏最流行的遊戲。他們高聲叫喊，當輪到誰投骰子時，他就會拼命叫出聲來。深夜，飛機短暫停留加油之後，這些人終於進入了夢鄉。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們看到了腳下太陽照耀著的一大片微光閃爍的水域-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海洋。

小飛機飛行一天之後著陸。一輛軍用運輸汽車倒著車，一直開到了飛機後部的梯子旁，將這些藏人給拉走了。這裡氣候涼爽，大雨傾盆，雨點重重地落在車篷上。根登在帆布上發現了一個小洞，他將小洞捅大了一些，然後彎下腰來就可以看到外邊。一些東方人拿著雨傘，頂著傾盆大雨路過商店，這些商店的招牌上寫的是中國字，根登猜測這是台灣。卡車通過了拉著鐵絲網的一個檢查站，然後在兩幢小樓房前停了下來，房子前面有一片很密的樹林遮擋掩護。進樓房之後，這些藏人被領進了一個空無擺設的房間，裡面有一排帆布床。他們就要在這裡度過未來的二十八天，如果走出樓房，也禁止離開緊挨樓房的附近地帶。

這些人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現在住的地方是一個龐大的軍事基地的遙遠一隅-不是在台灣，而是在沖繩島上，這是他們後來才知道的。一天，含煙鬥的那個人通過翻譯給他們講了話，他說他們一直在等候第二批藏人。現在看來，越過巴基斯坦邊界時，印度的情報局在對整個大陸進行搜查，因此他們只好獨自繼續行動。他說：「你們每個人的履歷都進行了嚴密的審查，以確定你們不是中國特務。你們將採用新名字，用我的語言，從現在開始，你們只能使用這些名字。」這些藏人大為高興，他們從此就安上了下列名字：多格、鮑勃、威利、傑克、羅基、馬丁和李，這也證明了他們當中很多人原有的猜測，即共產黨的頭號敵人美國-一個遙遠的國家-終於認識到，成為西藏的最好朋友是適宜的。

銀灰色飛機又一次轟鳴衝向空中，窗簾嚴嚴地給拉上了。在白人及其照料的這些人之間，發展了一種奇特的同志式情誼。當藏人在地板上賭博、喝可口可樂、又喊又笑時，這些西方人士顯然也受到了藏人無拘無束情緒的影響，他們在寬寬的走道上踱來踱去，不時站在達賴喇嘛的像前，雙手擺出祈禱的姿勢，然後露齒大笑。雖然這些白人反復命令他們的乘客睡覺-他們甚至將藏人趕到座位上，並將頭頂上的燈也給熄掉了，但這些康巴人卻執意要回到地板上，摸黑賭博，因為他們只習慣於服從自己部落首領的命令。早上，一個大島出現在下邊的海面上。他們著陸之後，休息了一天，在此期間，含煙鬥的美國人堅持要求根登照張像。他們又回到了機上，飛機起飛，在空中又飛行了整整一個夜晚，第二天當根登眺望夕陽時，他看到了腳下長長的一線海濱，一座大城市位於山麓之間。當他們飛越一條暗褐色的山脈之後，根登很快又看到了另一座大城市的燈火，飛機就在這座大城市著陸。在等候的又是軍用卡車，不過這一次，溫度特別低。坐車行駛三小時之後，在路旁停下來休息一陣子。當這些藏人從卡車上走下來時，他們驚奇地看到，在星光閃耀的天幕之下，雪峰聳立。這些高山看上去非常眼熟，有些人一時還認為他們已經回到西藏。而另外一些人在狹窄的環境裡生活了五個星期之後，發狂似的在覆蓋著新雪的大地上奔跑，根本就沒有註意到自己的旅遊鞋濕了。那些白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們重新弄上了車。在大山里行駛三個小時之後，他們經過了攔著鐵絲網的檢查站，然後沿著一條長長的河谷行駛。在河谷的盡頭有一些平房，在一座平房裡，給他們每個人安排了一張床，床邊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的鉛筆、拍紙簿和毛巾擺得整整齊齊。軍營裡陳設簡單，幹幹淨淨，但根登發現了唯獨的一個用於紀錄的東西：一支鉛筆，鉛筆頭上的橡皮擦上有牙齒印。在西藏寫字時，通常都是牙齒咬著筆，用雙手去疊紙，這些齒印使根登確信藏人曾來過這裡。從那時起，他就相信自己是在美國。

海中的第二個島嶼是夏威夷；海濱的那座城市是舊金山；飛機降落的城市是丹佛；藏人被帶到的這個高山基地是黑爾營，它位於科羅拉多洲的利德維耳城北面十八英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黑爾營被用來進行高山地區戰鬥訓練營地，現已重新作了安排，由中央情報局直接指揮在這裡培養一支秘密藏軍。

在美國訓練藏人的決定，是在3月起義不過一個月之後作出的。1959年4月21日，當達賴喇嘛出逃才三個星期，國防自衛軍的野戰司令員貢布扎西·安昌珠將軍在面對著佔絕對優勢的中國軍隊的情況下，他命令放棄山南司令部，遊擊戰士繼續在山南各地分散行動。於此同時，國防自衛軍的主要指揮官都在東北邊境特區找到了避難所，貢布扎西則在受折磨，因為他負了傷，身體越來越虛弱。貢布扎西來到大吉嶺，見到了國防自衛軍的領袖、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他們與顧問們一道製定了國防自衛軍的下一階段作戰方案。鑒於中國已經全部佔領西藏，作戰方案的基調就是要使中央情報局大力轉入進來。

到當時為止，中央情報局給予康巴人的訓練還一直十分有限。在關島和沖繩島（這是中央情報局監控西藏活動的前沿站），受訓人接受四個月的訓練，然後他們帶上沖鋒槍、無線電和毒藥（以便在被俘時自服），從河谷坐飛機，空投西藏，組織基層遊擊隊。在此之前接受訓練的都是部落頭人以及他們的兒子，而1959年5月開始的新計劃則要訓練五批人，共計約五百人。挑選這些人要看身材，也要使西藏三個省區的每一個縣都有人參加。正如過去一樣，當訓練結束之後，他們就會被空投到自己的家鄉，組織抵抗力量，這些抵抗力量最終還得與國防自願軍的大部隊聯為一體。國防自願軍希望能在西藏的某塊邊境地區重建自己的新基地。

整個行動絕對保密，西藏人從未聽人說過他們是在美國，這樣如果有人被俘，那也無法證實美國人已介入其中。同時，在洛磯山脈的中段訓練一支亞洲人組成的秘密部隊，也要求慎之又慎。到1959年7月中旬，中央情報局已在丹佛的《郵報》上發表了頭版新聞，報導將在黑爾營進行核試驗-不過並不是原子彈爆炸試驗。這裡的山峰高一萬四千英尺，還有河谷，黑爾營佔地遼闊，從此以後，這一片地方嚴格禁止老百姓靠近。後來飛機將一批藏人運送出去時，有些人在彼得森空軍基地（這個基地在科羅拉多州斯普臨斯城外）附近，遭到拘留。有一次在槍口下押著的就有四十七個人，他們躲在軍用路障後面，直等到那些窗戶塗得漆黑的神祕客車開了過去。當《紐約時報》得到了科羅拉多州有一些身份不明的東方人的消息時，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親自出面，壓下了這條消息。那些看守這個基地最敏感區域的士兵-還有那些西藏人-得到了明確的指令，如果發現他們的區域內有外人，即開槍擊斃，這也是最後的辦法。

根登這批人，是第四批抵達黑爾營的藏人。藏人抵達的第一天，就給他們發了黑色的戰鬥靴和綠色軍用工作服。早飯後，他們被領著在緊靠營房的地方周遊了一番。這裡共有十幢房子，位於一條小河河畔，周圍都是高山，森林密布，將這裡與外界隔絕開來。甚至營地範圍之內，也有一些限制：允許藏人去的地方，只有他們自己的營房、餐廳、教室、一個裡面有式樣怪異的「落袋彈子戲」球檯和乒乓球檯的大房間。這就是他們第一課堂的內容，老師是位穿著戰鬥服的大個子，這個美國人告訴他們說，他們這批人的訓練要持續六個月，他結束這節課時問了兩個問題：「你們敢從飛機上跳傘嗎？敢跳的，請舉手。」他對得到的答覆非常滿意，臉上露出了笑臉，又問道：「誰願意同中國人作戰？」

黑爾營開設的課程包括很多科目。這些藏人的英文名字在一塊塑料板上，粘在帶帽舌的太陽帽上，別人就叫他們的英文名字。藏人學習使用武器，學習逃生方法，操作無線電，譯電碼組織地下工作網，傳遞信件，用圖標出接頭地點。上午的課程學習無線電發報中用的由二十六個字母和十個數字組成的密碼，學看地圖和指南針。中央情報局專門為藏人生產了一套設備，其中包括不過一隻手大的無線電，但這種無線電的功率仍然很大，長距離使用時信號仍然十分清晰。使用的武器包括M1步槍、迫擊炮、火箭筒和消音器。藏人還學習跳傘，攀登石山。渡河，行軍野營，在奔跑中宰殺野鹿，生鹿肉要吃一個星期，同時教員還逼迫自己的學生。他們還接觸到了要求更高的間諜手法。根登聽別人對他說，他被送回西藏之後，必須躲藏幾天，觀察父母和親屬的日常活動，以保證在接觸之前就能完全弄清楚，他們是否在與中國人合作共事；他們是否受到了中國人的監視。接著他還學習組織抵抗小組，這些小組要定期向他報告中國軍隊的調防情況。他們還必須隨時做好準備，一有信號就舉行起義，這是全國實行協調努力的組成部分。根登還學會了怎樣在晚上通過敵國領土；如果迫不得已要在白天行動的話，怎樣化妝通過檢查站；如果被俘，該怎樣對付審問。他要盡量咬定一套確定的口供，這樣就可以逐漸使中國人相信他身體很弱，並選擇一個最易被人相信的時刻倒在地上，然後又告訴中國人自己的身份，聽起來還要是真話，但這也是早就編造好了的。

在黑爾營待了幾個月之後，又來了一百二十五名藏人。過了沒有多久，根登完成了訓練，八十名學得最好的藏人被挑選出來，計劃空投到西藏去，他就在其中之列。雖然每個人的任務對別人都保密，但這些藏人經過自己的一番偵察之後得知，全國各地已經空投了很多批，形成了網路，他們不過是最後的一批罷了。一天，一位藏人在打掃一座通常有人看守的樓房時，發現只有他自己，別無旁人。在那間主要的房間裡，他拉開了白色大布簾，發現了布簾後面的一張西藏詳圖。遍布地圖的紅色別針標出了特務位置。他又繼續翻找，發現了預先包好的傘袋，上面標有他這個組的人名。袋子裡面的東西有無線電、小手槍和消音器。不久，根登在夜色的掩護下，被送出了黑爾營，開設了回國的漫長旅程。但在他短留黑爾營期間，變化很大，這期間不僅改變了中央情報局和西藏人的關係，而且改變了中亞地區的勢力平衡。

1962年10月20日清晨五點，中國人開炮轟擊守衛東北邊境地區的卡門專區的小股印度邊防軍。一小時後，兩萬名中國軍隊齊頭並進，翻越了塔格拉嶺，在相距一千五百英里的拉達克同時發起了進攻。在東線，人民解放軍一直推進了孟迪拉，而在西線的阿克賽欽的人民解放軍卻佔領了一萬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地盤，直到11月21日才撤到東北邊境的麥克馬洪線，它歷來是印度和西藏的分界線。（潘奇謝爾協定）期滿剛剛四個月，尼赫魯與人民共和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十年努力驟然付諸東流，他成了中國邊境領土要求及其顯而易見的擴張主義政策的犧牲品。尼赫魯的這次失敗給他帶來了恥辱，迫使他承認，「我們一直生活在自己異想天開的傻瓜似的天堂裡。」此後，他直接轉向美國求援，以對抗進一步的入侵。

印度武裝北部邊界地區的努力是晚了一些，其中心內容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指導下，新成立一支秘密突擊部隊，名叫特種邊境部隊，代號為第二十二號營地，這是根據這支部隊的主要基地命名的。特種邊境部隊於1963年11月13日成立，由印度情報局的研究分析處指揮，這支特種邊境部隊由藏人組成，其任務就是守衛地球上最高的邊界地區。儘管西藏流亡政府矢口否認這支部隊的存在，一些印度人士表明，西藏流亡政府應該採取通過新德里的直接渠道，以緩和通過巴基斯坦使中央情報局和康巴人保持聯系的困難局面，這一點十分重要。根據這些人提供的情況，從此以後，國防自願軍的許多行動，受第二十二號營地領導，直接聽命於來自印度首都的指揮。在奧裡薩邦的加爾各答設立了一個專用通訊基地，因為加爾各答無線電波很少，所以很容易每星期與西藏境內的活動分子保持聯係。

根登回到亞洲之後，沒有被派往前線作戰，而被安排在奧裡薩邦中心擔任職員。這裡有兩個大型接受機，配有專用天線，可以收到來自喜馬拉雅山脈北面的最模糊信號。根登和他的十個同事將這些信號記錄下來，然後通過電傳電報打字機，以數字密碼的形式，將這些信號傳遞到新德里的國防自願軍總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根登被調到新德里工作，在新德里一幢看上去很不顯眼的平房裡，根登、其他三名無線電報務員和兩名檔案職員一起翻譯這些電碼。他每天要乘坐客貨兩用車上下班，身上蓋這毯子作掩護，這樣持續了十一年。每逢星期一晚上，國防自願軍和印度情報局研究分析處的高級官員以及中央情報局的代表舉行聯席會議，會上要分析每星期從西藏得到的情報的抄本，並作出指示。同事，在為西藏而戰的全部鬥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防自願軍的前線新基地。

1960年中期，當時中央情報局的訓練活動已在大力進行，西藏抵抗力量的首腦人物，選定面積為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木斯塘王國，作為重新組織行動的最佳地點。木斯塘與周圍地勢相比，如同鶴立雞群，海拔一萬五千英尺，就像插入西藏西部的楔子，自從十九世紀初葉以來，它一直是附屬於尼泊爾的樸從國。但是，由於木斯塘與世隔絕，距加德滿都有一個多月的行程，所以它除了給尼泊爾政府付給不過一百美元的年稅之外，與尼泊爾政府沒有任何聯繫。從南面進入這個王國的主要通道，是極為狹窄的卡利甘達基峽谷，它是世界上最深的峽谷(由於它處於安納普納和道多拉吉里之間，這兩座山在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列)，如果在此設防，幾乎無法通過。但木斯塘的最大戰略價值，就在於它距離新疆至拉薩的公路很近，這條公路是西藏的兩條主要的大動脈之一，它始於康區，沿著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全線的懸崖陡坡，修到了拉達克的阿克賽欽地區，從這裡它再朝西北方向蔓延進入新疆，再往前走就是中蘇邊界。這條泥土公路和唯一的電報線路，將這條長達一千五百多英里的敏感邊界線上的中國邊防軍連接了起來。木斯塘還有一個優點，它是現存為數不多的原始西藏文化的小塊地區之一。因此，它就成了康巴人的根據地，既可以從這裡安然無恙地襲擊中國軍隊和附近兵營，又可以作為藏南和藏東仍在進行活動的遊擊隊的至關重要的後方基地。

1960年後期，國防自願軍的部隊開設來到木斯塘。雖然後來小股的遊擊隊從西藏直接來到這裡加入了這支部隊，但最先來到這裡的，卻是隨同貢布扎西將軍從山南地區撤退下來的藏人。國防自願軍部隊這些人來自各個築路營，他們先前往大吉嶺和甘托克，然後在這裡分為四十個小組，朝西行進，偷偷越過邊界，進入尼泊爾南部的茂密叢林，然後沿著卡利甘達基峽谷的寒帶山地朝上走，最後出現在木斯塘。這裡已屬於西藏高原，乾燥貧瘠，狂風陣陣。藏人在這裡受到了這個王國第二十三代土王的歡迎--他最害怕附近的人民解放軍，其次就是自己領土上不受約束的軍隊。西藏人在這裡組成了連結成

網的基地：有些就是設在前沿的帳篷營，只有一二百名官兵；另一些則是建在已有的城鎮和寺院附近的給養倉庫。總部設在後方，木斯塘的南部邊緣，在靠得最近的尼泊爾焦木桑鎮的北面，相距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後來，在一條深谷到森林茂密的尼爾基里山麓之間，蓋起了二十五幢房屋，裡面設有五個部隊-給養、運輸、彈藥、情報和內部訓練。木斯塘司令巴巴益西的辦公樓位於這些房子正中--這是一座三層樓房，四周有圍牆；大門前拴一條兇惡的大藏狗，西藏旗在院中飄揚。除了這裡的地理環境之外，還有那些拴在木樁上的藏馬和身著繳獲的人民解放軍上衣和子彈袋的康巴軍隊，所有這些使這裡染上了「粗獷的西方色彩」，這是一位老戰士回憶時說的原話。但是，由於這裡環境十分乾燥，岩石遍地，所以開始創建木斯塘基地時困難重重。在足夠的給養空投進來之前，四千創業戰士當中的大多數人，只得煮靴子和馬鞍來充饑度日。據一些人說，有些人還越過邊界進入西藏，他們並不是去攻打中國人，而是偷盜牲畜，求得生存。

隨著空投給養而來的，還有幾乎四十名黑爾營的畢業生。從他們身上，國防自願軍學到了迫切需要的現代戰鬥知識。這些畢業生帶來了 M1 步槍、斯普因菲爾德沖鋒槍、八十毫米無後座力重砲、二英寸迫擊炮、供隱藏式無線電用的太陽能電池、發電報時用的擾頻器、機槍消聲器和用於間諜活動的「毒藥片」及微型照像機。由他們擔任教官，全部換上了卡嘰制服，日常生活更為嚴格。每天早上五點起床，接著是做體操，唱西藏國歌，幹農活，在山里進行生存訓練和演習。他們是自 1958 年的起義高潮以來，西藏萌生的第一線真正的軍事希望。

國防自願軍恢復元氣之後，他們就從木斯塘這塊高原向東面、北面和西面出擊。一般的出擊由幾十個人進行，他們插入西藏，待上一個月時間，埋伏襲擊人民解放軍的一支隊伍之後就撤回來。由於西藏很荒涼，只要軍隊大致相等，無論遊擊隊在哪裡進攻，他們保證可以獲勝。1966 年派了一支小隊伍去騷擾新疆至拉薩公路的運輸線，結果他們消滅了一支中國人的部隊，直到戰鬥結束之後，遊擊隊才在屍首堆中發現了人民解放軍西藏西部軍分區司令員及其全體參謀人員。這些人民解放軍帶上了他們的全部檔案材料，結果這些東西成了寶貝，不僅對西藏人是如此，而且對中央情報局也是如此。通過這些材料，得到了有關剛剛開始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寶貴情報；其中還有一份價值不尋常的文件，在這份文件中中國自行透露，在 1959 年的叛亂中大約有八萬七千名藏人喪生，而北京一直將這次叛亂說成是一場小小的騷亂。

木斯塘最成功的一點，是它的間諜網。在很短的時間內，國防自願軍成功地在西藏各地建立了地下聯絡點，得到的情報不僅範圍廣泛，而且質量很高，這就使得這項情報工作極為有用。雖然中國人對所有的藏族都持懷疑態度，但中國共產黨的自治區委員會卻不得不起用一些少數民族幹部，讓他們幹行政工作。在這些藏人當中，有很多人似乎是中國人的合作對象，而實際上隨著他們在地方的官僚階梯上慢慢爬了上去時，他們就給國防自願軍提供情報。夜間，國防自願軍的信使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從間諜那裡收取情報，他們不僅要負責匯集整理中國在沿喜馬拉雅山脈一線大量的集結軍隊的情報，而且還報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核試驗基地從新疆的路帕路（3）遷移到距離拉薩北面一百六十五英里的那曲的重要情報。

儘管木斯塘有這麼多優點，但它卻存在一個關鍵性的弱點。它距離中國人活動的主要場地太遠，正如一位遊擊隊戰士在描述西藏抵抗運動第二階段的情況時所說的那樣，這是「一支在與世隔絕的領土上的孤軍」。此外，雖然康巴人千百年來生來就騎馬，但現在這些康巴戰士卻失去了坐騎。由於在翻越這塊高原四周的崎嶇山口時，困難重重，因此整個部隊只保留了六十匹藏馬。這次退卻所帶來的傷亡最大，傷兵通常只好任其死亡，木斯塘總部沒有藥品，沒有外科設備，木斯塘所轄的前線軍營就更不用說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戰士的死大多數不是由於戰鬥，而是由於衰老。有一位年輕的遊擊戰士，以前是西藏青年大會成員，應徵派到木斯塘是為了替換那些已達四、五十歲的人，他回憶說：「真是可悲！人們並不是死於槍彈，而是往返打一次仗就一命嗚呼。中國人只要一知道藏人又在進行襲擊，他們就會馬上派出巡邏隊切斷藏人的退路。人民解放軍精神十足，而我們的戰士卻連續奔波了幾個夜晚，因此這些上了年紀的人也就精疲力竭了。他們就拿出一罐咖啡，倒在碗裡，與湯湯水水攪拌在一起喝了下去。但這樣幹過一兩次之後，他們的心臟都直往外蹦。」

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內外壓力危及到了木斯塘的繼續存在。1971 年 7 月，亨利·季辛吉秘密飛往北京，為美中關係走向友好鋪平道路。接著，中央情報局突然中斷了對西藏遊擊隊的援助。由於特種邊境部隊已經成熟，印度也沒有必要保持與以前同樣多的援助。特別糟糕的是，尼泊爾也不再像六十年代初期那樣擔心中國人進攻了，現在它絲毫不擔心，而希望通過進一步發展與北京的關係，來抵消新德里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因此，加德滿都於 1972 年採取了驅逐康巴人的第一個步驟，它發起了一場宣傳攻勢，指責藏人搶劫、強姦、殺人；而在過去的十二年，加德滿都則對這些康巴人的存在視而不見。

國防自願軍也發生了內訌。1969年，甲樂頓珠在那些中央情報局培養的年輕軍官長期怨聲載道的影響下，免除了巴巴益西將軍的司令員職務，讓甲多旺堆將軍取而代之。甲多旺堆將軍是已故貢布扎西·安珠昌的侄兒，也是美國訓練的第一批藏人當中的唯一倖存者。巴巴益西開始還若無其事，他來到達蘭薩拉，作為補救措施，他應邀出任令人矚目的安全局長，這個職位相當於副噶倫，但他卻拒絕擔任這一職務。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將他手下近二百多部落藏人集合在自己身旁，率領眾人脫離了國防自願軍，公開指責甲樂頓珠濫用資金，並在木斯塘東面佔領了芒芒遊擊營，他就從這裡公開攻打部隊的主力，實際上成了一個競爭派別。旺堆將軍包圍了這支分裂隊伍的據點，直到後來，加德滿都得知這一自相殘殺的內亂，它迫使巴巴益西前往尼泊爾首都。接著他跟以尼泊爾的內政秘書為首的尼泊爾人進行了為時三個月的私人談判。根據一位目擊者提供的情況，當他們的談判達到高潮時，巴巴益西放聲大哭，懇求保護，然後以獲得政治避難為交換，向尼泊爾人提供了國防自願軍的軍力、給養、武器和布防情況。

這時，這場動亂已經傳播到了印度的西藏難民營。有十三座難民營的難民主要來自康區和安多，這些難民營的著名領導人，在這場爭端中站在巴巴益西一邊，確信甲樂頓珠解除巴巴益西的職務，是達蘭薩拉的西藏政府剝奪他們權力的一致努力的結果，而政府主要是由來自西藏中部的人士組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地區性不和(它一直是來自西藏內部的最大威脅)的起源，得歸咎於國民黨的挑撥。藏人的流亡生活剛開始時，國民黨的特務就企圖爭取難民中的一派為其事業服務。他們在所謂的十三集團的一些藏東人士身上獲得了最大的成功；雖然這些藏東人並沒有親台灣的同情感，但他們卻樂於接受大筆財政援助，以作為對達蘭薩拉支援的另一渠道。國民黨利用國防自願軍的分裂局面，竭力進一步離間十三集團和達蘭薩拉之間的關係，而使十三集團與國民黨的關係更為密切。國民黨通過大肆煽動分離主義情緒，在這方面獲得了成功。十三集團企圖改善與達蘭薩拉的關係，但努力歸於失敗。十三集團與流亡政府的關係惡化。十三集團中的一些成員停止向政府繳納稅款，多數藏人每月每人要向自己的政府繳納一個盧比。

1974年初，各種壓力匯合一起，要摧毀木斯塘。毛澤東1973年11月在北京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當面威脅國王，如果國王不關閉西藏遊擊隊基地，他將直接採取行動。比蘭德拉在威脅面前屈服了，他宣布尼泊爾西北部全境為限制性區域，並開始將王家陸軍、警察以及廓爾喀人組成的部隊一萬人大批調入這個地區，那些廓爾喀兵是從國外調回的，他們作為聯合國的維護和平部隊在國外執行任務。由於只有在卡利甘達基峽谷西坡上才有一條狹窄的通道，從波克拉朝北通向焦木鎮，因此即使只是到達木斯塘這塊地方，也是非凡之舉。雖然這些尼泊爾人比康巴人多一倍，但一旦進入交戰狀態，他們取勝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西藏人在這裡的山地待了十五年之後，他們對於這裡地形的瞭解無與倫比，而他們的儲備也夠他們支撐兩年。因此，尼泊爾與中國秘密協調策劃，如果康巴人企圖撤退進入西藏，人民解放軍則從康巴人的左翼驅趕他們。

在軍事上做好了打一仗的同時，尼泊爾政府於1974年3月採取了第一個政治性步驟。加德滿都派使者來見旺堆將軍，提出了交換性的解決辦法：如果康巴人徹底投降，並解散各個營地，尼方將提供近五十萬美元的「復興」援助，並保證讓這些康巴人享有土地權和房產權。當康巴人拒絕後，尼泊爾就企圖動武。4月19日，國防自願軍駐新德里的首席官員拉姆次仁前往木斯塘途中經波拉克時，他卻被逮捕。他被作為人質扣押，以迫使藏人投降，但這還是試探性的行動。拉姆次仁只是遭到軟禁，因為尼泊爾人十分擔心，如果採取任何更為強制性的行動，他們會激怒康巴人(這些人只有一星期路程之隔)，康巴人會下山，「見人就殺」，這是一位觀察家的原話。此外，拉姆次仁還是設法帶出一封信，他在信中命令，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木斯塘基地都不屈服於尼泊爾人的要求。尼泊爾在大不情願的情況下將其軍隊佈置就緒，並要求藏人在7月3日前同意五點投降條件，否則就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前景。當形勢在朝著對峙急劇升級時，達賴喇嘛親自進行了乾預。他作了二十分鐘的錄音講話，要求國防自願軍和平解除武裝，他還派遣達蘭薩拉負責安全局的噶倫PT達卡拉前往加德滿都。達卡拉抵達加德滿都之後，要求尼泊爾釋放拉姆次仁，並準許他與這位遊擊隊領導人帶著達賴喇嘛的錄音帶前去見旺堆將軍及其下屬軍官。尼泊爾人同意了這一建議，準許達卡拉在波克拉與拉姆次仁隨同前往。他們兩人從波克拉乘坐直升飛機來到了焦木桑鎮的斯托爾機場，機場的另一側有一個尼軍平房兵站，周圍集結了數千名士兵。拉姆次仁被扣留在附近的一座房子裡，而達卡拉則騎馬朝北奔跑了一個半小時，來到了國防自願軍的指揮部，一大群康巴軍官已經得知達克拉的使命，他們在司令部等候。

接下來的情況是可悲的。PT達克拉呼籲投降，他首先說尼泊爾將拉姆次仁扣壓在焦木桑鎮，如果遊擊隊希望他能夠得到釋放，遊擊隊就必須解除武裝。這些康巴指揮官幾乎毫無希望地打了二十年的遊擊戰，與地球上最大的國家作對，他們認為達克拉的推理實在可笑。他們開玩笑，說達克拉帶來了好消息，而不是壞消息，因為那天晚上，他們就打算去襲擊那個

兵站，解救他們的同志。直到這時，達克拉才播放了達賴喇嘛的錄音。立即出現了一片混亂，人們暗暗叫苦。帕村站起來要講話，他是內訓處處長，是最受尊重、最為衝動的領導人之一。他說：「我從來未向中國人投降過，我又不能違背達賴喇嘛的命令。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全部返回西藏，寧可在那裡的戰場上戰死，也不在恥辱中貪生。」不過，旺堆與其他高級官員的意見一致，他決定服從達賴喇嘛的命令投降。幾天之後，帕村自刎倒地。其他兩名軍官隨後效法，自殺身亡。他們寧可自殺，也不接受那些自相矛盾的失敗條件。

達賴喇嘛的講話錄音帶，從一個營地轉到了另一個營地，在高音喇叭裡多次播放，因此一隊隊馱畜，馱著武器朝南而去。當尼泊爾得知康巴人的決定之後，它立即推翻了實行交換式解決辦法的諾言。尼泊爾派兵進入木斯塘，開始了「搜捕」行動。全部自動解除武裝的遊擊隊都遭逮捕，被押送到焦木桑鎮，而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則遭到沒收。這種兩面派手法的消息，很快傳到旺堆將軍的耳裡。

旺堆帶上四十名精銳的警衛部隊和遊擊隊的文件跑了，他騎馬奔向西面，奔波於尼泊爾與西藏之間，他企圖最後跑到二百英里之外的印度邊界去，人民解放軍已經在等候他。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中國人兩次出擊，將康巴人攆回了尼泊爾；而尼泊爾人的一次伏擊，又將康巴人趕回了西藏。接著，遊擊隊再次遭到了叛徒的破壞。剛逃跑時，一天晚上他們在夜行軍，一頭馱糧食的驢子丟了，旺堆將軍派了兩個人去找驢子，其中一個卻沒有回來。他去焦木桑鎮，報告了這些藏人的逃跑路線，而他得到的交換條件是緩刑。對立派巴巴益西的隊伍已經被尼泊爾徵用，讓巴巴益西的人給尼軍帶路，來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隊伍當中的四十個人，立即派到了旺堆的右翼，而尼泊爾人則在距印度邊界二十英里的地方設下了一個大包圍圈，這裡有朱姆拉縣境內高達一萬七千八百英尺的定克山口，它是這位遊擊隊領袖的目標。

旺堆於八月下旬抵達定克山口，他命令停止前進。他手下的士兵個個精疲力盡，他們下了馬，坐在山坡上，從這裡可以看到附近的一處人民解放軍兵營，無人主動提出要給馬匹尋找飼料和水，旺堆親自率領五個人，順著小路前去偵察。不一會兒，將軍和他率領的偵察隊，就消失在山口前的一條小小的沖溝裡。又過了一會兒，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們，聽到了一陣激烈的槍聲，子彈是從四面八方射來的。但他們朝自己的坐騎奔去時，看到了偵察隊的五匹馬朝他們奔跑回來，馬上沒有人。他們躍馬揚鞭趕去參加戰鬥，正好看到旺堆一人在獨自朝附近一座山坡上的尼軍陣地發起攻擊，他中彈倒地，其他四人除一人之外都已被擊斃。接著就是一場對射，持續了整整一天。據說，這場戰鬥致使尼軍死亡幾百人，由於藏人在數量上居劣勢，最終他們只好丟棄坐騎，利用繩索爬上了周圍的懸崖峭壁，繞過山口，幾個小時之後逃越邊界，進入印度，受到了正在等候的印度軍隊的歡迎。

定克山口戰鬥結束一天之後，巴巴益西從加德滿都乘坐直升飛機前往山口辨認旺堆的屍體。證實之後，在王宮舉行了一次正式的儀式。比蘭德拉國王親自向參加木斯塘戰鬥的幾十名尼軍官兵頒發了獎章和獎金，宣布了晉升令。在加德滿都市中心的洞尼克爾廣場，支起了一個大帳篷，裡面陳列了旺堆的護身符、手錶、戒指、步槍、茶碗，好奇的尼泊爾人在這裡排隊數日，就是為了觀看這位遊擊隊領袖的遺物。在這些物品旁邊，還陳列著來自木斯塘各個藏軍營地的許多其他東西，有望遠鏡、無線電和輕武器。在洞尼克爾廣場的南邊，也就是中心郵局的正對面，是加德滿都的中心監獄，這裡關押著拉姆次仁和服從達賴喇嘛投降命令的六名康巴領導人，他們在這裡度過了七年萎靡不振的時光，直到1981年國王大赦，他們才終於獲釋。雖然國防自願軍設在新德里的辦事處逃過了遊擊隊的這場災難，但從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它在西藏費盡心血建立起來的地下工作體系，卻也被尼泊爾人出賣了。尼泊爾人將巴巴益西的供詞轉給了中國人。在中國入侵二十五年之後，為西藏自由而進行的戰鬥，似乎在一場悲劇性的災禍中全毀了。

但是，特種邊境部隊保存下來了。六十年代初期，一個獨立於遊擊隊為西藏獨立而戰鬥的秘密團正在組建。男性難民得知這一消息後，從築路營蜂擁來到了火車站的集合地點。他們乘火車來到台拉登；然後乘坐軍用卡車來到了一百公里外查克拉塔軍事基地的第二十二號軍營。他們在這裡入了伍，進行了六個月的基本訓練。起初是由美國人負責訓練工作；後來因為在程序方面發生了分歧，印度軍官接替了全盤工作。儘管如此，在最高一級的軍官之下，全面形成了一個西藏軍官團，這樣就使第二十二號軍營--兵力為一萬零五百人--實際上完全成了一支藏，人們希望它就是自由西藏未來的軍隊的初胚。

特種邊境部隊的首要目的--也是長期的目標--就是要偵察「世界屋脊」不宜居住的山地高原。藏人與印度的陸軍士兵相比，不僅前者比後者在那寒冷的氣候條件下求得生存容易的多，而且無論藏人已經在南亞次大陸居住了多少年，他們都不會染上高原病。印度依靠他們，就從拉達克至阿薩姆的印度的喜馬拉雅山脈領土上設立了基地網。特種部隊的第二個目的不僅是站崗放哨而已。新德里確信，按照亞洲瑞士的觀點，獨立的西藏是一個中立的緩衝國，它能夠起到對付中國的最佳保

護作用。新德里暗自決定，如果發生戰爭，就要爭取贏得西藏的自由，第二十二號軍營可以一馬當先。因此，這支邊境部隊不但要訓練成為能偵察的部隊，而且要成為高原地區的傘兵部隊-這些遊擊隊要精於埋伏、爆破、求生和破壞。西藏普遍憎恨中國人，因此仍然存在著多股地下隊伍。由於有這些地下隊伍，所以選派了第二十二軍營的一些男女戰士(徵召了兩個連的女醫務工作者和通訊兵，以表示西藏婦女樂意為祖國而戰鬥的願望)，要將他們空投到中國人的防線之後。一方面，印度的正規軍正面牽制中國人；另一方面，西藏人則與地下隊伍聯合起來，開闢小片抵抗區，破壞人民解放軍的側翼和後方。

但是，與中國打仗並非迫在眉睫。藏人迫不及待地要與中國人交手，整連整連的藏兵常常違背印度人的命令，越過邊界進攻人民解放軍的前方哨所。控制第二十二號軍營已經成了問題，因此只好將它所轄的基地全部撤到前線二十英里後的地方設營，印度軍隊則佈置在藏人和他們的祖國之間。直到特種邊境部隊成立十年後，它才有機會獲準露一手-在1971年10月下旬的孟加拉戰爭期間，它充當了印度進攻的先頭部隊。

新德里只想幫助東巴基斯坦努力擺脫西巴基斯坦，它確定讓第二十二軍營承擔此項工作，並認為它再合適不過了。第二十二軍營並不是正規軍的組成部分，這些都為秘密進攻提供了最理想的掩護。大約五千人-這支部隊的一半-投入了這場戰鬥，這是一支精銳部隊，它對巴基斯坦的一個主要基地發起了突然襲擊，拉開了孟加拉戰爭的序幕。印度新聞界稱第二十二軍營的官兵為自由戰士。他們繼續作戰，攻取了吉大港城，這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前沿城市，因此，第二十二軍營在印度的防禦界上層人士當中，贏得了它是印度最佳的部隊之一的聲譽。爾後，第二十二軍營回到了自己的基地。1977年選舉結束了印度共和國的緊急狀態，在這次選舉期間，第二十二軍營又獲得了新的名聲，它被認為是英迪拉·甘地的「嫡係部隊」。正如後來所披露的情況那樣，國大黨領袖曾經計劃，如果反對黨的騷動進一步發展，就要依靠第二十二軍營的部隊來鎮壓這些騷動。她還在特別邊境部隊的傘兵部隊基地薩薩瓦準備了一架AN12飛機，隨時準備起飛，如果她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她就會下令飛機將她送往毛里求斯。人民黨獲勝之後，第二十二軍營第一流的反恐怖行動隊，被防於新德里的巴蘭機場。但是，特別邊境部隊的其他官兵只好像以前一樣，留在高原基地無能為力，不能完成自己最終的使命。

遊擊隊的完蛋，第二十二軍營又起不了任何作用，這些情況使得流亡中的藏人進一步確信，為西藏自由而進行的鬥爭，已經落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單巴次仁在談到青年大會轉向恐怖主義計劃時，說：「我們認識到，獨立不會輕而易舉的來到我們手中，必須靠戰鬥來贏得。在戰鬥中我們能否獲勝，那是另外的問題，但我們至少得作好準備。如果必要做好準備，即使機會來臨也會抓不住。」在一系列的會議上，單巴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討論了兩個可能的方案，他們相信任一方案都適於用作恢復西藏綱領：在中印之間或中蘇之間爆發戰爭；大陸內部發生崩潰，如同1911年發生的情況一樣。第一個方案的可能性幾乎每天都存在，因為無論是在中蘇邊界還是在中印邊界，過去都曾發生過許多的爆炸性事件。當前在中亞爭奪優勢的態勢下，莫斯科與新德里結為一體，對付北京和伊斯蘭堡。因此，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的鬥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對抗以及西藏獨立問題，它們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因內部分裂而造成的崩潰，同樣是可能的，因為中國共產黨顯然毫無辦法，它完全陷入了破壞性的、一次接一次的權力鬥爭，例如在百花齊放運動之後，在大躍進之後和在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當中，就爆發了這樣的權力鬥爭。

1977年年底，青年大會計劃成立自由戰鬥聯隊。一方面，青年大會鼓勵藏民學校的所有畢業生，應徵到特別邊境部隊中服役一段時間；另一方面，青年大會又決心將青年大會的優秀戰鬥分子組織起來，直接對中國駐外使館和工作人員採取恐怖行動。對於它們的訓練如何作出安排也進行了探索，決定以登山學校作為幌子來進行。單巴說：「當亞西爾·阿拉法特應邀赴聯合國並受到熱烈的鼓掌歡迎時，我們就已經開始辯論是否轉向恐怖主義。世界顯然成了這個樣子：當你殺了人並宣布破壞活動是你幹的時，別人就認真聽你說話；但當你呼籲為自己的人民伸張正義時，卻無人聽你說話。我們終於開始實施這一計劃，不過這是十分有選擇性的。這種行為與藏人的本質背道而馳。因此，首先我們盡力小心翼翼地弄清楚，訓練在我們的年輕人當中是否也產生消極結果。」

1978年年初，西藏青年大會已開始了遊擊戰爭的教育，它們用的是難民營車間裡製造的木頭槍。早上，青年大會組織男女青年做操，這些人來到野外，身上穿著印有「為西藏而戰」的短袖衫。有一些組織經過仔細檢查之後，在大難民營周圍的叢林裡，接受更為複雜的訓練，時間也得延長。青年大會還擴大了與西藏的地下小組的現有聯繫，同時它還至少公開表示歡迎莫斯科提供支持，雖然這還只是一種可能性，但這種支持並不是義務；自從六十年代中期以來，莫斯科已經增加了對流亡藏民的主動姿態。但是，在事實上沒有發生戰爭的情況下，暴力對於大部分藏人來說，仍然是個微妙的問題，這也就阻止了青年大會的努力。正如達賴喇嘛（青年大會憲章發誓要堅定地接受達賴喇嘛的領導）所說的那樣：「從理論上說，

暴力與宗教觀點是可以結合的，但條件是人的動機以及他的行動產生的結果，必須是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目前又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暴力才是許可的。現在，至於談到西藏，我相信採取戰鬥的姿態有益於在青年人當中保持士氣，但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卻不可能，這只會是自殺。」

截止七十年代後期時，達賴喇嘛自己的西藏獨立計劃，在許多方面已經成熟，難民社會一片繁榮。在經濟方面、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難民社會已經成熟形成了一個連貫的整體，這完全是達賴喇嘛二十年前所希望的局面。達賴喇嘛相信，北京由於再也不能指望流亡藏人的瓦解分裂，所以很快就會被迫屈服。達賴喇嘛堅信勝利就在眼前，因此他對亞洲和西方進行了一系列的訪問，著手重新喚起國際社會對西藏的興趣。這些訪問都是宗教性質的訪問(在七十年代期間，世界各國的藏學中心如雨後春筍，已達數百個)，而這些訪問肯定也會影響中國。自從六十年代初期以來，中國對於國際輿論對於它佔領西藏的合法性的反應，顯然一直非常敏感。毛澤東死後出現的政策放寬傾向大勢已定，也使中國在外交方面採取了一些新的主張。隨著這些情況的出現，達蘭薩拉變得重新樂觀起來--如果迄今為止，還找不到具體原因的話。

單巴的信念也發生了變化。單巴在新聞局待了四年之後，於 1978 年升任副秘書。三年之後，即 1981 年春季，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前往達賴喇嘛的住宅德慶措林報到任職。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外事處首席秘書必須暫時離職，單巴被選定出任這一官職。單巴說：「當我聽到這一消息時，我很擔心自己太缺乏經驗，不能出任這樣的高級職務，我當時沒有信心。但接著我認真考慮了一番，我一生中唯一的希望就是有那麼一天，能夠回歸獨立的西藏，這就是我一直為之奮鬥的事業。人們離達賴喇嘛愈近，感情就愈好，這是很自然的；而無論我做的是什麼，我都知道我是為我的人民服務。因此從這一點來看，我確信這也沒有多大區別，我可以像往常一樣接受這一變化。但對於自己缺乏經驗，我仍然十分擔心。」

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單巴竭盡全力充當達賴喇嘛最親密的助手之一。單巴負責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與外界的信函往來，每天下午當達賴喇嘛定期接見外國人士時，他則擔任翻譯，同時他還要監督政府外交局的多項計劃。單巴三十二歲時，他站在新崗位上回顧了自己在印度的歲月。他回憶到，他的一個妹妹死在未到不丹的高山里，另外一個妹妹則在米薩瑪裡死於痢疾，媽媽死於巴瓦納築路營旁的帳篷中。這時他明白了，他的倖存以及他們整個民族的倖存，都是達賴喇嘛進行重新建設所付出的和平努力的結果。單巴隨同西藏領袖一道訪問了亞洲、歐洲、蘇聯、蒙古和美國。這種旅遊經驗以及他對許多青年大會同僚的觀察使得單巴確信西藏的不尋常希望並不在失敗的遊擊隊，而是在傳統社會的力量，這一傳統社會已經重新建立並正在走向整個世界。

譯注

(1)1961 年 3 月 1 日美國總統肯尼迪下令成立，隸屬美國國務院，由「受過特別訓練」的美國男女組成，任務是按照美國《共同安全法》前往發展國家執行美國的「援助計劃」。後來，日本、西德等國也成立和平隊。

(2) 即現在的孟加拉。

(3)Lop Nor 的譯音。

第三部分

第六章 藏醫--治療科學

1960 年—1974 年

益西丹增醫生順著威廉·施累德左手的中間三個指頭朝手腕上方輕輕壓了一下，他壓的是手掌這一面，然後叫病人低了低頭，醫生再聽了一會兒。五十二歲病人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一副困惑不解的神色。他面前的這位醫生既沒有穿大褂，又沒

有掛名籤。醫生既不發問，又沒有記錄紙和醫療器械。益西丹增醫生身著黑紅色長袍，留著光頭。桔色的襯衣裡面，褂著嵌了綠松石的護身符，鼓鼓囊囊的。他紋絲不動，全神貫注地在深思著。一分鐘過後，他拿起了病人的右臂，輕輕按了橈動脈，似乎是要進一步證實自己的發現。醫生將施累德先生領到了隔壁的房間，打手勢叫他脫去衣服，然後他沿著施累德的背脊骨按了按選定的幾個部位。每按一下，施累德先生就痛得失聲大叫。丹增醫生同情地點了點頭，叫他穿好衣服。

在維吉尼亞大學，益西丹增醫生身著一套實服，他提出了自己對威廉·施累德的診斷。他對施累德先生一無所知，與他相遇也只是在幾分鐘之前。他通過翻譯說：「許多年以前，你抬了一件笨重物品。當時，你傷了右腎附近的一根血管，因而阻塞了體內的氣通過後背正常流動。氣在血管之外聚集，骨頭日益惡化，病情已經相當嚴重。」施累德先生大吃一驚，他證實說，他的頸部和後背下部患嚴重關節炎已有三年。病痛使他幾乎成了殘廢，只好被迫放棄工作。丹增醫生居然能夠重現他的歷史，這使施累德先生更為吃驚。施累德先生回憶說：「1946年，當我從冰箱裡將一個牛奶罐拿出來時，我的背部受了傷。我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當我起床時，背部又一次受傷，再次臥床不起。這一定是整個問題的起因。」

西醫只需依靠 X 光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但益西丹增醫生獨特的高明醫術，使美國的醫術和病人都為之折服。他是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1980年冬天達賴喇嘛將他派來向西方介紹藏醫。杰拉爾德·戈德斯坦博士是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腫瘤學系教授，在這位藏醫短留美國期間，杰拉爾德·戈德斯坦博士與他的工作關係甚密。他說：「可以想像得到，儘管我們努力科學化，但我們觀察能力的一部分卻反而衰退。而另一方面，丹增醫生與當今進行的一切工作完全協調。他使用自己的全部感官當作醫療器械。丹增給我們的病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理查德·塞爾澤博士是耶魯大學的外科助理教授，當益西丹增於 1974 年首次訪美時，他們兩人會了面。塞爾澤博士回憶說：「我專程去觀摩丹增醫生，心中抱有幾分懷疑，但並無惡意。對於我所看到的事實，我既感到驚奇，又感到高興。他似乎就是一部心電圖機器，在解釋脈搏的組成部分。我們西方卻根本沒有這種情況。這是我們尚未認識的醫學的一個方面。」赫伯特·本森博士於 1981 年率領哈佛大學的一些研究人員參觀了藏學中心。本森博士說：「西方的科學文獻當中沒有西藏研究工作的資料。不過，如果能夠發現藏醫數千年發展的價值，那簡直太好了。即使藏人的研究只有部分是真實的，這些東西也就值得研究。因此，難道我們真的能夠無視這一切嗎？」

為了通過實驗室的標準來檢驗藏藥的有效程度，益西丹增醫生在維吉尼亞期間，同意用患癌症的老鼠進行一次實驗。在維吉尼亞大學動物園的一個實驗室裡，丹增醫生對九隻進行了腫瘤移植的老鼠僅僅只觀察了一陣子之後，他開了一副通常的藏醫癌症處方，處方由六十多種成分組成。六隻老鼠拒不服藥，不到三十五天就死了，剩下的三隻老鼠服了藥，結果活了五十三天。第二次的實驗用了十六隻動物，也證實了這些發現。這是自 1967 年以來開展對這種癌症進行研究以後所取得的最為成功的結果。不過更為有趣的是，丹增醫生居然對自己與之打交道的這種癌症的性質一無所知。負責這項實驗的研究人員唐納德·貝克博士評論說：「腫瘤確實有幾百種。那麼，對於生長在一種由近交產生的 3CH / HEJ 雌性老鼠體內的 KHT 還原成形肉瘤，丹增醫生又遇到過多少次呢？如果要請他來確定最好的治療方法，那是毫五道理的。假如他瞭解這些情況，也許他就會有徹底治療的辦法。」戈德斯坦博士又說：「毫無疑問，這是治療癌症的江湖郎中大肆進行活動的領域。無論最終成功與否，但丹增醫生手中卻有成功的東西。」

丹增醫生盤腿坐在自己維吉尼亞的公寓裡，一邊喝酥油茶，一邊用藏語簡要地解釋癌症。他聲稱：「我治療的癌症病人也許有一千人，治癒的佔百分之六七十。我們的醫書認為，腫瘤有五十四種，發病時有三種形式，腫瘤以其中的一種形式出現於身體的十八個部位。我們認為癌症是一種血病，它起源於環境中的污染雜質。這些污染物質反過來又可以影響體內七種有感覺的生物，其中兩種極易受到影響。這些生物極為微細，但假如人們可以看到它們的話，這些生物是圓的、紅的和扁平的。它們在血液中游動，瞬息即逝，最初形成於子宮中的胚胎，通常的作用是維持體力。總的來說，佛祖曾預言，我們時代流行的疾病有十八種，原因有二，一是道德行為敗壞，二是污染。癌症是這十八種疾病之一。」

基於益西丹增第一次實驗所得出的結果，與他一道工作的那些醫生，希望在西方更為廣泛地開始對藏醫的研究。丹增醫生同樣熱心交換醫學知識。丹增醫生在即將結束他在維吉尼亞的短留時，作了下述評論：「我認為，如果西醫能夠逐漸認識藏人對於人體結構的看法，其益無窮。藏醫對於疾病有許多療法，西方醫生目前並不明白，或者理解不對。我們能夠成功地治療糖尿病、各種形式的冠心病、關節炎、肝炎、震顛性麻痺、癌症、潰瘍和常發感冒，我們治療癩癩和癱瘓有困難。但因為藏醫體係是科學的體系，所以作為科學家的西方醫生，自己可以發現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沒有價值的。」為了說明藏身於喜馬拉雅山後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科學，益西丹增講述了自己的平生，講述了他成為藏醫醫生的學習階段。

1929年，丹增醫生出身於小村莊納木羅的一戶富裕農民家庭。納木羅村位於雅魯藏布江南岸，騎馬去拉薩有一天的路程。納木羅村周圍的很多土地，都是丹增一家及其親戚的財產。益西丹增的姨媽、姨爹擁有五千隻羊、犛牛和馬匹，還是很多塊青稞地的主人。因為他們沒有男孩，所以心想丹增長大後能夠繼承接管這些家產。但是，丹增的父母卻另有打算。他們只有這麼一根獨苗，因此決意要讓丹增投身佛門。所以，當他們的兒子六歲時，他就離開了家，在納木羅村後的山上爬了短短的一段距離之後，就進了雪珠林寺，被該寺接受當了喇嘛。丹增醫生回憶說：「我對這一切仍記憶猶新。我成了喇嘛，來到了喇嘛當中，過著舒適的生活，與我的老師生活在一塊。我強烈希望能夠快快學習，我的頭腦十分清楚。我一天就能背誦四頁書，我們那些書一頁都很長。由於益西丹增長於背誦，因此他在自己那些同年人當中贏得了很高的地位。也就是在此基礎上，他十一歲時中選代表雪珠林寺前往門孜康，它是拉薩國辦的兩家醫學院當中的大醫學院。政府要求雪珠林寺像其他寺院、宗（縣）政府和軍營一樣，派學醫的學生前往拉薩。這些人結業之後，還得回到原來的地方行醫。但是，雖然雪珠林寺也有學醫的學生（政府因此也付給寺院的年長喇嘛一筆報酬，而這些喇嘛對這筆薪俸並不反對），但這裡的四百名喇嘛對於將來去學醫並不熱心。丹增回憶時笑出了聲：「寺院裡的喇嘛人人都擔心會選中自己。大家都不願意當醫生。當醫生的至少要在課堂裡學習十一年，要背的書多的可怕。但是，因為我喜歡背誦，所以當我父母說我選中了時，我倒十分高興，一心想走。」

益西丹增要學的醫學，起初是大乘佛教僧人所追求的十門學科之一。在印度北部的大寺院裡，這一醫學繁榮了一千多年。公元前一世紀，兩名印度學者將這一醫學傳入西藏。從此以後的近七百年時間，它一直是服侍藏王室的一個醫生世家涉足的領域。但是，由於六世紀時傳入的佛教醫書超過百部，因此醫學逐漸廣為流傳。最後在西藏召開的一次由來自九個國家的醫生參加的大會上，大家認為這是當時傑出的醫學。後來，八世紀時，藏王赤松德贊在拉薩南面的貢布，辦起了西藏的第一家醫學院，起名梅隆，即「醫學之國」。在梅隆的帶動下，又有幾十所藏醫學校問世，它們多數辦在大寺院的紮倉裡。十七世紀中葉，五世達賴喇嘛創辦了西藏的第二家醫學院，即鐵山之上的藥王山醫學院，它位於布達拉宮的對面。來自西藏各地和蒙古各地的醫生雲集於此，學習多年發展起來的醫學各流派的成就。由於現代社會需要更多的醫生，因此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16年創辦了西藏最新的中心醫學院，即門孜康，意即「醫學之家」。

門孜康位於拉薩城西(1)，與新建的政府郵電局為鄰，中間是個地面鋪著石板的院子，兩旁有一長排房子，它們是僧俗學生的宿舍。在這兩排房子的上端有教室、會議室和院長的住房，這裡正對大門。門孜康內的生活十分艱苦。每天早晨四點鐘，院子頭上的主殿裡的鐘聲敲響，益西丹增用幾分鐘時間洗洗臉，疊好被子，然後匆忙趕到教室，開始在柔和的酥油燈下背書。因為人們相信早晨起來大腦最清醒，所以日出前的三個小時全用來背誦醫學經典。這些經典共有一千一百四十頁，佛祖佈道時也用了這些經典，它們與數百篇論文和藥物目錄一道構成了藏醫基礎。早晨七點，老師對學生進行小測驗，看看他們早上背書的效果如何。然後學生們回到自己的房子，喝上一天的頭一碗茶。接著，第二次鐘聲敲響，全院師生結合，坐在有柱子的大廳裡祈禱，形成了從大廳的一頭到另一頭的長長一列隊伍。牆上掛著唐嘎畫，圖案是草藥、人體骨骼、胚胎發育和外科器械。益西丹增在回自己房子的路上，要經過門孜康院長肯繞羅布的住房，在他的房外排列著等候治病的人們。高年級學生在老師的觀察和指導下，為病人看病，而其他的教授則和藥王山醫學院的全體醫生一道分成若干小組走向城中，上午來到病人家中看病，因為這些人病情太重不能去醫學院。看病免費，要付費的只有藥品，西藏的情況總是如此。

雖然益西丹增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背書，但他還是常常到門孜康的主要藥劑師的房裡，去看看他和他的助手。他們的房間在正門的東面，中間隔兩間房。他們將各種各樣的根、莖、葉、枝以及多種寶石、礦物質和畜產品捶成很細的粉末，這是製藥的第一步，這些原料用於門孜康常用的二千種藥當中。他們的工作壓力很重，門孜康里到處都是做藥的原料。這些草藥是山上採來的，氣味刺鼻，有數百種，學校的門廳過道、教室里和房頂上全都曬了草藥，而用藥時要麼是粉末，要麼是烏亮的黑丸子和棕色藥丸。

學生晚飯吃得很早，下午五點就開餐，然後全體學生再次集合，這次是練習辯論。學生在院子裡坐好，院長一聲令下，全體學生即開始高聲大氣辯論開來，還不時擊掌。一些學生發問，另一些回答，這些問題涉及的是醫學經典對各種疾病的原因、狀況以及治療方法的敘述，要對這些敘述作出正確的解釋。辯論常常十分熱烈，當長達五個小時的辯論課結束時，還有一組組的學生在繼續辯論，直到深夜。他們周圍還坐著一些入了迷的旁觀者，他們都將長袍緊緊裹住身體，以御風寒。

兩年零四個月之後，益西丹增完成了醫學經典的背誦。接著他在自己的老師面前整整背誦了一天，而習慣做法是這一考試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分段進行，但他卻拒不分段進行。在他房間的五個人當中，儘管他年紀最小，但他卻升級當了高年級學生，參加了正式考試。考試用了四個上午。他的父母特地從納木羅村趕來觀看考試，而他的故寺雪珠林每天上午則供應一

次茶水。當時，益西丹增還只有十三歲半，他在集會廳裡露面了，面前有門孜康的院長、全體教員和學生，他朝著擺在佛龕上的藥師佛像和西藏名望最高的醫生宇妥·雲登貢布像叩了三個長頭，接著逐字背誦四部醫典的一百四十六個章節。根據要求，有時按順序背誦，有時跳開一些章節背誦。只允許出一些小小的差錯 - 任何失誤都會成為失敗的原因。第四天的下午，益西丹增得知他成績優異，通過了考試，獎給了他一條白哈達和一套緞子封面的書，他被這一家醫學院接受，開始了正規的學習。

接下來的十四年時間，丹增醫生專心致志進行了十一個方面的學習。為了讓學生對藏醫體系有一個概貌性的瞭解，門孜康的課程從醫學樹解釋圖開始，這張圖標出了醫學的各個領域在整個醫學中所佔的應有位置。益西丹增和他的同學從八廓街(市場)買來了彩線、棍子和鮮艷的塑料扣。在他們房前的大石板上拚湊這棵樹。這棵樹有三條根、九根樹幹、四十三條樹枝、二百二十四片樹葉、三個果子和兩朵花。他們掌握了這幅圖之後，就學習怎樣將醫典中的各個章節與醫學樹的各個組成部分對照起來，然後他們學習第一根、第一幹、第一枝。它們解釋的是三種體液，這些體液是藏醫系統的理論基礎。

正如佛祖在第一部經典(即本典)中所解釋的那樣，眾生的健康受三種體液的支配，它們是氣、膽汁和黏液。經典認為，氣的特性是暴、堅硬、冰冷、難以捉摸、漂移不定；膽汁重量輕、油膩、具有腐蝕性、很熱；粘液則黏性強、清涼、很重、十分柔和。每種液體又分為五類。它們和諧地構成了人的有機體。五氣支配人的動作、呼吸、血液循環、分泌以及知覺與身體的聯係；五種膽汁支配消化、視力、膚色；五種粘液支配身體的內聚性，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功能。一個成年人的氣能填滿膀胱，膽汁能灌滿陰囊，粘液用雙手能捧三把。雖然這三種液體在全身都起作用，但骨盆裡起主導作用的是氣，在軀體中部起主導作用的是膽汁，而在軀體上部起主導作用的則是粘液。氣在骨骼中移動，膽汁在血液中流動，粘液在乳糜、肌肉、脂肪以及再生液體中流動。在青少年時代黏液居主導地位，成年時代居主導地位的是膽汁，老年時代居主導地位的是氣。當所有的體液處於平衡狀態時，人體就健康。但只要出現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不平衡，也會產生疾病。任何疾病 - 醫典將疾病分為一千六百一十六類，共八萬四千種 - 的治療都在乎糾正體液的不平衡狀態。藏醫具備這一無所不包的理論，因此，無論是已知的疾病還是未知的疾病，藏醫都可以對其進行治療，神經病也不例外。因為不僅人體本身受制於人體內體液的平衡狀態，而且人的性格也是如此。

丹增醫生在知道體液能起作用的情況下，他繼續學習胚胎學、解剖學、新陳代謝功能、死亡預兆、病理學、治療和診斷。藏醫關於胚胎學的醫典章節，先於西醫二千年，論述受孕、接著扼殺胚胎每星期發育的情形(其中包括在發育的關鍵階段胚胎的意識實質)。書中還介紹了分娩前確定嬰兒性別的方法、將分娩時間減至二到四個小時的藥、防止產後感染和治病的藥。接下來就是學習解剖學。只有當負責治療的醫生對死因持異議時，才進行屍體解剖。因此，門孜康學生的解剖知識是從一些詳細的掛圖中獲得的，這些掛圖畫於八世紀末葉，當時藏醫的外科書正值全盛時期。在那時，西藏的外科醫生常常進行心臟和大腦外科手術，直到後來，第三十八代藏王木尼贊普的母親在接受減少心臟周圍積水所造成膨脹的外科手術時，她死了。繼她死後，外科手術被官方禁止。但是，小手術仍在繼續進行，門孜康仍可以使用外科器械，仍可使用麻醉藥。新陳代謝功能和死亡預兆這些課程比較簡單，但病理學、治療與診斷則十分複雜，需要益西丹增付出最大的努力。第二部醫典(即口傳醫典)中的九十二章，分別說明了數千種疾病的分類、癥狀以及併發症，此外還附有在各種情況下這些疾病的治療方法。這裡證明背誦醫典是極為有益的，因為益西丹增在掌握了歷史上一系列藏醫醫生寫的評論之後，他就通過單液體不平衡、兩種液體不平衡或三液體不平衡的情況，逐漸在自己頭腦中構成了人的整個疾病範圍的複雜圖畫。不過，學習診斷則更為艱難。醫學樹診斷根的三根樹幹、八條樹枝和三十八片樹葉不同於高深理論，它們必須通過實踐方能徹底理解。診斷的關鍵是詢問病人和分析尿液九個方面。然而，優秀醫生的標誌卻是看他是否掌握了第三樹幹，即看脈。

儘管門孜康要用整整一年的時間教學怎樣看脈，但人們確信要想徹底弄清看脈這個問題，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最後一部醫典的十三個章節，論述了這方面的基本知識，前四個章節詳細論述了在看脈前一天晚上需遵守的八條指導原則。為了作好準備，病人和醫生都應克制，不要喝茶，不要飲酒，不要吃營養過多的食物，而且還要避免運動，不要同房，不要做引起憂慮的事情。翌日清晨，當太陽升起，但「陽光還沒有落在山頂」(這是醫典的原話)時，就應該看脈。人們相信，在這一段短暫的時間內，兩個決定性因素 - 熱力和寒力 - 最為平衡，這兩個因素無一例外地都是人們脈搏、疾病和內科的特點。黎明前，月球的影響在起作用，表現為冷脈(負脈)提高，加重了氣和黏液；黎明後，太陽的影響在起作用，增加了膽汁和血液(血液有時被說成是第四種液體)的熱脈(正脈)。因為病人沒有進食，所以消化並不妨礙其他功能，而在睡覺時，五氣逐漸深深沈入中心血管，按照醫典的理論，精神與肉體就在這裡結合。

據說，摸脈的最佳位置是病人的手腕，比動脈方位略高一點。最後一部醫典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摸動脈呢？」醫典給予了答復。聽靠身體關鍵部位的動脈，「如同在瀑布旁同別人講話」，而如果聽的是身體的邊遠部位，這就如同收到的是「遠方商人帶來的消息」。橈動脈是最佳位置，它被比作是「夏天曠野上的高聲呼叫」。醫典繼續發問：「摸橈動脈，又怎麼可以知道人體十二器官的狀況呢？這就正如同成功的商人在市場上看商品，他能知道商品的產地和產家一樣，在橈動脈處摸脈也就能夠揭示空心器官和實體器官的狀況。」只有當病人是小於八歲的兒童和晚期疾病患者時，摸脈的方位才改在他處：前者是摸耳垂上的血管；後者則是摸腳踝骨後的脛骨動脈。

面前醫生學習的是摸脈方法。如果病人是男性，則先摸左手；如果病人是女性，則先摸右手，然後換手，醫生再摸病人的另一隻手。無論是哪種情況，醫生可任意使用左手或右手的中間三個指頭，手指之間的距離是「一粒米」那麼寬，為了對付小臂肌肉很厚這一情況，醫生的食指按皮膚，中指按肉，無名指按骨頭。診脈的要素解釋如下：兩隻手的中間六個指頭每一個都被分成「里外」兩個部分。這十二個部分能摸到各個器官的狀況；手指外部負責空心器官，手指裡部負責實體器官。例如，醫生右手食指的外部能感覺到心臟的狀況，裡部負責小腸；中指外部負責脾，裡部負責胃。除一種情況之外，六個指頭的用法對男女均無區別。當遇到男性病人時，醫生的右食指摸到的是心臟狀況，左食指摸到的是肺部狀況。而遇到女性病人時，情況則恰恰相反。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同情況是因為醫生相信，當受孕時，女性的意識進入受精卵的中心位置與男性略有不同。因此，醫典告誡醫生要時常保持手指尖「光滑、敏感、沒有傷疤，要柔韌。」

在摸脈之前，還有最後一點需要注意。共有「三種脈搏」，與三種體液相對應，人人無一例外地要取其一種。男性脈搏如氣，大而明顯；女性脈搏如膽汁，微細而速度快；中性脈搏如黏液，速度慢而平穩。除非醫生知道病人的脈搏屬於哪種類型-無論男女均可屬於任何一種脈搏(而醫生又只能在病人健康時才能檢查出來或由別人提供這一情況)，否則，很容易發生診斷上的錯誤。此外，一旦知道了脈搏類型之後，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必須考慮，即「季節性脈搏」-每一季節對某一特定的器官的脈搏特性產生影響，如夏季的炎熱可以影響心臟，冬天的寒冷可以影響腎。

醫生首先要弄清疾病是熱性還是涼性。醫生以自己的呼吸周圍作為標準，確定病人的脈跳頻率。如果每呼吸一次脈搏跳五次的話，就說明這個人身體完全健康。脈跳超過五次說明是熱性紊亂；少於五次是涼性紊亂。高出八次的熱性紊亂和低於三次的涼性紊亂的人病情極為嚴重，通常無法醫治。

一般來說，熱脈和冷脈又可細分為十二類，病人總得歸於其中一類。熱脈有六類，它們是強脈、足脈、搖擺脈、快脈、緊脈和硬脈。冷脈也分六類，它們是弱脈、深脈、衰退脈、慢脈、松脈和空心脈。如果醫生的手指剛剛觸及橈動脈，就從皮表上感覺到這是熱脈，那麼醫生就知道病人患病不久，且並不嚴重。如果在施加壓力之後，感覺深沈，那麼這就是慢性病，而且很複雜。而冷脈的情況則恰恰相反，表脈說明是老病，且病情嚴重，深脈表示是新病，只是略感不適。這是第二步，從此就可以知道病史了。

現在探索的是體內三種液體的狀態。每種液體及其結合體都屬於一種特定的脈型。認識到這一脈型之後，就要在大量的情況中，找出屬於某種情況的具體脈搏來。如果病人是孕婦，那麼「孕脈」就會表明這一點，而且還能在六週之後知道胎兒的性別。如果有腸蟲的話，脈搏則「軟弱無力」，跳動時似乎要打結；如果有細菌的話，脈搏則不會完好，「跳動的節奏不正常，會突然出現無法預測的停頓。」當病人患的是麻瘋病時，脈搏每跳完一次時會「顫抖」收縮，「就像人的一癱一拐地行走似的」。受傷之後，脈搏「沉重、僵硬、速度快」。體內如有子彈的話，脈搏就像「跛子行走，有一對脈」似的，像是摸到了兩根動脈，而不是一根。醫典在介紹了怎樣區分脈型之後，接著就講解了怎樣通過手指尖上的十二個部位來瞭解各個器官的狀況。大約要聽脈搏跳動一百多下，醫生摸脈才算結束，這樣醫生也就知道病人是屬於哪種體液不平衡，其嚴重性如何，影響的器官是哪些，這些器官又是怎樣受到影響的。

然而，正如益西丹增及其同窗所清楚的那樣，脈搏診斷這一題目的學習還遠遠沒有結束。在後來的章節中，引用了超出規則的許多例外，論述了怎樣利用脈搏來確定壽命長短，確定人是否著魔，「令人不解的七脈」這一極為複雜的章節，論述了疾病未來起因。在第十一節中，介紹了能夠說明晚期疾病的脈搏，這一點表明醫典是多麼真切。

「變化中」的死脈，被描述成「在風中飄揚的旗幟」；而「不規則」的死脈，則似乎像「捕捉小鳥的禿鷹，它時而停頓，時而俯衝，時而快速地拍打翅膀，時而再次停頓，然後又在空中飛翔」。當病人的氣與膽汁同時出現紊亂時，病人的脈搏就像「水中一躍而起捕捉蒼蠅的魚兒，很快又沉入水中」。黏液與氣聚合所產生的死脈，如同「雞啄米」一般；三種體液紊亂所產生的脈，就像「在風中行走、直流唾液的母牛」。接著，醫典列出了與諸體液無關的各種死脈。如果遇到意外事

故的健康人脈搏微弱，那麼它的死期就不遠了。如果病了一段時間的人脈搏突然變得強勁有力，那麼這也就是死亡臨近的徵兆。如果沒有脈，死期也就在八天之內。如果摸不到肝脈或膽囊脈，人就會在三天後死去；沒有肺脈或大腸脈的人只能活兩天；如果舌頭髮黑，目光呆滯，沒有心臟脈或小腸脈的這樣的人只能活一天。

丹增醫生真正開始學習診脈，還是在他結業之後。他十八歲時，門孜康院長肯繞羅布讓他去當四年的實習醫生，就學於在山南行醫的一位名醫門下。這位名醫周圍已經聚集了許多門徒。這是丹增醫生學習的第二階段，他每天拂曉前就起床，摸脈、分析小便，並將他對病人病情的診斷向他的新老師報告。隨著他對無數脈型的認識不斷提高，他逐漸產生了對整個藏醫體系的深深敬意。雖然晚期病人無法治愈，但有些人患了些通常為不治之症的疾病(如癌症和糖尿病)，藏醫療效卻很好，能夠使人痊癒。至於糖尿病，在二三百個病人當中有一人患糖尿病，他親眼目睹很多人在六至九個月內就完全治愈。當藥物無效時，丹增和他的老師就採用其他輔助治療手段，這些治療辦法是催吐劑、瀉藥、艾灸、燒灼、放血、針刺療法(「金針」療法)。根據藏醫歷史記載，針刺療法源於西藏，後來通過蒙古傳入中國(2)，益西丹增發現的最成功的治療方法，其中包括衰老治療法(用的藥為記憶丸)，劃分婦科疾病和兒科疾病的方法，八種不育症的分類，這八種不育症本身就構成了醫學中的一大類別。雖然有兩種避孕絕藥丸，但卻很少服用，原因是不符合佛教的倫理觀念。其中一種要連續服用幾天時間，效力為一年；另一種藥丸則可終生絕育。

另一相關專業名叫「曲龍」，意即「吸取精華」。它以返老還童為目標。據信，如果服用這類藥，三年、九年、甚至十二年的修行者在偏僻的山洞裡，每天只需吃上一顆種子或一朵花，也能保證不死。而對於凡夫俗子來說，「曲龍」則可以使頭髮和牙齒復生，同時還可以將人的壽命延長十乃至上百年。正如丹增醫生所解釋的那樣，「人每天要呼吸二萬一千次，而其中五百次與壽命有關。如果服用曲龍藥，加上修禪無誤，這樣就能增加與壽命有關的呼吸次數。從我自己的經歷來看，我敢肯定這樣做是有效的。採用過這一療法的人我認識好幾百，他們五十歲才開始這一療法，看上去卻已回到了中年時代。我遇見過一位喇嘛，當時他已是一百七十歲高齡的老人了。他一頭白髮，但面容看上去就只有四十歲。」

西藏醫生採用返老還童療法已有二千年歷史，因此他們認為這是藏醫的普通組成部分。然而，還有一種藥也同曲龍一樣受人器重，這種藥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藥名叫仁青里布，即「珍珠丸」。每每丹增醫生回到門孜康為他的教授補充藥品時，丹增總是要弄清楚醫學院的藥房裡最近生產了什麼樣的珍珠丸。珍珠丸共有七種，藥性最弱的珍珠丸由十八種原料配製而成，藥性最烈的由一百六十五種原料配製而成，被譽為藥中之王。珍珠丸用彩布包裹，繫上彩帶，封上臘。珍珠丸之所以得此名，原因有二：它的配料--金、銀、水銀、珍珠、紅寶石和鑽石，這些原料經過特殊處理，然後與各種草藥混合在一起；它的功能--對整個身體有益的靈丹妙藥。據信，珍珠丸能夠治好最難醫治的疾病。由於珍珠丸的配製有時需要二十名藥劑師日夜不停地忙上三個月，所以珍珠丸藥性很烈，用藥得嚴加控制。烈性珍珠丸能使病人一天臥床不起，與此同時，毒性則被珍珠丸殺死，體內的紊亂狀態得到糾正。雖然益西丹增對珍珠丸的成份很熟悉，但他在當實習醫生期間，主要任務是提高自己對藏醫大藥典的認識。為了檢驗丹增的進步，肯繞羅布要求丹增醫生隨醫學院的師生一道上山採藥，醫學院每年要採一次藥。

7月剛剛開始，他就上山採藥，同他一道上山採藥的還有完成了背誦學業的學生以及一些老師，通常總共為三百人。一般說來，每個人要攜帶三套換洗衣服，因為佛祖強調，採藥時保持清潔十分重要。兩名學生配一頭馱畜和一名馬夫。這支隊伍離開了門孜康，他們環繞拉薩城走了一圈，然後朝北行進，走了一天來到了大芽巴。這裡群峰四起，有一片又一片的寒帶草地，是採藥的好地方。政府已經在這裡為醫學院的師生紮下了一個大帳篷營，配備了廚師，並提供了充足的給養。學生和老師分成若干小組，每三天換一個地方，每天上午八點出發，就在略低於雪線的地方採藥，七週時間天天如此。他們一邊採藥，一邊向藥師佛誦經，專心致志，力求精神與肉體均純潔無瑕。草藥被分為三十科，再細分為五十九類，每一種草藥均可分為九個小類，他們尋找的就是這些草藥。他們採到的其他草藥還有數百種，不過價值不及前者。由於這時候植物成長(迅速)會產生上臘作用，也開始授粉，因此他們不太重視樹皮和植物的分泌液，而注重的是花、果、籽、葉。

夏季過了一半之後，大板條箱子開始從拉薩源源不斷地運來，這些箱子裡裝的是西藏中部地區所沒有的幾十種草藥，都是幾個月前就與各省(3)的省長訂好了的。人們小心翼翼地採來了這些草藥，草藥的根鬚上還帶著泥土，隨即用冰雪將其包裹起來。八月末時，這些木條箱子全到齊了，學生們也完成了自己的採藥任務，準備好迎接年終辨認植物的考試。

考試在一頂大帳篷裡舉行，四周有高高的圍幔，帳篷裡排列著一行行木板，上面鋪了白棉布，白布上面雜亂無章地擺著二百種挑選出來的植物。肯繞羅布主持考試，他坐在帳篷一頭的一張高高的椅子上，另外還有三位老師，每人配有一名秘書

為助手，由他們帶著學生從桌子前走過去。學生要回答提出的問題，分別說明每一樣東西是什麼類型，屬於哪個物種，以及藥用部分的藥性。考完的學生在別人的陪同下，從帳篷後走出去，並要與那些尚未參加考試的學生隔離開來，然後另外三名學生接著參加考試。這些人在進行考試時，前面學生的分數表已經填好，送到院長手中，然後院長向全體師生公佈分數-這個辦法是為了保證能夠增強學生們已有感覺的緊張心理。考試完畢之後，學生們又被老師領著在桌子前走一圈，這一次是為了將他們的錯誤之處指出來。

門孜康大多數有志向的醫生都參加過五次考試，然後他們才能正確辨認每年大部分的植物。益西丹增在他一、二次考試中分別名列第六十二和第四十五。當他二十歲，他的實習期也已結束，他獲得了第三名。十分湊巧的是，以前與他同一寢室的同學分獲一、二名，這樣他們三個人就囊括了最前面的幾個名次，因為他們的分數十分接近，所以肯繞羅布下令再組織一次復試。這一次，三位年輕人的眼睛全給蒙上了，被人領著在桌子前走了一圈。考官將草藥樣品依次拿起來，叫這幾個年輕人根據嗅覺和味覺來辨認這些植物。益西丹增回憶道：「這種考試難度很大，但幸運的是，我們都能夠給予正常的答復。當考試結束後，宣布我名列第一」。不過，後來，他笑著補充道：「我發現這裡面有蹊蹺。因為我是畢業生，所以我的那些朋友假装出了一些小差錯。事實上我是第三名，但好在他們的這一詭計，我才被確定為醫學院的最佳學員。」

考試之後，舉行了大型慶祝會，其規模與畢業慶典不相上下。公開宣布學生們的名次，親耳所聞的有好幾百人，他們是從拉薩以及周圍的村莊趕來的。榮獲一、二名的學生，獎給長長的綢質哈達，上面繡著「日夜吉祥」幾個字。獲得下面名次的學生就沒有得到這麼好的待遇。倒數第五名被稱為「扛藥的人」--意即「護士」，是諷刺話，他得到的是藍色的醫藥包，醫生的助手均用這種包。倒數第四名叫做「看門人」，他穿的是政府僕役穿的黑袍，站在帳篷的入口處：倒數第三名是一身趕騾人打扮，他與倒數第二名和最末一名一道不僅被轟出了醫生的行列，而且被排斥在人類之外--他們分別被稱為「白驢和黑驢」。他們的頸上掛了鈴，繫了韁繩，背上馱著藥品。這些「驢子」被人驅趕繞營地行走，邊走邊叫喚，引起眾人大笑不已，然後大家共進野餐。翌日，全體師生返回拉薩，在大昭寺前舉行了一項儀式。這樣學年就告結束，放假一個星期。

丹增醫生畢業後，他給肯繞羅布做了三年的特別助手。晚上，丹增醫生繼續與門孜康的高年級學生和老師展開辯論。每月他去林廓(拉薩城的轉經道)一次，為那裡的數百名窮香客和乞丐治病，因為這些人很少來求醫。除此之外，他還特別注意加深對醫生守則的十一條誓約的認識，這些誓約旨在灌輸這樣的觀念：醫生行醫的基本動機，就是要為他人服務。益西丹增在談到自己實踐這一歷史悠久的守則時說：「我也是常人，同樣遭受著欲、恨、惑的折磨。但是通過反復思考在我行醫中所看到的痛苦，我一直在努力增強我的憐憫心。作為醫生人們希望我們能夠為其他人好好服務。」另外，丹增醫生出於好奇，每天要花兩個小時，去英國的外交代表處，在那裡熟悉西醫。1951年，肯繞羅布終於將益西丹增的畢業證書，送到了噶廈的辦公室，證書得到了該辦公室的正式認可。然後噶廈發函洛卡的宗(縣)官員和政府的運輸中心，他們為丹增醫生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使他分文未花就返回了家鄉。在丹增醫生學生學業開始後的十三年，他離開了拉薩，期望自己能夠獨立開業行醫。

他沒有等待多長時間。當時，在不丹邊境爆發了一場流行病，它是由從印度回來的商人引入的--這些商人帶來了巧克力、電池、絲綢和為人喜歡的淺頂軟呢帽。西藏地處高原，細菌很少，染上了這種病--一種腸胃道流行病--的人很快就死去了。幾十名醫生已經雲集這一地區。

丹增醫生來到了桑洛林寺，這裡已經來了三位醫生，他們一直在控制流行病，但卻並不成功。這家寺院的三百名僧人已經死了九個，寺院下方還有一個村莊，村民亦死去了很多。在夜色即將降臨時，丹增醫生來到了目的地，他被領進了一間房子。在這裡他首先是照例進行晚祈禱，然後入睡，期待著明天早上就可以診斷他的第一批病人。夜間，他卻做了個不同尋常的夢，按照西方標準，這個夢似乎難以解釋，但它卻體現了在藏醫中宗教與科學的密切關係。「那天夜晚，我夢見一位赤裸裸的女人來到了我的身旁，即一位卡卓瑪。」丹增醫生說，他所說的卡卓瑪指的是神靈，據說這位神靈像天使一樣能夠幫助陷入沉思的醫生。他接著說：「她右手拿著一面密宗鼓，左手拿著一個頭蓋骨，左腋夾著一袋子藥。她的面前有一隻白色的錫杯，杯上的圖案是紅的，杯沿有道小的裂紋，杯中盛滿了人尿。這女人問我：『查驗了這杯尿之後，你能告訴我病人得的是什麼病嗎？你的診斷如何？』在睡夢中我看了看那杯尿，然後回答道：『這就是今天的流行病。醫典預言，我們這個時代有十八種疾病，分為六十五個類型，這就是其中的一類。』她問：『病因是什麼？』我回答說：『原因是環境污染，醫典就是這樣寫的，這是一種熱病。』她說：『你講從外部看這是發熱，但你能斷定，從內部說這就不是傷風嗎？』當時，因為我常常學習還記憶猶新，所以我回想起了第三部醫典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這兩章將冷、熱疾病放在

一起論述。我以辯論的形式答復了她，並引用了醫典原文作為依據，說並不存在什麼隱藏式傷風發熱病，這種疾病里外均屬熱性病。我們你來我往地辯論了一段時間，最後她說：『那你怎麼治療呢？』我回答道：『因為引起這一疾病的細菌將血液和膽汁已經混攪起來，所以就應下藥將血液與膽汁分開。』接著她又問，病人的起居飲食該注意什麼--這些總是治療服藥時要注意的兩個方面。我回答了這一問題，她又說：『再給我講一遍，你怎麼治這種病？』我們再次進行了熱烈的辯論，然後她笑出聲來，忽然間消失得無影無蹤。接著是一片寂靜，我醒了過來。」

破曉後不久，有人給丹增醫生送上了茶。然後，被請去看第一個病人，這位患者是僧人，二十三歲，衰弱無力，躺在自己的房中。丹增醫生繼續說道：「我去給這位年輕人看病。他的病情十分嚴重，房間裡臭氣薰天。他腹瀉非常厲害，大便中有血，控制不住拉在床上，人處於半昏迷狀態；他不能說話。我請人將他的尿拿來，一隻裡面盛了他的尿的錫杯端到我的面前，倏忽我想起了那個夢。杯子一模一樣，杯的邊緣也有裂縫。哦，我以前已經察看過這杯尿，我心裡這樣想。我感到吃驚。接著，夢的全部過程又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回想起那場辯論以及治療方法，我隨即準備好了對症之藥。這人的病給治好了，此後村莊裡的流行病也得到了徹底的控制。現在，每當我回顧這件事，我總覺得，無論那天晚上以卡卓瑪的身份來到我身旁的人是誰，實際上是這個人對我進行了最後的考試。」

隨著丹增醫生的名聲傳開之後，在五十年代剩餘的那段時間裡，他從一個宗走到另一個宗，四處行醫。他敘述說：「每天，我騎著馬串村走鄉，定期返回拉薩取藥。我能夠治好四分之三的病人。由於我對皮膚病注射青黴素-這在藏人當中是件新奇事，所以我的名聲在繼續增長。我從未休息過一天。」他親屬當中的一些年輕人開始跟隨他學習。但不久之後，拉薩爆發了反對已歷時九年的中國統治的鬥爭，達賴喇嘛也跑了。丹增醫生回憶說：「當神聖的達賴喇嘛一行經過我家鄉時，我見到了他。那些沒有跟隨他的人則參加了遊擊隊，為爭取我們的自由展開了殊死的戰鬥。我的學生都有親屬在家，他們不能拋下親人。我的母親雙腿不好，不能外出行走，我父親則說年紀大了，去不丹要翻越高山口，他不行。由於我是僧人，所以我不能投入戰鬥。因此，我感到除了一走了之外，別無他法。我借了一匹馬，告別之後就上路了。」

雖然納木羅村距離邊界只有幾天的路程，但因為有中國軍隊，迫使丹增醫生躲藏了一個多月，最後他才與八十名難民一起從一道雪坡上走下來，越過了一條河谷，涉水渡過了一條冰冷的溪流，然後進入了不丹的森林地帶。丹增醫生身上只帶了幾本醫書、一些器皿和藥品。他沿途乞討，步行穿過了不丹。丹增醫生回憶說：「我在被迫逃離祖國之後，我放棄了一切。我認為生活沒有實際意義，沒有真正的穩定感。我只好從事宗教活動。」益西丹增到達布爾薩之後，別的人均被派去修路，而他則要求留下來，與那裡的僧人待在一起。那位負責的藏政府官員回答說：「你有權從事宗教活動，但你還很年輕，可以去修路。如果噶廈問我：『從西藏出來的人有醫生嗎？』而我又將你派到其他地方，我又怎麼回答呢？因此，由於是政府花錢供你學的醫，所以今天也是你來幫助我們的時候了。」

丹增醫生被派到了達爾豪樹，這裡有三千難民，其中包括拉薩兩個密宗扎倉珠特和珠麥的傑出喇嘛，他們的營地環境十分骯髒。肺結核、肝炎和阿米巴痢疾非常流行。在印度的藥店裡能夠得到的草藥不多，丹增醫生用這些原料盡力配製了一些藥品，開始了一家診所，工作起來。他說：「一天，診所裡的一位清潔工被毒蛇咬了。當我正在用藏醫方法止血時，來了一位印度醫生。他檢查了一下傷口，然後斷然說，除非立刻將大腿切除，否則這人就會在半小時之內完蛋。我告訴他手術沒有必要，我已經給了病人消毒的藏藥。這位醫生轉身對清潔工說：『如果你不讓我動手術，用不了幾分鐘你就要喪命，但這位藏人--他指著我--的看法不一樣。』醫生問清潔工他希望接受誰的診斷。清潔工看我治過病，因此他回答說，他願意接受我的診斷。然後，這位醫生強要我在一張紙上簽字，以證明他對這一病例毫無責任。我的治療方法有許多方面，十天之後，這位清潔工就可以走動了，一個月後他就已告痊癒。」

儘管清潔工恢復了健康，但這一插曲卻成了一段尖銳衝突的開端。印度醫生每星期來檢查難民一次。每逢這時候他們會來到丹增醫生的診所，要求他停止行醫，因為他在印度沒有行醫證明。丹增醫生接著說：「有一天，他們來我診所時，我正在檢查一個皮膚病患者。這些醫生見到這位婦女後，異口同聲說她患有水痘。他們聲稱，如果不將她隔離起來的話，在全體難民中就會爆發一場流行病。我直截了當地說他們不對。這位婦女只是有點發燒，沒有別的毛病。他們走了，留下了一些藥叫她服。我不讓她服用那些藥，過不了一會兒，他們又折了回來，想將她弄到林中的一處房子裡隔離起來。我不讓她走。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因為我自己，而讓水痘流行病突然爆發，我回答道：『藏人是我的同胞，我怎麼會加害於他們呢？』接著我叫他們在一張紙上簽字，就像以前我不得不簽字一樣，確切聲明這位婦女患有水痘。他們支吾了一陣，結果這位婦女幾天之內就給治好了。」儘管益西丹增醫生獲得了這場小小的勝利，但接踵而來的卻是更多的較量。直到六十年

代中期，他被召到達蘭薩拉，這是出乎意料的。流亡政府得悉，一位就學於門孜康的醫生逃出了西藏。達賴喇嘛得到丹增醫生的消息後，親自傳話請他。

丹增醫生回憶說：「在日落前，我到了達蘭薩拉。這裡的丘陵到處是帳篷。人們的生活條件極差。他們拒不離開神聖的達賴喇嘛，他上哪兒，他們就跟著去哪兒。」益西丹增被人領著來到了秘書處院中的廚房區域等待，秘書處設在英蒂梅爾別墅。當達賴喇嘛到來時，丹增醫生正在將茶一口喝下去。他說：「忽然，我聽到神聖的達賴喇嘛在另一間房間裡說話，他問到：『醫生在哪？』我站起身，雙手合十，為他的長壽祈禱。我的意志十分堅強，但當神聖的達賴喇嘛進入房間時，我開始哭泣起來。以前我遇到任何人從未哭過。當時我一定在想念西藏……」

達賴喇嘛詢問了他一些出逃的情況，然後叫丹增為達蘭薩拉周圍帳篷裡的人治病。丹增醫生的工作地點，就設在康寧別墅的幼兒園外，他開始為病人看病，陪同他的有一些西藏政府官員。在得到這些官員的許可之後，他再次被召到達賴喇嘛身邊。這次卻是來看病的。他為達賴喇嘛治好了輕度皮膚病之後，又被請去給亞傑林仁波齊看病，他是達賴喇嘛的最高佛師，又是格魯派的首領，他患有心包炎，病情嚴重，住在加爾各答的一家醫院裡。幾乎只用了一年時間，亞傑仁波齊的病就給治好了。丹增醫生被正式任命為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在西藏通常有四名醫生出任這一職務。這時他對行醫的熱情才完全恢復，他開始著手重振流亡社會藏醫的繁重工作。

別的從西藏逃跑出來的醫生只有兩人，他們卻不能給達蘭薩拉的丹增醫生提供任何幫助。丹增開始單槍匹馬招收學生，傳授藏醫的基本知識，但由於幾乎毫無資金，所以學生的進步受到了妨礙。益西丹增沒有辦法，直到 1963 年的一天，他與印度醫生的多次爭吵，才算有了積極的結果，這一點倒很好笑。

當地的醫生不斷抱怨，說這個藏人「偷竊」了他們的病人，印度衛生部的一名高級部長來到了達蘭薩拉。他花了一個星期觀察丹增醫生通過摸脈驗尿來診斷病人，然後他認真詢問每個人的疾病。一次，附近的軍營來了五名軍官，他們再次來這裡開處方。丹增醫生回憶說：「當這位部長看到這些軍官時，勃然大怒，他高聲大吼，『我們為你們提供了印度最好的醫療條件，今天你們倒跑到這裡來吃一個藏人的大便。』」這些軍官回答說，其中不少的病人已患病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西醫無效的地方，藏醫卻有效。他們說：「我們無須告訴丹增醫生是什麼病，這一點就與其他醫生不一樣。他會告訴我們。」這位部長在返回新德里之前，來到了益西丹增看病的地方，說：「你在這裡幹得很好。只有一個問題，你沒有足夠的學生。我將每年給你三萬盧比，給你一家二十張床位的醫院。」藏醫中心就是這樣建立起來了。

丹增醫生身兼數職，他既是主任，又是藥劑師，還是主治醫生。1965 年，來了另外一位醫生，他幫助教授七年制的課程，率領採藥隊到達蘭薩拉後面的大山里去採藥，配製一百六十五種主要藥品。由於十五名學生畢業加入了在西藏境外從事藏醫工作的一百五十名左右醫生的行列，且已有了組建研究結構的計劃，還有一個博物館。在各難民營共有九個門診部，因此丹增醫生於 1969 年從該中心退休。他在麥克累德干基獨自行醫，同時還繼續擔任達賴喇嘛的保健醫生。每天太陽剛剛升起，他就給達賴喇嘛摸脈，直到 1978 年才任命了一名醫生協助他工作。這時丹增醫生才有時間向西方介紹藏醫。

益西丹增對維吉尼亞的訪問結束時，杰拉爾德·戈德斯坦博士在預計將來藏醫和西醫可否進行交流時，作了這樣的評論：「在藏藥獲準在美國使用之前，需要大量的實驗室工作人員用數年時間方能得到所必需的資料。每一種成分都必須個別辨認，原料要經過提純，然後進行徹底的試驗。誰又來付這筆費用呢？」唐納德·貝克博士看法相同：「現在，研究工作就是講究成本與收益。醫藥公司要去印度北部採來所有這些草藥，又怎麼還能賺錢呢？」戈德斯坦博士又說：「不過，開展這項工作的推動力卻顯而易見，因為我們的藥品其中有三分之一強是用植物和微生物作為原料生產的，尤其是有一些歷史最悠久、效果最佳的治癌藥物。這些原料西藏人恰好使用了很多世紀，他們贏得了這方面的經驗。我個人認為，藥品公司正在丟失一個好機會。其中一些藥品肯定會產生速效。」

東方卻沒有丟掉這樣的好機會。雖然北京在 1959 年之後不久摧毀了舊西藏的各種機構，但它卻保留了門孜康，並且後來進行擴建。門孜康現名藏醫院，醫務人員共一百二十七人，每天的門診病人為七百至八百。這些醫生對精神與肉體的關係有獨到的見解（由於它是佛教教義的基本成份，所以中國人特別討厭）。這些醫生被迫消除這一見解，但他們卻編制了大本大本的彩色圖片，將藥用植物分門別類。與此同時，在高原的農場，也開始種植許多極有價值的草藥，這些草藥生長於喜馬拉雅山脈地區。同時，藏藥在大陸中國十分流行，但這些藥卻被說成是源於中國，而不是源於西藏。

丹增醫生訪問美國之後，他在總結自己對藏醫和西醫的看法時說：「藏醫與西醫的起源完全相反。首先，從疾病的分子結構去查明病因方面，西方科學家是通過顯微鏡來進行檢查。只有這時，才考慮具體的病人。藏醫首先就從患者開始。我們根據氣、膽汁、黏液來考慮患者的性情，然後才來對付疾病本身。我認為，這一不同之處暴露了各自的弱點和長處。我們缺乏現代醫生所擁有的許多癥狀療法。另一方面，如果西方醫生能夠認識藏人對人的體液、它們的平衡以及不平衡的見解，這也是很有益處的。如沒有這一條，西醫也就並不完整，西醫也就不能清楚、正確地說明產生所有疾病的原因和條件。如果西方醫生能夠來到我們這裡學習一段時間-同時也傳授西醫對疾病的分析，那麼，我認為是可以真正進行交流的。」丹增醫生明智地作了這樣的結論：「看來，我們雙方都可以從對方身上學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譯注

- (1) 即現在的藏醫院處，因當時拉薩城小，故謂城西。
- (2) 成書於戰國時代的《黃帝內經》，即有《針經》部，對針灸敘述甚詳。
- (3) 即西藏的各個地區。

第七章 跟隨達賴喇嘛朝佛

夜色籠罩著帕坦科特。在大路的一頭，彎彎曲曲地排列著一排木頭蓋的棚店。棚店裡麵店主渾身發冷，坐在平台上，四周都是些破爛貨：舊毯子、舊橡皮靴、附近軍營扔掉的大衣。店子裡吊著一盞盞的尖頭燈，用來照明，店主們面帶愁容，凝視著漆黑一片的大街。甚至在夜晚，大街上仍是一片混亂景象。衣衫襤褸的苦力，站在人力腳踏車上，跟著一輛客車，走到了路中間，後面一輛客車在高聲按喇叭，也不加理睬。來來往往的印度國產「大使牌」小轎車渾身傷痕累累。這些轎車迎面對駛時，也不見速，司機只到最後一刻才轉動方向盤，沒有撞車。大功率的「塔塔牌」柴油車像個龐然大物，車上掛著籃臉和紅臉神像，神像配有照明彩燈，神像四周框了一圈金屬絲，這些柴油車壓倒了其他的吆喝聲。儘管到了城鎮，這些大客車也不減速，飛速開了過去，喇叭聲震耳欲聾，弄得公路上濃煙滾滾。這些汽車剛過，幾百人沖刺般地穿過大路，他們圍著圍巾，以抵禦元月初的風寒。塵土總要飛到他們骨瘦如柴的雙腿上來，只是在夜幕的掩蓋下看不清而已，即使是下過一場雨之後也是如此。像鴿籠似的修理店有幾十家，每家專門修理汽車的一個部件-輪胎、水箱、防護板或電瓶，這些修理店就將這些東西扔在各自門前的空地上。那些駕駛室裡有床的卡車老司機用一些廢罐子點上火，圍坐在火旁，一邊烤火，一邊抽著葉卷的煙卷，而那些面容憔悴的年輕人則身上穿著睡衣似的大襯褲，手臂和臉上全被油污給弄髒了。他們發狂似地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想尋找一點橡膠、鋼材、鐵板或木材，看看是否可用這些東西暫時代替某個部件。但損壞了的部分無法修好。看來，大自然的力量早就將這些汽車給損壞了。

西藏毛線衫商販幾個人同住一間房，他們從家裡走出來，穿過鎮子，來到了英國人蓋的這個舊火車站。他們經過了泥土地廣場，這裡有一個沒有水的噴水池，然後又穿過了有一些大柱子的門廊，進入了通向鐵軌的大廳，左右兩邊都有賣票的窗口。現在窗口都關上了。他們在這裡排成兩行，面面相對，中間留了一條很寬的過道。婦女穿著齊踝骨的長袍，繫著顏色像彩虹一樣的圍裙，黑油油的辮子上紮著緞帶；她們穿著旅遊靴、寬鬆的褲子、紅色或藍色風衣。一把把的香在燃燒。在一個角落裡有三個尼姑，他們雙手合十，大聲誦經。一位身著黑色制服的人走了進來，後面跟著一隊錫克兵。他們身穿橄欖色上衣，戴著後面吊著紅纓的藍色頭巾，身上紮了子彈帶，扛著木槍託大步槍-他們是旁遮普邦的警察。達旺先生順著走道緩步向前走，他是達賴喇嘛派駐新德里的聯絡官。人群浮動起來；報紙弄得嘩嘩直響，在十多處地方出現了塑料花束，粉紅、大紅、黃色、五彩繽紛，頓時整個大廳一片沸騰景象。

紅燈劃破了夜色。一輛吉普車疾駛過來，停在兩根柱子之間，下來了一個班的警察，他們分兩翼散開，把住了進入車站的入口。接著開來了一輛醬色「賓士牌」轎車，這輛徑直開到了大廳的大理石過道上。車還未停穩，車的後坐門就打開了。

達賴喇嘛的弟弟阿里仁波齊，在一名僧人和藏族警衛的陪同下跳下車來。阿里仁波齊現在已三十出頭，因為他長相很像達賴喇嘛，所以當他大步走入大廳時，藏人立刻深深鞠躬，動作整齊得就像一個人。聽得出他們都憋住了氣，舌頭伸了出來，這是他們傳統的歡迎方式。這時賓士牌轎車的前門也打開了，走出來的是達賴喇嘛，他身著紅色長袍，腳上穿的是棕色淺口便鞋，右肩上隨便挎著一個醬色的喇嘛袋。他微微鞠躬，兩個手掌合攏放在胸前，沿著過道緩步朝前走，他的面色安祥，目光熱情而富有幽默感，與人們期待的目光相遇。在達旺先生的引導下，在鐵軌附近他拐向左邊，他的隨從都跟在後面，朝休息室走去，在那裡候車。人們雖然只是匆匆仰望了神聖的達賴喇嘛的尊顏，但他們卻非常激動。這時人群散開了，跟隨著達賴喇嘛沿著月台跑了下去。他們路過了一塊標語牌，上面是一句樂觀的話：「列車既可能趕點，也可能誤點」。

半個小時之後，像圓桶一樣的黑色蒸氣機頭，牽引著一列鐵銹滿目的列車，轟轟隆隆進了站。火車是從帕坦科特北面的查莫開過來的，查莫是鐵路線的盡頭，到帕坦科特需要兩個小時。由於這列火車自西向東下行，橫貫印度北部，所以叫三十三次下行車，這列火車有一節客廳式的車廂。這節車廂像其他車廂一樣，外表陳舊，滿是灰塵，窗口安上鍍了銀的金屬百葉窗，關閉得嚴嚴實實；但是車廂裡面卻有一個現代化的客廳，臥室收拾得十分整潔，這節車廂配有一名廚師，還有若干僕人。他們穿著白上衣，在廚房的鐵爐前排列成一行，面部露出了緊張的笑容。迎候客人的到來。鐵爐上燒了水壺，在冒熱氣。達賴喇嘛在月台上走了一段短短的距離之後，進入了自己的車廂。月台上的商販和乞丐，早讓警察給攆走了。這時已經九點鐘了，因為達賴喇嘛一般是早上五點起床誦經，所以他立即進了自己的房間，晚祈禱之後就安歇了。這九個隨從--四名僧人、兩名保鏢、印度政府的兩名官員和阿里仁波齊--選定了自己的房間之後，坐下來吃晚餐，不過時間比平時晚。不到十分鐘，火車緩緩啟動，開出了帕坦科特，繼續橫穿印度全境的行程，將他們一行人帶往東面遙遠的比哈爾邦，它是達賴喇嘛 1981 年前往最神聖的佛教聖地的第一站。

三十三次下行列車橫貫印度，行駛了兩天兩晚。這是一列慢車。它逢站必停，從未連續行車一個多小時而不停車的。第一個晚上，當列車朝南轉彎時，車廂形成了一條長長的弧線，機車噴出的白色蒸氣和煤煙橫跨列車兩翼，直向後面飄來，車廂裡的窗戶都關上了，以擋住印度北部的寒風。列車裡寂靜得可怕--印度也是這樣。在火車行使開始的那一段行程，車廂裡幾乎沒有乘客。二等車廂裡面可以躺下來，車廂裡的床位有三層，這就像運人的貨架一樣。一等車廂裡的包房空無一人。火車顛顛簸簸地經過了賈朗達爾和盧迪亞納，兩個地方都是一片亂糟糟的場面，火車的汽笛聲、掛鉤聲和搬運夫的吆喝聲交織在一起。在這兩站之間，大地一片漆黑，寒風襲人，萬籟俱寂。黎明時，列車跨過了朱木拿河，奔向德里。這時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都甩到了後面；然後列車到了薩哈蘭普爾和莫拉達巴德，這時已經進入了北方邦；這個邦的人口為一億，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也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現在列車再也不空了。除了達賴喇嘛的車廂外，其他車廂都擠得水洩不通。二等車廂裡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乘客在最上面臥鋪上懸吊著，手抓在車廂天花板電扇的外罩上以保持平衡。下面有二十五人，擠在與一間小小的肉類貯藏室大小相同的地方，叫喊、大笑、剝雞蛋、打嗝、玩撲克牌、嚼檳榔，贏了一手牌就斜眼瞧人家，伸出紅舌頭，嘸嘸濕潤的嘴唇。這時，金屬窗已經開到了最大限度，高山的寒風已經拋在身後，巴不得空氣能夠對流，以緩和車廂內的炎熱和汗臭氣味。甚至一等車廂也未能倖免，照樣擁擠。那些持月票乘車的人，大學生和商人，蜂擁而上，坐上半個小時車，從一個城鎮去另一個城鎮。包廂裡六個人的位置，一次就吵吵嚷嚷地擁進了二十個人。乘務員也不見了。

蘭普爾、沙賈漢普爾、錫塔普爾、勒克瑙、賴巴雷利、賈伊斯、阿梅提、貝拉……各地農村景色都相差無幾。太陽從北面一百英里外的喜馬拉雅山脈的上空升起來，中午到正中，因為是冬天，所以最高點就要低一點，然後落到了列車的右邊，白色薄霧瀰漫的天空，充滿了淡淡的陽光。多少綠油油的長方形小塊田地，在一望無垠的平原上組成了迷宮似的圖景，使這塊平原顯得很擁擠；這是印度負擔過重的心臟地帶。除了偶爾有幾塊沙地或寬闊、乾燥的河床是荒地之外，其餘每一寸土地都是耕地，這裡的土壤耕種過度，地力衰弱。不過地裡卻不見人的蹤影，只有在城鎮邊緣的磚廠才看得到人。這些地方土被挖下去了三、四英尺，顯露出來的是貧瘠的土質，顏色像燧石一樣毫無肥力。砌成弧形的磚堆中間是漏斗形的雙煙囪，這些煙囪在沒有樹木的平原上是最高的物體，就像被毀壞的柱子，薰得烏黑的煙囪口沒有頂蓋，煙囪腳下是磚窯，周圍是骨瘦如柴的女工。她們身穿沙麗服，托著沉重的步子在幹活，赤著雙腳，在瘦得露出骨頭的腳踝骨上，包裹著她們最值錢的財產：像腳鐐似的笨重青銅鐐子。城鎮一個接一個，它們周圍有一些泥塘，裡面是淺綠色黏泥滲透了尿水，表層一塌糊塗，有紙張、糞便和拉圾。這些城鎮外圍有一些矮牆，牆上寫了一些政治口號和貼了一些被撕爛的色彩俗艷的電影廣告畫。城鎮亂糟糟的，牲畜、過往車輛、擁擠不堪的建築和馬路，馬路就像斷了的血管四處蔓延，吞吃了狹窄的鐵軌，鐵路經過市郊進入車站。這裡是包羅社會萬象的一個窗口，月台上各種各樣的人成群結隊。一天下午，在一個車站的月台上有幾十個人並排睡覺，身上裹著毯子，頭枕在行李上面。機車還未停下來，年輕的商販就來到車廂前，緊挨著列車，扯

著宏亮的嗓門叫喚：「花生！花生！」其他人則在高聲兜售素煎餅、水果、薄餅和奶茶。這種茶就盛在棕色泥杯中，喝完後就扔在鐵軌上，壓碎完事。身體健壯的搬運夫-他們身上繫著腰布，炫耀著別在紅色衣裳上擦得亮晶晶的銅徽章-人群中飛跑，肩頭上平平穩穩地扛著大箱子。雇主則跟在後面拼命追，以免丟失了自己的行李。有錢人穿過貧窮的人群，走向一等車廂，他們的名字寫在紙上，組成了一個圓圈貼在包廂的門旁。當上下車的高峰平息之後，一些殘廢乞丐出現在公用飲水噴泉附近的地方，在這裡每天二十四小時一次，都有一批新人起床之後刷牙、乾咳、濺水、吐痰，只想使自己清新清新。

第二天夜晚。在達賴喇嘛的車廂裡，仍然像以前那樣寂靜。車廂尾部的門落了鎖，一名警察坐在前門，監督著車站偶爾來往的人們。達旺先生和達瓦波耶(德里負責達賴喇嘛的安全官員)與阿里仁波齊共用客廳，在這裡閒聊、抽煙、看報。達賴喇嘛的隨身近侍洛桑阿旺和帕覺，偶爾也來客廳待上幾個小時，與阿里仁波齊和保鏢開玩笑，這兩個近侍來自達賴喇嘛的私人寺院朗嘉扎倉，若干年前達賴喇嘛就選他們做了近侍。達賴喇嘛只有在淨手單獨吃飯時，才離開自己的房間。書案上他擺著一本裹著枯黃色布的大經書，旁邊是他的小型短波收音機，每天早晚他都收聽國際新聞。房中還擺放了一些西藏最神聖的佛像，據傳說這些神像是保護神的藏身之所，歷代達賴喇嘛都要隨身攜帶它們。

而在列車外面的確存在危險。帶著自製「土」手槍的殺人土匪到處都有。外面一片夜色，什麼也看不見，居民眾多的公寓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荒山丘陵和溝壑，土匪從這些地方衝出來攔截火車，劫持卡車和襲擊村莊，好笑的是，二等車廂由於人特別多，倒很安全。而一等車廂卻成了主要目標，因為這裡是包廂，人們也更有錢。在一等車廂，乘客們將門給鎖上了，在沒有弄清楚來訪者的身份前，拒不開門。凌晨四點鐘，到達了聖城貝拿勒斯。列車上的乘客下了大半；有些人來到這裡就是為了死在恒河河畔，旁邊是燃燒著香火的台階，千百年來歷代的印度教徒一直點燃了這裡的香火，從未熄過。過了貝拿勒斯之後，列車渡過恆河，來到了古印度的腹心地帶馬德亞代薩，意即「中間的國家」，它橫跨了恒河平原，這裡是形成佛教核心的兩個王國和九個共和國。翌日上午八點三十分，列車終於抵達加雅，加雅相距比哈爾邦的菩提伽耶六英里，菩提迦耶是佛祖修成正果的地方，是佛教的核心地帶。

正當他們感到要停的站沒完沒了時，卻到達了目的地，這使他們感到吃驚。達賴喇嘛的車廂周圍一片寂靜，門窗仍然鎖上了。月台上，菩提伽耶西藏寺院堪布，在一群人數不多的僧人中等候。他們身上的紫紅色長袍十分整潔，黃顏色的短緊身皮上衣非常醒目，在他們周圍來來往往的人骯髒褻褻，這樣他們就形成了一個乾淨寧靜的彩色小世界。車廂的前門被小心翼翼地打開了，阿里仁波齊伸頭向外看。他將門門拉開，僧人們被領進去，他們拿著白色的絲綢哈達，歡迎達賴喇嘛。在餐廳裡簡短地表示歡迎之後，達賴喇嘛不願再耽誤時間，腳步輕盈地領著其他人走下了車廂。

加雅有些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月台上，在車站裡就顯而易見，甚至在還沒有到達這座城市時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可以看到人群，他們的動作顯得虛弱，面容憂鬱。發狂似的步調並沒有減慢，但其內在的力量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人們擦身而過時，也顯得動作親一些，皺縮的臉顯得精神緊張。另一變化的跡象卻要比這明顯。達賴喇嘛走出車廂後，前往車站大樓，當他朝橫跨鐵路上的有頂棚的天橋走去時，他在月台上路過一個孤零零的小女孩身旁，她不過八歲。她不像其他車站的那些乞丐，而是一句話也沒說。她站在那裡紋絲不動，身上穿的衣服破爛單薄，烏黑的眼睛沒有神采。這女孩餓極了。由於缺乏蛋白質，她那一頭粗糙的頭髮已微微染上了紅色。她的嘴唇稍微外凸，這是她身上唯一顯得豐滿的部位。當這一大幫人從她身邊經過時，他們的快速步伐，使她抬起了自己的小臉蛋，雙唇緊閉，前額向中間收縮。她的手上拿著一隻錫碗，不自覺地就將手伸了出來。本來達賴喇嘛已經走過去了，但他仍將阿里仁波齊叫來，要他回頭給那小孩一些錢。阿里仁波齊折了回來，找到了她，彎腰對她說話。他遞給了女孩一張二十盧比的鈔票。她一手捏住了這張鈔票；二十盧比--約二十至三十皮薩(1)-的十倍。後來，阿里仁波齊對於自己如此超過施捨者通常給乞丐的數量感到吃驚--大為吃驚。

為什麼通常人，錢給的那麼少，一出車站就可以明白了。在車站入口處的泥寧地上躺著幾十個人，全是斷腿斷腳的，正在死亡線上掙扎。比哈爾是印度最窮的邦，這裡的痛苦生活沒有得到絲毫減輕。雖然已是隆冬，但天氣仍然很熱，而夜晚氣溫卻驟降，寒冷要奪去幾百人的性命，因為他們只有稻草遮擋風寒。夏季氣溫常常超過一百度(2)，由於中暑又得使幾百人傷生。今天是陰天，空氣沉悶。早些時候曾下過雨，車站廣場到處是一灘灘的水，水窪之間的泥濘地上，到處是人們吐掉的紅色檳榔渣，還有香蕉皮、桔子皮、卷煙紙、短短的綠色尖枝條。窮苦人就用這樣的枝條來刷牙。馬和狗比比皆是，牆腳落還有人拉的屎，他們周圍是一灘灘的尿，散發出一股臭氣。水果、紙張、糞便，什麼東西上面都有一片蒼蠅。瘦得皮包骨頭的狗在到處亂竄，在垃圾堆中亂翻，它們長了一身癩疥，僅僅留下了小小的一兩塊好皮。在廣場的一端有一排馬車，黑色的馬車滿是塵土，頂蓋是帆布的，馬匹的脊梁骨以及發脹的腹部到處是潰瘍。在馬車和車站入口處之間，一幫無家可歸的乞丐在這裡安營紮寨。當將他們與那些明顯享有特權的人們對比時，他們卻不是乞丐。他們就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

或者說很多人都像他們一樣，那些有家的人--有地方可去的人--在人群中行進時，不過稍微顯得更有目標而已。那些最不幸的人們幾乎被壓成了碎塊。一位白鬍子老人失去了雙腿，神經失常，他拖著自己的軀體，繞著車站大樓牆根轉圈子，從一片垃圾爬到另一片垃圾，逢人就說話。在他周圍四處走動的人，也比他強不了多少：盲人，臉上露出了兩個空洞洞的眼窩；雙腿分不開的年輕人，他們只好依靠雙拐代步，蠕動的身子就像小桶一般；中年麻瘋病人，他們的耳朵上、鼻子上和臉頰上都留下了深深的麻點，骯髒破衣服的碎片，在失去的手指頭和腳趾頭留下的位置上飄來擺去；另一些人則患有橡皮病，他們的手臂和大腿上長出了一團團的贅體，他們拖著沉重的軀體緩步行走。這些人雖然幸運一點，但也無家可歸，他們的行動目標，就是進出車站的一隊隊旅客，向他們乞討早餐，雙目無神，顯得憂慮重重。即使是那些背袋子、能夠付得起火車票的旅客都沒有穿鞋。他們從車站悄悄溜出來，竭力躲避乞丐，還得閃來閃去，避開一灘灘的尿水和廢物。

達賴喇嘛及其一行，從車站大樓裡來到了停在車站入口處的一排轎車前，最前面是警察局的一輛吉普車。他們沒有帶行李，因為行李隨後會送來，就坐上疾駛的汽車出了車站廣場，因為只有快速行車，再加上按喇叭，才能從到處是人和牲畜的馬路上開出一條通道。

加雅有四萬人，因此是個大鎮。但是，貧困使這座城鎮顯得古舊，街道上很清靜。這座城鎮沒有機械化，仍在過去的歷史中沉睡，被塵土所掩埋。房子是用柔軟的泥巴蓋起來的，已經變形彎曲的大樑歷史已長達幾百年，顏色已經變得像黑色玻璃一樣。寂靜的街道塵土飛揚，甚至連街道上空也滿是灰塵，因為這些陰沉沉的白堊鋪的街道只有約四米寬，而房子都搖搖欲墜，直向前傾。在這房子擠得像網絡一樣的城鎮裡，幾輛腳踏三輪車在光滑的路面上滾滾向前，它們中各種各樣的鈴聲在街道兩旁的牆壁之間迴蕩。人們在有屋頂的門廊裡生起了一爐爐的小火；煙霧爬到了灰塵上不去的房子上部。仍像處於昏睡狀態的婦女，用衣服裹著身體，從低矮的門洞裡走出來，出現在這片薄薄的煙霧中，她們瞅了瞅火，在爐子上的銅壺裡攪一攪。

當最後一些三輪車讓到街道兩旁之後，轎車隊就出了陰沉沉的加雅城，進入了綠油油的農村。這裡空氣清新，天空明亮。公路沿線種植了菩提樹和棕櫚樹。孩子們在田野中歡蹦亂跳，農畜在四處走動。陰暗的鬼城消失了。菩提伽耶出現在遠方，人們看到它之後，情緒為之一振。

兩管西藏長號齊鳴，就像巨輪的汽笛一樣，壓倒了其他聲音，號聲是從城郊的日本寺院屋頂傳來的，它是達賴喇嘛到來的信號。當車隊在空曠的平原上加速時，第二組號角已經在泰國人的寺院前準備就緒，接著吹奏起來。現在，可以朦朧看到前面高達一百八十英尺的石頭寺院了，它是為紀念菩提樹而修建的，佛祖在菩提樹下修成正果。第三響嘹亮的號角--尖銳刺耳--發自一種手握的銀質短號，是從過了中國寺院後的西藏寺院的屋頂傳來的。西藏寺院與菩提樹前四方寺廟相距最近。當車隊來到了菩提伽耶邊緣的一行行綠葉成蔭的樹下時，速度減下來。在號角聲中，還可以聽到鼓聲和鈸聲，左邊是進入西藏寺院的大門，四千人在這裡迎候達賴喇嘛，警察用竹棍使勁將人們往後趕。

大門上有一橫幅，上面寫著「熱烈歡迎神聖的達賴喇嘛」，在大門一側有一線粉紅色的蓮花，上面是佛教的八寶吉祥。當達賴喇嘛的轎車率領車隊緩緩通過時，幾千人雙手合十口中祈禱，低著頭，然後抬起敬重的目光，看了看神聖的達賴喇嘛。他也雙手合十，表示回答。丹增嘉措坐在車內的後排座位上，面帶笑容，使人們感到無拘無束。寺院頂上的煙囪裡冒出了濃濃的香火，車隊駛入了第二道門。門的頂部，是像徵佛教的圖案，一個八齒金質法輪，兩頭鹿靜靜地分立兩旁。在寺院的院子當中，熙熙攘攘有一大幫西藏人和西方人在看熱鬧，其中有許多數日穿著西藏的喇嘛服。達賴喇嘛的轎車從他們身邊駛過，在大殿的白色門廊前停下來。這裡聚集了七十位僧人，他們手裡拿著綢質的勝利幡，一千根羽毛裝飾的帽子，倒像古希臘的頭盔，口中在吟唱禱詞。達賴喇嘛走下車，受到了一些穿著喇嘛禮服的高級活佛的正式歡迎。在他們當中，站立著身材矮小的土登·塔巴魯薩，他是上一任西藏外交部長，是傳播達賴喇嘛教誨的世俗方面的保證人，下個星期，他將被領著來到那棵菩提樹下。當達賴喇嘛被人帶到二樓他的房間時，鼓聲、鈸聲和歌唱聲仍然持續不衰。達賴喇嘛離開後，興奮的人群一哄而散，奔向寺院牆外搭好的帳篷。這裡的帳篷遍地都是，簡直像個帳篷城市。朝佛季節開始了，就像西方的聖誕節或復活節一樣，西藏人期待這一季節，認為它是一生中最神聖、最幸福的時刻。

達賴喇嘛在自己的套間裡簡單用了餐，吃些麵包、果醬和酥油茶。他的高級佛師亞傑林仁波齊和他作陪。因為亞傑林仁波齊是菩提伽耶寺的堪布。所以他的居室與達賴喇嘛的一樣，同在二樓，在他們的居室之間，是這家寺院的主要殿堂，在這間殿堂前，已經聚集了一些喇嘛和俗人百姓。阿里仁波齊和達賴喇嘛的主要侍從洛桑甲旺，低聲向他們表示歡迎，他們都

在等待將他們領到達賴喇嘛跟前。丹增嘉措到這裡還沒有半個小時，就已經在不停地工作、接見、摸頂祝福、講經、授予僧職，他一刻不停地這樣工作了七天。

這家寺院位於菩提伽耶的西側，距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樹的那個院子不到一百碼。在寺院後面空曠的原野上，藏人搭起的帳篷營一直朝平地線延伸。下陷的泥土小道，像迷宮一樣將帳篷連結起來，在帳篷營的後部，有一塊平平的岩石地，因為需要也就用它作了廁所。人群中有拉達克人、門巴人、夏爾巴人、有從庫努、馬納利、斯皮蒂、拉胡爾、多爾波、木斯塘、錫金和不丹來的香客，只需看外表就能知道哪一幫人是來自何方。不丹人身穿橘紅色，紫方格長袍；婦女的頭髮留得很短；男子漢穿著齊膝的襪子。來自喜馬拉雅山脈西北部河谷的婦女，穿著毛織服裝十分笨重，就像雨披一樣，他們戴的耳環足有耳垂那麼長。多爾波海拔一萬六千英尺，是地球上最高的人類居住區，那裡的男子漢粗野兇猛，他們穿的長袍身份粗糙，黑土滿身，腳上穿著高高的氈靴，暫時沒有佩戴刀箭。

晚上，達賴喇嘛安歇去了，因此阿里仁波齊也就沒事。他在寺院的食堂裡匆匆吃了一頓飯之後，就來到了夜色籠罩的寺外。在走向大路的途中，他路過了一些印度遊客的客車，這些車輛停在那裡，遊客正在進行準備，他們打算睡在車內的稻草鋪上，這些乘客從車窗到附近的樹幹上牽了繩子，將他們洗過的東西曬在上面。他上了大路，走到摩訶菩提會的大門前，這是負責維護菩提廟及其周圍環境的國際佛教組織。在這裡他受到了印度僧人吉安·賈高特的迎接，他是菩提廟的主要看管人。吉安·賈高特一副典型的婆羅門模樣-長鉤形鼻子，尖尖的耳朵，半透明的耳垂，一雙眼睛深深地凹了下去，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就像凝結了似的。他外面穿著小乘佛教僧人穿的深橘色長袍，裡面穿了一件黃顏色的高領毛線衫，繫了一條南瓜色圍巾，打扮的十分雅緻。他的行為舉止很有教養，說明他過去是個俗人；由於佛教直到最近才在它的發源國復興，所以他也像其他所有的印度僧人一樣，晚年才出家。而阿里仁波齊自從來到印度之後就還了俗，他穿著灰色的肥大褲子，一件綠色的軍上衣，他曾在特種邊境部隊當過傘兵，這種衣服是他傘兵生活的紀念品，不過他矢口否認這一點。

賈高特法師雙眼閃閃發亮，鬼笑了一下，說：「我們到一個神秘的地方去。我擔保你會喜歡那個地方的。」他的住宅大門齊肩高，他將大門關上後，就帶路來到了城中心。白天的喧嘩大都已經消失了。這裡有一處射擊走廊，一些紅氣球和白氣球繫在走廊後部，是它吸引著這裡唯一的人群：一些印度男孩和一些西藏毛線衫商販。這些商販希望，他們朝佛所需的費用能夠賺回來，因為他們沿著廟牆擺了攤。賈高特法師沒有理會他們，徑自走了過去。然後拐向一條大路，它直通廟的正門。他對著一間小房裡的收票人點了點頭，領頭走了進去，在爬了三段長梯之後歇了一會兒。在他面前聳立著一座巨大建築，直沖雲天。它於公元前三世紀(佛祖死後兩百年)，由推崇佛法的阿育王始建，座落在一個大廣場的正中，深入地下五十英尺。在建築的底層周圍有花園，花園裡種有高大的菩提樹，周圍有開花的灌木，中間穿插著一組一組的小型卒塔婆和殿堂，即供放佛教羅漢(佛教聖人)屍骨的場所。周圍在一塊寬闊的台地上，還有四座小一些的建築，廟的頂部呈尖形，直插雲天，頂部外表密密麻麻雕刻著許許多多的幾何圖案，最上面是一塊高達二十五英尺的圓石，就像一支燃燒著的巨大的石頭火炬。

賈高特法師望瞭望給尖頂照明的那四盞微弱的汽燈，雙眼露出了可憐的神色說：「人上去換一隻燈泡就得花五十個盧比。誰也不願意爬到那上面去。如果掉下來，那就完了。」他一邊領路下梯子，一邊談到了重修這座古廟的情況。「就在幾年前，這裡還是一片荒野，灌木叢生。在佛祖曾經用來沐浴過的水池周圍，有四百座小房子。牛群就在內牆的牆根下吃草。夏季，人們甚至無法靠近這塊地方。」這就是他斷然作出的結論，一面說還一面用手帕摀住鼻子，以解釋他的這一結論。這時，一群十幾歲的小孩，在寺廟樓上的陽台上跑來跑去，他用印地語衝他們吼道：「安靜點！安靜點，你們這些調皮鬼！」後來他又告誡另一些人：「不要抽煙。」他轉過臉，對阿里仁波齊眨了眨眼，表示自己並不贊成這樣做，「他們心都很好。只是他們不懂得該怎樣做。」

在入口處前的一間低矮的石頭房子裡，一些藏人正在叩長頭。藏人穿了護膝，手上戴了底部是木頭的專用手套，他們雙手做好祈禱的姿勢，摸摸頭頂、額頭、喉嚨和胸部，然後臉部朝下，朝著佛像五體投地趴在久經磨擦的地板上。這樣叩頭十分費力，因此他們的呼吸聲在夜晚可以聽得清清楚楚。與此同時，其他人則一邊祈禱，一邊點燃蠟燭，並將蠟燭與花和香一道放在內殿大門左側的壁架上。殿內有一尊神聖的佛祖像，據說這尊佛像與佛祖的實際面貌一模一樣，因為它曾得到過親眼見過佛祖本人的一位老婦的證實。這佛像是尊坐像，下面有個金質底座，上面是深藍色的華蓋，寶座位於三間小房子的後部，這些房子的牆壁是橘色的，很有光澤，在幾百支蠟燭的照耀下，反射出安祥的光芒。佛像雙眼半睜半閉，神情鎮定，表現出心情十分平靜。達賴喇嘛解釋說：「我們相信，人們獲得高度的精神發展的地方，佛祖是去過的。就如普通男女在他們居住的地方能夠造成某種氣氛一樣，偉人在聖地也能造成某種氣氛。我們可以根據人們住房中的氣氛來給他們下

結論，同樣我們在菩提伽耶也就可以得出對佛祖的看法。朝佛的基本目的是：從聖地獲取積極的力量，這樣人們的德-- 人們思想中的全部優秀品質-- 也就會增長。」

這一天結束時，三個人分開坐於鋪在地上的卡墊上，他們仍在專心致志坐禪。在佛龕旁的一個角落裡，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手握上了刺刀的步槍，多心地盯著這些人。達賴喇嘛第一次去菩提伽耶是 1956 年，當時他送給這家寺廟一盞純金的大酥油燈。通常這盞金燈是收藏在加雅的一處地下倉庫裡，因為這個星期開始朝佛季節，所以金燈轉移到廟裡來了，這盞金燈的光芒在其他的燈光中閃閃發亮。然而，由於有這盞金燈，也就不得不派十個衛兵，他們就駐紮在靠近這座殿堂的地方，就像在西藏寺院一樣，也派一隊衛兵駐防。

賈高特法師離開了寺廟，步行穿過花園。在花園內遠處的一側，他在一個水池旁停下腳步，這裡是一塊下陷的盆地，長滿了草，盆地的一端有一顆樹，靠岸邊有幾朵紅色的蓮花。他眼睛睜得大大的，壓抑著興奮的心情說：「這就是我們神秘的地方。佛祖成道之後，就是在此地沐浴。」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天空覆蓋著雲層。靜悄悄的水面看上去非常平靜，顯示了永恆的色彩，似乎它還像二千五百年前那樣。賈高特法師繼續說：「佛祖曾是王子，一直被關在王宮裡，沒有見過王宮外面的世界。但是，他四次偷偷溜了出來。第一次他看到了一位病人，第二次一個死人，第三次他見到了一位老人，第四次他看到的是一位隱士。他僅僅這樣想到：『人的命運就祇有生、老、病、死嗎？是不是還有比這些捉摸不定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東西呢？』這四種情景緻使他反復考慮整個世界。它們並不是超自然的事物，而恰恰正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現象。」

佛祖成道之前名叫悉達多·喬達摩。他出生於公元前六世紀，是一個小小的釋迦族諸侯國的王子。這個王國位於貝拿勒斯北面，在喜馬拉雅山脈腳下。他是在首都迦毗羅衛長大的，這座城市是熱鬧的政治和貿易中心，城裡有許多商人、行吟詩人和士兵。釋迦元老院位於市中心，外面有一道高達二十七英尺的圍牆，圍牆中間修建了一些塔樓。一位占星家告訴他父親首圖馱王(3)，說他的兒子要麼會成為全世界的皇帝，要麼成為佛陀（覺者）。淨飯王為了兒子成為全世界的皇帝，不讓王子離開宮殿一步，使王子只受到自己的影響，而不受任何其他影響。但是，當悉達多二十九歲時，他已經四次偷著進了城，形成了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因此他坐臥不安，終於告別了妻子和新生兒子，拋棄了自己未來的王國，在一天夜晚逃離了迦毗羅衛。他脫掉王服，剃了個光頭，成了流落四方的乞丐。他來到南方，求學於當時名氣最大的哲學家門下。他去過拘薩羅王國的六座大城市，這個王國就像當時的希臘一樣，這六座大城市也正處於哲學思想發展的全盛時期。不過沒有任何一個哲學家能使他滿足。悉達多來到了位於尼連河畔的漚樓頻樓村，這裡距離他的故鄉大約有二百二十五英里。悉達多下定決心不斷地冥思苦索，用苦行來克制自己，直到能夠直接最終認識到現實真諦為止。他過了六年的苦行僧生活，但卻毫無結果。後來有一天，他在河邊飲水時，掉到了河裡，無法再支撐下去。他被迫中斷沉思冥想，費了很大勁朝南走了二英里地，來到了苦行村村外。在這裡一位名叫詩迦羅越的年輕婦女精心調理下，他逐漸恢復了健康。他恢復健康之後，在五月望日那天晚上涉水渡過了尼連河，在離岸邊河堤幾百英尺的地方找到了一顆大菩提樹，他坐在樹下又陷入了沉思，翌日黎明他即修成正果。接著佛祖獨自一人在菩提樹附近度過了七個星期，考慮怎樣將他成道的根本要素解釋給別人聽。然後他朝西走了一百英里，來到了貝拿勒斯，開始了創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生涯，歷時四十五年。他逝世於拘尸那揭羅這座小鎮，距離他的故鄉五十英里，終年八十歲。這時僧侶集團已經形成，並得到了拘薩羅王國的兩個勢力最大的王的保護。

賈高特法師突然從小池前轉過身，抬步朝寺廟往回走，他說：「我們得從這邊走。」在寂靜的石頭靈塔與開粉紅色的灌木叢之間有那棵菩提樹，樹腳下有一些蠟燭在燃燒，中間還有一盞小燈在閃爍，這棵菩提樹已經是原來那棵樹的第三代了，它就長在佛祖成道的那位置，絲毫也未偏移。賈高特法師在菩提樹下站了一會兒，祈禱了一句才走。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九時。達賴喇嘛離開了西藏寺院。三十五名警察在菩提伽耶唯獨的那條彎彎曲曲的大街上開道，還有不計其數的便衣警察，他們跟隨在這一隊人馬的前後，繃著臉，就如同強加在別人頭上的面具一樣，之所以能夠辨認他們，就是因為他們身穿奇形怪狀的西式上衣，裡面則繫著白色腰布。達賴喇嘛快步從西牆的一道大門進入了寺院內。進門之後他放慢了腳步，他從最高最大的圈子開始轉經，一直到下面的殿堂裡祈禱，賈高特法師一直在他身邊作陪。達賴喇嘛上供之後，便沿著靠牆最近的小道，朝菩提樹走去。在菩提樹下的草坪上，已經聚集了四千名藏人。人群十分擁擠，隊列參差不齊，前面是僧尼，從佛塔之間的空地一直到後邊的石門和大鐘，到處都是起伏的人群，達賴喇嘛率先從那張石門進來。在人們的腳下，鋪了幾百張卡墊和毯子。沒有留下過道。打算走的人們，都待在人群的邊緣。其他的人擠做一團，只給幾個年輕僧人讓讓道，因為他們在分發錢包大小的冊子，裡面有達賴喇嘛寫的經文，呼籲西藏的保護神改善西藏的狀況。

最後的幾名僧人，將喇嘛袍袖子匆匆甩在肩上，當達賴喇嘛繞過牆角時，他們剛剛找好自己的位置。他們首先看見達賴喇嘛，立即站起身，後面的人們也跟著站了起來。達賴喇嘛雙手合十放在胸前，後背微屈，面帶笑容，感謝人們對他的歡迎。他在一張六英尺高的華麗寶座前停了步，這張寶座是用黃色、紅色和金色緞子包裹起來的，他脫掉靴子，接著叩了長頭，然後爬上了寶座，坐一個小小的紅色坐墊上，將他的喇嘛袋放在右手邊的桌子上。頭上，菩提樹的枝葉，就像美麗的綠色華蓋。這棵樹有四根主幹，由於風吹雨打樹皮剝落了不少，沿著四根主幹長著金色的樹葉，薄薄的，被風吹得嘩嘩作響，四處飄動，因此菩提樹的下半部則閃閃發光。樹上掛著的各色各樣的旗幡，有幾百面，它們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香客掛上去的。這棵樹裝飾成這般模樣，似乎是要舉行賽船大會似的。

人們都叩了長頭之後，達賴喇嘛開始快速背誦《心經》。領誦的喇嘛坐在第二排，他身邊有一個繫了哈達的話筒，他接著達賴喇嘛領頭祈禱，接著人們都跟著他祈禱起來。兩分鐘後，快速誦經以最後高聲鳴掌三下而結束，這樣是為了象徵性地掃除障礙。以便能夠認識到色空不二：這是《心經》的主題，是佛教哲學的基礎。達賴喇嘛做了一些預備性的修習之後，即開始講經，他講經的內容基於贊貝桑波寫的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他是十四世紀一位著名喇嘛。

連續五天，每天上午四個小時，丹增嘉措講述在通往成道路上的主要做法。他貫穿始終的主題是，佛教徒一生的實質，就在於要努力使自己的精神純潔化。要去掉粗俗的、受蒙蔽的精神狀態，如憤怒、慾望和無知，要用與之相反的東西來取代它們，這些是耐心、鎮靜和智慧。這樣做就可以獲得永恆的內在幸福，而這樣的內在幸福是與外界條件毫不相干的。達賴喇嘛說教的背景為全體聽眾共享，從合情合理的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這種認為神不存在的佛教觀點，儘管是屬於東方的教義範圍，但它卻與現代世界的世俗思想十分相似，描述了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的作用。

佛祖認為宇宙是無數個世界組成的，它們形成、解體、再形成，無始無終，他認為，在這些世界中眾生要反覆經歷生、死、再生這樣一個過程，這樣一個過程是基於他們對現實的誤解。佛祖說過，眾生都認為事物都是獨立存在的，事實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發源於自己；各種現象的產生都有賴於若干原因和條件。佛祖將這種互相依賴的關係叫做空-特別是沒有最終的自我。只有當人們的大腦認識到它本身是空虛的，並不是一個特點鮮明的實體，而只是以幻影的形式而存在時，才能從無窮無盡的生死輪回中解脫出來。這就是羅漢(聖人)的解脫。一旦獲得了解脫，也就有可能將意識擴張到無所不能的成佛狀態，同時也就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認識萬物，也能認識到它們本身也是空的。如果要以普度眾生(這是大乘佛教的動機)為目的，那麼就必需這一智慧，佛祖說，我們這個世界要經歷二十劫，在此期間會出現一千個佛陀，由他們指出成道的通途。他說自己是第四位佛陀。不過在這整個過程中，高級菩薩和佛陀能夠繼續不斷地形成各種化身。按照大乘佛教的解釋，釋迦牟尼本人就是這樣的化身。正如達賴喇嘛所解釋的那樣：「我們總是從兩個方面來看待佛祖。一方面他是普通人，只是不同尋常而已；另一方面他是個化身，他可以同時出現在我們銀河系的上億個世界當中傳播佛教。當然，我們並不直接地知道他屬於哪種類型的，但如果人們撇開抽象的理論，只考慮他的話的實質，他的整個說教就匯成了一點：愛與慈。這就是他的教義。沒有哪一個字是主張仇恨和任何形式的聖戰的。這類東西從未提過。因此你們明白，我認為這樣的教義好極了。問題就在於我們能否將他的教義付諸實踐。」

達賴喇嘛在西藏時，那些年他對佛祖的個人感情要疏遠些。但是，他一來到印度，他對自己宗教始祖的感情開始加深，這就如同他早就一直對西藏的聖人懷有感情一樣。他敘述道：「最近我在講經談到智慧時，我幾乎確信，在佛祖講經談到這一點時，我也是人群邊上貧窮的印度人中的一員。儘管我當時是社會最底層的一分子，但我卻在佛祖在世時與他建立了某種關係。這可能是毫無根據的念頭，大家知道這樣說對於一個僧人來說是十分危險的，但在此時此刻，由於我是在從事傳播佛祖教義的活動，我認為這其中必定有其原因。這就是我的理由。」

信奉佛教的人確信佛教的核心是，過去決定現在，現在決定將來。達賴喇嘛繼續說：「再生的觀點是有許多合乎邏輯的證據作為依據的。不過從根本是說，我們認為嬰兒的意識不會像嬰兒的軀體一樣是來自其父母，大腦神經是無形的，它只是啟發和認識。由於這一點，所以物質是不能作為大腦的實在之因的。只有以前的一段意識才能作為大腦的首因，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指的前世生活。在我認識的一些人當中，當他們修禪到了一種勝過別人的敏銳的意識階段時，很顯然他們能夠回憶七百年、八百年、甚至一千年以前的事情。」這就是因果報應的種子，人們的行為在大腦裡遺留下了這些種子，是它們從一種生活中塑造出了另一種生活。正如達賴喇嘛所得出的結論那樣：「人們在生活中的所作所為，是不會毫無作用的。將來，他們因果報應的種子遇到適宜條件時就會結出果實。如果是在目前，人們就絕對不會遇到他們過去未曾做過的事情所產生的結果。基於這一原因，人們的命運完全是在自己手中。」

對於這些西藏人來說，這個星期剛過了一半就出現了一件事情，它有力地證明了因果報應觀點是不可褻瀆的。這些香客在菩提伽耶的消息傳了開來，致使幾百名乞丐蜂擁而來。無論是誰從西藏寺院走到摩訶菩提寺，尾隨乞求的婦女和孩子總是多達二十人之多，婦女高聲大哭，孩子們則扯著他們的衣服直喊：「爸爸，爸爸。」他們似乎在遭受無法忍受的痛苦，因為乞討的準則第一條即，叫聲越可憐，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比哈爾邦，乞討是一種職業--尤其是，它還是一種表演藝術。一連串的尖叫、呻吟、歇斯底里的動作，最後是用殘廢的雙手將罩衣伸過來接錢，條條街上都是這樣的情景。乞討的高峰時間是香客前去聽經結束回來時，這時候菩提伽耶似乎就是戰場。如果香客不理乞丐，開始的拖拖拽拽就會升級變成使勁戳、高聲尖叫，這樣叫喊是為了招來一大群光著腳、衣襟襤褸、滿是泥水的小孩和形容枯槁的母親，使香客無法脫身。但最大的錯誤就是停步站住。那些停步站住的人，不要說給錢，反倒被四面八方蜂擁而上的幾十個乞丐一頓踐踏。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衝出去，或者將錢高高地拋向空中讓那些乞丐散開去搶錢，大部分人採取的是第二種辦法。

到朝佛週後期，情況起了變化。好笑的是乞丐來的太多，大多數乞丐不得不放棄努力。競爭現在只能起到消極作用。因此，他們就沿著通往菩提寺大門的通道坐下來，臉對著牆，前面放著錫碗。甚至白天還組織人來照看孩子們：母親們一個個定時輪流看管骨瘦如柴的孩子們。兒童們坐在這裡玩石頭，互相捉蟲子，當坐著的一排乞丐呻吟聲逐漸升高，表示來了一位潛在施捨佬時，孩子們又笑、又鬧、又哭、爭著要施捨。藏人對於這樣的局面安排還甚為滿意，因此他們帶著零錢，走過這全段路程時，偶爾丟一硬幣，儘管讓這一硬幣滿足多一些錫碗的要求。這樣大多數人也就能夠勉強討到一點錢，能與自己的孩子們，同吃上一頓飯，然後就在城郊的小巷裡擠做一團睡覺，靠彼此的體溫來取暖。1943年的孟加拉大饑荒致使比哈爾和鄰近的孟加拉的三百萬人喪生，這次饑荒是本世紀最嚴重的饑荒之一。雖然現在更大的問題是長期營養不良，但大批餓死人的可能性卻似乎無時不存在。

好像是為了表示一線希望，一支遊行示威隊伍從菩提伽耶的一頭走到了另一頭。二百名印度學生和農民敲著底面繃有響弦的小鼓，揚起密密麻麻的紅旗，憤怒地揮著拳頭，要求政府給比哈爾邦提供更多的援助，達賴喇嘛在評論這一壓倒一切的形勢時，說：「一定會爆發一場革命，但同時苦難是不會消失的，人們前世作的孽，勢必會得到報應。而且苦難本身實際上就是人的精神與肉體的屬性。人的精神與肉體就是苦難的基礎，只要人們擁有精神和肉體，人們很容易就會受苦受難，從深一點的角度來看，我們藏人現在失去了獨立，生活在異國他鄉，我們遭受的是某種類型的苦難。因此，大家看，事情恰恰就是如此。你們也許會認為我是悲觀主義者，其實不然。這就是佛教的現實主義。這就是我們如何按照佛教的教義和指導來處置事情的，這樣的觀點會使人們變得更緊張，更積極。當遇到壓倒一切的苦難時，它絕不會使人們喪失頑強的意志。」

香客們並沒有全然忘記西藏的事業，每天講經結束時，都要為在中國人統治下生活的藏人祈禱，接著是發誓要行善積德，為迅速結束那些藏人的痛苦生活而努力。藏人相信，只有通過克服他們自己的幻覺，大家都來行善積德，這個問題才能得到圓滿解決。因此，到朝佛周中期時，朝佛活動比比皆是。每天下午和晚上圍著菩提寺和菩提樹下轉經的人數高達幾千，他們叩長頭、誦經、點蠟燭和燒香，菩提樹下堆集了大量的供品：麵包堆高五英尺寬四英尺，還有一藍藍的香蕉、蘋果、橘子、餅子、糖果、錢幣和鮮花，一碗碗的藏紅花水，一英尺高的錐形糕點，上面還飾有酥油雕塑。連結達賴喇嘛的話筒的那些高音喇叭的電線上掛了一簇簇的紅、黃、綠各色帶子，用意是這些帶子可以吸收吉祥的祝福，以後就可以拿來戴在頸上，轉經的善男信女源源不斷，在他們身後的天幕上留下了自己的輪廓；小轉經道則像旋風一般，高大的石頭建築直插雲天，建築腳下平民百姓在忙著轉經，在菩提寺門旁和水池旁的叩拜殿裡，男女信徒脫掉衣服，只剩下內衣，在辛辛苦苦地叩長頭，一叩就是幾個小時，他們只是在互相開玩笑時才中斷片刻。草坪上有一些人在靜坐修禪，孩子們在他們中間奔跑打鬧。每天太陽落山時，幾千盞小燈照亮了這座聖廟。聖廟下面幾層的每一個角落，各個小殿堂以及三條過道的大部分地帶都被照得通透明亮，台上的酥油燈看上去就像星光閃閃的銀河系落到了地球上，縷縷清香繞過樹梢，飄向天空，一弦明月掛在廟頂上空。

一天，《甘珠爾全集》- 佛祖的遺言，共一百零八卷- 被全篇朗誦出來。僧人們用一輛木頭大車將西藏寺院裡這套布封面的全套經典拉到了菩提樹下，擺在一張石頭供桌上，就是從這裡，一捲捲黃色封面的經書分發到坐在草地上的人們，他們分成小組，圍座成若干個圓圈，經書放在圓圈中間打開，每人負責一頁，開始以最快的速度朗讀。突然，在這塊地方爆發出不和諧的朗讀聲，只用了兩個小時，地球上又一次聽到了佛祖講過的每一句話，一字未漏。

菩提寺外，僧俗氣氛渾然揉為一體。毛線衫銷售十分活躍，買賣遍及帳篷城下的每一個角落；一批大像被主人牽著在帳篷城中穿行，人們付費就可以騎著玩。茶攤上的人們在勁頭十足地交談；幾十個人在幫助僧人煮麵條，就放在室外的一口大

鍋裡做。可以看到，眾人的嘴唇總是在動，他們是在念真言。西藏的善男信女，無論是自己講話或是在聽別人講話時，他們總是繼續默默背誦真言，一面還撥轉著若無其事地拿在左手上的念珠，這是西藏人的習慣。達賴喇嘛在西藏寺院的大殿裡，親自給人們摸頂祝福的那天，他才真正感到了緊張的勞累。雖然在菩提伽耶和其他地方，平時已有十萬人這樣得到過達賴喇嘛的祝福，但排隊等候的人們仍然似乎沒有盡頭。幾百人拿著白色的哈達，身穿最好的衣服，在靜靜地等候，越往前走，他們的表情越抑制，直到後來他們爬上了樓梯的頂層，進入西藏寺院。達賴喇嘛站在這裡，他身後是一尊巨大的鍍金彌勒佛(未來佛)，這些善男信女完全被敬畏恐慌的情緒所壓倒。他們從一列僧人面前走過，頭和背壓低了。接著，當他們來到滿臉微笑的達賴喇嘛面前時，他們的憂慮頓時消失，因為剛剛來到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跟前，使他們感到有幾分害怕，取而代之的是孩子般的喜悅。不過，達賴喇嘛並沒有受到向表示的敬意的影響。他從從容容地抓住人們的手，為他們的孩子命名，輕輕地拍打一下病人的額頭，用吉祥之手摸摸經書、盛水的容器和一束束的絲綢保護帶。他還常常攔住人流，不是提問，就是滿足人們要求給他們提供指導。有一次他接見了二百名西方人士，這次他免除了西藏所有禮節，就坐在來自十幾個國家的遊客中間，下面就鋪了個墊子，回答他們有關佛教的提問，接見結束時，他堅持要與每個人握手，並分別詢問他們是哪國公民。正如賈高特法師所指出的那樣，佛教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除了西藏人之外的其他人，到菩提伽耶最多的不是亞洲人，而是西方人士。今年西方人的熱情特別高，因為為時兩天的起誓將在菩提樹下譯成英語，這樣做還是第一次。他們每天都在甘地寺聚會，這是城邊上一座無人居住的空房，這裡存放著備荒用的一大堆一大堆穀物，上面牌子上寫著：「美國人贈送。不得轉賣或交換」。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年近三十歲或三十多歲，許多人是在六十年代移民浪潮中來到印度的，爾後他們繼續留居印度，自稱是「佛教」。一些人還是僧尼，這些僧尼當中的部分人，經歷了佛學嚴格的邏輯學習級段，他們贏得了藏人的尊敬，開始藏人對他們的皈依佛教曾表示過懷疑。達賴喇嘛評論說：「開始，西方人士受到宗教的吸引，這就像他們的精神在度過一段假期生活一樣。然後，過上了一些時候之後，他們對於進一步認真學習、深入鑽研有了興趣。一般說來，宗教沒有國界的。如果宗教有助於人民，那就足夠了，但對於信奉佛教的人來說，僅僅信教是不夠的，人們必須依靠理智來分析檢驗。佛祖說：『僧人和學者應該聽我的話，但不應該是出於尊敬，而是像金匠通過切割、熔化、磨擦來分析金子一樣。』只有經過理智的思考而仍然無損的東西，才能被認為是最後確定的東西。人們在弄清真理之後，就應該有信仰；而這就不會是將人們引向深淵的盲目信仰了。」

第三天講經結束時，達賴喇嘛將經書合上，放回了紅色的綢套，他嚙門平靜地對著話筒說：「今天上午我得到了我母親去世的消息，沒有必要傷心，如果你們當中的一些人今天下午有時間，又沒有其他事情的話，也許可以在菩提樹下為我母親背誦幾遍真言。」顯而易見人們都被打動了。偉大的母親，是西藏社會的一根支柱。她是與昔日的西藏密切相關的人物之一。因為她是三位活佛的母親，所以特別受人尊敬。達賴喇嘛後來敘述道：「當我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時，這可是不同尋常的經歷，是一次好機會。死亡的觀念和人的壽命長短，給我的觸動更大。但是，我並不傷心；我接受了這一事實。在離開達蘭薩拉之前，我曾經作過預言，說死亡很快就會降臨，我去看望了母親。當我見到母親時我清清楚楚地對她說：『我們都要死的，躲是沒有地方躲的不僅僅是你，大家無一例外都會離開人世。』你們看，在信教的人們之間，他們可以坦率地談論這些事情。但與其他入交談時，即使你知道他們將死亡，但你仍然得假意說他們身體很健康。我直言不諱地告訴我母親：『妳年事已高。遲早是要走的。在最後的時刻，最要緊的是不要有依戀之情。唯獨只應該對觀世音懷有依戀，這樣就沒有理由去擔憂了。』她心情鎮定地接受了我的忠告，後來別人告訴我，母親在彌留之際，表示的是對身邊周圍人們的關心，感謝他們照顧她，對益西丹增說她的病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表示歉意。你們看，這樣做就很好；這就體現了佛祖的教義。事實上，信奉佛教的目的之一是，當人們的最後時刻來臨時，即將去世的人已經有了準備，而他們身邊的人們則懂得自然規律，並不擔憂。情況通常恰恰相反，人們並不談論死亡，我們假裝自己能夠長生不死，而當死亡來臨時，我們只是哭叫，而這卻無濟於事。雖然我是她有出息的兒子當中的一個，但我也曾有過特別的夢幻或表示。我背誦了幾遍真言，祈禱了幾句，別的事情也就再也沒做了，我相信她來世的命運一定很好。」這是達賴喇嘛結束時笑著講的幾句話。

1月19日早上六點十分，貝拿勒斯車站的梯託大門前。達賴喇嘛的車廂與家雅列車脫鉤之後，滑行進入了終點站之外的一條幽靜的岔道。早餐後，丹增嘉措沿著狹窄的走廊，來到了車廂尾部的盥洗室洗一洗。與他同行的那些人，都在忙著將衣服拿出來放在車廂裡，準備開始第二站的朝佛活動。

車廂外面的鐵路旁停有三輛大使牌轎車，司機在擦轎車前罩，高等佛教研究學院院長、博學的桑東仁波齊手捧哈達，在迎接達賴喇嘛。在他周圍站立著通常可見的警察，他們肩背步槍，頭上裹了圍巾以抵禦清晨的風寒。過去一點就是淺黃色的圓屋頂貝拿勒斯車站，它是英國人統治時期留下的更具戲劇色彩的遺產之一，它在朦朦的晨曦中露出了自己的面目，這時車站大廳裡躺著一排排的旅客，他們靠著牆，身上裹著毯子。在這一排排的旅客之間，是印度的白色神牛，身上有波紋，

下巴鬆弛，眼睛又大又黑。貝拿勒斯是聖城，神牛比人吃得還好，它們四處自由漫步，一堆堆稀散的牛糞就拉在大理石地板上，牛尿的刺鼻臭味瀰漫於整個車站。在達賴喇嘛的轎車旁邊，一個孤伶伶的乞丐在沿著鐵軌搜尋，從地上拾起從列車上扔下來的吃了一半的食物。轟轟隆隆開來了一台蒸汽機車，拉響了刺耳的汽笛，打破了大地的寂靜。

達賴喇嘛走出車廂。他問候桑東仁波齊之後，大步橫穿月台，走到了最前面那輛大使牌轎車跟前，這是輛低矮的深灰色轎車，車窗是茶色的，後坐車窗拉上了粉紅色的窗簾。負責安全的官員達瓦波耶坐在司機身旁。這時突然進來了一位西藏保鏢——曾經在特種邊境部隊裡服過役。達瓦波耶被擠到了座位中間，不過倒還舒適。德里的聯絡官達瓦先生，陪同達賴喇嘛坐在後排。其他兩輛大使牌轎車都是乳白色，很快也上滿了人。一輛吉普車滿載警察，步槍從敞開的兩側伸了出來，這輛吉普車跟在達賴喇嘛的轎車後面，車隊駛向車站大門。

汽車離開貝拿勒斯，朝正北方向駛去，印度古典文明的搖籃就在真理的恆河平原上。這塊土地上曾經覆蓋著榕樹林、椰子樹林、烏木林、棗椰樹林和刺槐樹林。發源於喜馬拉雅山脈的六條河流都注入恆河，把這裡變了無與倫比的肥田沃土，也就產生了印度古代的城邦。這些城邦是商業、藝術、政治和哲學中心，這裡的城市也就成了佛祖佈道的主要場所。在距貝拿勒斯五英里的鹿野苑的鹿園，佛祖作了第三次佈教演說，接著他進行了一次思想理論上的革命。他削弱了婆羅門教的崇拜體系，戰勝了有神和無神兩個哲學派別，贏得了這個地方幾乎所有強盛城邦的敬重，使他們信服新興的精神科學，這是印度黃金時代的全盛時期。今天北方邦遺留下來的景象，與它光輝的昔日相比，幾乎面目全非。

林木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它們幾乎沒有一棵倖存下來。不僅在一坦平原是如此，甚至在公路兩旁也是這樣。這裡的公路旁有刷了白灰的樹幹，這就如同印度其他所有地區一樣。但是出城一小時之後，不許損壞樹木的法規就遭到了公然踐踏。公路兩旁砍掉的、肢解的樹木只留下了樹樁，這些樹木都是零零碎碎毀掉的，一片片的樹皮被隨意剝去，樹枝被攔腰砍斷。在公路沿線，修路人居住在低矮、被煙薰得烏黑的帳篷裡。每隔五英里就有一隊築路工人，他們旁邊的公路切成幾段，成了一長截一長截的岩石路。公路上坐著一些婦女和兒童，他們將粉紅色、灰色的大石頭敲成小塊，然後又將小石頭敲成碎石，這些石堆常常有四英尺高，四分之一英里長。男子漢則挖運泥土，築新路基。這與西藏人幹過的活一模一樣，不過對於印度勞工來說，因為他們生來注定就是要一輩子做牛做馬，他們的命運也就似乎要悲慘得多，汽車在這條路彎來拐去。車速不過每小時三十英里，在石頭和溝道之間搖晃行駛，儘管車窗關得嚴嚴實實，但車內仍然灰塵瀰漫，叫人透不過氣來。達賴喇嘛十分討厭灰塵，因為他總是將外面長袍撩起來遮住自己的面部。兩小時之後，他建議在一個小村莊裡讓司機休息休息。除他之外，大家都走出汽車，伸伸手腳，消除一下疲勞。在印度，大家在路邊都是這樣，到破破爛爛的茅草房的茶攤上叫一杯甜茶，趕忙喝下去。一小時之後，他們第二次停車，這時達賴喇嘛叫達瓦先生去為大家買些橘子和蘋果。車隊繼續前進，換了一輛警用吉普車，護衛的警察在兩縣交界處就得換防。汽車駛經一頭死牛，一條狗被壓翻在地，腸子流到了路面上。在一條污濁的河流岸邊，一群村民一聲不吭地坐著，他們前面是一堆長方形的大柴堆，一具裹著素服的屍體在烈火中火化，一縷縷長長的煙柱飄然直上，升向空中，在他們身後的沼澤地上，還有十幾具裹上了平紋細布，等候火化。

四小時後，車隊快速穿過了一座難以形容的城鎮，朝右拐下了幹線公路，路過了一大片沒有樹葉的高大樹林，樹林中間是座小山，這些樹木就像是燃盡的蠟燭似的，山頂上有一座褪了色的建築；一片令人失望的景象：這就是朝佛的第二站拘尸那揭羅，它是佛祖涅槃(逝世)之地。

山包的對面，是一家色彩鮮明的藍色和橘紅色相間的阿育王旅館，它那高大的門道像人的心臟，看去就像通向曲折而又黑暗的隧道的大門。令人吃驚的是，這家旅館非常清潔，配有現代化的設備，周圍是修剪齊整的草坪，草坪上點綴著一些棕櫚樹。經理和他的助手們全是西裝領帶，整整齊齊，站在大門口等候，他們緊張得渾身抖動。一個排的警察繫紅頭巾，步槍上了刺刀，在四處不安地走動。一名身材像圓盤似的警官，肩上洋洋得意地掛著手槍套，尖尖的帽子在中午的陽光下閃閃發光，輕便手杖輕輕地敲打著自己的手掌，他高聲叫了一聲口令。當達賴喇嘛從轎車裡出來時，警察們的步槍一下甩上了右肩，鞋跟卡嗒一聲作響，腰桿挺得筆直兩眼一眨也不眨。經理領著達賴喇嘛，經過了向他致敬的警察隊伍，在旅館的外圍走了一圈。在這裡該警察排的其餘警察，卻毫無接受檢閱的準備，托托沓沓，他們似乎感到不好意思，臉也紅了，大氣不敢出，心底直發顫。而這些警察的伙伴現在也無須立正站好，他們盡量忍住不鬆開釦子，很明顯緊張的情緒驟然消失，雙膝也就可以輕鬆鬆鬆了。達賴喇嘛被帶到了一排房子的陽台是共用的，激動人心的時刻也就倏忽宣告了結。這時恰恰是正午。自從一個多星期前開始朝佛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得到安靜的時刻。陽台前佈置了一名警察，他一直在那裡行禮站立：一名西藏保鏢將一張椅子拽過來，放在達賴喇嘛淺藍色的窗戶下。隨行人員去了隔壁其他房間，打開自己的箱子。剩下的警察，還有他們的指揮官以及一些沒趕上歡迎儀式的縣裡的官員，他們與旅館的職員們站在一起，呆呆地看著達賴喇嘛

的房門和保鏢那張相當嚴厲的面孔，保鏢的面部表情明顯表示戲已經結束了。但顯而易見，在拘尸那揭羅很長一段時間就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即使看不到這位貴賓，但只要貴賓就在幾碼之外的地方，也有充分的理由留在这里呆呆地再看上一個小時——人人都是這樣。

下午無事，阿里仁波齊、達瓦波耶和達旺先生搬了幾張椅子，放在門廊前，坐在溫暖的陽光下。他們匆匆洗了一下，毛巾和內衣就放在附近曬乾。從旅館的休息室送來了一些報紙，其中有一篇關於西藏的特寫。照片中有一輛新的日本豐田麵包車，白顏色。中國人將這些麵包車運到西藏，為數很少，目的是要促進旅遊業的發展，是前一年開始朝這方面努力的。不過這輛麵包車陷在泥土中。二十五個衣衫襤褸的貧困藏人在推車，顯然他們是從附近的田地裡召來的——十分清楚，一張這樣的照片是不讓拍的，更不要說用它去作雜誌封面了。阿里仁波齊看著這張矛盾百出的照片，禁不住笑出聲來。他認為這張照片象徵性地表現了自己祖國的命運。他一聲不響地瀏覽了一遍這篇文章，還是老一套，這樣的旅行是中國人在炫耀自己，他們領著別人去參觀拉薩新近修復的幾家寺院。他讀完文章之後，坐著沈思，目光越過草坪和公路，疑視著一百碼之外的樹林中的涅槃寺。

下午過去了，當太陽開始西沉時，起了一層薄霧。霧氣是從潮濕的大地冒出來的，使地平線看去顯得模糊不清。拘尸那揭羅似乎仍在悲痛傷心。附近飄來的炊煙，夾雜著燒糊了的氣味，它覆蓋了佛祖逝世的樹林。一隻孤伶伶的鳥兒在哀鳴，一聲比一聲叫得高，叫得急，劃破了靜悄悄的 sky。由小漸大的月亮，緩慢地爬到了廟頂的上空，懸掛在那裡，淡淡的月光漸漸消失，飽含悲哀。

佛祖逝世前三個月，他就告訴自己的弟子說他一生事業已經完成。在雨季消退修行期結束時，他領著弟子們來到了拘尸那揭羅，這是叢林中一座泥巴牆式的小鎮。在這裡，佛祖躺在婆羅雙樹之間的一張床上，他問僧人，關於他的教義他們如有什麼問題就提出來。沒有一個人上前提問，於是他又陷入沉思，那天晚上三更時分他再次睜開眼時，他只講下了下面幾句話，這是他的最後遺言。相傳他說：「弟兄們，我規勸你們，世界萬事注定都要衰亡。發奮努力，去贏得自己的解脫吧。」佛祖的屍體用新織的布包裹起來，然後放在鐵器上火化，鐵器下面是香木壘起的柴堆，火堆上裝飾著拘尸那揭羅人民獻上的供品。後來，一些王國、共和國和其他要求獲得骨灰的人分成八組，分掉了佛祖的骨灰，每個組都在自己的地區為這些骨灰蓋了一座紀念塔。

翌日清晨，達賴喇嘛五點醒來修禪。他房間裡臨時佈置了佛龕，他在佛祖像前上供叩頭之後，就坐在座墊上，擺出了規定的姿勢；雙腿相盤，眼睛半閉，舌頭輕輕抵著上排牙齒的背面。他的手掌一個壓一個，放在大腿上，兩個拇指尖相互柔和地挨著，默想著大乘佛教的目的就是要普度眾生。像其他所有佛教信徒一樣，接著他就沉思考慮佛教的基本內容：人生的寶貴性質、非永恆性、因果報應以及空。然而，由於他是密宗喇嘛，因此他的努力馬上轉向了一些高級方法。這些高級方法使藏傳佛教聲名大振，因為西藏的佛事活動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他通過各種辦法，努力揭開了意識的粗造外表，揭示了精神的基本實質：智慧之光，一旦智慧之光清楚地表現出來時，他就把它專注在空上，這樣也就在開始消除與生俱來障蔽智慧的業障——誤解萬物常恆和萬物有我。同時達賴喇嘛要用智慧之光的力量，來創造一個難以捉摸的軀體，這個軀體能夠不受阻攔地穿過物體，可以將自己的軀體變成無數個，為全宇宙的眾生謀利益。他再一次叩了長頭，接著他就聽到有人輕輕敲門，他讓開了門，進來的是洛桑甲旺，他給達賴喇嘛端來了早餐，放在一個有蓋的茶托上。

九時，達賴喇嘛去參觀了涅槃寺，當他從自己的房間裡走出來時，一個班的警衛持槍向他致敬。這一次丹增嘉措放慢了步子，用銳利的目光打量了他們一眼，然後以正規的檢閱方式從他們身邊走過，在隊伍的末端他還了禮。他鑽進了大使牌轎車，汽車疾馳穿過大街，來到了二百藏人——他們也在朝佛——列隊站好的地方，他們手裡拿著哈達。這些藏人的周圍是一片廢墟：古代寺廟的殘垣斷壁，這些牆壁顏色微紅。前方最高的地方聳立著涅槃寺，這是座淺黃色橢圓形的新建築，它是為1956年紀念佛祖誕辰二千五百週年而修建的。達賴喇嘛在門前脫了鞋子，披上了正式的長袍，進門之後就在侍者鋪在大理石地板上的紅色和金黃色的布墊上叩了三個長頭。六英尺遠的地方(也就是到了房間的另一頭)，有一尊五世紀的臥佛，這尊佛像就是佛祖逝世時的姿勢，他靠右邊側臥，一隻手掌支撐頭部。據說，這尊佛像的位置與佛祖逝世時的位置絲毫不差。達賴喇嘛走上前來，幫著將一條供奉的華麗哈達披在佛像肩背上方，這條絲綢哈達長達十五英尺。他轉了一圈，又回到了狹窄房間的前部，懷著敬意用前額觸了一下佛像的基座，然後陪同他的僧人與他一道坐好背誦兩句經文，這兩句很短，但對藏人來說，它們卻是最為流行的大乘佛教祈禱詞。這些簡短的紀念活動完了之後，他就離開了這裡。

外面爆炸聲撕破了長空，每次爆炸聲過後，烏鴉就發狂地呱呱直叫。慶祝集會正在進行，雷鳴般的爆炸聲是在放爆竹。三千名印度佛教徒在這裡集會，為一位緬甸和尚的塑像舉行揭幕儀式。這位緬甸僧人在拘屍拿揭羅度過了自已的一生，前不久死於居屍拿揭羅。達賴喇嘛在只有一名喇嘛看管的小小的西藏寺院稍事停留之後，乘車前往集會地點向他們發表講話。

從一開始，這些參加集會的人們的情緒就近似發狂。他們用很多根舊竹竿支起了一頂波浪式的紅色帳篷，在裡面安裝了有線廣播，前一天的深更半夜，這些集會者還在大肆播放印度電影音樂。保鏢們不安地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肩上垮的手槍套壓得吱吱作響。其他房間裡也是一片響聲，直到後來阿里仁波齊大步穿過曲折而又黑暗的隧道和大街，要求他們安靜下來，真是不可思議。組織者們堅持說，他們不過只是為了表示他們的喜悅心情，因為達賴喇嘛來到了這裡，但第二天，清早喧囂聲又重新再起，不可壓抑，紅色煙火爆炸聲在鄉間的上空迴響，一位臉色紅潤、瘦得皮包骨頭的男子漢情緒高昂，他的情緒像在印度的政治性集會上一樣，激發人群為達賴喇嘛歡呼。因此，人們一邊吃早餐，一邊高喊：「達賴喇嘛萬歲！佛祖戰無不勝！」口號聲在有線廣播喇叭聲中迴響，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在達賴喇嘛抵達這裡後的幾個小時情況一直是這樣，那位高談闊論的男子漢，仍在繼續進行他那可怕的工作，在台子上跳來蹦去，引導著發狂的人群，自己的喉嚨都啞了，還在發狂地指手畫腳，過不了一會兒就將話筒夾在腋下，拚命鼓掌，掌聲壓倒了歡呼聲，他認為掌聲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大多數的印度教徒一樣，他們都屬於賤民階層，在五十年代中期數百萬賤民皈依佛教，但他們對佛教卻一無所知，僅僅為了甩掉他們的種姓帽子。

達賴喇嘛開始講話時，一群印度僧人在平台後熱氣騰騰的地方打瞌睡，他們身著各色長袍，有黃色、赤黃色、橘紅色和栗色，全部戴了太陽鏡。一位牢騷滿腹的西方香客那天早些時候說：「這些穿黃袍的強盜-他們沒有一個人習經，白吃人民的血汗。」這位西方香客對於在印度人不是出自精神上的動機而投身宗教職業感到討厭。後來他又說到：「你們當時看到那些笨蛋在睡覺嗎？他們當中誰也不懂一句祈禱詞。難道他們就不知道僧人戴太陽鏡形象可怕嗎？」他感到大為吃驚。與此同時，當達賴喇嘛在講話時，很多人就像晚會上的兒童一樣，激動萬分，吵吵嚷嚷地走出帳篷。那位開始在台上慷慨陳詞的男子漢，發了瘋似的在過道上維持秩序，將這些人強行趕回他們的位置。當達賴喇嘛告退時，這個男子漢又衝上平台，想領著人們再歡呼幾次，不過卻毫無結果。人群發現了比歡呼更有趣的事情。他們圍著這一行人，貴賓達賴喇嘛也在其中，與其說他們是為了得到客人的祝福，還不如說他們的激情迸發，要形成他們慶祝活動的最後高潮。在混亂的人群中腳踩腳地走了好一陣，達賴喇嘛終於來到了轎車旁，坐上車走了。令人奇怪，這裡的情景仍然毫無改變，一片混亂，他們就佛祖的捨利問題展開了爭論，據說這場爭論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出現了。

一個半小時之後，丹增嘉措來到了一個大禮堂裡面。一千名教授和研究生站立起來，歡迎達賴喇嘛，他們都是龍樹佛教協會(它是研究原始佛經的名列前茅的印度學術團體之一)的會員，他們正在戈拉克普爾大學集會。達賴喇嘛作了即席講話，他論述了學術與佛教的關係，指出印度在熱心從西方輸入科學知識的同時，絕不可拋棄自己的古代知識遺產。這並不是個神學院，而是個規模很大的大學，但幾乎閉幕式上的全部講話都說達賴喇嘛是佛祖活的化身，很自然地將知識與宗教信仰柔和在一起。達賴喇嘛講完話之後，在隔壁的房間裡，接見了一長列的表示良好祝願的人；不過也有幾百人沒將達賴喇嘛放在眼裡，沒有理他。顯然他們受到了一股力量的支配，而這股力量要比敬重的力量大一些，他們一下撲到了長長的桌子上，桌子上擺了有缺口的茶杯和碟子，碟子裡面放了免費的糕點和三明治。實際上，這些教授的行為，似乎說明他們已經餓得半死不活了。他們大舌大嚼了十分鐘，沒有休止片刻，糕點和茶就全部報銷。戈拉克普爾-這個城市的人口差不多有三十萬，他們將在這裡停留兩晚-的情況將會說明為何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

雖然大街上沒有人餓死，但顯然卻買不到食物。達賴喇嘛一行在城裡最好的餐館就餐。兩天時間菜譜一模一樣：花菜、米飯、一份骨頭很多的肉，甜食是米飯布丁，布丁上面總是有一層殺蟲藥劑。這樣的菜譜已經相當不錯了，對於那些花不起這筆錢的人們來說，他們一輩子就只能吃米飯、麵包和達爾(Dal)，偶爾才能吃上一個雞蛋，或從附近的河流打撈些魚。河流很淺，河水混濁。這就是印度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比哈爾初露鋒芒的饑荒問題，而是長期的營養不良，它影響千百萬人，縮短人的壽命，助長了疾病的蔓延。戈拉克普爾不是個好地方。特別是這裡一直表現了人口爆炸問題，增長的人口充斥於印度的全部城市。人口的螺旋式增長又帶來了嚴重污染，城市上空的濃煙有三十英尺厚，是成千上萬家的炊煙，他們燒的是煤，甚至在晚上汽車的前燈也不過只能穿透十幾碼，因為煙霧實在太濃。城裡似乎在發生席捲全城的大火災。達賴喇嘛一行就下塌在市中心的兩家政府賓館，這裡離火車站不遠。賓館的職員既遲鈍又貪財。他們一方面對這些客人十分敬畏，而另一方面當必須幹活時，可又互相不懷好意。經理的一副鬼臉，像殺人犯，而他那些助手則像一些餓狗。顯然易見生活上缺吃少穿對人的性格損害實在不小，要生存就有壓力，就必須事先考慮自己，再想到別人。他們這種出於敵對情緒而產

生的懶惰，也是忍耐的一種形式，因此當第一家賓館滿員之後，達瓦先生不得不親自去安排第二家賓館，因為還有一半人沒安排下。

「他媽的，該死的臭蟲！」夜晚就讓這些傢伙給破壞了。阿里仁波齊穿著內衣，拿著手槍在空中亂晃，他呼地一聲開了門，從第二家賓館的一間房子裡衝了出來，高叫：「該死的臭蟲！吸血鬼，把我吸乾了。」接著他將小巧的自動手槍插入槍套，跑回大樓，拖了一床墊被又出來了。他將墊被鋪在撒滿露水的草坪上，將手錶取下來，皺著眉頭看了看：早上四點。從午夜上床到現在一刻也沒有睡著。吞沒了戈拉克普爾的煙霧茫茫一大片，它供養了幾十億蚊子，有許多還是瘧蚊。而在這個賓館裡的蚊子又特別多，它們世世代代喝的是印度官員的血，人連吸氣都難於做到。蚊子一來就是一群，像籃球那麼大小，它們的嗡嗡叫聲充斥於整個房間。那天晚上早些時候，達瓦波耶對阿里仁波齊說了聲晚安，又說：「今天晚上好好欣賞音樂會吧。」把蚊帳抗在肩上就走了，因為他倒記得隨身帶蚊帳。沒有蚊帳就無法睡覺。這時阿里仁波齊在房子外面的草坪上，柔和的月光宛如滴滴露水，散落在黑色的大地上，草坪在月光下顯出了自己的輪廓，阿里仁波齊只清靜地休息了十分鐘，接著他又發現了一群蚊子，後來室外的蚊子都蜂擁趕來聚會。

儘管晚上沒有休息好，翌日卻還是趕上最辛苦的一天。達賴喇嘛將進入尼泊爾王國，這還是他二十一年的第一次。比藍德拉國王在他即將來臨的生日時，要釋放拉姆次仁和六名遊擊隊戰士，他們是於 1974 年在定克山口被俘的。國王對藏人還表示了進一步的姿態，他同意達賴喇嘛對藍昆尼作短暫訪問--而不管在北京會產生什麼後果，藍昆尼是佛祖誕生地，在尼泊爾境內距邊界十七英里。在尼泊爾的西藏難民有一萬五千人，多少年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從加德滿都、波卡拉以及附近城鎮趕來歡迎達賴喇嘛。按照事前作出的安排，達賴喇嘛將不受檢查，不要護照和其他東西，就可以越過邊界，作八小時的停留。

日出後不久，一支由藍德羅弗越野車、豐田車、賓士轎車和傑洛基切費車組成的車隊共五十多輛，上面坐滿了藏人，遂在邊境尼泊爾側排列起來。這裡入境有一張大門，大門上面是一個卒堵婆，它將邊境城鎮索納里分割成二半。這裡的一片繁榮景象，與印度形成了對照，尼泊爾的西藏難民顯然比印度的西藏難民高一等。他們的富裕蜚聲境外藏民--尤其是加德滿都那些大商人十分有錢，他們不但作珠寶和卡墊生意，而且還經營唐卡和佛像，這是褻瀆行為。他們的孩子們穿的藍色牛仔褲，留時髦髮型，他們自己身著做工考究的厚藏裝，還有一塵不染的淺頂軟呢帽和用綠松石以及珊瑚做的傳統耳環，這些都表明了他們的富裕。僅在這裡集中起來的屬於藏人的小汽車數量，可能接近印度境內藏人擁有的小汽車的總和。但是，之所以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富裕情況倒不是在於人，而是在於尼泊爾這個國家。這個王國在東西方之間保持了平衡，它依靠中國人修路，從印度進口水泥，請日本和歐洲蓋飯店，從日本和歐洲進口音樂帶、手錶以及最新式的轎車，這樣在過去的十五年當中，它就引進了大量的消費品。雖然人們指責政府官員貪污作弊盛行，大肆鎮壓以學生為基礎的民主運動，指責政府幾乎對所有的人都採取兩面三刀的手法，但政府卻有能力將各種商品送往窮鄉僻壤，多少世紀以來在與世隔絕的河谷裡過著原始生活的人們，都能順利地買到東西，因此也就能夠使全國人民心滿意足。尼泊爾王國不像印度，它不是難於操縱的龐然大物，這個王國大小適中，至少在外表上可以在一夜之間就跨入二十世紀的門檻。甚至秘密警察也表現出受過第一流訓練的模樣。秘密警察到處都派了人進行觀察，他們的服裝--與印度秘密警察的亦不一樣--是漂亮的套裝，他們攜帶著微型無線電報話機和照相機，將人群的各個角落都拍了下來。這個星期三的上午陰天，尼泊爾的重要事件莫過於達賴喇嘛非官方性的來訪。中國大使已經離開加德滿都返回北京，以表示必要的抗議，同時又聲稱他只是去「度假」，以掩蓋其本意。不過藏人清楚，在他們當中中國特務很多。因此對於達賴喇嘛的來訪，做了嚴密的組織工作。在邊境上等候歡迎他們領袖的有二百人，其他八千多名年輕人則在藍昆尼的西藏寺院前，排起了超過四分之一英里的歡迎隊列，他們頭戴米色高頂皮帽，長袍上繫著紅色和綠色緞帶。相比之下，由三輛轎車組成的達賴喇嘛車隊就微不足道了--只是因為這個車隊的主要人物的個人威望才使它顯得了不起，車隊於八點鐘離開戈拉克普爾要朝北行駛兩個小時。

途中一直非常平靜，離開戈拉克普爾之後半小時，鬱鬱蔥蔥的景像出人意外地展現在眼前，取代了身後荒蕪的原野。喜馬拉雅山脈離這裡僅五十英里。田野裡色彩繽紛，莊稼長勢良好，有芥子、小扁豆和麥子。未遭毀壞的樹林又重現在眼前。這裡有叢叢柚木樹點綴著大地，每一叢就像一個半圓形的華蓋，蓋底平整，引人注目的芒果深綠色，一串串地掛在樹葉之間。沿著這條狹窄的單行道公路有一些村莊，村里的房子全是用光溜溜的黃泥巴修建的，門廊、柱子和牆壁渾然一體，屋頂是用成褶狀的茅草蓋的。在附近的田地裡，人們用長長的扁擔挑著皮桶，不停地上下擺動，十分平穩。村民們同樣表現出他們與這裡的環境十分和諧。他們的身材很高，皮膚豐潤，骨架勻稱，手指修長，高高的顴骨，清澈的雙眼深深地嵌在眼窩裡，顯然表現出了貴族的風度。

雖然八點還沒有過多少，但公路上已擁擠不堪-不過帶有原始氣息，十分安靜，因為公路上擁擠的是牛車和農民。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印度古代腹心地帶的痕跡。數百人井然有序地隊伍去趕集；他們的車子都是三角形，下面是兩個輪子，輪輻很多，輪輞十分笨重，車上堆放著草、木材和農產品，足有二十英尺高，趕車人坐在高高聳立的貨物頂上，手裡握著一根鞭子，自家做的白色長袍一塵不染。牲口簡直棒極了，牠們的臉長長的，粉紅色的耳朵，鐮刀形的紅色頭角，有些到肩頭有六英尺高；他們腳步穩重，悠閒放鬆，與主人的安祥鎮定彼此相呼應，趕車人對於鳴著喇叭超前開的汽車幾乎不加理睬。

在邊界弧形大門下舉行了簡單的歡迎儀式之後，達賴喇嘛乘坐轎車全速駛越一座現代化的橋梁，下面是平整的公路，路基墊高了。這裡是開闊的熱帶大草原。從僅僅相隔十五英里外的喜馬拉雅山脈吹來了習習涼風。在不到兩個小時之內，景色就發生了三次大的變化，這是第三次：從不毛之地到魚米之鄉，眼前是一片原始平原，就像東非平原一樣一直伸向地平線，而這裡卻是地球上最高山脈的腳下。半小時之後，右邊出現了一片長長的叢林，叢林中有一些寺廟。西藏寺院位於叢林正中，栗色的廟牆高高聳立，廟牆下支起了一千頂帳篷。車隊在一座黃紅兩色相間的牌樓前放慢了速度，松樹枝在牌樓兩旁的石頭火爐裡燃燒，冒出的煙霧將牌樓籠罩起來了。牌樓後排列著八千名藏人，他們在這裡已經列隊就緒五個小時，迎候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灰色大使牌轎車小心翼翼地駛到了牌樓下，然後又順著隊列向前駛去。當轎車在緩行時，人們完全被衝動的感情所左右。他們低著頭，雙手擺出祈禱的姿勢，手裡拿著香和哈達，目光凝視轎車後排尺窗，從這裡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幾乎所有的人開始哭了起來。婦女和兒童，年輕人和中年人，來自多爾波的牧民，來自木斯塘的康巴人，這些康巴人以前是遊擊隊員，身高肩寬，臉龐久經風霜，多年來毫無結果的戰火將他們的臉龐鍛鍊得更加結實。頓時，這些人全部一副哭相，淚如雨下。

站在隊列最後等待的是西藏寺院的六十名主寺喇嘛，他們在敲鼓擊鈸，有些人手裡拿著緞質的勝利幡。達賴喇嘛被人領著來到寺廟內，登上了二樓，人們可以聽到他與寺院堪布的開心大笑，過了一會兒之後他又來到外面，後面跟著精心挑選的一大幫人，他邁著輕快的步子朝聖樹走去，佛祖於二千五百年前誕生在這棵樹下。

這棵樹圍在一個用白磚頭砌的台子裡，儼然像史前留下的遺跡，高三十英尺。茂盛的樹葉，在近午的陽光照耀下閃閃發亮；樹的根鬚就像木倒刺一般，沿著台子的整個東翼一側露在外面，整棵樹從上到下纏著許許多多像珠柄似的藤，之所以有這麼多的藤似乎還不只是巧合而已。有幾個男孩正在樹上爬來爬去，他們不知道達賴喇嘛來了，都藏在或隱或現的地方互相叫喚；樹下有三名西藏婦女，她們每人背上都纏著一個嬰兒，正在用自己的額頭觸摸樹幹。從山里吹來的涼風穿過原野，給人以清爽的感覺。莊嚴的色彩，並沒有給蘭昆尼孩子般的氣氛帶來任何不便，佛祖是在這棵樹下誕生的，儘管樹根年代已久，四處蔓延，但它那纖細的樹枝卻直插藍天，柔軟而富有活力。達賴喇嘛停留的第一站，是一個用磚砌的四方水池，裡面是一池綠水。他在池邊進行了一項簡單的儀式，用一個銀器將聖水倒了下去，然後沾了幾滴池中的水抹在額頭上，以示祝福。當時就在這裡的水邊上(不過當時這是湖)，佛祖的母親摩耶王后在分娩前停歇過。到了分娩期，她按釋迦部落的習俗，離開首都迦毗羅衛去她父母家中分娩。這嬰兒不同凡響，這一點已為人所知，因為已經有了一些先兆，而且還做了一個好夢，在懷孕期間夢中出現了一匹有六根象牙的白象(它是王室的最高象徵)，白象進入了王后的身右側。令人吃驚的是，分娩發生在曠野，同時出現了一些奇跡般的徵兆，還有一些天使作陪，當時王后還在去父母家的途中。摩耶王后在城東蘭昆尼園林中的湖邊停歇。這時她開始分娩，照看她的有她的妹妹和一些女僕，她身子站立，手抓著無憂樹下部的一根樹枝，生下了小孩。據傳說，小孩是從她右脅出來的，朝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走了七步，然後揚起了一個指頭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嬰兒被帶回了迦毗羅衛，跟著他來了位聖人，因為天宮的信使給他透露過消息，他是根據孩子身上的標記，認定他是位大明大智的佛陀。但七天之後，摩耶王后去世了，佛教經書認為她完成了自己的光榮使命之後，得到了善報，上天界轉世再生去了。

佛教認為聖人會常常在世上出現。達賴喇嘛在談到這一信念時，他評論到：「自願重新轉世的目的，就是要為眾生萬物謀取好的結果。聖人轉世再生是有選擇、有意圖、有目的的，其確切目標就是要通過宗教或其他手段為人類服務。這樣的聖人又分成若干級。最高一級是摩訶菩薩和佛陀，他們擁有轉世的能力。而這些轉世又可以分為許多等級，低等級的轉世就必須受制於核心轉世。而高級轉世則可以自控。我就知道一些例子，其中就涉及到一百個轉世，哪個轉世都知道其他轉世在幹什麼，而又都只對自己(即『我』)有認識，但核心轉世還是只有一個。不過這是很難解釋清楚的。」達賴喇嘛最後笑著說：「除非人們有親身經歷，不然就會認為這些話是無稽之談，像科幻小說，或者說像宗教小說。」

達賴喇嘛在尼泊爾的一位考古學家的帶領下，路過了古代立的一根柱子，它是公元前三世紀由阿育王修建的。達賴喇嘛獻了一條哈達，接著爬上了兩節樓梯，來到了樹旁的一間單獨的殿堂裡，房間裡一片漆黑。達賴喇嘛叩了長頭，獻了供品，

由十五名喇嘛陪同吟唱祈禱詞。擁擠神聖的殿堂色彩鮮艷，氣氛安祥，僧人們流暢的誦經聲在房間裡回蕩，這裡出現了朝佛期間屬於個人的短暫一刻。達賴喇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母親。他說：「雖然後來的計劃不一樣，但不知怎的，蘭毘尼卻成了我朝佛的最後一站。我在蘭毘尼時，就認為這是吉祥的徵兆。因為蘭毘尼是佛祖的誕生地，它代表著一件事的起始。現在我母親必須再生，你們看這不是很好嗎？」

午飯後，達賴喇嘛乘車來到一片曠野上，這裡支起了一頂大帳篷，裡面放了一張寶座，帳篷前聚集了一大群人。繁瑣禮節完了之後，達賴喇嘛開始講話，首先他就招呼八千人都盡量靠近自己。他們照辦了，密密麻麻地在他前面擠得水洩不通，真是令人驚奇。達賴喇嘛似乎是在對自己家里人講話一樣，他熱情洋溢地講了一個半小時，談到了人們必須好好生活，要有道德，要慷慨大方。講完這些之後他停頓了一會兒，接著他使聽眾大吃一驚，因為他實實在在地宣布：「現在，我們鬥爭的漫長夜晚即將結束了。我相信我們不久就會重新相會-是在拉薩。」人群為之驚愕，繼而報以有節奏的響亮掌聲，這是不同尋常的-他們快樂的心情更多地表露在數十張老淚縱橫的臉龐上，因為他們開始領悟了他們所聽到的這番話的含意。

1月21日凌晨二點，梯託大門前。達賴喇嘛在包廂裡睡了幾個小時。第五十一次上行列車從加爾各達發車，前往帕坦科特之外的查漠，要到凌晨四點才能到達目的地。當列車緩慢駛入貝拿勒斯之後，達賴喇嘛的包廂將要轉軌，這節車廂被掛到了褐色車廂之後，前面牽引的是一台黑色蒸氣機車。與此同時，桑東仁波齊既不離開，又拒絕打盹。他說：「神聖的達賴喇嘛是在我這個站，他沒有離開，我就不能睡。」他和阿里仁波齊共用鐵軌旁的一間休息室。他們躺在床上輕鬆閒談，一會兒談到高原跳傘(是在特種邊境部隊的西藏突擊隊中舉行的)的世界紀錄，一會又談到了有關佛祖生平的理論問題的辯論。當話說得越來越少時，他們兩人開始打起瞌睡來。阿里仁波齊設法從附近一名睡著的警官身上偷來他的烏木棒，棒頭上還包了銀。他拿到烏木棒之後，就與桑東仁波齊一道溜到了黑漆漆的月台上，他們要在這裡進行棒平衡比賽：棒子放在中指指尖上。S.仁波齊(他的學生都這樣稱呼他，以示親熱)生來就是個至善論者。他在月台上轉來繞去，跟著那根搖晃不定的烏木棒移動，他那件合身的栗色長袍就像羽翼一樣優雅地擺動。達瓦波耶和達旺先生走了過來，剛才他們到城裡看電影去了，因為現在他們的任務已差不多完成。他們總是在談論火車是否會來，如果來的話什麼時候到，當火車終於來到時，這時仍是深夜，他們將烏木棒歸還原處。接著是互相簡單話別，然後前往旁遮普邦的兩天旅程就開始了。又是那些沒完沒了的停車站，不過這次順序倒過來：貝拉、阿梅提、賈伊斯、賴巴雷利、勒克瑙、錫塔普尼、沙賈漢普爾、蘭普爾、盧迪亞納、賈朗達爾，最後是令人沉悶卻又熟悉的帕坦科特月台，到最後一站的時間是上午九點，天氣很冷。

栗色賓士轎車擦得乾乾淨淨，在車站門廊的屋簷下等候。車旁站著的是通嘎，他是達賴喇嘛的司機，也是麥克累德干基咖啡館店主，還有一排威利牌吉普車和大使牌轎車，西藏司機都已做好準備，等候達賴喇嘛一行的到來。卻看不到一個警察的蹤影。喜馬楷爾邦似乎天氣不好，無法派一隊警察來護衛。頭天晚上下了今年的第一場雪。但在帕坦科特卻只有雨--陰森討厭，將公路變成了泥潭，轎車和卡車在泥漿中蜿蜒滑行，泥水飛濺到了路旁棚店裡，紅棕色的泥水噴得棚店邊上到處都是。那些倒霉的店主，緊貼在棚店的後牆上，他們躲在一堆堆的毯子和上衣後面，無可奈何地乾瞪眼，看著一輛輛車將泥水濺到他們的貨物上。不過他們身旁有收音機和熱茶，這還能給他們一點點安慰。誰也沒有動彈去重新收拾一下商品，也根本沒有去關板子--儘管沒有一個顧客。雖然每年冬天都有兩個月，但奇怪得很，冬天並不冷，因為印度次大陸通常都熱得令人難受，因此冬天這一段不長的時間，也就和其他地方的情況不一樣，開設前面沒有牆壁的露天攤子與其他季節一樣也是可行的，不過這些店主還是有點不正視現實。達賴喇嘛的車隊過了這片地方之後，加速前進，飛馳穿過了一英里長的陸軍基地，來到了丘陵區，車隊進入喜馬楷爾邦，來到了迷宮似的古老河谷，據說亞歷山大大帝曾從路過，前往康拉河谷，他還在達蘭薩拉的多拉達山脈山脊上宿過營。

公路上沒有其他車輛。因此，達賴喇嘛坐在他最喜歡的前排座位上，只要在兩旁都是峽谷的森林中有一段直路，通嘎就會將油門一踩到底。有一次加速時，突然一隻後輪爆了，賓士轎車剎車後停了下來，車身有一半出了路面，後面跟著的兩輛大使牌轎車，裡面坐滿了僧人。再後面跟來了一輛吉普車，車速每小時五十英里，司機只想跟著車隊跑，但因為他在車站要值班，弄得他筋疲力盡，抱著方向盤在打瞌睡。在最後的一剎那他看到轎車停在前面，連忙煞車，但已晚了，汽車煞不住，輕輕撞到了最後一輛大使牌轎車的尾部。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傷。這時，冰雹夾著雨點鋪天蓋地打了下來，把旺秋淋得透濕。他是康巴人，個子高大，著綠色軍夾克，腳上穿著笨重的靴子，他正在手忙腳亂地換賓士轎車的那隻輪胎。轎車在粗壯的大樹下等候，冰雹重重地打在車身上，車上的人們陷入了沉思。

一小時後，達蘭薩拉後的巍峨群山出現在遠方。山上剛剛下了雪，耀眼奪目。風暴過去了，天空漸漸明亮，空氣清新，令人振奮。這時前方已經可以看到達蘭薩拉和麥克累德干基了。它們分別座落在兩地的山後，覆蓋著皚皚白雪，令人心曠神

怡。達賴喇嘛母親的住宅克什米爾別墅，位於達蘭薩拉和麥克累德干基之間，但由於它太小而看不見。幾十名喇嘛團團圍住了這座別墅。這時，他們將六千二百萬最終的禱言(共有一億)聚集起來，然而達賴喇嘛的母親已經告別了人世。

車隊進入特瓦里集市之後，人們立即可以看到這場暴風雪所帶來的危害。甚至下達拉薩拉也是一片困境。公路全被覆蓋了，車子要安全上行根本就不可能。消息傳來，一輛客車在軍營和西藏兒童村前的那段長長的緩坡上拋了錨。即使能夠修好，在一英尺半的雪地裡客車也無法朝前開。決定要試一試山背面的公路，這條路很窄，一邊是山，另一邊是數百英尺深的峽谷。不過這是人們步行來往於麥克累德干基和甘村基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之間常常走的道路。在卡特瓦里集市末端，車隊折向右邊，徑直向前奔馳，達賴喇嘛乘車來到了噶廈大樓前。他穿過寒冷的地段，跑進大樓，噶廈成員都按照禮節聚集在這裡迎接他。不過他在這裡又得到消息，還要耽誤。後面那條公路也不能通車了。兩輛吉普車在最危險的轉彎處車頭相撞。下坡的那輛車陷在雪地裡，開始滑向一邊，離邊緣只有一點點距離了。另一輛車也不能向下倒車，害怕也會陷入第一輛車那樣的處境。兩輛車抱頭纏在一起，堵死了通往德慶曲林(大昭寺)的最後一條公路。沒有別的法子，只有走上去。當達賴喇嘛在與噶倫們一起喝茶時，就打發了一個僕人上山去德慶曲林宮取一雙靴子。同時從車台上開下了一輛四門吉普車，這輛車是特種邊境部隊的戰士送給流亡政府的車身笨重，橙紅色，是訂做的。有了這輛吉普車就還有希望開上去一截路，車可以到一條石頭小路前，這條小路一直從林中穿過。達賴喇嘛的靴取來之後，他就朝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和一些趕來看他的家屬們揮了揮手，動身出發了。汽車開到了一些當地山區老百姓居住的房子附近，達賴喇嘛走下吉普車，邁步攀登坡度很大的小道。岩石小道舖上了一層白雪，岩石都看不見了，但達賴喇嘛卻能很快地在光滑的白雪下找到岩石小道。他在前面開路，領著大夥朝前走，他那條紅褐色的長袍忽隱忽現，頭上壓著積雪的松枝就像一頂斗篷，他獨自一人出現在山峰，身後襯託他的是清澈的天空，他的朝佛之行到此結束。

譯注

(1) 印幣單位，一皮薩等於百分之一盧比。

(2) 指華氏一百度，約相當於攝氏三十八度。

(3) 公元前六世紀前半期，印度有十六國，拘薩羅曾是最強的王國之一，它包括了居住在迦毗羅衛的釋迦族人領土。

(4) 一種印度食品。

第八章 護法之輪

1981年2月14日凌晨六點，達蘭薩拉。達賴喇嘛坐在大昭寺的寶座上。室外依然一片漆黑，萬籟俱寂，習習涼風從芒峰方向吹來。兩位老嫗天不亮就起了床，圍著大昭寺在轉經。她們看不聞寺內任何東西，因為寺院的窗簾全都嚴嚴實實地拉上了，正門上了鎖，側門有一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喇嘛在看守著。強烈的燈光透過扇扇窗戶的邊緣，外面的人才知道寺內燈火通明。

今天早上進行的活動絕對保密。只要是局外人，無論是藏族還是其他民族，都不得觀看。除了參與者之外，知道正在進行這些活動的人寥寥無幾。乃窮曲均已在忙於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兩天來，該寺喇嘛在背誦經文，而他自己卻也在不辭辛勞的淨心淨身。他每天都要坐禪，而今更為謹慎小心。他的膳食中沒有魚、豬肉、大蒜、洋蔥以及其他不純食物。他用的那套餐具也是自己專用的，這套餐具與寺院裡的其他餐具分開保管。為了完全徹底淨身，人們用藏紅花聖水從他的頭頂澆了下去，同時還要誦經。

今天早上起床時，四名侍者幫助乃窮曲均著裝。他平時穿著樸素，而今天卻要穿上一套華麗的服裝，這套衣服一直存放在兩只衣箱裡。紅色錦緞褲取代了他那普普通通的褲子，這條錦緞褲的腿部有六英尺寬，要折疊七下，縫在褲子上的襯墊才

可以位於膝部，褲子要在踝骨的部位紮緊，因此也就向兩旁鼓起了一英尺。他貼身處穿的是一件汗衫，然後是一件紅色絲綢襯衣，外面再套上兩件笨重的長袍，腰部鬆鬆地紮上一根腰帶，上面再罩上一塊很厚的錦鍛，錦鍛上開了個口，以便能從頭部套下去。接著將齊膝的皮靴穿上去，繫起來，靴子的腳趾部位向上捲曲，踝骨部位有深紅色的絲綢鑲飾眼睛，怒氣沖沖。這番打扮之後，人們攙扶著他鑽進了一輛吉普車，這輛車停在藏政府的院子裡，夾在該寺和西藏文獻檔案館之間。在夜色中，吉普車沿著後面的那條公路，盤旋行駛，穿過麥克累德干基，沿著通往大昭寺的路下行，來到了大昭寺。在人們的護送下，他從正門進了大昭寺，來到了大昭寺後部的一個小房間裡，準備工作要在這裡繼續進行。他穿上了一件三角背心，這件背心是用金箔小環製成的，就像古西藏的鎧甲一樣，背心底邊正好齊腰。接著，在他背上緊緊拴上了一個背包樣的東西，這個背包上要插四面旗，這上面還點綴著三面象牙旗。這四面旗是用對折的錦鍛製成的，懸掛在柔韌的金屬旗桿上，旗幟一直拖到背後背下部；象牙旗形狀猶如雨傘，下面插在臀部中間，上面超過頭部，頂部是金黃色。他的袖子用紅條布紮上了；左邊的袖子上另外縫有三隻深紅色眼睛，為方便射箭，這只袖子縫上了襯墊。最後，胸前掛上了一塊金黃、紅色相間的絲綢，絲綢底部垂吊著數百根彩虹色絲線，精美至極，將一切都遮住了。絲綢正中一面金鏡，東南西北四方點綴著串串綠松石，環繞著一塊紫晶，紫晶核心是銀質的，擦得閃光耀眼，紫晶核心上有一密宗祈禱詞。左邊掛著一柄三英尺長的劍，銀質劍鞘，右邊是一個裝滿了箭的金色箭筒；右手大拇指戴著一個金箍環，當要拉回弓弦時就用得著它。這些都是史詩裡一位西藏武將的裝束，他是格薩爾王時代的一位英雄人物。格薩爾王是傳說中偉大的藏王。但是，儘管這位喇嘛一身戎裝，但他並不是去戰場的。幾分鐘後，當他坐在大昭寺的強烈燈光之下時，他將失去知覺，降神作法，他的知覺將由多傑扎登的知覺所取代。多傑扎登又稱「聞名於世的永恆之神」，他是西藏國家級曲均的首席佛師和顧問。一個所星期之前，持續三天的藏歷新年慶祝活動宣告結束，現在輪到一年一度的首次正式降神作法要開始了。幾個世紀以來，年年都是如此。

在大昭寺的主殿堂裡，達賴喇嘛沉默不語。他的寶座後面立著一尊高大的佛像；他坐在殿堂的前部，這裡的基座上陳放著許多西藏保護神塑像，顯得很擁擠。塑像前擺放著一盞盞的大大的酥油燈，將塑像照得通亮。不過殿內之所以通明透亮，更主要的還是由於寶座兩旁排列著一百盞電燈，形狀如同層層相疊的錐形物，這些電燈泡也是作為供品來安排的。在強烈的燈光照耀下，光澤的地板幾乎使大昭寺染上了異常整潔的色彩。但並非全是這樣，七英尺的長矛上畫著深紅色眼睛，長矛用繩子拴在殿堂的正面柱子上。柱子後面是乃窮寺的兩排年輕喇嘛，他們手拿樂器，準備就緒。一張桌子上擺著用糌粑做的供品，另一張桌子上放著一張長弓和一柄劍，旁邊是一頂飾有旗幟的頭盔，頭盔鐵質金箔，幾乎高達三英尺，頭盔熊皮毛飾的正下方是五個顱骨，珍珠牙齒和紅玉色眼睛，環繞周圍的孔雀羽毛，前面是一柄火紅的劍，象徵著能透視現實生活最終實質的洞察力。頭盔後部支撐著九面鑲有銀鈴的三英尺的旗幟。最上面的那面旗上又有一些金鈴，周圍是白棉組成的一個環，中間是金雕的佛、法、僧三寶。旁邊是另一個頭盔，它屬於嘎東曲均，今天早上他也要降神作法。不僅達賴喇嘛陷入了沉思冥想之中，而且他屬下的眾噶倫、人民議會的議長、副議長以及各部門的各位秘書長也都是如此。他們坐在達賴喇嘛左側低矮的座墊上。一些經過挑選的堪布和喇嘛出席儀式，面對他們坐著，中間夾著過道，他們的行為舉止同樣壓抑低沉。

儀式開始。兩支十英尺長的法號齊鳴，號聲震耳欲聾，接著是白螺伴隨著鈸聲、鼓聲和喇嘛的誦經聲，使得保護神屈尊降格，附身軀曲均，即「受體」。寺院一側的一塊布簾拉開，出現了三名助手，他們攙扶著曲均，曲均幾乎無法抬步行走，他身上的八層衣服共計重達一百磅以上；頭盔的重量，雖然只有在西藏境內使用的頭盔的三分之一，但也重達三十磅。然而，使乃窮曲均不惜他人之力而難以動彈的，不僅僅是他的服裝，而且他已經開始進入降神作法的第一階段。他全身微微發抖，呼吸聲又短又粗。在音樂與誦經的間隙之中，曲均的呼吸聲全殿都能聽到。當曲均邁步向前行走時，他那耷拉著的腦袋在下面那一大身衣服的反襯下，顯得微小脆弱。他顱骨突出，一副凶相，雙眼內凹，目光發狂，大有受驚之狀。左眼上的濃黑眉毛從一個角度直指鼻樑，使人聯想到易洛魁(1)人假面具那被扭曲了的目光。他就像一副假面具一般，面頰發脹，門牙暴出，嘴唇前凸，整個左面頰變形走樣，足足比右面頰低出一格。只是嘴巴稍微捲曲，露出嘲弄的微笑，這還算正常。緊接著出現了更為嚴重的扭曲，頭皮緊緊地繃住了顱骨，使五官黯然失色。整個面容彷彿進入明淨純潔的天國。這時，曲均的眼睛顯得可怕、遙遠。他完全將自己看成是保護神，站在一座天宮大廈的中間；如果他不是這樣認為的話，那他也就不宜降神作法了。

在別人的帶領下，曲均沿台階而下，來到了大昭寺的主殿中。他在殿堂中間一張蓋有錦鍛的輕便折凳上坐下，下面鋪著一張人造虎皮。一名侍者雙手支著曲均的雙臂，另一名侍者一面拿著他的頭盔，一面緊緊地頂著曲均的後背，進一步協助將他支撐起來。乃窮曲均雙腿大力趴開，抬頭觀看二十英尺外的達賴喇嘛，此時他的呼吸加快。時機到來了。第一輪祈禱結

束，第二輪開始，又一次將佛師多傑扎登召來，請他從位於「無邊無際的宇宙」心臟的保護神「不可知大廈」屈尊降格，進入受體。長號聲宛如雷鳴，震撼著殿牆，降神作法進一步朝縱深發展。曲均開始降神作法，突然他的腦袋擺向右邊，他開始以驚人的頻率過度換氣，每次呼吸總是壓縮著迸發出來，就像水箱冒氣似的。速度加快，他開始感到全身窒息，這就如同貫穿全身的一根神經被緊緊地繃住、扭曲，一次次扭曲將他的呼吸與靈魂進一步從體內分離出去。這時，他的雙腿驟然跳離地面，蹦上蹦下。顯然易見，曲均的身軀開始膨脹增大，增加了兩英寸，原來特意繫得很鬆的腰帶，現在已緊緊地紮在長袍上了。他心跳很厲害，似乎成了獨立的行動，曲均胸前的那面鏡子居然也給彈了起來。

那位手拿頭盔的侍者意識到佛教保護神已經到來，因此他立即將頭盔戴在曲均的頭上。頭盔戴上之後，曲均的臉色一下紅的發亮，雙腳伸的筆直，腦袋則向後仰。三名喇嘛竭力扶著頭盔，同時領誦人即刻帶領著人們停止誦經。有一兩分鐘時間，除了音樂聲，什麼聲音也聽不到。降神作法結束時，必須將紮頭盔的那一活結解開，否則曲均就會完蛋；這一技巧侍者們練習了好幾天，就在他們自己的膝蓋上打結、解結。然後，曲均好象死了似的。但靠近細看，才能聽到頭盔頂部的小金鈴還在叮噠作響；金鈴的擺動並不是由於腦袋還在震動——即使腦袋紋絲不動，金鈴仍會微微擺動，這是由於多傑扎登的存在。護法神就在此地，就在這間房子裡，當那些侍者盡力將頭盔繫上去時，他晃了晃那雙似乎不屬於自己的大腿，猛烈地將頭部從一側甩到另一側。他那雙眼睛在頭盔紅綢邊緣下忽開忽閉，一眨一眨的，似乎一次就注意到了一個陌生環境的點點滴滴情況，然後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思緒之中。過了好幾分鐘之後，頭盔上的繩子才繫好。當繩子繫好之後，繫得很緊很緊，假如只有曲均一個人在進行這一系列活動的話，他肯定會立即窒息喪命。然而，當頭盔最終繫好之後，保護神也就完全附身於曲均又蹦又跳，右手揮舞著一柄長劍，開始舞蹈起來。

他的動作體現了尚武精神，憤怒且充滿尊嚴，每個動作都非同尋常地準確。當由於服裝太重，曲均無法行走時，一附於體內的多傑扎登也就幾乎再也憋不住了。他來了個九十度的鞠躬，雙臂交叉置於胸前，倏忽又反彈回去，那笨重的頭盔根本就算不了什麼。他一邊在空中揮舞著那柄重劍，一邊抬起了他的右腿和右臂，右膝和右肘彎曲，接著是左腿、左臂和左膝、左肘重複這些動作。這也就是儀式舞蹈的基本步子，他出於敬重，中間時給達賴喇嘛鞠躬行禮。曲均四周旋轉，重複著這些動作，十分敏捷，離他身邊兩英尺遠的那些侍者似乎進入了另一個世界，與他們眼前這非常敏捷的動作相比，他們顯得步履蹣跚，動作粗俗。這些侍者之所以待在原地，僅僅是為了使曲均在大殿中間的那塊空地上活動。

多傑扎登三分鐘之內鞠了三個躬，他甩掉長劍，衝上台階，直奔達賴喇嘛而來。他掃了一眼在旁邊的西藏政府各位官員，徑直來到了寶座腳下。他從侍者手中接過一條哈達，獻了上去，達賴喇嘛眼疾手快地將哈達接過來。與此同時，三位侍者趕忙將「芒德丹松」(傳統供品，由佛像、佛經、佛塔等組成)塞到曲均手中。保護神肩上披著那根儀式上用的繩子，他將聖骨盒、佛經以及佛像一樣一樣地接過來，緊握手中，然後獻給坐在上面的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用額頭觸了一下這些聖物，動作只稍比曲均慢一點，然後將他們遞給了右側的一位喇嘛。曲均和達賴喇嘛目光正視，在這一瞬間，多傑扎登雙眼仰視，溫柔愛撫，瞳孔擴大，目光明亮。這時，有人送上了一隻放在銀托上的銀杯，送到了曲均手中，杯中盛著的是濃濃的紅茶。曲均將銀杯托起，送到了達賴喇嘛的眼前，達賴喇嘛接過來喝了一口。接著，曲均也喝了這杯茶，然後他走到寶座的右側，這樣達賴喇嘛就可以彎下身來，同他耳語。這是所提的第一個問題，也是絕密問題。多傑扎登立刻作了答復，接下來曲均來到了幾個主要的佛像前，敬獻哈達。他急衝衝地來到寶座後的狹窄空地，將一條哈達拋送上去，哈達徑直落到了佛陀行乞用的鉢盂中，離地面有十二英尺高。這樣的力量和準確性令人驚訝不已，因為這顯然是很難的，將哈達拋上去這麼高，而且哈達還沒有散開。接著，他向其他佛像也獻了哈達，然後他以同樣迅捷的速度，回到了大殿中間的折疊坐凳上。

當他在一口一口地繼續喝茶時，眾噶倫、人民議會議長、副議長離開坐位，來到了他跟前。現在，降神作法所引起體力上的大消耗已告平靜。曲均的陣陣呼吸聲嘶嘶作響，十分均勻，有條不紊。當這些官員列隊而過，向他敬獻哈達時，多傑扎登從一名侍者手中接過紅色的保護繩，打好結，然後套在每一個人的脖子上，以示祝福。他們匯集站在曲均左側。這時，達賴喇嘛的首席秘書拿著一條二英尺長的捲軸，照本宣科地念著。這就是正式的請求，它是用詩體寫成的，請求保護神具體展現達賴喇嘛的前景，展開西藏人民及其政府的未來。其中不過只有三個問題，這一次，問題與接著而來的答復都採取公開的方式進行，大家都能聽到。但在其他時候，則需要更高程度的保密性，問題是寫在一張小紙條上，保護神將紙條塞在自己的頭盔下。當保護神準備就緒回答問題時，他根本不讀紙條，就將它扔在地板上。現在，在回答問題之前，又開始跳起了儀式舞。

各位官員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多傑扎登又拿起了那柄長劍揮舞起來，旗幟在他身後嘩嘩飄揚，有些旗幟的頂部用的是白棉。他戴上頭盔，插著像翅膀一樣的旗幟，洋洋得意地蹬著一雙前面向上翹的白色靴子，金黃色長袍和擦得發亮的胸甲在

閃閃發光，他就像神話式的驕傲英雄一般，就像古代西藏高原好戰的部落首領。當第二輪儀式無接近尾聲時，他轉向左側，長劍仍在頭上旋轉飛舞。他來到擺放錐形糌粑的供品桌前，揮手就是一劍，削掉了最上面的那塊供品的頂部。接著，他扔下長劍，大步向前，又一次來獻計獻策。

三名秘書正在寶座左側等候，其中一人拿著一塊夾有紙張的書寫板和一支紅色圓珠筆。侍者再次給護法神上茶，但這次他卻將茶杯推開，開始說話。他的聲調令人吃驚，字字清脆，但音調卻縹緲空洞、時斷時續，好像隔了多少個年代，相距那麼遙遠似的。由於音調高，而且還顫抖，人們還以為多傑扎登是女性，但他的音色卻如同天神一般。當他講話時，他的雙眼就像燃燒一樣，瞪得圓圓的，目光銳利，似乎能熔化一切，這也反映在他那繃得緊緊的臉皮上。雖然這整個場面都很平靜，但這幾位秘書仍可看到，多傑扎登渾身上下在強有力地地震動起伏，就如同燈泡的鎢絲一樣。據說，他的身體只要無意地觸及一下他物，就能將其徹底粉碎。這時，多傑扎登拿住了達賴喇嘛的一隻手，動作彬彬有禮，十分親熱。他轉過臉抬頭觀望，說起話來語氣謙恭、親近，出自於志同道合的感情，這一感情源遠流長。當他的話一句一句地講出來時，達賴喇嘛給予合作，慢慢地重復一遍，接著幾位秘書也齊聲重復一遍。多傑扎登的忠告就像電報一樣，一字一句地被接收下來，無一遺漏。這也並非易事。保護神竭盡全力，盡量發音準確，張動著那彎曲的、富有彈性的、老是容易張大的嘴，一個字一個字地發音，緊接著還要抬頭看看達賴喇嘛，以卻定對方理解無誤。這樣的交流，是在熱烈的、隨和的氣氛中進行的，這一點顯然與該儀式的任何其他時候都不同。忠告的形式，是輕快而有節奏的詩體。每一行首都是一個聲調很高的「啊」開頭，這一聲音逐漸減弱，在接著的字與字的停頓之間，餘音不散。今年，新年賀詞是以一首兩段詩開的頭，這首詩歌頌了達賴喇嘛，稱他為「蓮花之主，是人世間（堅熱斯）的化身，堅熱斯憐憫同情的目光射向四面八方：

窮苦眾生無保護神，
沐浴千眼慈祥佛光，
手握蓮花保護眾生，
我等欽佩敬仰萬分。
雪域佛陀慈悲為懷，
慈祥遍撒四面八方，
技高心善如母待子，
慈愛不盡舉世同歡。

對所提問題，他按照問題順序作出了預言性的答覆。

長號齊鳴，號聲在殿內回蕩不息。侍者將帆布座凳朝前挪了挪，多傑扎登在達賴喇嘛的寶座前坐下，仍在朝兩邊旋轉。當栗色簾布再次拉開時，他朝門口望去。嘎東曲均在侍者們的攙扶下，走了進來。他也要降神作法，附身於他的天神是「木鳥」，有時又稱「烏鶯帽」，像多傑扎登一樣，他也是西藏主要保護神之一佩阿甲布(意即神諭之源頭)的大臣。但是，嘎東寺曲均與乃窮寺的不同，歷任嘎東曲均都不是喇嘛。嘎東寺的曲均由俗人出任，父傳子，世襲相承。現任嘎東曲均是位三十多歲的男子，他還受聘擔任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的秘書。他出任曲均不過一年時間，因此仍然感到困難重重，因為在使保護神進入體內前，必須要經過掃除精神通道的過程，而他仍覺得這一過程痛苦不堪。此外，「木鳥」這位天神更粗暴，更易發怒。由於這些原因，所以才將這兩位天神召集到一塊，這樣通過使用特殊手段，多傑扎登就可以提供幫助，使這位新曲均變得合用。

當嘎東曲均進入大殿時，他的呼吸頻率很高，很沉重。他不如乃窮曲均那麼嫻熟而很快就能進入不斷深入的降神作法各個階段。他的胸部起落幅度大，毫無規律。他身著全長的黃袍，那又長又黑的頭髮與乃窮曲均的短髮形成了對照。不過，他也像乃窮曲均一樣，當他坐在進門五英尺處的帆布座凳上時，他的呼吸也驟然加快，聲音變得又粗又大。「木鳥」似乎一下就附身於他。每每吸氣一次，他就痛苦地尖聲叫喊，瞳孔膨脹，全身猛烈發抖。侍者們費了一番工夫後才將頭盔戴在他的頭上，然後架著他趕忙去向達賴喇嘛敬獻「芒德丹松」。經過一陣忙亂之後，「芒德丹松」總算敬獻完畢。接著，達賴喇嘛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一條綠色吉祥哈達放到了曲均頭盔與頸部之間。但是，整個降神作法過於激烈；窒息和抽搐不斷加強，大有危險之勢。達賴喇嘛發布了一道簡短的命令：立即將曲均的頭盔取下。緊接著，曲均就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突然中止。嘎東曲均毫無知覺，全身僵硬，人們將他抬起，拋向空中，這時多傑扎登跳離座位，從另一位喇嘛那裡抓了幾把金燦燦的青稞，向嘎東曲均俯伏的身軀撒了下去。接著，當嘎東曲均那人事不知的軀體被抬到門口時，多傑扎登自己卻也支撐不住了；這位喇嘛曲均全身頓時僵硬地伸直開來，侍者們趕快扶住了他，才沒有摔在地板上。侍者們將他抬了出去，這次降神作法全部結束。

一片寂靜。在復甦室內，兩位曲均分別躺在緊挨著的兩張床上，身上裹著金黃色錦緞毯和橘色的絲綢床單。嘎東曲均仍然全身發抖，呼吸斷斷續續，像痙攣似的。乃窮曲均紋絲不動地躺在床上，神色安祥。助手們松開了他的服裝，正在給他按摩。不久，他睜開眼睛看了一會兒，心神安定，接著他又閉上雙眼，靜靜地休息。這時，嘎東曲均已完全恢復，因為他的降神作法程度不及那麼深，且又短些，他坐了起來，雙手捧著腦袋，上身前傾，呼吸均勻。

兩位曲均換了衣服之後，與他們的隨身侍從一道來到了大昭寺主殿正門，進入大殿，向達賴喇嘛叩了三個長頭。乃窮曲均身著樸素的栗色長袍，他似乎只是稍微受了點刺激--在他給達賴喇嘛叩長頭祈禱時，他雙手與身體其他部位不太協調。但是，像以往一樣，他對降神作法根本沒有印象。嘎東曲均身著一件漂亮的綠色卡其長袍，繫了一根紅色腰帶，看上去他完全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凡夫俗子。他跟隨乃窮曲均來到了達賴喇嘛跟前，兩人都接受了授予他們的保護繩和哈達，然後回到兩列隊伍之首，一人坐在一列隊伍前頭，顯得面目一新。達賴喇嘛仍然默默無聲地看著下面。接著是上茶，殿內的二十個人都在用自己的碗喝茶，人人都在頂著自己腳跟前的地板。達賴喇嘛一口將茶喝乾，離開寶座，在接待室裡繫上了棕色淺口便鞋。當他走出大殿時，印度衛隊持槍立正。他準備返回自己的住宅。殿外，大昭寺外圍仍然空無一人，就像四十分鐘前一樣。天空開始泛白，夜已經過去了。今天是星期六。大昭寺內，人們正在從地上一粒一粒地拾起多傑扎登撒下的金燦燦青稞，他們要將這些青稞保存下來，將它們珍視為保護神的祝福。

一千三百多年以來，國家領導人幾乎每逢大的國家決策，總是要請西藏的乃窮曲均。雖然在拉薩的一些場面上，這位曲均會面對多達八萬名的觀眾，但該寺的內幕，降神作法的實質，特別是那些核心人物的經歷，這些都一直嚴加保密。不過，達賴喇嘛已同意將乃窮寺的一些詳細內幕情況及其最重要的人物乃窮曲均的生平向外界披露，這也是西藏走向世界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1930年1月5日，第十二世乃窮曲均洛桑晉美出生於拉薩一個中產階級的店主家庭。他幼年喪父，致使其母將她唯一的兒子送去當喇嘛。他們家有幾位表兄弟，有的在西藏第二大寺院色拉寺的傑扎倉，有的在布達拉宮的朗嘉扎倉，它是達賴喇嘛的紮倉。在決定去哪一個扎倉之前，洛桑晉美的母親讓著名的德莫仁波齊他們打卦問卜。根據德莫仁波齊自己的預言，他說這個孩子這兩個寺院都不要去。這位喇嘛說，這小孩在乃窮寺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幹，因此他應該去乃窮寺。喇嘛又說，這男孩必須受到精心照顧，必須總是保持「清潔」-意即在他面前，什麼事情都得按規矩辦。聽到這番話之後，洛桑晉美母親想到莫非她兒子是位確認的活佛。他那敏感、內省的性格進一步說明這男孩不同凡響。母親在乃窮寺弄到了一個位置之後，就將七歲的男孩送出了家門，他小小年紀就開始了喇嘛的生涯。

乃窮多傑扎央林寺-以前又稱永恆不變的妙音小島，位於拉薩西郊，離市中心四英里，周圍是一片檜屬植物林和果林，正處於哲蚌寺下方。自從十七世紀以來，該寺的一百一十五名喇嘛一直是由西藏政府供養，而西藏政府則責成該寺喇嘛每天都得與西藏的主要護法神佩阿甲布保持聯繫。人們相信，佩阿甲布和他派往西藏的主要使者多傑扎登居住在人們所看不到的精神世界，因此該寺喇嘛每天要舉行四次宗教儀式，共計八個小時，同他們進行接觸，最早的儀式於早晨六點開始，最晚的於晚間十點三十分結束。為了學會乞靈技巧，洛桑晉美必須記熟五百頁的密宗儀式-這些遠比那些為獲得神學博士(2)而必須背誦數百卷佛經要少得多。但是，由於特別重視要在儀式中採取準確無誤的符咒，這也是一項頗費精力的事情。除了背誦之外，別人還教他熟悉乃窮寺唱經、演奏宗教樂器、雕刻精美的糌粑供品以及跳宗教舞的獨特方式。最複雜的是，每一位喇嘛在念經時，必須在頭腦中所做的複雜觀想。由於他們坐禪所產生的力量，由於那些在觀想中的由血、肉、酒做

成的供品，大家相信實際上也就召來了保護神。想像力是通向更高一級、更美好的實相階段的紐帶。洛桑晉美很快就得知，那些因坐禪多年而打開通靈之道的老參們，在每天舉行的念經活動時，就可以親眼看見身著華麗喇嘛服的多傑扎登。然而，其他人則只能在每月舉行的五次正式降神作法時，才能隱隱約約地見到「聞名於世的永恆天神」。

雖然，在達賴喇嘛的要求下，經常私下進行降神作法，但在陰歷的每個月初二，哲蚌寺的眾堪布就會於日出後來到乃窮寺謁見保護神，從不間斷。當曲均在該寺後部二層樓高的哈雅格日瓦(面目可怕、多頭多臂保護神)像前進行降神作法時，這些堪布就向他提問請教，內容涉及哲蚌寺各方面問題。接下來那個星期，政府的四個部門--噶廈、達賴喇嘛事務總管辦公室以及財政局的兩個辦公室--就向乃窮寺提出正式要求，他們也要謁見護法神。每次降神作法發出的預言都有精確記錄，由乃窮寺秘書負責，他將預言記錄在九塊兩英尺長的黑色紅邊木板上，這些木板塗了油，並在上面撒了石灰粉末。因此，他用的是一支不用墨水的竹筆，記錄時用的是手寫體，這樣才能跟得上曲均那常常很快的講話速度。每當一次降神作法時，洛桑晉美目睹人們將木板搬到寺院的東廂房，在那裡將記錄重新抄寫，然後交給有關部門，同時還供本寺存檔。存檔用的記錄抄寫在大本書上，木框邊，用錦緞包好，存放在飾有華麗圖案的高櫃裡。在它們旁邊存放著若干卷金黃色綢軸，上面寫著五世達賴喇嘛親手製定的乃窮寺寺規。其他地方陳列著笨重的鋼刀，上面繫了結，這是多傑扎登贈送的以示祝福。不過，乃窮寺真正的佛寶是一些神聖的器皿。據說，保護神可以不要曲均的幫助，通過這些器皿直接與人們交談。自從佛教在西藏傳播以來，這些空心器皿就一直保存下來了。

不久，洛桑晉美從同伴口中聽到了有關曲均非凡能力的故事。別人告訴洛桑，在西藏歷史上，確榮保護神一直想方設法保護善男信女免遭傷害。前些年，他在拉姆措聖湖示現一星期之久，指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出生地。當年輕的達賴喇嘛已經成年並將要親政時，保護神在一次降神作法會上，通過與才智不凡的攝政王交鋒，揭露了有人想暗害達賴喇嘛的陰謀。當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統治即將結束時，保護神在羅布林卡公開舉行降神作法。他先面向達賴喇嘛，然後向他告別離去-這是最後分手告別時才有的場景。這一點在當時儘管令人費解，但四個月後，當這位西藏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出人意料地逝世時，人們才恍然大悟。所有這些都向洛桑晉美表明，他的寺院與西藏政府的關係是多麼密切。不過，在所有這些活動當中，只有藏歷新年期間舉行的活動最清楚地說明，乃窮寺所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藏歷新年的第一次儀式，就使整個保護神界直接接觸到了人間事務。

乃窮寺是國家級寺院，全國曲均及其主神數以千計，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網絡，乃窮寺位居榜首。這一網絡使人類世界與宗教世界連接起來，它每年都得收取一次「神稅」。西藏的一百二十名宗本每年都要代表天神，向他們各自所在地區的曲均收取供品。在藏歷新年初三舉行的龐大供品儀式上，他們再將供品交給乃窮寺，獻給佩阿甲布。這一儀式結束之後，乃窮寺的喇嘛來到拉薩市中心，觀看曲均參加西藏最為壯觀的慶祝活動，即為時三週的傳昭大法會。此時，二萬多喇嘛蜂擁而入，來到拉薩城，另外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千名香客，乃窮曲均至少要降神作法十次，其中最為激動人心的一次是在幾天的遊行活動、體育表演以及宗教集會之後。他也參入了城南五彩繽紛的遊行行列，來到了布達拉宮腳下的一片曠野上。他在一堆篝火前揮弓舞劍，玩弄一把三叉戟，儀式上他驅逐了舊歲惡神。

洛桑晉美長大些之後，他的主要老師逐步向他介紹了西藏宗教各階層的形成情況，通過講述這些情況，進一步向他灌輸了作為一名乃窮寺喇嘛所發揮作用的重要性的觀念。

十三個世紀以前，西藏是塊不文明之地，人民和當地神靈都很野蠻落後，不守規矩。第一位跨越喜馬拉雅山脈的佛教使者靜命大師試圖在西藏傳播佛法時，儘管王室還資助了他十一年之久，但最終還是被西藏的土神攆出了西藏。這些神靈本性殘暴，新宗教勸人們和平相處的教義與他們格格不入。繼靜命之後，印度大聖人、密宗大師蓮花生應邀入藏。蓮花生技藝高強，身手不凡，讓西藏人民打開眼界。他征服了那些不順從的神靈，迫使他們從此以後捍衛佛教。每當征服一個神靈，蓮花生就根據其能耐大小，將他安放在宗教的一個合適位置上，最後只剩下了五個狂妄至極之輩。在一系列的惡戰中，蓮花生將他們五個也擊敗了。接著，其中一個代表另外四個神靈，來到了蓮花生跟前宣布投降，表示效忠於他。這個神靈來時打扮成一個八歲小喇嘛模樣，頭戴金黃色帽子，手中拿著一串水晶念珠。蓮花生手持金剛，在這小孩子頭頂上打下了一個標記，並塗花蜜於他的舌尖，任命他和他的弟兄們為佩阿甲布神--五猛王。然後，蓮花生又規定佩阿甲布為全部保護神的首領。蓮花生戰勝了反對佛教的全部勢力之後，他幫助修建了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並將神聖器皿置於寺內。這些器皿是佩阿甲布的物質基礎，通過這些器皿就可以與佩阿甲布神接觸。由於這幾位猛王的地位太高，他們不能自己直接與人世交往，因此他們派出兩位大臣擔負此任：一位是多傑扎登，他是負責言論的西王桑吉甲布的大臣；另一位是星加亨，他是專管最優氣質的南王榮登甲布的大臣。另外指派了兩名力量更強的神靈協助他們：一位是藏帕，他以拉薩北面拉莫寺

曲均的身份出現；另一位是桑耶寺火焰七兄弟。洛桑晉美得知，由於這些神靈的卓越地位，他們可以免交「神稅」。另一方面，這些神靈的曲均經常用來檢查乃窮曲均作出的秘密預言，這樣就能確定，乃窮曲均作出的預言是否得到了正確的理解。而在他們屬下又有三十位將軍，這些將軍的任務就是管轄那些地位低一些的神靈。

蓮花生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後，西藏的保護神體系在整個佛教當中就佔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人們對他們進行了像徵性的描繪，稱其為護法之輪。據信，在這一護法之輪裡，菩薩和佛陀不但以安祥的面貌出現，而且也有怒容滿面的時候，而這些怒相是專為管制那些不順從之輩的，因為對付他們非靠武力不行。在宇宙空間，護法之輪無所不在，處處在發揮作用，就像天使群一般，每一組都承擔各自所轄區域宣傳推廣從善之道的責任。

在保護神的幫助下，西藏傳播佛教的事業發展很快，洛桑晉美所在寺院的創建，標誌著這一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十二世紀末葉，多傑扎登促使一位著名喇嘛在拉薩西郊的曠野上修建了小小的乃窮廟，主供佩阿甲布。這樣，護法神的根據地，也就從桑耶寺專移到了西藏首都的郊區。二百年之後，也就是 1414 年，多傑扎登幫助修建了哲蚌寺，最終由達賴喇嘛出任法台。當五世達賴喇嘛於 1642 年獲取政權之後，他規定佩阿甲布為西藏政府的保護神。為了給這位保護神的曲均找到一個棲身之所，五世達賴喇嘛在原来的乃窮廟周圍修建了乃窮寺。此後，一些神聖器皿也從桑耶寺轉移到了乃窮寺，這座寺院也就訂為西藏國家級曲均的住錫寺院。

如果洛桑晉美在十週歲生日前後沒有受到一場怪病的突然襲擊的話，本來他作為乃窮寺的一名喇嘛所要經歷的學習階段是可以正常進行的。深更半夜，他總是匆匆起床，穿好長袍，夢遊走出臥室。第二年，洛桑晉美白天也開始出現精神不正常症狀。一會兒他與年輕喇嘛交談，一會兒又遙望天空，語無倫次。當發作過去之後，他又毫無印象，於此同時他的嚙語似乎又不無邏輯。他常常描述動物——特別是鷹、象、猴子。有一次，他提到了一個大寶座，是五人做的，他斷定，將來他就會成為那個寶座之主。

由於找不到洛桑晉美的病因，因此門孜康和藥王山的醫生無力醫治此病，不過他們的診斷還是十分清楚：這不是精神病，而是神靈附身於體內了。醫生們建議，洛桑晉美去拉薩北面的彭波夏彭巴靈塔去朝佛，靈塔里供有大喇嘛夏彭格西的屍骨，這個靈塔在減輕神靈作魔於人方面負有盛名。洛桑晉美獲準休假半月，用來治病，他的上司警告他，乃窮寺寺規嚴格，必須按規定日期返寺。因此，洛桑晉美在夏彭巴的逗留十分緊張。為了完成獲取療效所必須的祈禱次數，他必須整天圍繞靈塔轉經，只有在吃飯時才歇一歇。他付出了很大努力，終於如期結束此行，但他的病情卻毫無好轉；他帶著疾病回到了寺院。兩年之後，也就是他十二歲那年，洛桑晉美再次出門朝佛——他去的是甘丹寺東面的一座靈塔。這次，他同樣按照要求轉完了規定的圈數，但仍然一無所獲。

洛桑晉美十四歲那年，他的病情急劇惡化，致使他再也無法參加乃窮寺天天舉行的佛事活動。他經常臥床不起，一陣一陣地發病，毫無知覺，不能動彈。這時，朋友們為他端來了飯菜，但他卻視而不見。他整夜夢遊，白天也同樣發病，產生幻覺，而且還常常發高燒。但是，儘管他身患疾病，但他仍然設法完成了背誦學業，通過了考試。

一天，洛桑晉美最要好的朋友、年輕喇嘛格桑領著他到乃窮寺的周圍作短距離散步。當他們來到寺院門前一棵熟悉的樹下時，兩位年輕喇嘛決定休息休息，平常他們都是在這棵樹下練習吹奏法號。他們躺在草地上，遙望天空，開始打起瞌睡來。突然，洛桑晉美失聲尖叫，一躍而起。他一頭伏在格桑的大腿上，並請求他將長袍蓋在自己身上，格桑問他出了什麼事，但開始時洛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接著，洛桑晉美懇求他朋友帶他離開這棵樹，並說他再也不想見到這棵樹了。格桑照看著洛桑晉美，洛桑晉美告訴他所發生的一切。當洛桑晉美正盯著樹梢時，頭頂上出現了兩條蠍子，體積有犛牛那麼大。它們的腳爪交織在一塊，似乎是在打鬧著玩。接著，在沒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它們突然鬆開，其中一條徑直落到洛桑晉美身上。這時他大聲尖叫起來，並埋頭伏在格桑的大腿上。

緊接著，洛桑晉美又高聲叫喊，說蠍子跑道他口中來了。狗也出現了，牠們口中也有蠍子。他胡言亂語越來越厲害，乃窮寺不得不再次批准他短期休息，開始，他來到母親家中。在家裡他整天臥床不起，呆滯地望著隔壁的房頂。他這樣觀望時，居然見到床口出現了大象，接著猴子也露面了。他母親以及家中其他人都不知道該怎樣照看他。他的病情發作令人難於接受，實際上家人也想讓他離開這個家，因為有他在，家裡的生意已經受到了影響。

洛桑晉美已經到了絕望的程度。見此，他母親就去找哲蚌寺曼扎倉的大喇嘛甲傑莫錯克仁波齊，向他討教。她問大喇嘛，是否可以對她兒子採取一種叫「查嘎」辦法，堵塞其精神通道，以免不受歡迎的神靈附身於他。莫錯克仁波齊打卦、占卦，

然後說無論如何不能採取那種辦法，他說如果採取那種辦法，這年輕小伙子就會完蛋。接著，大喇嘛叫她放心，與表面現象相反，她兒子的病情發作是吉祥徵兆。他說洛桑晉美具備「獲得成就之種子」，到時候大家就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位年輕喇嘛再也無法在家裡待下去了。在格桑的叔叔陪同下，洛桑晉美離開了家，騎馬行走了四十英里，於 1944 年 9 月來到了東面的甘丹寺。

甘丹寺位於海拔一萬四千英尺高的月牙形山脊上，周圍山峰林立，它是西藏最為壯觀的寺院之一，擁有好幾十個殿堂僧舍，四周一片美景。這些殿堂吸引著來自中亞各地的香客，善男信女來到這裡朝拜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鍍金靈塔。靈塔置於其中的一座栗色殿堂裡。洛桑晉美希望能夠人不知鬼不覺地待在桑林仁波齊家中。這位活佛年近四十，在一年一度的大法會慶祝活動期間，他常常租用洛桑晉美母親家中的一間房子。

儘管甘丹寺景色宜人，但僅僅一個星期之後，洛桑晉美的病情又開始惡化。這時他感到，他很像染上了自己親眼目睹過的降神作法。他現在的情況不同於過去那樣一陣陣地發生幻覺，而現在常常感到全身麻木、震顫，這一感覺滲透全身的每一個部位。他的呼吸時而短促，時而又恢復正常，無法自控，但還算好，這些症狀總是消退了。幾天之後，這些新的感覺根本就沒有消失。他開始天天體會到真正的降神作法了，輕則一天只有一次，但常常卻是上午多達兩次，下午甚至高達三次。此外，降神作法迅速變得十分嚴重，一旦發作，他就發狂似地大叫大喊，橫衝直撞。結束後十分鐘左右，他就感到疼痛異常，但卻對所發生的這一切毫無印象。正如洛桑晉美和他的朋友們很快所發現的那樣，此時只是微不足道的神靈依附於他身上，他正處於過渡階段，一位大神靈在有力地幫助他。「消除通道」的過程越來越強。開始，附身於洛桑晉美而起作用的是相對弱小的神靈，昏迷也就相應地輕一些。但進入第二個階段時，桑耶火焰七兄弟輪番附身於他，一個接一個。這七兄弟是力量最強的神靈，因此昏迷也就加劇。事後洛桑晉美感到如同大病一場，疼痛不堪忍受。

好像洛桑晉美的病情還不夠嚴重似的，困難又進一步朝他襲來。從桑林仁波齊家中傳出的吵鬧聲，激怒了甘丹寺的當權人物，他們通知照看洛桑晉美的那些人，這位乃窮寺的年輕喇嘛已經成了不受歡迎之輩。儘管小伙子病情嚴重，但他們仍堅持叫他返回乃窮寺。有三次他都試圖離開甘丹寺，但每當他走到甘丹寺的大門時，病情就突然發作，窒息、翻滾幾分鐘之後，他就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鑒此，陪同他的桑林仁波齊和格桑的叔叔不得不將這年輕人抬了回去。然而，受此折磨的不僅僅只是洛桑晉美一人。隨著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洛桑晉美的母親收到了一封信。她感到十分痛苦，決定再次求助於高級喇嘛。她朝甘丹寺出發時，希望能夠得到高級喇嘛的高見，然後再將她的兒子接回家。她只走到了拉薩南端的拉薩河邊。到這裡時，她剛剛準備步入牛皮船渡河去對岸時，突然發病。她一頭栽倒在河堤上，右臂、右腿和腹部鑽心地痛，不得不坐上擔架讓別人抬回家中。現在，為改變這位年輕喇嘛處境的種種努力似乎阻力很大，都行不通，其原因不久以後就真相大白了。

有一次，洛桑晉美嚴重昏迷時，附身於他的神靈說：「六月初四，當太陽爬上旺波里山時，確榮多傑扎登就會附身於你。」這句話桑林仁波齊和所有在場的人全都親耳聽見了。西藏的主要保護神要進入一位不知名的喇嘛體內的消息令人難以相信，然而第二天就是初四，旺波里山是該地最高峰，從洛桑晉美房間往外看，清晰可見。桑林仁波齊和正在甘丹寺的洛桑晉美的佛師，決定翌日清晨要守候在這年輕人的身邊。第二天早上他們進屋時，發現洛桑晉美黎明前就起了床，正在念經。他早已經是一副可憐相。接著，當晨曦透過窗戶，開始取代室內安祥的酥油燈光時，他們兩人都注意到地面上有一團黃、紅色線，這種線通常是用來捆香的。多少天來，每當洛桑晉美昏迷時，他們就燒香念經；這似乎是唯獨可以採取的補救措施。洛桑晉美的佛師一看到地上的線時，就從座位上彎腰將它拾起來，他是想保持室內清潔。當他將線拿在手中時，它突然變成了一條活生生的蠍子。他傻了眼，趕忙將它扔在地上，就在這時，本來靜悄悄地坐在自身床上的洛桑晉美突然蹦跳起來，又一次進入昏迷狀態，臉部和身體萎縮變小。與此同時，朝陽的萬道金光正好照耀在旺波里山那光禿禿的山嶺上。過了一會兒，洛桑晉美倒了下去，它的突然結束就如同它的發作一樣迅速。他們將洛桑晉美安放在床上之後，就開始尋找那條蠍子。雖然這只是一間小小的僧舍，但他們既找不到蠍子，也找不著那團線。

此後，桑林仁波齊開始將前後發生的這一系列事情串在一起。他敢斷定，洛桑晉美的確已被西藏的主要保護神看中，要起用他。有三個因素可以佐證這一結論。首先，事前已得到明確消息，知道附身於他的神靈是誰。雖然這也可能是哪位惡神在有意搗亂，但這次降神作法能量甚大，足以說明這位神靈是非常強悍的。其次，蠍子的出現是人們熟悉的多傑扎登的象徵。不過，第三個因素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即：那時，在任乃窮曲均是一位中年喇嘛，名叫洛桑朗傑，他中了風，人們認為他已好景不長。似乎很清楚，多傑扎登正在著手準備接班人。

不過真相是幾星期之後才大白的。7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念完經、吃完早飯之後，桑林仁波齊、洛桑晉美和他的佛師決定去甘丹寺的一些殿堂轉轉經。甘丹寺的正中是存放宗喀巴靈塔的殿堂，他的靈塔是西藏至聖珍品之一。靈塔位於一座殿內，殿內沿牆供放著一些銀質聖盒，裡面是歷代「甘丹赤巴」的屍骨。五個半世紀以來，甘丹赤巴作為「宗喀巴寶座之主」一直統治著格魯派。在聖盒中間支了一個蒙古包，它是宗喀巴死後中國皇帝順治送的禮品。宗喀巴的靈塔位於蒙古包後部，前面是一尊這位聖人的鍍金塑像，三英尺高。他們於十點鐘來到殿堂，進了蒙古包，這時靈塔前的上午念經活動早已結束。在整個轉經當中，洛桑晉美一直很平靜，他的兩位朋友誰也沒有密切注視他。然而，當他們從支撐蒙古包的紅漆核桃樹木柱旁走過，正開始在宗喀巴像前叩長頭時，洛桑晉美猛然發作。兩位朋友企圖控制住洛桑晉美，但反倒自己被掀倒在地。他們坐在地上驚異地觀看眼前的情景，這時神靈已附身於這位年輕人的全身，他在宗喀巴的靈塔前必恭必敬地跳起了獨特的多傑扎登舞。五分鐘後，降神作法即告結束，洛桑晉美撲通倒在地上，他們兩人趕忙將倒在地上的洛桑晉美拽到了大殿角落裡的一個小殿堂裡。

洛桑晉美恢復知覺後半小時，仍然感到十分惡心，不能動彈，頭部、雙肩以及胸部都疼痛異常。他最後的記憶就是他站在鍍金靈塔前，準備祈禱。接著，他開始感到像有幾千條蟲子在身上爬。他全身都在震動，感到刺痛，就在這時出現了更為難受的感覺，彷彿他的「肘部尺骨端」(3)被觸動了一樣，全身都有發麻感。他的呼吸逐漸加快，腦袋發沉，胸部急劇起伏，他感到全身充血，就像剛剛爬上了陡峭的小山頭。突然，殿堂開始從他視野中消失。身邊這兩位喇嘛的念經聲也變得愈來愈弱，所有這一切都在起作用，接著他感到雙眼發黑。儘管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些感覺不過就發生在一會兒之間，但他卻像度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無法忍受。在回宿舍的路上，桑林仁波齊告訴洛桑晉美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一致同意，此事必須嚴加保密，一位不知名的十幾歲喇嘛，豈能就憑幾位朋友所看到的一兩件事，就妄稱自名已被選中出任西藏國家級曲均的新「受禮」。

然而，多傑扎登降神作法的活動仍在繼續下去，洛桑晉美擔心會當眾降神作法，因此就閉門不出，他覺得自己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變得愈來愈強壯，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樣，如同「充滿熱血」的一匹馬。每當降神作法開始和結束時，他總是感到痛苦不堪。儘管降神作法不過只持續二至五分鐘，他忍不住要痛苦地盡力高聲大叫——這一點甘丹寺的當權人物不能容忍，雖然這件事本身特別蹊蹺。這位年輕喇嘛終於被迫離開甘丹寺，他既不能返回乃窮寺，又不能再回到母親家中。他的病情使他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通過朋友的幫助，他終於在甘丹寺東面的拉莫找到了一戶願意接受他的人家。由於洛桑晉美自己能夠獨立行動，所以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他離開了甘丹寺。他在拉莫待了一個半月，像以往一樣，他不僅遭受著新近染上的降神作法之苦，而且幻覺、病情發作和夢遊也沒完沒了地纏著他，他過去的六年時間就是讓這些東西耗費殆盡。

這時，洛桑晉美的母親接到了乃窮寺的通知，儘管信中也對他的病情表示難過，但卻要求洛桑晉美立即返回寺院，否則的話要懲罰他，將他開除，來信說，其他喇嘛都在為洛桑晉美長期缺席發牢騷，講怪話；雖然他的病情嚴重，但也不能破例，違反寺規，他母親作了答復，說她兒子長期患病，治療無望，即使將他開除，也毫無辦法；他仍回不了乃窮寺。見此，寺院官員放棄了強硬立場，企圖尋找折衷的解決辦法。他們通過洛桑晉美的母親通知他，暫時他還不會被開除出乃窮寺，但他必須早一點返回寺院。洛桑晉美心中有數，他作為乃窮寺喇嘛的生活已告結束，而又無處求助，他只好決定去一山洞當隱士，過與世隔絕的生活。這時，他剛剛十六歲。

桑林仁波齊知道這位年輕人的打算之後，主動伸手相助。桑林仁波齊提出領他去色拉寺山上的萊格佩洛珠山洞進行三個月的坐禪，希望通過誦經和進行一些淨化儀式，就可以驅除影響這位年輕人的消極因素。在格桑的叔叔陪同下，他們來到了這個山洞，開始了隱居坐禪生活。起初，由於他的病情使他陷入困境，情緒非常低落，以至於他幾乎無法按照桑林仁波齊的指導行事。雖然他設法完成了每天的背誦任務，但他的病情並無明顯好轉，接著，當他們的坐禪生活進入中間階段時，一天早上他一醒來，就感覺良好，這是多年來的第一次。第二天，他仍然感覺很好——以後天天如此。他的病症奇跡般地全然消失。這時來了位送信的，他帶來了令人吃驚的消息：乃窮曲均洛桑朗傑已經去世。曲均逝世那天，也就是洛桑晉美病情消失的同一天。此外，送信人還告訴洛桑晉美，是乃窮堪布乃窮仁波齊派他來的，要將洛桑晉美召回寺院。不是別人，竟然是當時的西藏攝政王、大扎仁波齊下令，叫洛桑晉美去羅布林卡。似乎就是這次消息一下就使洛桑晉美的命運全部改觀。

正如所有與洛桑晉美有交往的人們很快得知的那樣，乃窮曲均死後不久，攝政王通過嘎東曲均特向星加亨請教。攝政王問他在何處可以找到多傑扎登的新曲均；他得到的答復是，候選人是乃窮寺的一位喇嘛。嘎東曲均接著說，很可能出任乃窮新曲均的這位喇嘛還十分年輕——只有十五歲。他生於鐵馬年，名叫洛桑晉美。

當乃窮寺的上層人物得到這一消息時，既驚訝，又欣慰。好笑的是，縱觀乃窮寺的三百年歷史，共有十一位曲均，但無一人出自本寺喇嘛的行列，他們都是出自其他地方。為了證實洛桑晉美是乃窮曲均這一說法，攝政王進行了一系列嚴格的測試。這些測試包括將洛桑晉美的名字與其他六名候選人的名字——他們之所以被選為候選人，是因為他們作為曲均的名聲——都放在入重量分毫不差的糌粑麵團裡。這些麵團全盛在一隻珍貴的器皿裡，將它擺到西藏最聖神的三尊佛像前，據信最高當局的提問由有菩薩提供答案，方式是讓器皿中的一個麵團滾出來。大扎攝政王在器皿中放了七個麵團，而帶有洛桑晉美名字的麵團就滾出來三次。因此，乃窮仁波齊受命立即將這位年輕人帶到攝政王跟前來。

送信人到的第二天洛桑晉美就離開山洞下山。他抵達拉薩時，受到了乃窮仁波齊以及該寺一隊喇嘛代表的歡迎，在他們的陪同下，騎馬西行二英里，來到了夏宮。這支隊伍將自己的坐騎拴在夏宮大門兩側的大石獅附近。他們一入園內，就有人迎接他們，領著他們經過了兩邊都有參天樹木的林蔭小道，晚秋時節樹葉已是一片金黃。他們來到夏登拉康，這是攝政王會客的殿堂。洛桑晉美被帶進了一間裝飾華麗的會客室，他神色緊張地拿著一條哈達，向前走去，這是那一次會見他最後的印象。當他走到攝政王那高高的寶座前，並將哈達獻上時，多傑扎登立刻附身於他，就這樣通過直接現身說法，向攝政王證明眼前的洛桑晉美是真正的曲均，而不是假的。降神作法持續了五分鐘，在此期間，多傑扎登私下與攝政王交談了幾句。當降神作法結束時，洛桑晉美倒在地上，人們將他抬回乃窮寺。在乃窮寺，他單獨居住，同時還得接受一系列的測試，以便無可爭辯地證實是多傑扎登附身於他，而不是另一位力量強大，但地位不及多傑扎登的神靈。

完全徹底測試乃窮曲均的真實可靠性，幾個世紀以來這一直是西藏政府非常關心的事情。由於國家內政外交的主要政策都與乃窮曲均有關，因此產生漏洞的可能性總是存在，要麼惡神在作怪(接著就是通過另一曲均發表看法)，要麼是有關的曲均本人對降神作法有些印象。此外，還存在著發出錯誤預言的危險。為了防止出現後一種情況，曲均的降神昏迷程度受到了嚴密觀察，完全徹底，直到失去知覺這才是理想境界。出現這種理想境界的先決條件是，人身上的七萬二千條精神通道必須暢通無阻。根據密宗理論，人體內的知覺依賴的就是這七萬二千條精神通道。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降神作法才能迅速進行，在沒有波動和異常現象的情況下繼續。儘管洛桑晉美的降神作法說明他是純粹的「受禮」，但下一步的任務卻仍要分階段進行測試，這些測試是為了證實附身於他的是否真是多傑扎登。

開始，人們要在他身上尋找多傑扎登力大無窮的四個徵兆：曲均身體要膨脹二英寸，若無其事地穿上笨重的服裝，頭盔頂上的金鈴叮噠作響，隨著心跳加快，胸鏡要震動。這樣，人們才算看到了附身於他的神靈的特性。多傑扎登的宗教舞步也是他獨有的，正如他那兇猛高傲的態度只有在達賴喇嘛面前、在他的像前和他的服裝前才會變成謙恭的姿態。其他時候，這位神靈之大臣總是要求面前的所有人士對他卑躬屈膝。由於這些因素，因此要進行三種類型的測試：表層測試、深層測試和秘密測試。在進行表層測試中，曲均正在降神作法時，人們將封好的盒子拿到他跟前，要求他說出盒子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人們認為，這種測試很容易，因為人們相信大部分神靈都具備某種形式的超人視力。接下來是深層測試，這時要求曲均一字不差地背誦保護神在過去特定日期所作出的預言。由於多傑扎登作過的預言成百上千，都有存檔，且全部用的是詩體，常常含義隱晦，所以如果不是保護神本人出席的話，這樣的考試近乎不可能通過。秘密測試由兩場考試組成，人們認為這些考試具有決定作用，在進行降神作法前，人們要檢查曲均的呼吸，以確信沒有異味；在降神作法過程中，還得再次檢查。如果附身於曲均的是多傑扎登的話，曲均的呼吸就會發出股股濃香。近似於酒精，但實際上人們將它描述成花蜜香味。當蓮花生將「五王」改造過來，他們派代表以八歲小僧人的模樣出現，表示皈依佛教時，蓮花生就在這小孩舌頭上撒下了幾滴花蜜。神靈一直將花蜜清香保存下來，作為其誓言已經得到履行的象徵。蓮花生獲得這八歲小孩的效忠時，還用他那燃燒著的金剛尖兒點了一下跪在地上的小孩頭部。當降神作法結束時，在曲均窒息之前，那頂塞得厚厚的頭盔給取下了，這時多傑扎登附身於曲均的證據表現在一個清晰可見的金剛印記上，這個印記顯現了幾分鐘。

1945年初，洛桑晉美成功地通過了所有的測試之後，他被公開宣布擔任西藏新的乃窮曲均。受職那天，他參加了乃窮寺一項極為複雜的儀式，爾後堪布領著他來到了曲均住宅，這是一棟設備完善的大房子，位於乃窮寺院內。在這裡，一些經過精心挑選的侍從照看他，而他則用大部分時間來練習瑜伽(4)，力求獲得能使他在降神作法時減輕不適的坐禪技巧。西藏政府歷來都付給乃窮曲均一筆優厚的薪金，而且曲均還極受敬重，地位與高級喇嘛相等。洛桑晉美最感欣慰的莫過於他又享受到了健康之樂，打十歲以來這還是第一次。

但是，乃窮曲均一職既不容易，也不一定使人稱心合意，它的前途光明無量，但也可能會落個很不光彩的下場。很多乃窮曲均就慘遭這後一命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曲均才交上前一種好運。乃窮寺的第一任曲均，是於十七世紀該寺創建時任命的。由於下等神靈附身於他，使他對外洩漏了政府的秘密情報，最終被處以極刑。儘管從此以後再未出現過如此嚴重情況，但洛桑晉美前三任曲均其中有兩人被解職，蒙受恥辱，因為他們的坐禪不斷惡化，以至於影響了他們降神的連貫性。不過，薩迦雅培是他們的前任，卻享有盛名，倍受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厚愛，因為他作出的預言極為清楚，所以他十分受寵，甚至超過了首席噶倫和噶廈成員。實際上，他外出時，坐的就是黃轎，通常這種黃轎只有達賴喇嘛和攝政王才能享用。由於洛桑晉美的前任洛桑朗傑認識到這一職務難度很大，所以當他在一次嘎東曲均的降神會上被選為新的乃窮曲均時，他居然逃之夭夭。不過，他並未能夠擺脫自己的命運，多傑扎登仍然附身於他，直到他逝世(有人將他的死歸於降神作法對心臟帶來的額外負擔)，他一直擔任乃窮曲均。

洛桑晉美對乃窮曲均一職反應積極，而且他還感到與多傑扎登個人關係甚厚。他得到公認擔任乃窮曲均之後的頭三年，同一奇怪事情反復發生。午夜過後，就可以聽到洛桑晉美房中一聲大響，驚醒了他和他的侍從。侍從們無法弄清響聲來自何方，只好求助於乃窮曲均。這時，曲均眼睜睜地望著房門，放聲大笑。過些時候之後，他同意講講別人能聽到但只有他才能看到的情景。幾十名不過二英尺高的小喇嘛來了，他們爭先恐後地擠進房門，接著有些小喇嘛則摔在地上。那些來到他床邊的小喇嘛大膽地凝視著洛桑晉美，然後像得了傳染病似的，爆發出陣陣笑聲。洛桑晉美認為，這很清楚，他們是多傑扎登的信徒，來這裡看望新的乃窮曲均，以示歡迎。幾小時之後，多傑扎登又附身於乃窮曲均體內。

每年只有二次，洛桑晉美才感到特別不適。每逢這時候，「五王」中的兩位就會與他們的大臣同來，短暫地附身於乃窮曲均和嘎東曲均，他們是多傑扎登和星加亨的王兄。對乃窮曲均來說，是「行動北王」群裡嘎布尾隨多傑扎登進入曲均體內。這兩次分別發生於一月初一和三月二十五。起初，多傑扎登附身於曲均，接著群裡嘎布出現在曲均「腹內」--這是比喻性的描述。如果不是多傑扎登的力量緩和了「白佩阿」--群裡嘎布常用此名--的力量，曲均會立刻喪命。很多東西僅僅在短短的一分鐘--有時只有幾秒鐘--的降神作法時間內就一清二楚。當群裡嘎布進入體內的那一剎那，由於多傑扎登的力量，已經膨脹了的曲均身體會變得僵硬，四肢伸直，鼻孔流血。在場的人們會立即給佩阿甲布獻上哈達，接著北王就會離去。當多傑扎登附身於曲均時，曲均的血會停止流動，身體復原，接著多傑扎登也揚長而去。

洛桑晉美受命當任乃窮曲均之後，他的責任對西藏變得越來越至關重要。當他出任新曲均時，達賴喇嘛年僅十歲，開始事情比較順利。正如達賴喇嘛所回憶的那樣，他與自己的保護神多傑扎登的關係密切無間。他說：「一方面，達賴喇嘛的責任和乃窮曲均的責任幾乎是一致的，只是各自的領域不同而已。但另一方面，達賴喇嘛如同司令員，而乃窮曲均則如中尉或下屬。因此，達賴喇嘛從來不向乃窮曲均鞠躬，而是由乃窮曲均向達賴喇嘛行禮。無論如何，作為朋友乃窮曲均與達賴喇嘛的關係十分親密。當我年幼無知時，這一親密關係令人感動。乃窮曲均非常喜歡我，他總是照顧我。比如說，當降神作法在進行時，如果我的服飾不整，乃窮曲均就會幫我理好襯衣、長袍等等。後來，當我進入少年時代時，噶廈與乃窮曲均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每當他降神作法時，別人如問及達賴喇嘛的命運，他總是情緒高昂，給予積極的答復；但每當他評論政府的政策及其所關心的問題時，他總是毫無把握，假設甚多，並要諷刺挖苦一番。」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也就是達賴喇嘛即將成年的前夕，攝政王政府貪污腐化成風，致使政府的保護神公開反對政府。有一次，衝突特別激烈，在某一問題上，由於噶廈意識到它與多傑扎登的關係靠不住，因此以嘎東曲均的名義請星加亨出面為噶廈向乃窮曲均說情，星加亨答應了噶廈的請求，但當他剛替噶廈提出要求之後，多傑扎登給他猛然一擊，這兩次降神作法立即宣告結束。達賴喇嘛接著說：「你看，同乃窮曲均打交道可不那麼容易，它需要時間，需要耐心。他十分生硬，就像舊時代的一位偉人。他不善言談，含蓄，十分含蓄。他對小事情毫不在乎，但對大事情卻非常感興趣。」

儘管國內形勢每況愈下，但多傑扎登仍沒有忽略警告人們：存在著來自中國的外來威脅，達賴喇嘛生動地描述了第一次警告時的情景。那是1945年。他說：「那次，當人們問及西藏前景時，乃窮曲均一言不發。但他卻面朝東方，上下搖晃自己的腦袋。這情景看上去令人害怕，因為如果他是一個凡夫俗子，那頭盔準會扭斷他的脖子。他至少上下搖晃了十五次，而且用力很猛，接著降神作法就結束了。」1945年，在西藏誰也沒有想到，三十年前被趕走的中國侵略軍居然很快重返西藏。1948年，也就是入侵前兩年，多傑扎登明確警告人們，鐵虎年--1950年，西藏將面臨滅頂之災。他指示要進行一項佛事活動，其中一個內容就是要在指定地點修建一座大佛塔。這樣做雖不能消除遭受征服的威脅，但可以相信，他是保護神努力的一部分，可以將入侵延緩好幾年，在這段時間裡，形勢也許會好轉，這樣當入侵來臨時，損失就會小得多。但是，當時追求私利盛行，對這一忠告和其他忠告，無人理睬。當入侵臨近時，多傑扎登反復暗示需要達賴喇嘛親政。最後

於 1950 年 11 月，星加亨堅持要達賴喇嘛接管政權，當時拉薩已首次獲悉受到進攻的消息，由於噶廈感到一籌莫展，敗局已定，不得不表示同意。

1952 年，洛桑晉美再次患病，病因不詳。這次他害的是關節炎，也許是由於反復多次的降神作法給身體壓力太大而造成的。不久以後，他的全部主要關節嚴重發炎，致使他無法行走，非得兩人攙扶不行。醫院的大夫也無法找到治療辦法。他再次陷入痛苦深淵，天天如此——僅僅當他降神作法時，才是例外。與此同時，多傑扎登要利用他，叫他下達一道重要指令。達賴喇嘛必須於 1956 年赴印度，初次與尼赫魯以及印度政府建立了關係，在後來，西藏難民的生死存望也就全靠尼赫魯和印度政府了。1958 年，也就是達賴喇嘛外逃的前一年，確榮預言：「在這沒有津樑的大江大河裡，作為天神的我卻有辦法備一條木船。」他的含意很清楚，達賴喇嘛必須在他的指引下，渡過中國士兵組成的這條難以通過的「河流」逃跑。

1959 年 3 月 20 日凌晨，洛桑謹美像其他市民一樣被中國人的砲彈聲驚醒。拉薩東面(5)二英里的色拉寺遭到襲擊，但西面四公里處的哲蚌寺卻安然無恙。3 月 20 日接近黃昏時，乃窮寺時而被流彈擊中，流彈來自人民解放軍羅布林卡軍營附近的戰場，距離乃窮寺一英里多一點。乃窮寺的當權人物擔心曲均的生命危險，因此建議曲均爬上坡，轉移到哲蚌寺，在那裡也就不會像這裡那樣孤單了。這些喇嘛在念經時，洛桑晉美在一位喇嘛的陪同下，來到了主殿裡的哈雅格日旺像前。哈雅格日旺是蓮花生化身之一，呈怒相，就是他征服了佩阿甲布。從此以後，乃窮曲均都得利用蓮花生的這一化身，在保護神附身於他之前，通過將自己看作是保護神，來召喚保護神。他們將兩個糌粑麵團放入一個神聖器皿中，一個麵團上寫著去哲蚌寺，另一個寫著待在乃窮寺。他們舉行了一項得體的儀式，守候旁觀，結果寫著去哲蚌寺的那個麵團滾了出來。當天晚上，乃窮曲均在侍者的攙扶下，趁著夜色朝山坡上的哲蚌寺走去。通常這段路只要走半個小時，但這次卻幾乎走了一個半小時，因為人民解放軍時不時地向空中發射照明彈，迫使他們這一夥人躺在大岩石後面。不過，沿途還算順利。翌日早晨，洛桑晉美醒來時，發現哲蚌寺一片忙亂。向人們發放了步槍、迫擊炮和彈藥，拉薩附近的大寺廟也分到了武器彈藥，這些都來自布達拉宮軍火庫。人們猜測，中國人的坦克隨時都可能開過來；向哲蚌寺轟擊。哲蚌寺被大砲以及輕武器火力封鎖，斷絕了與拉薩的聯繫。哲蚌寺堪布請求洛桑晉美降神作法，這樣他們就可以向多傑扎登請教，應該採取什麼辦法才為上策。洛桑晉美進行了降神作法，堪布們說。由於色拉寺已遭炮擊，他們擔心哲蚌寺也會遭此厄運。多傑扎登回答說，如果不去惹怒中國人，他們絕不會朝哲蚌寺發一槍一彈。他指出，不論他們採取什麼對策，戰鬥三天之內就會全部結束。(兩句預言均準確無誤：3 月 23 日凌晨，起義遭到鎮壓，哲蚌寺秋毫無犯。)

降神作法結束之前，乃窮曲均的高級侍從走上前來，問多傑扎登乃窮曲均本人該怎麼辦。多傑扎登答道，洛桑晉美降神作法完全恢復過來之後，他必須立即離開哲蚌寺，朝南逃奔。他必須順著達賴喇嘛的路線出逃。保護神擔保不會發生任何麻煩，然後他用一條白色哈達包了一把聖化了的青稞，交給侍從，並指示他們，什麼時候遇到困難，燒一粒青稞即可，以消災除難。他說，無論當時他們想到了什麼主意，他們都必須立即行動起來。

當洛桑晉美恢復知覺時，自己正躺在床上，他抬眼看了看，見到一些喇嘛正在圍著他抽泣。他問哲蚌寺是否遭到了炮擊，如果真是這樣，是否有人受傷。他們回答不是。他接著又問：「那你們為什麼都在哭呢？」高級侍從復述了多傑扎登講過的話，說：「這是確榮的忠告，但我們又怎能照此執行呢？因為你現在身體有病。在 1956 年慶祝佛祖誕辰活動期間，你在印度境內乘車，還吃了不少苦頭。現在我們不得不步行、騎馬要持續好幾個星期。我們又怎樣解決這一難題呢？」洛桑晉美未作答復，大家一言不發，默默地思考著多傑扎登的另一句話：達賴喇嘛從羅布林卡出逃這一令人吃驚的消息——當時，中國人和西藏人都不知道，直到下星期他們才得知這一消息。

洛桑晉美於同一天逃跑。他度過了苦不堪言的兩個月，從哲蚌寺出發，路經山南戰鬥最激烈的地區，來到了印度。他多次死裡逃生，險遭人民解放軍抓獲，人民解放軍總是被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耽誤了。他安全抵達東北邊境特區，然後穿過米薩瑪裡，來到穆索里，去看望住在臨時住所伯拉別墅裡的達賴喇嘛。從此以後，在流亡生活中他與嘎東曲均一道，重新履行其作為曲均的職責。

在乃窮寺的一百一十五名喇嘛中，其中六人設法逃離了西藏。1962 年，乃窮寺堪布乃窮仁波齊也逃了出來，隨身攜帶了保護神最珍貴的器皿，十三個世紀以前，這一珍品原存於桑耶寺。幾年之後，益西丹增醫生治好了洛桑晉美的關節炎，解除了他不能動彈之苦。1983 年，乃窮寺的兩位重要人物積極工作，新招收了幾十名年輕喇嘛，修建了一座新寺院。這座寺院與崗慶吉雄(流亡藏政府所在地)的西藏文獻檔案館相鄰。在這座寺院裡，召喚多傑扎登的佛事活動又開始天天進行，

所需出席的喇嘛一個不缺——這些喇嘛認為，難民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流亡生活中所取得的許多進展，應當歸功於保護神的不斷指導。

譯注

- (1) 北美印第安人。
- (2) 作者此處指的是格西學位。
- (3) 尺骨神經在此接近表面，受觸時發麻。
- (4) 古印度哲學一派，帶有神秘主義成份。
- (5) 原文如此，應為北面。

第四部分

第九章 奴役的西藏

1959年—1965年

在此，特公布以下命令：

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數噶倫以及上層反動集團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狼狽為姦，聚集匪徒，進行叛亂，掠奪百姓，脅迫達賴喇嘛，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3月19日晚，他們指揮地方藏軍和叛亂分子，對拉薩的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發起了全面進攻。這是背叛祖國的行為，它破壞了國家的統一，為國法所不允。為了捍衛祖國的統一和全民的團結，特決定從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1959年3月28日

拉薩起義⁽¹⁾爆發之後，北京立即採取了行動。在轟炸羅布林卡之前，於3月20日命令實行軍管。3月23日，也就是叛亂被鎮壓的第二天，成立了拉薩軍事管制委員會，除班禪喇嘛管轄的日喀則之外，其他地區也相繼成立了軍管會，但這些地區卻一直十分平靜。五天之後的3月28日，西藏政府遭到解散，西藏被武力所征服，再也不是一個被佔領的，但卻仍然享有自治權的國家了。

拉薩城中屍體遍布街頭，三天的戰鬥幾乎使一萬人喪生。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報導，四千名「叛軍」被俘，還繳獲了輕武器八千件（史密斯、韋森 38 槍、科爾特 45 自動手槍、斯坦步槍和恩菲爾德·莫塞槍），輕重機槍八十一挺、迫擊炮二十七

門、大砲六門以及彈藥一千萬發。此外，人民解放軍為了確保其對局勢的控制，下午七點就實行戒嚴，沒收所有武器，小至四英寸長的菜刀。對城裡的男性公民幾乎無一例外地予以逮捕，致使好幾十棟房子和廟堂裡塞滿了這些人。位於城中的郎子廈和布宮腳下的蠍子洞這座監獄裡原來的囚犯，讓位於被抓獲的拉薩市民。小昭寺被炸後起火，現在仍煙火未消，但它卻被用作數百名喇嘛的集合點；接著大昭寺也遭此命運。在這裡匯集的喇嘛人數近一千名，他們分別來自拉薩附近的二十八所寺院。拉薩城郊的羅布林卡里拘留了八千人，拉薩的三大寺院色拉、哲蚌和甘丹被中國軍隊重重包圍。三大寺喇嘛總數為二萬人，剩餘的喇嘛全被趕到了各自的措欽大殿，並有重兵看守。

屍體的處理可是件難事。傷員無人照管，任其死去。同時人們將數千具屍體集攏成堆，在夏宮的楊柳樹下燒了三天。由於西藏燃料奇缺，因此只好中止焚屍，改成挖坑，實行群葬。但屍體腐爛，惡臭迫使中國人不得不又將屍體刨出來燒掉。與此同時，在滿目傷痕的羅布林卡園內，還有一堆堆被繳獲來的武器的情況下，就有一些部隊帶著特別指示，著手清理羅布林卡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準備運往中國。

由於達賴喇嘛逃跑了，因此中國人轉向班禪喇嘛，以便吹噓同西藏方面的配合與協作，給自己臉上塗脂抹粉。無論班禪本人對當時的局勢有何看法，但這位二十二歲的活佛，的確於3月29日簽署了一份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電報，支持他們解散西藏政府的決定。4月5日下午，班禪喇嘛在重兵護衛下抵達拉薩，出任新近任命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一職。為了給人一種拉薩一切正常的印象，中國人暫時準許拉薩市民走上街頭，燒松樹枝、叩長頭。歡迎班禪喇嘛。班禪喇嘛夾在左右兩側的中國將軍中間，手中握著一束鮮花，走進了自己的新住宅，它位於布達拉宮下方的休池林卡。翌日晚上，軍隊也獻給了他一束鮮花。第七天晚上，班禪喇嘛進城，先後去大昭寺和小昭寺祈禱。4月8日，西藏軍區的二萬名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列隊南進，前往山南圍剿遊擊隊。他們呈四路縱隊，步槍上了刺刀，沿著達賴喇嘛三個星期前逃出拉薩的線路，在拉薩河畔闊步前進，殺氣騰騰。第二天，在中國和西藏幹部的一片雷鳴般的掌聲中，班禪喇嘛走上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席台，在「新」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全會上，十八名成員被指控為「叛亂分子」而予以撤銷，並增添了六個部門——首先是公安廳。譚冠三將軍以及其他八人受命進入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常務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改組之後，西藏的大多數高級官員，從拉薩北面的當雄機場乘飛機前往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前拉薩人民曾擔心達賴喇嘛會參加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而遭到綁架。

這些會議代表走了以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並沒有虛度光陰。改組後的籌委會受控於下述兩個機構：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和西藏軍區。統治西藏的三位將軍出任這兩個機構的首長：張經武為西藏工委第一書記，張國華將軍為西藏軍區司令員兼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副主任，譚冠三將軍任西藏軍區政治委員。他們管轄的區域只限於內藏(2)——西至阿里，東到昌都，北起那曲，南抵喜馬拉雅山脈。佔西藏領土三分之二的康區和安多地區的大部分，也就這樣從西藏這個國家割去了。康區和安多的這些地區分別併入四川、雲南、甘肅(共成立了十一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以及青海省的全境(即舊時的安多)，這些地區再也不是西藏的疆域了。此後，中國公佈統計數字時，西藏的人口就在一百三十萬至一百八十萬之間，這樣西藏這一國家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新西藏進行了行政區劃工作，全區共分為七個地區，共七十二縣一市，即拉薩市。通過「加強」後的政府機構對人口進行控制，這是中國最為關注之事。為達此目的，首先公佈了「三清」(清反、清武器、清隱藏在人民當中的敵人)政策，後來這些政策似乎沒完沒了，就是這些政策統治西藏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三清」政策由「平叛委員會」或辦公室(這些平叛機構直至1962年才解散)執行。在「三清」運動當中，每個地區的城堡或大寺院成了臨時監獄，裡面塞滿了十五歲至五十歲的男子。在西藏第四大城江孜，首先起用郵政局關人，接著是江孜寺(3)，共關押了四百名僧俗民眾，全是五花大綁，腳鐐手銬，其中包括該寺曲均。中國人讓曲均身著降神作法用的服裝，一邊折磨他，一邊還逼著他降神作法，不然就不放過他。在西藏的第二大城日喀則，城內的那座糧倉變成了臨時監獄，關押在內的犯人被迫在周圍築起了高高的圍牆，這座糧倉也就派上了新的用場。未經許可，嚴禁成立任何組織活動，全區各級都成立了工委，指揮百姓。拉薩分為三個區域——南部、東部和北部，對於出身不好的人來往各區之間要嚴加控制；因此有些人的家庭成員，雖然相距不過一英里之遙，卻長達二十年斷了音信，不知對方是死是活。接著，拉薩市城關區分成了三個辦事處，約二百四十個居民小組，大約每十人就配有一個協調工作人員。形成了這樣的網絡之後，控制網也就伸向了每一個角落，無人遺漏。4月15日，組織機構設置方面的基本工作已告完成，因而在布達拉宮腳下的廣場上召開了二萬人(全部的監外人士)的大會，婦女、兒童、喇嘛全參加了。這些拉薩人有的扛著大紅旗，有的手拿三角旗，上面有漢語寫的馬克思主義的標語口號。正如中國新聞界所報導的那樣，這些拉薩人「要求鎮壓叛亂」，而且還「滿懷激情地歡呼」他們未來的「新計劃」的公佈。不過，當時這些計劃正在北京製定。雖然毛澤東於1957年擔保要推速「民主改革」的實施，但北京現在卻認為這

場叛亂致使它將全部保證拋在腦後，其中也包括「十七條協議」。不過，中國的目標依然如故：將西藏作為中國的五個自治區當中的最後一個，納入自己的版圖。在實行統一之前，必須對西藏社會來一次大的變革。1956年，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劃分的觀點，西藏被認為只處於第三階段——是「封建」社會，高於「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民主改革」（將私有製經濟變為公有製經濟，並消滅操縱私有製的剝削階段）就是為了使這個國家超越資本主義這一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接著，還得進行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內容是進行公社化，這樣也就能實現徹底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一最終目標。

這也是中國本土的模式。不過，究竟如何實施這一計劃，倒是黨內爭論不休的問題。多少年來，兩條「路線」或曰兩個陣營互相競爭，竭立想使自己的理論佔居上風。這兩條路線即：右翼或溫和派，以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為首，他們主張進化的觀點；另一派是左翼或激進派，以毛澤東為首，他們主張大步前進。在制定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方面」，溫和派企圖將少數民族與他們的「漢族老大哥」揉為一體；而激進派堅持民族主義最終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產物，因此必須對其採取強制手段予以消滅。結果中國對其五十四個少數民族的政策就時而溫和，時而嚴酷，問題是看哪一派在台上掌權。1959年，也就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所帶來的經濟災難之後，溫和派再次抬頭，如同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十年的大部分時候那樣，他們一直居主導地位。因此，以黨的觀點來衡量，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對於西藏民主改革的進程所提出的建議相當溫和。

6月下旬回到拉薩之後，班禪喇嘛與中國的那幾位將軍一道用了二十天時間，將民主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叫「三反兩減」，第二個階段即土地改革。兩個階段均計劃於1961年年底以前完成。「三反」（第一項內容也就是最初於三月份進行的「三清」）即反叛亂、反烏拉差役、反奴役；「兩減」即減租、減息。農民要向領主付出勞役以使用土地的「烏拉」（稅收）遭到廢止。而且，家庭僱傭僕人的作法也予以消除，中國人稱之為奴隸。

「兩減」直接危及了領主的切身利益。根據「兩減」中的「誰種誰收」政策，那些被認為參加叛亂的三大領主（政府、寺院、貴族）的財產，以及農作物全部分給了耕種土地的農民。對於沒有參加叛亂的領主，實行「二八」減租，即百分之八十的農作物分給農民，百分之二十留給自己；這樣做也有效地剝削了高於社會最低層人們的各階層權益。其次是減息，主要是指借款而言；僱農於1958年以前向地主借款項一筆勾銷，而1959年借的款項的利率一律減至每月百分之一。在各界人民參加的大會上，點起了一堆堆大火，借款卷——通常還有大莊園、商人和寺院的所有其他文據——全都付之一炬。人民解放軍小分隊站立一旁，藏人圍著火堆，熱烈鼓掌，高呼口號，譴責「舊社會的黑暗制度」——慶祝傳統的藏歷新年，這倒是一種新方式。通常人們用樹枝點上一堆堆火，香煙繚繞飄向空中，同時人們口中念念有詞，祈禱人人走運，個個平安。

進行民主改革的基礎是劃定成份。然而，共產黨統治下階級劃分遠比舊社會的階級劃分要嚴要細。如果人們扣除了每年的支出之後，仍有百分之五十的剩餘，這些人也就是農奴主；剩餘百分之四十五的為農奴主代理人；剩餘百分之三十五的為富農或富牧。剩餘百分之二十五的為中農或中牧；沒有剩餘的為貧農或貧牧。最後一種成分是反革命，它可以是上述任何一個階層的人；現在，它尤指參加叛亂的人們。根據中國人的統計，屬於反革命的只佔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國人公開宣布這些人是「人民的敵人」，必須受到公開打擊，他們無權享受新社會的任何好處。實際上，從此以後那些定為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富農或富牧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女親屬就一直受到流放，只有中農、中牧和貧農、貧牧才過得去。西藏與中國不同，雖然西藏的大多數也被土地所束縛，因為稅收不得不死守莊園，但他們的生活水平卻在貧困線上；實際上貧窮「大眾」（這是共產黨下的定義）只佔少數。無論這些描述藏人生活的新詞彙開始時顯得多麼深奧難懂，但藏人對上述的矛盾之處十分清楚。成份劃分的目標，在民主改革的第二階段得到了進一步的落實，中國人試圖再次將上層階級的財產分給下層階級。

拉薩也如同其他地區一樣，財產的再分配由「平叛委員會」負責執行。人民解放軍小分隊定期前往在押「叛亂分子」的家庭察看，無一遺漏。叛匪家屬要麼被趕出家門，要麼就被趕到一樓，同家裡的牲畜住在一起，因為他們無親友可投靠。接著對他們的全部財產進行清理造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存放在空房間裡。最後，房屋正門貼上了長長的封條，上面寫著黑體漢字，告誡人們行動起來鎮壓叛亂。貼了封條幾天之後，這些當兵的開著大卡車又會折回這些地方，沒收主人的財產。全部東西都帶走：家具、卡墊、廚房用具，甚至儲藏的糧食也不能幸免。財產被分成若干類：最為貴重的物品，如珠寶、金銀器、供碗、珍貴佛像全部作了送往中國的標記，並已包裝好且上了封臘；上等家具和卡墊則準備給在藏工作的主要漢族軍政要員使用，手錶以及貴重衣服之類的東西則計劃交給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商業廳，由它將這些東西賣給中國的機

關幹部。此後，高音喇叭發出通知，叫貧苦人家去居委會辦公室，領取那些曾經剝削過他們的那些人的財物。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破舊桌椅、空木箱、舊衣服，偶爾還有一隻茶壺。

在農村，財產的分配也是相似的原則進行的，只是這些財產貼上了「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標籤而已。生產資料包括全部家畜——犛牛、扁牛(pian)（即犛牛和黃牛雜交生的牛）、騾子、羊、馬——藏幣(儘管已經禁止藏幣流通)和農具。但是，大部分家畜——以及其他值錢的東西——全部讓中國人拿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舊衣服、舊家具、陶製品和鋁製品，與城市貧民領到的東西一樣。同時，真正的掠奪也在開始進行，車隊啟程開往中國，裡面裝得是從寺院以及布達拉宮的達賴喇嘛私人倉庫裡搶走的財寶。這些寺院和達賴喇嘛的私人倉庫是西藏真正的寶庫。這些財寶數量之大，以至於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這一過程才算結束。一方面西藏無價手工藝品充斥香港和東京的古董市場；另一方面在中國境內，金銀佛像(這是一千年以來積累起來的藝術珍品)卻被塞進了爐膛，轉眼成了金錠銀錠。

民主改革第二階段的中心內容是土地改革。下層階級的人均分配土地為三點五畝（約半公頃 1），甚至對「那些原來的土地所有奴隸主」也是這樣。到 1959 年秋季時，拉薩附近地區已經開始土改。一旦將那些與叛亂有關的人員的土地充公之後，對三大領主宣布了一項「贖買」政策，那些沒有支持叛亂分子的領主也「過關」了。這也就正如前噶倫——現在中國的主要合作人阿沛·阿旺晉美——在一次講話中所總結的那樣：「反對帝國主義，熱愛國家，接受民主改革的奴隸主及其代理人將受到保護……政治上對他們已經作出了妥善安排，生活上也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給予照顧」。「實際情況」指的是，那些以前的年利潤超過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農奴主，在第一階段的民主改革中，他們已經喪失了其財產的百分之八十，而現在剩餘部分也無法保住。對他們的土地和商品按照市場實際價格的百分之十估價，然後收歸公有，只給了他們擔保——最後還得給付錢的收據。人民解放軍再次對這部分人的財產進行了大量的登記工作。凡是那些解放軍沒有去的地方，就要求人們自己去當地工委逐項申報自己的財產，爾後予以沒收。

1960 年 11 月，土改全面完成，印製了二萬張土地所有證，大部分上面寫的是漢字，上面還印了一幅兩側都有紅旗的毛主席肖像。在大規模的儀式上向農民階級以及地位不及他們的那些人(常常是些年老傷殘的乞丐，這些人對農業一竅不通，且無意從事農業)發了土地所有證。幾個月以前，阿沛·阿旺晉美在北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總結民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時，說：「廣大農牧民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他們說：『噶廈(政府)的陽光獨獨照耀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但共產黨和毛主席卻將陽光照耀在我們窮苦人民身上。』他們滿懷熱情高唱讚歌：『毛主席是祖國各族人民的父親，他比父母還要親。』他們說：『上層反動分子儘管與我們同說一種語言，但他們的心與我們全然不同；漢族幹部的語言儘管與我們的不同，但他們的心卻與我們的一樣。』」

階級鬥爭是建設未來新社會的基石。階級鬥爭的烈火破舊立新，其燃料就是鬥爭會。通過開鬥爭會，「廣大群眾」也就是自己在幹革命，也就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實際上，這也就是要工人與雇主對著幹，農民與地主對著幹，喇嘛與堪布對著幹，學生與老師對著幹，孩子與父母對著幹。對於那些社會上的當權人物，人們也就自然接受了，他們的任命並不是根據功過大小，而是通過其同類人物的支持，謀取了自己的職位，唯獨的目的就是要壓迫百姓。儘管北京的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一再告誡人們要尊重少數民族，增進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團結，但西藏民族工作方面的情況仍十分嚴酷，中國佔領軍死死抱住「藏人蠻子」這一千年不變的觀點不放。作為共產黨人，他們還引用理論觀點以證實這樣的種族歧視是正確的，他們將西藏政府說成是「黑暗、封建、殘酷」的政府，喇嘛是「披著紅袍的強盜」或吮吸人民血汗的「寄生蟲」。但是，中國人對這些「人民」本身也感到不屑交往：他們又髒又黑，一股臭酥油味，行為舉止放肆，無異於野蠻，不是塑造堅定的、有高度自覺性的廣大無產階級的材料。所有這些助長了開鬥爭會的決心，同時，由於漢人擺出一幅屈尊降格的姿態，更使藏人對鬥爭會產生反感。每次鬥爭會，甚至每次流血事件之前，漢人總是要一本正經地聲稱，這樣做完全是最大限度地為了被鬥人的利益。

到 1959 年年 7 月底時，鬥爭會已經在拉薩大力鋪開。在每天舉行的「政治教育」會議上，定期召開鬥爭會，這些政治學習會議都是由居民小組召開的，每個居民小組管轄一兩百人。這些會議那麼轟轟烈烈，在被棄置了的寺院里和大戶人家的院子裡召開，它們僅僅是在講台上作宣傳，旨在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一開場通常是這樣的提問：「什麼是壓迫和欺騙？」正確的答復是：「舊社會」。

1959 年再教育的大部分內容集中於達賴喇嘛。中國人在西藏對藏人宣布，達賴喇嘛被反革命分子綁架，中國人對外界宣布的調子也一模一樣。由於對外界消息一無所知，因此各種謠傳層出不窮。有人說達賴喇嘛在森林中躲藏了十天，然後被

人民解放軍抓獲，將他從劫持者手中救了出來。在日喀則有消息公佈說，儘管達賴喇嘛的確遭到綁架，被帶到了「尼赫魯的祖國」，但印度卻無力供養達賴喇嘛及其一行，因為印度有成百萬人掙扎在饑餓死亡線上。據說，尼赫魯為這位西藏領袖在一艘輪船上安排了工作，但他掙的錢連自己糊口都不夠。結果，中國駐加爾各達的總領事館供養了他二十一天，接著讓他坐飛機到了北京，現在達賴喇嘛與毛澤東和班禪喇嘛住在一起，「他們同吃一鍋飯，享受同地位。」

目前正在作出安排，讓達賴喇嘛繼續留在北京，而毛澤東將親自到西藏來，取代達賴喇嘛。最後，中國人告誡人們，任何企圖逃往印度的想法只會落個徒勞無意的下場，就如同那些已經跑到印度的人一樣，他們不僅在忍饑挨餓，而且不久以後尼赫魯也會將他們送回西藏。

雖然鬥爭會怪不可言，但卻組織得十分嚴密，就像一齣集體耶穌受難劇。開鬥爭會時，人們坐在地上，正對著坐在前面的中國官員，他們前面擺了桌子。身份較高的中國官員主持會議作開場白。他在開場白中要告訴人們，鬥爭會並不是一兩次就完事，而是一直要開到被鬥人坦白悔過——直到被鬥人「在革命兄弟的幫助下」，徹底清楚了他中的反動思想為止。此外，鬥爭會還為了教育農奴站起來，不要害怕奴隸主，要揭發他們的虐待行為。像演習一樣，到時就會有人憤怒地揮手高喊：「將那些壞傢伙帶進來！」接著犯人被帶到人群前，被迫來一個大鞠躬，手掌到了膝部，眼睛正對地面。有人宣讀批判書，上面列舉了條條罪狀，正式的結束語是：「這些就是這個傢伙犯下的罪行。現在是人民幫助他承認罪過，並決定他該受何處罰的時候了。」這個信號一經發出，第一個發言控訴的人就會一躍而起，衝上前去，通常這都是中國人僱傭的「積極分子」。他開始譴責「剝削者」，高聲叫罵「宰了這條臭狗！活剝他的皮！你媽媽的P！你爹的心肝！坦白交待你的罪行！」他控訴了自己所受的苦難之後，與會人就會動手打被鬥人，而如果是起義者在挨鬥，士兵們就會用槍托揍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經常是與會者就對被鬥人處於極刑，而不是徵求意見，尋求最好的解決辦法。活埋，用毯子裹人然後付之一炬，將人吊在樹上，下面再點把火，活活將人燒死，絞刑，砍頭，開膛，淋開水，嚴刑拷打，活活肢解，讓人群用亂石將人打死，強迫小孩槍殺父母——所有這些辦法（合作人所提建議）都拿出來了，接著就付諸實行。這些情況就如同國際法官委員會所接到的一個又一個報告一樣，僅僅在起義遭到鎮壓之後的一年時間內，死於鬥爭會的藏人就高達數千。更多的人四肢受到傷殘，牙齒掉了若干顆，聽力或視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

全藏鬥爭會的基本模式就是如此，每每開鬥爭會總是三種形式取其中之一：小規模的、中規模的和大规模的。小型鬥爭會常常是自發性的，如果人們在照例舉行再教育會議時，有人答錯了一個問題，就可以開鬥爭會——這樣，當事人還得承認自己有舊思想，或者說自己的思想「不成熟」。中等規模鬥爭會對像是一個人，在大的居委會或幾個村莊的大會上要接連鬥爭他幾個星期。大型鬥爭會是正式公審的前奏。在拉薩，第一次召開大型鬥爭會是在1959年7月26日，也就是宣布實行民主改革九天之後。在入侵前夕將康區防務的指揮權交給阿沛之前，拉魯·次旺多吉是負責康區防務的噶倫，他在叛亂中被俘，被指控為叛亂的主要策劃人之一——當然他確是的。他被關押在西藏軍區院內的秘密監獄，遭到審問拷打，中國人將他作為舊時腐敗的主要例證，將他拉到拉薩街頭遊行示眾，在大片大片的人群前遭受皮肉之苦。最後又將他押回監獄，留他一條生命是為了將來為宣傳運動服務。不過，地位不及拉魯·次旺多吉的人境遇就更慘。比如有一位名叫嘎尼西·阿尼拉的尼姑，年已六十，10月21日她被拉到八廓街遊行，人民解放軍命令旁觀者揍她。結果無人動手，這時受僱的地方「積極分子」衝上去當場給她痛打一頓。根據目擊者說，十天之後她因為受傷多處而一命嗚呼。在大昭寺的正門前，密宗喇嘛在槍口的威逼下，被迫違背終生禁慾的誓言，不得不當眾與尼姑發生關係。(原文如此——編者)

到1959年10月時，全體藏民無不擔驚受怕；鬥爭會不但是藏人見了中國人就膽寒，而且還在藏人當中形成了一股互不信任的氣氛，這也是鬥爭會預期的目的。老朋友再也不能互吐衷腸，父親在自己的孩子麵前也不敢說老實話。在寺院，這種互不信任的氣氛更是令人難熬。

喇嘛是西藏社會結成一體、最有威脅性的社會集團，而中國人卻偏偏拿著他們大肆開刀。人民解放軍洗劫寺院，在牆上畫漫畫，醜化寺院僧侶。其中最出名的一副漫畫叫「兩面三刀的喇嘛」，畫面上有一個兩副面孔、六隻手臂的喇嘛，以此來譏諷佛教中那些多手多臂的神靈。這個喇嘛一副面孔和三隻手臂溫柔慈善，作祈禱狀，給眾人摸頂祝福；而另一副面孔——這才是那副真正的面孔——卻怒容滿面，三隻手臂在忙著凌辱那些虔誠的懇求者。哲蚌寺原有喇嘛一萬人，而今只剩下約二千八百人。在這裡匆匆忙忙建立了一個昔日的暴行展覽館，共有四個房間。第一間陳列了繳獲的武器，武器中間是正在降神作法的乃窮曲均模擬像，旁邊的解釋詞說，乃窮曲均在煽動人們叛亂，將人們領向失敗的深淵。接著是「經濟剝削展覽室」，它將哲蚌寺描述成一部全面掠奪俗人百姓的龐大機器。展覽告訴人們，哲蚌寺是怎樣巧立名目，在它管轄的眾多莊園裡獲得稅收——狗稅、貓稅、雞稅、驢稅、花盆稅、紙煙稅和鼻煙稅。據稱，哲蚌寺的四分之一收入來自高利貸。

展覽室裡展出了一塊翹曲的木板，它是用來收取糧稅的，說明喇嘛是在怎樣欺騙百姓。據說，當債務人無法償還借債時，哲蚌寺有權將他收為自己的奴僕，使其為該寺服務二十五年。人們說哲蚌寺還常常經營鴉片業。該寺喇嘛在本寺莊園巡迴收稅時，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要侮辱婦女，大發獸性。據說，那些不願屈服於他們淫威的婦女就要遭鞭打，被流放，或折磨至死。販賣男孩的交易相當活躍。簡言之，正像一個喇嘛對一位叛亂之後獲準來拉薩的西方作者說的那樣：「哲蚌寺是人們無法逃避的人間地獄。」

對這些宣傳，中國自己相信的程度，從色拉寺的鬥爭會即可一目了然。由於中國人對佛教的各個方面缺乏了解，致使很多人受到懲罰的可能性無限增加，如密宗喇嘛就是如此。大多數密宗喇嘛都掌握了唱經技巧，同時能發出三種音調。鬥爭會上指責他們掌握的是「資產階級的音調」中國人將一些喇嘛和學者挑出來作為鬥爭會的對象，而且他們還採用恐嚇手段，但只能使為數不多的喇嘛屈服，讓他們也組織開鬥爭會。「鬥爭」對像一段時間並不只是一個，而且每天要將十個喇嘛拽到措慶大殿——其他時間則將他們關押在黑洞洞的房子裡，然後將他們五花大綁，塞上卡車拉走。同時，剩餘的幾千名喇嘛則被迫在寫有色拉寺的當權人物對本寺喇嘛犯下暴行的文字材料上簽字證明。十月下旬時，也就是叛亂遭到鎮壓之後的七個月，中國人決定了對該寺大多數喇嘛採取什麼對策。「最危險的」一百五十名喇嘛被送往以前是兵營的紮吉監獄，其他喇嘛，加上在羅布林卡以及拉薩河谷附近地區抓獲的俘虜，被送到了西藏境內的第一個勞改營——鈉金⁽⁵⁾，它位於拉薩河畔在拉薩城外東面幾英里處。

鈉金是一座大型水電站所在地，當時已經開始建立一段時間了——僱用了七個隊的藏族男女。中國人說鈉金電站是藏人引以為豪的「拉薩河上的一顆明珠」。叛亂之後，再無必要花錢僱用勞動力了。到 1959 年 5 月底時，一般犯人陸續抵達鈉金，人數高達三千七百人，而看守部隊則有五百人。截止 12 月底時，這裡的犯人數已達八千。犯人的工地及住處周圍，三面都有帶刺的鐵絲網，後面是拉薩河。他們住帳篷，每百人分成一組，運土石方建壩，挖附屬渠道，修涵洞，蓋配套建築。晚上將公佈每組的進展情況，那些沒有完成定額的小組，將在鬥爭會上挨批，並要處以額外的勞役。1960 年 4 月水電站第一台機組正式發電，第二台機組於 1962 年 10 月發電。難民們說，在水電站建設過程中，死於饑餓和勞累過度的人多達數百，當時中國各地都在鬧饑荒。一位 1960 年設法逃到印度的哲蚌寺喇嘛說，在扎吉監獄，撇開體力勞動不說，在 1960 年 11 月至 1961 年 6 月間，該監獄的一千七百名犯人就有一千四百人餓死。

繼鈉金之後，三個主要的勞改營分別是：北面遙遠的柴達木盆地的格爾木勞改營；羌塘即北部高原的查拉卡布⁽⁶⁾勞改營；東南部森林地帶的工布勞改營。工布勞改營主要從事伐木，它是最好的勞改營——氣候溫和，活不繁重。但是，格爾木和查拉卡布則一開始就是死人的墳墓。

西藏公安廳於 1964 年接管格爾木勞改營，在此之前就是關押安多地區的中國犯人和藏族犯人的地方。它體現了中國靠人海戰術搞起來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一條將西藏和大西北與中國本土連結起來的鐵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地吞併了新疆，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條將新疆與蘭州連成一線的鐵路。西藏境內的鐵路卻被認為是對付印度，防衛中國西南邊境線的關鍵；也是穩定西藏，最終開發西藏自然資源的關鍵。不過，這裡地處亞洲腹地，海拔一萬英尺，氣候寒冷，土地貧瘠，每年的大風季節常高達七十天，乾燥缺水，長冬持續六個月之久。這個地區的東端是一望無邊的青海湖，多少世紀以來，它一直是蒙古族部落宿營的理想場所，藏人則認為它是安多地區的北部邊界。

在羅布林卡抓獲的數千人，分批乘坐大卡車，朝東北行駛六百英里，先後於 1959 年 9 月和 10 月抵達格爾木。兩年之內，格爾木又來了成千上萬名犯人。雖然保住這些人的性命對共產黨人也有好處，但他們顯然卻無能為力。他們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仍然食不果腹，沒有任何醫療條件，身上的衣服也不足以抵禦格爾木的嚴寒，因此光是在頭幾年，就有大批犯人死亡。

與此同時，位於拉薩西北面的查拉卡布勞改營的犯人則在挖硼砂，這裡地處羌塘中部，是一座枯水湖。查拉卡布也像格爾木一樣，水每天要靠卡車運進來；這裡一片荒涼，甚至連用來壘燒飯的爐灶的石頭都找不到——只好用小小的鐵三腳架將壺支在上面。這裡的氣候簡直令人無法忍受。犯人用鐵鍬將湖床裡的硼砂鏟起來，這些硼砂土白、赤、藍、黃幾色相間。有時硼砂埋在地下約一米深，則需挖上同房子高度相仿的深洞。最初的五百名中國看守告訴犯人，一卡車硼砂比一卡車銀元還值錢。因此中國人逼迫犯人從黎明幹到日落，而給他們吃得是最糟糕的混雜著木屑的糝粉麵粉，致使數百名犯人死去。每逢星期天，就將犯人一組一組地打發出去，為時六個小時，讓他們去有草的地方，在那裡可以找到一些枝條。黃昏返回勞改營時，每組犯人都得帶回七磅半的柴草。這些時候是犯人外逃的唯一機會。有些人帶上為數不多的糧食，從遊民那裡

借來了一些衣物，取得了游牧民的幫助，就可以抵達西藏西南部，從這裡再逃往尼泊爾。犯人爭先恐後地逃跑一些之後，中國人倒暫時有所放寬，停止了鬥爭會，停止了夾雜鬥爭會的思想教育會議，這些會議晚上都要持續到午夜。不過當這一辦法並不奏效時，那些會議又告恢復，犯人每次外出撿柴火時，監視更為嚴密。然而對查拉卡布勞改營還存在另一種威脅，它來自「四水六崗」管轄下有組織的遊擊隊——1959年3月之後已經整整一年過去了，「四水六崗」仍在腹心地帶與中國人作戰。

拉薩叛亂遭到鎮壓已經很長時間了，但西藏仍有數百支遊擊隊在積極活動。由於遊擊隊與他們賴以生存的村莊隔絕開來了，因此大的戰鬥日益減少。雖然如此，但對解放軍車隊的伏擊仍時而有之。除山南之外，主要戰場是拉薩的北面，即安多南部與康區西北部和羌塘交界的地區。叛亂三年之後，大股遊擊隊被切斷了西藏中部的逃路。他們在這裡整整打了三年的遊擊戰爭。安多的一個由果洛人組成的游牧部落十分好鬥，他們的人數在十萬以上，特別頑固；他們的名稱意即「叛匪」——他們真一直是這樣，主要是反對拉薩的中央政府。早在1952年，他們就開始了激烈的遊擊戰爭，使得大批大批的中國人斃命。西藏中部爆發叛亂時，他們尚未被剿滅。雖然這些果洛人和另一些「野蠻人」，即康巴人，都面臨著給養有限的困難局面，但要在無路可尋的坎坷不平的野外抓獲他們絕非易事。一旦中國人發現了一支遊擊隊，他們就會帶著機槍、迫擊炮和大砲，在半夜或拂曉時發起進攻，接著的大屠殺可想而知，情景如同西藏境內所進行的所有戰鬥一樣，就像羅布林卡當時的場面。但儘管藏人大量傷亡，戰鬥卻仍然堅持下來了。1964年12月，也就是叛亂被鎮壓幾乎五年之後，張國華將軍公開說：「封建領主仍未消滅，他們不甘心失敗，企圖竭力捲土重來。」約一年之後，他在談到內部騷動時說：「人民只有通過堅決的鬥爭，尤其是武裝鬥爭，才可能徹底粉碎封建領主的反動統治。」

隱蔽的抵抗方式同樣在妨礙中國同化西藏。北京聲稱，民主改革和民主改革復查(第二次大批逮人的婉詞)基本於1961年年底完成，但事業並非如此。1961年4月2日，拉薩的廣播電台叫藏人放心，「民主改革」還得再進行五年時間，然後才真正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完成民主改革——以及實行文官統治所依靠的其他政策——的任務也就交給了一個非軍事的官僚機構，它由藏、漢族幹部組成。由於各種機構正在組建，因此民主改革常常是在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在槍口的威逼下強制進行的。但是，解放軍起初的主要任務是消滅剩餘的自由戰士隊伍，後來於1962年它的主要任務卻是參與對印的邊界戰爭。此外，民主改革就是要使全社會都平等，這還只是西藏自治區成立之前所必須採取的兩個步驟中的第一步。西藏全民的階級差別消除之後，還必須組織合作社。社會主義化的第一階段——開始於1959年中期，在拉薩附近組織互助組——對於穩定全區局勢至關重要。沒有互助組，高級階段的集體化——包括集中權力和為國家增產——就無法實現。這是一項耗費時間的工作，僅有組建徒有虛名的自治政府可以與其同日而語。組建徒有虛名的自治政府是中國政策的基本成分，旨在表明西藏已經獲得了政治解放。但是，雖然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於1961年8月就已正式討論了普選問題，但實際上選舉委員會於一年之後才成立，而選舉規定則又過了幾個月後才予以公佈。當實行這些規定時，貫徹落實又用了二年半以上的時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選舉階段最長的地區。

同時，一方面《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吹噓「世界屋脊上的社會主義天堂」，另一方面拉薩則陷在一大堆新名詞裡面，用它們去創造一個實際生活中無法實現的虛幻世界。拉薩市的街道起名為躍進路、解放路、勝利路、幸福路。實際上，沿八廓街環繞大昭寺的三百多家商店全部關門閉戶，市場上空無一人，甚至那些照料得最好的房子也顯露了衰敗的跡象——牆灰脫落、屋頂總是漏雨、朽木比比皆是——這樣下去，只需要幾年時間，拉薩城裡的藏民居住區就會成為一片貧民窟。城外的藥王山醫院在1959年3月的戰鬥中被炮火夷為平地，現在這裡騰空架起了無線電天線，修築了砲兵陣地。這裡已經成了重要的軍事設施，成了彈藥庫，下面有地道通至一英里之外的宇妥橋。在班禪喇嘛的堅決要求下，在1959年炮火中受到損壞的大昭寺、小昭寺、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的那些門面得到了修復。同時根據中國人的需要，這些寺廟宮殿裡面不少地方派上了新的用場，用作糧倉、會議大廳和軍營，並派有人民解放軍的小分隊守衛。由於大多數喇嘛不是被囚禁就在勞改營，或者已經還俗回鄉，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院只留下為數不多的上了年紀的喇嘛看守寺院。大昭寺一直開放到1966年。每逢星期三——被認為是吉利日，拉薩人天不亮就起了床，在大昭寺和河對岸的布門帕里山燒香祈禱。人們仍在製作、懸掛經幡，除了這些小的方面能喚起人們對昔日的生活的回憶外，首都市民每天的生活內容總是沒完沒了的勞累。當時的號令是建設「新城」，這是新的政府機構的中心。為此，全城老幼被分成了若干個勞動團體。婦女和身強體健的男子——其中很多人還是在叛亂之後幾個月釋放的——抬石頭、運泥土，他們每天的報酬在一元二角至一元七角之間，約等於美金六十至八十分。成份「不好」的人每天工錢最多不過四角錢。但更為常見的是，他們這些人及其兒女就根本無工作可幹。正如班禪喇嘛在他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報告中所說的那樣：「總之，今天西藏的形勢大好。勞動與生產繁榮的景象遍及廣大農村和城鄉的每一個角落。這是我們的工作主流。」

「繁榮景象」在農村的確存在，不過收益者倒很難說是藏民。叛亂後的最初幾年，農業生產大幅度提高——這是集體化的初級形式互助組和長年互助組，後者要逐步取代前者。季節性互助組通常由七戶至十戶人家組成，在某一季節，他們輪流耕種各戶土地，播種、耕作、收割，然後再各自為戰。長期互助組將勞動力和土地集中使用，財產、農具以及農畜也集中調配。在許多方面，互助組倒很像西藏常年都存在的村莊務農方式，因此互助組對西藏的傳統社會倒不構成任何威脅。但是，「階級敵人」也同樣絕不允許入組的。這些人分到的土地通常是當地最次的土地，偶爾他們也能分到一頭牲畜用來耕地，並叫他們自己管自己。

1959年夏季，據報告在四個地區共成立了四千七百四十一個互助組。到第二年夏季時，已成立了一萬五千多個互助組；到1964年，農民成立的互助組有二萬二千個，牧民互助組有四千個。除了「耕地不閑」之外，這些互助組還開始大興水利，建水壩，修水庫，積農家肥，以前的一季作物改為兩季甚至三季。接著是大豐收。1959年的產量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1960年的生產指標是增長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截止1961年，可耕地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五。據稱，1964年糧食比民主改革前增長百分之四十五，同期的牲畜增長百分之三十六。對於這些產量上的奇跡般的增長，人們將西藏人的反應描述成欣喜若狂，現在「站起來的百萬農奴用歌曲和舞蹈慶賀」，他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但實際上，除了西部的阿里——仍是中國影響不及的地區，在西藏的每一個角落，藏人仍在數千計地死於飢餓。

饑荒的根源不在西藏，而在中國。農業連年歉收，大躍進致使與蘇聯產生裂痕，蘇聯因此而中斷了對中國的糧食出口。結果，1959年是「三年歉收」的第一年，全中國因饑餓死亡的人數達百萬。為了填飽中國人的肚皮，西藏的農作物剛剛收割，就立即從藏人手中拿走了，要麼供解放軍食用，要麼運往祖國。這是西藏社會主義化的最緊迫的目的：為忍饑挨餓的人民共和國創建一個糧倉。

鑒於中國當時的形勢，在西藏強製成立互助組無異於成立強制性的勞動隊。給大家無一例外地都發了定量供應卡——上面記載著公安局十分需要的統計數字，如家庭人口、年齡、性別、社會關係，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是二十二磅。這也就是說，藏人平均的糧食消耗下降了三分之二。由於禁止人們外出旅行，鄉下人也只好囤積野菜；市民——現在已無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由市場——境遇更遭，他們每月的糧食定量僅十八磅。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數不勝數。人們吃貓肉、狗肉和昆蟲。父母看到兒女瀕臨死亡，只好將自己的鮮血加上開水和糶粑攪拌在一起餵給小孩吃。而另一些兒童卻被迫離家，沿街行乞，老年人乾脆到山里安安靜靜一死了之。數千藏人就靠吃漢人大院的中國人扔給自己餵豬吃的東西，而在人民解放軍兵營周圍的老百姓卻每天翻軍馬的糞便，尋找幾粒還沒有被消化掉的糧食。甚至對於那些比一般藏族老百姓的待遇勝過一籌的藏族幹部來說，他們還斷了肉類和酥油，也只好用鹽和紅茶來取代青稞。

饑荒一直持續到1963年年底。到那時，西藏死於饑餓的人已達數萬。當饑荒的日子結束時，能夠得到的生存條件也不過是最起碼的而已。直到下一次大饑荒——始於1968年，延續至1973年年底結束——前，大家全都是實行糧食定量供應。拉薩是西藏中部受難最大的地區之一，每戶每月只發一根蠟燭，二百五十克茶和十點八克白糖。帕里是西藏最繁華的城鎮之一——它是與印度、錫金和不丹進行貿易的中心，由於它近靠邊界，是個敏感地區，因此它倒算最好的了。這裡一個強男「勞力」每月的糧食定量為三十磅，弱勞力二十六磅，老弱病殘二十磅，十一至十七歲的少年兒童十五磅，六歲以下小孩五磅。至於酥油、食油、糖、茶、汽油，只有最為富裕的藏人才可以配給到這些東西，每個月還有五包煙、六盒火柴、十米半棉布。甚至在帕里，貨物亦奇缺，致使定量配給的數低於平均數的百分之二，結果餓死的人很多。每天背著糶粑口袋的人家總有幾十戶，來往於各家各戶之間，不是藉糧，就是還糧；不久，這些兩手空空的人們就得了個可悲的外號「空流」。這些帕里人完全是勞而無功，他們將自己的苦難編入民謠，其中一首講到為中國修建一個水力磨房：

告訴我是為什麼，

短短時間建磨房，

糶粑麵袋總要揮，

告訴我是為什麼，

我們剛剛得解放，

勒緊褲帶度饑荒。

小磨房，我們的血和汗，

達賴來了是寶座，

毛澤東到此作墳場。

然而，無論農村的情形多麼不好，而西藏監獄裡的條件則更為糟糕。在這裡居住著與外界完全隔絕的一大幫人——有時候，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人坐監獄。

1959年冬天，達賴喇嘛的四名私人醫生之一的丹增曲扎醫生住在西藏第一家「亞西公館」裡。由於他已給達賴喇嘛當了三年的私人醫生，所以他已經成了這位年輕領袖一家的親密朋友，當時達賴喇嘛的一家人幾乎有一半仍在西藏。此時亞西公館的氣氛十分沉悶，因為大家都在為日益增長的叛亂活動擔憂。在此期間，丹增曲扎醫生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該起何作用——他說不准，中國是否會幫助西藏，然後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離開西藏。目前他們的佔領還能被人接受，但是否這只是裝模作樣，只是為掩蓋某種沒有明說，但最終只會更為嚴酷的統治形式。最後，當康巴人蜂擁而入來到衛藏地區時，他們揭露了中國人犯下的種種暴行以及強制實行集體化的行為，這時丹增曲扎才下決心支持叛亂。在三月十日那天的遊行示威集會上，他在羅布林卡遇見了門孜康的同事以及各大寺院的代表。在羅布林卡里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名(這份有簽名的東西對於中國人抓人倒是用途不小)，這份文件宣告西藏獨立，簽名人發誓要為自由而戰鬥。

1959年3月19日深夜，丹增曲扎被炮聲驚醒，人民解放軍開始炮轟拉薩城。亞西公館距布達拉宮還不足四分之一英里，正好與拉薩河對岸、遠離河邊的吉布村並排，炮彈就是來自那個村莊。他穿上了俗人藏袍和褲子，從自己房間裡退出來，到了通向亞西公館正房的大門口，結果這裡也無人知道達賴喇嘛已經出逃。

3月22日拉薩投降，這天下午中國軍隊來到這裡，他們沒有發出任何先兆，就對大門開了一炮，並叫喊著要裡面的人投降。這棟房子裡有十六人，其中四人決定出去招呼解放軍。但他們一出大門就被機槍擊死——因為他們忘記舉起雙手。帶著機關槍的戰士衝進了亞西公館。一些戰士看守剩餘的藏人，另一些人對整個亞西公館進行了搜查，他們見到箱子、櫃子、床等等，首先就是一梭子槍彈，而且還向衛生間里扔手榴彈，最終出來後，還對著外面的房子拼命射擊。那些在亞西公館院子裡租房用的人家共有三十人，他們被趕到正房，鎖在一間房子裡，裡面漆黑一片。翌日上午，他們被放出讓他們大小便，然後又給關了進去。那天晚上，一位中國軍官通過翻譯對他們講，他們已被作為「研究對象」挑選出來；這些人知道，所謂「研究對象」不過是處以極刑的婉語而已。兩名士兵在前，還有兩名押後，他們被攆著出了這扇毀壞了的正門，沿著空無他人的大街來到了城邊上。他們又被趕進了察絨家的一間小房子裡。這是西藏深得民心的領袖人物之一旺秋·甲布察絨的私宅，它已被人民解放軍用作犯人的集散點。丹增曲扎醫生與其他犯人一道在曾是海因里希·哈雷居住的房間裡關了兩天。在此期間，既無人給他們送吃的，又無水喝。他不止一次地聽到機槍聲，撩倒了那些企圖逃跑的人。第二天晚上，他們這一幫人又帶到了人民解放軍的司令部院內。這是一座絕密監獄，本來中國人蓋這座監獄是是用來關押中國人的：兩道圍牆，上面安有帶刺的鐵絲網，牆角頂上有塔樓，裡面總有哨兵值班。每處監獄關押三百五十名犯人，共十二個牢房，每間關押三十人；牢房正對中間的院子，東北面另有一些單獨的隔離牢房。

藏人的手錶以及珠寶全給取了，戴上手銬——有一些人只戴了手銬，而像丹增曲扎的另外一些人還戴了一英尺半的腳鐐。戴上腳鐐十分不便，丹增曲扎繫自己的棉布靴帶時，只得拴在腳鐐上，每每抬步就得將鐐銬也帶起來。

由於人民解放軍對叛亂之後大批大批的犯人接踵而至並無準備，他們花了六天時間將丹增曲扎醫生這批犯人分了類別（對於後來的犯人，分類也就可以立即完成了）。上層階級的成員——喇嘛、醫生、政府職員以及商人——關在絕密監獄裡，其他人則送往羅布林卡。那些留下來的人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屬於頭號犯人，是所謂的「反動集團」的核心。當他們一得知「地方政府」被解散的消息時，中國人就告訴他們，作為政府的主要「走狗」，他們將受到刑事審判。當時中國人宣布，每個犯人的首要職責是「認」罪，以便能夠服罪。問他們的第一個問題是：「是誰養活了你？」正確的答復是：「人民——即我剝削的那些人。」為了暴露自己的罪行，每個犯人被迫交待自己從八歲以來的個人經歷——這個過程持續了一個月。接著是七個月的學習、自我批判以及鬥爭——這些安排是想讓犯人坦白認罪，這是在履行共產黨人的思想觀點。

實質上，這些步驟反映了強加於全體藏族的措施。只是在監獄裡，實施這些步驟的方式更為激烈罷了。一天早上，丹增曲扎在監獄衛生間裡洗臉時，遇到了們門孜康的一位同行。儘管四周有一些看守，但他還是抓住了這一時機，透露了他剛剛聽到的一條消息。當時是五月份，一些犯人看到了報導達賴喇嘛抵達穆索里的消息的報紙。丹增曲扎悄悄地對那位同行說

：「現在沒有必要擔憂了，因為聖神的達賴喇嘛已安全抵達印度。用不了多久人們就會得知這一消息。」在鬥爭會的壓力下，丹增曲扎的那位同行將這番話報告了中國人。當鬥爭會還在自己的監牢裡召開期間，丹增曲扎又繼續犯下了一個更為嚴重的錯誤。他以前曾與五位朋友交換過反中國的看法，結果其中三人也來到了這個監獄。他認識到就是一件小事也能變成罪狀，因此他寫了張紙條給這三人，叫他們不要提起以前他們的交談。儘管他遞這些紙條無人發現，但後來他們全被發現了，這三個人壓力的威迫下，供出了條子是丹增曲扎寫的。接著，立即對他們進行了審訊，他被指控是賈樂頓珠的同謀。中國人認為嘉樂頓珠根據台灣的指示，策劃了這場叛亂。

審訊於六月上旬開始。一位軍官在兩名掛手槍的副官的陪同下，來到了丹增曲扎的牢房，並讓一名武裝看守在門外站崗。這位軍官揚了揚手，叫他的副官坐在一側，然後命令丹增曲扎坐在牢房中間，四周也是囚犯。

丹增曲扎已經目睹過幾次鬥爭會，它的確令人可怕。共產黨使用的審訊方式十分獨特，比國民黨佔領康區時採用的辦法還要狠毒。國民黨只是將犯人雙手綁在身後，然後在脖子上也綁了根繩子。共產黨的新辦法要複雜得多。繩索得先在胸前交叉，然後螺旋似地捆住雙臂，雙手綁在一起，並被拽到身後，還拼命地向時拽，幾乎超過頭頂；然後，繩頭再分別經過雙臂腋下，穿過胸前事先結好的小環，再往下拽，頓時雙肩勒得十分難受，面孔驟然變形，一副可怕的模樣，但又不至於使犯人窒息。這樣折磨使人痛苦不堪，甚至會使犯人大小便失禁。

審訊丹增曲扎醫生開始時是提問，內容涉及他在恰得寺的生活經歷。他在上醫學院之前，就是住在這座寺院。他如實作了回答，說他是在學習佛教。那位軍官問到：「你當時的思想是什麼？當時你一定有資產階級傾向？」由於丹增曲扎不能確切理解「資產階級傾向」為何物，因此不知該怎樣回答這一提問。然而當提問一步步深入時，也由沉默變成有意對抗。他意識到，中國人看中他已有目的：就是為了搞臭達賴喇嘛。軍官告訴他，如果丹增曲扎要免遭挨鬥，他就必須詳細提供「達賴陰謀」的每一細節——亞西公館的種種活動，嘉樂頓珠與那些外國人有關係，他們談話的確切內容。此外，他接著又說，儘管達賴喇嘛是一位宗教人物，但至少丹增曲扎應該清楚，實際上達賴喇嘛是盜賊，是殺人犯，而且他還亂搞女人——尤其是他還與自己的大姐姐次仁卓瑪發生關係。軍官期待著丹增曲扎能證實他的這些指控，但他卻回答說，他作為西藏領袖的醫生，只有每天拂曉給達賴喇嘛摸脈時，才能見到他，而且時間很短，這位醫生解釋道：「用這些謊言譴責聖神的達賴喇嘛是不可思議的。對於我們藏人來說，他就如同我們的生身父母，他是我們的心。誰又能說那些話呢？」

但是，丹增曲扎夥伴中的三名犯人——在接受了鬥爭之後——卻決意要支持中國人。他們成了「積極分子」出賣別人，他們得到的報償是：獲釋出牢房。如果在後來鬥爭會上，他們有任何心軟表現的話，中國人就會有所指地向他們發問：「難道你們也同這個人一鼻孔出氣？難道你們同他共褲連襠。」這些發問逼著他們站到了鬥爭的前列。因此，丹增曲扎醫生清楚自己挨鬥的時候到了。經過幾天的盤問之後，一天早上人民解放軍的一位指揮官特意表揚了那些積極分子：「你們表現不錯，值得表揚。但是，我們必須徹底搗碎這個反革命老窩。你們應該緊逼丹增曲扎，問清他幾個問題，將事情弄個水落石出。」那天的盤問剛剛開始，那位軍官就瞪了一眼積極分子，其中一位立即站了起來，說：「如果你還這樣扯謊下去，出路只有一條，鑽黑暗的死胡同。因此為了你自己，你也應該向我們坦白交待你所知道的一切。」當他還在說話時，其他積極分子衝上前，一把抓住丹增曲扎，將他的手臂綁在一塊長長的木板上，綁的方法與以前的不同。繩子的兩頭向下吊，他們緊緊抓著丹增曲扎的雙臂，審問人在高聲尖叫，要求他譴責達賴喇嘛與其姐姐發生關係，犯下亂倫之罪。丹增曲扎拒絕之後，審問人將一隻鞋脫了下來，用鞋子猛抽他的耳光。這是給同牢房的其他人發出的信號，叫他們也動手——在看守的密切注視下，他們真的動了手，扯醫生的頭髮，拽他的耳朵，照著他臉上吐口水，揮舞拳頭，直往他腦袋上捶打。丹增曲扎醫生的雙臂很痛，失聲大叫，但直到他雙腿站立不住倒在地上時，軍官才叫大家住手。稍事休息之後，大家又開始打他，周而復始，整個上午都是這樣。最後，他完全失去知覺，臉上身上鮮血直流，青一塊，紫一塊，四處發腫；他聽到軍官下令住手，這次鬥爭共持續了四個小時。他剛剛鬆綁，又戴上了手銬腳鐐，中國軍官直接對丹增曲扎說：「如果你講真話，承認達賴喇嘛的犯罪行為，你的前途是光明的。這樣的事情就不會再發生，你將獲釋。記住你的朋友們的提問，好好想一想。」講完這番話之後，丹增曲扎被帶離這個牢房，他被領到了東北面的那些牢房前，與別人也就中斷了聯繫。

丹增曲扎蘇醒過來時，他發現自己給關進了一個漆黑的房間，四英尺寬，八英尺長，牆上離地面高高的地方有一個鐵窗，還有一個六平方英寸的小洞用來送飯。泥土地上有一個草墊子，一件人家丟掉不用的軍大衣，還有一個尿桶。他已經在監獄裡關了兩個半月了，接著，他得獨身一人在這裡待四個月——也就是1959年夏季的剩餘月份。這段時間從頭至尾，他都像下面所講的那樣生活。早上，廚房的工作人員打開門上那個小窗口，他戴著手銬腳鐐也盡量站起來，將碗伸了出去，接到的是一個小饅頭、一點米飯和蔬菜。飯後，他得坐在草墊上，整天反省自己的罪行。他不能躺下或休息，因為送飯進

來的那個小窗口經常會被突然推開，中國看守的雙眼會朝里瞧，看看他是否在反省。只有每天晚上去上廁所時，他才能短暫地輕鬆一會兒，看看夜空，吸吸新鮮空氣。實際上，丹增曲扎的腦袋裡亂得像一鍋粥，情緒低落。挨了那頓打，疼痛逐漸消失之後，他就總是恍恍惚惚，有時竟然眼睜睜地頂著石牆，肯定自己不久就會被處決。他想像自己兩側是一排排的人，全部被鎖在漆黑的房子裡，等候死神降臨。夜晚，他的夢成了一個回憶往事的大雜燴：兒童時代，學醫、行醫中夾雜著被捕的情景，監獄生活和那次挨揍。他醒來時，發現自己唯獨的希望就是去死。不過，雖然他已找到了自殺的辦法，但他卻將自殺排除了。當犯人被領著去拉薩河洗澡時，朗嘉扎倉的一位喇嘛就投河自盡了。但這只是例外，丹增曲扎像大多數藏人一樣，他害怕自殺所帶來的後果甚於眼下所忍受的苦難，無論這樣的苦難有多麼大。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世界上眾生萬物多得數不清楚，而人卻並不多，眾生萬物要想再生轉世成為人類的一員，是難上加難的事情。我們確信，自殺是犯罪行為。自殺無異於在佔有一袋真金之後，卻不去用它，而將這袋真金扔入大河。根據佛教的觀點，如果有誰自殺，那麼他至少在將來的五百次再生轉世時，毫無希望進入人類的圈子。」

每星期的最後一天，總有兩名看守要到曲扎醫生的牢房中來，大聲命令他站起來，然後槍口對著他，將他趕到監獄的院中央支起的一頂鈴形帳篷前。帳篷裡坐著公安廳的一位幹警，他前面是一張上面什麼東西也沒有擺的桌子，旁邊有一位藏族翻譯。曲扎醫生被推到地上的一個坐墊上，又遭到審問。問題總是這樣開頭：「你決定坦白了嗎？」當丹增曲扎回答說，他一直講的都是真話，這時，警官就會大發雷霆，高叫：「你這六天都想了些什麼？」並且他將手槍從槍套裡掏了出來，啪的一聲扔在桌上。這樣交往了幾次之後，他威脅曲扎醫生，再頑固下去，後果自負。一個月後，後果也就真來了。

7月中旬時，曲扎醫生成了第二次鬥爭會的對象。他被從隔離牢房裡帶了出來，路過了南邊的牢房，被安排在他那些舊牢友的中間，就像以前一樣。這時，負責軍官問他：「你認清現實沒有？你現在坦不坦白？」儘管曲扎醫生有些恐懼，但他仍拒不回答。他又被綁在木板上，再次挨打。人們用笨重的靴子反復抽打他的面部，他的雙眼很快就模糊了，倒並不是鮮血擋住了自己的視線，而是因為眼睛受了傷。幾個小時之後他被拖到了自己的牢房，他意識到自己左眼視網膜已脫位，右眼珠已經到了眼窩的左側，因此視線也就不能集中於前方了。後來幾天，他發現他上面那排牙齒已經全部鬆動。起初，他還可將牙齒推回原位，但不到一個月，上排的牙齒就一個個地全掉了，只留下了一些有傷口的小洞，牙齦仍然紅腫有血。儘管當時疼痛逐漸消失，但曲扎醫生那損壞的牙齒和眼睛卻永生永世使他不能忘記第二次鬥爭會。然而，下個月又挨了第三頓揍，這次更兇。

8月，由於曲扎醫生在每星期一次的審問會上拒不交待，又讓他回到了原來的牢房。接著又是那些令人無法相信的問題，然後是綁在木板上，在怒火衝冠的軍官命令下挨一頓臭打。他的雙臂被捆綁得幾乎斷了一樣，頭部和臉部也由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襲擊而紅腫。曲扎醫生逐漸喪失了疼痛的任何感覺。他彷彿昏昏欲睡，四處飄遊；他唯獨的感覺就是特別口渴。他感覺越來越渴，接著他雙眼發黑昏了過去。他恢復知覺時，挨打的情景仍在腦海中一幕一幕出現。實際上，他是躺在隔離牢房的地上；剛才有人對著他的臉部澆了一桶涼水。看守見他蘇醒過來之後，猛然將他拉起來，銬上手銬，然後讓他倒在草墊上。

曲扎醫生接下來的印像是一幫人進了他的牢房。其中一人肯定是中國人，他是醫生，對他進行了檢查。幾個月後，他又回到了原來的牢房中間，人們告訴他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昏倒之後，請來了一位解放軍軍醫，實際上還是不想讓丹增曲扎醫生死去。醫生檢查完之後，說曲扎醫生已瀕臨死亡，揚言對這一病例拒不負責。這一消息傳到了該監獄的最高官員耳裡，他派了一位大員來到了他們這裡。當時那位負責審訊的官員也在場，這位副官警告說，如果丹增曲扎醫生有個三長兩短的話，他們這些犯人就負負責，並將受到懲罰。他問道：「你們為什麼要動手打人呢？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不許毆打犯人。你們唯獨的任務就是學習，不是互相傷殘。現在你們必須討論討論，找找原因，為什麼要打人，誰的責任。」不久之後，鬥爭會的形式結束了——然而，這並不是因為採取了寬大為懷的新政策，而僅僅因為弄清誰是最危險的反動派這一初始階段已經完成。

1959年10月15日，全監獄的七百名犯人在監獄的南部排成長列，周圍是中國的軍隊。監獄最高長官在一張桌子前坐定後，說：「你們當中有那麼一部分人，堅持扯謊，拒不承認事實，我們已經決定將他們送往中國內地進一步學習。那裡的條件遠遠比這裡要好，糧食更充足，他們的需要一定會得到充分的照顧。」接著公佈了七月份的審問結果：四名犯人獲釋，二十一名送納金水電站工地勞動，送往中國內地的七十六人於兩星期內啟程。但是，直到臨出發的前三天，犯人們才知道去中國內地的是哪些人。10月29日上午，曲扎醫生接到通知，他也去中國內地的犯人之列。因為他既沒有受到指控，又

沒有判刑，所以很難相信他還要去中國。因此，他認為這些犯人是去哪個附近的地方，然後找個藉口將他們全斃了，將他們隔離開來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翌日，丹增曲扎的手銬腳鐐全給下了，他與其他七十五人一道乘車來到了羅布林卡。他們在這裡待了一天二夜，丹增曲扎醫生逐漸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以前這些人都是西藏社會和政府裡的大官貴人。大家的看法一致：即使中國實際上是他們的終點站，那麼他們被挑出來，這一點就足以消除一切懷疑，說明他們的剩餘時日已經不多了。出發的那天早上，他們獲準向親人告別，使得他們的恐懼心理有增無減。破曉時，犯人們被帶到一道牆跟前，每次叫他們過來二三個，來到一扇窗戶前，給他們嚴格規定了幾分鐘，讓他們與親人待在一起。儘管中國人揚言，如果有一個藏人動感情，他們就得取消會見，但誰都流下了眼淚。看守叫那些剩餘的犯人安慰他們的親屬，他們十分幸運，他們將去祖國——接受教育。在這道牆的另一端，犯人的親屬——他們都帶來了吃的、穿的和毛毯——得到了承諾，他們的親人在中國的生活條件一定會盡可能地好一些。然而，中國人卻允許犯人收下那些禮物。

當叫到曲扎醫生的名字時，他來到窗前，見到的是他哥哥多布吉。多布吉淚流滿面，說不出話來，一把將丹增曲扎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來曲扎醫生說：「你最好將我永遠忘掉。你回家去，好好照料自己吧。」多布吉給他帶來了糌粑、一條墊在床上的羊毛卡墊、兩條毛毯、一些衣服、一隻碗和一個臉盆。他彎腰將自己那雙高筒藏靴帶解開，但丹增曲扎堅決不接受這雙靴子，他說：「你還必須穿這雙靴子，但我卻無此必要了。」

告別見面結束，犯人被領著走進了兩輛沒有蓬布的軍用卡車，四個角下各有一名士兵。前面一輛卡車開道，上面架了一挺機槍，槍口對著這些藏人；後面一輛卡車押後，上面有十名士兵，也架了一挺機槍。車上沒有地方坐，因為每輛卡車上都有三十八名犯人，大家只好肩靠肩站著，默默無言地望著前方。這時汽車發動，朝前駛去。此時犯人的妻子們說了幾句掩人耳目的話，高聲大叫西藏歷來驅逐苦難的那幾句話：「讓你們帶走西藏的全部苦難吧！苦難全滾蛋吧！」

曲扎醫生和他的伙伴們真的是去中國。11月1日早已定為將犯人大批從拉薩轉移出去的日子；他們前面有很多車隊，當他們駛經哲蚌寺後，他們前面的路上又跟了六部卡車，上面是哲蚌寺的三百名喇嘛，他們全都只有十三、四歲。他們的車隊增加到了十輛，共四百多人，朝北行駛，直奔當雄。他們停留的第一個大站是那曲。在旅途全程，犯人們不得不站在車上，當他們翻越那些高一萬五千英尺的高山口時，晚秋的寒風刮在臉上就像鞭子抽打一樣。晚上也很難休息好，他們每達到一個村莊過夜，總是住在最大的地方——為方便起見，常常是一個房間，因為空間太小，有一半人要坐在別人的大腿上。每天夜晚，時而有人高聲尖叫，不是壓住了手就是踩了腳；那些晚上要起來方便的人，也只好用自己的碗將就了事，每當這時，還必須自己將碗端平，以免尿會溢出來。每人的糧食定量大幅度減少，現在每天只有一杯開水、四個饅頭，因此大家都感到十分煩躁。

出發後的第十一天，車隊在青海湖的北岸停下來。在這裡犯人改乘火車，朝東面的甘肅省會蘭州駛去。儘管他們當中沒有幾個人見到過火車，但眼下因為太累，誰也沒有心思去欣賞它。他們團團坐在一起，取暖禦寒，看著燈光在車廂內跳來晃去。一天之後他們抵達蘭州，兩隊人馬分開行動；那些年輕喇嘛繼續坐火車前往中國內地，而曲扎醫生這幫人卻又坐上卡車，再次朝北駛去。多少世紀以來，蘭州一直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但它周圍的村莊卻是一片荒涼，中國人總是不去管它，在這裡居住的只有回族，他們也是少數民族。在蘭州城的北端，黃河淤泥堵塞，自西向東，奔騰不息，再過去就是蒙古，那裡完全是一派異國他鄉的風光，這一點長城的殘垣斷壁可以作證，還有戈壁沙漠的邊緣地帶。

犯人們乘車前往騰格里沙漠，它是戈壁灘的邊緣地帶。騰格里沙漠寬大無邊，碎石遍地，它是風暴和冬季狂風的起點，大風在它與長城之間的沙漠上大發淫威。人們一直形容這塊荒涼的大地有「三多」——風多、沙多、石頭多，「三少」——雨少、草少、土壤少。這裡不過一直是人們過往的地方——蒙古人去西藏朝佛時，自北向南而來，然後又自南向北而歸。在絲綢之路上還有東來西往的商人。然而，對這塊地方，共產黨卻派上了新用場——廣闊的犯人區，似乎還很理想。

甘肅和安多（中國人已將其更名為青海）北部的荒涼大地上，監獄究竟有多少，這只有北京的那些人才知道。不過，人們估計，這兩個省的監獄不計其數，犯人總數高達一千萬人。正如1979年的一期《時代周刊》所形容的那樣：「它是一個黑洞，這裡的消息外界幾乎一無所知，甚至中國的其他地區也對其了解甚少。」

由於青海擁有三十萬平方英里的幾乎無法進入的地帶，因此1949年過後不久，它就被選中作為中國將來關押大多數犯人的地區。五十年代初期，開始還只有一些規模很小的勞改營，每個勞改營的犯人人數不過幾百，和一些帳篷，四周圍了帶

刺的鐵絲網——有時安的是電網。犯人的第一任務是用磚頭、泥土建造自己的監獄。到五十年代中期時，這些勞改營被大型監獄所取代——這些監獄如同城堡一般，沿著簡易公路連綿數英里。每個監獄關押一千至一萬名犯人，這些地區的監獄是整個監獄體系的主幹。曲扎醫生的這隊人馬去的蘭州北部的這個地區條件最糟糕。接下來條件很苦的地區有四個：兩個在青海省西寧北面，一個在西寧南面，一個在正西方，相距西寧四百英里，位於去新疆的途中。監獄和勞改營與遊民部落相互交織，使這大片農村地帶染上了鮮明的色彩。

日落時，藏人路徑一個村莊，這裡的房子是用幹打壘的方式蓋成的，邊上有幾棵東倒西歪的大樹。再往前走五英里，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朱鎮監獄。像城堡一樣的鐵絲網圍了四個地方，每個地方之間的距離很大，這也就是整個改造營。他們駛進其中鐵絲網圍的一個地方，卡車駛往監獄工作人員的住房和一個建築群。這群建築後面是監獄圍牆，二十英尺高，五英尺厚，長半英里，寬三百米左右。東牆的正門上插著紅旗，兩側各有一座崗樓；西牆中部另有一座崗樓。圍牆裡面是牢房，沿中央的院子一字排開，有的牢房關押十四人，有的關押二十七人，這裡的犯人共計一千七百人。廚房是沿西牆一線的房子，廁所位於西南角。大門左側掛著一個告示牌。犯人基本上是漢族和回族的上流人物：回族軍閥馬布芳部隊的舊軍官、醫生、教授、法官、舊政府官員以及現在稱作反動派的知識分子。顯而易見，從這裡是無法外逃的：這個地區太荒涼，太偏僻，單獨一人活不了幾天。

進院子後，四名一直陪同他們的藏、漢官員對他們進行了安排。這些官員與朱鎮監獄的官員一道工作。每人發了一頂帽子、一雙手套、一條棉被、一套青色或海軍藍囚衣，褲子是背袋褲，十分擁腫，過了不久人們就叫這種褲子為「肥大褲」。對每個人所帶的包裹逐個進行檢查，幾乎所有東西——包括鋪蓋、炊具以及換洗衣服——全都收走了。接著犯人被帶往自己的牢房：這是三間大牢房，每間能容納二十七人，在監獄南側的廁所旁邊，這裡有一道內牆將這些牢房與中央院子隔開了。這些牢房完全一樣：牢房的四周有窗口，玻璃上糊了報紙，但留下了足夠的地方沒有糊，以便看守人監視牢房內的情況。兩個土台子有房子那麼長，中間是一道走廊，走廊頭上有一小塊供休息的空地。土台子離地面二英尺高，上面鋪了稻草，墊著睡覺，這也就是監獄的炕了。炕歷來是中國大西北的床鋪，冬天下面可以燒火，這樣睡在炕上的人就總會感到暖呼呼的。不過犯人沒有燃料，因此也就無法去取暖。第一天晚上，藏人蜷縮一團，他們發現每個土炕上勉勉強強只能容納十三、四個人，這樣人們就爭先恐後搶地盤。直到幾天以後，他們才在每個人頭上的磚牆上劃了分界線，分界線表明，每個人睡覺時只能佔寬一英尺半的空間。

這個勞改營裡已經關進了兩名藏人。將這兩名藏人同他們關在一起後，他們兩人才告訴他們，三年前的1956年，安多地區的第二大寺院拉卜楞寺的三百名喇嘛被關押在此，現在就剩下他們兩個人了，其他人已餓死。兩個月後，在中央院子的廚房前演出了第一場宣傳戲，西藏中部的人士即刻注意到，用作背景的那塊栗色幕布是用喇嘛袍縫製而成的。接著，有一次他們當中的一個被分到庫房裡幹活時，看到了一些特點鮮明的喇嘛靴，靴底因為幹重體力活已經磨得所剩不多了，只有上面那些皮子還保存下來，一備將來再用。

他們抵達的第二天，就熟悉了朱鎮監獄的規定。除了有必要外，不得與外界通信聯絡。看守告訴他們：「這是座絕密監獄，專門關押那些罪行最嚴重的犯人。不允許散佈反革命謠言。」根據陪同他們的官員們的建議，在每一至十五人一組的犯人當中指定一名「進步犯人」當班長。儘管班長也同其他犯人同一間牢房，但他卻可以免受鬥爭之苦。作為回報，他必須向中國人報告所有情況，甚至連犯人之間傳遞眼色也不例外。因此，從他們一跨進朱鎮監獄的大門以來，囚禁他們的還有一座肉眼看不見的監獄，幾乎無異於禁止任何行為舉止。人們平時交談完全是為了講給那些告密者聽的，總是諸如此類的套話：「這裡的條件好極了，我們非常喜歡。」

每天破曉，犯人要集合。犯人得在各自的牢房前站成一排，接著有人領著他們大聲歌唱，歌曲的第一段歌詞是：「莫斯科領導鬧革命，帝國主義嚇破膽。」然後他們排著隊下地幹活。中午回監獄吃飯，時間很短；一天勞累之後，吃晚飯前還得再次唱歌。晚飯也像中、早餐一樣，是在廚房工作人員旁邊的房間裡吃。晚餐後是「政治學習」，一直要到十點才結束。然後犯人上炕就寢。每過十天，犯人就得經受一次審問，無人例外。此外，中國人可以隨意提審犯人，將他們帶到朱鎮監獄圍牆外的工作人員的一間小房間裡，四個人整天輪番發問，企圖拖垮犯人，以求得到他們歷史上所犯下的「罪行」的詳情細節。除此以外，犯人總是集體活動，下地幹活，甚至上廁所都得由看守監護，集體行動。

當時正值「三年歉收」期間，朱鎮監獄生產的農作物並不是給犯人自己享用，而是供應其他工作人員和該地區的人民解放軍。看守部隊是人民解放軍，士兵只要看到超越自己的看守範圍，就可以開槍射擊。每個犯人只發了一把鐵鍬，每天必須

開墾足夠收獲三十磅小麥的荒地，還要包括開挖水渠。墾荒時要挖一英尺深，面積約四千平方英尺。這項工作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是石頭不多的荒地，一個強勞力也很難完成任務。但荒地常常是又堅硬，石頭又多。每當遇到這種情況，犯人將大石頭搬走之後，又得尊命去附近的地方運沙土；兩人一組，一根扁擔挑兩只筐，然後犯人將新土和老土混在一起。速度是關鍵。他們實行的是記分制，完成定額的犯人就得分，完不成定額的要受罰。挑沙返回時，犯人就可以收到一藍紙條或白紙條；每天收工記數時，紙條數也就是某一犯人所挑的筐數。第二天，表現最好的那個隊的地裡就會插上一面紅旗，而其他所有沒有達到這個隊的水平隊就得延長勞動時間，晚上的會議時間也得延長。因為常常有人昏倒在地，所以事先就備好了擔架。如果地裡離挑沙的地方近，每天可以挑六十擔，但往返都得跑步才行；如果較遠的話，就只能完成二十五擔。

再教育是在晚上會議上進行，學習的內容通常是國內外大事。最常見的內容是：討論通過艱苦勞動提高生產力是社會安定的關鍵的觀點；討論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歷史上是怎樣壓迫中國的。中國人要求犯人對眼下討論的問題談個人看法。不過，起初他們不得不學習那些正確的詞彙。中國人稱他們為「石頭腦殼」，翻覆挨鬥，直到不久之後，大多數犯人也就知道說些什麼了。第一個發言的會這樣說：「西藏是反動的農奴主以及帝國主義走狗統治的封建社會。毛澤東同志解放了祖國，我們與地鬥，與天鬥，種植的農作物應有盡有，因為我們的人民過上了和平、幸福、繁榮的新生活。」第二個即席發言的人會說：「帝國主義和反動集團狼狽為姦，剝削人民，但現在它們全被打倒了。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所有共產黨的先鋒，是因為毛澤東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目前，只有他才能為當之無愧的領袖。」

夏季來臨，炎熱的沙漠高溫取代了又幹又冷的氣候。犯人領到了又肥又大、像紗布似的棉製服。1960年5月1日下午，也就是藏人抵達這裡六個月之後，廚房工作人員來到了他們牢房，提了藍平常吃的饅頭和一桶青菜，不過，饅頭只有雞蛋那麼大。犯人們問饅頭為何這麼小，他們得到的答復是：他們每月的糧食定量由每月十六磅半減到了八磅半。從此以後，每天只給三個饅頭，而且再也不是白麵饅頭了。為了節省更多的糧食，朱鎮監獄的領導將消化不了的草根樹皮也和糧食攪拌在一起。三種草根樹皮最易辨認：一種是遠離監獄的一片小山上的樹上剝下來的腐朽樹皮。將它磨成粉末，並與麵粉摻和在一起後，饅頭變成了紅色；吃了這樣的饅頭，胃部沉甸甸的，十分疼痛。如果消化時間過長，樹皮就會在腸胃裡劇烈發作，像流血一樣疼痛；這些東西還只吃了幾天，犯人們就發現自己大便帶血。摻在一起的還有穀殼。秋天時還得加一種原料，它使得饅頭面目全非，這就是黃豆加工之後的廢料。黃豆用來為監獄的工作人員做豆腐，而將豆渣蒸一蒸，看上去像粥一樣，再與麵粉攪拌在一起。但這樣的粥太稀，只好將鍋挨個端到每間牢房，給每人分兩匙稀粥。冬季，吃的東西就包括白菜和其他青菜外面的幾片菜葉，而菜心已經讓看守給吃了。當時連一種當地的大綠葉、上面開黃花的植物也用上了，這種植物就用水煮，然後給每個犯人分發一勺，一頓飯總共不過一口食物。

飢餓壓倒了犯人的所有心思。秩序也亂了套，強者欺侮弱者，為的是要得到一大勺青菜。這樣中國人也就拿著雙筷子，每勺都撥弄撥弄，以便保證每勺的東西多少一樣。即使如此，犯人們對於分菜不均的可能性，變成了對他們各自飯碗的大小不同的爭執。這裡發的碗從來就不是一種規格。因此，每個人都從獲準保存下來的親屬送的禮品中拿出只碗來，如果沒有的話，就想法從看守那裡弄一隻碗。辦法各種各樣，曲扎醫生帶來了一個茶缸和一個臉盆。當用茶缸吃飯太小時，他偷偷摸摸地從住在朱鎮監獄圍牆外的那些獲釋囚犯處弄了一把剪刀，他們眼下仍在這裡勞動；他用這把剪刀將臉盆的四邊剪下去了一些，這樣他的臉部也好靠下去，可以將盆中食物舔得乾乾淨淨。大多數犯人沒有這麼幸運。一些人有杯子，一人有罐頭盒，其餘的一些人則有金屬煙灰缸——是中國人發的。最可憐的是那些只有木碗的人。最後人們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即在食物分完之後，而又沒有吃之前，不規則地交換盛食物的器皿。這樣倒恢復了一些平靜，不過到下個月時，這個問題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

夏季開始時，出現了飢餓的第一個癥狀：極度虛弱。當行走時，犯人們常常感到雙膝打跪，一些人摔倒在之後，要就站不起來了。即使他們坐下來後，不休息幾小時，也無法行走。到七月份時，大家都瘦得剩了一副骨頭架子。脅骨、胯骨以及脛骨直向外凸，胸部朝內凹，瞳孔脹得大大的，牙齒也出現鬆動。以前曾經黑得發亮的眉毛、頭髮變成黃褐色，然後成了米色，最後開始脫落，頭髮只要輕輕一扯，就會從頭皮上脫落下來。每天早上，那些能起床的犯用雙手扶著牆壁，一點一點地向上挪，小心翼翼地保持著頭部的平衡，盡量不要讓自己倒下去。站起來之後，他們又頭暈目眩地穿過草墊，沿著炕的後部來到了牢房門前。從這裡他們去廁所時，得靠扶著沿途的窗沿和牆壁，才不至於摔倒。從此以後，誰也不能四平八穩地行走，更不要說跑步挑沙了。腿部關節就像僵了一般，拖著雙腳朝前走，因為雙腳腫得無法抬起來。晚上犯人回到監獄牢房裡時，小心地彎下身來，一隻手扶著牆壁，另一隻手扶著腦袋，倒在土炕上；人是朝一頭倒下的，由於自身的體重根本就無法控制。

第一個死去的人，是那曲來的一位喇嘛。以前，他曾在地裡昏倒過多次，每次都需用擔架抬到醫院病房，在那裡休息幾天。九月的一天，他躺在炕上再也爬不起來了。監獄看守進了牢房，質問他為什麼不出去勞動。他回答說：「我連雙腿和頭也抬不起來，又怎麼能幹活呢？」接著他說了幾句挖苦的話：「現在我終於弄懂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這很好。我是個不能動彈的人了，也許只能活一兩天了——就這麼多，而現在居然還叫我去幹活。這的確是為民政策。」說完這番話之後，人們就將他送到了醫院。兩天之後就像他所預料的那樣，他在這裡閉上了雙眼。

死人的事，曲扎醫生和其他囚犯已有一年半的思想準備，幾乎每天都擔心會發生第一起這樣的事情，現在之所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是因為過了這麼久才餓死了第一個犯人。人們的反應漫不經心，犯人來到朱鎮監獄之後，還未曾有過精神崩潰的病例，沒有恐懼沮喪的神情，現在也是如此。除了老是為吃飯爭吵不休外，飢餓壓倒其他所有的感覺。不過藏人現在意識到，他們不會被槍斃或死於嚴刑拷打，而是會因強制勞動而喪命，這樣那些當權人物（至少用他們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也就似乎可以不負任何責任。

幾天以後，接著又死了一個人——他是一名政府官員，名叫朗達加央，他的妹妹後來與一個美國人結了婚，並移居美國。此後，每個星期要死兩三名犯人，間隔最長時候也不過兩個星期。過程總是相同無異。那些純粹死於飢餓的人，總是躺在炕上不能動彈。他們的呼吸越來越短促，聲音越來越微弱，到最後時刻，嘴裡往外冒唾液，接著就死去了。而有時候，人死之前，得在人世間苟延殘喘幾個月之久。拉卜愣寺的二名喇嘛，雖然逃脫了該寺二百九十八名喇嘛的同樣命運，但其中那位年紀大一點的喇嘛，就是拖了幾個月之後辭別人世的。他兩個月時間臥床不起，僅靠其他犯人餵他幾口稀飯和白開水維持生命。每次吃了些東西之後，他就恢復了氣力，四周瞧瞧，甚至還能與別人簡短交談，然後又恢復了半昏迷狀態，口中直吐泡沫。而其他入世滯留人世的時間卻只有幾天，曾任拉薩貢本拉康堪布的一位喇嘛就是如此，他也是早期的死者之一。對於晚上去世的那些人，醫院的醫務工作人員就將他們抬走，將他們身上有用的東西全取下來，然後將屍體堆放在廁所前。拂曉前，一個三人掩埋小組就會將屍體運出監獄，墳場位於離監獄圍牆不遠的野外。掩埋小組隨手撿來一些手掌大小的石頭，用紅顏料在石頭上寫下死者的名字，然後將石頭置於墓地上面。由於土太硬——冬天凍結成板，夏天卻變得乾燥，鬆軟有彈性，因為只能挖一個淺坑，赤裸裸的屍體就給扔進坑，也沒舉行任何儀式。曲扎醫生見到過中國犯人的家屬在這裡游來逛去，企圖找回死者的骨頭。這些家屬有的來自遠方北京和上海，結果一到達這裡，得到的卻是親人去世的消息。監獄借給他們一把鐵鍬，並叫他們自己去尋找親屬的屍骨，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將屍骨帶走——真是令人可怕，令人心碎，因為有時候挖出來的屍體還沒有完全腐化。

而對於犯人來說，不時死一個人，倒可以提高他們的糧食定量——至少有一天可以是這樣。如果犯人幸運的話，他們可以將死人的事瞞住看守，這樣死人的定量也就給保留下來了。曲扎醫生也曾從中受益。一天早上他醒來時，發現躺在他身邊的那個人紋絲不動，情況異常。他推了推他，仔細聽了一會兒，才意識到他死了。這時睡在他身邊的另一個人也發現了這一點。他們兩人都同意，用毯子將死者蓋上，但還露出了一些部位，並告訴周圍那些人——中國人來了時，也告訴了他們，說他病得太厲害，不能動彈。這時，他們就多得了一份飯，待到廚房工作人員走後，他們將這一份分吃了。

隨著死亡率的升高，藏人開始啃吃衣物。曾經用來捆綁從西藏帶出來的包裹的皮帶，他們也用石頭、鐵鍬將其按每天一份弄斷。幹活時他們口中就慢慢嚼上一根，但願可以恢復一些體力。對於小小的皮袋也是如此。曲扎醫生有一件上衣，襯裡是皮毛的，第一個冬天這件衣服給他添了不少溫暖，但第二年夏天他卻被迫吃掉它。他光吃毛皮。當冬天再次降臨時，他設法弄了少量的灌木，在炕下面點了一把火。他將這件衣服的剩餘部分一點一點地燒烤了。犯人在往返地裡幹活的途中，他們撿了一些植物——蒲公英最受歡迎，能吃多少就撿多少，從當地為數不多的幾棵樹上摘一些樹葉，打狗，捕捉昆蟲，挖洞找蟲子。特別是尋找一種蟲，它可以作食油，因為在他們的飲食中根本就沒有脂肪；這種蟲渾身白色，黃腦袋，犯人管它叫「瑪帕」，僅次於最好吃的食物，也就是糌粑拌酥油味道最好的吃法。

更為常見的食物來源是中國看守扔掉的廢品。一大群一大群的犯人，圍著扔在路旁的骨頭和果皮。那些先到的人就算幸運，他們慢慢咀嚼自己找到的這些東西，讓其能維持幾個小時。但是，這樣尋找食物所帶來的後果卻可能十分危險。一天，曲扎醫生被安排到監獄圍牆外的一個垃圾堆幹活，同他一起去的有一位名叫洛桑土登的舊政府低級官員。這裡地方很大，監獄的垃圾全往這裡倒，中間還混雜著人糞，然後再將這些東西運到地裡肥田。他們兩人一道將大糞鏟到大桶裡，讓同伴們再將它挑走。洛桑土登正鏟著時，見到一頭小死豬——是監獄工作人員飼養的——但幾乎全部腐爛了。當看守沒有註意時，洛桑將死豬拿到手，對曲扎醫生說：「我們應該吃了它，也許對我們會有所幫助。」他將死豬身上的大糞擦掉，將小豬撕開，看看裡面是不是還有一些可以食用的豬肉。肩部倒有一塊肉仍呈紅色，約手指那麼長。接著他決定它帶回監獄，吃晚

飯可以和青菜一起吃，美美飽餐一頓。曲扎醫生勸同伴立即將這塊肉吃掉。丹增曲扎醫生說，一方面他身體很弱，吃了肯定立即見效；另一方面如果在監獄大門口檢查時被發現，那就可能會引起麻煩。洛桑土登根本不聽，他反而將那塊豬肉裝進了自己後背的衣袋。結果正像曲扎醫生預先警告的那樣，當幾個小時後在晚上進行檢查時，肉被發現了。洛桑土登身上的這一小塊豬肉激怒了中國的監獄看守。當天晚上洛桑遭到威脅和漫罵；第二天上工時間推遲，在監獄的院子當中召開了全體囚犯參加的鬥爭大會。洛桑土登被帶了上來，五花大綁。監獄的最高長官憤怒無比，高叫：「吃這樣的髒東西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莫大污辱，是對國家的莫大污辱，找到什麼東西就吃，這是企圖直接與政府作對。這裡的條件和糧食定量都很好。我們絕不能容忍這樣的污辱行為，必須通過鬥爭會予以糾正。」「積極」犯人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像通常一樣拳打腳踢，「鬥爭」洛桑土登，重覆著那些對洛桑的指責。但過了不久，洛桑一頭倒在地上。後來，他不能行走，無法照顧自己，只好讓別人給送到了醫院。四天之後他在醫院去世，就是為了一塊一英寸半的豬肉。

雖然對犯人採取了這麼嚴厲的報復行動，但他們也沒有任何東西會再蒙受損失，因此幾乎仍是我行我素。有一次，一些中國犯人揍了廚房工作人員——這些人一個個吃得圓滾滾的，因為這些工作人員在離開廚房回家時，一藍藍的饅頭給帶走。這些犯人儘量抓了一些饅頭，邊跑邊吃；但當天晚上，一個不剩地都給查了出來，並受了懲罰。即使不去惹看守，也會招來殘酷的虐待，這也是常有的事。一天，曲扎醫生在上廁所，一名中國犯人也進來解手。他身體太弱，剛剛蹲下，就一頭栽在地上，口吐白沫，不能動彈。這時一名看守走了進來。他腳踢犯人，責怪他躺在廁所裡，一分鐘後他當場死去了。譏諷是看守所喜歡的罵人方式。曲扎醫生親眼看見過一名中國犯人被拽到田頭，看守們指責他「太懶惰，不想幹活」。他無精打采地動了幾分鐘之後，倒在地上就死了。又有一次，一些中國犯人被別人發覺在啃一隻驢頭，這隻驢頭也是在洛桑土登找到小豬的那個垃圾堆裡翻出來的。他們被銬上手銬，挨了一頓毒打，被帶到九百名犯人面前挨鬥。監獄工作人員開口就罵他們：「你們這些國民黨軍官，以前拼命壓迫百姓，現在你們居然想通過吃驢頭來污辱共產黨。這就是你們的死因，因為你們不懂得怎樣照顧自己。」曲扎醫生也挨過兩次鬥，都是因為在食物方面犯有「污辱行為」。一次，他在吃一個肥料堆裡的菜葉時被發現。另一次卻與他的學醫有關。作為藏醫醫生，他對植物的知識十分淵博，因此他總是悄悄地告訴犯人，地裡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當然這樣交談是不允許的，因而要擔負一定風險。被發現之後，他又遭到審訊，中國人指責他的行為是有預謀的，是有意與當局作對。這些當權人物從始至終認為，全體犯人「吃得很飽」。

然而人們對於曲扎醫生的建議迫切需要。犯人往往是得到什麼就吃什麼。有些東西並不怎麼危險，另一些則不然。一次，一位犯人設法找到了一塊羊羔腳骨，這塊骨頭上面沒有肉，但他將骨頭塞在自己的鋪蓋下，藏了一個月，每天晚上總要將骨頭拿出來美美地啃上幾口。元旦時，為了體現寬宏大量，宰了一頭驢子，供全體犯人享用。曲扎醫生的一位朋友曾是一位貴族家的管家，他注意到監獄工作人員將煮驢子的水倒在離廚房不遠的一個垃圾堆上；雖然這裡並不是廁所，但犯人仍常在這裡撒尿，整塊地方到處有一灘灘的尿水。曲扎醫生的朋友沒顧這麼多，他帶著茶缸跑步來到了垃圾堆，將表層的一些土弄到缸子裡，心想從中可以擠出一些煮過驢子的水來。他將浸濕的泥土拿到曲扎醫生面前，問醫生這些泥土對他是否有益。這位管家也像其他犯人一樣，晚上失眠，視力減退，耳朵總是嗡嗡直響——根據藏醫的觀點，這些癥狀都是因為「肺氣」上升所引起的，而這又得歸咎於飢餓。曲扎醫生認為，如果他能從尿水浸透的泥土中得到一些煮驢子肉的湯水，它就可以用來壓壓「肺氣」。他的朋友照此行事果然就好些了。但其他病例卻沒有如此見效。犯人的病情真是可怕，腸胃功能突然完全失調。有個犯人名叫甲村他巴，丹增曲扎醫生無法給他任何幫助，他的大小腸脹破後，就死了。在此之前的幾個星期，他不管青紅皂白，找到什麼野草就吃，不久就染上了嚴重痢疾，幾天之後大便中就夾有一種黏乎乎的像肉凍似的東西。接著，他拉出來的全是水。這時，無論他吃喝什麼，都要疼得失聲大叫，他感到疼痛不斷，無論液體固體食物，他都不能沾邊。兩天時間他捧著肚子，躺在炕上，尖聲大叫，然後就去世了。曲扎醫生推論，他的腸部內壁被哪些粗草刮去，這也就是他的大便中夾雜著黏乎乎的東西的原因。腸子反復被粗草摩擦之後，就會脹破——這時，他一喝水，水也就會進入腹部，引起劇烈疼痛。最後，當什麼東西都不能吃時，腸子的傷口就損壞了消化道，這就導致了死亡。另一個人叫德欽群培，由於腸胃中有一些無法消化的硬東西，使得括約肌開裂，丟了一條命。

儘管曲扎醫生知道哪些東西吃不得，但他卻無法長期忍下去。藏人抵達朱鎮監獄一周年那天，他也支撐不住倒在地上，被人送到了醫院——全體犯人都到過這裡，只是時間先後不同而已。在三個月的時間裡，他時斷時續地在這裡住了一段時間，也就了解到了自己牢房夥伴之外的監獄生活。這所醫院——只有一間房子——只是徒有虛名而已。除了一些外傷用的藥膏和助消化的中草藥之外，這裡幾乎沒有醫療設施和藥品。偶爾遇到犯人病情危急時，不是打一針葡萄糖，就是餵一茶缸胡蘿蔔湯。醫院醫務工作人員的主要職責是處理屍體，因為許多犯人都是在醫院裡死去的。醫務工作人員大部分也是犯人，

讓他們在醫院工作是對他們表現「進步」的獎賞。實際上，這項工作使他們獲益非淺。不僅他們不用下地像牛馬似的幹活，而且它的確給他們到來了一些額外的食物，因為他們總是將死人情況隱瞞不報，這樣就能夠繼續領取死人的那份定量。

醫院有所謂的醫生三名，全是犯人，但實際上只有一人是醫生，他也無能為力。其他兩人是朱鎮監獄僅有的女犯，她們兩人表現相當突出，屬於半釋放的，在監獄牆外居住的勞改隊。以前她們也在監獄裡面服過刑，但根據中國刑法規定，刑期未滿之前，她們也不能獲釋。因此，她們的地位只是提高到了「勞改工」這一級，獲得自由的期限總是向後推延。對這樣的勞改工不供應飯菜，他們必須像中國的老百姓一樣，艱苦勞動掙取「工分」，他們就可以拿這些收入去買定量糧食。在朱鎮監獄，這樣得人有八百至九百，他們大多數幹的是輕活，是在犯人們已經開墾的荒地上種植農作物。

這兩個女醫生其中一人富於同情心，沒有私心；另一個卻出於不得已，完全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模樣。這個心地善良的女醫生是基督教徒，無所畏懼；即使她挨過多次鬥爭之後，仍公然在脖子上掛著一個十字架。她盡力充沛，技術嫻熟，看守們常常依賴她，儘管她常常努力使看守們改變強迫犯人下地幹活的決定。她的關心是朱鎮監獄裡唯獨的人道主義行為。有一次親眼見到一名中國犯人，他已經臥床幾個月，渾身上下起了褥瘡。這些褥瘡感染之後，上面生滿了蛆。每天上午，她從監獄圍牆外來到牢房，坐在他旁邊，為他一條一條抓蛆。然後她來到廚房，從爐灶裡抓了一些灰，細心將灰壓碎，只留下很細的粉末。接著她將這些灰倒在一大塊布上，將這塊布墊在病人的背下，這樣，大量的蛆就掉了下來。這位病人最終還是去世了，但直到最後一刻，她都一直這樣照料他，為他減輕痛苦。

另一個女的叫王珍，她與那位男醫生一道是方興未艾的黑市中心。晚上，廚房工作人員給醫院送來了胡蘿蔔湯——醫生列了三個病人名單，每個病人可以吃到一個胡蘿蔔。廚房工作人員進來時，會大聲叫道：「胡蘿蔔湯來啦。」這時，曲扎醫生注意到，總是那三個藏人吃，而他們根本不是病情最嚴重的病人。當時他只能猜猜原因到底何在。監獄領導也感到懷疑，就將醫生與有關的病人叫過去，不久就查出來了，是病人用從拉薩帶來的鞋、一支德國造的鋼筆之類的物品賄賂了醫生。但在這一情況沒有公開揭露的很久以前，丹增曲扎醫生也捲進去了，他也注意到了這條新的生存渠道。

王珍的活動，遠遠不限於從她照看的病人那裡獲取這些小禮品。她的大部分活動，是為犯人以及勞動隊的勞改人員內部做交易牽線搭橋。不論成交的是什麼東西，她都要從中獲取不少實物作為佣金。犯人們弄到一些衣服來做交易，而勞改隊的人則想方設法額外搞到一些饅頭。為了防止偷種子糧，朱鎮監獄的看守，在將種子糧分給勞改隊的成員時，在上面要撒上毒藥，雖然採取了這一預防措施，但勞動隊的人每次還是得偷上一把，因為他們不會受到搜身檢查，然後就將偷來的種子糧洗一洗。他們自己吃，而將監獄廚房根據各自所得工分分給他們的饅頭保存下來，通過王珍進行交易。曲扎醫生送給王珍一套舊藏裝，羊毛已經磨掉了。作為回報，他得到了三十個饅頭：不運氣的是，這些饅頭由於加了腐爛的樹皮，而變成了紅色。王珍拿了其中五個作為對她的報酬，剩餘的歸他享用了一個月，每次拿兩三個。但無論從事這樣的黑市交易能得到些什麼，它仍然遠遠滿足不了生存的需要。因此，犯人們依然是能夠得到什麼就吃什麼。一天，曲扎醫生看到一個中國犯人在他杯子裡裝了一條長長的紅色蟲子。他通過一個能講漢語的藏族犯人問那中國人，他是在哪裡找到的這條蟲子。他說是在拉大便時拉出來的。他小心翼翼，唯恐看守發現，他將蟲子揀出來，用水沖了沖，從廁所帶回來，準備吃了它——當天他將那條蟲與其他吃的東西拌在一起吃下肚去了。

醫院也是審訊的場所。藏族犯人剛進醫院，安全官員就會跟著來到這裡，這些安全官員的任務就是審問犯人。他們的目的是雙重的。監獄的領導十分清楚，人們處於這種狀況最容易招供——飢餓能夠使他們獲得採用鬥爭拷打迄今無法獲得的東西，同時詢問也能幫助阻止犯人進醫院，這樣就可以讓他們整天幹活，完成勞動任務。

1961年初，丹增曲扎出了醫院，重新回到了幹活的行列。他的恢復不僅僅由於休息，而且也得歸功於他自己的治療辦法。他已經注意到了死去的犯人所共有的病癥：嚴重痢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輕度水瀉，但持續不斷；這樣在褲襠裡只好塞一塊破布。曲扎醫生明白，根據藏醫理論，消化力即胃部的熱力是保持健康的關鍵所在，消化力的水平不僅可以決定新陳代謝的好壞，而且通過決定新陳代謝的好壞，還可以決定三種體液機能是否平衡。但在朱鎮監獄，消化力受到雙重打擊：極度寒冷和進食不含脂肪以及無法消化的粗劣食物。為了增進消化力，曲扎醫生每天晚上悄悄地進行半小時的高級治療辦法——藏語叫吞莫巴扎，意即「升熱降熱」。當獄友入睡之後，曲扎醫生腦海中出現了純化一切能量的形象——是以白色光束的形式出現的，每次吸氣時，一直到肚臍下方還有充實的感覺。他看到了玫瑰花刺大小的三角形火焰，看著它順著他的背脊骨延伸，通過肚臍的能量中心，穿過腹部、心臟、喉嚨、頭頂，它燒掉了精神上的不純雜物，釋放出散發著花蜜芳香的一股光束，然後又順著原來的路線返回。這時，他會認為在監獄裡受的種種苦難被沖洗得一乾二淨，被光束中的無

窮歡樂取而代之。他回憶道：「起初，對所有這些只是想像而已。但過了五、六個月之後，身體狀況卻無疑有所改善，體內熱度有所升高。當時我身體虛弱，但我再也沒害過痢疾，也沒害過消化方面的疾病。此外，雖然我們經歷了各種苦難，但這一治療方法卻增強了我的勇氣。我再也不害怕了，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曲扎醫生回來幹活時最不湊巧，秋初以來，死亡率直線上升。這是炕上的空間比以前大一些——人們睡覺時可以翻身了，但由於牢房裡沒有生火，犯人仍只好擠到一塊取暖。冬天的氣候幾乎使人無法幹活。犯人盡量找些破布，用來纏手包腳，在看守的押送下，犯人們哆哆嗦嗦地來到荒地。在這種滴水成冰的季節，他們的墾荒任務仍和夏天一樣，沒有任何減少。手上的凍瘡似乎從未好過，即使是握一握鐵鍬，也會疼得令人難受。不過，每逢刮起所謂蒙古大風時，氣候倒幫了犯人的忙，大家偶爾可以休息一會兒。大風從騰格里沙漠吹來，飛沙走石，旋風將石頭和塵土扶搖直上吹向空中，遠看就像一根針，然後再直落到大地上。五英里外的朱鎮，首先發出大風襲擊的警報。鎮上的高音喇叭聲穿過田野，叫居民注意隱蔽，犯人們隱隱約約地也可以聽到。這時，看守發出命令，叫犯人撤到溝裡去，他們早就在工地周圍挖了隱蔽溝。犯人們可以在溝裡休息兩三個小時，除了上面吹下來的一些碎石和沙土外，其他倒沒有什麼幹擾，直到復工命令下達後休息才結束。

截止 1961 年春，原來的七十六名藏人已經死去了四十人。但更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頭。即使在監獄附近的農村地區，也無望逃脫饑荒所帶來的悲慘情景。朱鎮的人倒將希望寄託在監獄。第一個表明當地人也在忍飢挨餓的跡像是鎮上新來的兩個犯人，他們都是中國人。其中一個是矮個子，背微駝，他餓得受不了時，動手殺了一個八歲小男孩，並將他給吃了。儘管監獄內還沒有出現吃人的事情，但犯人們時而也為此開過玩笑。現在，倖存的那些藏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鷺鷹」——西藏天葬時，屍體就是餵給鷺鷹吃的。其餘那個犯人是個十八歲的小伙子，他殺害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就是為了她拒不給他九磅麵粉。

那年夏天，犯人在地裡幹活時，對朱鎮的生活進行了更為直接的觀察。一天，曲扎醫生在幹活，他抬頭看到了一大群小孩，他們手揹竹籃，朝一片地頭走來。他們年齡不等，全都一無所有——赤腳，骨瘦如柴，除了件破舊襯衣之外一絲不掛。過了一陣子之後，曲扎醫生才再次注意這些小孩，因為他聽到附近的一名監獄官員在指揮一隊看守，叫他們包抄這些小孩，將他們帶到監獄去。那天收工經過小孩去過的那片地時，藏人看到那年種的蠶豆全給刨出來了。後來藏人聽說，監獄看守問那些小孩是哪些大人派他們來偷蠶豆的，他們回答沒人派他們來，因為他們餓得實在受不住，就自己來了。監獄領導不願將小孩逮捕，將他們送回家去了。然而，看守對於這一明確無誤的饑荒表現卻十分敏感。他們對此火氣很大，甚至當一名犯人偷聽他們將這幫小孩說成是「人鳥」時，這名犯人也因為將這句話傳出去而挨了鬥。

不久之後，又發生了第二件事，這一次卻不容置疑。當時，曲扎醫生的那個組要到離監獄有一段距離的地裡幹活。到那片地裡去，他們必須走大路。如同中國的其他許多地方一樣，這裡的大路兩旁也是綠樹成蔭。一天，他們路經這裡下地幹活時，在一棵大樹旁遇見有一位年輕的母親，還不到二十歲。顯然她餓極了，臉上、身上浮腫很厲害。一個六歲的小孩和一個四歲的小孩緊緊地抓著她，孩子們淚流滿面。領頭的叫大家停下來，他問這女人要不要些蔬菜吃。這位婦女答道：「在這樣的政府領導下活著還有什麼意思，還不如死了好。我不需要你給我的蔬菜。」犯人們離開了她，繼續朝前走。翌日，他們又路經這裡，看到這一家幾口仍在大路上有氣無力地流浪。第三天早上，犯人們看見他們一個壓一個，躺在樹下，全斷了氣。

監獄也深深感到鎮子上的饑荒狀況的嚴重程度。曲扎醫生自己有親身體會。一天下午，曲扎醫生和一位名叫恰巴頓珠的同伴去上廁所時，他們遇到一個年輕的中國姑娘，她設法溜進監獄。她瘦得皮包骨頭，但患有水腫病，一頭淡黃色頭髮，毫無光澤。她見到他們之後，乞求他們給點吃的。他們想辦法給她弄到了一點蔬菜和水，看著她吃。但她剛剛開口吃，鼻孔裡就直冒鼻涕，並痛苦地失聲大哭——這是極度飢餓的跡象。廚房工作人員聽到動靜之後，將她領到廚房，給了她一個雞蛋大的饅頭，然後將她打發回鎮上去了。第二天，他們的施捨所引起的後果暴露無遺。當犯人穿過監獄去幹活時，他們看到一大幫朱鎮的男男女女在監獄圍牆外，爭先恐後地要進來討取食物。接著是一場混戰，直到看守動用槍托揍人，將他們往後趕，這些鎮子上的人才落荒而逃。

雖然監獄內的形勢每況愈下，監獄外一片混亂，但那些中國監獄官員卻從不偏離自己政策的軌道。犯人已經死去了好幾百人，但仍在繼續實行槍決——這一直是這個監獄的特點。中國人從來不明確提出死刑者的罪行。那些將被處決的人的名單就寫在一張佈告上，貼在監獄牆上，這樣的事常有，邊上只有一些諸如「頑固」或「舊腦筋」之類的說明。當死刑已經執行後——死刑不是公開執行，而在其他監獄卻是這樣，遭到處決的人的名字邊上就得打上一個紅叉，佈告要貼一段時間，

作為對其他犯人的警告。接著，在晚間的會議上，那些官員又得老調重彈，說：「反革命殺一個少一個，殺兩個少一雙。如果反動派全部消滅了，那麼老百姓就十分滿意。」

每年的三個節日期間，都要進行宣傳演出，從不間斷。一個節目描述日本侵略中國的失敗，另一個歌頌艱苦奮鬥的美德，第三個——對這個節目人們興趣最濃——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藏人旁邊站著一位藏語翻譯，節目在高高的舞台上演出，背景的幕布上用已經去世了的喇嘛的長袍縫製的。舞台上出現一個代表美國的人物。他身一套米色服裝，頭戴一頂黑色大禮帽，炫耀自己高高的紅鼻子，爪子像鷹一樣銳利，還有一條尾巴，尾巴上吊著一條布，上面用漢字說明了他的身份，並聲稱他是「核大國」。他雙手抱在胸前，就像準備猛撲上去的貓一樣，四處剝削非洲人。這些非洲人是犯人演的，他們按照黑人模樣化了裝。非洲人經受了大肆殘酷壓迫之後，在中國人民的幫助下，終於在一次光榮的起義中征服了壓迫者，將美國人也鬥了一場。鬥爭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了。

藏人來到朱鎮之後的第三年，情況突然發生出乎意料的好轉，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北地區的監獄都是如此。根據一位曾先後在五個勞改營待過的倖存者說，囚禁在蘭州北面地區的藏人約有七萬，1959年至1961年期間三萬五千人死於飢餓。六十年代初期，青海和甘肅的死亡率很高，犯人只好經常轉移，目的是讓這些監獄能發揮其勞改營的作用。距西寧西面十小時路程的地方有個叫衛波⑦的大監獄，轄有三十個勞改營，共有囚犯三萬人，大的勞改營關押九千人，小一點的則七千、五千、一千不等。其中百分之十是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其餘的為漢族。當饑荒結束時，從內地派來了一些中國官員進行了人口統計，他們報告說有一萬四千人死亡。另一個監獄叫班查扎新區⑧，轄下六個勞改營，三英里長，關押了一萬兩千名犯人，其中多半也餓死了。朱鎮監獄的倖存藏人只有二十一人，剛來的時候需要三間牢房，現在只要一間就足夠了。那年初，押送藏人來朱鎮監獄的那四名安全官員，又從他們的拉薩機關來到了這裡。他們得到了四十五本封好的檔案材料，其他檔案材料也很完整，這也是預料之中的，因此中國人斷定從藏人手裡再也得不到更多的東西了。審判停止了，「再教育」課也降了溫，鬥爭會也大大減少。倖存的藏人轉移到了監獄一角三間相連的牢房。從正面的門進去是一個走道，左右各一間牢房，每間可以關押十個人。晚上門也不上鎖，這樣犯人上廁所時也就無人看管了；自從藏人關到這裡以來，這樣小的放鬆也還是第一次，它給藏人首次提供了相互接觸而又不受監視的機會。人與人之間的障礙消除了，相互猜疑也沒有了，犯人們為失去同伴而相互安慰，再次滿懷希望地談論達賴喇嘛以及跟隨他逃往印度的成千上萬藏人。新的寬容政策還體現在糧食定量增加方面。中國的饑荒年代結束後，犯人的每月糧食定量增加到十六磅半——在正常情況下，這也是不能再少的了，但對於犯人來說，卻無異於大吃大喝。1962年元旦那天吃了一頓豬肉湯，每個犯人的份菜還真有幾小塊豬肉——這是他們兩年半以來第一次嚐到豬肉味道。新牢房出人意料也給藏人帶來了一些好處：他們獲準可以在秋收後保留一些麥麩，還可以保留一點火柴，這樣晚上他們就可以在土炕下生火。有時候，碰上運氣好，他們在房間裡還可以打到一隻老鼠，燒了就吃。老鼠在天花板上的屋樑之間和糊著報紙的天花板裡到處亂竄。不久之後，藏人公開捕捉老鼠。每天晚上，老鼠在報紙裡跑來竄去，他們則手拿長棍，目光隨著它們的腳步聲跟蹤，在下面等候。如果將棍子朝上打得又準又猛，是可以打到老鼠的。儘管打著老鼠，美餐一頓的時候不多，但它們畢竟為藏人提供了一些肉食。

飢荒高潮過去之後，死亡率迅速下降。兩年內，朱鎮監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犯人總數的大半。大部分中國犯人遷到青海、新疆的其他地區，在那裡他們的勞動對國家用處更大。他們走後，剩下的藏人糧食供應也就多多了。

監獄裡空出來的牢房供廚房工作人員存放白菜、白蘿蔔和胡蘿蔔。剩下的犯人得知這一情況後，就開始晚上去偷。一天晚上，一位名叫土登鄧珠的犯人輕輕踢了踢曲扎醫生的腳，耳語道：「是我們去偷白菜的時候了。」他們帶著一個枕頭套、一條褲子，褲角下方用繩子紮上了，偷偷溜出了牢房。他們摸進了附近的一間儲藏室，然後等一名中國犯人上完廁所又回去之後，將他們帶來的枕頭套和褲子灌滿了白菜，接著又趕忙溜回自己的牢房。他們將偷到的東西藏在自己的鋪蓋下面。翌日他們下工後，一名看守將曲扎醫生叫到一旁，他帶著威脅的口吻說：「告訴我你搞了什麼名堂。」曲扎醫生明白偷竊是要槍斃的，因此他回答說他什麼也沒幹。接著看守命令他進牢房看看，不僅他的鋪蓋給翻過來了，其他人的鋪蓋也全都是底朝天。他和土登鄧頓珠偷來的白菜四周有更多的白菜、胡蘿蔔和白蘿蔔。很清楚，大家全偷了——這樣倒無法給予懲罰。儘管現在糧食充足，但任何東西都可以在黑市上換幾個饅頭，好笑的是這倒招來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偷竊風。白天，經過中國人的許可，一些犯人留下來看管同房間犯人的東西，他們就藉此機會潛入隔壁的幾間牢房去偷。甚至住院病人也從病床上爬起來，希望能偷點什麼東西去作交易。夜幕降臨後，犯人就偷偷留出自己牢房，到別人房間去偷東西。牢房之間發生格鬥，相互打伏擊，甚至發生了打群架的現象。藏人從監獄倉庫直接偷糧時，他們就將一把把的糧食藏在鞋襪裡，還在襯衣上縫了口袋，做了一些又長又小的袋子，將袋子吊在褲子裡的大腿上，當彎腰撒種時，就可以偷偷地灌滿袋子。

到 1962 年秋季時，朱鎮監獄只剩下了三百名犯人。有謠傳說，從拉薩來了一些人。9 月 28 日，官方發表了講話。一位中國官員對排列在面前的二十一名倖存的藏人說：「你們已經教育改造好了，因此我們決定放你們回去。」他手里高舉著一個氧氣袋(中國人在西藏就用這種氧氣袋)繼續說：「你們看，我們為你們可盡了力量，花了不少錢，我們買了五個這樣的氧氣袋，每個二十元，這樣當你們在途中經過高山山口時，就不至於把命給丟了。出發之前，讓你們放假休息。」他建議大家：「乾乾淨淨洗一洗，但不要損壞你們用的臥具，不要撕毀，也不要燒掉，臥具還的留在這裡。」

整整一個星期，犯人們即激動又懷疑。預定出發的頭一天晚上，一位官員給他們帶來了新衣服，這些新衣服是用已經死去的犯人的服裝縫製的。衣服裡的棉花重新鋪平了，然後上面再套上了新的粗棉布。朱鎮監獄的領導似乎對藏人的外表很關心，因為現在要將他們交給其他人去看管了。1962 年 10 月 5 日上午八點，一輛帶蓬布的軍用卡車駛入監獄院子。藏人手提小包袱，走到卡車前，身體強健一些的犯人幫助體弱犯人爬上了軍車。他們要走時，監獄工作人員向他們揮手告別，高聲叫道：「你們終於要回家了，注意身體，要好好照料自己。」藏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通過翻譯他們回答說：「非常感謝，我們一定照辦。」接著，汽車發動了，他們憋住氣，低聲咒罵，就這樣邊揮手，邊咒罵，藏人乘車穿過大門，踏上了駛離中國的征途。

曲扎醫生從朱鎮監獄釋放十五天後，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對於中國來說，迄今為止這場戰爭是對它在西藏多年努力的最大報償。1959 年之後，人民解放軍抓緊鞏固其地位，準備最終進攻印度，北京認為這對於它努力向中亞地區施加軍事影響，進而施加政治影響至關重要。完全是由於對藏人的強制勞動，才建成了一片公路網，將分別設在喜馬拉雅山脈邊境地區的昌都、日喀則以及日土的人民解放軍三個前線司令部連結在一起。公路一旦修好之後，還必須修建觀察陣地、機場、基地、給養倉庫等，而且這些工作得在夜間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正當在抓緊進行準備工作時，從藏南和藏西征用了數千名藏人，增援運輸給養的當地民工。與此同時，留在後方的人晚上學習時，當局告訴他們印度佔領了西藏最好的地區，迫使人民解放軍為人民收復領土，這是人民解放軍的神聖職責。增援部隊和給養源源不斷地從中國運送到西藏，這樣給西藏經濟也就進一步增加了負擔，大部分的收成不得不用來供養新抵達的部隊。戰爭打響之後，藏人才面臨戰爭的殘酷局面；獻血成了義務，雖然抓獲的印度戰俘有三千人左右，但從大肆動員人們輸血這一點來看，中國人也蒙受了傷亡。當時的政策是儘可能地要求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人獻出正常情況下抽血的一半。抽血的主要對像是那些「階級敵人」，中國人自己卻可以不獻血。起初，當局聲稱對於自願獻血者，可以獎賞二十五元錢(約相當於十二點五美元)、半磅酥油、一磅肉，但仍無藏人自願報名獻血，因此對大批藏人採取了強行輸血措施。結果，很多已經餓得瀕臨死亡的藏人，也就因為獻血而最後完蛋。只有一些藏族幹部才能得到那些獻血獎賞。在拉薩布達拉宮東北面的多登(9)新建了一個血庫，人血、動物血都儲存，許多前線的中國重傷員最終就送到了這個地方。

六十年代初期的輸血是當時的殘酷運動之一，而許多人認為，絕育和強迫藏族婦女嫁給中國軍隊的官兵則更為嚇人。藏族幹部是「群眾的帶頭人」，因此他們率先絕育，手術地點是拉薩市人民醫院⑩。這所醫院建於 1952 年，它是「醫學和少數民族醫務工作者的研究與培訓中心」。為了使盡量多一些的藏人絕育，一些仍在校學醫的中國學生經常為藏人動手術。許多男女幹部動過手術之後，腹部以下全無知覺，或者小便失禁。有些人被送進醫院之後並沒有告訴她們，結果她們發現動手術時也給絕了育。藏人看到這些情景之後，抵制絕育。當這種計劃生育的辦法逐漸停止實行之後，又做了一場更為廣泛的宣傳，動員藏族姑娘與中國軍隊官兵結合。(藏族男人絕對不允許娶漢族姑娘為妻。)六十年代初期，幾乎全部中國佔領軍官兵都是 1950 年部隊入侵時進藏的。當時他們是年輕小伙子，但十多年時間沒有休假，雖進入中年，但仍未成家。通過鼓勵他們與藏族姑娘結合，這就有利於提高部隊士氣，但這很顯然也有助於進一步推行北京的全面同化政策，因為通婚產生的後代都將作為中國人撫養。對漢——藏夫婦進行了廣泛的獎賞——包括炊具、額外供應的糧食定量和服裝，在當時那種令人絕望的條件下，的確也促成了不少對。許多藏人私下譴責那些與中國人合作的藏人，這完全是為了逐漸同化藏族。不過在公開場合，恥辱卻落到了中國人頭上。每當人們聽說藏族嬰兒問世，就總要引用中國的一句俗話：「天下烏鴉一般黑。沒有白的。」意即只有中國小孩才會是「白」烏鴉，也就是吉祥之兆。

1962 年戰爭之後，印藏邊界及其附近地區總是保持著緊張局勢。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崗」遊擊隊重新進行了組織，並加速了進攻步驟。一方面人民解放軍面對著敵對的印度，儘管這支軍隊給打怕了，另一方面人民解放軍對遊擊隊憂心忡忡。此外，儘管對邊界進行了嚴密封鎖，但在夏季那幾個月，仍有幾百名藏人設法逃到境外，帶來了在中國人統治下所經受的各種苦難經歷。1964 年 7 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公佈了一項政策，在西藏的各大城鎮四處張貼，為的就是解決這一問題：對於外逃印度投誠歸來的藏胞，對於參加叛亂投誠歸來的遊擊隊給予重獎；對於攜帶回來的各種武器和投誠歸來的藏人分別規定了獎金，獎金數目因人多人少也各不相同。拉薩的廣播電台也不斷廣播外逃人員家屬的請求信，懇求外逃人

員回到「社會主義的天堂」來。混入噶倫堡、大吉嶺以及尼泊爾的各西藏社團的特務分子也引誘那些一無所有的難民，擔保他們回家之後一定會生活富裕。有些人也真的回來了。其中最顯要的人物是多吉帕姆，她是西藏地位最高的女活佛，中國人立即將她也納入了「上層」統一戰線。但其他人並不多。與此同時，西藏境內的有關家庭被告知，他們有責任勸其親屬返回西藏，如果勸返不成功，他們將會受到懲處。為了清楚地說明這一點，經常引用一句新造的中國諺語：「跑了喇嘛跑不了廟。」

1962年至1964年期間又實行了四項政策，導致了西藏自治區的成立。第一個是「民主改革復查」，它始於1960年，在農村搞了好幾年。「復查」的目的是為了弄清楚是不是所有的反動分子和「階級敵人」在民主改革中查清了。其必然結果就是要為西藏建立一個獨立的監獄、勞改營體系，共有四級，歸拉薩的公安廳管轄。根據有些藏人說，發現的反動分子實在太多，只好確定指標，將逮捕人數限制在當地人口的百分之五，但這一點從未得到貫徹落實。考慮到境外藏胞的情緒，採取了第二項政策，叫作「穩定發展」，它包括一個有九十六項內容的計劃，於1962年至1963年期間公佈，在全區實施，其中十點特別針對邊境敏感地區。在這裡，人們的自由程度更高，免稅，糧食定量也更高。1963年至1964年期間實行了第三項和第四項政策，分別為「三大教育運動」和「四清」。第一大教育是「階級教育」。中農現在分為上中農和下中農。如果是上中農，那也就是出身不好，它會導致挨鬥，常常是進監獄。同時，「下中農」和貧農則要接受「思想教育」——一切具有舊思想的人都被當作階級敵人。因此，西藏社會的每一階層都有許多反動分子——幾乎無一倖免，只有中國人及其合作者是例外，他們代表了「作為革命先鋒的廣大群眾」。第二大教育是「社會主義改造教育」。從理論上說，它的意思是要「變自私為無私」。它的目的是為了清除對互助組以及逐步提高的合作化的最後障礙。第三大教育為「科學技術教育」這無外乎是一場宣傳攻勢，旨在推行人民公社化。在這場教育中，搞了一些樣板公社，給他們提供了現代化設備、肥料、種子以及農具。最後的運動是「四清」——清思想、清歷史、清政治、清經濟。它統一了黨對西藏歷史的正確說法——例如黨認為，西藏歷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某層單位，負責貫徹執行一系列激進政策的是藏族幹部。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整數在六千至八千之間；到八十年代末期（11），替中國人幹活的藏族約八萬人，其中三萬曾在中國內地受訓學習。他們是藏族中的佼佼者——在五十年代中期，藏族兒童常常是自願離鄉背井，因為他們被現代世界所引誘，而在他們眼中那就是中國，他們迫切想去看看「人們不用走路」，「路明如鏡」的國家。他們就學於創辦不久的中國各民族學院，是作為第五縱隊培養的，目的是讓他們最終取代當地的「上層」領袖人物，而當時還不得不暫時利用這些上層人物。中國在第五縱隊身上寄予了無線希望。

五十年代這段時間，藏人進入學習的學校有十七所，其中大多數在中國西部，位於北京城西的中央民族學院位居榜首。該院院址舊時是一處墳場，宿舍、禮堂和教學樓是整體式混凝土結構，四周有一些五彩繽紛的花園，院內到處種有鬆樹和柳樹，該院設置的課程儘管包括科技、數學，早期還開設繪畫和音樂課，但大量時間是用於漢語和馬克思主義的教學。地方上的民族歌舞受到鼓勵提倡。新疆來的高加索學生允許穿戴自己的民族服裝，每逢節慶場合，藏族學生也可以領到新藏裝。中央民族學院的社會生活各種各樣，十分活潑，經常去北京城外郊遊，參觀天文台、動物園、故宮；星期六晚上放電影，可以展開各種體育活動，包括足球、籃球和田徑運動。因此年輕藏人此刻為自己所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期待最終返回家園時，在西藏新的社會制度下成為領導人物。

1959年否定了自由的「百花齊放運動」——在此期間，毛澤東鼓勵知識分子公開對黨提出批評——之後，中國共產黨自己堵死了實行成功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大門。接著而來的「反右」運動將中央民族學院的所有自由傾向全部扼殺了。當時激進的左翼掌權，第一次鬥爭浪潮降臨在學生頭上。該院的院長皮少東（12）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食堂、教室以及宿舍全都貼了大字報，批判他那套自由的「小資產階級管理」辦法，大字報惡語傷人的新辦法對堅持那一套的人予以批判，指責他們是「吃人民血汗的蠢豬」、「人身蛇頭的傢伙」、「脫離群眾」。郊遊、舞會以及佛事活動全部取消。為了形成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每月給予學生的津貼減少四分之三，新服裝也不再發了，糧食嚴格定量。共青團的「積極」幹部強迫同學們進行自我批評，內容無所不包，從穿皮鞋、緊身褲到過去看過的電影和戲劇。隨著這種壓制活動的進一步升級，藏族青年本來對共產主義的同情也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相反的東西——他們成立的地下組織。各個小組利用運動隊和樂隊作掩護，諸如「耳」會和「鼻」會的組織張貼了大字報，用他們自身的馬克思主義詞匯譴責當權人物。在其他民族學院，也出現了相類似的組織——有時甚至是以公開的形式，如甘肅的西北民族學院就是如此。在該院，五十二名漢族學生和十八名藏族學生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公開衝突中傷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地下組織的成員很快就暴露了身份，在學院的食堂裡舉行了一系列的鬥爭會，對他們進行鬥爭。大躍進於1958年展開，在少數民族學生當中又進而開

展了一場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運動，估計中央民族學院百分之六十的藏族學生挨過鬥——其中一些就在挨鬥的過程中死於朋友之手。

1959年3月20日深夜。中國教師叫醒了中央民族學院的一千名藏族學生，叫他們去各自的教室集中。他們第一次聽到了拉薩叛亂的消息。藏族學生得到了給家里人寫信的命令，要勸說自己的親屬和朋友不要參加叛亂。根據他們自願採取行動的不同程度，立即將藏族學生分成了三個類別。到五月中旬時，首批兩百名藏族學生作為先驅派往西藏，這是為了匆匆忙忙地建立起一個新的官僚機構。1959年夏季期間，從中國的各民族學院派遣回藏的藏族學生約三千五百人。在離開學院之前，他們領取了連衫褲工作服、帽子、帆布鞋和毛毯——在當時普遍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這些物品價值極大。他們在告別故土多年後返回了自己的祖國，但卻打上了統治階級的烙印。

實際上，中國徵用的大部分這些工作人員反漢傾向十分嚴重。因此，一方面中國必須依賴藏人來治理西藏這個國家，另一方面這個實際上扶植了那些即將成為剛剛興起的地下組織頭目的藏人。這些幹部十分瞭解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行政管理程序亦非常熟悉，因此他們一邊學習如何執行上司的命令，一邊謀求加官晉級，這樣也就可以有效地破壞政策的製定與實施。二十五年來，在中國境內受訓培養的幹部與在西藏工作的兩個幹部集團聯成一體。第一個幹部集團是真心實意幫助中國的藏人——他們是當地的「積極分子」，出生貧苦，他們是在實行民族改革以及貫徹執行後來的政策時，被中國人看中當上幹部的。截至1965年，這樣的幹部人數已達二萬人。由於他們忠心耿耿，所以他們可以在工廠，學校，部隊以及政府各個部門挑選自己的職位。但藏族人民蔑視他們，「罵他們是像瘋狗一樣的獅子」。第二個幹部集團卻恰恰與第一個相反，對他們進行選擇時並不嚴格，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們參加了各種短訓練，二個月至六個月不等。他們學習的內容幾乎全部都是他們今後必須貫徹執行的革命思想。不少人被迫離開他們的村莊，而他們對中國人的公開仇恨常常使他們深陷囹圄。但製造最大麻煩的卻是這幫中國培訓的各級官僚。他們擔任教師、護士、拉薩的廣播電台和《西藏日報》的記者，他們總是給中國人製造麻煩，而儘管中國對他們懷有疑心，但仍然依靠他們去開展工作。到1962年時，被解僱的不可信賴的新幹部人數高達近三千名。然而，截至1965年底中國人使用的藏族幹部達到三萬至四萬人，但他們在各級政府中沒有決定權，從職位最高的藏族合作者到表現最差的積極分子無一例外：藏族幹部必須向一名漢族黨員直接請示報告，按指令行事。經過六年的努力之後，儘管這套官僚還搖擺不穩，但他已經成了一個可行的官僚機構。經過長時間準備即將正式成立的西藏自治區就是以這個官僚機構為基礎，以所謂的選舉——按照這一選舉規程，各級行政官員即獲選「走馬上任」——為基礎。唯獨存在一個障礙——正如譚冠三將軍和張經武將軍所描述的那樣，他是通向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的攔路石；好笑的是他卻又是西藏的傀儡政權的最高領導人物，是與中國進行合作的最高人物，他就是班禪喇嘛。

雖然中國人表面上對班禪喇嘛的合作態度未表示過懷疑，但早在1958年就已經出現了裂痕跡象。當時，儘管有謠傳說班禪喇嘛的父親向「四水六崗」提供了武器和馬匹，但近期中國人並無採取報復行動的打算。但兩年之後的1960年12月末，班禪喇嘛正在北京作《關於去年西藏工作的報告》時，人民解放軍包圍了他的住錫寺院——日喀則扎什倫布（它是唯一沒有進行民主改革的寺院），抓獲了寺院全部四千名喇嘛，其中有些人包括在三個月後的3月21日遭到公審的十名藏人之列，他們被指控參入叛亂。有些人——其中包括該寺一些聲譽最高的學者和活佛——由於擔心也會遭此厄運，自殺身亡。該寺剩餘的其他喇嘛，全被弄到格爾木和查拉卡布進行強制勞動改造。

對扎什倫布的破壞，深深震動了班禪喇嘛。1960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他與中國人的合作似乎出現了更大的裂痕，當時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屬下的班禪堪布會議廳被解散。日喀則的行政管轄權原屬班禪堪布廳，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日喀則城進行了自治管理，而在其他地方就不能這樣做。儘管對為什麼要採取上述步驟沒有進行任何解釋，但藏族幹部卻十分清楚，1959年之後班禪喇嘛逐漸對在西藏掌權的那幾位中國將軍越來越不順從。除了要求對在拉薩平叛戰鬥中損壞的宗教文物進行修復外（班禪喇嘛親自捐錢，對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內的壁畫進行了修復），他還下令將布達拉宮內的一些佛像轉移到扎什倫布寺，這樣藏人對佛像妥為保管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此外，他對佛教的支持還不僅限於保護聖物。班禪喇嘛在休池林卡的新居仍繼續接見善男信女，向他們發表講話。在他講經時——參加者高達幾千人，總是要提達賴喇嘛是西藏的真正領袖。他反復說，西藏的發展必須由藏人來領導，因為漢族只是在西藏協助他們而已——這句話特別令人惱火，但由於它是毛澤東講過的，因此也無懈可擊。

1961年年底時，班禪喇嘛公然與中國人唱對台戲。9月下旬，班禪喇嘛及其隨行人員應邀上北京參加國慶十二週年慶祝活動，在西藏境內，成千上萬的人們正在死亡線上掙扎。拉薩和日喀則兩地死氣沉沉，沒有商品，沒有商業。寺廟遭到破壞，勞動隊遍布農村。囚車和自由工在簡易公路上艱苦勞動，從他們身邊駛過的是一隊隊綠色軍車，運的是西藏收下來的

農作物和西藏的宗教財富，駛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拉薩人一無所有，扔下手中的活兒，當班禪喇嘛離開拉薩城時，他們聚集在一起懇求大師向中國要求提供糧食和醫療保健。他們的懇求激起班禪喇嘛採取行動。他剛剛抵達北京，就向毛澤東遞上了萬言書，描述了西藏目前的形勢，其中也轉達了拉薩人民要求多給農民一些糧食，照顧老弱病殘，真正實行宗教自由，停止大批抓人。毛澤東叫班禪喇嘛放心，這些建議一定會受到關注。為了說明好意，在西藏全境印刷和發行了小冊子，說毛澤東已親自答應了班禪喇嘛的請求，情況很快就會得到改善。

1962年初，班禪喇嘛返回西藏時發現情況依然如故。張經武將軍告訴他，北京所講的和西藏所幹的完全是兩碼事。作為西藏黨的高級官員，張將軍說對那些要求不予理睬，而且他倒向班禪喇嘛提出了一個要求。他說他們已經作出決定，鑒於達賴喇嘛已向聯合國發出呼籲，鑒於他在國外重新組建了西藏政府，今後不再提達賴喇嘛受到了反動分子的劫持。班禪喇嘛必須公開譴責流亡在外的西藏領袖，這樣就可以將他頭銜上的「代理」二字去掉，讓他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就可以戴上西藏首腦的桂冠，移居布達拉宮。班禪喇嘛公然拒絕，說任何企圖取代達賴喇嘛的努力只會激怒藏族人民，這樣也就會妨礙實現這一行動的目標。緊接著中國人立即嚴禁班禪喇嘛公開發表講話，只有在正式場合他才和大批其他人一起露面。為了進一步說明班禪喇嘛地位的變化，扎什倫布寺留下來的看管寺院的喇嘛被指控犯下了五條罪狀——包括窩藏達賴喇嘛肖像，在日喀則人民面前公開對他們進行了鬥爭。

兩年之後的1964年，班禪喇嘛從新露面，這次為時很短，但卻意義重大。由於班禪喇嘛所採取的行動，他在藏族人民當中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在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之前，張國華將軍被迫澄清自己的立場。因此，班禪喇嘛也獲得了最後一次改變其頑固立場的機會。中國人再次要求他譴責達賴喇嘛，這次是要在傳昭大法會的一次慶祝大會上發言。傳昭大法會以前要持續三個星期，這一次只給了一天時間，而且是專為讓班禪喇嘛講話才這樣安排的。

集會於3月份舉行，與會者一萬多人。班禪喇嘛坐在大昭寺南側俯瞰拉薩大廣場的高高寶座上，像以往一樣，他再次呼籲實行宗教自由，西藏的發展要依靠西藏人民。接著，在中國人期待他譴責達賴喇嘛是反動派時，他停頓了好一會兒，俯視下面的人群。可以聽到他嘆了一口氣，然後接著說：「神聖的達賴喇嘛被劫持到了外國。在此期間，如果達賴喇嘛安然無恙，是符合全體西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為，只要達賴喇嘛安然無恙，西藏人民的吉祥之源就沒有枯竭。今天，藉我們大家聚會的機會，我申明自己的堅定信念：西藏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重獲獨立，神聖的達賴喇嘛一定會重返寶座。神聖的達賴喇嘛萬歲！」

3月叛亂之後已經差不多五年過去了，中國人對班禪喇嘛如此大膽地公開與他們作對十分惱怒，將他軟禁起來了。張國華將軍和張經武將軍乘飛機抵達北京，直接向毛澤東、周恩來請示該怎麼辦。他們於7月返回西藏，發起了一場「徹底粉碎班禪反動集團」的運動。在運動前期，人們只是列舉了班禪「對人民犯下的罪狀」的證據。厚厚的捲宗記錄了目擊者們證實的各方面罪行。當完成了記錄罪狀的捲宗的收集整理工作之後，三百名藏族幹部——其中包括地位顯赫的諸位愛國上層人士，如阿沛·阿旺晉美、多吉帕姆——集中於拉薩。在他們抵達首城拉薩之前，他們被告知，將他們集中起來是為了批判某些「主要的反動分子」，最近他們與祖國為敵的陰謀才被揭露。他們的頭就是「通向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的大石頭」班禪喇嘛。張國華將軍後來告訴這些與中國合作的人們，班禪喇嘛組織了一支地下游擊部隊與中國對抗。這些幹部受命搬去這塊攔路石。

對班禪喇嘛的審判於1964年8月在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新建的一座禮堂（舊禮堂被破壞者一把火燒得一乾二淨）裡進行，持續了十七天。張國華將軍和張經武將軍坐在舞台上一條長桌的正中，班禪喇嘛被夾在中間。張國華首先作了長篇講話，他暗指班禪喇嘛的錯誤行為，列舉了尚未明確的「反動集團」的叛國罪狀。結束講話時他說：「如果人們緊捏蛇身，一定可以將它的五臟六腑全擠出來。」——這是預先安排好了的一系列批判發言開設的信號。愛國上層人士之一——帕巴拉·格列朗傑對班禪喇嘛歷來私怨甚深，他率先譴責班禪喇嘛。他說：「犯下了大錯誤，責任在班禪。因此我批判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班禪。」張國華將軍接過話頭，站起來說：「這是對班禪的嚴厲批判。在這次會議上有必要揭露這些錯誤。」接著會議分成若干小組，每一組由一名有準備的幹部牽頭，在組員們仔細考慮時，他則在「揭露大石頭」犯下的罪行。

第三天，會議氣氛變得十分激烈。張國華將軍重複了關於蛇的比喻，他說：「如果人們緊捏蛇身，一定可以將它的五臟六腑全擠出來。但置蛇於死地，就要擊它頭部。如果我們通過鬥爭會來緊逼班禪喇嘛，許多隱藏的反動派和國家的敵人就會自行跳出來。如我們置班禪於死地，全部發動集團就會土崩瓦解，如同一棟房子的基礎被摧毀了一般。」幹部們從座位上一躍而起，開始打耳光、拳打腳踢班禪喇嘛，拽著他的頭髮（原文如此——編者）將他拖到了舞台正中。大多數與會者看

到西藏職位最高的活佛之一的班禪喇嘛居然遭到藏人毆打的情景，實在心中不安。無論別人怎麼動員，他們就是不忍心上去動手。見此情景，一幫事先指定的贊同者，列舉了班禪喇嘛的十大罪狀包括殺人、與他兄弟的妻子同居、縱酒狂歡、偷竊寺院佛像等。但最嚴重的罪行是說班禪喇嘛組建了一支遊擊隊，接受了機槍射擊訓練，此外還有一支二十人的騎兵小分隊。指責班禪犯下這一罪行的根據是他利用了日喀則的一所學校為班禪堪布會議廳培養幹部，這所學校由中國人始建。

1959年，這所學校改成了一所工業技術學校，開設了木匠、汽車修理以及鐵匠等課程。現在它被說成是一個「地下工廠」，學生在這裡生產武器彈藥，以備將來發動起義。展出了兩輛進口汽車，上面另外還加了油箱（在西藏行車這種情況司空見慣），企圖讓與會者相信，班禪喇嘛至少計劃逃跑（這也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當時所有公路上大型車隊很多，檢查站更是不少）。至於說到騎兵：一些年前，別人送給班禪喇嘛二十四匹蒙古馬作為禮品。他非常喜歡這些馬。有空時，他還幫助馬夫遛遛馬。就是靠一支這樣的騎兵他能去攻打祖國嗎？

班禪喇嘛對於所有指控一概駁回。他反復說，儘管在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工作期間他可能犯了錯誤，但每當決定問題時，他總是徵得了張國華的同意——這句話更為激怒了張國華將軍。與此同時，班禪喇嘛上年紀的佛師古曲仁波齊，企圖為班禪喇嘛承擔那些「罪狀」的責任。他說，班禪喇嘛很小時，他就親口告訴他「共產黨是魔鬼」對此班禪喇嘛在審判時明確加以否認。但是他的佛師和管家後來還是被送到了格爾木，他們死在那裡。

鬥爭結束後，張將軍徵求大家意見該給予什麼懲罰：槍決、流放、判刑，眾說不一，但實際上他的刑期早已決定。張將軍贊揚了在班禪喇嘛的大肆挑釁面前，共產黨仍然寬大為懷，他告訴與會者班禪喇嘛不會遭到處決。審判之後，班禪喇嘛，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剩餘隨行人員被戴上腳鐐手銬，給攆進了密封的卡車，在重兵看守下離開了拉薩城——他們的目的地無人知曉。直到12月17日——四個月之後，在第一百五十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從北京傳來了消息。這時，中國人首次公開譴責達賴喇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叛徒，撤銷了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職務，指責達賴喇嘛「發動1959年反革命武裝叛亂，在國外成立非法政府，頒布非法憲法，支持印度反動派入侵中國，組織和訓練殘餘匪徒，將自己與祖國孤立開來」。四天之後，周恩來在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說，班禪喇嘛也同樣墜落犯罪：「有計劃地領導反動派與人民為敵，與祖國為敵，與社會主義為敵。」作為對班禪喇嘛的懲罰，他也被撤銷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負責人職務，但其籌委會普通委員的職務仍給予保留，以備將來還可能利用他。周恩來的這次講話幾個月之後，還簡短地提到過班禪喇嘛，此後再無他的任何音訊，當時他還只有二十七歲。班禪喇嘛就這樣消聲匿跡了。

對班禪喇嘛審判一年之後，從縣一級逐級上升的選舉——選舉規則於1963年3月公佈——終於在西藏全部結束。在選舉過程中，選出了三百零一名代表。根據中國刊物的評論，進行選舉就像過節一樣。藏人敲鑼打鼓，身著節日盛裝，手握鮮花和哈達，爭先恐後來到投票地點；被封建農奴主弄成殘廢的跛子也拄著拐杖，「興高彩烈」前來投票。根據新華社1965年8月的報導：「選民們在這場首次能夠發表西藏人民意見的選舉中，經過熱烈討論，選出了那些他們信得過、能夠真正代表貧苦農牧民的人作為候選人。」

實際上，完全不存在什麼自由選舉。在基層，村民們分成若干個討論小組，每個小組由鄉政府派人組織牽頭，向村民們提供了一張候選人名單，他們出身於貧下中農或「非反動分子」的貧苦家庭，村民們只需討論各位候選人的優缺點。任何人如提名讓其他人當候選人，都要受到嚴厲批評。接著參加討論的幹部發言，宣布黨組織的選擇。每個小組散會之前，必須一致投票選舉那位預先內定的候選人——這樣的結果是有保證的，因此主持討論的幹部要保證每張選票都要按自己的意見填寫。

張國華將軍當選，阿沛·阿旺晉美也當選了，黨選定他取代班禪喇嘛出任西藏名義上實行自治的政權機構的首腦人物。一年之前，阿沛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叛亂平定後，他從籌委會秘書長升任副主任。之所以選定他出任這一職務，主要原因在於他是舊政府的唯獨可以利用的倖存者。因此，他是少不得的。他的家位於拉薩東北部，裡面擺設了西式家具，周圍是個大花園，有兩名僕人。他當選出任新成立的西藏自治區領導機構——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名義上歸他負責。人委三分之一的成員是藏族，其他人是漢族或居住西藏的其他「少數民族」。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工委也改為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這一點說明了西藏的共產黨最高權力機構運轉現已完全正常。張國華將軍為黨委第一書記。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中國建設》報導了當選代表進入會場時的情景：「他們胸前戴著寫了人民代表幾個字的緞帶，昂首挺胸，走入會場。他們是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的代表。在歷時九天的會議期間，他們雙眼含著激動的淚花，臉上掛著勝利的微笑，他們憶昔日之苦，思今日之甜，表達了西藏百萬翻身農奴對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無比熱愛。」會議閉幕那天，三萬名拉薩市民，還有一名副總理和來自其他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的七十六名代表，乘飛機抵達拉薩參加閉幕式。閉幕式在拉薩新建的「體育場」（這是一片空地）舉行，四周都是紅旗，慶祝西藏自治區的成立。這個場面是為了做給國內外人士看的，它標誌著宣傳攻勢的開設。對於那些自 1950 年以來一直在西藏的人來說，它像徵著過去十五年工作所達到的頂點以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此外，正好在十年前的這個月，新疆僅先於西藏成立了自治區，這一事實只會提醒在藏的中國人：在「世界屋脊」上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是何等艱難。但他們當時仍不知道，前面等待著他們的是比過去的六年更為艱難的一段時期。十一個月後，中國將爆發自內戰以來最大的騷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

譯注

- (1) 即指叛亂。
- (2) 內藏原文為 Inner Tibet，外藏原文為 Outer Tibet，又可分別稱之為小藏區和大藏區。
- (3) 原文如此。
- (4) 原文如此。
- (5) 當時實際上是水電廠工地。
- (6) Tsala Karpo 的音譯。
- (7) Vebou 的音譯。
- (8) Bhun-chatsa Shen-shu 的音譯。
- (9) Dohdun 的音譯。
- (10) 原文如此。
- (11) 原文如此，應為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末。
- (12) Phi Shadong 的譯音。...

第十章漫長的黑夜

1966 年—1977 年

成立宣言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下，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鼓聲中，拉薩革命造反總部成立了。

我們造反總部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運用毛澤東思想去造反！我們要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我們要造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派的反！我們要造牛鬼蛇神的反！我們要造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反！我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派，我們要拿起鐵掃帚，揮舞千鈞棒，將舊世界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我們要打亂天下，我們不怕狂風暴雨，不怕飛沙走石……造反，造反，一造到底，一定要建立一個紅彤彤的無產階級新世界！

拉薩革命造反總部

1966年12月22日

到1966年12月最後一個星期時，拉薩的紅衛兵已擺好姿態要奪西藏自治區黨委的權。四個月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開始。顧名思義，它應為「文化」革命，但它卻遠遠超過了這一範圍，是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內左翼和右翼及其思想路線之間幾十年來的權力鬥爭的大爆發。儘管大躍進失敗了（這是左翼第一次試圖通過激進手段，使中國朝著更為徹底的共產主義目標前進），但毛澤東仍繼續疾呼階級鬥爭是中國全民無產階級化的最佳途徑。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部分時間，國家主席劉少奇率領溫和派捲土重來。但到1965年秋天時，毛澤東並沒有因為他前一段的失敗而退卻，而又將左派恢復到了與右派平分秋色的地位。此後毛澤東又下定決心一次徹底清除保守的反對派。在林彪領導的軍隊的支持下，他於1966年6月成功地改組了北京市委，清洗了反對派；在同年8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揭開了文化革命的序幕。全國上下黨和政府的各級權力機構都受命接受衝擊，也就是一句口號所概括的那樣：「炮打司令部」，這是清除右翼的代名詞。大躍進的理論強調的是增加生產，而今天左翼強調的卻是採取疾風暴雨的形勢「清除中國的爛核」，左翼認為這個爛核就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緩慢的癥結所在。

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打擊對象——開始是私下的攻擊，後來成了公開的，他們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北京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領導全國範圍的清洗運動。部隊指戰員、毛派幹部、群眾組織的代表（他們與新成立的紅衛兵也相差無幾），這些人響應號召，聯合起來，奪地方各級黨組織的權，成立革命委員會。在黨政機構恢復且分開行使各自的權力，並由左派牢牢掌權之前，革命委員會的任務就是集黨政大權於一身。「三結合」小組成立了，搞了個執行激進政策的八條：破「四舊」、立「四新」。「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新」是與之相對立的事物：毛澤東新思想、無產階級新文化、共產主義新風俗、新習慣。廣大心懷不滿的中國青年抓住這一機會，大亂國家，毛澤東的妻子江青鼓勵他們造反，江青是指導紅衛兵運動的領導人物。他們獲準在中國境內四處串連，「交流革命經驗」，一夜之間他們可以放肆發洩自己的不滿，目標是毛澤東的政敵。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地區當中，證明少數民族地區最易受到新指示的衝擊。與內地相比，這些地區的「四舊」很完整；諸如少數民族使用各自的語言文字，他們文化水平低等等，這些都被認為是反動的。中國各自治區、自治州。縣的領導人物遭到指責，說他們在任職期間未能清除「腐朽社會」的殘餘，他們必須承擔責任。受到大肆吹噓的以各少數民族「愛國上層人士」為工作對象的統一戰線政策也被拋到一邊，無人問津，各地群眾都受到鼓勵，要從他們自己的隊伍中直接產生積極分子，發起中國的這場第二次大革命。

1966年8月25日，西藏的文化革命開始。舉行了慶祝十一中全會召開的大會之後，大昭寺遭到紅衛兵的衝擊。他們毀壞了數以百計的松贊乾布時代的壁畫和佛像，該寺由松贊乾布始建，他是第三十三代藏王。寺內的兩個院子塞滿了一群群暴徒，他們焚燒佛像達五天之久。損壞的確慘重，因為根據班禪喇嘛的指示，大昭寺是存放附近各寺院無數件藝術珍品的倉庫。破壞高潮過去，西藏最神聖殿堂掛上了招待所的招牌，而這座殿堂就如同西方善男信女眼中的梵蒂岡一樣。寺內院子成了養豬場，以前用作舊政府各部門的辦公室、庫房以及殿堂，現在卻成了最激進的新生的各紅衛兵組織司令部。過了不到幾天時間，羅布林卡也屢遭衝擊破壞，接著拉薩全城都交給了紅衛兵，連街名都給改了。街道的舊名牌被砸碎在地，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街名，如育新街、躍進路等。十月的第一個星期，拉薩發行了四萬張毛主席肖像。上面繫著紅緞帶，拉薩城裡的每張門上、每個家庭、每個辦公室、工廠都掛上了毛主席像。布達拉宮和其他地方掛上了大幅熱烈歡呼文化大革命的紅色標語；其他一些標語內容則是支持北越，譴責美帝國主義，或者寫的是中國的偉大舵手毛主席的語錄。

早在七月份，拉薩就來了一些革命青年，在西藏自治區煽動紅衛兵運動。起初進展緩慢，但到九月中旬時，他們的工作已大有進展，拉薩市成立了好些紅衛兵組織，足以對當權派發起一次公開進攻。他們開始印發的傳單號召大家「火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實際上，這樣做會導致複雜的權力鬥爭，當時全國上下都在批判這種做法。因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下令開始文化大革命，所以各級領導幹部也就不得不衝擊自己。他們至少得遵照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辦事，否則真會立即招來「群眾」鬥爭的滅頂之災。不過，開始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遭到指責犯了這樣的錯誤，除非後來人民的確證實他們沒有犯下這樣的錯誤。因此，張國華將軍和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兼西藏軍區副政委王其梅立即成立了拉薩文革

小組，領導造反，並希望能夠將造反的「矛頭」從自己轉向別處。開始，他們強調「學習」和「討論」，而不太主張暴風驟雨似的「揭發」，不主張貼大字報——直到後來他們看到這樣做似乎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最重要的是他們還向拉薩的各機關、工廠派遣忠誠的幹部工作組，以便阻止自發性地成立紅衛兵組織。截至 10 月底止，他們的努力頗有成效，儘管林彪在天安門城樓發出了響亮號召，號召發起一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運動。」但隨著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越來越多，他們的合法進攻越來越緊，當權派保住自己的努力開始崩潰。到 11 月中旬時，四個紅衛兵組織在區外來的一千多名紅衛兵的支持鼓勵下，佔了上風，他們徑直要求拉薩的廣播電台播音室公開廣播批判當權派的文章。他們譴責張國華和王其梅——他們是西藏文革小組的領導人，指責他們打著支持的幌子鎮壓革命，他們兩人力圖表明自己是無辜的，但 12 月份他們受到的壓力更大。最終於 12 月 22 日，代表五十個紅衛兵組織的革命造反派首次宣布聯合起來，準備「奪權」。

這樣的聯合絲毫不能給人以任何安慰，反而使西藏的共產黨中年幹部十分恐懼。西藏的紅衛兵像全國各地的一樣，都是些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是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長大成人的，滿腦子極端主義的東西，現在隨著年齡的增大和當權者們不將他們納入黨內，這些思想傾向更有發展之勢，導致他們認為炮打權力機構是合法的。他們的成立宣言的語言概括了他們的哲學：

「造反！造反！我們這些革命造反派自願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聯合起來。……我們這個組織拋棄了一切陳規陋習。只要是革命造反派，只要同意我們的觀點，誰都可以加入我們的組織。……我們一定堅持要文鬥，不要武鬥。但是，一旦我們造反行動起來之後，我們決不溫文而雅，決不瞻三顧四，決不文質彬彬，寬大無邊。」

幾十個簽署這個成立宣言的組織，代表了拉薩各級領導機構的大批幹部，這些組織當中有好些紅色造反戰鬥隊，如「草原星火戰鬥支隊」、「燎原烈火戰鬥隊」、「市貿易公司打狗戰鬥隊」。他們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我們的最高統帥、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1 月 10 日晚上，「革命造反派」發起了第一次進攻，奪了拉薩城北的《西藏日報》的權，它是西藏自治區的官方報紙，中國殖民主義者的必讀報。一天前，造反派一下奪了上海兩家報紙的權，這是對上海市委的挑戰，但卻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公開支持。這一事情激發拉薩的「革命造反派」也奪了《西藏日報》的權。第二天晚上，公安廳的二十名幹部在拉薩文化宮的接待中心也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文化宮位於新建的中國人居住的郊區，它是一座有柱子的建築。在這裡他們得到了一位區黨委書記的認可，張貼了一張指責接管《西藏日報》的大字報。他們獲準「包圍」——以對他們進行鬥爭——了那些「革命造反派」，指責這些造反派是反革命，在西藏這是火藥味特別濃的指責。西藏自治區黨委佯裝支持造反派接管報紙以欺騙群眾，下令逮捕了報社的兩名幹部。同時區黨委又聲稱，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會放棄權力，而這些造反派要求的就是區黨委放棄權力。接著，黨的幹部又進行幕後策劃，讓報社的大多數職工也不公開宣布，就「不去上班」，採取了這一罷工形式。但他們的努力都無濟於事。接管報社後的三天，約一百個革命造反組織召開了一次群眾性的「誓師大會」，發誓要「粉碎新的反攻」——這次集會比兩個星期前官方舉行的那次群眾集會更富於煽動性，也存在著更多的潛在爆發因素。在這次集會上，二萬名藏人高唱毛主席語錄歌。紅色消息造反隊現在掌管著《西藏日報》，在 1 月 22 日的社論中說：「先生們，用盡你們的全部武器吧，包括『核武器』，沒有什麼新鮮貨色，不過如此。根據你們鎮壓革命造反派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來看，難道我們還不知道誰該戴『反革命的高帽子』嗎？革命同志們，大家要提高警惕。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派，在煽動受蒙騙的同志們罷工。」

他們所幹的一切遠遠不止上面那些。幾星期後，當權派們在拉薩全城動用了人民解放軍，大力鎮壓造反派。這次激烈的報復行為——這只是以後的兩年中一系列激烈衝突的第一次——後來被稱為「二月逆流」。全國上下都採取了類似行動，因為毛澤東命令軍隊進行幹預，希望軍隊能夠恢復全國的秩序，同時通過讓軍隊參加三結合，加速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但是，大多數軍區的領導常常也正是受到文化革命威脅的那些人，因此他們大打出手，鎮壓紅衛兵。紅衛兵稱鎮壓為「白色恐怖」。在此之前，造反派在西藏付出的努力十分成功，張國華不得不於元月 21 日逃之夭夭，讓北京關係比較好的上司將他調往四川，後來他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國華逃跑之前，幾乎喪失了一切。造反派公開指責他犯下了種種罪行，是「西藏的太上皇」。造反派認為，自從他 1950 年作為進藏部隊的司令員抵達西藏以來，他從未放棄努力，想在「世界屋脊」上的這個「自由王國」當「皇帝」。

張國華逃命後，造反派膽子更大了，他們組成了一個新的龐大組織，叫「專打土皇帝聯絡委員會」。元月 25 日他們在全城散發了不少傳單，聲稱他們已經奪了西藏自治區黨委的權：「天下全是我們的了。土地是我們的，群眾是我們的。」區黨委的十一名最高領導人被拉到外面遊街，遭到毆打，同時又散發了更多的傳單，詳細列舉了他們的條條罪狀。

造反派推翻地方上的當權派之後，將注意力轉向軍隊，而沒有軍隊的支持，造反派是無法控制拉薩城的。有人企圖在西藏軍區發動兵變，但這場兵變立即遭到鎮壓。軍隊及時穩定下來，對造反派發起了大規模進攻，當時造反派的奪權活動幾乎功虧一簣。張將軍離藏之前，親自協助制定了「二月逆流」計劃，後來這一計劃是由任榮實施的。任榮是西藏軍區副政委，張將軍的親密部下，他得到了三個新的忠實於林彪的師的支持——其中一個師是從北京派來的。3 月 3 日，已經回到當權派手中的《西藏日報》報導，軍隊直接接管了全部機構，從公安廳到電台、銀行。人民解放軍在控制拉薩，建立了軍事管制。軍管得到了「大聯合指揮部」的支持，這是由當權派組建的、由一些紅衛兵組織構成的新的聯合組織，旨在對抗「革命造反派」及其遭到取締的「專打土皇帝聯絡委員會」。

「大聯合指揮部」就像中國其他地區的類似組織一樣，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境，它必須證明自己比對手們更為馬克思主義化，辦法是通過比其對手更為激烈地攻擊它所代表的權力機構。為了徹底迴避這一問題，「大聯合指揮部」力圖轉移視線，將鬥爭矛頭指向造反派，它聲稱造反派在為外國帝國主義賣命，他們打著文化革命的幌子，企圖破壞西藏的穩定。「大聯合指揮部」創辦了《風雷激》報。3 月 10 日，也就是西藏叛亂八週年紀念日那天，它發表了一篇激烈攻擊造反派的文章，將造反派與西藏自由戰士視為一路貨色：「在目前這個緊急關頭，無產階級正在同資產階級進行一場決定性的較量，所有牛鬼蛇神也從他們隱藏的地方跳了出來。他們喬裝打扮，鑽進了革命隊伍的行列。這一點完全證明，他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雜燴，是一個臭不可聞的臭水坑。」由於作了這番評論，因此「大聯合指揮部」站穩了腳跟，暫時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儘管軍隊指戰員的派別傾向不同，但他們壓倒一切的任務是要保持西藏的安定。看起來軍隊似乎勝利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但四月份，八千名新的紅衛兵從中國抵達西藏。他們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認可，中央文革於 4 月 6 日命令人民解放軍停止鎮壓左派，派遣這些紅衛兵來藏是黨內激進派發起的一場全國性大反攻的組成部分。反攻對像是當權派發起的二月逆流，當權派為的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和性命。4 月 16 日，西藏的紅衛兵召開了二萬人的群眾大會，支持造反派，譴責「大聯合指揮部」。在反攻中造反派在林芝毛紡廠一舉奪權成功，林芝毛紡廠是西藏自治區最發達的工業企業，位於康區和西藏中部交界的雅魯藏布江畔。

由於「大聯合指揮部」沒有北京的支持，因而失去了權力。6 月 8 日，《紅色造反消息報》宣布「革命造反派」正式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紅旗飄揚，革命隊伍士氣高漲，在戰鬥的召喚中萬馬奔騰。拉薩革命造反派總部正式恢復了。」沒過多久，就有人應戰了，造反派和「大聯合指揮部」的下屬組織在拉薩全城爆發了巷戰，不少房屋建築成了據點。造反派勢力太大，「大聯合指揮部」迫不得已，只得犧牲它的一位主要領導人王其梅副政委，佯裝是將他揭露出來的，以便像往常一樣企圖保持真正的革命熱情。（入侵西藏之後，王其梅原為人民解放軍昌都軍分區司令，後來據說他在中國的一所監獄裡自殺身亡。）局勢完全失控——儘管在 7 月 9 日和 14 日的事件中，「大聯合指揮部」的人包圍、擊敗了大批造反派。因此，7 月底時甚至任榮及其副手陰法唐也認為到四川成都去與他們昔日的頭頭上司張國華將軍待在一起，要比待在西藏的軍區司令部好得多。一些造反派跟著他們去了成都，張國華熱情地向造反派表示要保任榮和陰法唐，而在拉薩他們的支持者們卻捲入了一場全面戰鬥，巷戰變成了攻打戰略要點。

9 月份，人民解放軍重新恢復了自己的地位，軍隊得到了北京下達的一項內含五條內容的命令的支持。北京命令兩派「聯合」，停止「武鬥」。但是，雖然諸如機關槍、迫擊炮之類的重武器已經沒收，但戰鬥仍未停止。「革命造反派」拆掉了大昭寺的大片屋頂，製造了一些刀、矛、斧和木棒，以補充他們保留下來的手槍和其他一些輕武器——他們用這些武器繼續攻打「大聯合指揮部」。此外，當時戰鬥已從拉薩蔓延到日喀則、江孜、那曲以及其他地區，兩派群眾均各自成立了司令部，以便同首城拉薩的總部保持聯繫，而拉薩的總部則負責精心協調全部的進攻活動。雖然這些衝突也包括襲擊部隊車輛，但在 1967 年秋季期間進攻的主要對像是對方派別的據點。拉薩的一些令人矚目的建築如水泥廠、運輸中心等一次又一次地被攻克；俘虜的一隻耳朵被切除作為標記，並強迫他們加入對方的陣營。那年秋天，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派又重新弄到了一些重武器，拉薩的造反組織設法控制了拉薩的四家醫院，這樣也就使得「大聯合指揮部」的傷員得不到治療。為了贏得藏人的支持，造反派釋放了所有的與漢族合作的藏族主要人物；元月份造反派在奪權時逮捕了這些藏族，並公開對他們施刑。但是，這些「愛國上層人士」剛剛獲釋，「大聯合指揮部」又將他們抓了起來，毒打一頓，給他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接著又將他們囚禁起來。

1968年元月爆發了截至當時最大的武鬥，光是拉薩就死了好幾百人。當時拉薩城斷了電，總部設在「亞西公館」的造反派，迫使總部設在布達拉宮前的一座西藏自治區領導機關所在地的建築裡的「大聯合指揮部」向郊區的中國漢人區域逃跑。元月底時，西藏的交通、建設以及通訊全部癱瘓，因為軍隊也突然產生混亂，從1967年2月直至當時軍隊一直平安無事。據報道：整支整支的部隊不是加入這一派，就是加入另一派，並帶去了自動步槍和手榴彈。此外，一方面，要確切地給部隊規定什麼行為才是忠誠的已根本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在西藏的中國漢人的團體中，要在親毛分子和親劉分子之間劃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也同樣困難。因此，像「大聯合指揮部」給「革命造反派」所貼的「大雜燴」標籤一樣，類似情況可以說無所不在。陳明義是負責指揮解放軍佔領軍的指揮官，他竭力保持邊防哨所的穩定，而其他事情也就幾乎無能為力了。與此同時，位於扎吉監獄東面，派有重兵把守的恰榮（1）糧庫同拉薩的聯係被切斷，由此帶來了最為嚴重的混亂，因為非同小可的糧食供應體系驟然失靈了。到元月底時，人們生存所必需的一定數量的糧食（自從1963年解除糧荒以來一直還不錯）無法保持供應，饑荒再度出現。這次持續了五年時間——直到1973年才結束，而邊遠地區的饑荒狀況卻一直持續到1980年。

文化革命開始兩年後的1968年9月15日，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終於宣告成立。西藏與新疆（新疆革命委員會於同一天宣告成立）同是中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當中最後置於北京控制之下的地區。但當時，西藏的兩派雖已被解除武裝，卻仍在進行武鬥。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是某種討價還價的產物，在此之前它是激進派和部隊負責維護西藏安定的指揮官在中國首都北京討論研究後確定的。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林彪線上的人物曾雍雅任主任，因而也就滿足了左派；而任榮則由於參入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失去了堅定的毛派人物的信任，雖然出任職位較高的第一副主任，但仍處於從屬地位。陳明義曾在一段時間內作為張國華的繼任人當過權，但這次任命的職務更低，顯而易見他被排斥在權力圈子之外。新任命了一批與中國人合作的藏人，其中只有阿沛的名字為大家所熟知。接著就開始了在地區一級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在中國其他地區的紅衛兵組織內部，衝突已經結束，這是因為毛澤東於1968年7月發布了一項命令，授權軍隊解散紅衛兵組織，將其成員下放農村。但是在西藏，直到1969年4月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時，七十七個地區、市、縣才有六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一點證明西藏仍然很不安定。12月，也就是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武鬥停止了幾乎一年半之後，拉薩的廣播電台仍在提「資產階級派性」，它清楚地表明西藏地方上的內亂到了何種根深蒂固的程度。

儘管西藏的文化革命很激烈，但政府上的鉤心鬥角基本上只限於中國人內部，而由此產生的種種苦難卻大多數落在西藏人民頭上。雖然中國人有好幾千人喪生、逮捕或遭到嚴刑拷打的折磨，但藏人的傷亡（包括死亡和囚禁）卻高達好幾萬，還有幾百萬人受到極端的虐待。而對於留給後代的遺產而言，情形更慘，西藏文化幾乎蒙受滅絕之災——好在還有居住印度的西藏難民。凡是中國人的東西和共產主義的東西就被接受。佛事活動明令禁止，為違法行為。民間節日和集市貿易予以取締，民間歌舞、燒香以及各種形式的藏族藝術和風俗習慣都受到禁止。在拉薩八廓街附近的衝賽康舉辦了大型的露天展覽，展出了所有禁令之列的宗教物品和裝飾品，上面掛著的小旗上還寫著要將這些東西立即交各級工委和「平叛委員會」（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動亂中「平叛委員會」獲得重建）。全藏上下，出身不好，而至今又未被抓入監獄的人們被拽到大街上，頭戴紙做的高帽子遊街——一邊走還邊挨打，挨人們的唾液，袒露的胸前掛著列舉了他們罪狀的牌子。遊街隊伍由敲鑼打鼓的紅衛兵開道。喇嘛身上綁上了沉重的佛像，不得不彎下腰來，舊貴族和商人的脖子上吊著用來儲糧的空罐。高音喇叭以前一天只廣播三至六小時，現在整天吵個不停，都是些宣傳歌曲和歌頌毛的歌曲。高音喇叭的尖叫聲在大街上回蕩，震動了家家戶戶。

除了抓人遊街之外，紅衛兵各派互相競賽，爭先恐後地摧毀所剩不多的西藏文化。剩下寥寥無幾的經幡給撕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紅旗，西藏的佛教風光——一排排給河谷山川帶來福音的佛塔，城鎮周圍的一個個瑪尼堆，還有刻寫在山坡旁白色岩石上的六字真言——全是毀壞對象，取代他們的是大幅毛的標語口號。藏民住房的窗戶裡邊以及室內五彩繽紛的色彩不是給刮掉，就是讓重新刷上一層塗料。在康區和安多地區，藏民家庭的二樓也被貼上了「資產階級奢侈生活」的標籤，全家人被迫將其拆掉，住在一樓連窗戶都沒有的潮濕的馬廊裡。男男女女的長辮子都成了「農奴社會又髒又黑的臭尾巴」，如果自己不剪掉，四處巡邏的紅衛兵就會動手代勞。有些人剃了個半邊光頭，以表明他們是落後的。截止1967年3月，發行了數萬本毛的紅寶書（2）——外麵包有塑料皮，上面寫著「毛主席萬歲」幾個字。藏人必須背誦紅寶書內的語錄。在晚間的會議上和在大街上，他們都會受到檢查——紅衛兵在街上隨便攔人，叫他們一字不差地背誦，一有差錯就免不了飽嚙拳腳之苦。人們必須穿連衫褲工作服，不許戴手鐲、耳環和戒指；甚至還取締了藏人傳統的問候方式——相當於握手，也就是見面時伸伸舌頭，吸吸氣。紅衛兵挨家挨戶清剿寵物，他們還強迫居民在每間屋子裡掛上毛主席像，牆壁上要寫標語口號。藏族青年——共青團和在校學生——也被叫來清剿寵物，這是有意同藏族厭惡殺生這一習慣過不去。藏族文獻甚

至藏語本身也成了消滅的對象，藏語被一種叫「藏漢友誼語」的稀奇古怪的語言所取代，其主要成份不過是些亂七八糟的漢語。這種語言的語法和詞匯，大部分藏人都弄不懂。許許多多的藏人——尤其是幹部和中國人直接僱用的人們——被迫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近似的漢名，而且其中有一個字必須是毛名字中的一個字。如果父母拒不給自己的後代取一個含有毛名字中的一個字的名字，那麼這些小孩的正式名字就會是他們的出生日期或出生時的體重。這樣，對於中國官員來說，許多藏族後代只不過是些符號而已。當時有一句話形容了中國人的愚蠢：「首先他們要我們笑，接著又叫我們哭。」

文化革命的狂熱到了荒謬的地步，因此藏人有足夠的理由畏懼三分，甚至超過了他們對民主改革及其階級隊伍清理運動。在民主改革期間，每當對人們實行各種懲罰時，還嚴格地聽命於當權人物；而文化革命卻純粹是暴徒動武。開始還只有遊街，不久就是用鐵條燒紅烙人，槍決，在大街上隨時召開鬥爭會——如此這般，弄得藏人幾年時間人心惶惶，不敢邁出家門半步，只是上下班時才提心吊膽地在外面來回走一趟。甚至遇見朋友也拒不相認，因為街頭巷尾總有放哨監視的人，他們的任務就是報告可疑行為。早在 1966 年 8 月就出現了輪姦。紅衛兵將扎木四百戶藏族人家的女孩脫得一絲不掛，在外周遊、開鬥爭會，最後將她們全姦污了。有人向拉薩當權人物告了狀，但他們因為害怕自己的烏紗帽落地而拒絕受理。1966 年至 1967 年冬季，革命造反派來到拉薩北面的那曲。在這裡他們對大批游牧民也犯下了類似暴行，這些牧民在冬天的幾個月雲集於那曲。婦女們全身脫得精光，五花八綁站在結冰湖面上，還有人看守。一位名叫卡瑪夏拉的男牧民和他的女兒次仁卓瑪被迫當眾發生關係。在山南各地也發生了相類似的暴行，階級成份不好的人被綁上之後扔進麻袋裡，一扔就是好幾天。在江孜城外的年楚河（雅魯藏布江的一條支流）畔，出身不好的人包括婦女兒童一家人被迫站在冰冷刺骨的河裡泡上五個小時，頭上戴著高帽子，腿上還拴著石頭。日喀則的強姦和打人事件更多。許多藏人，有時是全家一道，寧可跳崖或跳河自殺，也不願意死在一夥中國暴徒手中。頓時，西藏全境出現了一股自殺風。在拉薩想自殺的人實在太多，人民解放軍只得派兵在拉薩河邊日夜巡邏。

隨著紅衛兵各派之間武鬥升級，暴行也在加劇——暴徒不僅僅是平民百姓，也有解放軍。強姦與毆打進而變成處決，受害者在被槍決前被迫給自己挖坑。這些流血事件是 1959 年鎮壓叛亂以來最嚴重的罪行。在當時的一場混亂中，又有一大批難民逃往印度。根據他們提供的情況，藏人常常被肢解，耳朵、舌頭、鼻子、手指、手臂被割掉砍斷，生殖器官和眼睛被火燒掉。為了從有些受害者口中得到有關對立派的情報，將他們的大拇指繫上一根繩子，吊起來，然後再燒開水。將人活活釘死的辦法也用上了：1968 年 6 月 9 日，兩個男人的屍體倒在浪子夏——拉薩舊監獄的門前，身上全是鐵釘眼，不僅手上有，腦袋和軀體的主要關節部位也釘了釘子。直到 1970 年時，人們還逼迫靠近尼泊爾邊界的一些曾做過喇嘛的人，要他們站在一個台子上連續三天當眾背誦毛的紅寶書。那些拒不從命的人，當場被人民解放軍擊斃。他們的屍體被拖過大街，人們被迫朝屍體吐痰和仍石頭。兩個拒不這樣做的人也遭到槍決。最後，暴屍示眾，上面還掛著牌子，上面寫著這是一切反動派的必然下場。

西藏全境的六千二百五十四座寺院的命運，也同西藏人民的命運一樣。然而，紅衛兵的許多活動雖無人控制指揮，但寺廟的摧毀卻是精心策劃的一場運動所帶來的結果，這場運動始於文化革命前。從 1959 年開始，將西藏各寺廟的每件物品按其價值分類編目，以便最後運往中國。它一直是「文物管理委員會」的任務。北京派來了冶金專家組。但這是一項浩大的工作，進展緩慢。光是拉薩、日喀則、江孜以及康區和安多的主要城鎮附近的大寺院的寶貝就無法估量，因此直到 1966 年前，農村牧區的寺院就沒有幾個徹底查清過。然而到 1967 年 9 月時，也就是拉薩的第一個「革命造反派」組織成立一年之後，破壞寺廟的活動已全面鋪開。老紅衛兵手拿小本本負責指揮，小本本上分別寫著每件物品的處理辦法，是保留還是銷毀。金佛、銀佛、銅佛、昂貴的錦緞以及歷史悠久的唐嘎捆上紮好。雕繪圖案精美的柱樑拆下來後，供中國人建設自己的大院時用。接著，在紅旗下——敲鑼、吹號、擊鈸，一片熱鬧場面，當地的藏人被迫拆毀座座寺廟。人們點燃了一堆堆烈火，焚燒經書，那些被燒掉的，就讓人們褻瀆一場——在中國人的商店裡用作包裝紙、用作衛生紙或做棉鞋時塞在裡面。那些夾經書的木板用來做了樓板、椅子和農具的手把。泥菩薩被搗得粉碎，扔在大街時讓人們踐踏，再同肥料拌在一起。有些泥菩薩則用來燒制磚塊，專門用這些磚塊蓋公共廁所。瑪尼堆曾是人們表達經文的最常見的形式，而今這些瑪尼石用來鋪了人行道。壁畫遭到毀壞，壁畫上佛像的眼睛被挖掉，使人們想起十二世紀時穆斯林教徒在印度摧毀佛教寺廟的情景。寺廟的銅頂金頂給拖倒，同其他金屬一道重新回爐。

掠奪結束後，在寺院殿堂裡裝上炸藥，連同牆壁全給送上西天。野戰炮也用上了，因此不到三年，西藏全境瘡痍滿目，到處可見的殘垣斷壁就像一座被轟炸過的城鎮一樣。因為寺院殿堂的牆體很厚，所以甚至包括甘丹寺（它作為格魯派最神聖的寺院是計劃要徹底摧毀的）在內的所有寺院都未能完成夷為平地，但現在這些看上去令人心寒的殘垣斷壁，總是使人回

想起它們昔日的規模。摧毀西藏的寺院使大家受到震驚，除了那些最年輕的藏人外，其他藏人是無法理解的。藏人個人所蒙受的任何苦難，同他們所知道的似乎是一個民族文明的徹底完蛋相比，黯然失色。

對西藏文化大肆破壞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又是一場貶低舊西藏的宣傳運動。主要的替罪羊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1968年12月，北京電台廣播了迄今為止措詞最激烈的攻擊達賴喇嘛的文章，說他是「政治僵屍、土匪、叛徒」。在西藏，中國人譴責達賴喇嘛是「靠人民血汗為生的兩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他手上的紅色標記就是鐵證」。中國人聲稱，每逢達賴喇嘛背誦經文時，就得獻祭人心、人肝或人的手臂。據說，達賴喇嘛破了膽不敢返回西藏、擔心這些事實真相讓西藏人民瞭解之後，他們會叫他因「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而受到報應」。現在人們晚上學習時，那些陳腐的提問是：「告訴我們是誰策劃了叛亂？」答復是：「達賴喇嘛」。接下來的問題是：「他過得是什麼生活？」回答：「他是個貪圖享受的喇嘛，玩女人，愛金銀，將我們的祖國出賣給帝國主義。」

文化革命接近尾聲時，中國對舊西藏的形象最後表現在西藏革命展覽館內。展覽館位於布達拉宮腳下。從七十年代中期以來，去拉薩的外國人要經過嚴格篩選，而他們無一例外地必須去參觀這個展覽館。在展覽館的第一個展室裡，陳列了一些文件，證明自十三世紀以來，西藏一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接著是「舊制度所犯下的驚心動魄的種種暴行」，這是一名隨喬治·布什（當時是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1977年訪問西藏三天的《華盛頓郵報》記者說的。展覽展出了剝掉的手臂、大腿的雕塑，這還只是輕的懲罰，據說在舉行一次宗教儀式時，兩名兒童的頭皮被活剝下來，還有「封建農奴主」用來折磨「農奴」的各種鞭子、刀具以及腳鐐手銬。1976年的一期《中國建設》在評論這一百零六個栩栩如生的塑像時，說：「推開展覽館的黑色門簾後，人們進入了人間地獄的舊西藏。」展覽配有錄音音樂和解說詞，共分為四個部分：封建莊園——人間地獄；寺院——殘害農奴的罪窩；噶廈——反動的地方政府；農奴為解放而鬥爭。其中的場景包括一個「農奴」被迫在暴風雪中背著「農奴主」爬越陡峭的高山，「雙眼發射出仇恨的目光」；農奴主因為丟失了一頭驢在痛打一男孩；站著的一位喇嘛斜眼瞅著眼前的借債人，他馬上被拴在馬後給活活拖死；又是一個喇嘛，他把一個將要用來獻祭的哇哇亂叫的男孩塞入一個木箱；一名婦女被拴在樹幹上，她要接受挖眼睛的酷刑，她的罪狀是領導了一次人民起義。最後的場景是「農奴」站起來了，他們殺掉了農奴主，一個快死的女孩用自己的鮮血在一塊岩石上畫了顆紅星，表達了「她渴望農奴得解放，盼望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願望」。

文化革命的混亂局面和破壞活動持續了三年時間，而它所帶來的政治後果，卻又持續了七年——一直到毛澤東於1976年9月逝世。但在西藏，卻還有一件頗為費事的事情——人民公社化。迄今為止，西藏中部是中國唯獨沒有實行公社化的地區，毛主席分子認為這是當地黨組織執行「修正主義」政策的最突出的表現。無論其他事情如何緊迫，紅衛兵認為在西藏實行公社化是他們的神聖職責。但這並非易事，這一點文化革命前的當權人物是可以作證的。

其實，實行公社化的努力，早在1962年就開始了。當時，在拉薩、日喀則和澤當附近進行了成立人民公社的試點工作。但由於民主改革之後的局勢不穩，因而並沒有推廣人民公社，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日期推遲，也是由於同一原因。藏人認為公社無異於將群眾囚禁起來：這是控制社會的最終手段，這樣人民享有的不多的自由——包括享有土地、農具、牲畜以及為數不多的幾件私有財產——也會喪失，最後國家會使社會完全平等。他們之所以害怕是因為他們看到了1959年前後，在康區和安多強制推行合作化所產生的後果。雖然年年增產，但農作物卻要充公，饑荒在曾經出產豐富的東部地區也十分流行。據說，康區人民（幾年戰鬥之後，基本上剩下的是婦女和兒童）就像耕畜一樣犁地，一年勞累到頭，為的就是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指標。

如同民主改革一樣，實行人民公社的願望似乎也是出自人民群眾。因此，藏人被迫簽署要求實行人民公社化的文件，接著黨就會保證「讓他們實行公社化」。這種辦法除了它的宣傳價值之外，長期以來中國的幹部認為，它也是防止對他們的日常工作提出批評的有力工具。如有人抱怨，也只需一句話就可以將其駁回，他們會說是人民自己要求實行這項政策的——既然如此，他們現在又怎麼能反對這一政策呢？在現在中部地區，在實行社會主義化的過程中，繼互助組之後，沒有實行合作化。其他人是在一步一步地走，而藏人則要一步「跳」入發展公社的階段——這樣做，他們需要黨的幫助。

中國人開始刺激是人民積極分子的「領導人物」的積極性。1964年，中國人常常開會，在會上說如果公社成立地建立起來之後，他們這些積極分子就可以去領導公社，擔任主任和隊長，從以前的組長到主任、隊長就升了官。他們的辦法包括兩個方面：作為嚴厲的一手，在公社成立之前，持續三、四個月的時間，它都是晚間會議的中心議題；誰要是反對公社，就要拿他作為鬥爭對象示眾，或乾脆關押起來。那些「聰明人」積極行動起來——他們現在對於要生存該怎麼辦那一套已

經熟悉了，正如境外難民所描述的那樣，西藏各地的人民很快就異口同聲地說：「如果今天沒有辦法成立公社，那麼明天一定要成立！」作為軟的一手，中國人擔保公社是「通向社會主義天堂的金橋」。成立了一些樣板公社，給這些公社提供了足夠的犛牛、綿牛、馬、豬、馬車、農具、肥料——對於所有初辦的公社也承諾提供一切，用這些公社去激發別人。緊接著 1965 年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區之後，成立了約一百三十個公社。然後隨著文化革命的到來，擯棄了「軟辦法」，公社化在西藏全國推廣實行。截止 1970 年夏季，已經成立了一千多個公社；到 1975 年 12 月，佔西藏自治區七十一個縣的百分之九十三的縣實現了公社化——成立了一千九百二十五個公社。

讓人民放棄自己的財產（這是公社化的第一步）證明阻力最大。確定了折價賠償率——遠遠低於有關物品的實際價值：一批最好的馬是一百五十元，約合七十五美元（3）；一頭犛牛是七十元，合三十五美元（通常的價格為二百五十美元）；一頭驢和犁十五美元；一把錘子兩個半美元；一把長刀四美元；一把鐵鍬和一個馬鞍三美元；一根套索兩美元。在大多數情況下，賠償款在三至五年內付完，但藏人卻從未收到過這些錢。中國人說，只有公社生產有剩餘時，才會開始付賠償款——這一規定倒對所謂的「賠償」是莫大的諷刺，因為藏人需要用自己的勞動去「償還」成立人民公社時他們自己的投入。這樣看來，國家對公社沒有任何投資——但宣傳時卻一直大叫特叫，國家投入了大量的物資和種子。更有甚者，凡十六歲以上的人，必須立刻貢獻十一元作為公社成立時的資金。由於誰也沒有這筆錢，中國人不得不提供貨款——致使全體藏民負債；因此每當收割時，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通過利息不斷提高稅收。在人民解放軍不參入的情況下，要使藏人自覺自願地將這些極為不利的條件加在自己頭上的確很難。不過最後還是向許多地方派了部隊，大批抓人，對於那些不妥協讓步的人很快也向他們明確：在公社內生活可能日子不好過。但在公社外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面臨絕境——公社徵用了當地的一切水源和耕地。只有一些成份不好的家庭，才有意不讓他們入社，此後也只有他們才生活在新社會的圈子之外。

一個人民公社平均由一百至二百個家庭組成，一千人左右。公社下屬生產隊（由於人口稀少，沒有像中國其他地區那樣設大隊），一個生產隊通常就是一個村莊。一個區的七個公社共用一個銀行和一個百貨商店。七十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衛生保健和小學教育的一些有限設施越來越稀少，因為四個公社合併在一起仍作為一個單位對待。公社的管理工作由一些幹部負責，一名領導根據當地黨委的要求發布工作指令，有些公社的管理層共有五十個不同崗位，擔任這些職務的幹部全都是藏人，他們必須先幹好他們的本職工作，然後才是每天參加農業勞動。在他們的領導下，西藏人民喪失了剩餘的一切自由。出家門以及地頭的一切活動遭到禁止。甚至外出抬柴火也得事先徵得許可同意才行。如果要請一天病假，或請一天照看有病的親屬，必須要多達十二名幹部的簽名同意才可以。

每天早上一報北京時間——在西藏離日出還有兩個小時，高音喇叭裡就傳來了中國人最喜歡的頌歌「東方紅」樂曲聲，樂曲悲哀單調。生產隊點名之後，早上五點開始上工。根據季節，一直幹到晚上八點或十點收工，接著是長達兩三小時的政治學習會議，一直開到差不多半夜才散。雖然許多人每兩星期能休息一天，但一年的法定節假日只有七天——共產黨的國慶三天，中國人的春節三天和元旦一天。帶嬰兒的母親上午和晚上各有半小時哺乳時間。儘管老弱病殘以及學齡前兒童可以不參加勞動，但他們不幹活，也就得不到口糧。因此，西藏從六、七歲到八十歲以上的人，只要身體吃得消，無論男女老少都不得不幹活。人們實在太累，而規定又實在太嚴，死者的屍體常常要擱置幾天之後才去料理。藏人在描述自己命運時，說：「在西藏，人們只能看到三樣東西。早上出工時，人們看到的是星星，白天是家家戶戶門上的鐵鎖，晚上收工時是月亮。」

除了地裡的農活之外，人們還得挖數英里長的水渠，要建水壩，修路、修水庫。墾荒是公社全力以赴的事情——就像七十年代初期種植冬小麥一樣。中國人喜歡小麥而不是青稞，因此百分之八十的可耕地種上了小麥。當麥桿長到五英尺高時，當地官員就要估產，秋收之後要根據估產得出的數字，認真對照檢查實際收到的糧食，以確保無作弊行為。而且，耕地不允許隔年休耕，在西藏不利的自然條件下，這樣做致使地力衰退，結果是大面積糧食減產。這種錯誤做法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得到糾正，它是西藏各地總有一些地方遭受饑荒的原因。

西藏的游牧民也必須實行公社化，在辦互助組時，許多游牧民拖延了很長時間，他們的財產和牲畜都交歸集體所有。關於牲畜的繁殖，作了嚴格的要求，對每群牲畜的雌性成畜的百分之九十規定了產畜指標。牲畜的事故性死亡率允許低於百分之二；但超過百分之二時，就必須向負責幹部作出充分解釋——然後，如果是牧民的责任，他就要受到懲罰。游牧民的主食肉、奶酪和酥油，現在主要由國家配給的青稞所取代。在西藏中部，肉類讓人民解放軍享用；在安多和康區，肉類則連同牛羊皮一道直接運往中國。

公社成立不到一年，其經濟壓迫再次急劇改變了西藏的生活方式。複雜的工分制和稅收使西藏人民跌到了生存線以下，分得糧食平均一年要短缺三、四個月——從現在一直到七十年代後期都是如此，除非個人之間作些調劑。工分制首創於中國公社的樣板大寨大隊（據後來揭露，這個大隊驚人的糧食產量數字全是虛報），它代表了極端的集體化。在西藏，人們得到的是一顆顆星，記錄在工分本上。每隔三天，負責人就將工分本拿過來，看看手下的社員得到了多少顆星；每隔兩個星期，就將星星數小計一次。最強的勞動力每天能掙八顆星，最差的掙五顆，孩子們四顆。當將工分折換成人民幣時，其價值時高時低，但一般來說每顆星值美金五分左右。因此，掙得最多的藏族幹部每天的收入是美金五十分，每月是十四美元，每年是一百六十八美元。將撫養家屬和平均收入都考慮進去之後，每年人均收入在六十美元左右。這樣，目前西藏仍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甚至還低於不丹人民，他們每年的人均收入比西藏還要高出十美元。然而，由於一些商品都實行計劃定量供應，因此貨幣價值位居其次。工分即星星，起作用的時候是在年底。這時，要對整整十二個月的勞動進行計算，然後將工分變成口糧。不過，這時還沒有交稅。

在計算工分值和確定生產隊的口糧時，必須上交高達八種的稅收：它們包括百分之六的公糧（稱為愛國糧——因為藏人應出自於對黨的熱愛上交此糧）、種子糧、飼料糧、備荒糧、戰備糧、公社費用糧。另外兩種類型的餘糧，嚴格地說它們並不是稅收，而是「自願」賣給國家，價格低得令人難以相信：一克（4）（二十八磅）通常只賣三元，即一個半美元，這點錢只能用來三包香煙。另外，錢款接著就存入公社銀行，個人是不能動用的。在完成上述稅收工作之後，社員們根據各自的工分多少，才能得到一年的口糧。按照這一體制，每人每年的口糧通常在八克至十二克之間，也就是二百二十四磅至三百三十六磅之間，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每天的定量遠遠不足一磅。肉類、蔬菜、酥油、牛奶、酸奶、茶以前全是主要食物，現在人們仍沾不到邊。有老年人和小孩的家庭吃的苦頭最大。本來他們的口糧供兩個大人吃還不夠，但卻必須五個人勻著吃。這樣，出現了一個新的乞丐階層。雖然公社對其中一些這樣的不幸人家提供一次貸款，但不會有第二次。由於無力償還貸款，人們只好繼續行乞。見此情景，黨公然宣布幫助他們已不是黨的責任，而是當地「富裕」社員的責任。這是製度本身所產生的一個新的階級，一夜之間就成了沉重的負擔，而且隨著下一代的問世和更多的人家借債，這一負擔越背越沉。藏人自己談論時說：「解放就如同給人們戴上了一頂濕皮帽，皮帽乾得越快，就箍得越緊，直到叫人喪命。」

這句話的正確性越來越清楚，因為現在又出現了饑荒，耕地增加也無濟於事，飢餓是公社給藏人帶來的唯一結果。好像文化革命的動亂還不夠似的，一系列自然災害也降臨西藏頭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五十年來最大的雪災，1972年還發生了大地震。這些災害使得農業減產失收。在1963年至1968年期間，一些小地方鬧饑荒，中國人有時也從國庫中拿出一些糧食借給藏民。但在1969年全國上下忙於戰備時，中國人不在藉糧給藏民了，而將存糧全部留給人民解放軍用。此外，農作物歉收時，中國人拒不減稅，使得本來就只平了生存線的口糧又有大幅度下降。1972年數百名忍飢挨餓的藏人湧入江孜和日喀則，他們每年的口糧從七克降到五克，最後降到四克即一百一十二磅，真是令人難以相信——而這點糧食只能支撐四、五個月，即使如此，堆得滿滿的軍隊糧倉卻沒有拿出一點東西。人民解放軍並不願逮捕這些示威者——因為還得給他們飯吃，而是將他們攆回農村。這樣，他們也就只得靠野菜、根莖、蘑菇等生存度日。以前，喪失勞動力又沒有人贍養的老人就只能靠這些東西維持生命。現在，全體藏民幾乎就靠從地上撿東西過日子，經常產生致命的惡果。就像六十年代初期一樣，他們從人民解放軍的軍馬糞堆裡找幾顆沒有消化的糧食，偷中國人餵豬養雞用的殘菜剩飯，在地上挖洞找蟲子。然而，城市居民的處境比農村藏民還要艱難。從1968年初開始，日喀則和拉薩都斷了供給。商店的貨架上空空的——甚至連火柴、煤油、蠟燭、香煙也脫銷，更不用說白糖和茶葉了。有好幾年時間，晚上開會時只點一兩根蠟燭——這對藏人倒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強打精神，擔心別人看到他們心不在焉。直到文化革命的混亂局面開始收場時，西藏又可以得到一些商品了；但直到1973年的饑荒結束時，商品仍然十分短缺，因為只有幹部和漢族才總是可以得到這些商品。對於藏人來說，每個月一盒火柴就是極大的優待了。一罐食油的價格，比一個中等勞動力兩個月的收入還要高。每年的棉布計劃供應是四碼，連做件新藏裝都不夠，這還是過去的事，現在人們的衣服總是反復改來補去，因為補丁太多，弄得面目全非。由於藏人得不到像肥皂之類的必需品，因此只好用泥巴代替。但中國人每三個月卻可定量供應一塊香皂，每兩個半月條肥皂。搶竊事件太多，人被抓到之後，無非是坦白一番，放走了事。

在1968年至1973年的饑荒年間，數萬藏人死亡。據倖存者說，飢餓奪去了生命的藏人，再加上直接死於中國侵略者之手的藏人，總數接近一百萬，是藏族人口的七分之一。在鬧饑荒之前，中國人搞了種「憶苦湯」。它是糲粳摻水熬成的稀粥，裡面沒放鹽，迫使人們喝這種湯，旨在讓他們回憶解放前他們在所謂可怕的條件下受的種種苦難。藏族小孩問長者：「舊社會真有那麼苦嗎？」大人小心翼翼地回答：「是的，群眾吃的就是這種粥，而貴族們整天花天酒地。」不幸的是，中國的宣傳也沒有得到什麼好結果，對過去事實的歪曲，同今天的現實一比較，也就微不足道了。

公社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饑餓與第三種現象——戰備——緊密相連。戰備開始於 1968 年後期，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後半期。1968 年 10 月 1 日，林彪和周恩來發出大規模進行戰備的新號召。這次也像 1962 年與印度的邊界戰爭一樣，當時是企圖在「三個災年」之後利用戰爭激勵國家，而這次卻是利用外來威脅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他們停止內亂。此外還有「下放」運動，它始於 1968 年秋季，在這場運動中多達三千萬的紅衛兵被迫上山下鄉。戰備有一個方面很特別，它是戰備時間長、有深度的原因。西藏邊界上集結了大批印軍，東北面的朝鮮仍然處於分裂狀態，與蘇聯則即將爆發 1969 年激烈的邊界衝突，越南戰爭也正處於高峰期間，這樣人民共和國被敵對勢力團團包圍了。中國確信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這也是中國最擔憂的，黨內的理論家們當時認為隨時都可能發生核屠殺。在當時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刻，要人民幹什麼幾乎也不算過分。七年期間，藏人總是受到警告，說印度進攻的時候終於來臨。因此，一方面人民群眾忍飢挨餓，另一方面軍隊的糧倉——人民解放軍吹噓這些糧食可以用幾十年（在西藏高原上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卻越來越大。公社是戰爭機器的引擎，戰備所要求人們幹的工作比農活要多。

到 1969 年，出現了三種形式，通過這三種形式全部藏人都得支援人民解放軍。第一種形式是徵兵，這一使命落在出身最好的藏族青年人頭上——出身貧窮，年齡在十七歲至二十五歲之間。這些青年人在部隊要服役五年，首先是二個月的新兵基本訓練，此後他們將與其他新兵一道分別到基層連隊。通常一個班只有一名藏人，他們的任務就是當翻譯，因為部隊要與當地老百姓打交道，還有爆發戰爭時協調對前線的支援。他們不得私自與其他藏人交往，不得在藏族戰友當中討論防務問題。根據上級的規定，他們對於自己連隊究竟有多少人也不應知道。每個藏族戰士都發了一個筆記本，要定期在上面記下他們的錯誤行為，以此進一步確報安全。開始，光是西藏自治區境內被迫在四百五十個區政府辦公室自願報名參軍的藏人就多達三萬人，他們入了伍；而康區和安多的數字還不知道。

第二種形式是民兵。1962 年邊界戰爭期間，民兵工作進行了小規模的試點，主要限於邊境地區。1969 年，又是在邊境地區組建民兵，不過這一次是縣、區、公社、生產隊無一遺漏，每一級都有民兵組織。民兵的年齡在十五歲至三十八歲之間，有兩種類型。基幹民兵重要一些，每個民兵基層組織都有兩名基幹民兵，他們接受過專門訓練，他們的任務是要查出特務、反革命分子和那些企圖逃往印度的人。兩位基幹民兵其中一人配有一件自動武器（斯坦步槍），另一個則帶上彈藥。他們共同守衛戰略要點，包括橋梁、糧倉和水壩。剩餘的人是另一類民兵，他們佔大多數，不配槍枝。他們用木頭槍和木棒進行訓練。不過到七十年代中期時，有些三人一組的民兵還是配備了武器：一人扛步槍，一個拿子彈，另一人則輪流替換他們兩人。為了不佔用從事農業勞動的時間，晚上的會議時間就用來訓練，但大多數民兵只是進行一些操練，一旦戰爭爆發人民解放軍和基幹民兵隊伍上前線之後，這些民兵主要是發揮警察部隊的作用，維持治安秩序。

第三種類型叫「戰備軍」。作為「戰備軍」的組成部分，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藏人要跟隨人民解放軍上戰線，當民工，做運輸工作。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的那些藏人則負責協助醫務人員；他們除了送繃帶和其他醫療用品外，主要任務是運輸傷員和掩埋死人。年齡最大，用處最小的五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的藏人，他們也得應召「援軍」。他們沒有配發任何武器。但必須先於正規部隊發起進攻，靠人海戰術壓倒敵人的火力。在邊境地區，犛牛和馬匹均編進了各個運輸隊。

當西藏西部、南部以及東南部的藏民在忙於訓練時，大城鎮的藏胞們也同樣手忙腳亂，做些令人煩躁的事情。拉薩、日喀則、江孜、昌都、玉樹、康定以及所有的其他大城鎮也像中國內地沿海城市一樣，忙於準備，防止空襲。家家戶戶在自家最堅固的房間外再平行砌了一堵牆；沿著主街道，藏人挖了一些防空洞。拉薩城內，民防演習日夜進行，藥王山上的警報器發出開始和結束演習的警報。人民解放軍的高射砲部隊和民兵部隊接管城市的那一兩個小時，甚至醫院也得進行疏散。西藏自治區各主要下屬機構都在地下建立了指揮部，地道通向河谷周圍的那些小山，重新佈署的計劃只需一會兒就可完成。藏族幹部中有謠傳說，重要文件已運入拉薩城，送到了一些秘密地點。

戰備不僅限制了紅衛兵的暴行，而且也止住了藏人的叛亂行動。文化革命當然給藏人提供了一次重新向中國人發起進攻的機會，藏族青年加入了「革命造反派」，而負責招收他們的這些造反派則保證藏人會得到高一些的糧食定量，甚至還可以獲得宗教活動的自由——真是令人吃驚。在那些人的領導下，藏人也戴上了全國紅衛兵統一的紅袖章，「圍攻」他們所仇恨的漢族幹部，伏擊車隊，只要有可能就挑起主要派別之間的衝突。這是這些藏族青年有生以來第一次從勞累中擺脫出來。他們積極打製木棒、矛槍和斧頭，以便和「大聯合指揮部」決一雌雄。那些比藏族青年大一些的藏族幹部，他們是中國人徵用的，反過來又攻擊自己的上司，自己卻不幹工作。如果有人想阻止他們，這些藏族幹部就用「親劉分子」這一令人可怕的帽子予以威脅。不過相比之下，不順從只不過是一種溫和的抵抗方式。到 1968 年年底時，西藏全國各地又發生了一

些起義事件，而且由於中國軍隊撤向首城拉薩還進一步加劇了事態的發展，廣大農村只留下了一些像孤島一樣的守備部隊，通訊聯絡也被切斷。

尤其是有一事件激發藏人發動叛亂。1968年6月7日上午，一些十幾歲的年輕人在拉薩的「亞西公館」院內與一支人民解放軍的部隊糾纏一團，兩名中國士兵被殺；這些年輕人嚇壞了，拔腿就跑，躲進了大昭寺內的殿堂裡。緊接著三百名士兵就將他們團團圍住。人民解放軍指揮官向他們喊話，限他們五分鐘內交出剛才偷竊的武器彈藥，否則他就要下令開火。而這些年輕人卻堅持說，他們沒拿任何武器，此外他們還聲稱他們全都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然後他們沒有再多說一句話，就高高舉起了毛的紅寶書，開始高喊共產黨的口號，希望能夠解除緊張的對峙局面：「軍民一家人，誰也莫想分。」五分鐘時間一到，人民解放軍對著他們一陣猛射，當場擊斃十二人，打傷四十九人，接著不少人還挨了刺刀、槍托。而且中國軍隊的指揮官拒不給那些傷員治療，後來門孜康來了一些藏醫，方將這些傷病員抬走。與此同時，聚集在寺院門外的大片人群聽到裡面的倖存者在唱大家熟知的一首歌曲：

西藏人民莫悲哀，

自由獨立定會來，

牢記我們的太陽，

不忘神聖的達賴。

在西藏神聖的寺院裡進行大屠殺的消息很快傳開了。民情激憤，中國人為了平息城裡的風波，不得不宣布進行調查（事實上沒有實行），但拉薩全城人民反抗的意志卻無法消除。反漢事件常有發生，整整一年過區後，全城百姓公然不顧嚴禁佛事活動的規定，他們舉行了慶祝活動——慶祝佛祖的誕辰、成道、涅槃。下個月，首城拉薩的機關幹部放假，顯然是要慶祝「世界團結日」。他們在拉薩的老林卡里支起帳篷，在拉薩河畔準備了野餐的場地，然後翻開放在地上紅寶書，裝模作樣地在學習，其實整整玩了一個星期，擲骰子，打麻將。但在山南地區，抵抗形式就沒有拉薩這樣溫和，三千藏族青年攻打人民解放軍，殺死他們二百人。兩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又有二百人在澤當被殺。據說，早在1967年西藏西部的五個地區就爆發過類似的起義事件。1970年夏季——這時紅衛兵武鬥高潮早已結束，公社也已強行成立，戰備已拉開序幕，在西藏西南部卻爆發了一次大叛亂，據當地人民解放軍司令員說，一千多名中國士兵喪生。接著斃了大批人——對象通常是地下組織的成員，每逢處決人，常常要趕在節日的前兩天。但原康區十八個縣的人民沒有被嚇倒，他們高舉西藏旗，公開與中國人為敵，攻打中國人。直到1972年，戰鬥仍未平息，最大的一次叛亂影響約六十個縣（西藏自治區共有七十一個縣），據說，藏人死了一萬二千人。

雖然西藏於1968年秋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雖然紅衛兵武鬥也於1969年結束，但北京仍認為西藏需要進行一次大清洗，才能重新穩定局面。這場運動開始於1970年初。官方稱這次清洗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它不像民主改革及其復查運動那樣，對像只是上層階級，這次的範圍包括社會的各方面。「叛徒、陰謀家、破壞者、縱火犯、無政府主義者」——從極左分子到逃脫了文化革命的那些頑固的反毛分子的所有人都在「鏟除之列」。1970年4月，幾萬名在這場動亂中證明是不足信任的藏族幹部被清洗出各級機關。與此同時，對於西藏自治區的每個藏人的檔案材料進行了復查，這些材料由公安廳的有關處室妥為保管。接著，晚上突然採取行動，數千人被捕入獄，遭到審訊。在每一地區，要將一、二十個人跳出來，拿他們示範，叫他們在三種命運當中選擇其一：鬥爭會、囚禁和公審。死刑佈告在各縣張貼，上面印有被槍斃人的像片，像片上畫有一個紅叉，他們「反黨、反人民」的罪行列在下面。處決就在開會用的大廣場上執行，受害者的脖子上纏著一根繩子，一名中國看守緊緊拽著這根繩（以防他們最後還要高呼反動口號）。槍決時從後面給受害者腦袋一槍。緊接著，站在人群前頭的死刑者家屬還得被迫感謝黨的「恩得」，感謝黨「消滅」了他們當中的「壞分子」，然後就簡單地挖個坑，也不舉行任何儀式，就將仍有餘熱的血淋淋的屍體扔進坑里，一埋了事。這時使西藏陷入混亂的文化革命已經有四年了，西藏正在開始結束混亂局面，而中國官員又企圖靠殺人的辦法來重新獲得對西藏人民的控制。

1962年10月18日午夜，丹增曲扎乘坐的卡車來到了能夠看到布達拉宮的地方。三年前離開西藏時的他們這些藏人只剩下了二十一人，從中國乘車返回西藏。艱難的旅途將他們一個個折騰得筋疲力盡。在西寧——拉薩的公路上，當汽車左右顛簸時，只有那些身體最好的人，才能隨著汽車的搖擺盡力保持身體的平衡。每逢汽車轉彎時，其他人雖盡力靠在一起以保持平衡，但也抗不住慣性的力量，也只好聽之任之。他們爬越了距那曲有五個小時行程的唐古拉山口，這時大家都想從

氧氣袋裡吸幾口氧，還是有些人昏過去了。此後，稀薄的空氣和嚴寒，使他們期待回家的熱情也涼了半截。到旅途快要結束時，他們的心情才好一些，因為布達拉宮在它身後的山峰襯托下，映入了他們的眼簾。

卡車走的是北面那條路，繞過拉薩城，十分鐘後就進了扎吉監獄的大門。它是西藏最重要的監獄，圍牆高二十英尺。原來，它是藏軍扎吉團的司令部，1959年9月時這裡的軍營接收了三千名犯人，其中大多數是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喇嘛。這些犯人被迫給自己蓋牢房，開始是他們在一道內牆裡面，修了一棟沒有窗戶的絕密牢房，可以關押二百名高級喇嘛和官員。接著他們又在外修起了一道圍牆，院內蓋了一些牢房，後來又修了一家醫院，專為拉薩的中國官員治病。從此以後，扎吉監獄成了在民主改革期間被捕犯人在西藏的主要集散點。一旦犯人的案件定性之後，大部分犯人就被遣送到西藏自治區日益增長的各勞改營，關押在這些勞改營的犯人最後高達十萬多人。據曾關押於此的一名犯人說，扎吉監獄關押的犯人為一千七百人，犯人中常常有人死亡，因不足數每月都要進行補充，每次補充十到十五名新犯人。

在扎吉監獄，丹增曲扎真正弄懂了「再教育」的確切含義。扎吉監獄不同於拉薩城內和其他五座監獄，這五座監獄直到八十年代，仍關押著七千至八千名政治犯——幾乎為拉薩人口的五分之一。扎吉監獄並不強調實行強制勞動，而進行思想灌輸則是紮吉監獄的特點。只有上廁所是例外，曲扎醫生和監獄裡的其他犯人，除了睡覺之外的所有時間都得用來學習——這是精神上的進攻，事實證明它比肉體上的折磨更為厲害，使人心神不安。現在，精神崩潰、抑鬱症以及自殺行為都出現了——以前之所以沒有這類現象是因為肉體上所受的折磨，而一旦精神成了受折磨的主要對象時，上述情況就不可避免。犯人一到這裡，就得牢記八條規定，這些規定是「再教育」的基礎。犯人不許談論各自的背景、被囚禁原因以及學習之外的別的任何內容。而且，他們都得坦白交待；為達此目的，要求每個犯人揭發檢舉自己的同伴。另一方面，犯人必須經常歌頌黨，並從自己的親身體會中，舉例說明黨的光輝指導使他們獲益非淺。最後，不允許對糧食定量埋三怨四，所有命令必須五條件地服從，不許破壞財產，不許放聲大笑，不許唱歌，不許高聲講話，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整潔。

曲扎的牢房是關押十四個人的牢房，位於外院東側。房間太小，只有十六英尺長，十二英尺寬；因此當人們分兩排頭頂著頭睡覺時，雙腳能觸到牆根，所以大家不得不縮著腳睡覺。扎吉監獄的膳食主要是糌粑粥和白開水煮青菜。但曲扎醫生這幫人抵達這裡十五天後，他們第一次嚐到了酥油茶，這是他們多年來第一次喝酥油茶，此後他們隔天都可以喝上酥油茶。接著的兩個星期，親屬也獲準來探監，他們帶來了肉、炒蠶豆和青稞。曲扎的弟弟多布吉也來了，他帶來了一隻犛牛頭——這是他盡全力所搞到的一切。不過，這些禮品雖能使他們開開葷，但也讓他們吃了苦頭。犯人們將這些食品分成若干份，每天一份，然後是一頓狼吞虎咽，結果腹部劇烈疼痛，接著是腹瀉。犯人每天可以出來上三次廁所，但每次離規定時間還很遠時，牢房裡那個晚間用的小木桶就會漫了出來，弄得房間的地上到處是尿尿。房間內的氣氛本來就很幽閉，再加上這股臭味，令人無法忍受。在這段時間，曲扎醫生骨瘦如柴的身上才長了點肉。似乎發生了奇跡，頭髮和眉毛又長出來了，這樣他和同伴們看上去就更像人了。但它們的身體仍很脆弱，隨著五官各部位的機能在恢復，稍有刺激就會感到難受。約二十碼之外的廚房工作人員開始燒茶做飯時，那股誘人的香味使人飢餓難熬。長時間來，他們一直身體虛弱，因而也不感到餓，但現在飢餓感捲土重來，不論他們吃多少，總是感到腹部很空。就是這樣飽吃一頓、腹瀉一場，反復多次他們的身體逐漸恢復，朱鎮監獄的悲慘生活也慢慢淡忘了。

他們自己選了個組長，由他負責，開始了再教育。學習時要發一張當時的《西藏日報》，作為討論的起點，組長負責會議記錄。鬥爭會還是有，因為有些人不太聰明，他們不會用一些要求他們講的話去掩蓋自己的討論發言，因此成了鬥爭會的對象。接著有一次，中國人宣布曲扎醫生那個組要接受更為嚴厲的處罰，但卻沒向他們作任何解釋，1963年秋天，也就是他們到達扎吉監獄一年之後，他們被轉移進了那座絕密牢房。新牢房與舊牢房大小一樣，只有幾個小洞，每個洞兩塊磚頭大小，以便採光透氣。看守將他們的腰帶和鞋帶全沒收了，以防自殺。這些藏人後來才知道，監獄裡的犯人利用牢房天花板上小煙洞下方的木板，吊在那上面自殺。沒有幾個人能忍受這樣的囚禁，終日不活動，每天是沒完沒了的冥思苦想。

一天，曲扎醫生和他同房間的犯人，聽到房間外的院子裡一陣喊叫，接著是槍聲。後來他們有次放風上廁所時，看到地上橫著一具中彈倒地的屍體，他是彭波來的農民。他本來關押在他們後面的一間牢房裡，在看守的監視下去上廁所時，企圖動武。後來又有一次，曲扎醫生聽到牢房外的一名犯人不顧一切地高呼：「我不要馬克思主義，我要宗教！」他回到牢房之後，憤怒不已，從掃帚把上扯了一根細枝，將一塊布纏在上面——當時他只能找到這些東西，然後高喊：「西藏獨立！」他被帶走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這是曲扎醫生被關押的第三個階段，他的情緒一直非常抑鬱。

1965年5月一名看守來到丹增曲扎的牢房，叫他收拾一下為數不多的幾件東西。這次也是未作任何解釋，他又被帶走了。當時一輛吉普車在扎吉監獄外院等候。汽車沿著拉薩河谷朝東北方向行駛。這裡是桑伊監獄，它建在一條峽谷裡，位於一座高山的兩處尖坡之間。監獄本部及其易度吐（5）分部（這個分部的條件在該監獄居中）兩個單位位於峽谷前部。這裡有三道牆，每道牆上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座崗樓，後部借用懸崖作圍牆。該監獄的第三部分是玉第吐（6）分部，在峽谷南面五百英尺處，四周有一道圍牆，它離中國人居住的一個單獨的大院很近。曲扎醫生被關押已經有六年了，但從未向他提出犯任何具體罪狀的指控，沒有審訊，更不用說判決了。他被關進了一個能容納十三名犯人的秘密牢房，中間是一條混凝土鋪的過道，兩旁撒了沙子供犯人睡覺，他再次面臨沒完沒了的「再教育」。

曲扎醫生離開扎吉監獄來到這些新夥伴中間之後，他們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現在，他認為最艱難的監獄生活已經過去。在西藏軍區院內的絕密監獄那些日子裡，他首次嚐到了一場場鬥爭會的滋味，他的牙齒被打掉了，眼睛也受到了傷害；接著是朱鎮監獄和扎吉監獄的艱難歲月。經過這一切之後，他現在已經學會了怎樣裝出「自我改造，已有進步」的樣子，而內心世界卻根本不接受思想教育那一套，特別是宗教信仰仍使他沉著鎮定。每天晚上，他都要做吐莫（7）操。自從去年他在中國以來，還輔之以默默背誦經文。此時，他在桑伊監獄冒了一次很大的風險。他在一根繩子上紮了一百零八個結，權且用它作念珠，拿著它念經。每天晚上睡覺前，他總要背誦四五百句：一半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的，另一半是智慧無邊的文殊菩薩的。實際上，其他人早就產生過這一想法，隨著他們加深了對新夥伴的信任，他們也都在他面前背誦經文了。曲扎醫生在桑伊監獄裡背六字真言達三百萬次，他知道其他犯人的背誦次數是他的二倍。

丹增曲扎到桑伊一年多點之後，一天上午，犯人像往常一樣將自己的缸子擺到牢房的窗子上去接茶。但廚房工人經過時，他們才知道酥油茶已經停止供應了。從此以後，喝酥油茶也給貼上了這樣的標籤——它屬於「腐朽的舊制度，只有反動派才沉溺於喝酥油茶。」打那以後，只供應「無產階級的」白開水。青菜湯也不供應了，現在吃的全部東西就是小份糌粑，一日三次。幾個星期後，犯人們分發了毛的紅寶書，這時他們才猜測監獄外面一定在發生什麼大變化。在接著的十年期間裡，紅寶書成了學習的主要內容，文化革命也滲透了監獄裡面。但是，雖然當時的飲食又恢復到了近乎挨餓的地步，但隨之而來的政治上的變化倒是福音。結果，那本紅寶書卻可以用來為他們誦經作掩護。他們每天翻開那本紅寶書，背誦的卻是經文，一天完了還可以計算一番，房間裡的所有犯人心裡充滿了新的希望。無論那些粗心大意的看守朝房間裡瞧多少次，他們總是看到十三名犯人無一例外地在念紅寶書，看上去是全神貫注，甚至嘴唇稍微動一動——這在過去就足以給許多犯人招來鬥爭會，而現在倒好像人們在專心致志地背誦毛的語錄似的。

1972年，曲扎醫生終於得到了判決，它是根據四年之前通過的刑法作出的，刑法規定四種犯人不得獲釋：邊境犯人；「反動分子主犯」，如游擊隊和地下組織的成員；沒有家屬的犯人；最糟糕的一類——丹增曲扎就屬於這一類——是與西藏舊政府有關聯的上層知識分子。他們與其他類型的犯人一樣，要受到六種刑期之一的判決，刑期從十二年至三十年不等。有些判決需要復審，其他的就不用了。除此之外還有死刑，緩期一兩年執行；此後如果犯人被認為改造較好，還可以改為無期徒刑。曲扎醫生的判決是十七年徒刑，他已服刑十三年。即使如果沒有對他提出任何指控，最多也只能將他的地位改善改善，讓他成為「自由工」。就像在朱鎮監獄一樣，這些人居住在監獄圍牆外的牢房裡，無人看管，自己去上工幹活。每隔兩個星期，這些「自由工」就可以三人一組，去拉薩探望家屬。他們像西藏其他人一樣，也是掙工分，買自己的定量糧，監獄什麼也不給他們。由於這一做法，犯人自由的希望幾乎等於零。每年冬天進行核算時就很清楚，勞動隊是十分需要的。這時，桑伊的利潤——每個勞動區總要掙上幾十上萬元——張榜貼了出來，這一數字確定下一年的生產指標。如果沒有這支「自由工」大軍，產量超過前一年是不可能的。因此，桑伊監獄靠的就是這樣一支穩定的隊伍，當然如能增加就更好。另一方面，一旦犯人、自由工病情太重或年紀太大不能再幹活時，監獄就會立即將其打發回家。曲扎醫生親眼目睹過老人多次被逐出監獄的情景。這些老人苦苦哀求不要將他們送回老家，因為家裡無人贍養他們。但他們的要求卻遭到拒絕，結果還是被強行攆走，要飯或找死，聽其自便。

判刑之後，曲扎醫生從桑伊轉移到了鄰近的易度吐分部，這裡的條件稍微好一些。過去十年的囚禁生活，他一直活動很少，在這裡結束了這樣的生活，他的「再教育」被認為完成了，將他分配到監獄的採石場。這項工作和做磚頭是留給藏人幹的活；中國犯人修汽車零件，幹工廠活兒。現在他每天則必須鑿九十塊十二英寸長、八英寸寬的石塊，原料也就是監獄後面山坡上炸下來的岩石。他與其他五名犯人一起幹活，只能勉強完成自己的定額，因為長期不動彈，肌肉萎縮十分嚴重。他們中間的兩人將大塊岩石用鐵錘敲成小塊，其他四人則忙於鑿這些石塊，他們四人必須完成六人的定額。這項工作非常危險，犯人的眼睛和臉龐經常遭到飛來的小石片的襲擊。他們要用扞子和大鐵錘，握扞子的那個人常常挨打，原因是速度在

不斷加快。在監獄內的一座牆上掛了一塊黑板，黑板上方有一塊鋅板擋雨，黑板上公佈了各組每天的進展情況；這裡好像中國境內的監獄一樣，誰要是沒有完成任務，就得在會上挨鬥，以促使他改進。

隨著丹增曲扎對新生活的適應，戶外的新鮮空氣和勞動使他逐漸增強了體質。翌年，他產生了相對的滿足感，它越出了自己已經努力獲得的超然感。有一天，他正在幹活時，有人將他叫走了。他被叫到一位姓李的中國醫生面前，當李醫生以巴結討好的口吻同他講話時，使他感到驚訝不已。李醫生解釋道，他從桑伊的檔案材料中找到了丹增曲扎的名字，他受一種疾病的折磨已有多多年，他想找丹增曲扎醫生看看會有好處。接著，請曲扎醫生給他診斷。這一請求特別令人吃驚，因為儘管門孜康自 1959 年後一直對外門診，但中國人從來就不相信藏醫。曲扎醫生給李醫生看了脈，李醫生的手十分粗糙，皮很厚，劃破的地方不少，要給予明確的診斷很不容易，但曲扎醫生仍然發現——而且很正確——是肝病。李醫生非常激動，他說他的病情十分嚴重，曾不得不兩次去內地治療，西醫、中醫李醫生都試過，但都沒有療效。曲扎醫生給他開了一些藏藥，並說治好並不難。接著，李醫生從門孜康拿了藥，病也就好了。李醫生恢復健康之後，也給曲扎醫生的命運帶來了大變化。李醫生在公安廳的職位很高，他與拉薩公安廳的主要領導就丹增曲扎一案進行了商談。在商談時，他指出曲扎醫生的醫術也許對國家有用；當時國家剛剛實行放寬政策，叫「四大自由」，旨在重振「地方文化」。三位患有慢性病的公安廳官員也來到易度吐分部，他們召來曲扎醫生給他們診斷治療，三人的病全治好了。結果，他們將曲扎醫生從牢房中放出來，讓他到桑伊醫院工作；對此，他根本就不敢相信。隨後在 1976 年，他十七年徒刑服刑滿了之後，又將他調到了玉第吐，它是桑伊監獄條件最好的部分。在這裡，雖然官方仍認為他是「人民的敵人」，但他已成了「自由工」，他的身份證上仍寫了「壞分子」幾個字。

曲扎醫生命運的好轉，對他來說就如同從地獄到了人間。他能夠再次獲得行醫的機會，十分激動，但他十分清楚，只要說錯一句話，或是哪位不高興的官員忽生一念，他立即又會重新打入地獄。變好的境遇只能使他念念不忘自己仍很容易受到衝擊。

有位中國女醫生姓劉，曲扎醫生認為她「粗暴無禮，心地不善」。劉醫生被派到西藏援藏三年，她是桑伊醫院的四名醫生之一，丹增曲扎和另一位是藏醫。這位女醫生仗著有黨給她撐腰，就是要取壞藏醫及其醫生的名譽，想證明西藏文化是毫無價值的。夏季，她堅持讓藏醫醫生在醫院門廊的一角接待病人。冬天，中國醫生霸佔著生了火的房間，而讓藏醫醫生待在沒有生火的庫房裡，房間裡除了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之外，什麼也沒有。

曲扎醫生每月的工資為二十八元（十四美元），每年用來從門孜康購藥的經費只有五百元（二百五十美元）。病人找曲扎醫生看病之後，又會被叫到那位女醫生面前——不管他願意還是不願意。她問清曲扎醫生的診斷之後，接著提出自己的診斷意見，然後又將病人帶到曲扎醫生面前，再來到監獄領導跟前對曲扎醫生的診斷橫加指責。這時，爭論愈演愈烈，領導只好進行幹預，他們對於完全對立的診斷結論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經過幾個月調查之後，他們得出了一致結論，這一次是一致支持丹增曲扎醫生和藏醫，這是出人意料的，中國官員當眾宣布，儘管政府長期以來對藏醫持懷疑態度，但現在藏醫的價值卻一清二楚。後來作出了決定，對門孜康投資是值得的。此外，在國家的資助下，對在文化革命期間未遭毀壞的醫書要進行大規模的尋找。一座現代化建築的藍圖已經問世，在曲扎醫生領導下的以哲蚌寺為基地的藏醫研究計劃已經開始實施。曲扎醫生也有了公開的頭銜「藏醫醫生大師」。他的工資從五十三元提到了六十三元。此外，1979 年由於他堅持自己的意見，終於為藏醫醫生贏得了給病人開假條的權利。雖然曲扎醫生仍在玉第吐分部，但他已感到自己的生活發生了一個轉折。中國人雖無跡像要摘除他階級敵人的帽子，但對他的醫術已確信不疑。他終於獲得了一點點自由。

中國統治西藏十二年之後，西藏似乎全完蛋了：成了一個極度貧窮的警察統治的國家，西藏人民喪失了意志，甚至其佔領者也不例外。對於西藏的中國人來說，很清楚文化革命已歸於失敗。文化革命沒有帶來奇跡，它不是通向純共產主義的大道，反而將為成立西藏自治區而進行的六年努力所取得的大部分成績全部毀於一旦。光輝的社會主義天堂，似乎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遙遠。為了挽回損失，黨的領導人視七十年代為防禦時期。西藏不再是造就新人的熔爐，而只是要求西藏生產糧食，供養軍隊。現在，這倒成了佔領現在的並不迷人的目標，就如同所有的新政策一樣，實行這些新政策也以改組現存的黨組織揭開序幕，這樣的改組與中國內地相類似的變化緊密相關。

1971 年夏季，西藏發生了共產黨統治以來黨內的第四次變化。這次變化是毛澤東與其指定的接班人、國防部長林彪之間的鬥爭的結果。為了削弱毛自己培植起來的這個人的權力基礎，毛更換了中國五個自治區當中三個最重要的自治區的軍事領導：西藏、內蒙古和新疆。大多數更換對象原屬於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西藏的曾雍雅調到了瀋陽軍區。作為革命委員會

的十三個副主任之一的任榮原來一直坐等一旁，現在他重獲主要領導職務，在 1967 年的「二月逆流」期間他曾短期擔負主要領導職務，儘管任榮原來也是四野的人，但他的保守態度使他登上了主要的領導崗位。不過，為了限制他的權力，另一位忠誠的毛主義分子、西藏前領導人陳明義重登舞台，當上了西藏軍區司令員，但為時不長。任榮出任西藏革命委員會主任，後來還擔任了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當時是 1971 年八月，文化革命開始五年之後，西藏恢復了黨組織，它是中國最後恢復黨委的省區。就像 1959 年至 1965 年一樣，中國人不得不再次在全區成立黨組織，以便統治西藏。1972 年成立了四個地、市一級的黨委。在拉薩市委的六十六名委員中，擔任書記一級領導人的藏族只有兩人；在二百九十三名區局一級的黨委領導人當中只有六名藏族。除了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民積極分子之外，自治區一級有點名氣的藏族領導人當中只有天寶（桑吉益希）一人。他是自治區新黨委的書記之一，還兼任西藏軍區第二政委，最後他於 1979 年 8 月接替任榮出任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但並沒有接任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天寶的升遷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外界，藏人已真正當家作主。事實上，雖然天寶出身於藏東地區，但自他十四歲加入紅軍的長徵隊伍以來，他就加入了共產黨。他的妻子是漢族，他根本就不講藏語。

1972 年 5 月 8 日，拉薩的廣播電台報導，共青團在羅布林卡（現為人民公園）舉行了「大型野餐會」。他們在園內唱歌、跳舞，開展娛樂活動，它像徵著政策的放寬，旨在確保藏人與新領導攜手合作。兩個月之後，自 1959 年以來從未聽說過的「四大自由」也正式公之於眾：信教自由、買賣自由、借貸自由、僱工自由。不准穿藏服的禁令也予以取消，帕巴拉·格列朗傑等與中國人合作的上層人士，在文化革命中蒙受了不白之冤，現在也予以平反昭雪。還制定了修復破壞嚴重的大昭寺以及其他幾座寺廟的計劃，並已開始付諸實施。那年年底，在晚間的會議上開始了大家更為熟悉的運動，名曰「一打三反」。一打是打擊「反革命」；三反卻拿政策放寬所鼓勵的幾大自由開刀，即反鋪張、反唯利是圖、反浪費。

1974 年剛開始，又重新發起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攻擊。林彪在中國國內遭到批判時（他企圖發動政變，進行暗殺之後），一位高級官員於藏歷新年後不久抵達拉薩，他在軍區院內向黨的領導幹部作了講話。他說，在現在對中國人的統治仍存在著兩種危險：國外有印度支持下的流亡的達賴喇嘛；國內西藏人民對於班禪喇嘛無視北京仍十分欽佩。這兩個喇嘛是「一丘之貉」，對他們要再次批判譴責，形式可以是會議、流動宣傳隊以及展覽。這些展覽的展品有一百零八個頭蓋骨製成的念珠，據稱這些頭蓋骨是從獻祭給達賴喇嘛的「受害者」身上取來的，還有班禪喇嘛圖謀發動叛亂收集的手榴彈和機關槍。這場批判運動一直持續到 1975 年，這時又搞了個新花樣，企圖爭取難民回歸西藏。拉薩的廣播電台播放了一些藏人的講話，有時竟播放六十多次，這對於聽到這些講話的親屬來說是特別痛苦的。1976 年 6 月 5 日播放的講話就很典型，一位名叫玉珍的昌都婦女讀了一封寫給她流亡在外的哥哥強巴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親愛的哥哥強巴：

我是你的妹妹玉珍。我們分別已有十八年了，你可能仍記得我曾是個愛唱愛跳的小姑娘吧。在我們的姐妹當中，你最喜歡的是我。我們的生活很幸福，生活得很好。現在全城到處是高樓大廈、醫院、百貨商店、學校、銀行、郵局、餐館、影劇院……晚上燈火齊明時，收音機裡傳來了甜美的樂曲……哥哥，你過去很愛吃舌頭，我仍記得你以前打發我去為你買舌頭的情景。隨著許多食品業的興起，在市場上可以買到許許多多的食品，其中就有舌頭。如果你想再次品嚐各味舌頭的話，你一定得回來……呵，如果你能回來與我們共享幸福生活，那我們該有多高興啊！我們有一句俗話不就是這樣說的嗎，鳥大歸巢，人老還鄉……哥哥，請你相信我吧！如果你想擺脫黑暗，走向光明，那你就回來同我們一道生活吧！你的家屬、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都會歡迎和尊重你的。

強巴在《西藏評論》上公開發表了他的回信。強巴說當他再次聽到妹妹的聲音時，頓時回想起了父親以及其他親屬的音容笑貌，他恍惚是在做夢一樣。但對於妹妹被迫在電台上讀這樣一封信，他表示無比憤慨。顯然其他藏族也有同感，因為截至 1975 年止——這次吸引西藏難民回歸的工作已進行了十五年，拉薩的廣播電台報導回國定居的藏胞仍為數甚少。

1975 年，對原來西藏社會分為六種不同成份的階級劃分辦法作了修改，旨在安定西藏全國。在四個月的時間裡，晚上的會議更名為「社會主義改造專題會議」，會上，專門委員會要刨根究底地提問，弄清楚從八歲開始的每個藏人的歷史。人們如果從並寫好他們的簡歷後，在會上要予以宣讀，供大家「批評和評論」。接下來，要求人們給自己劃成份——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貧苦階級出身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無處不在。人人都很擔心，尤其是父母對於自己的孩子劃定什麼階級成份更是憂心忡忡。最後確定了八種階級成份，新添的兩種成份是「城市貧民」和「遊民」，遊民即妓女和扒手。因為父母的

行為，年輕人劃定了上述成份時，他們會互開玩笑，「我這輩子從未做過妓女，也沒當過扒手。但現在，我倒正式屬於妓女階級了，我認為走上街頭，當個妓女倒成了我的義務。」

1975年9月是西藏自治區成立十週年的紀念日子。考慮到西藏局勢持續不穩，因此北京派來的中央代表團團長是當時的公安部長華國鋒，這絕非偶然。當時，阿沛·阿旺晉美也是七年來第一次返回西藏。阿沛比代表團先到一步。9月6日在拉薩南面新建的貢嘎機場，他向代表團表示歡迎，純粹是為了讓照片見報。三天後，五萬人在拉薩體育場集會，聽取大會發言。講話人歌頌了西藏自治區十年來的成就，同時譴責了「達賴集團復闢封建農奴制的反革命目的」。天寶說要歌頌的成就的確很多。儘管全區「階級敵人」仍然很多，但他們聲稱全區百分之九十的公社自成立以來，農業連年增產。在過去的十年中，糧食產量幾乎增長了百分之五十，牲畜頭數增長百分之二十五。當局聲稱，西藏於1974年就已成為自給自足的地區——這種說法得到了1979年中央情報局一份報告的反駁，也得到了難民們的反駁。雖然種植了約四萬六千公頃的冬小麥，但藏人充分意識到，農村仍有大片地區無米下鍋。但是，全國貧窮的事實對當局影響卻甚微，他們仍然要顯示西藏自治區成立之後所取得的成績和進步。正如阿沛·阿旺晉美在1976年的一期《中國建設》上所說的那樣：「我已年逾花甲，但我從未看到西藏人民生活這樣幸福，這樣興高彩烈，決心這樣堅定……甚至連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像西藏這樣，只花了二十五年時間，一個民族就從極端落後的封建農奴社會跨入了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真是世屬罕見。」

不過，中國人在統治西藏的第二個十年期間，是獲得了一些成功。這完全只限於經濟和軍事領域內成就。從經濟上而言，北京對西藏高原的剝削主要是林業和牧業——在七十年代期間，兩方面均有增長。康區的一座座大山的森林和波密、達波以及貢布低海拔地區的森林全部一砍而光，源源不斷的木材沿著流入四川、雲南的大江大河紮排放了下去。中國內地於1981年和1982年發生特大洪災時，中國才意識到大肆砍伐是多麼愚蠢。為獲得皮革和肉食而在安多地區大肆宰殺牲畜，速度也是同樣的快，不過計劃還是比砍伐森林有節制一點。從1973年以來，中國科學院先後共派出四百多名專家來藏，對西藏的地熱資源、礦物資源以及石油資源進行了考察。已經開采的有煤和礫砂，接著又開採了鐵、銅、鉻、鋰、鎢、鉛、金、銀、石油和鹽——儘管它們的儲量佔中國已查明的礦物資源的百分之四十，但全部都只能進行小規模開採，產量不高，因為從偏僻礦區往外運礦困難實在太大。截至1980年止，據說已開工生產的工廠約有二百家，是六十年代中期的兩倍。小規模企業的職工主要是中國的移民，這些工廠生產白糖、化肥、火柴、牙膏、肥皂、墨水、餅乾、毛毯、電池和農具。雖然水電站和每隔五英里的一個道班遍布西藏自治區的部分地區，但大城鎮的藏民居住區直到深夜才有電供應，這時中國人居住的區段的用電高峰已過；除了為數不多的藏族幹部之外，新建的公共汽車系統完全供漢族地方與連隊工作人員享用。林芝靠近拉薩，修建了一個大水泥廠（1964年竣工）和一個汽車修理廠，它是西藏的唯一工業區。如同西藏的其他工廠一樣，這個工業區的就業機會及其產品歸中國的移民專有，這些移居高原的漢族第一次開始大批湧入西藏。

1952年，毛澤東曾說過，最終將有一千萬漢族定居西藏。但大批移民還來不及開始，西藏全國的局勢就呈現不穩，必須予以穩定。1966年以前，在西藏一直有人民解放軍和為數甚少的幹部和技術人員掌權。早期抵藏的紅衛兵是湧入「世界屋脊」的首批大量的中國平民百姓，接著1968年的「下放運動」又給西藏增加了一些人。1975年5月16日，拉薩的廣播電台公佈了中國移民不斷抵達西藏的消息。根據七年之後的1982年的中國人口普查公佈的數字，漢族人數已增加到九萬六千人。但據藏族幹部估計，如果將他們的家屬算在一起，光在西藏中部的漢族就多達六十萬人——佔全區人口的三分之一。無論精確數字是多少，它都遠遠低於毛所希望的數字。

中國移民所帶來的最為引人注目的變化是那些「新城」；水泥鋪的院子，起波紋狀的鋅板蓋的屋頂，辦公樓和生活區都在一個院子內，這些院子幾乎將所有的西藏舊城鎮包圍起來了。從1970年起，拉薩的新城將舊城向外擴張了八平方英里，新建了九十一條馬路，新城區擴大到了東至色拉寺（8），西達哲蚌寺範圍之內的地方。新城區全是藏民蓋起來的，但只有那些與中國人關係密切的藏人，才能住進這些新城區。在這裡，這些藏人目睹了遠遠高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西藏漢族官員的家屬通過拉關係、開「後門」進了西藏，他們只需幾天時間就可以安排工作，而藏族工人卻要努力幾年才能獲得這些工作。從商店的發票到政府的報告，一切公務都用漢語進行，無論是從社會方面還是從生理方面而言，這些移居西藏的漢族都感到十分孤立。藏人治病要麼靠的是受過六個月急救訓練的「赤腳醫生」，要麼在病重時，通過賄賂進入中國人辦的醫院治療；漢族移民則享受免費醫療。漢族小孩上學有專門的學校，而藏人的學校幾乎根本不存在。藏人學校要放春假和秋假，這樣為數不多的學生（他們的父母不要他們幹活去掙幾個工分）就可以幫助幹農活，而其他時候他們也常被叫去修路、割草、積肥和消滅害蟲害鳥。學校開設的課程只有漢語、馬克思主義和數學。但漢族移民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不同點是他們的糧食定量要高的多。即使供應緊張時，中國人每月也可供應三十至三十五磅大米和麵粉，這是藏民供應量的兩

倍。此外，在購買所有消費品方面，中國人享有優先權。藏族高級幹部能夠可望買到的最好商品，就是湖北專為西藏人民生產的「紅旗」牌半導體收音機。為了使三、四年的援藏任務更易被中國技術人員所接受，冬天他們可以享受休假；在拉薩的中國內地人秋末離開拉薩，這時進藏的每個航班和每輛長途汽車都空無一人，但出藏時卻全部坐滿了中國人。

中國人移居西藏隨所帶來的另一負作用是大批傷害迄今為止保護得很好的野生動物。在大批捕殺野驢時——這使人連想到十九世紀美國西部大量捕殺水牛，人民解放軍使用了輕機槍，既為殺驢取肉，也為打獵取樂。中國在西藏的定居者外出下鄉時，總是帶上武器，捕殺野生動物，致使許多稀有野生動物瀕臨滅絕——其中包括雪豹、喜馬拉雅猴、瞪羚和野犛牛。1980年5月，由來自十七個國家的六十多名科學家組成的一批外國人終於獲準考察西藏，他們沒有看到任何大的哺乳動物，鳥類也寥寥無幾，甚至曾一度多得無數的野鵝野鴨也不見了。

中國人在西藏所取得的一個徹底勝利是軍事方面的成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中期，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修建能通過七噸載重卡車的公路。到1965年時，西藏自治區的百分之九十的縣都通了公路；到七十年代初期時，幾乎所有的縣都通了公路。兩條戰略公路從藏南通向境外，一條通尼泊爾，另一條接巴基斯坦。無數橋梁——它們在西藏的眾多河谷中十分重要——將公路網連成一片。

人民解放軍完成築路任務之後，集中精力將西藏變成一個堅不可摧的堡壘。西藏原來的三個行省，現分屬中國十一大軍區當中的四個軍區（9）。西藏自治區的七十一個縣個個都修建了不少小型軍事基地，一個大型軍事基地。這些基地分屬六個軍分區指揮，每個軍分區有一個四萬人的師。拉薩是西藏自治區五十萬駐軍的司令部，其中約半數部隊布防於沿喜馬拉雅山脈的邊境地區。修建了十四個大機場，還有二十個簡易機場專供軍用，只有拉薩南面的貢嘎機場才供地方使用。

喜馬拉雅前線至關重要。它由幾十個秘密基地、軍隊的地下據點和給養倉庫所組成，下面地道將它們連成一片。地道橫穿西藏，長達九百三十二英里，西藏難民給它安了個綽號，叫「毛的地下長城」。防線中間是重要的春丕谷。1962年的邊境戰爭之後，這個河谷至少駐紮有一個師四萬人的部隊，春丕谷東面，由各基地構成的中國防線正面是東北邊境特區，防線的後方司令部設在昌都。防線朝西延伸到六百三十八英里外的日土，喜馬拉雅邊防線的指揮中心設在日喀則。

埃非爾士峰（10）北坡駐紮著一支主力部隊，距定日縣的司令部很近。1967年初，一隊高級軍官陪同六名科學家來到山上。他們走後八天，一片二十平方英里的地方被封鎖起來，連該區域內的藏族養路工也由中國士兵取而代之。在二十六名解放軍軍官的陪同下，三名科學家又返回此地。接著，1968年5月裝運設備的軍隊來到了仁布寺跟前，該寺位於高一萬五千英尺的山坡上。據說，到9月份時，周圍山上就挖了一些大山洞，出口進行了精心偽裝，以防空中偵察，這些山洞由地道將它們連成網絡。地道很寬，在裡面吉普車和卡車可以對駛。這些山洞的規模很大，據西藏難民和尼泊爾的夏爾巴人說，裡面可以駐紮整團整團的部隊。地面也修起了越來越多的軍營，到1970年時，這個地區的山梁上架起了雷達裝置。1973年，在西藏西部的日土安裝了全套雷達裝置。印度情報部門證實說，安裝這樣的雷達裝置不僅是為了監視發現來犯的飛機，而且它還可用來作為衛星和導彈的跟蹤站，這一點更顯重要。雷達站進一步證實了印度1968年以來的疑慮：北京決定要在西藏的腹心地帶設置中國的主要核基地。

1969年夏天，印度情報部門的人士向新聞界首先透露，中國正在將其核基地從新疆的洛帕諾轉移西藏境內。據說，一個氣體擴散工廠、一個彈頭裝備廠和一些研究實驗室已於前一年搬到了一個沒有對外公佈的西藏地區。儘管新疆的人力不成問題，但洛帕諾顯然容易遭到蘇聯的襲擊。除了西藏更為安全並有受到保護的後勤供應線外，還有兩個有利的自然因素在起作用：藏北的羌塘人煙稀少，是理想的試驗場；一年多雲天氣多，雲層可以妨礙偵察飛機和衛星發現地面設施。1970年，法國空軍的刊物《法國空軍》證實了印度的報導，該刊物說儘管洛帕諾的設施仍在讓其運轉以便掩人耳目，但美國衛星仍發現了這一轉移行動。1976年，新近轉移的基地已被暴露：那曲，它位於拉薩北面一百六十五英里外，地處安多地區南部邊緣地帶，它早已是西寧——拉薩公路上來往車輛的大停留站。

不久，難民的報告披露了進一步的細節。那曲鎮地處安多縣境內，該縣被宣布為禁區，除了幾個獲準的人民解放軍部隊駐紮在此外，藏人和中國地方人士都不得入內。有一個叫羌塘格穆（11）的中途停留站，騎馬距那曲有三天行程，以前這裡只居住著一些游牧民，現在它變成了一個「新城鎮」，到處是中國的工作人員。還有人進一步報告說，地下也修建了一些大規模設施。定日的跟蹤站已經竣工，修建這個跟蹤站顯然是作為那曲的附屬設施，西部日土的基地可以接受一些導彈，但不知是中程彈道導彈，還是中程彈道式導彈（前者的射程為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英里，後者的射程為四百至六百英里）。1978年，人們相信那曲的基地已準備就緒，可以按設計要求佈署彈頭了。印度的情報專家預計，那曲「地位的重要性只

有美國的內華達州試驗場才能與之相提並論」。雖然達賴喇嘛曾呼籲過讓西藏繼續保持「無核區」的地位，但並不能肯定這一新基地是否進行過任何試驗（不過一位目擊者說，他看到過蘑菇雲）。然而，1980年香港的《時報》報導，該基地貯存了七十枚中程彈道式導彈和二十枚中程彈道導彈。這樣，新德里以及印度其他二十座主要城市，還有伊爾庫次克和蘇聯境內的中亞地區以及西伯利亞地區的主要城鎮全部包括在這些核武器的射程之內。由於西藏海拔高一萬四千英尺，遠遠高於其鄰邦，因此中國企圖將西藏最終變成防守據點的理想似乎終於得以實現。但此時此刻，這個國家的命運（從許多方面它也是中國付出的種種努力的焦點）再次成為擺在世人面前；好笑的是，這次的局面是中國領人自己促成的。

譯注

- (1) Charong 的音譯。
- (2) 即《毛主席語錄》。
- (3) 按當時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價折算。
- (4) 藏語容量單位，約二十五斤。也是地積單位，播種一克種子的土地稱為一克地，一克約合一市畝。
- (5) Yidutu 的音譯。
- (6) Utitu 的音譯。
- (7) Tun-mo 的音譯。
- (8) 原文如此，應為北面。
- (9) 三個省即衛藏、康區及安多，四個軍區應分別為當時的成都軍區、新疆軍區、雲南軍區和蘭州軍區。
- (10) 即珠穆朗瑪峰。
- (11) ChangthangKormo 的音譯。

第五部分

第十一章參觀團的西藏之行

1977年—1984年

1976年1月8日，週恩來逝世。繼他死後，朱德和毛澤東分別於7月上旬和9月9日相繼去世。前後只有九個月時間，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長達幾乎四十年的三巨頭一個不剩地死去了。三個半星期之後，北京衛戍區部隊在人民解放軍德高望重的兩位元帥指揮下，於深夜進入中南海，逮捕了「四人幫」：他們是黨內極左派的領袖人物，以毛夫人江青為首，1971年林彪死後，他們打著年老多病的主席的招牌，號令全國。儘管開始顯然是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掌權，但黨內溫和派領袖鄧小平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有效地將大權奪了過來。

對於許多觀察家來說，這一變化只不過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權力移位——這次是權力從黨內的左翼手中又回到了右翼手中，這樣的權力鬥爭一直貫穿於中國三十年內亂的始終。但在藏人看來，這次權力移位卻是意義更為重大的轉折。七十年代初期，乃窮曲均曾預言中國會走下坡路。第二次預言告訴人們，毛死後他所創建的一切將會迅速崩潰瓦解。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相繼逝世，還有7月底在離北京一百英里以內的唐山發生了地震，奪去了十五萬至八十萬人（根據不同估計而異）的生命，這些事件向藏人表明，國家的命運將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藏人相信，這一變化預示著中國一個時代的結束，隨之而來的可能是西藏前途的新開端。

翌年春季出現了第一個政治性的表示。1977年4月底，阿沛·阿旺晉美在北京會見一個日本代表團時，說：「中國歡迎逃往印度的達賴喇嘛及其隨者們回歸祖國……」僅一星期過後，北京就允許拉薩年老的藏人在佛祖誕辰、成道、涅槃的宗教節日圍繞林廓和八廓轉經。不久以後，有親戚在國外的家庭被告知叫他們邀請境外親屬返藏，「因為現在的情況很好」是華國鋒親自正式表示的，他於一九七七年中期號召全面恢復藏族的習俗。但地方幹部要麼沒有意識到這一新政策，要麼就是有意拒不給予藏人這些自由，他們反而又開始了一場「新三反運動」，致使現在全境出現了一個大批斃人風潮。在其它好壞消息混雜而來之前，達賴喇嘛對中國混亂而毫無疑問的調和姿態作出了反應。他專程來到新德里祝賀新當選的人民黨，此行期間他在對新聞界發表講話時說，西藏問題不僅僅是他的問題，也不是流亡事業問題，而是全體西藏人民的幸福問題。達賴喇嘛指出，如果西藏人民感到「不幸福，不滿意」，那麼根本就不存在他回歸的問題。他幽默地又加了一句，如果他的祖國的困境沒有解除他就貿然回去的話，「西藏人民也許會將他攆出去」。

但是，中國的新領導人顯然下定決心要根本改變西藏的狀況。1978年2月25日，西藏在囚禁班禪喇嘛十四年之後，突然將他釋放。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一次會議上露面。據新華社報導，他在這次會議上發言說：「一段時期，我丟掉了愛國主義的旗幟，犯了罪。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我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一年過後，班禪喇嘛前段時間究竟軟禁在何處的消息才走露出來，而且這也純屬偶然。當時，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主要人物之一魏京生在「民主牆」上貼了一份長達二十頁紙的大字報。大字報說，他與班禪喇嘛一道關在青城（1）第一監獄，它是關押黨的高級幹部的高級監獄，位於北京東北面，相距一個半小時行程。魏說，監獄生活令人無法忍受，班禪喇嘛（人們只知道他的編號）受不了這樣的折磨，曾企圖自殺，魏的大字報沒有詳細說明班禪喇嘛為何企圖自殺的原因，而描述了他拒不吃喝的情景。他對監獄官員說：「你們可以將我的屍體送交中央委員會了。」班禪喇嘛現在又圓又胖，雖然他已同意與黨的新領導攜手合作，但合作的深度如何還有待觀察。對於各地的藏人來說，只要知道他還活著就足夠了。

班禪喇嘛重新露面，進一步證明北京有意尋找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與此同時還發生了一起更富有意義的事件，沒有對外披露。通過私下渠道，鄧小平的一名私人使者在達賴喇嘛哥哥嘉樂頓珠設在香港的辦事處，同他進行了接觸。在經歷了十九年的公開敵視之後，中國主動提出無條件和解。鄧為了證明自己的良好意願，邀請嘉樂頓珠來北京，這樣鄧也就可以當面通報嘉樂頓珠他想告訴達賴喇嘛的意見。但嘉樂頓珠在未徵得弟弟認可以前，拒絕去北京。達賴喇嘛說：「我哥哥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刻趕來見我。我聽他講完之後，說：『我們不是任何一個大國的追隨者，我們沒有個人隱藏的動機，我們採取的是誠懇的態度，是為了正義的事業。因此，同中國進行面對面的交談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我又指出：『除了解釋西藏境內外的形勢之外，我沒有別的要說——沒有建議可提。在見到中國領導人並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之後，我們將考慮下一步行動。』接著，我哥哥去了北京，見到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些中國人。當時，鄧承認中國在西藏犯了很多錯誤。鄧還說，他對西藏的前途十分關心。最後，除了就西藏問題泛泛而談之外，他特地請我回去。他說，如果我回歸將受到熱烈歡迎——達賴喇嘛不應只為西藏人民謀福利，而應該為全中國人民謀福利。我認為這很好，我認為這些談話和討論很好。」

雖然丹增嘉措也知道難民社會的大多數人會反對與中國進行妥協，但他卻一直認為妥協是重獲西藏自由的最切實際的辦法。自從六十年代初期以來，他強調了西藏的人權問題，認為這個問題的地位優於西藏的政治地位這一問題；他認為西藏這個國家的困境不在於勢不兩立的不同意識形態，而是人民所受的種種苦難。事實上達賴喇嘛常常對記者說，從理論方面而言，馬克思主義和佛教是可以結合的，因為兩者都認為平等的社會才是理想的社會。他主動將問題從嚴格的政治範疇內解脫出來，允許北京承認其錯誤，而又不至於北京自己的教條過不去。既然北京已經這樣做了，因此他對談判已有基礎這一點信心十足。

這就是達賴喇嘛一方的情況。但中國這方的情況卻複雜得多。首先，在評價鄧小平的主動表示時，不能忘記他的總方針和信念。1978年，也就是激進派領導之下的差不多十五年的動亂時期之後，中國出現了根本的政策放寬傾向。它的目標是

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一直是右翼路線的基本內容。現在，激進派的試驗失敗之後，現代化也是黨恢復其聲譽的唯一手段。作為它的組成部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國新的外交方針力爭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就現在問題而言，國際上對中國入侵者的形象完全是不利的。在這條曾經平安無事的邊界線上，對峙著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亞洲大國，它不僅拖住了大量的人力和資金，而且有可能（儘管這樣的可能性十分遙遠）重燃戰火，將幾乎佔全人類一半的人口捲入戰爭。而眼前更為迫切的問題是：對於中國在現在的合法統治地位，國外反對呼聲仍十分強烈，北京認為這是新德里手中的危險武器。最後，西藏問題給中國最棘手的外交問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蒙上了一層陰影。與蘇聯、印度、越南的分歧，大都集中於分界糾紛，它與中國內部分裂這一潛在的致命問題相比位居其次。鄧與他的左派前任者們不同，他認識到靠武力——在近期內——是征服不了台灣的。西藏難民推測，北京對他們的主動表示就是它努力的組成部分，它企圖努力說服台灣，統一是可行的。而且，他們還認為，中國希望通過消除自己的敵手：一個難以對付的中國政府，破壞西藏境外難民社會的穩定。無論北京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它佔領西藏所付出代價起的是負作用。雖然吞併西藏成功地堵上了中國的「後門」，使它在中亞地區佔據了最有利的據點，但中共領導人現在似乎已經意識到，中共確實實現侵略西藏的目標仍相距甚遠。西藏（意即「西方寶庫」）（2）的巨大資源仍原封未動，它們的開發利用仍不容易。在三十年的時間裡，中國只能獲得一些垂手可得的資源——表層的精華下面是一層永久凍土，再下面才是更多的財富。這些表層的財富是：西藏寺廟數世紀積累起來的財富，康區的木材以及安多的牲畜。儘管中國對西藏高原豐富的礦物資源垂涎三尺，但中國的新領導人也不得不問問自己，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採取什麼方式，才能將它弄到手。除非不惜大力給予補助，否則大規模的移民定居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漢族移居者在西藏待了十年之後，他們的身體仍因地處高原而面臨嚴重問題，吃苦不淺：心臟病、高血壓、流產、死胎的發病率遠遠高於內地的家鄉。西藏的官僚行政機構也運轉不靈。雖然大力進行思想教育和灌輸，但中國的八萬名藏族幹部（據不同估計其中一至四萬人為黨員）卻仍然既不可信，又不精幹。黨最神聖的任務是要贏得廣大群眾的支持，但在這方面也無疑失敗了。諸如班禪喇嘛和阿沛·阿旺晉美這樣的「愛國上層人士」似的傀儡人物，又都十分不宜擔任實質性的領導職務。那麼，除了達賴喇嘛出來領導西藏人民會緊跟外，又有誰能擔負領導西藏的重任呢？如果中國真心願意鬆手放權，那麼讓一位能被當局接受的人民公認的領袖人物出面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從最近的叛亂事件即可看得清清楚楚。

顯而易見，「階級敵人」仍然很多。繼 1972 年的那次大叛亂之後，小型叛亂從未斷過。在文化革命中，康區的十八個縣一夜之間就成了戰場，再加上兇惡的安多果洛人，他們使中國人傷盡了腦筋，企圖完全征服野蠻的藏東人的可能性簡直微乎其微。就在前不久的 1977 年，人民解放軍的一個百多輛卡車的車隊，在滇藏公路上居然也遭伏擊，搶劫一空，然後車輛被付之一炬。西藏中部也是一樣，麻煩事從未斷過。在 1976 年元旦至八月的七個月時間裡，拉薩的廣播電台發表了二十六篇講話——幾乎一個星期一次，譴責西藏自治區內的顛覆活動。藏族高級幹部的破壞活動也在增加，1976 年，連接定日的跟蹤站和藏西南的達瑪地區的一條絕密地下電纜割斷一事就是例證。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發生，當局不斷採取強硬措施，主要是斃人。1977 年 5 月的「三反」（反小商小販、反偷竊、反壞分子）運動致使數千人被捕，接著是一股殺人風，光是拉薩 8 月 1 日（人民解放軍建軍節）一次就公審處決了二十人。從長遠的觀點看，西藏的不穩定，同當局只是對六百萬藏族人民實行高壓統治政策相比，問題更大。儘管藏族人數很少，但他們所佔的地域卻幾乎是中國國土的四分之一。中國的其他少數民族，在漢族的統治下仍然是怨聲載道，他們也像藏族一樣，佔據著敏感的邊境地區。如果他們獲得機會，也會學藏人的樣，要求獲得更多的自由。

倘若達賴喇嘛回歸的話，也許西藏就可以重建，就會開始向中國內地提供它豐富的自然資源。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而言，北京沒有用過的辦法，似乎也只有對話這一條路了。

達賴喇嘛對局勢進行深思熟慮之後，參入了眼下這場微妙的遊戲。班禪喇嘛剛剛重新露面一個星期，達賴喇嘛試了試中國發誓採取的寬厚態度。他於 3 月 10 日發表例行講話時，提出要允許人們自由出入西藏。他呼籲受到了注意。1978 年 6 月，北京令人吃驚地宣布，藏人可以先與國外親屬聯係，然後還可以出國探親，這可是 1959 年以來第一次允許藏人這樣做。流亡在外的藏人焦急地等候來信，以便了解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仍在人世。這類郵件還未開始，天寶就親自率領 1954 年以來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出訪尼泊爾，開始了打開這一封閉地區的進程。

11 月 4 日，中國人採取了下一個步驟。在拉薩舉行了「釋放大會」，會上三十四名藏族犯人露面。其中大多數人是「最後一批叛亂首領」，他們是西藏舊政府的官員，自 1959 年反叛後一直被關押。為宣傳這次大會拍了一些照片，這些人坐在那裡，痛哭流涕，身上穿著新服裝，但頭上又戴著有毛邊的藏式帽，很不和諧，手裡拿著一把把的人民幣和釋放證書。中國的刊物報導，他們這些人在「新西藏」週遊一月之後，現在將得到幫助安排工作，如果他們願意的話還可以出國。他們感謝人民共和國「教育了他們」之後，談到了這次大會的目的，「既往不咎」，爭取全部「流亡在外的藏胞」回歸。西

藏難民對這次會議的反應十分審慎。他們認為中國一貫只是想通過宣布改變政策，就將過去的一切事情輕率地一筆勾銷，這次又是一例。儘管如此，難民們仍贊賞這一行動，為了自己同胞的利益，希望以此來鼓勵中國人進一步放寬政策。

1978年就是這樣結束的。

新年一剛始，發生了一系列經過精心策劃的事件。元月1日清早，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了美國的正式承認。黨的高級官員王炳南公開說：「西藏式解決辦法」是可以作為台灣與祖國統一的方式的。與此同時，班禪喇嘛呼籟達賴喇嘛和其他流亡在外的藏人回歸祖國。班禪喇嘛說：「如果達賴喇嘛真正關心藏族人民的幸福，他應該對此毫無不懷疑。我敢保證，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舊社會』也好很多倍。」一個星期後的元月8日，邀請國外藏胞回歸一事得到肯定，拉薩的廣播電台報導了由西藏自治區的五百名官員參加的一次會議，會上決定成立一個「接待委員會」，歡迎國外藏胞回來參觀。第二天，新成立的「接待委員會」（由一些與中國合作的藏族主要人物組成，都是人民積極分子和上層人士，這樣的組合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宣布，中國將履行其六個月前作出的承諾：給予人們出入西藏探親訪友的自由。該委員會在談到五十年代藏人採取的妥協態度時，說：「我們想坦率地告訴達賴喇嘛，他在歷史上做過一些有益工作。」中國似乎不僅在證明自己卻實心懷「善意」，而且希望通過這樣做，可以迫使達賴喇嘛也作出反應，以免他採取不妥協態度。

1979年元月的最後一天，丹增嘉措在加爾各答對記者發表評論時，作出了反應。他說，他正在盡力「與中國使館取得關係」。達賴喇嘛表示，他的意圖是要鑿通一條與那一小部分資格最老的藏族黨員交往的通道。同時，他批准了一項計劃——由包括單巴次仁在內的十五名藏族青年發起，該項計劃是要通過申請去西藏的簽證，來試探中國同意藏人進出西藏的承諾是真是假。一方面，中國駐新德里的大使館就他們的申請要求，正在與北京一道作出詳細安排；另一方面，拉薩的當局已同意藏人出國探親，這是1959年以來的第一次。這些藏人出國以後，他們說人們現在已經可以圍繞大昭寺轉經了，人們可以超定量購買肉類和酥油，布達拉宮已重新粉刷，粉刷時藏族工人偷偷地將白糖與白色塗料摻在一起，以作為傳統的獻祭。甚至連烏鴉也重返蕭條的拉薩城，因為拉薩市民現在糧食有剩餘，可以做供品糕點，將它擺在屋頂上讓烏鴉來吃。在1979年3月10日的講話中，達賴喇嘛敦促中國人「承認自己的錯誤，承認現實，尊重所有人民享有平等和幸福的權力」。他說：「做到這幾條，不應該只停留在紙上，而應該付諸行動。」北京於一星期後的3月17日作出了反應，它摘掉了六千名「階級敵人」的「壞分子」帽子，又釋放了三百七十六名犯人——顯然第一次釋放的犯人不是「最後一批」被囚禁的叛亂分子。由於那十五名要求獲得簽證的藏人在申請人國籍一欄中填了「西藏人」而不是「中國人」幾個字，他們的申請遭到拒絕。但是，僑居瑞士的一名難民於5月上旬從尼泊爾進入西藏，他是二十年來第一個正式回家探親的流亡藏人。不過，他的回藏探親之行不久被一件更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所壓倒。

經過兩年半時間的接觸之後，達蘭薩拉和北京實現了突破。在達賴喇嘛的要求下，中國同意接待一個正式的參觀團，察看西藏的情況，重新建立流亡政府與境內藏族人民的關係。參觀團由兩名噶倫、西藏人民議會副主席、一名局級秘書和達賴喇嘛最小的哥哥洛桑三旦組成。如果一切情況良好，繼第一個參觀團之後，到時還會再派三個參觀團。這幾個參觀團要交叉往來西藏原來的三個行省的各個地區，只有西部邊遠地區除外。這幾個參觀團將要進行的考察是西藏歷史上範圍最大的考察之一。一旦在印度的藏人收到他們的報告之後，接著將會考慮下一階段的行動。

1979年8月2日，第一個參觀團離開新德里前往香港。他們一行五人抵達機場時，受到了中國官員的歡迎，然後乘車來到了城中一座招待所。翌日，他們參加了在中國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行的午宴，這個分社也就相當於祖國派駐香港這一英國直轄殖民地的代表機構。主人手拿著一杯茅台酒，站起來準備祝酒。他說：「歡迎你們，我們是偉大的中國，你們是中國的少數民族。你們與祖國分離的時間太久了，漢藏人民分屬兩個民族，藏族是中國最大的少數民族之一，我們兩個民族從來就不應該分離。現在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你們回到了祖國，要進行參觀。你們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家，看到自己的故土了。」他最後說：「你們必須明白，你們今天之所以有這麼好的機會，完全是因為共產黨領袖人物的英明政策，完全是因為他們所具備的優良品質。」

他們此行長達五個月時間，這樣的講話走到哪裡都是這個基調。洛桑三旦在回憶參觀團對上述那番話的反應時，說：「我很耐心，但是，這番話是令人氣憤的。這個人說的話句句是謊言。但他講話的口氣卻好像我們大家都表示同意似的。我們沒有致答詞，但那會兒我們別的什麼也幹不得。」

幾天之後，參觀團踏上了這個本土。在廣州機場他們受到了廣州市副市長和一些官員的歡迎，被領著走進了機場大樓。他們頭頂上方是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和一條巨幅標語，這裡站著一些解放軍戰士。洛桑三旦說：「真奇怪，除了我們、海關官

員和那些部隊戰士之外，機場裡空無他人，這使我們大家都感到不安。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共產黨人方逃離了我們的祖國，而現在我們又回到了他們當中。我不得不認為：『現在我最終還是落到了敵人手中。』」他們獲得特別簽證進入中國，而沒有在他們的護照上蓋戳記——這樣也就避開了對國籍問題的不同看法。參觀團成員乘車遊覽廣州城，然後又折回機場飛往北京。他們於晚上九點抵達首都機場，在舷梯下受到了三十名官員的正式歡迎，其中包括國家民委的最高一級領導。這些領導人物出面迎接，說明參觀團的規格很高，但是，他們很快又產生了有意將他們孤立起來的感覺。他們乘車路過了執槍站崗的士兵，徑直來到了一座孤零零的十二層樓高的樓房門前。進入樓房之後，每個人被單獨領進了一個房間，床頭櫃上擺著一杯酸奶和一些餅乾。第二天早上，別人領著他們穿過了一樓的一個餐廳，來到了他們的早餐室。途中，他們一眼見到了這座招待所的其他客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軍官和副官。參觀團成員的不少親友都死在人民解放軍手中，他們總感到中國是在企圖嚇唬他們。正如洛桑三旦所說的那樣：「當然，部隊的招待所所說屬於中國的上等賓館飯店之列。但招待我們這些人，偏要選一個部隊招待所是別有用心的。中國人就是要讓我們知道是誰在當權。」

接下來是製定計劃的兩個星期。每天早飯後，國家民委的一位高級官員高先生，在十幾位帶著西藏詳圖的助手陪同下，來到會議室。他們逐步商定了三個半月的日程安排，全部行程約二千五百英里，停留地點五十個。高先生提供了一張空白圖，肯定地告訴參觀團除了無橋無路的地區外，他們想去哪個地方都行。在討論制定日程安排計劃時，頭幾天每逢休息，高先生還力圖說服參觀團成員同意中國對西藏的既定目標。他總是說：「繼續待在國外毫無用處，你們應該回到祖國定居，我們應該成為朋友，攜手工作。請你們轉告達賴喇嘛，如果他回來，我們會作出適當的周密安排。」

參觀團成員在參觀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時，第一次遇見了自己的同胞。他們在一些藏族青年的陪同下，在校園內散步，眼下暫時無人監視他們，參觀團成員總是急切地提到中國佔領西藏這一話題。洛桑三旦說：「十分清楚，同我們交談過的學生愛國心很強。他們是在外來統治下出生的，他們對於獨立的西藏一無所知。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反對中國人，我們感到驚訝。說到底，這些學生還是作為幹部培養的呵。」第二次與藏人相遇的是在離開北京之後，這次是在甘肅省會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蘭州是參觀團進入西藏東北部地區前的最後一站。參觀團成員再次分為不太引人注目的幾個小組同藏人交談。他們來自鄰近的安多，現在這一地區叫青海省，這些藏人都頗有名氣。洛桑三旦同一位蹲了十九年監獄而獲釋不久的男子，散步於校園內高大的冷杉林中的建築之間時，他對洛桑三旦說：「無論中國人說什麼、做什麼，都不可信，無論他們講我們藏族什麼，都不可信。我們團結一致反對他們，在西藏全國各地都有地下組織，甚至在監獄裡也是如此。尤其是年輕人十分堅定。」

8月28日清晨，參觀團分乘兩輛白色豐田麵包車離開蘭州。隨行的有六輛軍用吉普車，裡面坐著二十名地方官員和從北京陪同參觀團的十名官員。車隊朝正西方向駛去，直奔西傾山腳。在中國平原的邊緣地帶，車隊停了一個小小的回民村莊裡用午餐。然後，車隊開始了兩個小時的爬坡，奔向第一山口，它高達一萬英尺，過了山口就是西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地區。他們期待的情緒頓時高漲，目不轉睛地盯著原野。這時一位站在路邊的皮膚黝黑的中年游牧民映入他們的眼簾，他身著厚厚的羊皮襖，只紮一條辮子，上面是一塊閃亮的藍色綠松石。然而，倒是站在他身旁的黑白相間的那頭犛牛，立即激起人們高聲大叫起來，洛桑三旦叫著說：「犛牛，犛牛！停車！」

車隊驟然剎車停下，參觀團成員衝出車門，向那位游牧民高喊，他只是禮貌地笑了笑，一副茫然發呆的模樣；一旦人們告訴他這些人是達賴喇嘛派來的時，他的臉頓時變樣，令人難以相信。緊接著，他雙手合十作祈禱狀，鞠了個躬，簡單說了句「謝謝你們」。一群婦女兒童從附近的地裡跑了過來。參觀團員一邊同他們分吃蘋果，一邊反復與那頭犛牛合影。洛桑三旦笑著說：「我們根本不管中國人對我們怎麼看，這場面似乎是有些好笑。但人們又怎麼能想像到，我們這麼多年之後重見犛牛，心情該有多麼激動。」他們上車前，得知自己的目的地已經不遠了：安多的最大城市拉卜楞，自十八世紀以來因擁有那座五千多喇嘛的輝煌大寺院而聞名於世。

路上見到的犛牛、農田和草堆越來越多。太陽悄悄地躲到了山背後，接著車隊又停下了。一些中國官員站在路中間，他們的吉普車停在路旁。他們匆匆開了一次會議，然後其中一名幹部走到參觀團跟前，通過翻譯對他們說：「現在你們離拉卜楞只有二公里了，前面有數千名群眾在等候，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得到了你們也來的消息。請你們不要停車，不要開車門車窗，不要將手伸出去，將車門車窗都關好。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都不要同他們講話。」

洛桑三旦描述說：「我們感到十分不解。但在當時，我們也只能盡力妥協，後來，我們才知道蘭州的藏人送了信給拉布楞，說達賴喇嘛派遣的一個參觀團要來，還說參觀團中還有神聖的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就是我自己。」

幾分鐘後，拉卜楞城郊映入他們的眼簾，站在公路兩旁的群眾有六千人。當第一輛吉普車放慢速度時，人群頓時爆發出掌聲和歡呼聲。接著，人群看到了參觀團，他們蜂擁而上，將車隊圍在中間。洛桑三旦又說：「我們打開了車窗，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到處是人群，他們在呼喊，扔哈達、蘋果和鮮花，他們見到我們是多麼激動。他們將所有的車窗全砸碎了，他們爬到車頂上，直想到裡面來，雙手直往前伸，想觸摸我們。那些中國人尖叫起來，『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他們會要你們的命！他們會要你們的命！』所有的藏人都失聲痛哭，高喊：『達賴喇嘛好嗎？達賴喇嘛好嗎？』我們高聲答道：『他很好，你們好嗎？』接著，當我們看到他們一貧如洗的悲慘樣子時，也全都哭了起來。」

由於集會自由已被取締二十多年，這次集會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洛桑三旦說：「高先生與我同乘一輛麵包車，他坐在我旁邊。他嚇壞了，對我高喊：『你還只是達賴喇嘛的代表，人們就爭先恐後想讓你摸頂祝福。假如達賴喇嘛來了，那又會是個什麼樣的場面呢？我們控制不了，我們負責不起，這些人簡直發了瘋！』我只好待小孩一樣對他說：『不用擔心，我們對此已經習慣了。他們熱愛達賴喇嘛，這麼多年來他們十分想念他，他們就是想看望達賴喇嘛。』」

一個半小時之後，拉卜楞城為數不多的街燈亮了。這時車隊仍陷在人山人海之中，總算開到了解放軍的一家招待所大門前。這裡有一隊身著白制服的警察攔住了向前擠壓的藏民，參觀團成員在高高的鐵欄柵圍著的院子裡下車之後，答應明天上午再會見他們，這時人群才平靜下來；但仍有幾百人拒不離去，他們就在招待所大門外安營紮寨。招待所內，中國官員怒氣沖沖。參觀團盡量想消滅他們的氣，但當時參觀團成員完全沉浸在激動之中。洛桑三旦說：「那天晚上我們的心情都很激動。我們為自己的人民而感到自豪。他們迎接我們的方式——以及他們的力量——令人鼓舞；但同時也令人傷心，他們到了一貧如洗的地步。大多數人就像乞丐一樣，衣衫襤褸。而且局面仍十分艱難。我們藏人又歡聚一堂了，但我們仍不自由，中國人仍然夾在我們中間。」

第二天早上剛起來不久，洛桑三旦就受到打擾，門口響起了敲門聲。隨團的兩位醫生中的一位在一位翻譯的陪同下，走進了他的房間。醫生問他：「你感覺怎樣？我想你肯定會不舒服。」洛桑三旦回答說：「我感覺很好，你應該好好照料自己。」醫生接著說：「請你不要過勞，不要過於激動。高海拔是會出危險的。」醫生給他量了血壓和體溫之後就走了，洛桑三旦忍不住大笑不已。他心想：「中國人去西藏時，總是小心翼翼。在整個旅途期間，我們藏人感覺良好，但北京來的那些官員卻總是頭痛、惡心、流鼻血。他們面部浮腫，每天總得被迫停一兩次車，在路邊嘔吐。每輛吉普車上都備有四個氧氣袋，袋子有一頭安了一根吸管。這些氧氣袋主要是北京的官員們使用，他們不時要吸氧氣，整天在座位上打瞌睡。有時候，高山反應十分嚴重，中國人不得不總是隨身攜帶氧氣袋。在停留站時，當看到中國人緩慢地行走，鼻孔裡插著一根長長的吸管，腋下夾著一個難看的氧氣袋，自然就感到不舒服，也影響了他們自己無拘無束的行動舉止。早飯後召開了四十名幹部參加的會議，陪同參觀團的地方黨委書記說：「保護你們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沒辦法控制他們。為了避免麻煩，你們今天一定要乘車去參觀拉卜楞寺。你們一定得呆在一起，不要分開，不要來到這些人當中去。」洛桑三旦代表參觀團作了答復，他說：「我們是藏族，歡迎我們的人也是藏族，因此，不會有任何問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承擔全部責任。」但這樣的擔保仍不能令他們滿意，黨委書記又說：「現在，如果你們不照我剛才說的那樣去做，你們根本就不能出去。」洛桑三旦回答前停頓了一會兒，然後說：「達賴喇嘛已告訴北京當局，他派手下的人來就是為了弄清楚西藏境內的藏人的看法和處境，這一點是北京政府和達賴喇嘛已經同意的了。因此，我們不會避開人群，而要從人群當中走過去，要與他們見面。」為了緩和當時的對立局面，高先生出面乾預了。他說：「不錯，這一點是北京和達賴喇嘛的意見，無論參觀團成員有什麼要求，我們必須予以滿足。」洛桑三旦回憶時說：「當時，誰也不吭聲，我們贏得了這場爭論，但在每一個停留站都會出現與此相同的激烈爭論。總的說來，從北京來的官員富有耐心，彬彬有禮，具有外交風度。但另一方面，那些地方官卻令人害怕——脾氣暴躁，心胸狹窄。他們舉止粗魯，對我們指手畫腳，發號施令；這也是多年來西藏人民生活為何如此艱難的原因，我們也領教到了這一點。」

十點，參觀團離開招待所大樓朝大門走去，在大門外過夜的那些藏人正在等候。他們身後是通往拉卜楞的公路，還有一又四分之一英里，路旁站立著一萬人左右，一名中國官員正在拍照作記錄（此行期間，他的工作天天如此）。參觀團急切地穿過大門，朝人群走來，這時，附近的一名警官立即命令正在等候的一隊警察將他們圍在中間；與此同時，剛才開會的那些官員也圍上來，也想將他們與人群隔開。這樣的努力不過持續了一會兒，藏人像洶湧的海潮一樣，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上，竭力想緊靠參觀團。洛桑三旦說：「這情景就像以前一樣，大家都向我們衝來，失聲痛哭，高呼神聖的達賴喇嘛。人們哭得像瘋了似的。有些人哭著哭著就倒在地上，其他人則扯下我的頭髮，撕破我們的衣服，用來作紀念品——事實上是對他們的祝福，從那時起，我就失去了不少頭髮，我的雙手也總是被抓傷，因為大聲對人群呼喊，喉嚨也總是處於嘶啞狀態。在此期間，從我身上撕去的衣服就有一件大衣、一件雨衣、二件襯衣和一頂帽子。」

參觀團帶來了幾百張達賴喇嘛的小照片和一些由他親自加持過的紅色保護繩，但過了參觀團的第二個停留站之後，這兩樣東西就全分發完了，迫使參觀團成員不得不分發自己的念珠，一次給一顆珠子。第一天上午，他們離拉卜楞的大門還很遠時，他們攜帶的四十張達賴喇嘛照片就被一搶而光。1955年在與達賴喇嘛去中國之後的返藏途中，洛桑三旦曾參觀過拉布楞寺。當時，拉卜楞寺就像個城鎮，措欽大殿的金頂輝煌壯觀，俯瞰眾多僧舍和殿堂，條條巷道裡只見一隊隊喇嘛和香客穿梭往來。而現在，原寺院的十分之九已不復存在，被夷為平地，只剩下了為數不多的院子，裡面有些建築；在倖存的建築前有一片新闢的空地，幾百名上了年紀的藏人自動排成了長隊，他們手捧哈達和鮮花，當參觀團從他們面前走過時，號啕痛哭。三旦回憶當時的情景：「天哪，他們哭得那樣傷心。他們總是在喃喃自語：『我們現在一無所有，一切都完了！』我們又能說什麼呢？拉布楞寺曾是一座漂亮壯觀的寺院，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中國人純粹是將它給拆了。」

十一名年長的喇嘛身著嶄新的長袍，在主殿前歡迎參觀團。他們被領進殿內時，驚奇地發現這裡燃著酥油燈，牆上的宗教畫重新佈置了一番，佛像前擺著一些剛上的供品。接著，在接待室喝茶吃點心時，那位一直在寺院等候的衣冠楚楚的官員講了話，他說：「你們從這些殿堂就可以看出，共產黨是保證宗教自由的。舊社會卻沒有這樣的自由，那時喇嘛從來就不勞動，他們只知道剝削人民。但自從土地改革以來，在黨的領導下，這一切全廢除了，條件已經變得非常好。」參觀團中的一名噶倫問道：「所有的那些建築都到哪去了？」幹部回答說：「非常不幸的是，在『四人幫』極左政策的影響下，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噶倫又問：「那麼五千名喇嘛又在哪裡呢？」回答：「1959年叛亂之後，他們自願還俗，過上了農民的新生活。現在誰也不願意再返回寺院。」

事實上，正如洛桑三旦在此行期間同一位喇嘛悄悄交談所得知的那樣，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前拉卜楞寺就已被摧毀。1959年叛亂以前，該寺的珍寶就已被運往中國，寺院學者、醫生和藝術家被送進了勞改營，活著出來的為數甚少。文化革命期間遭到摧毀的只是那些空樓。一個月前，露面的那十一名喇嘛才從附近農村的人民公社應邀而來，那些佛像、經書和酥油燈也是從其他受到嚴重破壞的寺廟翻找出來的。這些喇嘛來到拉卜楞寺後，受命在參觀團到達前，要使寺院變個樣，讓人乍看起來昔日規模氣派猶在。

參觀團在拉卜楞寺呆了四天。第二天，藏人開始在招待所門前集結，要求中國衛兵允許他們同來訪者談談。從這些藏人身上，參觀團第一次廣泛瞭解了西藏人民的感受。洛桑三旦說：「每每我們問人們，自從叛亂以來，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時，他們就失聲痛哭，鎮定之後，他們就回答說：『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一無所有，什麼都完了。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意志卻是堅強的，我們決不喪失我們的意志。只要神聖的達賴喇嘛沒有落在中國人手中，我們就有希望。請你們轉告他，無論他為我們的自由做什麼，我們都感激不盡。』這就是他們說的一切，我們一邊又一邊地親耳所聞。沒有幾個人願意談及他們的個人遭遇及問題。」不過有一次，洛桑三旦的一位老朋友來看他。以前，他曾是安多地區的一位重要部落頭人，叛亂之後被抓進監獄，過了二十年艱苦的勞改生活。在參觀團抵達的前幾天，有選擇地放了一些人，他也被釋放。三旦說：「他看上去簡直令人不敢相認，以前，他體格健壯，但現在我只能勉強將他辨認出來。這傢伙情緒沮喪低沉，妻離子散，與家人分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們。幾天前他才聽說，他的兒子已死於監獄。他說：『洛桑，你瞧瞧我，除了他們給我的這套衣服外，我一無所有。』真是令人傷心。」洛桑三旦最後又說：「我們終於打開了人們的話匣子，他們談及了自己的身世，任何一個家庭都有類似於此的一段經歷。」

除接待來訪客人之外，參觀團還參觀了拉卜楞城。他們目睹了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舊城里居住的仍然是藏人；周圍則是中國人的「新城」。藏民居住區無異於一片墳場。這裡的房屋完全失修，街道泥濘，令人無法抬步。人們住在黑洞洞、很糟糕的房間裡，房內幾乎沒有家具和其他用具，沒有自來水，電也是時來時停。另一方面，雖然中國人的居住區也露出了維修不善的跡象，但這裡的居民遠比藏民要吃得飽，穿得好。參觀團參觀了一個又一個貧困不堪的家庭之後，心情非常激動。

洛桑三旦說：「我們感到十分震驚，誰也吃不好，睡不寧。我們回想起舊西藏的生活。我們想到了我們在印度享有的自由，我們將它與我們國家境內所發生的一切進行了對比。中國人總是厚顏無恥地反復宣傳，條件已有改善，人民生活很幸福。我們對此非常憤慨，尤其是我們與人民重逢時見到的情景，更是我們百感交集，悲喜交加。這簡直令人受不了。當此行結束後我抵達香港時，我睡了一個星期，不分白天黑夜。」

參觀團在安多繼續待了三個星期。他們參觀了二十座城鎮、幾十個村莊、公社和游牧民居住點，參觀範圍達幾千平方英里。他們常常坐車就是一整天，在荒涼的高原凍土上頂著狂風奔馳，中國人修建的軍用公路和長途電話線在這裡形成了網絡，

它取代了舊時的商道。也不知怎麼的，參觀團的消息總要比他們自己走得還快，總是有大批沸騰的人群在迎候參觀團的到來。到9月中旬時，發狂地歡迎過參觀團的藏民就高達幾萬人，而他們這時進入西藏境內還只有一個月。中國為了擺出寬厚的姿態，也不敢叫解放軍對這些近乎暴亂的場面採取高壓手段，但顯而易見還是必須採取點行動才行。結果，高先生通知了拉薩的西藏自治區領導人，告訴他們眼下的困難。接著，拉薩方面進行了最後的努力，防止人們從鄉村大批湧入首都拉薩。

在拉薩的晚間會議上，中國幹部一反常態，沒有保密，他們宣布了達賴喇嘛的代表即將抵達拉薩城的消息。他們說，這些代表人物都是些反動分子。然而，拉薩主要街道兩旁建築的門面都要洗刷一番，街道上不許小販擺攤設點，不許有破磚碎石。拉薩人要著節日盛裝，如果偶然遇見參觀團成員，要表現出興高彩烈的樣子。他們不許主動找參觀團成員交談，但可以答話，這時得以堅定的、有說服力的口氣告訴參觀團，在新制度下生活多麼美好。對於那些當局被認為參觀團要去訪問的家庭，給他們發了新的工作服，還發了五彩緞帶，讓姑娘紮在辮子上。那些最重要的人家還發了熱水瓶、毛毯和棉被，他們的房間還有人檢查，以確保醒目的牆上掛起了毛澤東畫像和黨的主席華國鋒的畫像。參觀團到達幾天前，中國官員傳達了最後一系列指示。這時他們對公眾說，參觀團已經到了安多。那裡的藏民無法壓抑對所有反動派的深仇大恨，據說公開圍攻了參觀團。無論參觀團在哪裡出現，幾百個人就會冒了出來，向他們扔石頭，責罵他們，還往他們身上吐口水。黨的幹部的觀點是堅定的：在首城拉薩不允許出現此類行為——不過這似乎倒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場面。作為對參觀團表示的姿態，自1968年以來一直負責領導西藏的革命委員會，也在新成立的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取代，出任主席的是天寶（桑吉益希），他是藏族。但任榮仍繼續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這才是西藏的實權職位。

9月26日上午，參觀團乘飛機離開蘭州前往西藏中部，航程為三個小時。在貢嘎機場，他們坐上了新麵包車，兩小時後來到了拉薩河谷的西端。這時，他們第一次看到了遠處閃閃發光的布達拉宮金頂。洛桑三旦回憶說：「我一直相信，總有一天我會再看到我的家。我的兒童時代就是與神聖的達賴喇嘛一道在那座壯麗的宮殿中度過的，當時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出現在腦海裡。那時，布達拉宮一派生機：人們在辦公室里工作，在殿堂裡祈禱念經，在樓梯和屋頂上走來走去，晚上幾百盞酥油燈照亮了扇扇窗戶；但現在它卻如同死水一潭——空無一人，陰森發冷。昔日的尊嚴全不見了。」還未到布達拉宮跟前，參觀團就吃驚地發現汽車拐向離市中心越來越遠的岔道，將他們送到了拉薩西面四英里處的一個偏僻招待所。他們一到目的地，當地的官員就告訴他們：「這是目前最好的招待所。這裡一切都十分安靜清潔。無論你們需要什麼，我們都樂於提供。」參觀團要求立即將他們送到城裡去，這樣人們就可以看到他們，但這一要求遭到了拒絕。接著出現了僵持局面。這時洛桑三旦開了個玩笑，企圖緩和一下緊張氣氛。他幽默地說：「實際上我的家就在拉薩，我不需要住在部隊招待所，我就住在我母親家好了。」他回憶說：「我的話音剛落，中國人都大笑了一陣子。接著他們說：『洛桑，你的家早沒了。現在，它已成了公眾的財產。』我禁不住追問道：『哪些公眾？是藏人還是漢人？』他們回答：『啊，就是普通老百姓。』接下來大家都沉默不語。」

三天以後，參觀團轉移到了舊城中的第二招待所（3）。當時十分清楚，意見的不一致又進入了新階段。9月29日，這是參觀團在拉薩的第一個上午，一萬七千名藏人雲集大昭寺，參觀團已經到達該寺朝佛。中國的安全人員遭到踐踏，大昭寺正門被撞開，人們發狂似地圍擠參觀團，使西藏的最高當局大為震驚。當天晚上召開了會議，向全城人民發出警告，不得集會示威。但這也無濟於事。第二天，藏人公開違令，數千人湧向街頭，參觀團成員一出現就如此。每天黎明前，第二招待所的院子里人們就排起了長龍，許多在外面等候的人都是參觀團成員的好友，自1959年以後他們就沒有見過面。參觀團從這些人口中得知，儘管普遍公然違抗當局命令，但仍有成百上千的人十分恐懼，不敢露面。此後，參觀團成員長距離步行穿越拉薩的窄街小巷，尾隨的人很多，致使監視十分困難。這樣，他們也就能夠直接進入許多住戶家庭，看望他們了。

10月1日中國的國慶節那天，西藏自治區的官員堅持要他們參加在羅布林卡（即人民公園）舉行的慶祝活動。這可是對任榮、天寶以及西藏自治區其他主要官員的嚴峻考驗。他們未能控制參觀團遇見的越來越亂的場面，但希望能在他們控制的情況下，在一年中最重要節日這天，表現出令人信服的不同的西藏風貌。因此，幾十名藏族幹部及其家屬受令在羅布林卡野餐，身著節日盛裝，熱水瓶、收音機、麻將牌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但到上午10點時，約八千名不速之客已經聚集在公園裡。就像其他時候一樣，人群沸騰，為了打開一條通往達賴喇嘛新宮（在洛桑三旦的親自指揮下建於1956年）的通道，徵用了一大幫警察。在新宮，參觀團受到了西藏自治區主要領導人的歡迎，接著給他們上了查核點心，並告誡他們不要到人群中去；正如一位主人所說的那樣，他們「可能會迷路」。

參觀團幾天前就參觀過羅布林卡。除了新宮那個院子之外，它裡面的花園不過是一片灌木叢。這裡的殿堂亭閣只剩下一副外殼，而且搖搖欲墜，僅僅增加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動物園，裡面有些假山和猴籠。二名中國男女領著他們參觀樸素的兩層樓新宮，參觀團聽了他們的解說詞，這些解說內容有關西藏領袖的生活方式，平時是講給為數不多的一些參觀者聽的。他們對參觀團說：「這是達賴喇嘛睡覺的地方，這是他吃飯的地方，這是達賴喇嘛會見他母親的地方。這是他的電唱機，這是他的電扇。」最後洛桑三旦插話了：「我對你們講的十分清楚，難道你們不認為我該告訴你們：你們這是在什麼地方嗎？這座宮殿是我建造的，我曾經天天都在這裡工作。」他們沒有再解說下去，而趕忙答道：「啊，是的，洛桑是比我們清楚。」過了不久，參觀團從格桑頗章門前經過，這是羅布林卡內的一座大宮殿，曾是國家舉行重要活動的場所。他們發現正門上了鎖，因此從外面的梯子上爬了上去，從破舊的窗洞裡看到了裡面的大殿。殿堂裡面一堆毀壞了的具有幾百年歷史的佛像、頭像、四肢以及基座四分五裂，堆得高達二十五英尺。導遊解釋說：「這些東西是我們從人們手中搶救下來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毀壞它們的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我們。他們搶走了珠寶金子，事實上，假如我們沒有保護這些佛像的話，它們也會被偷走的。」

洛桑三旦一想到格桑頗章內的那堆毀壞的佛像，就離開了官方招待他們的地方，大步來到宮殿前門的台階上向人們發表講話，這違背了他與中國人達成的諒解——決不發表公開講話。

幾千名藏人擠到這座宮殿的石坪上。只有一排警察手挽著手，將人群朝後壓，而那些便衣警察則在照相做筆記。洛桑三旦剛一出現，人們就開始高呼：「達賴喇嘛萬歲！」一位男子手握一根棍子，前頭挑著一根哈達，他擠到前面，高喊：「這條哈達是西藏人民獻給你的。」三旦接過哈達之後，揚揚手請大家安靜下來，接著就開始發表講話。他說：「神聖的達賴喇嘛十分想念你們。他知道你們吃了不少苦頭。我們希望總有一天他會回來看望大家。這次我們來西藏，是為了了解這裡所取得的進步以及犯下的錯誤。無論我們在這裡幹了些什麼，我們回到神聖的達賴喇嘛身邊時，一定向他如實彙報。」

講完後洛桑三旦回到屋內，他進去後，數百名藏人衝破了警察的警戒線，衝到屋裡來了。三旦看到這些藏人之後，無視屋內嚇壞了的中國人叫他重新出去的吩咐，立即來到了藏人當中。十位年輕人手挽著手，將他護在中間，免受人群的衝擊。就這樣他度過了接著的五個小時，在羅布林卡內四處遊動。有好幾次，他們被人們不小心推倒，有一次掉在一個齊腰深的池塘中。洛桑三旦回憶說：「當時太亂，只有在幾處地方我才設法坐下來同人們野餐。當我坐下後，只能平靜地交談幾分鐘，人們的真實感受就會全倒出來，痛哭不已。這時我會盡力起身上別處，他們就懇求我不要走。然後他們堅持要同我一起跳最後一次舞。這樣，大家共同攜起手來，跳跳我們的藏族舞步，又笑又唱，邊叫邊舞地鬧一會兒。」

下午時間過了一半時，人群中有人叫道：「洛桑，曲扎醫生在這裡，他到處找你呢。」緊接著曲扎醫生出現了，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曲扎醫生就說了一句話：「你一定很累吧。」不過倒是曲扎醫生自己看上去「像死人一樣」，這是洛桑三旦的回憶。洛桑三旦叫中國人找到了這位醫生，現在他想通過要求中國人允許丹增曲扎離開西藏去印度，來試試他們是否真有誠意。

10月1日幾天過後，參觀團成員得到了那天發生的另一件事情的消息。有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五十六歲的婦女，她的丈夫是羅布林卡的花工，她有七個孩子，那天她激動不已，高聲呼叫：「西藏獨立啦！」她當場被逮捕，被送到拉薩南面的一個公社里，關了三天。對她進行了好幾次審訊，她所在的街道召開了六百人的大會，對她進行了鬥爭。儘管她挨了揍，但她堅持認為她喊的那句話不是有意對抗，而只能算是犯了錯誤；她看到洛桑三旦站在新宮的台階上時，心中充滿了信心，達賴喇嘛不久也會站在這裡，隨之而來的就是西藏的獨立。她只是喊出了她確信是眾所周知的信念。她的招供未能使中國人滿意。公安廳決意拿次仁拉姆做個樣子，因此將她投入監獄，據很多人說她在監獄裡受到了電打的折磨。洛桑三旦說：「我們一得到這一消息，就認為我們此行再繼續下去會毫無意義。我們意識到，我們的出現只會給這些貧苦人家帶來麻煩。那天我們沒有出門。我們取消了所有的計劃，並告訴高先生，我們希望盡早回北京，然後去印度。」高先生擔心此行半途而廢所產生的後果，因此很快就讓他們釋放了那位婦女；他解釋時說，她的「案情十分嚴重」，之所以逮捕她「是因為人民要求這樣做」。

10月6日，參觀團抵達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但當時日喀則是座空城，除了一些嚇壞了的體弱老人之外，全城男女在黎明前就被趕到了地裡。下一站薩迦也是如此，接著江孜也沒有任何不同。他們最後來到了控制沒有那麼嚴的康區山地，這時他們即將離開西藏，才再次可以自由地會見人們。洛桑三旦特別回憶了此行的這一最後階段發生的一件事。他說：「一天，我們在一個小村莊裡停留吃午飯。一群人聚集在招待所門前，但中國衛兵將他們攔在外面。我們在等候吃飯，這

是一位藏族青年不知怎麼溜了進來。他很年輕，只有二十歲，體格健壯，大塊頭——真正的康巴人，身著羊皮襖，胸膛袒露在外，頭髮很長。他對中國人毫不在乎，他徑直走到我們的飯桌跟前，失聲痛哭。我是說，他的眼淚奪眶而出。我想安慰他。我說：『不要難過，我知道你的感受。』他沒有說一句話，他緊緊捏住我的雙手，盯著我，然後轉過身，朝外走去。」

11 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參觀團離開西藏，從成都坐飛機返回北京。他們在北京待了十天時間，在人民大會堂和民族文化宮會見了高級官員。在會談時，負責與流亡在外的藏人建立新關係的那些官員，坦率地詢問參觀團對西藏情況的看法。洛桑三旦回憶說：「我們事先決定，沒有必要將真實情況和盤托出，這樣會加劇敵對局勢。但是我們的確對他們說過，西藏目前比它以前要窮得多。我們對他們說：『教育、醫療、像樣的住房和就業，所有這些根本就不存在。你們那些人連藏語都不會說，他們對待藏人非常無禮。』他們答道：『是的，不錯，這些都是事實。我們十分抱歉。我們保證將來要加以改進。』我不能相信他們的話。我非常氣憤，他們在我們的國家幹了那麼多可怕的事情，這麼多年犯下了那麼多暴行。中國人又可能做些什麼來補償我們遭受的悲劇呢？最後我說：『我們對於自己的所見所聞十分氣憤，但這些都過去了。將來，這些事情要由神聖的達賴喇嘛與北京直接商談。我們將等等看，到底會有什麼結果。』」

參觀團經香港飛抵新德里，於 1979 年 12 月 21 日返回達蘭薩拉。他們帶回了拍下的十一個小時的膠片，還有給流亡在外的親屬的約七千封信和無數人的要求，請達賴喇嘛在念經時提到他們的名字，還有一些寺院遭到破壞時保留下來的珍貴經書和聖物。人們懷著複雜而有期待的心情，迎接他們參觀歸來。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不同意見，五個月前他們出發的消息一直嚴加保密。流亡政府的最高決策機構全國工作委員會，也只是在參觀團離開達蘭薩拉的頭一天才得知這一消息。兩天之後的 8 月 3 日，嘎廈發表了措詞審慎的公告，說參觀團除了弄清「西藏的真實情況」之外，「無權決定任何問題」。儘管如此，但人們仍擔心會被出賣給中國，加之對參觀團的出發日期嚴加保密而使他們憤怒無比；因此德慶措林收到瞭如潮水般湧來的幾百封信，大多數來信懇求達賴喇嘛不要去北京。

然而，這位西藏領袖已於 7 月下旬離開印度，前往歐洲和美國進行訪問，一個月他出訪了蘇聯和蒙古。毫無疑問，由蘇聯支持的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各民族陣線的幽靈，使北京大為惱火；就如同達賴喇嘛亞洲和西方之行，又引起了新聞界對西藏問題的大量報導一樣，北京也對此十分惱火。但是雖然丹增嘉措採取這樣的方式施加了壓力，但他接到參觀團返回印度後提交的報告時，仍拒絕向國際新聞界公佈參觀團譴責性的調查報告；因為他確信，這樣只會使北京中止放寬政策的做法，而遭罪的還是西藏人民。達賴喇嘛反而於 1980 年 3 月 10 日呼籲中國接受流亡青年，讓他們到西藏去當教師，這一步驟是為了擴大和互相交往。雖然對方沒有反應，但於 4 月份又公佈了第二個參觀團將訪問西藏的消息。第二參觀團將於 5 月份啟程，一個月後第三參觀團也將踏上赴藏的旅途。與此同時，有一部兩小時的片子在難民營巡迴上演，它表現了人民一貧如洗，寺廟遭到毀壞，兒童也在勞動隊幹活的內容，因此，對「參觀團外交」之價值的爭論也為之遜色。甚至西藏青年大會也公開宣布，只有政府在未來的談判中，堅持獲得完全獨立，它才支持政府。

在西藏，中國人利用 1980 年冬季忙於接待下一個參觀團的準備工作，4 月 15 日召開了會議，認為第二參觀團的成員是「達賴非法政府的特務」，他們的任務就是鼓吹西藏獨立，藏人不能與他們相見。如果人們偶然遇見第二參觀團，不許笑，不許哭，不許握手，如果坐著的話就不許站起來，不許脫帽，不許獻哈達，不許邀請他們去自己家裡。當局告訴人們，這些反動分子會散發「獨立證章」，它們是些小小的金屬證章，上面的圖案是西藏旗。人們應該將這樣的證章扔在地上，再踩上一腳。接著下發了小冊子，明確了對參觀團成員可能提出的問題的答復口徑，同時黨員幹部則匆忙補了一堂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課。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副總理萬裡陪同下訪問西藏，他們是中共佔領西藏三十年來訪藏的最高級官員。胡在視察時，對藏族的生活條件當眾表示震驚，結果，任榮被免去了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取而代之的是陰法唐，他也是軍人，自 1950 年首批佔領軍進藏以來，就長期在西藏工作。接著宣布了就做好六件大事而製定的兩年規劃，旨在振興西藏。根據這一計劃，百分之八十五的中國人將撤回內地，還要免稅，保證個體經營的權利，不再要求非種冬小麥不可，而可以種青稞。在西藏高原種植青稞更為成功，但中國人認為青稞味道不可口。

與這些表示調和的姿態相反，仍在最後進行準備，說服藏人不要聚眾對參觀團表示歡迎。拉薩以及其他主要城鎮的警察得到了一些武器、鐮鏟、電棒等。一些與中國人合作的藏人，打扮成康巴人模樣，在八廓街一次又一次地爭吵鬥毆，企圖重新挑起地區之間的不和。自從 1959 年以來，第一次準許人們喝酒，這顯然是一位地方上黨的領導幹部的願望，他企圖讓

藏人醉得一塌糊塗，因而對參觀團的來訪漠不關心。最後，在第二參觀團抵達前夕，在晚間的會議上又重提次仁拉姆一案，她也就是羅布林卡呼籲西藏獨立的那位婦女。第一參觀團剛走，她又被投入監獄，據人們傳說，她因在監獄中遭到電打的折磨而成了棵一吹就倒的「蔬菜」。據說，那些歡迎過第一參觀團的人們的名字已被登記上冊；如果他們再次出面，代表團走後他們也會面臨類似的命運。漢族幹部引用了藏族了一句俗話，他們說：「夏天的烏雲一掠而過，但藍天的位置卻紋絲不動。」「青蛙一年到頭居井底，白鶴來得匆匆走得快。」

5月的第一個星期，第二參觀團抵達北京。與第一參觀團不同的是，他們下榻的飯店屬於地方。但是，他們第一次大的外出活動卻是來到首都郊區的一片開闊地，在這裡他們觀看了部隊的軍事演習。一個半小時，排成隊形的坦克駛過檢閱台，再倒過來，進行了模擬戰。其用意他們理解無誤。正如第二參觀團團長、紐約的西藏辦事處主任——丹增哲通所說的那樣，「顯然，中國是想嚇唬我們，但我認為實際上我們倒嚇壞了他們。」這個代表團由達賴喇嘛派駐美國、日本、瑞士的代表、英國藏族社團領袖以及西藏青年大會主席等五人（他們都是只有三十出頭）組成，這樣的人選是為了表明西藏獨立問題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丹增哲通解釋說：「中國人只需要看我們一眼，就知道我們不屬於他們習慣與之交往的藏人。我們十分坦率。我們對他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提出針鋒相對的看法，戳穿他們的謊言，指出他們的錯誤。除此之外，他們無法理解我們。我們受過良好教育，但仍然篤信佛教和我們的傳統文化，這一點對他們來說是無法理解的。這與他們的教條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所有的這一切，我們雙方之間的局面十分緊張。」

5月17日，參觀團離開四川省會成都，前往安多南部地區。他們進入西藏高原時，人們還是不顧一切，沿線都有人歡迎他們。在後來的兩個星期時間裡，在農村的腹心地帶，時而有馬車和自行車橫在公路上，迫使他們這支由八輛汽車組成的車隊停車。中國人企圖清除障礙時，從偏僻村莊裡集結於此的幾百人會從躲藏的地方一下冒出來，圍著參觀團歡呼一陣子。比這少一些的人卻會在公路上五體投地叩長頭，疾駛的車隊不得不來個緊急剎車。參觀團走到哪裡，人們就向他們要「獨立證章」，但他們卻沒有。由於他們是達賴喇嘛的使者，因此人們認為他們也是神聖的。他們和第三參觀團都看見人們在他們車隊駛過的公路上撿他們丟棄的廢物。在昌都，第一參觀團在理髮店剃下的頭髮，當時也被人捧起收藏，作為對自己的祝福；而現在卻先後有幾十個人叫第二參觀團為他們的嬰兒取名，這通常是高級喇嘛的事。甚至七、八歲的小孩也要他們摸頂祝福，要讓「達賴主席」的朋友們給他們摸摸頂。

6月1日，當第二參觀團穿越康區朝西藏中部行使時，第三參觀團抵達廣州。這個參觀團共七人，由達賴喇嘛的妹妹、達拉薩拉的西藏兒童村主任白瑪甲布任團長，他們的任務是調查瞭解教育方面的情況。她在談到旅途一開始就團團困擾他們這個參觀團的不良形象時，回憶道：「人們怎麼也想像不出我們第一眼看到中國的是什麼。那時一個討厭的下雨天，火車外面，幾百人在廣州火車站一處高高的鐵欄桿後面排隊。一隊警察將他們向後壓，他們爭先恐後要出境。我意思是說，作為西藏難民，我們熟知中國共產黨很多不好的方面，經過這麼多年後，我們到中國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企圖出逃的人群。這使我們感到不寒而慄。」

更有甚者，第三參觀團又面臨著其主人態度的改變。在得到第二參觀團在西藏受到狂熱歡迎的消息之後，國家民委三局（即西藏局）撕開了以前作為主人裝出的假熱情的面紗。第三參觀團也住在第一參觀團下榻的那個部隊招待所，在北京的大街上，不讓他們見到外國人，前往目的地也繞著道走——他們認為這樣做是為了防止他們自己外出。有幾次的確沒有人領著他們，可以自己在街上走走，但顯然後面有便衣警察跟蹤。白瑪甲布說：「從一開始，中國人就在對我們進行調查研究。在北京的那家招待所時，一位為中國人工作的藏族翻譯走到我們房門口，敲敲門，接著走進來，說：『你今天感覺好嗎？』然後也不等人回答就一屁股坐下，開始提問：『印度的藏族生活怎麼樣？他們對達賴喇嘛有何看法？他們都幹些什麼樣的工作？他們的學校如何？孩子們學習哪些課程？』顯然他們不懷好意。」翻譯從參觀團的一名成員那裡的得到回答之後，又會去找第二個人，提相同的問題，如果答復不一樣，他又回頭找到第一個成員，問他為什麼和他同事的回答不一樣。正如白瑪甲布所解釋的那樣：「由於這樣盤問，所以很快他們就將我們每人的個性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是個非常直率的人，沒有一點外交官那股拐彎抹角的氣味。他們從我身上得到的，除了爭論之外別的什麼也沒有，但在其他人那裡他們只想左右人，以便給我們製造麻煩，」一次，一位在瑞士長大的隨團攝影師丟了三個小時。他回來時，其他參觀團成員才發現他被嚴加盤問。白瑪甲布說：「中國人問我們的攝影師流亡藏人是否不團結時，他居然不知道中國人的用意何在。他坦白地回答的確存在著分歧，這也正是中國人為製造麻煩所需要得到的東西。」當時，這些問題本身在參觀團內部也引起了不同意見，因為他們感到有壓力也對各種不同答復給予評價，這樣也就導致了意見的分歧。攝影師的答復成了熱烈爭論的話題，最後我們叫他「只管照相，免開尊口」。

但儘管參觀團的所有成員從此以後極為謹慎小心，但問題從未斷過。白瑪甲布說：「當我們的逗留期即將結束時，中國人盡力想從我們口中多得到一些情況。從北京來的幹部甚至要求我們所參觀學校的老師問我們，難民從印度政府手中得到的援助到底有多少，每個學校的預算如何，是誰提供資金。我真不敢相信他們是多麼地不光明正大。」

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下，只要一出現不愉快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導致關係破裂。他們進入西藏後不久，當他們乘車前往安多的拉布楞附近的目的地時，參觀團突然發現七千人攔住了他們的去路。北京來的一名官員勃然大怒，從前導車上跳了下來，白瑪甲布也坐在這輛車上。他們動手就揍藏人，叫他們讓路。他害怕寡不敵眾，趕忙回到吉普車上，將車門鎖上，並推了推夾在他和一位中國女幹部中間的白瑪甲布，這位婦女幹部也不讓她開車窗。白瑪甲布敘述道：「用了三個小時才甩脫人群。那些人使勁撕破了吉普車的帆布頂篷，扯下了一些碎片。他們呼喊著要見我，但中國人像對待囚犯一樣，將我關在吉普車內，我十分生氣。午飯後一會兒，我們在公路上又遇見了一大群人，這次我開了車窗。那位中國婦女命令我將車窗關上，這時我真是火冒三丈。我告訴坐在前排座位上的翻譯，叫他將我講的每個字都翻給她聽。我就是想給她點顏色看。我告訴她，如果我決意要會見自己的人民，那完全是我的事，我決不能容忍她對我發號施令。神聖的達賴喇嘛派我們來見見藏民，如果她堅持阻攔我們，我說我就得立即返回印度。接著，我以前想像的一切都出現在我眼前。我們的人民衣衫襤褸，餓得半死不活，淚流滿面，圍著我們的吉普車高聲呼叫。我對那女的說：『我們走到哪裡，你們都聲稱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你看看這些人，難道這是進步嗎？我想問問他們，他們上頓嚐到肉味是什麼時候，就像我們中午吃了肉一樣。二十年來，除了這點之外你們又獲得了哪些成就呢？』而下面就是她的全部答覆：『這些人的行為為什麼如此野蠻？印度的藏族也是這樣嗎？』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答說：『當然不是。』她又問：『那是為什麼呢？』我說：『在印度我們是自由的。這些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你們對他們的壓迫太厲害了。這就是你們殘酷暴行的結果。』接著我們誰也不吭聲。我真的哭了起來。那位藏族譯員盡力想使我平靜下來，我對著他叫道：『你為自己人到底在幹什麼？你看看他們吧！』」

那天晚上，白瑪甲布決定取消此行。中國人得知這一決定後，找到穆索里學校校長拉珍恰措昌，想賠禮道歉。他們解釋說，那位婦女患有關節炎，肩膀不能吹風。就是為此——沒有其他原因——她叫白瑪甲布不要打開吉普車車窗。他們擔保今後不干預參觀團的行動，這才使參觀團沒有中斷此行。不過從此以後，公開敵視的氣氛隨時都可能使他們之間的關係產生破裂。

第二參觀團參觀了約二個月，他們於 1980 年 7 月最後一個星期到達拉薩。7 月 25 日上午，他們在去大昭寺的途中，一萬群眾圍著他們歡呼。從招待所出門後，一段短距離他們乘車卻用了半個小時；而從停車的地方到大昭寺正門這一截路卻走了一個小時。該寺看管人給參觀團獻了一條哈達（他因此當天即被解僱），接著他們在寺內進行了參觀後，爬到屋頂上對群眾發表簡短的講話。這時人們已經安安靜靜地坐在大昭寺的前院等候。在他們講話期間，一些藏族青年齊聲呼喊了三次：「西藏完全獨立啦！」中國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第二天他們在布達拉宮腳下發表講話時也沒有採取行動。當時，聽眾有三千五百人，一位男子站起來，高聲呼喊「西藏獨立了！」但第二天，即 7 月 27 日，那場迄今為止最富有爆炸性的示威集會，卻使中國人的忍耐超過了極限。

上午九點，參觀團乘車出城，過了拉薩河，朝東北方向駛去。他們沿河谷行使了三十英里後，來到了一座陡山腳下，開始爬坡。在第一個拐彎處，一戶藏人手握香火、哈達和一暖瓶茶，站在那裡迎候他們。他們的麵包車聽下後，與那些藏人交談了一會兒，繼續爬坡；來到了第二拐彎處，這裡又有兩幫人在等候他們。參觀團又停了車，然後再繼續爬坡，拐過最後一個彎時，他們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甘丹寺。三十二年前，也就是中國人入侵前夕，曾旅行到此的知名藏學家吉賽普·塔西是這樣描述他第一眼看到甘丹寺的印象的：它是「世外景觀」。他作了這樣的描寫：「剛剛刷白的牆體，火紅的殿堂，閃光奪目的金頂……這一切看上去渾然一體。它清晰輪廓的背景是萬裡無雲的藍天。」以前這裡聳立著上百座大建築，但現在剩下的卻是一行行長長的殘垣斷壁。甘丹寺幾乎是被炸成廢墟的。丹增哲通說：「我們以前曾聽說過甘丹寺被毀，但這樣的場面是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的。甘丹寺意即『極樂世界』，它的確曾是山頭上的輝煌城鎮。現在它全被炸毀了，只剩了些殘垣斷壁。看上去它像五百年前就已遭到破壞，而不是十二年前。」

在最後一道轉彎處，停了八十多輛卡車，汽車一直延伸到了被毀壞的牆體跟前，擋住了去路。卡車旁邊有五千人在等候。丹增哲通說：「我們一到，人們簡直無法抑制住自己。大家爭先恐後朝山下跑來，又哭又喊。我記得有幾個十幾歲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他們緊緊抓著我的上衣。他們哭得像淚人兒一樣，特別傷心。他們就是不放手。他們旁邊的人對他們說：

『請你們不要哭得這麼傷心好嗎？』但接著這些人也跟著哭了起來。指著山上說：『瞧，那就是我們的甘丹寺，你們看他們是怎樣毀了它的呵！』」

集聚在甘丹寺的這些人並不是為了歡迎參觀團，而是為了對它進行修復，這似乎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自願者們靠從拉薩附近的工地上偷來的石塊和木材，幾個星期前就開始了修復工作。每個星期天拂曉前，他們就會在指定的地點集中，等候藏族駕駛員開卡車將他們接走。他們將材料也搬上了中國造的卡車，沿途還得經常停車讓自願建設者們上車，要走四個小時才能到達被毀壞的甘丹寺。他們到達甘丹寺的山腳下後，都得下車，幫助將超載的卡車推上山坡。這是他們一個星期的唯一假日，但他們卻一直要幹到天黑才收工。在一些喇嘛、木匠和石匠的指揮下，他們已經開始建造達賴喇嘛的住宅和修復宗喀巴的靈塔。這不僅僅是與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作對，這樣做說明了西藏人民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堅定信念。參觀團去甘丹寺那天，它也是甘丹寺創建五百七十一周年紀念日，地下組織計劃組織了一些慶祝活動。他們公然陪同參觀團成員穿過被毀壞的寺院，來到了三頂帳篷跟前。在這裡，喇嘛們身著藏了一二十年的喇嘛袍，等候在室外佛龕前開展一些佛事活動，這些佛龕是用剛剛從埋藏的秘密地窖中取出來的佛像搭成的。背誦了達賴喇嘛爭取西藏自由的祈禱詞後，參觀團成員發表了激情洋溢的長篇講話。這時幾千人頓時受到鼓舞，由於他們離拉薩有一段距離也使他們壯了壯膽，大家高舉緊握拳頭的雙手，高呼西藏要自由。

拉薩的中國當局得知這一事件後，最終決定要採取行動——不管它會對達賴喇嘛的關係產生什麼影響。首城拉薩街頭巷尾謠言四起，說要舉行集會示威，在會上要打西藏旗。此外，二十一名分別代表各大報刊的西方記者也同參觀團住一個招待所，他們是第二批獲準來到西藏的外國記者。迄今為止，當局成功地將他們與參觀團分割開了。而這些記者在拉薩則顯然可能將本來是一場默默無聞的國內騷亂事件變成一起國際新聞，讓它起到災難性的作用。

7月28日下午四點，一些記者注意到藏人開始在第二招待所院子裡集結。還不到兩個小時，院子裡密密麻麻地站了兩千多人。夕陽落山時，大家熟悉的白色麵包車出現了，人群像發了狂似的。男人揮舞緊握的拳頭，婦女孩子們則大聲哭叫。緊挨麵包車的那些人只想接觸車內的參觀團成員，人們將手放在自己的頭頂上作摸頂祝福狀，擁抱、撕扯衣服。記者們驚訝不已，趕忙拍照。英國西藏社團主席平措旺傑站在招待所的台階上，對人群發表了講話。「達賴喇嘛的願望一定能夠實現，」他剛開了一句頭，還沒來得及講下去，一位年輕人就跳起來高呼：「神聖的達賴喇嘛萬歲！」他的話音剛落，人們也跟著一遍又一遍振臂高呼這一口號。參觀團回到房間後，記者們連忙來同他們交談，但被中國人阻攔住了。

第二天上午，麵包車沒來。11點30分，十六名官員在招待所會議室開了一次會。會上，第二參觀團接到通知，他們的參觀已經取消。他們必須立即整理行裝，返回北京。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索南羅布（原文如此——編者）說：「你們的行為是在蓄意煽動西藏人民與祖國的分裂，離間西藏人民與漢族老大哥的關係。它嚴重地危害了達賴喇嘛和北京的關係，是決不能容忍的。」第二參觀團在房間裡關了三個小時，然後悄悄地從招待所大樓的後門溜了出去，乘車離開拉薩。沿線有公安廳的幹警監視，接著看到了一些解放軍分隊，直到這時解放軍才從躲得好好的基地中出來露面。參觀團來到貢嘎機場，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乘飛機離開這個國家前往成都，再從成都飛往北京。

第三參觀團得知第二參觀團受逐的消息之後，從日喀則發了電報給達拉薩拉。他們得到指示，繼續他們此行剩下的六個星期。但計劃於8月份啟程的第四參觀團就根本沒有離開印度。北京首先將第四參觀團的行程延至1981年春，後來乾脆無限期地推後，這時儘管阿沛·阿旺晉美已取代天寶出任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這是中國表示調和的進一步姿態）。接著一年過去了，沒有什麼重要事件。直到1982年4月，三人代表團飛往北京，其成員是：達賴喇嘛噶廈政府的高級噶倫土登朗傑、負責安全事務的噶倫P·T·達拉和更名後稱為「西藏人民代表會議」的主席洛迪江村。在北京他們見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長期擔任國家民委主任的烏蘭夫和楊靜仁副總理。他們會談了幾個星期，這是迄今為止最高級的會談，雙方力圖闡述各自關於西藏地位的立場，同時也探討了解決問題的妥協性辦法。不幸的是，這些會談最後還是以僵局而告終。但會談的內容長時間沒有向外透露，直到後來《北京周報》11月份的一篇社論聲稱，流亡在外的藏人要求中國成立一個「統一的大西藏自治區」，它包括全部藏族居住地區，並享有1981年10月1日中國發表的九點統一聲明中所提出的中國給予台灣的同等地位。這篇社論還說，藏人最近的要求當然遭到了拒絕，這是因為西藏「解放已有三十多年」。社論說，繼續呼籲獨立不過只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卑鄙叫囂……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對，特別是遭到了西藏人民的強烈反對。」

1983年5月9日，達蘭薩拉終於作出了答復。噶廈對於《北京周報》社論聲稱是西藏人要求同中國建立關係這一點，攔在一旁，但對社論中的幾乎所有的其他觀點都進行了駁斥。西藏參觀團並沒有要求讓西藏享有提供給台灣的同地位，也沒有建議要成立一個新自治區。參觀團而是在簡要說明西藏人種、文化以及歷史上的獨立地位的時，還指出了西藏的正確的區界線（而目前的西藏自治區只有這塊面積的三分之一），並斷然對中國人又說了一句題外話，如果北京作出讓步，那麼也必須比給予台灣的自治權「要大得多」才行。

對會談的這些大相逕庭的解釋，充分說明雙方實際上離談判解決問題還相距甚遠。儘管班禪喇嘛於1982年夏季獲準重訪拉薩參觀視察——歡迎他的人數高達幾萬，但還只到1983年秋天，西藏自治區又大批抓人，在拉薩實行宵禁並公審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尋求解決西藏問題辦法的努力剛剛開始幾年，似乎就完全失敗了。但有一件好事卻在繼續發展，使得藏族個人的希望還不至於破滅：允許出國，儘管還十分審慎，而且獲得許可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也是經過篩選的。

1980年10月下旬——也就是第一參觀團訪問拉薩一年之後，在桑伊監獄三千名犯人面前，摘去了丹增曲扎醫生的「壞分子」帽子，宣布他自由了。接著，他接到通知，說洛桑三旦的要求已經得到批准。他獲準可以去印度。數百人得知他即將啟程的消息後，連忙來看他，帶來了送給達賴喇嘛的信。由於他無法帶走這麼多信，因此他答應親口告訴達賴喇嘛西藏的情況是多麼糟糕。同時，在臨行前夕監獄領導為他舉行的茶話會上，丹增曲扎醫生畢恭畢敬地發誓，要遵照黨的最新行為準則「事實求是」辦事。翌日，他乘吉普車抵日喀則，接著到了尼泊爾邊界。在西藏一側有個人民解放軍崗亭，一名站得筆直的哨兵身邊是一面中國的五星紅旗。尼中友誼橋下納楠（4）河水奔騰不息，橋的另一側飄揚著尼泊爾王國的雙三角形國旗，旗下是海關，尼泊爾士兵在海關旁邊喝茶休息。曲扎醫生與另一位藏人同行。當他站在橋上的紅色分界線上時，回頭最後一次看了看那位解放軍戰士。二十一年來他第一次真正體會到的自由感湧上心頭，意識到已經擺脫了看守的控制之後，他大聲叫道：「現在，讓你們全部中國人都見鬼去吧！但願我永遠不會再看到你們！」接著他笑了笑，但不知怎的也感到有點茫然，他從另一半橋面上走了過去，踏上了尼泊爾的國土。

曲扎醫生繼續講述自己的歷史：「洛桑三旦的一位朋友在邊界線接我。他開了一家餐館，開車送我到加德滿都。我們到達城裡時，一片嘈雜喧嘩聲，我一點都沒有寧靜感。我想休息輕鬆一下，但卻禁不住要這樣想：『這裡什麼時候出現問題呢？什麼時候會出現不安定期呢？什麼時候麻煩會降臨此處呢？加德滿都是座小城市，尼泊爾同西藏相比小得可憐，如果中國人願意的話，他們只需一兩個小時就可顛覆尼泊爾全國。』由於我腦子裡像團麻，所以我的全部感受也就是這些。一切似乎都不穩妥。」

丹增曲扎在加德滿都幾乎待了一個星期，然後乘飛機來到印度。在他自由後的開始那些日子裡，矛盾的想法一直佔據了他的心思。

他說：「我來到加德滿都城裡時，對人民的富有感到十分驚奇。看到商店裡那麼多商品，街上的所有轎車和摩托車都是私人財產，令人感到震驚。在全西藏，無論是買還是賣，人們都沒看見過一件像樣的炊具。我開口向主人提問：『這些轎車是尼泊爾製造的還是從印度進口的？』他回答說：『都不是，大多數是日本貨。』接著我又問：『一輛轎車要多少錢？』他告訴我：『哦，約五萬至六萬個盧比。』我完全驚呆了，因為將拉薩所有家庭的錢集中在一起，他們仍然買不起一輛轎車，而這裡不少人卻自己有車。」

曲扎醫生到了印度後，迷惑感進一步加強。他說：「我是晚上乘飛機離開加德滿都前往新德里的。我的一切想法就是急切想見到神聖的達賴喇嘛。但第二天，我穿過新德里時，再次感到茫然。這裡的富有程度又遠遠比尼泊爾高。我忍不住這樣想：『這個世界真是不公平。在西藏，人們終日操勞為的就是糊口，而這裡的人們卻如此富有！』我仍記得一家銀器商店和一家肉店。我看著人們在這兩家商店裡購買時，意識到：『哦，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國。如果你有錢的話，你愛買多少就買多少，誰也不會阻攔你。』在西藏，無東西可買，沒有產品，無人有錢。接著，我看到了四處漫遊的印度婦女，他們衣著華麗，無所事事。我心想：『這可真是自由世界。如果人們樂意，他們可以悠閒自在。』我心中老是納悶：『人民並不是時時都在幹活，那他們是怎麼得到了這麼大改進的呢？』在西藏，每個人都在不停地工作，尤其是婦女，日夜操勞。但是西藏仍無改進，而在印度，沒有人幹活，但什麼東西都很富有。這樣的發展一定是自由帶來的結果，但這是怎麼回事，我仍不得其解。」

1980年11月19日，丹增曲扎來到達蘭薩拉，又與洛桑三旦重逢了。在麥克累德干基的流亡政府招待所給他安排了一個房間。儘管他希望按照傳統方式（即在吉祥日）拜見達賴喇嘛，但他卻被立即召往德慶措林。他身著新藏裝，脫下了在拉薩發給他的那雙藍色運動鞋，換上了一雙新皮鞋。他步行穿過麥克累德干基的主街道，從遠遠的另一頭出了鎮子，在走到流亡者的大昭寺後的佛教學校時，他看到了一些年輕喇嘛，他們分組排好隊正在上上午的辯經課。接著，在達賴喇嘛住宅院子的大門口，他受到了一位秘書的迎接；秘書領著他從繫著頭巾的印度衛兵身邊經過，沿著山坡朝上面的西藏領袖的辦公室走去。他手捧一條哈達，緊張地穿過了擺著一線鮮花的走廊，走進了一個大房間，裡面掛了一些五彩繽紛的唐嘎。達賴喇嘛滿臉堆笑，正在等候他。曲扎醫生描述當時的情景：「我一見到神聖的達賴喇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失聲痛哭。他將我領到一張椅子跟前，坐在我身旁。他吩咐上茶。我盡力想張口說話，但就是講不出來。每每我開口要說話時，就會痛哭流涕。神聖的達賴喇嘛耐心地坐在那裡，最終上了茶之後，我的心情也就平靜下來了。我們交談時，我注意到他已經老了許多。當然，我上次見到他時，他還很年輕，現在他已進入中年了。但他看上去氣色很好。我知道他對世界已經有了很多的了解，這一點可與我們以前在西藏時大不一樣。我非常高興，因為雖然我一直很擔心，但他卻過得相當舒適。一切很好。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神聖的達賴喇嘛身體很好。」

與達賴喇嘛見過面之後，丹增曲扎參觀了噶廈。然而就在這裡，新舊西藏社會的變遷，重新激起了他不平靜的心情。

他解釋說：「噶廈的辦公室，似乎比神聖的達賴喇嘛的還要好。他們的辦公室看上去裝飾更多，更華麗。我感到心情不安，十分氣憤。我心想：『現在的世界可真是上下顛倒。我們的領袖坐在小小的墊子上，而他的政府官員坐的卻是厚墊子，並且在他們面前還鋪上了漂亮的藏式地毯。』我明白我是舊西藏過來的人，但我認為這種新的平等是不對的。而且，我四處看了看達蘭薩拉的那些高樓大廈，如圖書館、政府的幾座大樓、藏醫中心等，心中只犯疑，難道這些流亡的藏人真不打算返回西藏了嗎？我問他們：『這些建築是你們花錢買嗎？』他們說：『是的。』我禁不住心想，這筆錢應該節省下來，留待我們獲得自由時再用。但是，我的觀點現在也逐漸在發生變化。我認識到，二十多年時間是非幹些事情不可的。也許西藏問題不是很快就能獲得解決的。因此，印度的藏人也必須有個地方定居。我認識到政府官員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我們自由的希望，的確寄託在西藏境外的藏人身上。」

儘管曲扎醫生在適應監獄外生活和西藏境外生活時困難不小，但他很快就一心一意地履行藏醫中心醫院和製藥廠領導的職責，這個職務是新近任命的。他受命出任達賴喇嘛的首席私人醫生，因此每天剛剛破曉，他就得步行去德慶措林給領袖看脈。在達賴喇嘛的支持下，他主持了製造「措柏（5）」的工作，它是藥效最烈的藏藥，他出國之前，西藏難民社會中無人知道其成份。曲扎醫生從門孜康院長肯繞羅布那裡直接得到了這種藥的配方，他樂意在這種藥失傳以前，就將它傳授給別人。在達賴喇嘛的堅持下，製作了這種藥——參加製作的藥師有十八人，一天二十四小時輪流工作，不能中斷，就在德慶措林大院內，連續幹了三個月。這樣，達賴喇嘛也可以觀察這種藥的製作。該項工作成功結束之後，這次生產的「措柏」是藏醫史上數量最大的。如果它與其他藥配用，療效可以大大提高。取得這一成就之後，曲扎醫生回顧了自己的命運和整個西藏的命運。他說：「我們那幫被解去中國的犯人共有七十六個，但現在倖存下來的只有四人。我是其中之一，重要的藏藥『措柏』也保留下來了。整個西藏也是如此。我們幾乎喪失了一切，但我們卻沒有喪失。我們熬過來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其遺囑中就警告過我們，告訴我們在前面等候的是什麼。他明確告訴大家，如果人們按宗教信條辦事，不一切從個人利益出發爾虞我詐，這場災難也就可以避免。但西藏人民無視他的忠告，結果西藏成了乞丐之國。現在，西藏境內外的人都步步不離白雲之路——即宗教之路。我們的信仰得到了加強。對於將來，我們寄一切希望於這一信念，於神聖的達賴喇嘛的指導。」

達蘭薩拉，1983年1月21日凌晨四點。達賴喇嘛山頭別墅裡的鬧鐘發出了悅耳的響聲。丹增嘉措被驚醒，起床，洗漱，穿好衣服之後，他穿過一間連通房來到了別墅的正中。外面夜空烏雲壓頂。大昭寺朦朧的輪廓後面是崇山峻嶺。德慶措林的大門口，一名孤零零的印度兵在持槍站崗。達賴喇嘛別墅裡燈火齊明，侍者們在樓下自己的住處忙亂開了，壺已經放在爐子上燒茶，準備今天第一壺酥油茶。

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大房子裡，丹增嘉措站在一尊鍍金的觀世音像前。他雙手合十，五體投地叩了三個長頭，然後坐在佛像左邊的墊子上，用右手的衣袖擦拭著一個小銅盤的表面。他朝盤子上一把一把地撒大米，還一邊祈禱和觀想，逐漸堆起了一個三層的錐形物。這是個曼荼羅，有些環形寬帶支撐，最上面是陽盤和陰盤，曼荼羅代表的是宇宙。曼荼羅做好之後，達賴喇嘛將它獻給了海會諸佛，並請求他們繼續減輕眾生萬物的痛苦。五點三十分整，他向左邊靠了靠，拿出了一架很大的短波收音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部播放的國際新聞節目。法國總統密特朗抵達波昂參加西德——法國友好條約簽訂

二十週年的慶祝活動。兩天之後，蘇聯的一顆核動力人造衛星將返回地球。雷根總統呼籲在世界各地建立「民主學院」。聽完新聞之後，他繼續打坐。六點，他步入書房，這是個窄小的房間，裡面鋪了栗色地毯，位於別墅的後部。書房的窗戶周圍有一線粉紅、白色鮮花，上面已經灑上了晨曦，黎明已經來臨，麻雀和燕雀在冷杉林和達賴喇嘛吊在附近的一個木鳥籠之間飛來飛去，他的房間裡回盪著鳥兒的歌唱聲。丹增嘉措坐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肖像下方，像框的一角還夾著一張圖案是菩提伽耶的彩色明信片；他眼睛盯著對面一個擺設得整整齊齊的佛龕盒，它左邊有一張門通向他的工作間，裡面一堆破表還有待修理。書房的前部傳來喃喃說話聲，達賴喇嘛的首席侍從洛桑甲哇走了進來，將早餐盤放在一張低矮的桌子上，盤中放了烤麵包、茶、玉米片和點心，他回答了達賴喇嘛的招呼，然後走了；這時西藏領袖打開了一捲布面裝訂的經書，邊念書邊吃早餐。

七點鐘，丹增嘉措離開了他的住宅，從一段很陡的樓梯上走下來，走到了一輛米色汽車跟前，噶廈成員列隊送他；與他們告別之後，他乘車經過自己的溫室和辦公區域，這裡有兩輛大使牌轎車在等候，裡面坐著他的九名隨行人員。這些車輛一起駛離得慶措林，繞過了前面的大昭寺，在麥克累德干基的邊緣來了個右轉彎，小心翼翼地沿著後面那條又陡又險的公路駛行，路過了秘書處院子甘村基榮（崗慶基雄），穿過了卡特瓦里集市的寂靜街道；儘管當時一段時間都趕上了冬天的倒霉天氣，但那天的氣候倒還十分宜人。阿里仁波齊與丹增曲扎醫生和新德里的新任聯絡官 AN 凱納先生同乘第二輛車。阿里仁波齊說，達蘭薩拉特別暖和。車隊離平原越近，氣溫就越低。車隊從丘陵地帶的小山之間鑽了出來，插進了帕坦科特秩序混亂的車隊行列。這時阿里仁波齊將車窗搖上來擋寒氣，根本就不去注意大家熟悉的那些塵土滿目的大樓和它們那些東倒西歪的陽台，它們似乎會從那些死氣沉沉的牆上倒下來。然後，他們將帕坦科特甩在身後，開始了橫跨旁遮普邦的艱苦行程。他們扎了一個輪胎，在路上遭到了當地養路工的好一陣子圍觀，這才於兩個半小時後抵達阿姆利則機場。

TC-424 航班是小型噴氣式飛機，每天往返新德里和斯利尼加一次。它於三點十五分起飛，前往首都新德里。上飛機後，達賴喇嘛坐在一位克什米爾穆斯林教徒身邊，他們談個不停，直到身著莎麗服的空中小姐提著一藍糖果露面，他們才中止交談，這時飛機已降落在巴蘭機場。丹增嘉措向他的同伴告別後，下了飛機，在機場上受到了外交部北部司官員的迎接。在機場大樓遠處的另一頭，三百名藏人正在等候，他們中間還有一個學校樂隊，它屬於瑪基汝卡蒂拉難民營。他們揚起了印度國旗和西藏旗，笛聲鑼聲齊鳴，孩子們在唱「荷花之主」歌，這是對西藏的保護聖人觀世音的頌歌，他們還唱了西藏舊軍隊樂隊最喜歡演奏的歌曲。然後，達賴喇嘛驅車來到阿育王飯店，它是隸屬於印度旅遊部的國營飯店。在後來的兩天時間裡，達賴喇嘛就在這座飯店裡的一棟沙岩大樓四樓的一個套間裡接見各方面人士。

1月24日上午十點三十分，丹增嘉措離開阿育王飯店，去完成他新德里之行的使命。一輛警車從飯店富有氣派的拱門下開出來，在前面開路，沿著通往國會大廈的林蔭大街開道行駛。這座大廈週長有半英里，四周全是開放式柱廊。汽車開到大廈寬敞的門廊下，達賴喇嘛走進大樓，右轉彎後，被人領進了總理的特別助手辦公室，這裡緊靠人民院的大廳。在這裡他受到了英蒂拉·甘地的迎接，甘地夫人領著他經過連通門，走進了她自己的辦公室。這間辦公室的樓板是用木塊鑲拼的，俯瞰國會大廈樓內的玫瑰花園和噴泉。他們的會談絕對保密。顯而易見，他們討論的是些重要問題。最近，印度和中國已經開始談判解決邊界爭端。但對這次會議有所耳聞的藏人卻認為不可能討論這一問題。達賴喇嘛也不會要求印度於一個月後在新德里舉行的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提出西藏問題。只有一件事可能性似乎較大——達蘭薩拉與北京之間關係的發展十分重要，非向印度總理通報不可。這是令人頭痛的問題，達賴喇嘛一小時後離去時，沒有作任何解釋，甚至一點也沒有向外透露，這也是預料之中的事。而且，達賴喇嘛一行第二天上午就乘車離開了阿育王飯店，來到了巴蘭機場。在機場耽誤了兩個小時之後，他們登上 IC-489 航班，飛抵比哈爾邦首都巴特那。

下午晚些時候，遠處像火箭一樣的轉塔式菩提伽耶寺映入眼簾。廟體四周的大石塊沐浴著五彩燈光，聳立在平原上。接著，當達賴喇嘛車隊的開道車經過右側的日本寺時，寺頂傳來了長長的藏式法號聲，宛如雷鳴，在前方回蕩。接著，泰國寺、中國寺、最後是西藏寺也吹奏法號，如同接力賽一般。一路上都有歡迎牌樓，汽車驟然放慢車速，幾乎像煞了車一樣。約三萬藏人沿公路兩側站立，隊伍長達二英里多，手捧哈達、香火和鮮花。他們中間還有從西藏來的五百名香客，不僅他們身上破破爛爛的長袍可以證實這一點，而且達賴喇嘛乘坐的轎車從他們身邊駛過去時，人們哭聲不己，幾乎無一例外。菩提伽耶的西藏寺的僧人頭戴有頂飾的黃帽，手握彩色勝利幡，敲鑼擊鈸吹號，站在寺院門口歡迎達賴喇嘛。他被領進了二樓的房間，這裡通常是給達賴喇嘛安排的，隨行人員卻來到餐廳就餐，外面的人群也都回到鄰近的帳篷城裡吃飯去了。

2月1日上午八點三十分，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寺。他跟在一隊身著卡噠制服的警察身後，朝菩提伽耶走去。他從西門進入，繞著外面最高的環行道轉經，然後走下來，進了殿堂，接著繞過寺廟來到了那棵菩提樹下。當他雙手合十，滿面笑容來到

人群跟前時，全體起立。天氣晴朗，十分暖和，花園裡充滿了鳥語花香。這棵菩提樹就像一條揚起了若干綠色風帆的大船，上面掛了許多三角旗和經幡。達賴喇嘛叩了個長頭，動作敏捷，身著講經用的長袍，登上了包著錦緞的寶座，上面有一個紅藍兩色相間的華蓋。他將手錶正面朝上放在右側的一張桌子上，這時聚集在這裡的幾千人已經叩完了長頭，幾千張臉最後一次抬起來，因為接著他們就得紋絲不動地聽達賴喇嘛講話。領經師領著大家唱開場用的幾句祈禱詞，祈禱剛結束，幾百條哈達就像無聲的排炮一樣，從觀眾的後部扔到樹上和寶座前。扔到前面後，簡直就成了哈達的海洋，一排排的觀眾像接力賽跑一樣一次又一次將哈達捲起來，向前拋去。人們拋擲了五分鐘，這時坐在前排的高級喇嘛如同漂浮在從天而降的一片白棉組成的雲海中。他們將雙膝前面的地方清了清，身體前傾，認真聽取達賴喇嘛開始講話。像以往一樣，達賴喇嘛開始講經時，總是要說一說從事宗教活動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益的。但在今天，他接著就公佈了一條消息，不僅介紹了他與英蒂拉·甘地會見的情況，而且這番話也是他進入流亡生活二十四年來所發表的最重要的講話之一。

他講完一半時，語氣隨和地宣布：「如果條件許可的話，我正在考慮於 1985 年某個時候訪問西藏。」講到這裡，為了使人們放心，他連忙又說：「我不會落入任何圈套，因為我同中國人打交道已有三十年的歷史了。」

達賴喇嘛的這番話偏選在他的信仰中心發表，這對西藏難民來說象徵著大步躍進。達蘭薩拉和北京的關係陷入僵局三年以來，西藏難民社會又充滿了期待的心情。雖然進行了大量思考，但丹增嘉措似乎仍對目前政治上的各種細微差別置之不顧。從菩提伽耶返回之後，他就已經在考慮將來，憧憬著西藏重新掌握自己命運的那一天。他坐在書桌前，桌子上政府送來的各種報告堆得高高的，思考著那一刻。他解釋說：「我們在印度期間，就根據我們的憲法草案，為西藏的未來準備了某種解決問題的方案。在異國他鄉，我們亦盡力實施這一方案。將來，我們要從這裡向西藏境內的人民解釋說明。大家清楚，我們還要進行商討，但最後的決定權在西藏境內的藏族人民手中。他們的確受了磨難。是他們的決心激勵了我們。尤其是藏族青年，他們經歷了重重困難，獲得了有益的經驗。我充滿信心，他們一定會踏上正確的軌道。」

至於遙遠的將來，達賴喇嘛透露，長期以來他一直在考慮引退，不過這樣做就是要大大改變達賴喇嘛的地位性質，隨著也就可以改變西藏政府的地位。接著，他以講求實際的口吻繼續說了下去，「許多預言表明，我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整個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許達賴喇嘛根本就無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即使要保留達賴喇嘛，選定新達賴喇嘛的方式也會與傳統的方式不同。我可能親自選定繼任的達賴喇嘛。這樣，一旦我選定了繼任人之後，我就成了多餘的達賴喇嘛。」他笑著補充了一句：「那時我也就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佛教僧侶。無論如何，未來是開放的，廣闊的。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總的來說，如果我們小心謹慎地對待自己眼前的局勢，並將自己的信仰付諸實踐，結果可能會很好。關於西藏未來的某些預言就是這樣說的，我自己對此一直深信不疑。」

譯注

- (1) Qin Cheng 的音譯。
- (2) 原文如此。
- (3) 原文如此。
- (4) Nyanang 的音譯，當地人稱之為樟曲。
- (5) Tsother 的音譯。...

後記

1984年12月16日，第二個參觀團從北京訪問歸來六天之後，達賴喇嘛宣布說，他將不於1985年訪問西藏。長達一個月的最後一輪會談，不過是又一次突出了西藏與中國之間的分歧。會談期間，中國報紙公佈了達賴喇嘛返回的五項條件。其中包括要求達賴喇嘛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並要他和他的代表們「不要糾纏於… …1959年的事件」。最後一項條件要求，如果達賴喇嘛選擇「返回」，他可以「對報界發表一項簡短的聲明」，並「由他自己決定說些什麼」。

當西藏難民對中國的條件表示強烈的反對時，達賴喇嘛自己的反映卻是溫和的。在他的聲明中提到，中國只提及他個人的地位問題，因而又一次有益或無意地避開了西藏人民的命運這一關鍵問題。聲明中說：「只要西藏人民沒有得到完全的滿足，就不用談我回去的問題了。」達賴喇嘛在聲明的結束語中談到雙方關係的最新步驟時說，儘管1985年的訪問已無可能，他仍舊希望在將來「對西藏做一次簡短的訪問」。

約翰.F.艾夫唐

1985年